



任弼时传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任弼时传

任弼时传

目 录

一、童年纪略	(1)
二、少年纪学	(8)
三、五四启蒙	(22)
四、“到俄国去!”	(34)
五、在东方大学的熔炉里	(46)
六、共青团的“三大”	(69)
七、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87)
八、努力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	(108)
九、在第一个风浪中	(133)
十、“暴动是一种艺术”	(155)
十一、留守中共中央	(175)
十二、在中共江苏省委	(205)
十三、从湖北省委到长江局	(236)
十四、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268)
十五、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289)

十六、宁都会议	(323)
十七、湘赣纵横	(352)
十八、先遣长征	(383)
十九、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408)
二十、湘鄂川黔保卫战	(440)
二十一、长征途中（上）	(466)
二十二、长征途中（下）	(499)
二十三、西安事变前后	(532)
二十四、从云阳改编到山西抗战	(562)
二十五、在共产国际的日子里	(601)
二十六、回到延安	(629)
二十七、整风运动的前奏	(654)
二十八、延安整风（上）	(683)
二十九、延安整风（下）	(713)
三十、整顿经济，发展力量	(737)
三十一、党的历史性盛会	(766)
三十二、保卫胜利果实，制止反共内战	(792)
三十三、全面内战前夕	(821)
三十四、当和谈之门被关闭时	(852)
三十五、风雨战陕北	(878)
三十六、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 错误	(922)
三十七、春风送暖到平山	(955)

三十八、西柏坡的日日夜夜	(984)
三十九、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1020)
注释	(1055)
后记	(1120)

一、童年纪略

一九〇四年四月三十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傍晚时分，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任家新屋。

唐家桥在汨罗市的南部、距离爱国诗人屈原的故宅约七八十华里。北临长江，西濒洞庭。蜿蜒曲折的白沙河绕过唐家桥。白沙河平日河水淙淙，浅可徒涉，唐家桥以下，水势渐大，到五里外的徐家桥，便可通农家的小船，但一到雨季，山洪爆发，洪水奔泻入河，白沙河顿时水深齐腰；洪水经捞刀河宣泄入湘江，汇入波光粼粼的洞庭后，唐家桥附近的河床里，平静的水流淙淙如常。任弼时童年时期，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在河边打水漂、摸鱼虾、逮青蛙。

白沙河的西面是明月山，东面是颖珠山，是南岳衡山的余脉，明月山不高，所谓“上七里，下八里”，颖珠山更低一些，“上三里，下四里”。两山林木葱郁。

傍河两岸，丘陵起伏，山塘水田，茶树满坡，一派江南风光。白沙河西岸，有一条与河平行的古驿道。据郭嵩焘撰写的《湘阴县志》记载，元时，这一带设水陆两驿，筑南北通衢，北通大都，南达广东。自十三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接待过往官吏、运送钱粮贡品、传递往来文书的要道。唐家桥是一个驿站。二十世纪初，粤汉铁路通车，古驿道废了，驿站改为邮政代办所。多少年来，这条驿道给这个小小村落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信息。

任姓家族在当地是一个望族。老宅原在白沙河西面的冷水井。清末，任弼时的曾祖一辈在河东营建新宅，这就是新屋。新屋前后三进，加一罩顶。青砖落地，马头墙高耸；背倚山丘，面临水塘，四周竹木林立。进门的堂上当年悬着两块匾，上书：“望重龙门”、“光照璧水”，表明宅主是书香门第。据县志记载，任弼时的远祖任应庚，光绪年间，补用广西太平府知府，祖父任芝坞例授登仕郎。但是，他们仕途不畅，所以告诫后辈，居官艰难，不如读书明理，开发民智。后辈子弟果然读书兴学的不少。任氏族谱中，二十二世裕字辈子弟，学历都比较高，有的是清代高等学堂毕业生，有的是中路师范（后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和明德师范的毕业生，其中较知名的是任弼时的两位堂叔父：一位叫任裕恒，名恺南，清末官费留学

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报馆被查封后，即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先后六年。回国后，不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之聘，回长沙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及大麓中学。一九二六年，任湖南大学校长，是和马寅初齐名的经济学家，曾有“南任北马”之称。^①另一位是任裕敬，号理卿，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毕业后，一九一九年，考取“庚款”留学，入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是我国第一代的纺织工程专家。任理卿长任弼时九岁，“少年叔侄如兄弟”，青少年时代和任弼时交往甚密。

任弼时的父亲名裕道，又名思度、扬烈，号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在家乡开设一个蒙学馆叫“时中馆”，以教书为业。每年可从族中公田收的租谷中分得稻谷二三十担，零用开支，全仗“束俸”^②收入，家境并不宽余。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日本，爱国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势垂危，纷纷起来鼓吹变法维新。浏阳的谭嗣同和康有为一起，认为“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于是在长沙办时务学堂，创设南学会，出版《湘报》，竭力提倡民权、平等的学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殉难，省内各维新事项一律停办，但各地办新学，兴实业的潮流已势不可当。

一九〇三年，长沙的明德学堂附设速成师范班，

湘阴县师范学校也开办速成班，专门训练乡间的私塾教师。任裕道进了湘阴师范学校，他的小叔任岱云（任理卿的父亲）则进了长沙明德学堂的速成师范班。半年后叔侄俩结业回乡，在新屋里办起了一所求志学堂，从此讲授的不再是诗云、子曰的旧书，而是国文、算术、音乐、美术、体操等新课程。当时，新学初入民间，需要劝学，求志学堂首先招收族中子弟及亲戚的子女入学，男女兼收，使村里的风气为之一新。新屋的堂屋两边，悬起一副对联，上联是“崇文世第”，下联是“尚武精神”。每到上体操课时，门前的池塘边上树起箭垛，学生站在池塘的另一边，拉满弓，嗖嗖嗖，飞矢越过池塘射向箭垛。晚间，求志学堂还办起农民学校，吸收附近农民入学。^③

任弼时出生后，按照族谱的辈序：孔、孟、开、科、甲，光、裕、培、基、学，他应属“培”字辈，任裕道便为他起名培国，寓爱国、卫国、强国之意。“弼时”是后来参加革命时改用的。

任思度原配长沙陈氏，婚后不久丧偶，续弦长沙朱氏，即任弼时的生母。朱氏先后生三男三女，任弼时的兄培直、弟培达，均早夭。他排行第二，所以号二南。三个妹妹，即培月、培星、培辰。任裕道和前妻感情甚笃，常言道，“一代亲，二代疏，三代四代无人走”，为了纪念亡妻，他按照指腹为婚的旧习俗，

约定倘若生下男孩就和岳家的侄女陈琮英结成姻亲，以维持亲戚旧谊。^④这种以子女婚姻来维系上辈的亲戚关系，是一种落后的民风，但和买卖婚姻的“童养媳”是有所不同的。

任弼时的父亲思想开明，性情温和，对子女慈祥和蔼，母亲朱宜，勤劳家务，忠厚贤良。任弼时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给他讲岳武穆精忠报国的历史，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背诵“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诗篇。四十年后，任弼时在北京郊区玉泉山下养病的时节，还探笔录写《木兰辞》以自娱。

汨罗市境内，有许多屈原的遗迹。玉笥山上的屈子祠，汨罗江畔的独醒亭，招屈亭和汨罗山上的屈原墓，颂扬着这位“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楚国爱国名臣，后代文人的碑联，吟咏着他可与日月争光的洁志廉行：“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宋时，苏东坡则高度称赞屈原的爱国诗篇，他写道：“诗笔离骚亦时用，文章尔雅称吾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来屈子祠时，有联：“旨远辞高，同风雅并体；行廉志洁，与日月齐光。”

每年端午节时，当地人民包粽子、赛龙舟，来纪念屈原。这一天，汨罗江上千舟竞发，力争上游。唐朝的诗人刘禹锡在《竞渡曲》中曾写道：“曲终人散

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屈原的爱国精神，如汨罗江的流水，滋润着后人；这一天，千家万户还在门窗上悬挂着菖蒲和艾叶，又用雄黄烧酒喷洒，菖蒲和艾叶烟薰各居室，说是“辟邪”，实是消灭害虫，正如墙上贴的纸条所写：“五月五日午时节，百般虫蚁皆灭绝。”幼年的任弼时，这时特别兴奋，他手执菖蒲剑，艾叶旗，脑门上用雄黄酒写个“王”字，像戏台上的勇士一般，在家居各室穿梭似地奔跑。待安静下来时，父亲就向他讲述屈原的故事。

从唐家桥往北到长江边，有名的岳阳楼临江耸立，宋人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传千古，成为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

任弼时就在秀丽的山川和灿烂的历史文化薰陶下，开始启蒙。

1912 年任弼时（培国）主读作民小学的修业文凭

二、少年纪学

求志学堂创办以后，唐家桥一带接连办起作民小学，进德小学，仰山庙小学和同德小学。因为经费困难，求志学堂办了两年后就难于继续了。校长任岱云只好把学校交给任氏家族接办。任家祠堂有一部分义田，每年收入颇丰，除了用于祭祀外，就用来办学。求志学堂并入毛塘族祠的学校后，改名为序贤小学，任岱云任校长。任裕道则应聘入作民小学教国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任弼时七岁，正式入作民小学求学。作民小学离唐家桥新屋二十多华里，任裕道是住校的教师，任弼时也随父亲一起住在学校里。他朝夕在父亲督促和辅导下，孜孜地勤读，作民小学授给他的修业证书上写道：“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秀等。”^①

辛亥革命后，古老的中国废除了帝制，民心振奋。争民权，谋自立，兴科学，办实业的风气大开。序贤学校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扩充规模。序贤学校的校址原是任姓宗祠，初建校时，只有两间教室，四十多个学生。族人鉴于科举已废，协议扩建学校，于是搬走两侧的神龛，废弃佛像，扩建成教室，辟事务室、膳堂等，增加教师，扩招学生；还在范蒲山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女子职业学校，半天学文化，半天习缝纫，任姓子弟中的女性，多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为了筹集经费，将族田收入中原先用于“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的费用，改为办学基金，又倡导族人捐资，所以序贤学校经费较为充裕，师资设备均属优良。任裕道因此辞去作民小学的教职，转到序贤小学任教。一九一四年春节刚过，序贤小学的师生，排成队，站在新教室前，欢迎新来的教师任裕道。这时，裕道先生健步进入序贤小学，在他身后跟着的是十岁的任培国，他持着作民小学的肄业证书，插入序贤小学的三年级学习。他仍和父亲一起，住在学校里，只有在节假日，才回唐家桥去看访母亲和妹妹。

随着新学深入民间，民主主义的思想，通过觉醒的教师输入课堂。从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的任弼时的作业本中，可以看出他启蒙时期的思想脉络。在《民生在勤》的作文中，他写道：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知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也。”^②

在《自立》一文中又写道：

“自立之道，不可倚赖他人……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作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③

童年时代的作文，尽管充满着稚气，但爱国，勤劳，自立，自振的思想火花，粲然于笔端。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如洪水一般倾入中国内地。在湖南境内，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据一九一一年的统计，长岳两地海关进口洋货达银七百六十二万两，而出口货物仅只五百二十七两，相当于进口的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分之一。^④洋货倾销，利权外溢，国人无不忧虑。于是抵制洋货，爱用国货之呼声遍于全国。少年任弼时爱国御侮的思想，首先从抵制洋货方面萌发。他在《爱国》和《拟御侮之策》两文中写道：

“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

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外人有言，我国热心惟有十五分钟。吾国四万万同胞，本爱身之心以爱国，一则免受外人讥评，且不至为外人奴隶，则幸甚”；“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之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说者谓：吾国一日不买日货，则彼受一日之影响，若一岁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此策也，吾亦为然。”^⑤

“十五分钟热度”，是洋人对中国人做事没有恒心的讥讽，同时流传的还有鄙视中国人民的“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等说。对此，有人麻木甚至沉溺于自尊自大的可怕状态中，鲁迅乃作《阿Q正传》，把“精神胜利法”视为国民的劣根性以醒世。先进的人们从痛苦的现实中寻找出路，少年任弼时，开始求索着。有一次，教师命题作文，题为《合群说》，任弼时写道：

“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故各国重学会，士农工商莫不皆然。……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⑥

在另一篇作文中，他写了一个宋人富弼“识量过

人，不好计较”的故事。说有一天，邻人咒骂富弼，富弼听了，不予计较，不予纷争。富弼回答说：我和他没有宿怨，没有利益之争，天下之大，人民之众，岂能没有同名同姓的人。这话传到咒骂富弼的邻人耳里，甚感惭愧。任弼时接着写道：“故人知礼让者，则能结大团体；不明礼让者，至于左右近舍，每相纷争。若中有气量者，以潜移之，自然皆感化矣。吾人在校读书，必明礼让，岂可不以纷争为戒哉！”^⑦

“识量过人，不好计较”，是结大团体者必具的品格，这是任弼时童年自励的信条之一。

任弼时在序贤学校时期的作文中，还有《说公德》，《说阅报之益》，《说运动之益》，《说清洁之益》等等，足见序贤学校的教育内容已经开始摆脱孔孟之道的传统思想，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已如春雨滋润的籽种，在任弼时的心田中渐渐萌发。

一九一五年夏天，任弼时在序贤小学初小毕业。这时，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设高小部招收新生，父亲写信给长沙的亲戚，问明情况后决定让任弼时去投考。那时，从唐家桥到长沙要走八九十里旱路，过三次渡，任弼时在父亲带领下，徒步去长沙投考。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秀丽的妙高峰下，

一排崭齐的铁栏杆，围着一座新建的西式楼房，在当时堪称富丽堂皇。学校的前身是城南书院，后来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再改名为第一师范学校。全校分为三部分：国民教育部，师范部和附属高小部，规模宏大，师资优良，是全省卓有声望的学府。任弼时被录取后，从此离开了家乡，告别了父母和妹妹，开始新的学习生活。这时，他才十一岁。

从湘阴的乡村，来到省城长沙，任弼时的见闻增加了，视野渐渐扩大了。初到长沙，他和同学结伴，攀登妙高峰，游历岳麓山；在天心阁访古，爱晚亭畔吟咏。晚饭之后，步出校门，不远处就是粤汉铁路的长（沙）株（洲）段，南来北往的列车呼啸而过，再往前，便是滔滔湘江，帆影点点，火轮穿梭；水陆洲头，橙黄桔绿，美可入画。他自幼喜爱丹青，有一次，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一幅山水，远山近树，竹篱茅舍，他伫立良久，“甚为羡慕。或问其价，曰百金。予为哑然！”^⑧在列强侵略，军阀纷争的年代，大好山河，面临着血雨腥风，这不能不使爱国学子为之担忧。

就在这年冬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出丑剧——袁世凯称帝。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惜为时不久，在革命党人的妥协下，北洋军阀首领袁

任弼时（培国）小学图画作业手迹

世凯取孙中山而代之，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竟然定于一九一六年元旦恢复帝制，改号“洪宪”。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蔡松坡）等在云南通电起义，组织护国军，声讨袁世凯，全国纷起响应。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的袁世凯被逼下台，不到两个半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成为千古笑料。

湖南督军汤芑铭，是袁世凯的走卒，在湖南杀人很多，湘人称他为“汤屠户”。主子一倒台，走卒自然站不住了。程潜等在湖南发动“驱汤运动”，“汤屠户”不得不仓惶退出长沙。

七月初，任弼时正在家乡过暑假，一天，炮声隆隆，“汤屠户”的败兵出长沙北门，沿着古驿道溃退。“毛塘一带，漫山塞野，蹂躏殆遍，一时避难诸民有中枪死者，有坠岩死者，呼号之声，惨不忍闻”。^⑨眼看汤兵快到唐家桥了，任裕道只好率全家暂避到山区。汤兵一到，打家劫舍。任弼时家里“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后来，他在作文中追述道：“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从此，家庭经济更加拮据了。

任弼时进入第一师范时，毛泽东（润芝）正在第一师范就读。他是一九一三年入学的，同时在校的还有蔡和森、张昆弟、萧子章（萧三）等，萧是一师附

小的体育教师。他们不但是在校内传播革命思想的骨干，也是长沙学生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人物，第一师范学校因而在政治上颇为活跃。学校成立了学友会，组织同学参预校政，开展课外活动，在当时湖南各学校中这是破天荒的事。学生组织的活动内容包括演讲、竞球、竞走、音乐等等。新入学的第一年，任弼时参加了以“练习语言，增加知识”为宗旨的演讲部，第二年，他参加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四部，他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了。

在初小学习时，任弼时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即使寒暑假期间，也请长沙的亲戚经常给他寄报纸来读。第一师范学校的自修室里，每到晚间，楼上楼下灯火通明。任弼时常常坐在阅览室里，仔细地翻阅报纸，注意时事。一九一六年秋，对任弼时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老西开”事件。老西开在天津，法国人为了扩大租界范围，强占老西开地区，公然拘捕中国的警察。十月二十五日，天津市民八千余人，举行公民大会，决议罢工罢课罢市，以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竟然答应老西开由“中法共管”，国人甚为愤慨。另一件是爱国名将蔡锷的逝世。蔡锷是湖南邵阳人，起兵讨袁后，任四川省督军，因病去日本福冈医院治疗，不幸于十一月八日病逝。噩耗传来，国人同声痛惜，“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

千山排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松坡《登岳麓》的豪壮诗篇，岳麓山下的长沙人民，读来尤其令人声泪俱下。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省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任弼时和第一师范的同学们一起参加追悼。会后，他在作文中盛赞蔡松坡“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他感慨系之地写道：

“今日吾国何时乎？内忧外患，频仍叠起，龙济光、张勋等引兵自卫，……老西开郑家屯之案，受外人之压迫，无人抵抗，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惟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蔡松坡之死，在任弼时的心目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任弼时孜孜学习历史和地理，涉猎中外名人传记，从中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初探人生的道路。在任弼时故居陈列馆里，完好地保存着任弼时在一师附小学习时用过的历史教科书和学习笔记。在一个学期的二十八课课文中，分别叙述了我国自元朝以来的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成吉思汗、元末群雄、明太祖、王守仁、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各国索租之军港、康梁变法、八国联军、日俄战争、清廷立宪等内容，它向少年任

弼时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兴衰，列强侵华的痛史。任弼时逐课作了笔记。在日俄战争的一则笔记中，他提纲挈领地记录了：俄国近世之东方侵略；日俄战争之起因和经过；清廷立宪之原因、事实和结果。笔记的末尾，任弼时以十三字作结：“政治仍趋重专制，革命动机遂起。”^①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一天晚上，任弼时在自修室里，翻开祖国的地图，但见从南到北，到处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领土，金瓯破碎，令人触目惊心。“北方之朝鲜则为日并，库页岛则为日俄平分，恰克图、塔城修改等约，所失之地犹不在此数”。

北方如此，南方呢？“台湾及澎湖，于甲午之约同割于日，次有琉球、香港、澳门、安南等地，其它小小丧失，不可胜数”。国土沦亡，不禁使他“痛哭流涕”，他怀着强烈的义愤写道：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且吾国毗连强国之间，（西）有西藏，与英俄密切之关系，英欲得之以防俄，且藉此侵蜀，据扬子江之上游；俄欲得以据英，更由是南进而拊印度之背。东有东三省有日俄占

1916 年任弼时（培国）作文手迹

领之举，其外患尚未已也。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镬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⑫

为了渴求祖国的富强统一，任弼时曾经崇拜过明太祖朱元璋。他出身贫寒，年十七，入皇觉寺为僧，二十四岁时，元乱纷纷，从郭子兴起兵，后为诸将拥立，率兵灭群雄，统一中国，恢复汉唐规模，建立明朝，“中华人物由是复兴”，因此，他称赞朱元璋是古之圣贤豪杰中“功最大者”。后来，他读了俾斯麦的传记，认为这位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凭借实力，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下令全国皆兵，既破奥军，又打败拿破仑第三，联合二十五邦建一大国，“其坚韧之力，创造之功，真可为强国之模范也。”

如果说，少年任弼时对中外历史有系统的了解，因而崇拜朱元璋，赞扬俾斯麦，不如说他在忧国忧民的困惑中强烈地盼望着寻找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的出路。

一九一八年，任弼时高小毕业时，在《言志》的作文中，又竭力主张以发展工业来兴国。他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亦工业不发

达之一端也。……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者能无限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⑧

一九一八年夏，十四岁的任弼时，怀着工业救国之志，完成了高小的学业。

三、五四启蒙

一九一八年五月，任裕道给长沙的堂兄的信中说：“二儿来片云，伊阳历五月毕业，依次应入中学。联合、明德、省中学或其他各中校，下期有无开招新班，以及章程如何？惟学滌等费似以轻者为宜。”^①后来，任弼时考取了明德中学。这所学校创办于一九〇三年，规模和师资都是第一流的，人称“北有南开，南有明德”，因为它是私立的，学费较贵，所以，任弼时在明德只念了一个学期，便转学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国内部的各路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彼此争权夺地，不可开交。把持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继承袁世凯的衣钵，倒行逆施，借对德国宣战的名义，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购买军火，编练参战军，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起来反对，南北战争爆发。一九一八年五月，在

桂系军阀的排挤下，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被迫去职，军政府沦为南方军阀的政权，南北军阀陷入混战的局面。号称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来到了，任弼时在“国庆纪念日盛言”的作文中写道：“南北之战事已年余矣…事本段非，南方反抗，而段即以数十万之精兵为此无意义之事，诚可叹也。呜呼！此等之人，是何人焉？明为理国事，实为一二人之相争，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②

历时四年零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败于协约国而告终，中国是对德参战的协约国之一，为了庆祝胜利，湖南当局宣布放假三天，并举行提灯会。十一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参加了提灯会。后来，他在作文中对提灯会的“盛况”描述如下：

“是日也，本城各界无不赴会者，计约数万人，延行街市，约有四五里之长。街口街侧观会者堵塞不通，交通断绝，如斯之举，可谓盛矣。”^③

队伍从下午一点多钟齐集在教育会门前，整队出发，军乐开道，锣鼓喧天，华灯初上时，一条火龙，蜿蜒曲折，经过督军署，英美领事馆，出红牌楼，到长沙知事署，直到晚九时才散队。但是，热热闹闹的提灯会，带给任弼时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痛苦的

沉思。他接着写道：

“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觉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①

任弼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自遭汤兵洗劫后，每况愈下，小妹妹培辰出世后，全家六口人，全仗父亲一人的薪水维持，又要支付任弼时在明德中学的昂贵学滌费，年近半百的父亲担子显得更加沉重了。这时，任弼时的未婚妻陈琮英在袜厂里做童工。陈琮英是一个苦妹子，一九〇三年一月出生不久，母亲去世了，父亲陈芝轩常年在外教书，丧偶以后，幼小的女儿无人照顾，陈琮英“以嫂代母”，由兄嫂拉扯长大。到十二岁时，便进了长沙北门外的西园袜厂去当童工。这是一家手工业工场，雇有十多个织工和染工。陈琮英平时住在袜厂里，逢年过节，两家经常来往。陈琮英的哥哥在铁路上工作，收入略好一些。任家家累重，所以陈琮英拿到工资后，经常接济任弼时。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任弼时在明德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一九一九年春季开学时，他就考入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去了。

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又名长郡中学，创办于一九〇四年，是长沙府唯一的府立中学，初时规模不大。辛亥革命后，湖南教育界人士创议，长沙郡所属十二

县联合起来办学，于是建新校舍，扩充规模，至一九一二年四月，改名长郡中学，学生达一千多人。由于校产丰富，在校学生由各县按名额拨付经费，每个学生只负担三分之一的费用，每年缴学费十二元，收费是比较低的。在陈琮英的帮助下，任弼时得以继续求学。

长郡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彭国钧，字泉舫，安化人，清末秀才，后毕业于明德速成师范。在黄兴的影响下，曾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国民教育事业，一九一三年赴日本考察，认为日本国得益于教育甚大，回国后，制订校训、校歌，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在治校方面，他曾效法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不崇一而黜百家”，聘请的教师中，容纳了周谷城、高语罕、徐特立、熊亨瀚、周世钊等新派知识分子，五四期间，和徐特立、朱剑凡等组织“健学会”，在学生中成立“学术共进会”，提倡爱用国货，抵制日货，是长沙市国货维持会的评议员。他为学校制定的校训是“朴实沉毅”四字。学生一律穿青布制服，打绑腿，衣领上用白色丝线绣“长郡”两字，所以人称“长郡丘八”。正因此，学校的空气颇为活跃。毛泽东以“二十八划生”的名义嚶鸣求友时，第一个响应的李立三（隆郅）便是长郡的学生；新民学会成立时，长郡的学生李维汉、罗章龙是第一批会员；赴

贫民半日学校给任弼时（培国）的聘书

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李富春等二十八人，均是长郡学生，郭亮、陈赓、曾三等也都在长郡学习过。任弼时入学时，萧劲光（玉成）和他同为第二十五班的学生。彭国钧治校的开明措施，毛泽东曾经这样说：在暮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当拍手欢迎的空谷足音。但彭国钧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即使在五四期间，他对提倡新道德、推行白话文方面，也持保留态度。当时国文教员对学生作文有两种主张：新派主张读白话文，提倡学生“发表真正思想”，旧派则主张“文以载道”，载的当然是孔孟之道。两派争执不下时，彭校长规定一个并不执中的方案：偏重文言，作文以“文言为主”，“每月亦可作白话文一篇”；至于修身这门课，他亲自讲授，或由他指定的学监来兼授，生怕“过激思想”传给学生。据萧劲光回忆：有一次，彭国钧在修身课上说：“现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俄国的‘过激派’，这些人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这种思想你们赞成吗？赞成的举手！”所以大革命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后，彭国钧走上反共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

任弼时在长郡中学时的作文中，经常和旧派教员在思想上发生对撞。有一次，教员命题为：不念旧恶。这个命题来源于《论语》：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传统的解释是提倡无原则的恕

道。任弼时却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所谓善恶，必先分是非，在是非面前，则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其于人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结果必然是“扬恶而隐善，彼相訾议，吾恐今日揖让，明日齟齬矣，今日谈笑，明日讐仇矣”。另一种态度是，“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于人之过者，能悛即止，起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别人有过，改了就好。教师在评语中，始则批评“笔太平沓，未能紧逼题义”，继而说“言之有物，惜未处处合拍”。^⑤至于在抨击时弊的作文中，任弼时同那些旧观念“未能处处合拍”的言论就更多了。当时军阀混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湖南当局推卸责任，责怪商人“欺诈盘剥”，下令若“敢于腾涨者，按戒严条例从事”。有人以为这是“良法”，任弼时写道：

“彼督军省长，不揣其本，徒齐其末，……盖南北交战，师行而粮食，此其一也；且重累人民以任行李，擒掳车船以载人物，于是行商贩夫相戒于道路，而转输阻矣，交通塞矣。货源既绝，此物价昂贵之所由来也。”^⑥

他尖锐地指出，造成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在于军阀战争。

报载：湖南当局决定，挪用教育经费、慈善经费

以作军用，还振振有词地说，“挪借暂时，终必归还”，“有何不可”。任弼时驳斥说：

“学款多属地方经费，善堂全为人民所捐输，尤与军用性质如水之与火，冰之与炭，绝不相融者。……纵曰挪借暂时，现蹄踪既涸，辙中之鲋，欲待东海之波，恐已无及矣。”如此“而望教育之发达，慈善之盛行，难矣！以此察览行之，利无一而害无穷，不待辩而自明矣！”^⑥

至于政治腐败，官吏庸懦，实业不兴，挥霍无度等等时弊，血气方刚的任弼时，痛心疾首，每有涉及，就滔滔不绝地予以抨击。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节用。任弼时起笔如刀剑，犀利地写道：

“……吾观乎今之从政者，……拥妻抱妾，花天酒地，纵恣挥霍，不顾分量，甚或伴某省之督军省长，彼送此迎，耗费金钱不可胜言。嗟乎！此非我国之金钱耶，亦非我国民之脂膏耶，痛矣哉！时愈极而日用愈奢，生愈蹙而靡费愈大，以此治国，不亡何待。”^⑦

不久，他又在《富国论》的作文中议论横生：

“富国之道，约有三端：曰节用也，振兴实业也，开采矿物也”，“在位者惟知厚取于民，淫佚骄奢，恣情挥霍，谓其为振兴实业也，则洋货充斥，土货滞销，而政府虚与委蛇，不知设法组

织以提倡之；谓其为开采矿物也，则我国煤铁诸产甲于全球，而开采者寥寥。既不能开财之源，复不知节财之流，吾恐穷者益穷，而其乘机以崇权，逞势以割地，藉名以要款，且欣欣然沦为殖民地者比比皆是也。”^⑧

任弼时怀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忧国忧民，针砭时弊，渐渐地萌发着对社会问题的强烈参与意识。这种参与意识，必然发展而为政治行动。但是，一旦学生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那么，不但督军张敬尧不容，就连标榜“思想自由”的校长彭国钧，也按军阀政府的命令严加约束。

一九一九年春天，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里，协约国的代表召开巴黎和会。会议开了五个多月，名曰讨论战后的和平问题。实质是战胜德奥帝国的列强们互相分赃。中国是协约国之一，因此，在会上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取消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列强们对中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竟然在对德和约的条文中规定山东的“一切权利特权，一概让予日本”，而军阀政府竟采取妥协态度，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学生，爆发了空前的大示威，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消息传到长沙，五月

七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国耻大游行，任弼时和长郡中学的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北大学生邓中夏为代表，到长沙来与湖南学生界商讨联合斗争。长沙学生运动的一批骨干纷纷集会，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蔡和森，周南女中的蔡畅，雅礼学校的柳直荀，长郡中学的任弼时和楚怡学校的教师何叔衡等，于五月二十七日出席代表会，宣布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六月三日全体罢课。

湖南省督军张敬尧立即施出种种伎俩对付爱国学生。先是恫吓。声称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正严令警厅警察总局一体拿办”，接着令各学校采取断然措施。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贴出布告，提前放假，责令学生“限期离校”，并且通知学校的厨房“立即停滌”。

这时，省学联根据北京学生的斗争策略，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宣传。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任弼时联合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第一师范、甲种农业学校的湘阴籍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宣传团，回湘阴老家向民众进行宣传。

塾塘乡有一个完好的戏台，宣传队回乡以后，便组织民众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演出活报剧。

任弼时的堂叔任理卿，这时已考取“庚款”留学，制装备齐，准备起程去美国。宣传团演出活报剧，扮演帝国主义分子的演员没有西服，任弼时先是邀请任理卿登台演出，但他不善表演，便把新置西服借给宣传团。他们叔侄俩，后来，一个走的是社会革命的道路，一个走的是实业救国的道路，尽管道路不一样，但振兴中华，爱护祖国的赤心是相通的。所以，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互相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的来往。

宣传团除了在塾塘乡演出外，还到附近的桃花庙乡等地进行演出活动。

宣传团返校以后，湖南省“国货维持会”成立了，长郡中学还成立了学生爱国会。任弼时便和同学们一起，组成国货贩卖团，他们提着篮子，走上街头，一面检查日货，一面推销国货，向民众宣传爱国思想。这年十二月二日，长沙万余学生，齐集教育会坪，当众焚烧日货，一时群情激愤。张敬尧竟派出骑兵一个营，手执马刀进行镇压。张敬尧的行径，连彭国钧也认为是“摧残教育”，因而被撤掉长郡中学校长的职务，去上海避难。临走时告诫学生“慎重”、“牺牲”四个字，而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则由此兴起。

五四运动的洪流，使任弼时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乡村，从指点江山，针砭时弊进而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列。在课余，任弼时受学生爱国会的聘

请，担任贫民半日学校的教员；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他参加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这些经历给任弼时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五卅运动中，他号召青年到民众中去宣传。他写道：

“这种普遍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学生界应负大半责任，因为学生多为四乡集中于城市的，每逢寒暑假时节，学生回到乡村的时候，应特别努力在农民中活动。”^⑨

四、“到俄国去！”

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北京成立了勤工俭学会，组织有志的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为振兴中华培养人材。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在长沙积极响应。一九一九年三月，长沙各学校的一批学生运动骨干，像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率先报名参加。在毛泽东的奔走组织下，三四百个湖南青年，一批一批地放洋去法国，不但促进了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也为有志上进而无力升学的青年开拓了一条出路。这时，任弼时才十五岁，中学还未毕业，加上父亲年迈，家境艰难，未敢远离家门。但是，一年以后，他下定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布第一次对华宣言：

“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

“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凡俄国从前所获得的各种特权，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底审判的特权，都一律放弃。”

尽管北洋政府还没有和苏俄新政府建交，甚至封锁这项消息，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初，报纸纷纷透露对华宣言的内容，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或先或后介绍苏俄十月革命成功和对华友好的信息。这对于在昏暗、混乱中苦苦求索出路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道令人兴奋的光芒。

这年暑假，任弼时和同班同学萧劲光相约没有返乡。一来是为家里节省一点路费，二来，他们离中学毕业的日子不远了，毕业以后怎么办？依靠家庭供给继续升学，显然没有可能。谋求职业吧，找什么门路呢？所以，假期里想在长沙活动一番。有一天，任弼时和萧劲光经过一家画像馆，任弼时指着挂在画像馆墙上的作品，胸有成竹地说：这样的像我们也可以画得出来。于是他买了点图画纸和炭笔，试着画像。任弼时从小喜欢绘画，依着葫芦画瓢，作品并不比画像馆的逊色。以此谋生，看来是一条出路。但是

他们并不甘心。国家内忧外患，社会极端不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怎么能为了谋生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能不能找到一条既能谋求自立又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道路呢？

萧劲光回忆说：“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原来这时，长沙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何叔衡接办船山学社，经常举办演讲会，介绍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当家的新面貌。任弼时他们听了非常兴奋和向往，不久，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组织青年报名留俄。正在这个时候，任作民的哥哥任新典从上海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学好俄文以后，可以介绍去苏俄留学。任作民是任弼时的远房哥哥，原来是长沙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暂时休学，一度住在上海一家纱厂里当会计的兄长家里。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和任弼时，相约一起去俄国。任弼时把这些情况告诉萧劲光后，大家十分高兴。萧劲光写道：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

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①

不久，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和陈启沃等六人，由新民学会介绍，乘坐小轮船到岳阳，然后换坐长江轮，顺流而下，东去上海。

十月，当长郡中学校方贴出将任弼时、萧劲光除名的布告时，他们俩已在上海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

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地址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路铭德里六号）。这是一幢二层的石库门楼房。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吴廷康）为代表来中国活动。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接着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陈望道等。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在《民族生活报》发表过“不要忘记东方”一文，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

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②而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又表示：“深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所以维经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商谈后，即确定筹建共产党。首先是在知识界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活动，选派一批青年去苏俄留学。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在小沙渡路工厂区成立工人半日学校，不久，又办了“华俄通讯社”，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孙中山、陈独秀出席大会祝贺。“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也就在八月底挂在新渔阳里六号的乌黑大门上（这是以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翻译兼秘书杨明斋的名义租赁的），学社还在《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广招有志学习者速来报名。

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报到后，住在外国语学社附近贝勒路（今黄陂路旁的宿舍里，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饭铺的包伙，费用由学社提供。教授俄语的是维经斯基的助手、旅俄华侨杨明斋，还有一位十九岁的中国妇女，叫王元龄，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的女儿，刚从哈尔滨俄文学校学成回沪，陈独秀就邀请她来教俄语，大家都叫她“王小姐”。^③除了学俄语外，学社还请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学员们讲解《宣言》，请作家沈雁冰（茅盾）和《民

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同时，还在学员中成立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劳动界》和“华俄通讯社”缮写和校对稿件，收发信件，获得一点报酬作为零用。有时候，还让学员到工厂和贫民区去散发传单。

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学员中正式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任弼时等二十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划平等。

一九二一年四月，经共产主义小组与苏俄方面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于三月二十九日起程赴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又被同志们推为留俄学生代表”，前去与苏俄接洽，然后分批出发。

当时，从上海赴苏俄，有三个途径：一是走陆路，坐火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改乘苏俄的列车到赤塔西行。这是一条捷径。但是，在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军阀政府的边防站盘查“过激派”很严，即使持有护照也很难通过。二是走水路，坐船到海参崴后，乘火

任弼时（培国）1921 年赴莫斯科
东大学习行前致父亲的信手迹

车到伯力西行。当时，苏俄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于伯力，伯力以南的滨海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着，赤白交界，双方相持，旅途要冒一定风险。三是从黑龙江溯江而上到赤塔，盘查虽然较松，但河道冰封，要到五月中以后才能通航。赴苏俄的留学生，第一批走的是陆路，到满洲里后，就被军阀政府逮捕了。第二批十二人，改走水路，四月十一日从上海坐船出发，幸而成功，到达伯力后来电报告，并在伯力等候第三批留俄的同学们。任弼时、萧劲光等便决定走海路起程。

开弓没有回头箭。

五四运动后，任弼时走向革命实践，读《新青年》，读《共产党宣言》，从探索和比较中，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立志追求。五月四日，任裕道从长沙来信，劝任弼时“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任弼时“捧读之余，泪随之下”。尽管他非常体贴父母，理解此时此刻父亲的矛盾心情，但决心既下，岂能因儿女情长而改变行动计划，他“连夜不安”数日，终于在启程之日，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语多劝慰，并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他写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

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④

为了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他在信中说：“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

信的末尾，任弼时请父亲设法帮助陈琮英读书。这件事，他虽然已经给陈琮英的哥哥写了信，仍希望任裕道加以督促，他说此事“乃儿为终身之谋”。

一九二一年五月中旬，任弼时投寄了这封家书后，就和萧劲光、任作民等十余人，登上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为了避过军阀当局的耳目，他们化装成各种社会身份，任弼时扮成理发师，萧劲光化装成裁

缝，三三两两地上路，途中互相佯装不认识，暗中却彼此照顾着。

在春愁悒悒的日子里，邮轮载着十七岁的任弼时，出黄浦江，经吴淞口，乘风破浪地在太平洋上北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俄罗斯的土地上战火还没有泯灭。为了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调转枪口，勾结白匪来对付苏维埃政权。苏俄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和滨海省，盘踞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任弼时等乘坐的邮轮，先从上海到日本长崎，然后再从长崎起航去海参崴。在长崎靠岸时，为了安全，他们不敢登岸，成天守在昏暗闷热的船舱里。

海参崴还在冰天雪地中，又闹着鼠疫，寒风呼啸，街上行人稀少。他们住进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在冷冰冰的屋子里，等候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接头。任弼时感冒了，身子发着烧，清水鼻涕不停地淌着。他们按照指定的地点和联络暗号，找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联络点，接待他们的是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凡诺夫。伊凡诺夫叮嘱他们说，从海参崴到伯力是红军和白军交界的区域，沿途盘查很严，如果遇到白匪，暴露了身份，就会有生命危险。只有

到了红军管辖区的伯力，安全才有保障。

任弼时等约定了到伯力会合的地点后，三三两两，坐上北行的列车离开海参崴。列车运行不久，突然停了下来，前面是伊曼河。车上的旅客全得下车，通过日本占领军的检查站。任弼时和萧劲光小心翼翼地来到检查站。谁知一量体温，任弼时被扣了下来，他被怀疑是鼠疫患者。这一来，他和萧劲光失散了。

当萧劲光等在伯力会合时，没有见到任弼时，大家都为他担忧。因为在同行者中，任弼时年龄最小，正患着感冒，身上又没有多少卢布，万一迷了路或者遇到白匪，就有生命危险。可两天以后，大家喜出望外地见到了任弼时。原来任弼时被扣留以后，日本人和白匪先是盘问，他一口咬定是到俄国去谋生的。接着又量体温。任弼时急中生智，悄悄地将温度计的水银球露在腋窝的外面，这样，体温就显得正常了。他这才通过了检查站。过了伊曼河，他沿铁路线徒步走到一个车站，搭上下一班列车到了伯力。大家都赞扬任弼时的镇定和机灵。

在伯力会合后，他们把缝在棉衣服里的介绍信取了出来，交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接待机关，从此，他们的食宿和旅行，都由红军的机关给以安排。伯力以西，虽然都是红军的管辖区，但是有的地方战争破

坏的铁路桥梁还没有完全修复，为了赶路，他们分水陆两路奔向黑河。萧劲光和刘少奇等坐船从黑龙江上行，任弼时和罗觉等则继续乘火车赶路。

四年的世界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把古老的俄罗斯弄得筋疲力尽，没有粮食，没有煤，没有足够的日用品。开往莫斯科的蒸汽列车，燃的是木柴，颠颠簸簸，速度很慢。没有暖气的车厢运行在西伯利亚，冷津津地像是在冰窖里。车头上，不时飞出火星，落到车棚上，风一吹，燃起了火苗，列车只得停下来扑灭火星。有时，遇到散匪袭击，旅客们还得下车，匍伏在车厢下躲避流弹。在全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困难条件下，红军接待客人的食品，是每人发给一个小枕头一般的黑面包。只有经过贝加湖的时候，他们买了一点湖里的鲜鱼，用火烤着吃，改善了一次生活。列车走走停停，行旅是艰难的，但是，年轻的革命者“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决心是坚定的。

就这样，行程七千余里，历时两个月，他们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这一天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⑤

五、在东方大学的熔炉里

任弼时一行，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莫斯科时，莫斯科正洋溢在国际主义的气氛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相继在这里召开，世界各国的革命家们，冲破敌人的封锁，云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任弼时等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被安排和各国代表住在一起，轮流列席共产国际的大会。

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被选为名誉主席的列宁向大会作了演讲。首次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帝国主义便加紧镇压各国革命，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欧洲各国出现了暂时的低潮，因此列宁提出，革命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号召要加强群众工作，消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采取人民统一战

线的方法和策略，把发动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列宁的演讲为初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革命者，上了第一堂令人难忘的政治课。

大会结束之后，八月三日，任弼时等就进入东方大学，开始崭新的学习生活。

东方大学全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第十五号，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社的对面。这幢五层的楼房原是苏俄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时，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提纲，为了培养东方各民族发展民主革命的干部，便创办了东方大学，由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学员有来自远东各国的青年革命者，也有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一九二一年五月，东方大学刚创立，任弼时等是第一届学员，同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还有朝鲜、蒙古、日本、印度等国的革命者。全校五、六百学员，按国籍编班，外籍学员以中国班的人数最多，约有三十多人，称“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他们是：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萧劲光、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韩慕涛、蒋光慈（光赤）、傅大庆、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吴葆萼、曹靖华、韦素园、

任作民、王一飞、谢文锦、梁柏台、华林等。为了学员回国以后的安全，每个外国的学员都起了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学校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西方革命史，以及青年运动，职工运动等，全部用俄语教学。由于大家听课有困难，学校便聘请瞿秋白和李宗武来当翻译兼助教。瞿秋白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馆，当时是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在中国班学员中，任弼时年纪最小，身体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非常努力，俄文的水平提高很快。同志们问他有什么经验时，他腼腆地回答说：没什么，听不懂的多听听，记不住的多念念，自然就会了。

这时，苏俄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生活必需品都是按人头统一分配的，除了对儿童和知识分子有所照顾外，待遇最好的是红军战士。东方大学的学员享受红军的待遇，每天发给黑面包一磅半，偶尔也可以领到白面包。没有黄油，没有肉类；因为遭遇大旱，连蔬菜也很少，只有几个煮土豆佐餐，午餐和晚餐有一道汤，是土豆、海藻或咸鱼熬的，每人分一勺子。所以不到开饭的时间，肚子就咕咕叫开了。每人每月还发一斤白沙糖，发一部分卢布的零用钱，相

当于半个银元。穿的是红军的制服，冬天每人一件军大衣；皮鞋是英国工人捐献的，又大又重，鞋头尖尖的。屋子里冬季没有暖气，夜晚，宿舍里烧一点木柴烤火取暖。为了防止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骚扰和破坏，晚上，学员轮流到街上去站岗。星期日，学员们有三小时的军事操练，因为学校里没有操练的场地，教官就带着他们到皇城边的广场上去荷枪操练。凡是军训之日，每人照例增加半磅面包。有时候，学校还安排他们和莫斯科市民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或是参观博物馆、游览公园。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但是当他们得知，列宁的生活待遇也和红军一样时，大家感到苏俄人民对外国留学生已是很大的照顾了。随着经济的复苏，学员们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渐渐地，每周可吃到一点黄油。

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不仅使任弼时等较为系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更重要的是使他扩大了政治视野，把中国的革命和远东以至于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一九二二年到来时，他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一个国际会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英、法、日、意、比、葡、荷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远东的霸权，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和中国的代表一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会议公然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等”。共产国际远东局为维护远东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对抗太平洋会议，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简称远东会议。出席会议的东方各国代表包括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印度等共一百四十八人（其中列席代表十七人）。中国代表团由三十九名正式代表和五名列席代表组成，其中有中共党员十四人，国民党员一人，青年团员十一人，无党派人士十三人。团长是中共代表张国焘。瞿秋白、俞秀松、任弼时、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王乐平、王象午、于树德、柯庆施、林育南、张太雷、罗觉、萧劲光等分别以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代表为张秋白；舆论界的《民国日报》、《太平洋》和《中国》杂志社也派了代表。社会党的江亢虎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是列席代表。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一百十九位代表的年龄统计：绝大多数代表都很年轻，四十五岁以上的只有四人，仅占百分之三。不满十八岁的任弼时可以说是特别年轻的。

大会原定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举行，为了隆重起见，改在莫斯科。一九二二年的元旦刚过，任弼时等就冒着莫斯科的冬寒，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们。

一月二十一日，在克里姆林宫内富丽堂皇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任弼时和代表们一起出席开幕式，大会推举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片山潜五人为名誉主席。

通过十二次全体会议，远东各国的代表介绍了本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的斗争，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报告中着重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实质是帝国主义争夺和瓜分远东利益的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在中国市场战胜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竞争者”，“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润”；勉励中国、朝鲜的共产党人和民族运动的领袖们联合起来，“深入到人民中去，成为他们的领袖”，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大会。但是他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工人代表邓培，他亲切地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这意味着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殷切希望。

二月二日，当华盛顿九国会议准备签订瓜分太

平洋利益的各项协议书时，远东会议的代表们从莫斯科移到彼得格勒，在乌里茨宫举行闭幕式。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当前的大敌，号召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各国无产阶级援助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四天以后，二月六日，华盛顿会议收场，帝国主义在“民主”、“进步”的词句掩盖下达成了分割远东殖民利益的协议。这时，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大会的代表们，已经在《宣言》中发出了战斗的呼号：

“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①

大会闭幕之后，任弼时和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十月革命时首先向俄国资产阶级开炮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游览了当年被武装的革命工人和士兵攻占、标志着革命胜利的冬宫。大家不仅为冬宫精湛的建筑艺术赞叹，更为苏俄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所激励。

中国班的团支部建立后，任弼时担任执行委员，先后担任支部书记的是罗觉、王一飞、华林和彭述之。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旅莫斯科的团

员分批转入共产党。刘少奇、卜士奇、罗觉等是最早转入共产党的，但当时党并没有公开，也没有建立支部，称“旅莫组”，“推罗觉为主席”，并由大家轮流担任党团员大会的主席。

任弼时是一九二二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

这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率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时，党在国内的工作有较大的进展：从五月至七月，先后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别是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政治上开始明确要联合民族主义者和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组织上提出了党不同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也不是离开群众的空想革命团体，而应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因此必须将工作“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训练〕”，^②并且制订了党的章程。

十二月七日，陈独秀来东方大学，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是瞿秋白、卜士奇、罗觉和李人俊四人。经陈独秀提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八位同志入党。其中：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是“转为正

式党员”；华林是由联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蒋光赤（光慈）、抱朴、谢文锦、许之桢四人是新加入的候补党员。这样东方大学的中共党员增加到十二名。^③

陈独秀这次来校，还带来了党的二大的文件，交大家讨论。同时，当他得知旅欧支部有一部分同志学习和生活发生困难后，便向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交涉，将他们转到东方大学来。为了欢迎陈独秀，学校特意给每个中国学员发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几个人，把这些珍贵的食品合在一起，丰盛地聚了一次餐。

这次会议以后，东大党的队伍更扩大了，而且活动内容也丰富起来了。十二月十八日，中共旅莫组在罗觉主持下再次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将党员编成三个小组，任弼时、罗觉、李宗武、王一飞和最先从法国转来萧子章（萧三）为一组，组长是罗觉。彭述之、华林、许之桢、谢文锦和卜士奇为一组，组长彭述之。抱朴、蒋光赤、王鸿勋为一组，组长抱朴。二是成立三个专门组，研讨二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农民问题和党的策略问题的文件。^④任弼时参加的是讨论党章和研究党的策略的两个组。^⑤会议决定每周小组讨论一次，最后由大会讨论。

无论是党的小组和专门小组中都没有瞿秋白参加，原因是瞿秋白已经组织决定准备回国了。他在会

上说：这次回国有三项任务，一是到工人中去巡回讲演，先到长辛店，再到汉口、上海、天津或唐山，并整理成讲演录，以便传播，二是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注重实际的政治宣传；三是翻译马列的著作。瞿秋白回国后，西方革命运动史的课堂翻译工作，便由任弼时接替。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爆发，远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员心情非常激愤，他们出墙报，演活报剧，声讨军阀吴佩孚残杀共产党人林祥谦、施洋和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四月九日，中国班召开党团员大会，由中共中央派来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张国焘，介绍二七惨案情况。张在会上还说：中央认为中国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受帝国主义统治；一是由国共两党联合，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反对由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军阀实行“武力统一”，或搞什么“联省自治”。我们的口号是：统一、和平、自由。

会上，由彭述之代表病中的罗觉，向大家公布了党员的名单。说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青年团应当服从党的指导。这时，中国班有正式党员罗觉、李宗武、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王鸿勋、华林和萧子章等八人；候补党员有许之桢、谢文锦、蒋光赤、抱朴、梁柏台、萧劲光、彭泽湘等七人。同时宣布在西欧的一批党团员即将

转来莫斯科。^⑥

几天以后，赵世炎率领十二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成员，从巴黎来到莫斯科。这个团体原名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六月，赵世炎为书记，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已有团员七十二人，其中在法国的五十八人，在德国的八人，在比利时的六人，他们大都分散在各地做工，勤工俭学，在旅欧华工中开展活动，但集中学习和训练的条件，远不如在共产党执政的苏俄。因此，陈独秀同意他们的请求转到东方大学学习，同时，建议将团体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行前，他们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推选周恩来为新的执委会书记，赵世炎便率第一批成员来莫斯科。四月二十八日，“旅莫组”召开大会，通过了赵世炎、法共党员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德共党员熊雄、王圭转入中共旅莫组；吸收新来的王凌汉、袁庆云为候补党员。这样，中国班共有党员二十三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强；团员三十五人。会议决定成立党支部委员会，主要管理党员的训练和指导团员的训练，任期半年。任弼时提议以罗觉、彭述之、王一飞为支委候选人，表决结果由罗觉、彭述之、赵世炎为支部委员。从此以后，学习和训练更加有计划也更加严格了。党支部明确提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

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活动”；因为我们大多出身于非无产阶级，有许多“天然的”毛病，如无政府状态，不守纪律，“如不好好训练自己，将来必感困难”。为了培养革命的意志和锻炼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和团的支部对大家提出严格的要求，制订了详细而具体的训练计划：在思想和研究方面，强调系统化，即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反对宗法观念，乡土观念和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习气。在行动方面，强调纪律化，反对无政府主义。在生活方面，强调集体化，即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团结一致，刻苦耐劳，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的作风，随时准备回国服务。^⑦

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五月七日，支部召开临时大会，提出了十一个专题，包括唯物史观、经济学、工人运动史、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殖民地问题、无产阶级的艺术、西欧少年运动、军事问题、妇女问题、宗教问题等；有关时势方面的专题有：苏俄、德意志、法兰西、印度、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政党活动；法国的工团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英国的新行会主义等。要求每个党员选择两个专题，将研究成果寄送国内交《新青年》等刊物发表。

在这两次会议上，任弼时对训练和研究提出两

点建议：一是为了履行党的义务，支部应派一名委员参加团的执委会，帮助训练团员；二是在研究专题上，应增加青年运动的项目。

旅莫支部加强对党员的训练，这是党的建设的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要实现他的政治主张，首先要求党员有坚定的信仰，为人民利益奉献一切的精神，自觉的纪律性，始终不渝的战斗韧性，这种坚强而纯粹的人，是通过严格训练和长期的斗争实践造就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仅仅具有主观愿望的革命者都能贯彻始终的。这年夏天，旅莫党支部遇到了两件事：一件是抱朴被党支部除名了。抱朴原名秦抱朴、秦涤青，五四运动后，感于“社会黑暗，非改造不可”，决意到废除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去考察，将俄罗斯的变更“作一种研究的资料”，于是欣然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外国语学社因故推迟留俄学员的行期时，他结伴“不要团体的介绍，竟离开了上海”。几经周折，幸而到达目的地，进了东方大学，加入了共产党。^⑧但是党组织的纪律约束，使这位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于是，五月二十九日，党支部不得不将他除名，送回国来。他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作文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瞿秋白因而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进行批驳，一九二五年，无政府主义者秦

抱朴，终于供职于北洋政府驻海参崴的领事馆，一九三七年，又供职于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如果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离党而去，是容易被理解的，那么，六月三十日在旅莫支部会上宣布的一件事，却令人感到十分意外。这时，东方大学的学员正在莫斯科郊区农村度假，支部会由任弼时担任主席。他首先请李宗武朗读卜士奇从国内的来信，信中说，曾经是中共一大代表的李汉俊，自动脱离党的组织。李汉俊原是《星期评论》的编辑和撰稿人，一九二〇年和陈独秀等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并主编《劳动界》周刊，还担任《新青年》的编委，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党组织的过程中颇有声望，后来因为和陈独秀、张国焘意见分歧，拒不出席党的二大，离开上海去武汉教书。六月中召开的党的三大虽然仍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他并不肯接受党的工作，终于脱党而去，但他仍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活动，国共分裂后被桂系军阀杀害。^⑨秦抱朴的除名，李汉俊的退党，说明党由学会式的松散状态建设成统一意志、统一纪律、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先锋队的过程中，在知识阶层出身的党员中必然会出现分化。而大多数真诚的革命者，如任弼时等却在革命的熔炉中，自觉地接受训练，为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准备条件。一九二四年

春，任弼时在家书中写道：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⑩

不惜离乡背井，不感时伤春，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好好度过这时光”，这就是任弼时当时的心态。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许多共产党员包括李大钊、林柏渠（祖涵）、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标志着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中国班的学员们正在关注之际，突然，《真理报》的号外宣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噩耗：一月二十一日，伟大

的列宁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柯尔基村。莫斯科顿时陷于悲痛中。当天下午，学校举行追悼大会。任弼时立刻赶绘了一幅列宁的遗像，悬挂在中国班里以资悼念。第二天，大雪纷纷，从火车站到工会大厦的街上，军警肃立，迎灵的群众分列路旁，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列宁的遗体缓缓地被护送入工会大厦。二十二日下午起到二十六日晚，莫斯科各界代表川流不息地向列宁的遗体告别。一天晚上，学校通知任弼时去守灵。他穿起红军的制服，换上毡靴，走在东方大学的守灵队伍中，和他走在一起的是诗人萧三。

这天晚上，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街上到处燃着祭火，工会大厦面前，谒灵的人群带着沉重步伐，默默地走进圆柱大厅。任弼时肃立于安放在鲜花丛中的列宁遗体旁，泪水模糊地瞻仰着列宁的遗容。他默诵着列宁最后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段话：“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⑪ 五分钟的守灵时间是短暂的，但是，遵守列宁的遗教，奉行列宁的学说是毕生的。

正在举行中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了悼念列宁，停会三天，大会发出的唁电称列宁为“革命中之圣人”，孙中山亲笔题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孙

中山对列宁的尊敬和对共产党的友好，对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事业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中共旅莫支部接连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月二十四日，由任弼时担任主席召开党团员大会，热烈讨论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问题。会议从晚上七时开始，一直进行到二十五日凌晨二时，二十六日，支部又举行常会，继续讨论，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确认目前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使国民党发展成为民族革命的政党。因此，决定按国内的指示，暑假后派一批在东方大学学习时间较长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回国工作。其中包括罗觉、彭述之、赵世炎和任弼时等十八人。经与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商议后，二月二十七日的常会上调整了名单，回国的人数减为十五人。罗觉、任弼时、王一飞、彭泽湘、彭述之、陈延年等八人暂时留在东方大学。五月，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太雷出席了旅莫支部大会，他向大家说，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形成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的工作，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因人手不足，有所削弱，以致党的刊物不能按期出

版。于是常会决定：加派彭述之、陈延年、红鸿、尹宽、郑超麟和任弼时等六人回国，同时欢迎其余的学员自愿报名回国。六月二十三日，第一批十名学员启程经海参崴回国。任弼时等十一人，决定第二批成行，从这时开始，他们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⑫

七月八日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十五日，任弼时又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中国代表团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通知，由卜士奇、任弼时、王一飞和彭泽湘四人组成，除团长卜士奇由国内派出外，其余三人都是东方大学的学员。

共产国际大会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无产阶级革命“暂时退潮到来了”；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正在增长，同样出现了稳定的局面，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却方兴未艾，根据这个特点，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前提下，整顿组织，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把民族革命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结成联盟，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青年共产国际因此提出：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领导青年作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教育以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的斗争。这

种团体，“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青年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这个主张，对于还没有建立革命的党团组织，或者还没有实现群众民族革命大团结的国家来说，无疑是积极的，适宜的。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建立，团已经有四年的斗争历史和一定规模，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反军阀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另建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必要呢？任弼时认为：在国共合作共同创导国民革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群众，广泛地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加强现有团体的建设，使国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调更加统一，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外，另建组织。中国代表团以三比一的多数支持任弼时的意见。由于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来自青年国际，因此任弼时说：如果真有组织的必要，这也并非青年团本身所能够决定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的决定。^⑪

共产国际的两个大会结束以后，任弼时等准备和中共代表团一同启程回国。代表团回国后，首要的任务是贯彻共产国际大会的精神，筹备召开党的四

大和青年团的三大。这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九百九十多人，和国内的同志相比较，旅莫的党员虽然在参加实际斗争方面远远不如，但是他们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的理解上，通过参加国际活动对各国革命大势的了解和严格的组织训练方面，都具备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批力量。党的二大以后，中央的许多重要决策，都及时组织他们讨论，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为了贯彻国际的精神，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四大贡献意见，旅莫支部大会“全体通过”了十项具有方针和策略意义的提案。主要内容是：

一、党的三大关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决定，事实证明“此种政策之确切”，希望中央有“全盘的系统的计划”，委派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代表或指定特派员，“务使之实现”，以“造成真正的国民党”。

二、“由中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幼稚，与吾党组织分子之复杂（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同志“难免要发生（现在已萌芽）两种倾向”：一是向右的机会主义派，他们“将离开无产阶级立场而变成纯粹的民族主义，或甚至成为非革命的新官僚”；二是向“左”的极左派，“此派将离开目前极要紧的国民革命运动而属于非政治的部分的经济改良主义者，或空想家”。预防的办法是：担任国民党中央

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必得由党指定”；一切言行应受党组织监督，可能范围内须“极力接近工人群众”；派有力的党员作职工运动，但他们应“极力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了解国民革命运动之意义”。

三、为发展“合轨的”国民革命运动和科学的工人运动，“党的内部要有坚固的合乎科学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因此要实行“集中化”，“铁的纪律原则”，重视理论教育，禁止共产党员在出版物上发表“改良派的怪议论”，如周佛海等；为防范军阀和上海租界当局，“对于秘密工作应加十分注意”。

四、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尤其几个工业区，上海、汉口、唐山、安源”，国民革命形势较好的广东，尤应利用时机“特别努力”。

五、一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足证农民客观上已有革命的要求”，党的四大应有“系统的、具体可实行的计划，并须组织指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关负责，另一方面，须督促国民党努力作农民运动的普遍宣传”，发展农民中的革命势力。

六、“青年团实为党的一部，不能与党对立，尤其在政治上绝对受党的指挥，但是，关于教育工作与经济奋斗，青年团亦有独立之必要”；另组“国民革命的组织，此种组织若成功，将来对党，对于国

民革命运动，对于青年团本身，均大有妨害。望第四次大会、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取消此种决案（其详细由赴第四次大会代表陈述）”。

七、军事运动是取得政权的“一种特殊运动”，此时，“我们虽说不上无产阶级军事运动，但是国民革命的军事运动，也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就不能不开始注意”，大会对此“须与系统的切实可行的划昼”。

八、扩大党的数量，“尤须在工人群众中尽量吸收较觉悟的分子，以期渐成为群众的党”。

提案最后强调：“我们希望第四次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口号，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实际地布尔什维克化！”^⑮

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历史材料，它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在国共合作的实际行动刚刚起步时，这十项提案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旅莫支部全体党员智慧的结晶，也是早期学员的集体“毕业论文”。

七月下旬，任弼时结束了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告别了长住三年的莫斯科，坐火车经海参崴，返回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上海，中共旅莫支部对他的评语是：“用功，思想有进步，但对于实际和政治问题还须特别注意。”^⑯

临行前夕，他谒了列宁墓。在红场上，任作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

“决定了！”二十岁的任弼时简短而明确地回答。

六、共青团的“三大”

一九二四年八月，任弼时回到上海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为了培养国民革命的人材，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两个月后，又在广州开办了由彭湃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此同时，上海大学也在孙中山的资助下，扩大了规模。

上海大学前身是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师资，为了“养成建国人材”，“促进

1925 年 2 月 18 日任弼时致
罗亦农、王一飞的信手迹

文化事业”，孙中山将这所学校升格，派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为校长。于右任是国民党左派，他向李大钊咨询如何办好上海大学。共产党人李大钊是孙中山为了改组国民党而聘任的五位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建议，首先要把社会学系办好，并且推荐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为校务长。学校原址在闸北青岛路师寿坊，后由孙中山拨款资助，在公共租界西摩路一百三十二号（今陕西北路南阳路口）新建了一幢西式楼房，并在附近的新闻路找了几幢弄堂房子作学生宿舍，所以人称“弄堂大学”。尽管学校只有两院五系（文学院设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俄国文学和绘画四系；社会科学院设社会学系），规模不大，张太雷说：“我们虽是弄堂大学，但同学的思想新颖，情绪热烈，立志为革命作出贡献。”^①瞿秋白则主张：“上大需要有革命性、时代性，以担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和革命的责任。”^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上海大学集中了一批革命的教师；文学系在陈望道主持下，教授有沈雁冰、邵力子、叶楚伦、郑振铎、田汉、赵景深、俞平伯、刘大白等，社会学系在瞿秋白主持下，教授有施存统（复亮）、张太雷、彭述之、蒋光赤、郭任远、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肖楚女、恽代英等，其中有不少知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

党的左派，他们是当时我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第二，规模最大的社会学系，是国内各大学的首创，有三百多学生，课程包括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和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校还举办特别讲座，聘请李大钊、杨杏佛等来校讲学。李大钊先后讲过《社会主义释疑》、《研究历史的任务》等专题，指导同学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从事研究。正因为如此，上海大学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当时人称：“南有黄埔，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任弼时回国不久，党中央分配他到上海大学去任教，这时他才二十岁，在全校四十一名教员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他住在成都路福康里的一间亭子间里，与上海大学的新校舍相隔不远。每天早晨，他从弄堂口买一副大饼油条充当早餐，然后夹着讲义徒步走向上大。他教的是社会学系的基础俄语，由于当时进步青年对俄国的向往，学习俄语的热情很高。在课堂上，他不但教俄语，而且还向同学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有时，他引吭高歌，教同学唱“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歌声使课堂里充满革命的气氛。

上海大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提倡“读活的书”，理论与实际并重。张士韵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上海

大学》一文中写道：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上大的教员应把“从他们的网篮里带去的革命理论与反帝的热情，星星之火，也引发了各省各地的青年的革命狂焰”，“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③九月十五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五十次常会决定，任弼时为上海区委员会委员，二十二日，他出席了团中央局的常会，在这次会议上，团中央又决定：任弼时为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④这个区域内，共有团员三百七十多人，二十二个支部（包括二个特别支部），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芜湖、徐州和无锡等城市，其中上海占一半多；团员的成分，工农分子只占百分之六，知识分子占极大多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在校的学生。上海有团员一百九十五人，工农分子只有十人，上海大学的学生就达九十多人^⑤。从此，任弼时从上海大学的讲坛，开始走向社会，从事团的地方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任弼时向团中央常委报告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情况，特别是大会所提出的关于成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问题。当时，团中央办有三个刊物：《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和指导工作的《团刊》，为了加强写作力量，会上，团中央又决定在宣传委员会之下，设立编辑部，指定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和

林育南为编辑员，林育南为总编辑，负责向三个刊物供稿。不久，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⑥从此以后，小小的亭子间里，深夜灯火不灭，任弼时夜以继日地为刊物写稿。

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任弼时先后为《中国青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两文，为《新青年》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列宁的文章撰写于一九〇〇年。这年九月，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十万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国，先陷天津、北京，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正定，北侵张家口，帝俄又单独占东三省，疯狂烧杀，罪行累累。帝国主义者却胡说，战争是“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三个月后，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撰文，尖锐地驳斥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⑦列宁的驳斥何等鲜明啊！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帝国主义的魔爪却仍然紧紧地和封建军阀勾结，成为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所以，任弼时翻译了这篇文章，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的有力武器。

在介绍苏俄的革命和青年团方面，任弼时接连写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文章。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中国青年》一连发表任弼时的四篇文章。

这时，离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十个月，但是国民党的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却极力破坏国共合作的大业。六月，他们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指责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八月又发表所谓《护党宣言》，攻击排挤共产党日甚一日。中共中央决定予以揭露和反击。任弼时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就是对国民党右派的公开答复。针对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是想控制国民党，提出要取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它合并于国民党。任弼时指出：青年团是“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斗争的青年组织，它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所以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它极诚恳地为国民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欲使现有的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能担负国民革命使命的政党，以图国民革命早日的成功”，

而国民党右派竟然“费许多的光阴和经费印出许多印刷品来攻击他们，这真是令人为国民党惋惜的事！”^⑧

在《苏俄与青年》一文中，他以客观事实介绍了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和青少年在城乡革命和建设中的锻炼和成长，指出：“这种下层青年之培养，实为苏俄近年最可乐观的事，十五年后的苏俄，将有思想行为均健全的一般青年为真正共产社会建设的新基础。这是苏俄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企望。”正因为如此，使资产阶级深感畏惧，他们说，“苏俄现有的政权无足畏，所可畏者乃他们的儿童和青年”，因为苏维埃政权可以用武力推翻的，而无数用共产主义精神培养起来的“小东西”，是没有法子推翻的。^⑨任弼时怀着对培养教育一代无产阶级新人的使命感，开始从事青年团的建设工作。

九月初，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和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战事爆发，上海是他们争夺的中心。团代会的地点和时间就不能不改变。团中央一面起草文件，一面派人到革命力量较强的湖南安源去联系开会地点。

在三大的筹备过程中，面临着几个带有方针性

的问题：一是在中国要不要按青年国际的建议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这是在莫斯科的争论的继续。二是如何实现团组织的青年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青年团自一九二〇年八月成立以来，经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逐步明确了团的性质、任务和党团关系，全国已有团员二千四百多人，组织遍于十一个省的二十个城市，但是工人农民成分的团员只占少数，三分之二以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在校的学生占一半，学校一放假，团务陷于停顿，甚至无人接收信件，所以邓中夏说：这样的组织“亦可说是社会主义学生团”。这两个问题中，“最费争斗”的还是第一个问题。因此，九月十四日，团中央发出通知，“盼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此次大会有最好的成绩。”

九月底，任弼时在《团刊》第十二期上，再一次明确主张“绝对不应该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他系统地列举了以下理由：一是，国民革命运动需要集中力量，“共产党及青年团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之责”，“帮助它的发展”，而不是分散力量另建组织；二是，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既然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上和共产党并列，“完全等于一个独立的青年政党”，而这样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青年都可以参加，它必然是

成员复杂，政见不一，一旦革命深入，“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将更大矣。”三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本身的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另建组织，“徒使我们自己组织上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上和人材上的损失而已，并有因此而反轻视青年团内部自己应作的青年工人运动，和团内训练，纪律及国民运动工作之危险。”总之，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这样的组织“实是没有实现之必要。”^⑩任弼时的见解是有历史教训为依据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成员很复杂，有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者，所以，遇事意见分歧，团体政见不一，不到半年便停止活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青年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加以整顿，恢复活动。确认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逐步明确了党和团的关系，这是前车之鉴。至于后来的事实，又证明了任弼时的预见。如果当时建立了成员复杂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那么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后，这个组织必然要面临一场大分裂，使团的建设造成极大的困难。

从十月中旬开始，任弼时接连出席团中央的常会，工作中心逐渐从上海大学转向团中央。这时，团中央主持常务工作的是恽代英、邓中夏、林育南、李

求实等。为了筹备召开团的三大，林育南、邓中夏分别巡视南方和北方各地，李求实又去苏联学习，到十月下旬，常务工作主要由恽代英、张秋人和任弼时主持。这期间，团中央围绕筹备团的三大，着重抓了以下工作：一是调查各地团组织和青年团体的状况；二是督促各地在工人、农民青年中发展团员，提出在劳动青年中“发展宜宽、训练宜勤”的指导方针，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团中央先后发出通告，要各地发展青年工人入团和利用寒假组织学生向农村青年宣传，具体指示重庆地区的团委派得力干部到轮船、电汽、机器、铜元局、杠夫等产业工人中开展工作；三是开办团干部的特别训练班，分工由彭述之讲党的斗争策略，任弼时讲团的组织工作，恽代英讲宣传工作和学生工作，项英讲农工运动；四是督促各地开办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及娱乐场，在上海杨树浦开办平民学校校友会，以广泛联系群众，在农村注意联络小学教员。^⑪

十二月二十三日，任弼时向团中央常会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召开团的三大的决定：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在上海举行。四天以后，团中央作出两项决定：（一）委任恽代英、任弼时、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七人，组成大会议案准备委员会；（二）重新议订大会的议程。新的议

程中，增加了青年团与党的关系问题，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问题，反基督教的奴化教育运动^⑫和妇女运动问题等内容，更加突出了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在这次会议上，从事工人运动的蒋先云从大连调查回来，他报告说，大连的经济和政权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持，从最高行政机关“关东所”到民政署、警察局都为日本人控制，每个乡设有警察分所；小学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学校里三分之二的课程教授日文，为了监视中国教员，还派有驻校警察；九天以后，从北方巡视归来的邓中夏，也在常会上汇报情况，他说，大连有大小工厂三百余家，中国工人备受奴役，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但工资不到日本工人的三分之一；冬季，日本人的宿舍里生有火炉，中国工人却住冷屋子；南满铁路的机车司机、司炉，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裡，物价昂贵，中国工人苦不堪言。听了这些情况后，大家心情激动，越发感觉到要发动青工起来和帝国主义及资本家作斗争。

正在任弼时紧张地筹备团的三大的时刻，突然传来噩耗，父亲任裕道因病去世了。任弼时悲痛异常。自从一九二〇年秋，他毅然离开长沙，又远去苏俄，于今四年多没有见过家人。从莫斯科归来后，他曾打算回乡探亲，慰问担负着沉重家庭经济担子而又日夜思念着远方游子的年迈双亲，探视望眼欲穿

的未婚妻陈琮英。他离家时，小妹培辰才三岁，现在该是小学生了。但是，上海大学开学在即，加上学校里的教师多数是尽义务的，少数拿工资的，所得还不及一个高级技工。后来到了团中央机关，每月给津贴二十五元，除去伙食，要筹措一笔旅费也非易事，经济拮据，探亲的事只好暂时搁下。^④没料到老人突然去世，临终未能见一面，终成憾事。团的三大召开在即，他怎能因私误公呢！任弼时因此未能奔丧，只好修书给母亲请求宽恕，唯愿日后再向母亲当面解释。

这时江浙军阀的战乱方停，原先控制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为直系军阀齐燮元和孙传方所败，卢被迫下台。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团中央推林育南为出席四大的经常代表，任弼时和团中央执行局的其他成员轮流出席大会。大会审核了旅莫支部提案中关于团的建设的意见，采纳了任弼时陈述的不应当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大会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旧军阀崩溃，新军阀尚未巩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失其平衡，民族运动与工人运动得到发展的机会，青年团“应利用此机会在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工人运动中扩大其影响，并率领青年群众随同助 CP 发展一般的民族运动与职工运动”。^⑤党的四大关于青年运动的决

议案中，进一步明确：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当前，中心工作是通过青工、青农和学生运动，尽量扩大组织，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⑩

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具有历史意义的团的三大在上海开幕。任弼时代表旅莫斯科团组织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团由华林、任弼时、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五人组成。会议还成立了组织问题委员会，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非党青年运动委员会等。任弼时是教育训练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的成员。

经过五天会议，大会通过了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和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等决议案，并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等口号。大会还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什么要改名呢？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原来是第二国际领导的青年组织的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政治上向资产阶级妥协，不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表明中国的青年团是真正代

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决定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致，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月三十日，大会选出：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涂正楚、刘伯庄、夏曦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由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五人组成。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

从此，任弼时辞去了上海大学的工作，专门从事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工作。

共青团的三大，在团的发展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进一步明确了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核心的共青团，不是社会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奋斗的团体，因此，要有统一的政治主张，每个团员要为团体工作，受纪律约束。第二，更加明确团在政治上要绝对保证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目的在于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使团体青年群众化。第三，要广泛地在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建立组织，并且利用多种形式，文化的、娱乐的、体育的，联系和组织一般青年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为青年

的切身利益奋斗。第四，要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下，加强训练，提高团员的素质，保障团体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更加适应斗争的需要。这是青年团的建设从幼稚逐步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

大会之后，任弼时在《中学校刊》^①上发表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对团的建设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写道：

“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他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团同第二国际以及一切自称所谓工党的不同之根本点，就是前者确是要引导群众去作政治的奋斗，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主张革命而不妥协。它把接近与引导群众的工作，视为达到目的的根本条件，所以它在组织上务求其能与群众接近。”

他告诫一般“忽视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常常以为自己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究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布尔什维克者若有必须让步的地方，并不完全反对让步，但是让步要求其

对于我们工作的本身没有妨碍，而且利于以后的发展”，“我们运用政策，须求与主义根本不相冲突，且要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

在思想路线上，任弼时强调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否则，对于我们的发展有很大的危险。”^⑮

任弼时回国已经半年了，这些日子，他的工作非常紧张，团的“三大”结束后，他给尚在莫斯科学习的罗亦农和王一飞信中说：“于此短期，身体受两次小病，现在身体亦很感衰弱得很”。去国四年，与家人长期分离，“我回国后本应返家一转的，只因经济窘迫，也是未能成事实。”但是，最使他不安的是，担任组织部主任的工作后，“自己老实着想，实在能力不及”，从而深感在莫斯科的学习多是普遍的理论，没有注意对实际的研究。他写道：

“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其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究，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

用处，至多能做点文字宣传上的帮助，然做文章看书又没有时光，且空空普遍的理论，我们出版的刊物上也不觉得十分的需要，这是我们所感觉而感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因为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的了。”^{①⑨}

这时，孙中山的病状“危在旦夕”，任弼时在给旅莫诸同志的信中深为忧虑，耽心一旦孙中山不幸辞世“则国民党亦恐免不了要分裂”，^{②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大业将面临复杂的斗争……

七、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任弼时上任后，首先从调查情况、建立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入手，为了壮大团的组织，团中央计划，要在上半年增加团员人数一倍，其中特别是在青年工人中发展团员。这期间，上海工人阶级掀起了二月罢工高潮，为了在群众斗争中发展团的组织，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团中央召开青年工农运动讨论会，研究如何在工农中开展工作，要求团员在工农中多交朋友，物色发展对象。

二月罢工高潮，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二月初，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籍领班毒打中国女工，同时大批开除成年男工，以廉价的“养成工”来代替，该厂工人自动起来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二月八日，中共上海地委派李立三、邓中夏去领导，以沪西工人俱乐部为活动基地，发动附近十一家日商纱厂的工人起来响应。三天以

后，罢工的风潮扩展到上海杨树浦、小沙渡一带，不久，全市二十二家日商纱厂的四万工人，一致行动起来，成立内外棉厂的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形成了罢工高潮。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于十五日，发动全国学生总会、上海的同文书院、沪北公学、政法大学、菲律宾华侨学生会等学校和团体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起来声援。一时全市的工界、学界和商界成立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当时，纱布的行市看涨，工人罢工直接影响厂方的利润。日本资本家迫于群众压力，不得不让步。二月底，在上海总商会的调停下，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谈判，签订了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四项协议，长达二十多天的二月大罢工告一段落。这次罢工的胜利，正如任弼时在致旅莫诸同志的信中所说：“我们完全得到指导的地位。”沪西工人俱乐部因而成为团结工人的场所。

为了发动社会各界声援工人阶级的斗争，三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一文，文中指出：

“违反人类社会进化律的国际帝国主义，为苟延自己的生命，用各种方式来向无产阶级进攻。其进攻的方法：在经济上对于工人延长时间减少工资，在政治上则备政府的力量，警察军队审判监狱等，以禁制无产阶级及压迫民族的一

切革命和解放的运动。

“世界各国为革命而入狱者……合计其家属不下三十五万至四十万人，他们都是被剥削自由权，而断绝物质上的供给，急须外面的帮助的。同情于革命者，对于此等同志，和他们悲惨的家庭，在事理人情上，应当有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援助。因此，于是有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产生。

“救济会之组织，自发动于俄国后，得各国之援助，遂成为国际组织。……并规定每年三月十八号巴黎公社纪念日为赤色救济募捐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日烈，将来的阻碍及牺牲必甚大，对此国际革命者救济会的组织，凡同情于革命者，亦应起而赞助其发展！”^②

文章对发动学生向社会各界募捐，支持被资本家开除的工人起了推动的作用。九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济难会，选举恽代英、杨贤江等为委员，对一切为爱国运动而死难或入狱者，给以经济上、舆论上及法律上的援助。

在二月罢工中，任弼时深感在工人中发展团组织的迫切性，没有党和团的组织，工人阶级的团结缺乏核心，斗争难于发动，更难于坚持。有一天，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张秋人向任弼时汇报了一个情况：

沪西同兴纱厂有一个女工，放工出厂门时，经常受到资本家雇佣的印度巡捕利用搜身的机会对她进行猥亵。这个女工回家后便向哥哥哭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一天，她哥哥约了几个工友，在放工时等在同兴纱厂门外。果然，印度巡捕又施展惯技。这时，几个男工一拥而上，把印度巡捕揍了一顿。事后，有两个工人被捕。沪西工人俱乐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动工人抗议。可惜，同兴纱厂还没有成立工会，也没有团的组织，沪西工人俱乐部发动的斗争，在同兴纱厂内虽有愤怒的群众，但没有带头的骨干。任弼时听了这个情况，便和邓中夏一起，来到沪西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人俱乐部。

潭子湾在公共租界以外，是工人集居的棚户区，洋人和高等华人很少涉足，成立不久的俱乐部，虽然只有一间房，几条凳子，但已经办起了两个工人学习班。李立三、项英、刘少奇等经常在这里活动。任弼时和邓中夏了解了情况后，商定扩大俱乐部，为俱乐部找了较宽敞的房子，建议把两个学习班合并成工人补习学校。任弼时说：“你们可以分日夜两班上课，白班的工人晚上活动，夜班的工人白天活动。要迅速把团支部建立起来，一个厂里有三个团员就可以成立团支部或小组。”

为了取得对工人教育的直接经验，任弼时还到

曹家渡纯善里五十二号的工人训练班里讲课。这个训练班有一百五十多名学员，其中一半是女工。他按时到训练班向工人们通俗地讲《共产主义 ABC》的课。从中他体会到要使工人明白革命的道理，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工人的切身问题。后来，他曾告诫：向群众作政治宣传中的弊病，“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于艰深，并且没有注意日常生活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抗地主资本家，却没有说明他们怎样压迫人民的事实，我们应当怎样去和他们作斗争的方法。不讲这些而一上来就说十九世纪的法国革命怎样，这都是使宣传工作不能深入的弊病。他说：初觉悟的工人，“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③

这年三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华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顾问，中共中央派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做鲍罗廷的翻译，离开上海和鲍罗廷一同去广州。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会上决定：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确定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学生部主任林育南为总书记，在林育南没有到任前，暂由任弼时代理。七月二十一日，团中央重新分工，决定任弼时为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林育南任学生部兼妇女部主任。

据一九二五年一月统计，全国共有共产党员九百九十四人，而团员的人数比党员多出不止一倍，有二千四百多人，活动的方式也比较多样。为了发挥党、团员在群众中的骨干作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曾规定：职工运动由党组织统一指挥，但是在还没有建立党组织或党员太少的地方，团可以组织工会，在工会中“联合组织党团”，受党的工农部指挥。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又规定：各地党与团的执行委员会须经常互派代表，支部必要时亦得互派代表；团员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党员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应兼为团员；在团内负重要责任的党员兼为团员的，其去留必须经党和团的中央或各级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这项通告，由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团中央代理总书记任弼时共同签署。这些规定，对于密切党团关系，在斗争中统一步调，保证党的领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月罢工高潮暂时平息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在各地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四月八日，福州学生两千余人，为抵制美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渔业向省公署请愿，遭到军警镇压，死学生七人；十九日，青岛日商大康纱厂的工人，因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而起来斗争，遭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联合镇

压，死工人八人等等。层出不穷的流血事件，理所当然激起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义愤。于是，五月初，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再次掀起。

二月高潮时，因纱布行市看涨，日本资本家为避免罢工造成损失，不得不答应工人的某些条件，但是不久，纱布行情低落，资本家为了取缔工人罢工，断然宣布关闭内外棉纱厂，企图以失业、饥饿迫使工人就范。在工人方面呢？经过二月罢工斗争，基层工会已经组织起来，初步显示了阶级的力量，决心再次起来抗议。工会审时度势，采取怠工或轮流罢工的策略。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等进厂要求复工，日本资本家元木、川村竟然下令厂警开枪，杀害了顾正红，伤十余人，逮捕三人。一时群情激愤。第二天，内外棉厂的七千工人，在潭子湾集会，成立罢工委员会，控诉日方暴行，要求惩办肇事凶手。团中央宣传部主任恽代英，立即发动学生声援，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复旦大学及政法学校的学生，组成三十个小分队，从十八日开始，在上海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静安寺以及车站码头等地进行宣传，为罢工的工人募捐。公共租界当局出动军警，逮捕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学生数人。五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地委召开宣传联合会议，李立三和上海地委负责人报告了事件经过和筹备公祭顾正红的计

划，要求联合各学校、各团体，掀起一个反对东洋人惨杀中国工人的大示威，发宣言，散传单，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并由雪耻会出版特刊，指定王若飞担任编辑，任弼时负责绘制讽刺漫画。二十四日公祭大会时发出。^④斗争进一步扩大。

被帝国主义统治八十多年之久的上海市民怒吼了！

五月二十五日，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掀起一个反对日本人暴行的“大运动”，指示各地团组织应即与当地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最近在各地压迫中国人的罪行，“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要各地的公团机关联合发表宣言，通电军阀政府对日本资本家予以制裁。^⑤尽管官厅“嘱工会不要扩大罢工”，但是爱国群众箭拔弩张，一场伟大的反帝民族斗争已经势不可当。

在这样的气氛下，公共租界当局突然挑起了两件事：一件是五月二十四日，上海各界群众万人在潭子湾举行追悼顾正红烈士大会，上海大学的学生在赴会途中，遭租界的巡捕逮捕四人。连同以前被捕的学生一起，租界的会审公廨决定在五月三十日那天对他们进行公审。于是上海各校学生奋起营救。另一件是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决定六月二日通过三项提

案，即“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和“交易所注册”。这三个提案目的是进一步搜刮上海人民，箝制舆论自由，其中的码头捐一项，比原来加重百分之一百五十，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经济利益。自一九二一年以来，这些提案年年受到上海人民的抵制而未能通过，此时此刻，帝国主义者断然采取强硬手段，分明是向上海市民挑战，使上海各界人民感到忍无可忍。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集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提出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帝的政治斗争。

上海民众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总攻击”开始了。五月底，被称为“光芒万丈的明星”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了公开的指挥机关。但是，学生界的统一领导问题，却遇到一些周折。原因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某些人，生怕触犯租界当局，不敢公开出面；而上海学联的原理事长陈承荫，对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号召“时呈消沉之状”。还在去年十二月间，上海各界发动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团中央曾通知借运动之际，整顿和改组各校的学生会，上海大学等七校的学生会，联名敦促学联理事长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时局主张，但理事长“宕延一星期之久，仍未见召集”，全国学生总会只好出面召集，选

出九校的代表为执行委员，公决改组学生会。党中央决定组织五卅大示威后，负责发动学生的总指挥梅电龙，要求团中央派人帮助，为了统一领导上海学生的行动，任弼时和恽代英便挺身而出，和全国学生总会一起，直接领导上海学运。学总在南市老西门租了房子作办公室。任弼时和恽代英经常出席会议，听取各校汇报，决定行动。汇报会有时直开到天亮，到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上街买点烘山薯、大饼油条之类充饥。为了加强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的指导，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地委决定，由任弼时、彭礼和、郭景仁、张蕴良和任作民五人组成“指导委员会”。当天晚上，团中央和全国学生总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讨论第二天的行动。

俞昌时这样回忆道：会议开了一整夜，研究全面动员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及如何迎接战斗的各项具体问题，……天快亮的时候，忽然接到电话报告，复旦、圣约翰等大学数千学生，兴奋过度，已经自动地整队向大马路出发了。为防止他们孤军奋斗，遂决定将下午二时总出发的计划改变，临时通知十余校，上午出发，以为声援。^⑥

到下午一时许，南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门前，已经聚集了参加示威的大中学生和工人数万人。这时，租界的巡捕开始逮捕示威群众，先后有一百多

群众被拘捕于贵州路老闸巡捕房，于是愤怒的群众近万人蜂涌到老闸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英籍巡捕头子爱活生竟然下令开枪，上海大学的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的学生尹景伊，南洋大学附中的侨生陈虞钦等十三人，惨遭屠杀，伤者无数，酿成了“五卅惨案”，鲜血染红了老闸捕房门前的土地。第二天，作家叶圣陶前来“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但是血迹“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给一场“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他愤怒地写道：“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⑦

中共中央在三十日晚上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统一行动，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六月一日起，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五万多学生和部分商店联合宣布罢工、罢课、罢市，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罢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像火山一样率先从上海爆发，帝国主义者尽管动用了机关枪、装甲车，甚至将各国在黄浦江上的二十六艘兵舰上的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岸来镇压，但是，觉醒了的上海人民在血和火的考验面前，表现出无比英勇悲壮的革命气概。运动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半个月之后，全国五百多个城镇，一千七百万群众，纷纷起来示

威。

如果说，在五卅以前的日子里，任弼时和团中央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倾全力于发动青年参加斗争，那么，当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势如破竹地掀起后，任弼时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到研究斗争策略，指导运动深入发展。

六月二日，任弼时签发的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指出，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如何把握斗争方向呢？各派政治势力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就事论事，“以法律解决”；有的主张缩小斗争对象，“单独对英”，团中央的通告则鲜明地提出：“各处运动共同要求是：（一）惩办惨杀上海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及赔偿损失。（二）收回租界。（三）取消领事裁判权。（四）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自由。”至于上海的交涉条件，六月七日，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共提出十七项，包括撤退英日驻军等。

对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斗争，通告注意到区别各地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要求：“各地学生一律罢课，召集各社会团体开会，游行示威”，做扩大的反帝宣传，借机“组织并整顿学生会”；各地“租界及其他帝国主义资本所管理之企业，皆应举行

1925 年 6 月 12 日任弼时用俄文名布林斯基签发的团中央通告

政治罢市、罢工。租界内中国资本家之工厂，则应取总请假形式，不取罢工反抗形式，不提条件。对于外国资本家工厂，则可提必要的条件。内地概不罢市。内地凡非帝国主义者管理之企业，概不罢工”，“罢工中应极力进行组织工会，并发展团的组织。”

为了争取暂时的同盟者、扩大反帝联合阵线，通告详细规定了对大资产阶级应采取的态度：“大资产阶级尚未公然背叛民族利益以前，应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但同时我们要时时处处留意他们的妥协性，须联合小商人的群众逼之节节前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即时反动”。至于对军阀政府，通告指出示威民众“致电北京政府，向外交使团抗议此次惨杀，要求惩凶赔款，并提议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目前集全力于反帝运动，暂不向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进攻，但至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此运动，并且已触动民众愤怒时，那我们就要向之进攻。”

这些规定，有理有节，斗争目标集中明确，使运动沿着党中央的指示要求，有秩序地发展。后来，毛泽东评价五卅运动时说：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⑧

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情绪高涨的时刻，上海人民面前忽然出现了一张《诚言报》。但“诚言”不诚，公然污蔑五卅运动是“赤化”，是“赤贼”煽动起来的，提出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所谓“强权”，就是反对“赤色帝国主义”苏俄，除“国贼”，就是反对共产党。这分明是反苏反共的国家主义派、“醒狮派”的反动论调，原来《诚言报》是租界当局匿名所办的！六月十二日，任弼时在团中央通告（第五十六号）中指出：“此次宣传中，务须指明压迫我们的只是各资本帝国主义国之政府，各国中的平民，尤其是工人及非帝国主义的苏俄，都对于被压迫的中国人深表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应立脚在民族自由的意义上面，反对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不应立脚在反动的国家主义上面，反对一切外国及外国人”。在复杂的斗争中，通告及时地区别清楚敌友的界限。

六月十三日，共青团中央发布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书和《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与此同时，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署名文章，系统地阐明运动的性质，斗争的政策、前途和对青年的希望。他写道：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

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使帝国主义受打击，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因此，我们对于中国一班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应当注意联络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多方面进攻方能动摇其统治威力”，“结合反帝的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成功的唯一政策。”

文章告诉青年，“现在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为最大多数的农民和社会地位最苦的工人，而这两种中间最有革命力量的还是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应当打消宗法社会工学界限的观念，多注意与工人接洽”，同时“绝不能放松”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中的工作。他号召青年，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向工农解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灌输政治常识，使他们早日觉悟起来，组织工会，参加贫农协会，形成伟大的阶级力量。^⑨

六月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下，上海的斗争

形势发生变化：一是奉系军阀派兵进入上海，蓄意充当镇压民众运动的马前卒。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布告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派兵占据工会机关；二是“三罢”斗争坚持近一个月，六月廿三日，商界宣布退出，单独复市，大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制裁和军阀的武力威胁下，政治上发生动摇；三是暑假即将开始，学生放假回家，活动难于组织，工人阶级虽然坚持罢工斗争，但有孤军独进之势。为了巩固学生的斗争情绪，集中指导全国学运，团中央和全国学生总会执行委员紧急商定，立即在上海召开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六月二十六日，全国三十多个地区学联六十余位代表，在大中华旅社召开代表大会，恽代英任大会党团书记。下午三时，任弼时出席大会指导。会上，恽代英作了《“五卅”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会在宣言中说：“中国民众，应当赶紧自己团结，有一致的坚持的长久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我们学生当始终为全国民全运动的勇猛的冲锋队”，“应当更进一步的尽我们救国的天职，协助全国平民的解放运动”。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议决案》，《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等。会后，向北京、天津、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广东等地派出特派员指导运动。《中国青年》在介绍全国学生大

会时评述道：中国学生运动“从单独学生一部分的运动，进而为宣传民众及参加农工市民等社会运动；从松懈的组织，进而为精密的团结——这都是他们进步的最大的明证”，“援助工人农民案，是开学生会议案之创举，亦是此后学生运动新辟的途径，这在学生运动上有重大的意义”，“学生运动必要与工农联合，参加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组织，如此才能使中国民族解放成功”。关于学生组织问题，“最堪注意者即各级学生会均设有工农部，为专司学生参加工农运动之机关，可知他们所谓援助工农运动，非徒托之空言，且能实际行动”。^⑩

随着敌人的压迫愈来愈紧，任弼时预感到“大惨剧或即在目前”。七月二十三日，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后，党中央发表告工人士兵书，决定改变斗争策略，提出在满足经济要求与法律要求后，有组织地复工。八月十一日，任弼时签发的团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指出斗争策略转变的意义是“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工人即达到最低要求而上工，只是此次运动告一小段落，决不是全部民族争斗之完结。无论罢工停止与否，工人阶级都急须协同各界努力开辟此次运动之新的途径，即‘废约’与‘反奉’，以冀得到最后之胜利”。

为了坚定民众的斗争信念，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表文告：《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联合起来呵！》，郑重地告诫工人及民众，无论敌人怎样压迫和破坏，“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天，团中央发出通告（第七十三号），布置秘密工作，指出：“我们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秘密组织的必要，因为我们敌人是有武装的，他们立时可以封禁、捕捉、屠杀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在某种环境，必须保有自己的秘密组织”，“但是不要误会，以为进行秘密工作就等于要缩小范围，或是停止活动。要知道，秘密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能离开军警和侦探及其它一切敌人愈远，则我们的活动范围愈能扩大，我们的指导愈能有力。”一个月后，风暴果然来临了。九月十八日，奉军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限令取消各工会，斗争从此转入地下。

率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这场规模空前的五卅反帝斗争，是任弼时从国外归来后第一次斗争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党的领导和场面宏大的群众斗争有力地鼓舞了他，实际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又促使二十一岁的任弼时在政治上一步一

步地成熟起来。在五卅运动的全过程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脚踏实地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自觉的。这种脚踏实地求实态度，成为任弼时工作作风的重要特点。五月初，斗争刚刚起来时，为适应客观需要，他要求每个团员在两个月内发展一名新团员，规定凡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学生及职员，“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而有活动之才力，且愿遵守本校（团）纪律、接受执行机关之指挥而去参加实际工作者”均可入团，为使发展的“手续敏捷起见”，特别支部可以批准新团员（团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月底，他又提出：团“是一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究团体，就是研究也不仅是靠着书本上的理论，而是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要求每个团员参加一项组织分配的工作，“努力于主义上的训练”。（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七月下旬，他再次强调：“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我们要知道，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①

共青团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后有了巨大的发展。

据一九二五年九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三大”时的二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九千多人，增加了二点七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八。^⑫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参加罢工的五十五万工人中，青年工人占一半以上。共青团已经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

八、努力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

五卅运动的反帝怒潮，使帝国主义惶惶不安，日本纱厂的纱价大跌；伦敦邮报无可奈何地哀叹：一九二五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以来所未有！

于是他们和封建军阀勾结，纵横捭阖，软硬兼施。错综复杂的中国政局出现两个显明的特征：一是奉系军阀在粤、汉、宁等地继续镇压爱国运动，屠杀民众，其后果是民众反奉声浪日高，就连冯玉祥的四十万国民军也同情于民众的爱国运动，在北方起而反对奉军。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独立的政治作用，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的新老右派汇成逆流，竭力反共、反苏，特别是被工农运动吓破胆而公开鼓吹排共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先后抛出《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

共产党。一个自称是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家伙，竟然在报上撰文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在反奉高潮和反共、排共的逆流交汇的局面下，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在北京召开扩大执委会议，总结五卅斗争经验。

任弼时出席了党中央扩大会议，会后，紧接着于九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三届一次扩大会议。

根据党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向全团提出了“深入群众”的中心口号，要求团组织“在宣传上、组织上、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任弼时对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概括为三点要义：

第一，“组织群众，扩大组织”，就是要“号召广大群众在我们口号之下奋斗”，“将其中觉悟的分子吸收到我们团体里面来，使我们经常能有组织的影响于他们”；

第二，“战胜反动派的理论，以取得群众的信仰”。他指出，因阶级分化而出现的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以及一切知识阶级的各种落后、反动的思想，“妨碍无产阶级斗争的行动，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为消除障碍，“党和团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怎样使全国无产阶级具有纯粹的阶级思想”，这

就要在“各种行动斗争中，去批评反动思想的错误”；

第三，“领导群众为其本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而取得其信仰”。^①

会后，任弼时回到上海，向全团发出一系列通告。十月三十日，他和恽代英联合签署的团中央通告（第九十五号）中，强调要和戴季陶的排共阴谋作斗争，指示各地团组织派“头脑明晰口齿清楚”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级宣传训练委员会，在委员会内指明“一切要排斥共产党者根本便违反孙中山的意思——共产党决不能舍弃自己阶级的地位与行动”，阶级斗争是客观事实，“只有阶级斗争能实现民生主义，以及民权民族”，否则“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觉悟，国民革命决无成功之可能”，要向一般群众宣传“孙中山认清农工势力而容纳共产党，是革命的，戴季陶恐怖农工势力而排斥共产党，是反革命的”^②。

十一月六日，任弼时又在《重视农民运动》的团中央通告（第一〇二号）中强调指出：“占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现在无产阶级势力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紧”，目前须竭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

传”，组织农民协会，“极广泛地在农民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并且要注意调查农民中各种秘密和公开的社团，如红枪会、农民自卫团等，设法派人进去，肃清其中的反动势力，整顿并发展农民自卫军，发动青年农民及手工业学徒做经济斗争，教育引导他们拥护广州革命政府。^③

在组织上，团中央最重大的措施是落实中共中央的决定，将团的组织进行“年龄分化”。五卅以后，全国党组织人数已达三千多，而团组织则有九千多人，为了壮大党的组织，特别是在重庆、大连、福州、南京和西安等空白地区建立党的组织，特将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团员全数推荐入党；年龄超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完全脱离团组织，输送给党；不满二十岁但能干的团员也须推荐入党。这样，全团共有三千多名团员输送给党组织，占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当时，有些团的干部生怕因此而削弱团的力量，任弼时深谋远虑地说：“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④

在日益高涨的民众反奉运动浪潮中，军阀内部

出现分化，直系军阀孙传芳纠合地方军，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通电反奉。团中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全团发出通告，指出：一部分军阀转入反奉的真正原因是“民族革命运动广大发展的结果”，对他们的反奉应表示“赞同”，但要防止产生一种“错误心理”，以为单纯靠军阀力量就能使民族革命成功。当前的任务是扩大团的组织，巩固在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力量，采用各种方法使他们在反对奉系军阀，争取关税自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过渡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制止国民党右派分裂学生组织的活动。^⑤不久，又要求各级团的组织动员各团体，向标榜反奉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出通电或分途请愿，提出保护爱国运动，启封上海总工会等爱国团体，允许人民集会自由，禁止拉伏等要求，告诫他“万勿效奉军所为”。^⑥

为了使机构精简，工作集中统一，团的领导机关作了调整：一是设立经济斗争委员会，取消工农部，使发动青年工农的工作由各级团委“全部负责”，二是调整组织、宣传两部的工作职能：将团组织内部的训练、教育工作统一归宣传部管理；有关工农、学生、妇女、军士及群众运动等组织统归组织部，取消学生、妇女、非基运动等部，必要时可组织各种委员会。这样，各级团委由书记、组织、宣传、经济斗争委员

会和学生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共五人组成。团中央执委分工由任弼时任总书记，林育南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为宣传部主任；涂正楚任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刘昌群为学生委员会书记兼非基运动委员会书记；原工农部主任贺昌兼任上海地委书记。这样，机构精简，工作集中统一。

尽管军阀孙传芳标榜反奉、主张关税自主，但是他在反共问题上却不亚于奉系，进入上海后，雇佣英日高级侦探，收买叛徒，严密搜查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团中央再次发出通告，加强保密技术，行文通信改用新的代号“曾延”，要求各级组织本“勤勉、精密、井井有条，且须敏捷稳妥”的原则，将会议记录、登记簿、组织地图、系统表等严密保管，酌情保存、毁弃或转移。^⑦在这样的局面下，任弼时等活动非常困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陈独秀、瞿秋白等负责人的住地分散隐蔽，单身住在上海而又不便公开行动的任弼时，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联络需要助手，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顾，因此党组织批准他回湖南把在长沙的未婚妻陈琼英接到上海来建立家庭。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他买好了船票，准备起程，不料，中共中央突然通知他去北京出席中央特别会议。他只好放弃探亲，委托王一飞代他去接陈琼英，自己便改道北上。

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形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其所以紧急，一是上海环境险恶，而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又因病“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共产国际来电主张将党中央机关迁出上海，以便应付。二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奉军第六师师长郭松龄与冯玉祥取得联系，倒戈反奉，从滦州一带回师出山海关，直逼沈阳。一时，国民军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天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帝国主义者为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竭力制止国民军的发展，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出兵助奉，郭松龄兵败被杀。英帝国主义者则策划在长江一带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停止反奉，转而与奉系军阀握手言欢，结成“反赤联合战线”，向在河南的国民军进攻，继而直隶、山东两省的奉军又组成直鲁联军，向占领天津的国民军反攻过来。一时，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等反动军阀从四面八方同情民众的国民军袭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北方反奉形势的急剧逆转，使南方的广州政府处境十分严重，为了挽救局势，于是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开始后，接到陈独秀“由沪来电，谓已经能

扶病视事”，于是会议集中讨论挽救时局的对策，认为根本的出路“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鉴于五卅运动后期，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孤军独进的教训，会议强调：“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会议决定，不仅要在广东进行军事准备，而且要在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接应。并决定在中央“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负责党的军事工作。

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会议上就已经成立，后来改称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主任，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成立以来，主要做的工作：一是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委；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委；河南省的军委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二是分配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一批军事干部分赴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和熊雄等十二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十一人，王一飞、颜昌颐等三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颜昌颐任技术书记。三是在上海开办了训练班，建立了两千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

工作。四是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派出调查员等。三个多月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军事部向会议的报告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所做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一是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是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成立；三是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是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是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⑧

尽管军事部成立以来做了一些工作，尽管特别会议强调要“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但是由于没有出席北京特别会议的陈独秀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对军事工作表现消极，组织上没有采取措施，特别是“中山舰事件”^⑨发生后，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员退

出他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同意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将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连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军事部的工作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没有能够贯彻特别会议的决议精神。后来任弼时一直引以为憾！

三月十一日，任弼时回到上海时，陈琼英已在王一飞陪同下先期到达。分别六年，人事沧桑。陈琼英告诉任弼时，分手后她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任弼时颇为高兴。四月初，他们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筵席，住在一间简朴的亭子间里，但是感情的鲜花却在这里盛开。婚后，组织决定，让陈琼英担任交通员。

初到上海的陈琼英，一口湖南腔，一身乡姑的打扮，而任弼时呢，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不断改换装束，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人眼里，夫妻俩不免有点不大相配。任弼时对陈琼英说：“你初到上海，环境不熟悉，慢慢会习惯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党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罗迈都在上海，我出去活动不方便，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正便于工作。”这以后，任弼时常把起草好

的文件和书信，交给陈琮英按指定的地点送给中央的领导人，或是交给秘密的印刷厂排印。出门时，他总要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次，任弼时的大妹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里，陈琮英很想马上去看她。任弼时说：“要找个机会。”过了些日子，组织上安排任弼时搬出亭子间，迁到别处的一间前楼去住。在搬家的前一天，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机会来了，今天可以去看大妹了。”“为什么不搬好家后再去呢？”任弼时说：“搬了家就不便去了。因为万一遇到有人盯梢，新的住址被人发现，就会发生麻烦。今天去，就是有人发现了，明天就找不到我们了！”陈琮英恍然大悟说：“二南，你的警惕性真高啊！”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北伐的准备工作开始，南方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全国第一次农民大会，第三次劳动大会准备在广州召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也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学。这一期比以前五期的规模都大，共有学员三百十八人。由于工作需要，共青团中央的执行委员大部分被抽调去做党的工作。一月，宣传部主任恽代英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

大”后，留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政治教官，张秋人去广州农讲所任教；原工农部主任贺昌调任上海地委书记；四月，组织部主任林育南去广州出席劳动大会，经济委员会主任涂正楚也调离团中央，加上早已不在团中央工作的张太雷、夏曦，九名执委有五名被抽调做党的工作，两人在地方工作，“实际在中央工作者不过二人而已”^⑩，以致一度组织部、宣传部和妇委无人负责，工作不能分部进行，巡视和考察派不出人，刊物不能按期出版，身为总书记的任弼时工作就格外繁忙。

北京特别会议后，任弼时立即将决议精神通告全国，要各地“按此决议案原则以定工作之标准”，强调“北伐路线必经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⑪

根据新的革命形势，他先后撰写了几篇文章：

一篇是《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发表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署名PS。文章指出：

“第二次大会的宣言，承认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敌人，我们必须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以打倒他。这是五卅以来所证实的经验”，“有人只主张打倒军阀，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可惜他们眼瞎耳聋，见闻不到帝国主义在反奉战争以来，帮助反动军阀，直

接与民众冲突的事实”。“指挥舆论的先生们，似乎太简单而且没有常识了”，“我们的革命主力军是工农群众”，“工人阶级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凡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实际冀图毁灭民族革命之指导，即消灭民族革命运动”，“凡仇视工人阶级利益的，无异抛弃他们负的革命责任，违反第二次大会宣言，是国民革命的叛徒”。

文章敦促国民党当局：应“将第二次大会议案施诸实行，不然，白纸黑字，引不起民众的观感，我们亦难以取信于民众，进而领导他们。”

另一篇，是《联合战线问题》，发表在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第二期。文章指出五卅以来民众方面的力量渐次分化，目前存在着阶级利益不同的三种势力：一是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和赞助工农阶级的国民党左派，二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官僚政客利益的国民党右派；三是代表封建残余阶级为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主义分子。后两种势力实际群众虽不多，但若结成反革命联合阵线，足以破坏民众的革命联合战线，妨害各种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主义者和孙文主义学会，在学生中大肆煽动“反赤”，组织上制造分裂，因此，文章依据党中央统一革命势力，巩固各阶级联合战线的精神，对这项策

略的运用作了阐述：

“我们运用联合战线策略有两种重要的意义，即（一）求在共同口号之下，集中民众的革命力量，以对抗反动势力的进攻与发展，而求得共同要求之实现。（二）借联合战线策略，在行动中去揭破反动领袖的黑幕而取得其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仰”。

文章指出，联合战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上层下层同时联络，即向右派首领或执行机关公开谈判，求得在某种口号下一致行动，如能成功，“则可促成革命力量的集中”，如果他们反对合作，或不执行联合行动的条件，“可将其不忠于革命的黑幕，宣布于群众”，以争取其下层群众。另一种是“单独下层联络”，即在右派组织的群众中扩大党团活动，联络其中“较左倾分子，影响其他落后的群众”，使他们同情我们。针对有的同志认为这种策略是左派“投降或示弱于右派”，任弼时在文章中强调三点：一是“凡在有群众的地方，我们总须设法打进我们的势力”，消极回避“是轻视群众，违反取得群众的原则”。二是在理论上及斗争口号上不应妥协，“而是求得革命行动的统一”，“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不过去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三是在学生团体的

执行机关中，“注意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的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甚至可以（或必要）使右派代表参加，但以能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为让步的最低限度”，以促进联合，避免分裂。至此，“我们方可以达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之集中统一”。这种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和无原则的让步、消极的抵制以及无节制的斗争有根本的区别。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前，团员数量很少，质量不整齐，在社会上影响和作用甚微，那么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全国除西藏、贵州、新疆、甘肃之外，都已建立了组织，一九二六年七月统计，经年龄分化之后，全团人数已发展到一万零七十二人，其中广东区最多为二千五百九十四人，江浙区次之，为二千三百二十一人，在反帝、反军阀以及和各种反动思想的斗争中，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因而被“敌人认作洪水猛兽一般似的大加压迫”。在五卅运动中，团的上海地委执行委员何秉彝、团员尹景伊英勇献身；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团员八人被段祺瑞杀害；在安源遇难的黄静源，在青岛牺牲于军阀枪口下的李慰农，在上海被孙传芳暗杀的刘华，都是共产党员兼共青团员的中坚分子，至于被捕入狱的团员，总数在二百人以上。^⑫热血洒遍了沪、

汉、粤、渝、津、京、青、宁各重要都市。革命之花赖这些热血灌溉，一天一天的繁殖起来，虽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狂风暴雨的摧残，决不能抑制它的生长！^⑬

七月十九日，任弼时在上海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第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团的北方区、豫陕区、湘区、江浙区及武汉、山东的代表，会议共四天，中心议题是讨论共青团工作的青年群众化问题。

从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深入群众”到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青年群众化”，是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因为尽管共青团在各项政治斗争中积极站在前列，但是，在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上，和党组织区别不大，客观上无异是“第二党”，正如任弼时所说：“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因而团在青工中“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学生团体不被学生认为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这是“极大的缺点”。^⑭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斗争紧张，团体政治活动多，有关切身利益的活动少，另一方面是干部没有经验。团中央扩大会议要解决的是如何根据青年特点广泛深入地开展工作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什么是CY”，回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说，“CY是青年共产党”，“是党的左手”，

“是党的后补学校”；有的说，“是做文化工作的组织”。任弼时后来说，从中看出“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成分都是包含得非常充分”。会议的决议案最后归纳：“本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团要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因此，本团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获得青年工农学生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中去领导他们从自己的利益斗争去参加党所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⑮

如何着手呢？

第一，进一步扩大团的规模，加强团员的教育训练。除继续执行年龄分化外，强调“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发展工作应面向二十岁以下的青年，注意在青工、童工、学徒、手工业工人及农村贫苦青年中发展新团员，学生中要注意中学、高小、女校及教会学校中的发展工作。在无党派的青年中，以各种方式组织团体，包括文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美术研究会和俱乐部等开展教育的娱乐的活动，吸引他们参加斗争。在宣传方面，应着重“事实分析与理论辩论”，避免轻视理论学习或经院式的研究的两种偏向，但“不可忘了政治鼓动。”^⑯

第二，在经济斗争中维护青工利益，发起“保护

童工运动”。当时，全国新旧工业中有工人一千零七十五万人，青工占百分之四十，其中的童工有的不满六岁，十岁左右的普遍常见。单是上海一地，就有童工十七万三千多，他们每日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是资本剥削的“童奴”。因此经济斗争中要提出反映青工童工利益的条件，使他们和成年工人一起参加斗争。根据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的精神，规定“全体青工童工均应加入工会”，在工会中设立童工委员会，组织劳动童子团，召开青工大会或代表会；团中央建立经济斗争委员会，调查青工童工的生活状况，提出工作大纲。^{①⑦}

第三，加强农村青年中的工作。会议制定的大纲指出：“中国革命若不得农民群众有力的参加是不会成功的”，“党或团若不在农民中发展，决不能成为群众中的组织”。农村青年工作不限于青年农民，农村的小学师生，手工业学徒均应为团的工作对象，通过政治宣传、文化宣传及教育运动，广泛联系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青年团体、劳动童子团、小学教师联合会，引导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认清国民革命的意义。^{①⑧}

第四，在学生运动中，会议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学生阶级出身不同，五卅后，阶级分化，学生中出现党派对峙与不合作的现象“为势所必然”，但更应看

到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加紧侵略压迫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破产日多，失学失业者日众。校内功课陈腐（尊孔读经），因此“一般学生群众，乃日益革命化”，“我们认定学生群众是工农以次的革命力量”。学生运动的主要原则应是：一方面形成学生内部的联合战线以集中学生群众中的势力；一方面形成学生与各阶级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以“加厚革命的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学生运动今后由党和团共同指导，“但本团决不能因此而减少自己积极活动的成分”。对学生运动的要求是“组织统一，主张统一，行动统一”，斗争中须提出“各派学生大多数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革命口号与主张”，但在“日常的政治思想的宣传上，仍应尽可能的举出各种具体事实，宣传我们的革命理论与策略”，“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及基督教派丝毫不能让步”。^{①9}对分裂学生组织，限制学生参加革命运动的反动措施，“应号召学生群众，联络进步教职员共同反抗”。同时，“尤须防止因运用联合战线而忘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拥护与斗争”。^{②0}

第五，发展儿童运动。中国一向没有统一的儿童运动，但基督教青年会却有六千儿童会员，国民党青年部也在官私立学校中计划组织童子军。团中央的三届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第一个儿童运动决议案，

指出：“现今正在生长的青年男女儿童，即是三五年后社会上活动的中心力量。教育这些儿童，养成他们勇敢牺牲的精神和团体生活的习惯，经过他们去影响现代社会的生活，训练他们成为将来继续斗争的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极重要的使命”。^{②①}决议规定以“劳动童子团”或“儿童团”的形式，把城乡儿童组织起来。儿童运动的对象包括：工厂童工及工人子弟；乡村农民子弟；小学学生及街市贫苦儿童。从此，中国的革命儿童运动由零散状态进入系统化。不久，团中央制定了“劳动童子团”、“学生童子团”、“工会劳动童子团”等三个简章，对童子团的组织办法，活动内容和领导关系，作了明确规定。任弼时指出：“我们现在应认为组织劳动童子团是本团重要工作之一部分，在各工业区域中去尽量设法发生这种组织。最初色彩不必太浓，纪律不要过严，且加入条件不必过高，力求其能普及。在各乡村中，亦可进行组织”。^{②②}会后，上海、汉口、天津、唐山、香港等重要产业区及广东、湖南等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农村，相继建立了童子团。中国革命儿童运动由此发轫。

共青团中央第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开幕前七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到了长沙。为什么会议对北伐军中的青年工作没有形成决议呢？这正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青年团工作的影响。七月七

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后一周，陈独秀在《向导》杂志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文章中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湃（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若吴佩孚得张作霖之援助南下进攻广东，“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②而在共青团扩大会议之前结束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的《军事运动议决案》中，又规定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③这就使共青团难于动作。任弼时叹惜道：

“那时团（中央）的认识是：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就是由工人农民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庶使国民党或蒋介石等将来反动后，我们还可以取得一部分武装的兵士群众，并且我们若是在军队中有了势力，也就可以阻碍蒋介石等的反动……。根据这些理由，是主张在军队中应当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的。

但是，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反对在军队中有党与团的组织，因而不独禁止团去发生组织，并且还禁止党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有组织！当时党中央所根据的理由是：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尤其是军队是应当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 CP, CY, 其势必将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而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

.....

党中央既有如此政见的决定，团当然再不能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其实党中央这种见解是安心投降资产阶级，再机会主义没有的见解。”^{②5}

尽管如此，经团中央选送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先后有五百余人，他们分布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中，但因陈独秀不许建立团组织，他们只能在北伐军中分散地发挥作用。任弼时自我批评道：“团虽然感觉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勇气与党争抗，这也是不小的错误了！”^{②6}

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前后，广东的学生组织发

生激烈的分裂。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担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校长后，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依托，在广州组织“司的克党（Stickist）”以野蛮的手段向左派学生夺取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四月，广州市学联召开代表会议时，他们分裂学联组织，在“广大”另立门户，于是广州市两个学联对峙。五月七日，广州各界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时，“司的克党”竟派人捣乱会场，酿成“五七”事件。七月十六日，全省学生在“广大”召开代表会议时，“司的克党”，再一次大闹会场。他们在广州的《民国日报》上公开宣称要实行“司的克政策”（棍棒的政策），要“从广大打到广州，从广州打到广东省，而打到全国！”²⁷由于右派势力强盛，任弼时说：“学联机关始终是被他们占领”，“学联成了右派御用机关”。²⁸

有人说：广州赤化了，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鲁迅回答说：是的，满街都是标语，红的。不过红的不都是赤化。“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说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不错的。因为形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的；国民革命政府在这里建立；黄埔军官学校里有许多共产党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办了六期；广州大

学两千多学生中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四百多人，红色的广州吸引了许多青年。但是，孙中山逝世以后，广州也逐渐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国民党的新右派戴季陶公然说：“自改组以来，共产党的活动成了国民党腹内的癌肿”，于是“司的克党”在学生中大肆进行分裂活动。而蒋介石，先是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又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从此蒋介石把持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公然地进行排共反共活动，使广州实际上又成为反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斗争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

据当时在共青团广东区委工作的饶卫华回忆：大约在十月底，任弼时曾到斗争剧烈的广州检查团的工作，处理学生团体的分裂事件。但正在这时候，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议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便离开广州，准备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饶卫华说，当时他和谭平山的妹妹谭竹仙等三人，被派到东方大学学习，便和任弼时一起，坐“列宁号”邮轮离开广州。^{②⑨}

“列宁号”邮轮到上海后，停靠数天。任弼时上岸向当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萧子章交待工作后，

和陈琮英一起乘“列宁号”启程去莫斯科。

这时，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孙传芳正在屠杀革命！

九、在第一个风浪中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也在二十二日开幕。当时，欧洲的意大利、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运动，先后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但是，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停止。一九二五年五月，当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蓬勃兴起时，英国五百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它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巩固发展，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三大主要支柱”。^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在青年共产国际所属的四十个支部中，共有团员二百二十万人；在共产党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国家中，拥有五万多团员和十五万童子团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数量最多的；特别是中国的青年革命者，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

命运动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精神，深为各国代表赞赏！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因此在会上受到各国兄弟组织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结束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团组织特地邀请他参加大会，任弼时在苏联逗留的时间就延长了。在这期间，陈琼英被安排到东方大学学习。

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著名演说，他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迅速地彻底地发动农民参加，将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战线愈加有力，愈加强大。在谈到青年问题时，斯大林说：“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像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就尽力加强青年工作这一点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当尽量估计到这种情况”。^②斯大林的这些论断，使任弼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内疚和不安。因为“共产青年运动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军队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

团的一件耻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期间，当外国的同志问到：中国CY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任弼时简直无话回答。他说，“有时我只好照真答复：我们党禁止我们在军队中有组织，因为恐怕反而因我们的工作破坏了革命军队！”这样的回答令人感到很奇怪，“为何那样有名的中国CY在革命的军队中没有工作呢？”^③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任弼时偕陈琼英离开莫斯科返回祖国。去国半年，国内的政局发生了突变：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不断向北推进，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武汉。逞凶一时的三大军阀中，吴佩孚和孙传芳已经崩溃，只有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在负隅顽抗。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三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罗亦农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市民代表会议选出的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超过半数。这时，蒋介石正从南昌东下，他在安庆得知上海工人起义的消息后，感到坐立不安，他越来越觉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他独占国民革命胜利果实的心腹大患，于是兼程东下，沿途摧残工农力量，到达上海后，一面下令不许上海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就职，说什么“军事时期应暂缓办”，一面和帝国主义及江浙财阀密谋“清党”，条件是由银

行界先“借款”一千万元，蒋保证“长江以南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待“清党”以后，银行界再分两次“借款”四千五百万元。从限制异党活动到清共，蒋介石已经杀机毕露，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仍竭力退让，说“资产阶级是暴动的主力，无产阶级站在帮助的地位，暴动后的政权，无产阶级不必参加”，无产阶级是“在野党”。四月五日，他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国民党“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切弗听信反间的“谣言”，并“披沥陈词”，要和蒋介石、汪精卫等“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④不料，四月十二日，“弟兄般亲密”的蒋介石举起屠刀，残杀上海工人，解散工人纠察队，一夜之间，血染黄浦江。从此，五卅运动开创的国民革命新时期沦入了新的黑暗年代，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惨死于蒋介石的屠刀下，上海的八千团员锐减到三千，童子团被瓦解。十五日，广州又发生反革命政变，六千团员减少了一半。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使刚刚抵达上海的任弼时越来越认识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他和李求实、刘昌群等接上头后，立即奔赴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任弼时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蔡

和森、恽代英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意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

“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⑤

尽管“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

案》中，也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如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共青团“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等等，但是，对于陈独秀来说，以上主张，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五月十日，“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时，中国从南到北弥漫着腥风血雨。四月二十三日，著名的青年领袖萧楚女被国民党沉溺于珠江，二十八日，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死于军阀张作霖的绞架，在四围白色恐怖中，共青团“四大”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隆重揭幕。

仇恨，义愤，挽救革命的使命感融成大会悲壮的基调。第一小学的礼堂里，高悬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和李卜克内西的画像，横幅上写着：“我们的旗帜——列宁，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担任会场警戒的是头裹红巾、手持木棍的童子团员。参加大会的有六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共青团和童子团的代表，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英、美、法的共青团代表，以及国内各政党团体的代表。汉口《民国日报》对大会开幕式的报道中称：“革命空气之紧张浓厚，空前未有”。^⑥

对这次大会，任弼时这样写道：“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他告诫：在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要“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他又指出，北伐胜利后，中国南部农民运动有了惊人的发展，“中国青年运动有了更广大的下层基础，并且这一运动的领导，完全由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转交于中国的劳动青年群众了”，“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⑦

五月十六日深夜，武汉三镇处于战斗前夕的暂

时沉寂中，革命和反革命都在如磐夜气中紧张行动。在第一小学的礼堂里，共青团的大会正在举行闭幕式。大会通过的《宣言》中：“训令”全体团员偕同一切被压迫青年工农学生群众，在党的指导之下，一致动员，“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尤应彻底反对中途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谋改进工人生活，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宣言》特别号召学生“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⑧

与此同时，原驻宜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部叛变，潜师奔袭武汉，前锋已向武昌附近的纸坊镇袭来。武汉三镇进入临战状态。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平叛，毛泽东主持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四百多名学员和恽代英率领的一千五百多名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拿起武器，开赴前线。共青团湖北省委组织了四百多名童子团，担任武汉三镇的警戒任务。

童子团的活动，被武汉政府的汪精卫斥责为“过火”行动是毫不足怪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竟然粗暴地要团中央下令湖北团省委，停止童子团的活动，脱下劳动制服，交出木棍，“否则童子团应当枪毙”，“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

要解散”。^⑨陈独秀的“严重决议”，自然激起任弼时和共青团中央同志们的强烈不满。

五月三十日，为纪念五卅运动两周年，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郑重指出：

“五卅运动，我们没有得到直接的胜利，原因就在农民还没有起来，工人也仅有一部分参加，而革命的联合战线中还有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存在。但是，五卅把革命推进了，在这两年中，工人已全数起来，农民运动亦在北伐期间有长足的发展，因而迫得卖革命的资产阶级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反转来向革命进攻。资产阶级的反动，使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斗进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时期。……革命者对付它的方法，仅有积极的发展工农运动，实行土地革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用最伟大的革命力量，绝对消灭乡村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宣战。

“共产青年团昭告全国的革命青年，革命已进到了新的时期，在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联合一切反革命势力对革命者进攻之时，只有毫不顾忌的前进才是生路！”^⑩

那些日子里，陈独秀陷于内外交困中。党的“五

大”后，形势日益恶化。五月二十一日，继夏斗寅叛变后，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血腥屠杀工农，二十九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下令停止全省工农运动，将共产党“礼送”出境；四川军阀刘湘、山西军阀阎锡山，先后受命蒋介石携手反共；湖南军阀何键则叫嚣：共产党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冲着陈独秀一再指责工农行动“过火”，共产党“捣乱”。对汪抱有幻想的陈独秀，委曲求全地跟着责备工农。党中央三天两头开会，会上，敢于革命的同志责问：此时此刻何以不起来反抗？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对咄咄逼人的汪精卫及其同伙应采取什么方针，是防御，退却，还是进攻？党中央代理秘书长蔡和森说：今后我们的任务不是退让而是进攻。任弼时则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而看不到群众力量的人则主张妥协，说：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住他们的打击！陈独秀一筹莫展地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①简直不知所云。

这期间，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并且召集会议，请总书记陈独秀来参加，准备向他当面陈词。这样，任弼时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就发展到尖锐的地步。

围绕共青团《政治意见书》的斗争先后有三次：第一次是面对面的，时间约在六月下旬。

陈独秀的秘书黄玠然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汉口，团中央机关已经搬到武昌。有一天，团中央请“老先生”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说务必要去。那天下午，我陪他过江去。天很热，他穿着长衫，摇着折扇。一路上很沉默，因为那些天，他心事重重，我每天根据他口授的大事记，几乎都是两党联席会“无结果”，或是党中央常委会议“意见分歧”等等，有时，还可以看到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打转，低声叹息：我这个总书记还有什么威信哩！共青团机关原先在汉口青年会隔壁，因为外界传言，何键准备发动“武汉的马日事变”，为了戒备，中央有的机关就迁到叶挺的部队驻扎的武昌。共青团的武昌新机关是二楼二底的一幢民房。任弼时先接待我们在厢房里坐定，然后向陈独秀送上一份油印的文件（共青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一边摇着折扇一边看，面色很不好，因为文件内容是批评他的退让政策，责问他为什么不

执行“五大”的路线搞土地革命。他时而冷笑，时而说：“幼稚”，“荒唐”，手上的纸扇也不摇动了。当看到意见书责问为什么党中央隐瞒斯大林的指示时，“老先生”收起折扇，指着任弼时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为什么陈独秀对这件事特别恼火呢？事情是这样的：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期间，向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电：要求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动国民政府支持土地革命；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参加领导，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动员二万左右党员、五万革命工农，编成新军，作为武汉政府的“可靠近卫军”；组织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指示实际上还是幻想依靠和汪精卫继续合作来挽救革命。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收到这个指示后，连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意见也很不一致。持退却路线、主张和缓土地革命的鲍罗廷说：“难于执行”，“季诺维也夫^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没有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要进攻而不知道如何进攻的罗易对汪精卫抱有极大的幻想，为了向汪表示合作“诚意”，六月五日他竟然把国际来电拿去给汪精卫看；摇摆于鲍罗廷和罗易之

间、而且已经不能指挥群众的陈独秀，生怕和汪决裂，所以也不以为然地说：“难以执行”，“啼笑皆非”，迟迟不向党内传达。任弼时得知国际来电指示的信息后，更加强烈地要求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在《政治意见书》中指责陈独秀隐瞒国际指示，这就使有“难言之隐”的陈独秀大动肝火。因为在陈独秀心目中，年轻的任弼时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娃娃，居然不顾他早就宣布过的：“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的指示，来干预党中央的大事，未免太不像话。于是他不顾失态，当场把《意见书》撕了。

黄玠然说：“这时共青团的同志正在二楼等着，准备向总书记申述意见。任弼时不动声色，冷静地请陈独秀到会场上去。陈勉强地在任的陪同下上楼。但是，当任弼时宣读《政治意见书》时，陈独秀立即退出会场，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老头子’的家长制恶习又发作了！”^⑬

第二次是背靠背地递呈《政治意见书》，时间约是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就在这一天，汉口《民国日报》登载了湖北省总工会的布告：“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而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⑭《工人日报》被勒令停刊，武汉全市戒严。何键发表了反共通电，开始捕杀革命分

子。

尽管陈独秀当面撕毁了共青团《政治意见书》，任弼时没有气馁，他把《意见书》正式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时，党中央机关刚从汉口迁到武昌，晚上，陈独秀主持召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不久瞿秋白和一位“毛子”也来了。蔡和森写道：“共青团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⑮在这次会上，陈独秀对向汪精卫妥协让步的意见却十分欣赏，他支持起草一个决议案，先开活动分子会，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决议案对土地革命的基本主张是“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所以蔡和森称它不过是五次大会后，党中央“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⑯

第三次围绕共青团《政治意见书》的斗争是在七月三日下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包括正式和候补的执监委），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会议分析当前形势，认为：实行土地革命“首先应当有一支革命军队”，“而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足够的阶级觉悟，没有军事力量，因此土地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目前工农“对于行使领导权

没有准备”，为了避免工农在反革命进攻面前“孤立”，因此必须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为“革命中心”，“共产党人要利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国民党左派，同他们结成坚强的战斗集体”，为此目的，党“需要实行相对退却”。^{①⑦}接着会议宣读了由陈独秀准备的十一条退却纲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是一个以退让为名向汪精卫投降的机会主义纲领。这个文件的全文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在当年八月初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①⑧}中，向党员揭露了其中的主要条文：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 CP 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决议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

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总之，按照这个纲领，革命领导权不要了；共产党员应退出政府；工农民众团体在“国民党部之领导与监督”下被绑住了手脚，而工农的自卫武装收编入国民党一党控制的政府军，连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要被收编、解散和限止活动。这无异是说共产党应放弃独立的阶级政策，取消工农群众运动。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他强调说，第一条路是“不正确的”，第三条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①，即放弃独立的政策，留在国民党内。这和他过去所说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主力”，无产阶级“站在帮助的地位”，是“在野党”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照此办理，就是断送革命，无数烈士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将付之东流！

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求在会上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陈独秀很不耐烦地说。

“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种权利！”任弼时呼吁说。

这时，陈独秀恼羞成怒，他完全忘记了任弼时是党的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他语无伦次地说：

“青年团国际的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他不应当进行干扰。”

于是会场哗然。当许多同志起来批评陈独秀的错误时，他又说：“这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②①}

原来，陈独秀的“议事日程”是强行通过他的十一条投降主义的“政纲”。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年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是任弼时的政治启蒙读物，党内许多同志尊称他为“老先生”。但是，在革命深入、阶级斗争尖锐的历史关键时刻，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背离革命利益时，他的历史功迹就黯然失色，被他认为是“初生之犊”的任弼时，却敢于向他挑战。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在陈独秀千方百计地向汪精卫“让步”“退却”的

时候，汪却抓住罗易提供给他的那份电报，声称共产国际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他立即解除鲍罗廷的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和蒋介石合流，着手“分共”。

七月十五日，中国现代史上又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了。十九日，共青团中央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中，痛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等背叛革命、沦为反革命的工具。^{②①}

这时，不屈的共产党人却奋起挽救革命，组织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被何键宣布为“共党要犯”的毛泽东，准备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周恩来立即奔赴南昌，于八月一日和朱德、贺龙等拿起武器，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任弼时没有离开武汉，他冒着白色恐怖组织新的斗争。

八月三日，当汪精卫在国民党湖北特委临时大会上宣称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时，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的有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和林育南。会议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大纲》，决定发动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并准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关。任弼时在会上说：要真正接受“五大”以来党中央右倾机会主义

错误的教训，过去错误的责任，如国际代表有错，也应说明。同时要建立新的、集体的中央指导机关。^②

八月七日，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任弼时出席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讨论制订挽救革命的新策略。任弼时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作了系统的发言。保存下来的记录是简要的，但他的意见是鲜明的。他说：

“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原因是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北伐结果，唐^③等势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CP与CY意见冲突，主要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党怕群众。……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②①}

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草案时，任弼时建议：“1. 手工业工人以后的经济斗争应保障其胜利；2. 只有现在秘密工会还不够，还应组织一些斗争团体。”和“对CY关系亦应加入”^{②②}等。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分别在决议案中写道：

“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②③}“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②④}

紧急会议只进行了一天，“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会议

八七会议记录任弼时发言部分

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的肯定：

“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②③}

这是公正的结论。

在“八七”会议上，二十三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暴动是一种艺术”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向隐蔽在武汉的团中央委员们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会议对党领导土地革命，发动农民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在湘、鄂、赣、粤四省立即举行秋收暴动的新的决策表示完全接受，“从此团中央与党中央在政治方面的意见，大体完全一致”。会议经过讨论，“承认团过去工作中也犯了很多的机会主义错误”。^①

这时，背叛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南北夹攻，疯狂地残杀工农革命力量。在湖南，自马日事变开始，工农群众先后遭受湘桂两系军阀的残酷屠杀。据白崇禧自供，被杀者达十七万之众，其中学生一万多人；在湖北，四野枪声，野犬啖肉，长江漂尸。不坚定的分子，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人数一天天增加，初则一个一个地

登报脱离，继则一批一批……不但是在武汉，就在各地方如广东、上海都是这样”。^②全国团员人数由五万骤降到一万五千。团中央会议决定：“今后团组织应当更加坚决的努力建筑在‘城市青工’‘乡村贫农’，基础之上，并提拔新的工农分子以强健无产阶级指导。”

国共分裂后，中国往何处去，党的任务和策略是什么？八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讨论时，任弼时认为有两种前途：一是大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控制，在殖民地条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可能的”，但他们“要求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是困难的”；一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苏联影响下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至于两者的可能性，自然后者的可能性要多些”。特别是农村暴动起来以后，“乡村苏维埃比城市要先成功”，这一点和苏联相反。如果广州暴动成功，帝国主义必然要进行干涉，届时，“事实上恐怕要用布列斯特和约的原则来应付”。^③这时，各地农村暴动正在加紧准备，八月十五日，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鄂南暴动的军事问题，由任弼时和罗亦农面谈。^④

按照临时中央发布的《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九月十日，农历中秋节是两湖暴动的总发动日。后经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彭公达和临时中央面商，决定湖南九日开始破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五日各路

起义军会攻长沙。九月初，鄂南的暴动发生，人们盼望着从长沙传来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的捷报。

不料事出意外。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共产国际驻长沙的代表马也尔接连函告中共临时中央：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他严厉谴责湖南省委是“临阵脱逃”，“可耻的背叛”。十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也严厉斥责湖南省委“临阵脱逃”，提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为“全权代表”，立即赶赴长沙，查明情况，改组省委，要求新的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一面命令萍（乡）、浏（阳）、平（江）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不许丝毫游移”。^⑤

二十日，任弼时由汉口动身，两天后，抵长沙时，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易礼容、夏明翰已遭敌人“通缉”。二十三日，任弼时会见马也尔，但他与省委音信也不通。直到二十五日，任弼时才会见省委书记彭公达。二十六日，会见夏明翰。二十七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氛围中，任弼时主持召开湖南临时省委常委会。

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为什么改变原定的暴动计划？当晚，任弼时向临时中央书面报告了情况。

长沙暴动的计划是经临时中央批准的，其力量组织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事的，一部分是长沙城

内的工人和四乡的农民。九月初，毛泽东赶到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的和地方党的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将党所掌握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约五千余人，毛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以暂驻湘赣边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⑥为基础，补入平江农军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的农民起义军改编；第二团由安源的矿工武装及萍乡、醴陵、衡山和江西莲花的农军组成。约定十一日开始从修水、铜鼓和安源分头出动，得手以后，会攻长沙，建立工农政权。

九月九日，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切断长岳、长株两路，当天，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向平江进发。十一日清晨，安源的第二团及起义工人二千余人进攻萍乡未遂，改攻老关，得手后乘胜攻克醴陵县城。这时，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攻下距浏阳县城约百里的东门市。株洲暴动兴起，湘东的敌人纷纷退却。任弼时在报告中认为：“长沙城内的空气非常紧张。此时实为暴动的极好时机。但因省委与暴动区域交通不灵便，且事前未决定十三号暴动，故未发动，实为可惜”。^⑦

十四日，情况起了变化。一是从十二日下午开始，国民党方面修复了长株铁路，接着十五日长岳铁路通车，敌人便调集大军反扑过来。株洲暴动随即失

败，已占醴陵县城的安源起义军不得不退出，转攻浏阳。二是进攻平江的第一团在攻长寿街时，被临时收编的“半军半匪”的邱国轩团偷袭后营，以致第一团腹背受敌，被击散两个营。三是在东门市的第三团，因敌军反扑，寡不敌众，十四日不得不撤至上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当晚，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第三团干部会，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准备拉队伍“上山”。他随即通知各团到浏阳的文家市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十五日，安源的队伍虽然占领浏阳县城，但已是孤军奋斗，加上麻痹轻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星散。任弼时写道：“十六号，浏阳尚在我们手握，长沙亦有发动的可能，但省委改变了暴动时期”。之后，毛泽东率领保存下来的队伍，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任弼时对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停止长沙暴动的决定，经过省常委会后，认识有所发展。

在省常委会上，大家虽然承认“十三日没有发动长沙起义确是错过时机，造成错误”，但是并不承认十六日停止暴动是错误。任弼时对马也尔和罗米纳兹斥责的“临阵脱逃”、“可耻的背叛”的结论是持保留态度的，所以他在报告中说：“关于此一问题，只

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好了！”

教训何在呢？任弼时认为：错过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而没有广大农民起来参加暴动，“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正如夏明翰在会上所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如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任弼时说：“据我看来，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马夜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行军所到之地没有替农民做出一点没收土地、屠杀豪绅的事实”，同时湘西、湘南也没有发动起义，因此“不能分散敌人力量”。

那么能不能按罗米纳兹的意见，立即再次发动暴动呢？任弼时认为：湘东初败，湘西及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平浏已不在工农军手中，长沙城内有敌九千余，且戒备极严，而工人及四郊农民能发动的只有千人左右；武器方面，虽有炸弹千余枚，能用的只占半数，另有盒子炮二十枝。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任弼时郑重地向临时中央提出：

“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与马也尔商量结果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湖南今后工作计划原则上还是进攻的，并且应当是有广大群众的暴动，但是一定要相当时期为准备

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太近是无异乎自欺）。”^⑧

会议统一了认识，制订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主要精神是以湘西的常德、湘南的衡阳和湘西南的宝庆为中心，扩大农民的斗争，夺取重要县镇的政权，准备力量再夺取长沙。至于省委的改组，会议根据“全权代表”任弼时的意见，书记仍为彭公达，军事部长李子骥，农民部长向俊奇，组织部长林蔚，工人部长李运钧（工人），宣传部长罗章龙，秘书长蔡以忱。原省委常委夏明翰和易礼容，因受敌人“通缉”，党内出现奸细，在长沙“完全不能行动”，因此派夏去常德，易去衡阳，分别主持湘西和湘南的起义准备工作。

十月四日，任弼时经过进一步调查，并和工人、农民谈话后，再次向临时中央报告情况。原来马日事变后，何键封闭共产党机关七百余处，湖南省总工会、各产业工会、各级农协的干部，或被“送解省城县署枪决囚禁”，或隐蔽不能回籍；各地行政、团防机关均为土豪劣绅把持，工会、农协“均等于消灭”，加上资本家大量裁减工人，七千工人的安源煤矿，被裁者近二千人，工人受失业的威胁，“群龙无首”，不敢轻易行动。共青团机关的破坏则更为严重。六月四

日，团省委的八名领导干部中，书记田波扬等七人被捕后遭枪杀；八月初，团中央派吴化之等重建机关于大观园七号，但二十五日，又被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查抄，长沙团员的总名册、宣传队员名册落入敌手，敌人“全体动员，按名逮捕”，被捕一百二十余人，被枪杀十八人，这就是“大观园事件”。从此，团省委机关停顿，上下组织断线，元气大伤。在军事力量方面，据军部报告，唐生智拥兵三万五千人；湘南、湘西有粤桂地方军阀部队共一万六千九百多人，“多系蒋派及与李济深有关系者”，他们虽然和唐生智有矛盾，但镇压工农则并无二致。因此全省实际存在的国民党军共五万二千六百多人，枪支三万六千八百多枝。而工农武装力量，暴动失败后，仅余二千九百多人，枪支一千五百七十枝。敌我兵力的对比，在数量上是十六比一，武器方面是二十三比一，“由此看来，我们的军事力量非常之小，以后暴动纯靠农民群众起来的力量，方能得到成功”。如果不经相当时期的准备，贸然再次发动暴动，客观上将重蹈单纯军事冒险的覆辙。因此，任弼时着力整顿党团组织，重新恢复工会、农协和共青团机关，在农村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在工人中，扩大经济罢工，广泛宣传南昌起义后南下的叶挺、贺龙部进展潮汕的新局面，鼓起工农的斗争勇气。^⑨十月中，继改组中共湖南临

时省委之后，任弼时重建了团省委的机关，随后，巡视各地团的工作。两个月之后，全省组织已有二十四个县恢复，湘南、湘西、湘中、湘西南等地分别设立特委，长沙附近地区归团省委直接指导。^⑩在“反对新军阀战争”和“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斗争中，共青团如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了。

在处理长沙暴动的过程中，中央全权代表任弼时，冷静清醒，从实际出发，尽管罗米纳兹等有再攻长沙的“命令”在先，但他却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向临时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十月下旬，任弼时离开乱云飞渡的长沙城，只身回到湘阴老家，乘机探望亲属。这时，罗亦农、王一飞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抵达长沙，再次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由王一飞担任省委书记，准备发动第二次暴动。

阔别七年，门庭依旧，人事已非。父亲任裕道已故世三年；大妹培月，正在苏联工读；二妹培星，在上海一家医院里当护士，守在老家的是年已半百的老母亲。自父亲去世后，老人家挑起生活的重担。她勤劳家务，砍柴种菜，倚门倚闾，时刻盼望游子归来。和老人家相依为命的是小妹妹培辰，任弼时离家时，她才三岁，此刻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了。任培辰回忆

道：“国共分裂后，大约阴历九月，二南哥回过一次家。阴历九月二十一日，是母亲的生日，老人和二南哥商量，借过生日为掩护，和亲戚们团聚了一下。二南哥带给我一把小伞，还教我唱歌，鼓励我好好读书；还让我领他去看父亲的墓地，在墓前给我照了一张相。”^①

一抔黄土，一丛衰草，任弼时站在父亲的墓前默默祷告。他和父亲感情特别深厚。他是在老人家晨昏教导下启蒙的，“唧唧复唧唧”的《木兰辞》，是老人家教他背诵的；岳武穆精忠报国，屈原爱国投汨罗江的故事是老人家侃侃地向他讲述的；描红丹青，执刀镌刻是老人家手把手地教给他的；他去国赴莫斯科学时，曾在给父母亲的信中写道：“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如今游子归来，父亲却长眠于地下了。“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道路漫长，任重道远，但他时刻铭记着自己的誓言。

在探亲期间，二十三岁的任弼时时刻围绕在母亲身边，一会儿帮助打扫屋子，一会儿背柴火。厨房门外是一口水井，他提着水桶，一桶一桶地把井水挽起来注入灶旁的水缸，尽管母亲不让他动做，但他似乎想把每一分钟都用来分担老人的辛苦。任培辰又回忆道：“大约住了一个星期，二南哥对母亲说：我

不能久住，要走了。母亲说，我留不住你。第二天，母亲给雇了一顶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走了。”他没有回长沙，而是到离唐家桥不远的长沙东乡板仓冲杨家屋场，探望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任弼时依依地惜别老母亲和培辰妹。谁知这次和老母亲的分手，竟成了永诀！

任弼时回到武汉时，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已从武汉移往上海。九月三十日，苏兆征和瞿秋白先后动身赴上海，罗亦农则继续留在武汉主持新成立的中共长江局的工作。瞿秋白等临走时安排，待任弼时回到武汉后，由李维汉主持，召集顾顺章、罗亦农和任弼时等四位政治局委员开一次会，交接安排，然后除罗亦农以外，均往上海集中。十月十九日，任弼时接到临时中央通知：务必于十一月七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地之后，近三个月来，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义愤，和争取革命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相互交织，浙江的金华、衢州、严州，直隶的玉田，江苏的宜兴、无锡等地的工农纷纷起来暴动，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斗争中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抗捐抗税，

攻城镇，破监狱，捕杀土豪劣绅，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盲动情绪同时迸发，大有“无动不暴”，凡斗争皆暴动的气势，不少同志悲壮地倒在血泊中！

在悲壮激越的群众情绪下，共产国际的罗米纳兹和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误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罗米纳兹对结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的总政策是有贡献的，但是，在“八七”会议之后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的倾向。^⑫这种盲动主义倾向在共青团的工作中，集中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在宣传鼓动上。十一月七日，继《中国青年》停刊而出版的《无产青年》，在《发刊露布》（即发刊词）中写道：“我们的出路，只有毫不妥协的暴动！我们要为已死的几万兄弟报仇！我们要杀尽阶级的敌人！我们更要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余毒，扫除净尽！…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与一切走向资本主义的趋向奋斗，走上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⑬接着，又在第二期上以“无产青年社”的名义发表《暴动中的工作》一文中写道：“现在的情形是‘一切争斗皆

成暴动’，因此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几乎只有暴动中有机会作，”“最后的大爆发就在眼前！死于反革命刀下之战士们哟！不久，我们就可以沥统治阶级的血，来安慰你们的英灵！不久，我们就可以把大暴动来建立新的社会，完成你们的未竟之志！”^①其言亦悲亦壮，但政治上、策略上却缺乏应有的理智！

第二，是在党团关系上。十月，宁汉战争爆发，南京当局下令讨伐唐生智，中共湖北省委和长江局的部分同志，主张趁唐兵败退时，在武汉举行暴动，共青团湖北省委积极支持。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从长沙回到武汉后，认为敌强我弱，没有胜利的把握，正确地指出“目前绝非总暴动时期”，要暴动至少要有三、五个月的准备，但团省委的刘昌群、韩光汉却坚持要“马上暴动，建立三五天政权也是好的”，结果，仓促行动，遭到失败，事后他们联名向团中央和中共临时中央控告罗亦农。江苏省在宜兴、无锡暴动失败后，共青团还坚决主张在苏州继续暴动，后被临时中央及省委阻止。这样，党和团的基层组织往往相互指责，关系颇为紧张。

“哀兵必胜”，首先是坚定群众革命意志，清醒地估计形势和制定政策，保存实力以图再战，而不是在群众冲动的情绪左右下失去理智的盲动。任弼时说过：“我们运用政策，须求与主义根本不相冲突，且

要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如此方可以代表群众，为群众的领导者。”^⑮

十月下旬，任弼时抵达上海。由于他对长沙暴动失败作了详细的调查，深知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单凭少数人的热情冲动和军事行动导致暴动失败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团中央及时通告制止。指出：“这些盲动主义者往往只懂得暴动在军事上技术上的意义，而忽视了在组织上与政治上准备暴动的重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拼命走险心理的表现，直等于玩弄暴动”。^⑯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无产青年》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防止机会主义的余毒》的文章，署名“烈火”，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防止“‘左’的机会主义”。这篇文章和同期用“无产青年社”名义的文章《暴动中的工作》针锋相对。这是在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上最早出现，而且是在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盲动错误正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发表的。文章肯定“南昌与两湖的暴动乃是实现新政策的表示”，但是在各地暴动中，机会主义的最主要表现是“忽视群众力量”，“偏重于离开群众的军事力量”，“致使暴动变成了军事投机的失败”。文章批评：

“这种‘左’的机会主义，若是不能及时纠正，将使中国革命变成少数英雄主义者的斗争，结果永远不能消灭反动势力的统治，更不能实

现土地革命。

“……从今我们应当认清一切军事势力只是群众暴动的副力，暴动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工农群众之上。只有在暴动中创造出来的武装和不离开群众的军队，方才能够战胜敌人，方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从下而上的实行土地革命。只有工人和农民的斗争连贯起来，方才容易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使农村中的一切斗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发展”。^{①⑦}

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无产青年》，在一周之间言论导向开始发生变化，显然是和从湖南巡视回到上海的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有密切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江苏省委提出的上海暴动计划时，出席会议的邓中夏、李维汉都认为现在是处于失败后恢复工作的状态中，经不起再度失败，上海要普遍地进行政治宣传，开展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准备暴动的条件。任弼时说：上海也要动，但方式不是像农村那样，上海要开展反对统治阶级与经济斗争汇合起来的斗争。^{①⑧}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任弼时出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由罗米纳兹等起草的《中

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和《政治纪律决议案》等，强调中国现时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且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决议虽然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军事投机主义，但却认为军事投机主义“还不是主要的危险”，党的策略是努力使各地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①，以致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为了推行盲动主义，扩大会议之前，根据罗米纳兹的提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政治纪律委员会，由任弼时、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和李维汉五人组成，任弼时为书记。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错误地处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等，把暴动的失败，以惩办主义的办法，不作分析地归咎于有关的领导干部。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公正地评价道：“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米纳兹”，“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②

十一月临时中央扩大会议后，任弼时立即主持

召开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瞿秋白、周恩来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向会议作政治报告。尽管党的十一月会议决议认为军事投机不是主要危险，但是，从共青团的实际情况看来，盲动的结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是各地暴动失败后，共青团的地方领导机关纷纷遭到敌人的摧残，十一月，团的北方局三名常委被捕，顺直、山东、东北三省的机关被抄，团浙江省委的领导人被捕，机关被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据团的扩大会议上反映，目前党和团的部分干部中滋生着几种错误观念：一是取消主义。任弼时认为，产生取消主义的原因是过去团的工作偏重于抓学生工作，国民党反动后，阶级阵线发生剧烈的变化，一度蓬勃的学生运动趋于消沉，而发动工农青年斗争，无论是组织基础、工作方法和经验都不适应新的形势，于是有人认为工农运动有党负责领导，团没有特殊的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可以仿照国民党的办法，在党内增设青年部管理青年运动。有的主张“将团的干部分化给党，共青团今后可以专做文化运动和儿童运动”，这样无异于改变了团的性质和任务，沦为第二国际的非政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②二是先锋主义，其严重的表现是有些地方的团组织指责“党还没有改变旧的机

会主义的错误政策，不信赖群众力量，而畏缩后退”，妨碍“团的工作”，提出“党完全机会主义，（应）由团来干”，甚至写信给团中央，团应改名为“青年共产党”，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团”来代替“机会主义的党”。任弼时认为这是“第二党的倾向”。会议把反对因军事投机主义而滋生的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列为“第一个任务”。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六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两次讨论团的工作，任弼时在向中央汇报时强调指出：“先锋主义是这次扩大会议最严重的问题”，既要反对“取消派”、“文化派”，更要注意纠正“第二党的倾向”。周恩来指出：某些党部自然有机会主义的余毒，团勇敢的批评是好的，但团近来有点军事投机，是另一方面的机会主义，是冒险的，它可以牺牲许多同志，党和团负责指导的人要注意此种危险。^{②②}常委会一致认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处理好党团关系对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委托任弼时起草一个文件，这就是十二月六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关于党团关系的）。通告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只有“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弄暴动的倾向”，“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之任务”。^{②③}

会后，任弼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扩大

会议的经过与意义》一文中写道：这一个时期的工农暴动，“起了唤醒全国工农群众更加勇敢争斗的信号作用”，但是，在策略的运用上，“很严重的缺憾”是“各地暴动没有引起广大群众的参加，成为单纯军事投机的失败，仍然表现机会主义遗毒犹未完全肃清。”他进一步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主张”，其结果“都可以削弱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阻碍革命的发展”。那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团的出路应当如何呢？怎样才能在中国革命中表现其特殊作用与力量呢？任弼时写道：“扩大会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切实在青年工农与兵士中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为了适应土地革命的要求，他认为要进一步改造团的基础，以小资产阶级学生为基础的团“不能担负土地革命的使命”，“不在农村中建立基础是团的绝路”；在工作方法上，他谆谆告诫：“群众工作是一种艰苦的任务，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因为过去经验的缺乏，决不是很容易收效果的，必定要具有坚决忍耐的精神方才能够实现这一任务”。^{②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无产青年》第四期上，任弼时发表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编者在注文中指出：“本文所批判的论点和援引的文句，有一些是出自《暴动中的工作》一文，现将该文附录于

后。”这表明经过扩大会后，共青团中央对两个月以前的错误言论作公开的自我批评。任弼时在文中写道：

“恩格斯说‘暴动是一种艺术’，绝对不是‘一切争斗皆成暴动’的‘无动不暴’。若是我们不顾暴动的条件，不论成败如何，或是群众有了强固的组织和暴动情绪，而统治阶级并没有动摇，或是统治阶级已经动摇了，而群众尚没有具备暴动条件而贸然发动，这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直等于革命的罪过！”^⑤

被称为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左”倾路线的出现，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斗争经验上还不成熟。但是，在客观事实的教育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批评、抵制下，任弼时和临时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迅速加以纠正，而在纠正过程中没有遇到严重的阻力。任弼时从全权处理长沙暴动事件、及时制止盲目暴动到纠正共青团工作中的“第二党”倾向，他敢于实事求是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是非常可贵的。

十一、留守中共中央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任弼时到党中央机关工作。

这项决定前后酝酿了四个多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常委会议上就提议调任弼时等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当时，政治局的九名委员中，向忠发在共产国际工作，苏兆征将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王荷波在北方局，罗亦农在长江局，彭湃在海陆丰，在中央机关的只有瞿秋白、李维汉、顾顺章和十一月会议后增补的周恩来，人手很少，所以中央一再催促抽调任弼时，但因团中央扩大会议精神亟待贯彻，共青团本身干部也很缺乏，这件事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十五日，党的“六大”已决定召开，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将出国参加，政治局这才作出最后决定。

一九二八年初，由于党内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

对“左”倾盲动路线的批评和抵制，许多地方已经停止执行。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大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形势是高涨还是低落，今后革命的道路和策略等问题，认识颇不一致，召开党的“六大”已感到十分迫切。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接连讨论时，任弼时认为：现在是土地革命，在殖民地的条件下，革命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政权；联合战线只是群众的联合，不是上层机关的联合。^①对革命的潮流，虽然从总的说，他认为还是“高涨的”，但开始认识到“高涨的程度有差别”，农村很容易走向武装冲突，湖南已形成割据局面；城市中，因为白色恐怖很严重，群众斗争难于起来。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党要很好的领导，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②对土地政策，当时有的地方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任弼时说：现在党的土地政策至少应当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像江西的万安县，自耕农占百分之八十，立即采取没收自耕农的土地，“是比较危险的”。^③对暴动问题，他认为：蒋、桂两系军阀在广东冲突日益激烈，广东工运基础比湖南好，海陆丰苏维埃是发展的形势，广州暴动后，北江地区也有暴动的可能；至于城市暴动，他认为“一定要经过总罢工”，“但总罢工不必一定发展到暴动”。^④对有些省区出现的党内纠纷，甚至发展

到“小组织倾向”，任弼时强调说：“我以为还是上层负责同志的问题，是有危险的”，“要严厉地取消小组织”。^⑤

一月十八日，政治局讨论“六大”的筹备工作，任弼时建议：代表大会应制订一个新的党纲。会议接受他的意见，决定分工起草有关的文件：《党纲》草案、《党的政策》、《组织工作》、《土地问题》、共青团和职工运动决议案等，由于国内环境险恶，大会的地点大家倾向于在香港或澳门，并在代表大会之前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三月中，得知共产国际将于五月初召开第六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可于四月在莫斯科召开。这样，原来计划的中央扩大会议就来不及召开了。三月十五日，政治局讨论出席“六大”的代表时，考虑到国内工作需要，政治局委员不可能都出席“六大”，除向忠发、苏兆征已在莫斯科外，中央再增加瞿秋白、周恩来两人即可把过去的策略说清楚。周恩来说：国内工作要受点影响，顾了日常工作，顾不了巡视工作。他主张国内至少要留下四人主持中央工作，“亦农去，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四月二日，共产国际建议，“六大”后接着召开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希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⑥立即去莫斯科筹备。因任弼时提议由关向应代表共青团中央出席“六大”，四月底政治局决定：政

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后来周恩来说：“六大”代表成分“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太重视工人成分”，“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同志”，“代表成分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⑦

四月二十八日，任弼时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于二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革命现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已经结合成“完全的反革命联盟”，所以中国“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最大的危险是“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要“坚决反对盲目暴动”和“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等等。这个决议是经斯大林看过的、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⑧自然也是留守中央指导工作的依据。

会后，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启程去莫斯科，李维汉、任弼时等开始主持国内的工作。为了总结五卅

以来共青团工作的经验，向“六大”提交报告，任弼时日以继夜地不停地写作，以便交代表们带往莫斯科。五月七日夜，稿成，题为《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全文三万余言，系统地叙述了自五卅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发展过程和基本的经验教训。这时，全团人数已由八七会议后的一万五千人，增加到七万七千多人。团员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农民占百分之二十五，知识分子等合占百分之四十。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团的组织仍能获得这样大的发展，而且工农成分合占团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报告的末尾，任弼时写道：“关于最近期内全团状况、总结论与目前任务等，因时间十分短促，做报告者已过于疲乏，不能详述了”，由于团中央的一切文件“都在武汉最近破坏遗失已尽，所以许多详细情形，实在无材料可参考，只好凭记忆得到的记下来”，“所以这一报告当然不能算得很完善了”。^⑨

当中国共产党正在冷静地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时，四月初，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从津浦、正大、京汉铁路北上，向奉系军阀进攻，为了“巩固后防”，蒋介石加紧搜捕共产党人。三月二十八日，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湘鄂特委书记郭亮在长

沙就义，四月十五日，罗亦农从湖南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因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出卖，二十一日不幸遇难。但是，留守在上海的任弼时等，不畏艰险，在公共租界的闹市区巍然担负起党所委托的主持国内工作的重任。李维汉回忆道：

“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的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它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⑩

留守中央的工作刚开始，“济南惨案”发生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进军济南时，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保护奉系军阀和日本在北方的利益，派三千侵略军占领济南各机

关，屠杀民众三千二百多人，国人纷起抗议，甚至要求政府与日本国断交。曾经通电反日的蒋介石，忍辱退让，把部队拉到徐州、兖州、泰安一带，六日，通电取缔民众反日运动。与此同时，吁请国联和西方国家主持“公道”，出面调停，以便对日本有所牵制。九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布《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占据山东告全国民众》书。这时北方斗争吃紧。十一日、十五日，任弼时为中央接连起草两信，向中共顺直省委指出：只要蒋、阎、冯完全屈服接受日本的要求，甘心成为象奉系军阀一样的工具时，“京津必能于最短期内变成青天白日的反动统治”，奉系军阀在关内的统治“是有消灭的可能”。果然，六月二日，张作霖通电退出北京。七月六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集会于北平^①。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宣称统一大业“正告完成”，军事时期“将告终结”，于是，他一面以所谓修约、裁军、裁厘^②等手段欺骗国人，一面加紧压制民众运动，宣称“不容共产党存在”。在蒋介石等新军阀和平进入北平之日，也就是他们相互之间争权夺地、矛盾加剧之时。六月二十六日，任弼时为中央（留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书中指出：“这次国民党军阀的‘北伐’，完全是各派军阀为扩充自己地盘的混战，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

现在‘北伐’成功了，国民党的军阀得到奉系军阀关内的地盘了，——民众得到的是什么？工人得到的是失业恐慌！农民得到的是兵灾匪祸，人亡家散！兵士得到的是数万生命的死伤；生者七八个月得不到薪饷；……中国得到的是日本占领山东和满洲”。文告尖锐地指出：“将来以‘蒋与桂’、‘冯与阎’为骨干而互相勾结利用的战争，必然会要暴[爆]发，造成全国更紊乱更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⑧

留守中央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因势利导，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起来，以反帝、反新军阀、反国民党及其政府为中心内容，致力于发动群众，运用灵活的策略，使处于低潮时期的中国革命渐渐获得复兴的生机。在留守期间，任弼时为临时中央起草的指示、信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对于转变策略，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创造新的工作方法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是进一步克服盲动主义。

五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国奉战争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强调要“杀豪绅地主资本家，杀工头工贼监工，杀国民党及其走狗反动派并没收其财产，实行部分的夺取政权，一直到总的全省的大暴动”等等，任弼时在复信中指出：决议案表现有“极多成分的盲动主义精神”。任弼时预计到，蒋介石占领北方后，为

了巩固他的统治，必然要加紧镇压工农，今后的斗争，必然带来更多的困难，因此他指出顺直过去工作基础薄弱，目前主要的任务“不是甚么暴动夺取政权”，^⑭而是乘奉系军阀溃败的时机“竭尽全力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组织”，在城市，组织工人示威，“极力扩大下层的组织”，“准备秘密的机关”，为国民党占领后的斗争作准备；在农村，须在“五抗”口号下与豪绅地主阶级斗争，没有广泛发展的群众基础“不应攻取城池”，同时，有组织地发动工农“夺取收缴溃兵的武装”。^⑮六月一日，又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冯玉祥率部北上后，地方军阀争夺统治权的冲突加剧，这是“我党发展工作的良好时机”，但河南党和群众的主观力量“绝对没有到普遍的‘起而用暴动手段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时机”，而应是“加紧运用麦收机会发动农村争斗”。^⑯四日又函示中共江西省委，“务必停止”当地反日运动中打烧日本领事馆、杀日本领事等“不要群众的激烈行动”。^⑰福建省三月平和暴动失败，省委没有接受教训，又在永定发动“过早的攻城”，任弼时复信指出“这是危险的倾向”，告诫中共福途省委，在工人斗争中，“不应抱一种非罢工即不算斗争的错误观念”，在农村，不要群众一起来就去攻取城市。^⑱中共广东省委根据群众的暴动要求和桂系新军阀统治不稳定的事实，主

1928 年 6 月 4 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留守）起草
的致江西省委的指示信手迹

张在短期内发动夏收总暴动，任弼时在讨论时说：蒋桂冲突主要在长江流域，李济深在广东的地位相当巩固，工农的暴动其本身的组织尚无基础，农民的暴动要求不应是直线的。他强调说：“由斗争到暴动必须加上组织的力量。”^{①⑨}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在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承认客观事实，企图走直线式的进攻道路，是幼稚病；而面对现实，走曲折迂回的斗争道路，是清醒理智的表现，是革命的韧性。任弼时的这些意见，对于纠正盲动主义残余，把党的工作引向深入是非常有益的。

二是改造党组织，逐步确立新的工作方式。

“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其结果“不是脱离群众生活、毫不起一点领导斗争的作用，就是一动作便遭破坏，而致干部损失，组织瓦解。”这是任弼时对当时党组织状况和斗争环境的深刻分析。出路何在呢？他为中央（留守）起草了两个重要文件：《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②⑩}。这两个文件，对新形势下党组织的改造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

关于进攻和退却，文件指出：“列宁曾说，领导全党的艺术，不独在怎样有组织地向敌人进攻，在斗

争一时不利之际，并且能够有组织地暂时退防。”任弼时强调要“严重地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这就要提高党员的素质。为了使敌人不易破坏，或者破坏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其它部分，文件规定，缩小党支部的规模，“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但需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提拔工农同志，必须是“能担任指导机关一部分工作的”干部，纠正“很形式地以为只要工农同志便是满足”的倾向。^②

关于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文件指出：“党的秘密工作只有能使党领导广大群众斗争时才有意义，否则秘密则与群众斗争也隔离起来，那便是极大的错误”。因此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如组织兄弟团、姊妹团、读书会、平民学校等。在割据地区，“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

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要纠正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 CP 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常常把自己的‘官职’章帜公开悬挂胸前，惟恐人家不知道他的地位”。^②七月中，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在讨论党组织和文化团体“创造社”等的联系时，任弼时说：“创造社有公开活动的作用，要继续保持联系，以后要在革命文学和理论方面多发挥作用。翻译理论书籍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有计划地做下去，最好用‘创造社’或其它名义出版，在出版发行上给以帮助；其成员将来是要分化的，少数政治上好的可以秘密吸收入党。”^③

关于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任弼时写道：“如果没有健强的城市工人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的争斗配合发展，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的”，“过去各地争斗的失败多数由于斗争孤立发展而无配合的结果”。城市工作当然是职工运动，但在工业不发达的县市中，“手工业工人运动是城市工作的主干”；“若单纯只做工人运动而放弃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贫民等）的工作和士兵运动，也是不正确的工作的路线”。为使城乡斗争配合发展，“一区之中的各乡，一县之中的各区，一省之内的各县或区域的相互之间，必须力求配合适应地发

展”。^{②4}

关于创造新的工作方式。任弼时强调：要“抛弃武力胁迫的方式，而着重‘说服’群众的工作”；同时要加强对日常细微斗争的领导。在城市，要纠正“把罢工暴动看成是工人争斗的目标，而忽视小的能够争取群众的争斗之发动”，在未割据区的农村，要重视农民群众的经常组织工作，通过斗争聚集群众力量，任弼时强调指出：“每次斗争的胜利与失败，不应仅以是否达到部分的经济要求来决定，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有广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这些将决定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得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因为这就可以准备继续的进攻。”^{②5}

三是规划与指导军事工作。如果说八七会议后，党还存在着“军事运动的政策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应的缺点”，广州暴动时“亦没有建立红军的计划”，那么，留守中央已经认识到“军事问题现在占了更重要的位置”，急需要“有一个整个的规划与指导”。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留守）发出了《军事工作大纲》的通告。^{②6}这个重要的军事文件，是以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为基

础由任弼时改写而成的。

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曾决定成立军委（后改称军事部）时，任弼时是三名成员之一，但那时党还没有建立军队，他本人也丝毫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经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党已经有了将近一年的军事斗争历程，任弼时综合大家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工农群众军事化，军事组织工农化，军事行动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和注意战术等原则。《大纲》确定：在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官兵成分“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首先挑选“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士兵“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提高士兵的政治认识和宣传组织能力，以便“在退伍之后，乃至在偶尔失败之时，均能使他们回到乡村中成为群众中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在党和红军的关系方面，《大纲》规定苏维埃军委即为党的军委，是该割据区的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军委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红军的调遣“须服从割据区域苏维埃之命令”；红军中的党组织“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部”，党员人数多的以连为单位建立支部；政治委员“即为党的代表”，由苏维埃委派。红军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

应一律平等”，一切礼节“以表示亲爱与整齐为主”，设立经济委员会，由兵士选举代表参加等。这些规定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接着，临时中央常委会（留守）于六月五日通过了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长信，批准红四军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湘赣两省革命根据地，总方针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红四军“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做“改造与整顿工作”。并应由毛泽东、朱德等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为书记；前敌委员会之下设军事委员会，朱为书记。^{②7}这封长信是李维汉起草的，在常委会讨论时，任弼时指出：国民党六军程潜所部如退到赣西南，和朱培德部会合围攻朱毛红军，他们仅占据永新、宁冈、遂川三县还是有危险的。要告诉江西省委着重赣南工作，响应朱毛在赣西的割据。同一天，任弼时草拟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信，指示“要在此时加紧派人到赣南各县工作”，“是为至要”。同时要省委设立专门接头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使前委与省委及中央的联系“永不中断”。^{②8}十六日，毛泽东在宁冈的茅坪写给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说：“（1）

普遍发展六县之党，(2) 发动当地农民暴动，(3) 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 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5) 办军校及党校，(6) 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此时，毛已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任湘赣特委书记，他谦虚地在报告中写道：“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②④}可见《军事工作大纲》和中央给前委及给江西省委的信，已经付诸实施。

国民党打下平津后，各派新军阀开始“裁兵”和肃清内部，这一来，参加“北伐”的各军，不仅原来希望的晋升和领到欠饷成了泡影，而且还有被排挤和淘汰之虞。因而军心动荡加剧，兵变不断发生，在江西的二十七师与朱毛红军作战时大批起义，广东的第五军兵士日益左倾。任弼时起草的《兵运策略》^{③⑤}的通告中指出：目前“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但党内有的同志对士兵运动认识不足，不加分析地认为白军士兵“完全是离开生产的流民分子”，他们参加红军只有“消极作用”。通告对敌军士兵的社会地位作了详细分析，指出新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占大多数的”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湘鄂粤的军阀部队中，还有曾经受过工会农会训练的工农群众入伍当兵的，他们“更富于革命情绪”，只

要我们能判别对象，派同志进去发展，非常容易收效。至于“兵油”（即老兵），他们有战斗经验，得新兵的信仰，是连排中的“中心力量”，“若能启发他们阶级觉悟，很容易取得新兵群众”，是发展士兵工作“非常重要之点”。通告告诫：应从积极方面看待士兵工作，要利用敌人征兵、下级军校招生时，多派工农分子进去。

留守中央在五月下旬制定的《军事工作大纲》和七月发出的《兵运策略》、《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通告中所规定的农村游击队建设的分散性、普遍性、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等，反映了任弼时和留守中央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思想，它和七月九日“六大”给国内的指示电中“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加紧组织红军”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反映了全党对军事运动认识的新水平。

四是发展工人运动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八年初，上海工人经济斗争兴起，但此时赤色工会组织微弱，黄色工会则大肆活动，以改良主义麻痹工人，其结果，正如任弼时在给江西省委信中所说：“黄色工会并不因为我们的反对、打倒而受任何影响。事实上工人群众因为得不到出路，反而一天一天接受黄色工会的欺骗而受其影响”^③，赤色工会逐步脱离广大群众。鉴于上海的教训，任弼时在《城

市乡村工作指南》中，对黄色工会作了分析，划分了四种类型：一是“由工人自动起来为保障自己经济利益而组织成的工会”，他们虽然“脱离政治斗争”，但“站在工人地位求工人生活的改善并防止资本的进攻；不是绝对放弃阶级斗争的方式”；二是国民党御用的工会，其领袖虽是国民党指定的，但他们“相当地站在工人利益上来调停劳资的纠纷”，并且有“相当的群众”；三是没有群众的御用工会，四是“对 CP 非常仇恨”的“贵族工人领导下的法西斯式的工会组织”。任弼时指出：对于一、二、四类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应按其性质与内容的差别，而切实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工会的群众”；对于完全没有群众而极反动的工会，要“在工人群众中揭破其黑幕，防止它的影响在工人中发展”，对“非常仇恨”共产党的广东机器工会，则应“根本破坏其组织”。工人统一战线有“上层机关接洽与下层群众联络两种方式”，下层的联络与宣传应“单独经常进行”，只有在斗争紧张时或斗争爆发之前，对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可进行上层谈判，如同意争斗的条件，“便可与之作一致的斗争。如果被其拒绝，或在一致行动中他们的领袖由表现畏惧退后时，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③②}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我认为中央（留守）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可惜‘六大’职工运动决议说，‘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而‘六大’后新中央对‘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则正式予以批判和否定，自此以后，我们的职工运动长期遵循着赤色国际‘左’倾路线，跳不出来。”^③

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后补委员十三人。任弼时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瞿秋白、周恩来等继续留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和后补委员李立三先期回国。

八月二十九日，任弼时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会议。李立三传达“六大”精神，并宣布新的政治局的决定：先派四人回国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留守中央继续工作。九月二日的常委会议上，李维汉、任弼时建议：新的中央已有三人回国，应马上主持工作。六日，李维汉代表留守中央汇报了工作。出席会议的有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任弼时和李子芬。四个多月来，留守的同志很好地完成了中央委托的重任，其间除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省与中央（留守）失去联系外，各地的工运、农运、兵运和

党组织的整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上海，在纪念“五卅”三周年和“济南惨案”一周月时，先后发动了有数千工人、学生参加的示威。六月底，李富春向中央（留守）汇报时说：“上海工运零零碎碎，改造组织未找到出路，反帝工作至今操在国民党手里。一个半月之后，他说：上海现有三十四四个工会，可组织五六万工人，在某种政治口号下，可影响十万工人。出现了“四一二”以来的新气象，李维汉当时称赞上海工作是“全国首屈一指”。广州、安源、天津、济南、淄博、豫南、汕头、佛山、海口、镇江、苏州等城市中，工人经济斗争都陆续开展起来。所以，十月五日，毛泽东为湘赣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写道：“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③4}

九月九日，李立三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肯定留守中央几个月来“工作上的路线是很正确的，策略上一面反帝及发动群众是对的，但对资产阶级的估量的确是一个偏向”。他又说：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投降”到豪绅阶级方面去了，政治上必然是更反动，它

必然要利用民众运动欺骗，今后宣传上要坚决指出资产阶级的作用是反革命的，要不断给以打击。他进一步批评留守中央“对资产阶级没有正确的估量，或许还是动摇的”，特别是第五十四号通告（《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提出反帝运动中要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这“无异是承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至于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召开国民会议，他说，在“策略上是根本错误的”。^⑤

李立三的批评，一方面反映了“六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估量上“公式化”和“定型化”的缺点，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⑥同时，他把第五十四号通告中策略上的灵活性看成是政治上的“动摇”。通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对日军的暴行强烈不满，北京学生宣布罢课一天，南京各团体和上海学联等纷纷集会。这时，蒋介石权衡得失，不惜对日方忍辱退让，绕开济南，继续向奉系军阀占据的北京进军；与此同时，下命钳制民众运动，本来，这是党组织发动群众反帝反蒋的极好时机，但令人焦急的是各地党组织对反日运动意见不一，有的主张“大干”，趁机暴动；有的要蛮干，采取烧杀政策；还有的认为此时反日是帮助了蒋介石

石，主张消极冷视。加以在客观上，各地城市的党组织破坏殆尽，不可能公开的“独立的领导群众作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即使是“比较有斗争经验的上海党部，竟表现没有能力发动工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弼时不安地写道：“全国各地的反日运动，几乎完全是一种国民党领导的上层机关活动，看不出本党领导的群众斗争。”^{③⑦}六月八日，中央（留守）讨论，认为大干、蛮干是盲动主义的继续，消极冷视，放弃领导是政治上的失责和对民族利益的背叛，明智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参加，在斗争中提出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对日军退让，不顾民族利益的政治面目，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③⑧}把反帝斗争与发展工农运动，整顿改造党组织等工作结合起来，并适应各阶层民众对蒋介石“以党治国”、钳制民众运动的强烈不满情绪，把斗争由恢复民权运动引向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因此，五十四号通告提出恢复民权运动，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反对御用包办的国民会议等十七项要求，并且指出“这些要求自然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而是“用以发动群众的口号”和“复兴城市运动的策略”。所以，当李立三批评之后，任弼时一再申述：“此时如用直线的方式来发动群众，一定是很困难的，因此要用比较曲线的方法，先把群众发动起来，然后提出反国民党的

口号”。这样做“更易于发动群众的”。向忠发在会议结论时说：对资产阶级的估量如以为尚有革命性是不正确的，不要忽视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作用。^{③⑨}

留守工作结束后，中央派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工作。九月十八日，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任弼时便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

和任弼时同行的是安徽省出席“六大”的代表龚德元。他是铜匠出身，从莫斯科回来经过上海时，任弼时曾去鹿鸣旅社看访过他，和他相约同行。上船以后，任弼时向他打问一个地址：芜湖河南西街王源兴茶馆。龚德元说：“这就是我的家。”原来龚的家是省临委的交通处。任弼时高兴地说：“好，这样我就不烦神了！”^{④⑩}

十九日晚，到芜湖后，龚德元安排任弼时住在四明公所附近的芜湖饭店。第二天，便找到了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和委员王教。

任弼时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大”精神，二是处理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大革命失败后，安徽省委遭到破坏，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央派巡视员尹宽恢复临时省委，但是全省党的组织破坏严重，工农力量微弱，党员多是知识分子。蒋介石的势力入皖后，与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军阀联合统治下，全省几乎

“无一块净土”，本来这是发展工农革命力量的好机会，但是，以尹宽为首的省临委没有深入群众，“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经费使用又不合理，不但反日斗争开展不起来，日常工作缺乏指导，连临委机关也没有认真建立起来。而当下级组织对临委不满时，尹宽又以惩办手段压制民主。七月底，尹宽到上海向中央（留守）汇报工作时，任弼时告诫他，要将党的基础转到工农方面来，特别是发展农运、兵运，组织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以文化团体作掩护深入开展工作。九月六日，省临委来人向中央要求派干部，而尹宽则来信要求辞职，秘书长请求离职养病，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乘机煽动市委内部和省临委中的一些人，以经费开支不清为借口，酿成反对省临委的风潮，一时全省工作陷于停顿，政治局这才派任弼时赴皖处理。

二十二日，任弼时召集省临委同志开会，会议在芜湖东门外的“出世庵”举行，先由龚德元和任弼时分别介绍和传达“六大”的精神，听取省委的工作报告，二十三日参加芜湖市委会议。会后，又找有关同志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批评了省临委的工作，调整了人选，对带头煽动反对省临委风潮的芜湖市委书记朱世衡，维持省临委原有的决定，给以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参与闹事的王步文省临委委员资格。在此基础上，召开芜湖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任弼时

公开批评省临委的缺点，以巡视员名义提出正式警告，并遵照“六大”决议精神，宣布芜湖市委的工作由省临委直接领导，取消芜湖市委，改组省临委。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扩大会议前，调安庆书记吴芳同志加入省委工作”。二十八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处理情况，请求批准，并说“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大概要在十一月十号左右方能开会，我大概尚须留此三四天，方能出发巡视各地工作”。^⑪

十月五日，中央函复，对处理情况“中央均同意，并望早日将巡视工作做好回中央。”不料在这期间，省临委秘书处、团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临委秘书长被捕，临委机关不得不转移，任弼时决定离开芜湖巡视南陵县工作。

十月十三日，从芜湖到石碇镇的道上，小毛驴驮着两个青年人，一个是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化名徐厚昌），另一位是任弼时，他头戴礼帽，身穿咖啡色夹袍，化装成商人模样，改名胡少甫，因剃掉了胡须，显得更年轻了。当时，从芜湖到南陵县不通汽车，只有到石碇镇才能搭上漳河的夜航船，由水路到南陵。十月十四日黎明到达南陵县城。

南陵县有党团员二十多人，当地商人对抗捐斗争要求甚切。但七月间，因通信泄密，县委书记被捕入狱，组织遭破坏，不少人叛变失节。任弼时住在城

关的南美旅社。为了了解党团组织情况，他决定第二天（十五日）参加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会议地点在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香油寺北倚城墙，南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两桥通向寺庙，附近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名小乔墓。下午三时左右，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领着任弼时和林植夫来到小乔墓，这时接到通知的党团员陆续来到。不料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县党部发觉，县党部组织干事叛徒胡学礼，训练干事叛徒刘必昌和工会主任许锦章已在暗中盯梢，南陵县自卫队则埋伏在通往香油寺的金桥、银桥附近。当任弼时发觉情况不妙准备散开时，敌人已经拥上前来，当场逮捕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等四人。王德芳因不在场，没有被逮捕。当晚他赶到芜湖向党组织报告。十六日，他在芜湖也被捕了。

十六日晚，南陵县法院会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主审人是县长王粹民，县党部常委牧文农和刘必昌、胡学礼等叛徒一起参加陪审。王德辉、刘显宗承认了共青团员身份，幸好他们不认识任弼时，更不明他的身份；林植夫化名徐厚昌，虽然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没有供出任弼时。最后审问任弼时，他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你叫什么名字？”

“胡少甫。”

“哪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到南陵来做什么？”

“来催收帐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任弼时胸有成竹，对答如流。

敌人搜走了任弼时的八十元现金，别的一无所获。但不肯轻信，于是动了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份。通过刑讯，任弼时知道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其他证据。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任弼时等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⑫

在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同乡彭佑亭，他是当年长郡中学的工友，此时改作贩丝线的买卖。趁法警不备，任弼时托彭佑亭捎信给在长沙第一纱厂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

到安庆后，任弼时被羁押在饮马塘特种刑事法庭的看守所。看守所有“知”、“过”、“必”、“改”四个囚押犯人的号子，任弼时被关在囚禁政治犯的“知”字号房。

这时，在上海的陈琮英接到任理卿的电报后，立

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营救。长沙的伟伦纸庄是陈琮英的堂兄陈岳云经营的。陈琮英便以纸庄东家的身份延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奔走营救。何维道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出庭辩护。他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份，无罪开释。法庭便派人去长沙对质，将任弼时押回饮马塘看守所。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在国民党的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收买有关的官吏。

与任弼时同时囚押在“知”字号里的，除南陵被捕的同案犯外，还有在芜湖被捕的柳湜和戴映东。柳湜又名柳毅夫，是省临委的秘书，戴映东是芜湖市党的区委书记。任弼时在狱中言行谨慎，很少同政治犯交谈，有时通过帮助难友分析案情，从中给他们以启发。据柳湜回忆，任弼时帮他分析案情时告诫他说：年轻人有个缺点，就是急躁，总想马上冲出监狱。能冲出去自然好，但明明没有这样的条件，就要准备坐牢，利用坐牢时间学习。他不同意有些人由于受急躁情绪支配，在审讯时发脾气，骂国民党，这于事无补。“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戴映东回忆：在弼时同志的启

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在柳湜等同志领导下，成立两个学习组，一是工农分子学文化，一是有文化的同志学政治，使难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⑬

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份时，陈琮英早已作了准备，确认胡少甫是纸庄学徒，向法院出具保证。

一九二八年底，任弼时出狱回到上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在陈琮英奔走营救过程中，患肺炎夭折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向应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八千元。

十二、在中共江苏省委

任弼时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从安庆回到上海时，中共中央正在处理一桩新的党内事件——江苏事件。

这时，江苏省党的组织正在恢复和发展，全省有淞浦、南通、扬州、淮盐和徐州五个特委，三十七个县委，和五个特别支部，共有共产党员二万零二十二人。上海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工作居全国领导地位，所以上海市和市郊十二个县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济南惨案”后，通过反日运动，上海党的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一九二八年，工人发动的大小经济斗争共一百零九起，其中罢工十六次。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这种斗争“浪花”正如“六大”决议所说，仅仅是“新的革命高潮的薄弱象征”，从总体上说，力量还是很微弱的，拥有八十万工人的上海市，只有党员一千三百多人。中共中央为了要“准备群众到新的

革命高潮”，认为江苏省委力量薄弱，工作抓不住中心，“还没见很大成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时，由中央直接领导行动委员会。罢工结束后，行委和省委合并，政治局又派周恩来、李维汉、康生等组成委员会巡视上海工作。不久，周恩来离沪去解决顺直问题，向忠发和李立三主张由中共中央直接兼江苏省委。这个方案提出后，政治局内部意见不一，原在江苏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项英、候补委员徐锡根等都不同意。一九二九年一月中，处理顺直问题归来的周恩来也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做将妨碍中央的政治指导；事事过问省委的工作，会影响中央对全局的领导。为了掌握实际斗争经验，他主张从中央机关或从外地抽调得力干部，充实上海各区委，改造江苏省委。于是政治局决定由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和项英组成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在中共中央尚未作出决定时，徐锡根从派别立场出发，认为这是中央侵犯地方的权力，此事应交江苏全党来讨论，竟然在党内以至各省来上海的负责人中，散布“中央兼省委的办法是别有用意，是派别问题，江苏党部将打倒某人拥护某人，将联合各省以反对中央等等”。^①十四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不兼省委，对江苏省委徐锡根等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应予严肃批评。二十四日，又决定改组中共江苏省委，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

登贤为省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为省委常委，主管农民运动兼宣传工作，李维汉、康生主管组织工作，原江苏省委常委徐锡根主管职工运动。新班子中还缺少专门管宣传工作的人选，不久，中央又派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三月二十八日，任弼时开始出席省委常委会议。

这时，省委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是蒋介石打下平津后，企图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所谓“训政”，对工农群众，一面标榜“劳资合作”，“增加生产”，“二五减租”等，以改良主义的手法麻痹群众，一面借口“整理”，派人控制民众团体。三月二十七日，蒋桂两系新军阀战争在长江中游爆发后，作为蒋介石的后方的上海，形势更为严峻：查封赤色工会，严禁工人罢工，甚至屠杀工人领袖。在黄色欺骗和白色恐怖交织下，有不少共产党员看不到阶级的力量和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有的还没有完全摆脱“四一二”大屠杀后遗留的惊惶灰心的心态，而“取消派”则散布：中国已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健全发展的“新纪元”的谬论，幻想走合法运动的道路。因此，中共中央指出，要以极大的努力，艰苦耐心地“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与威信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

运用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创造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②

四月初，省委书记罗登贤因病住院，八日，李维汉在常委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为省委代理书记。任弼时因为自己刚到职，情况不如李维汉熟悉，所以恳切推辞，建议由李维汉代理书记。常委会议接受了任弼时的意见，但决定将罗登贤分工主管的省军委和联系沪西区的工作交任弼时接替。这期间，任弼时为省委起草了两个文件：《江苏省委反军阀战争支部讨论大纲》和《江苏省委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四一二”纪念工作）》。要求党员通过讨论，将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事例，如兵工厂、铁路的工人增加工时，军阀部队强拉民伕，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等，和新军阀战争联系起来，认识战争的反动性；同时，设法慰问“四一二”被难烈士家属，揭露蒋介石屠杀工农的残酷性和采用改良手段的欺骗性，号召党员起来反对新军阀战争，反对蒋政权。

任弼时主持省委宣传工作后，首要任务是深入宣传“六大”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指导群众斗争。在省委的领导下，他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出版报纸和刊物。四月十七日，省委宣传部在中央宣传部的指导下，创办了《白话日报》（后

改名为《上海报》)。这是一张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报纸，它以生动的形式报道各地工农的斗争，登载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改组派的种种阴谋，介绍苏联的新面貌，不仅向读者传达党的声音，而且直接推动工人的斗争。比如，当国民党派上海第六区党部常委王昌源去控制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时，报纸接二连三地揭露王昌源的丑闻劣迹，激起工人的公愤，终于把他赶走；邮务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报纸又揭露工贼沈天生、陆京士等出卖工人利益的黑幕，把黄色工会的群众争取过来，南京当局交通部的代表竟吓得不敢下来调查。这一来，报纸的销路打开了，经常的订户达二千份左右。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时，报纸加印八千份，不到五个小时，被抢购一空，工人们称它为斗争中的“一支先锋队”。

实际负责报纸主编的是李求实，武汉时期，他是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编辑部在全市工人中建立了近百人的通讯网，每个区设一名特派员，从采访、编辑、印刷到发行，工作都是在极险恶的环境中进行。《白话日报》公开问世后，当天，编辑部便遭到租界当局的查究，封了信箱，于是便改名为《上海报》，秘密出版。但不到半个月，又被查封，主笔、经理被“通缉”，职员被捕，承印的印刷局老板也被逮

捕，没收了全部财产，就连报贩也遭租界当局监禁、罚款和殴打，人数在八十以上。之后，报纸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发行，采取和敌人“捉迷藏”的办法，不断更改名称：《天声》（出了二天），《晨光》（出了三天），《沪江日报》（出版两月余），秘密出版，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发行到工人手中，十一月，恢复《上海报》的名称，一直出版到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四日被迫停刊，共发行三百八十五期。

六月十二日，省委宣传部又出版了《教育周刊》（实际上是月刊），这是党内教育的通俗刊物，发行到支部，主要内容是指导当前工作，介绍斗争经验。同时，还编印了《每日新闻》，供省委机关的同志阅读。

这三种报刊，内容密切结合当前斗争，对象互有分工，发行方式实行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在宣传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宣传部还指导上海各区和有关团体举办小报和刊物，如沪西区的《无产阶级》，沪东区的《沪东工人》，闸北区的《沪北工人》，沪中区的《党的生活》、《伙伴》，工联会的《工人之路》和反帝大同盟的《反帝三日刊》等。

第二，组织宣传队。工人斗争开始复兴后，每逢纪念日，如“五一”、“五三”、“五四”、“五九”等，省委都按中央指示布置各区组织大小不等的飞行集会和群众示威，“五卅”四周年纪念和“八一国际赤

色日”，工人队伍集中南京路，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每次行动之前，宣传部都要准备标语、口号和传单，组织和训练宣传队，扩大《上海报》的发行量，散发宣传品。这些宣传品，对揭露蒋政权的反动本质，唤起群众的革命激情是有很大作用的，但由于斗争的方式是“左”的，所以付出的代价很大。后来，任弼时总结了经验，明确日常的宣传工作主要抓三项：一是做好宣传组织工作；二是建立党支部的宣传业务；三是办好工厂、团体的报刊。

第三，教育和训练党的基层干部。随着斗争的发展，上海的党组织涌进了一批新党员，为了培养他们成为基层干部，八月中，省委常委会决定举办训练班，计划在三个月内训练三百名；在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三人委员会，由任弼时代表省委具体指导。训练的方式有固定的和流动的两种。固定的训练班的课程包括党的建设，职工运动，支部工作，厂内活动方法和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教学方法上，强调要“肃清”讲演式灌输的老办法，采用通过学员思考、讨论、质疑等方式，“启发每一个受训练的同志的自动性”。流动训练班由各区党委负责，派人个别地向不识字的同志讲解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这项工作是比较扎实而细致的。

省委宣传部满共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任弼时除了主管宣传部的工作外，还分工直接联系沪中区的工作。每天上午，他按省委的规定，到北四川路底的省委秘密机关去“接头”，然后和区委联系，具体指导斗争。每当大的斗争来临，他组织编写宣传品，训练宣传干部，部署宣传工作，工作繁忙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六月底，任弼时出席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江苏省委向会议报告了工作，着重介绍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汇合起来，走到公开的政治斗争，在组织上把秘密的党组织和公开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利用公开的名义组织斗争力量的做法。二中全会肯定了上海的经验，在《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在现在国民党残酷压迫而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的客观条件之下，党的策略的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同时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亲密的联系起来”。^③七月，任弼时在《教育周刊》上发表了《争公开机会的意义与教训》一文，文章写道：

“一个秘密的革命政党，想要在群众中树立他的政治领导作用，必须使他的政治主张能够深入广大群众中去。

但是在白色恐怖严厉压迫之下，完全没有集会言论出版自由，单靠支部的路线去推销党的宣传品，和发动部分斗争来扩大政治影响，显然是不够的，尤其在群众日益革命的时候，狭隘的秘密路线，必定赶不上群众的需要，尤其是很困难的调动指挥广大群众的行动。

因此秘密的党必须善于运用公开或半公开机会，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号召群众起来行动，只有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强固党在群众中的作用。”

文章回顾了上海群众在纪念“五一”、“五卅”时，利用公开路线，冲破敌人的戒备，发动群众示威的事实后，指出：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公开活动并非即是合法运动，现在一切合法组织与行动，都须先得国民党许可，这样方式当然不会收得我们需要的效果，并且是不正确的办法。

这就是说，我们要用群众力量来争得非合法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机会来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取消我们主张去求得公开。同时也不是机械地提出党的口号，而是要注意使党的口号内容能够与实际情形联系起来。这样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能深入群众而不致吓退群众。”^④

二中全会后，江苏省委在指导上海的工作是有所进展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健全下层组织，把工作推向深入；二是建立公开的群众组织，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推动工作。

当时，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无法公开活动，国民党的“工会整理委员会”控制了六十多个工会。六月十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将纱厂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各行业的工会和各区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建立党团，指导群众斗争；为了争取公开活动，组织路线上可以和黄色工会的群众联合，但绝不对其领袖存幻想。十七日，省委讨论“工联会”的工作大纲时，任弼时说：“工联会”应争取在下层群众中公开活动。总工会太红的人，不要坐在上层机关，应深入到“工联会”去工作，密切联系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的群众，指导下层工作。共青团要发动青年组织如学徒工、童子团等辅助组织等，加入赤色工会。^⑤十八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省委决定，工联会的党团由任弼时负责联系。

“工联会”成立后，基层工作进一步活跃起来，在斗争中互相支持配合，如上海二百五十家估衣店的一千六百余职工，为改善待遇，抵制国民党的“工整会”控制工会，联合罢工坚持了三个月；七月，虹口

区二十家丝厂女工一万一千余人，为要求增加米贴举行同盟罢工；十月，南洋烟厂七百多工人，为反对国民党通缉工人中所谓“反动嫌疑”分子举行罢工。端午节前后，任弼时直接联系的沪中区，丝绸业、药业、纸业职工罢工、怠工此起彼伏，和过去相比，经济斗争的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内容。虽然发动的对象还限于店员和手工业工人，但工作大纲中明确规定：“工联会的基础，必要建筑在重工业的群众上面，才能巩固他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中的领导作用”。^⑥

与“工联会”同时建立的另一个群众性组织是“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

这个组织，是在“五三惨案”后我国留日学生组建的“反日大同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日大同盟”本部受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上海的分会受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对外以反日团体名义向当局登记。为了利用它的公开合法地位，江苏省委决定将反日大同盟的上海分会和“思想社”（“创造社”的部分人员组成）、“新滇社”、大夏、光华和上海艺术大学的进步组织联合起来，扩大斗争范围，并且和“工联会”、共青团密切协作，组成“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⑦六月二十三日，在纪念“沙基事件”^⑧的群众集会上宣布成立。

任弼时为省委草拟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大纲》里规定：

“反帝大同盟应成为有群众基础的团体。团体或个人都有加入的资格，不管这些组织是赤色的或黄色的，不管他哪一政派，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都许其加入，但不是降低政治口号。”

七月三日下午，由十六个群众团体代表组成的反帝大同盟执委会召开首次会议，任弼时出席指导，会议通过了《宣言》，研究了执委会的分工和行动计划。^⑨

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是一个群众性的总的组织，下面有许多分盟，如工人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大同盟，台湾反帝大同盟，东方反帝大同盟（由朝鲜、越南等旅华侨民组成），在大学里也有分盟组织，是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革命团体。执委会下设总务、宣传、组织、纠察、救济等部门，创办了《反帝三日报》，大同盟的机关设在公共租界大沽路的一个弄堂里，后来迁到新闸路斯文里。

有了“工联会”和反帝大同盟，使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密切和群众的联系，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在组织上有了依托。

反帝大同盟成立不久，“中东路事件”发生了。

中东铁路是我国黑龙江境内东起绥芬河，西至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主要交通线，它在长春和南满铁路接轨。中东路是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和赤塔之间取道中国的捷径，由沙皇俄国和中国的清政府合资于一九〇三年修建的。十月革命后，据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由中方出资买回苏方的股权，在买回以前，由中俄双方共管。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蒋介石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封闭沿线苏方的商务贸易机关，遣送苏方高级职员回国。十八日，中苏两国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接着在中苏边境发生军事摩擦。蒋介石竭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浪潮。

共产国际过分严重地估计了中东路事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号召各国共产党和世界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世界大战，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规定八月一日为“国际赤色日”举行“总示威”，青年共产国际也号召全世界劳动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定九月一日为活动日。这就助长了中共中央“左”的思想和行动。群众对保卫苏联等错误的口号很难接受，而中央在布置“总示威”时，还要求在八一行动之前应尽可能地号召群众起来，作抗议中东路事件的行动。

这样，省常委会决定，由任弼时起草八一国际

反大战示威的宣言，大示威的准备工作归口到能公开活动的上海各界反帝大同盟，“工联会”、共青团及其所属团体应尽量发动群众，将工作纳入反帝示威系统。^⑩新成立的上海反帝大同盟便在任弼时指导下出面组织活动，在八月一日之前举行了两次预演式的冒险行动。

第一次是七月十四日，四百多有组织的群众，在沪西小沙渡路的工人区举行露天集会。上午十时，几声鞭炮的巨响后，群众闪电式地聚集一起，立即宣布开会，推举主席团，报告中东路事件，通过八一大示威宣言，接着开始游行，连同临时加入的群众在内，队伍约有两千多人。租界的普陀巡捕房，立即出动巡捕和马队，驱散游行队伍，追捕群众，当场被捕六七十人，其中包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⑪

第二天，周恩来出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任弼时在汇报中说：这次行动对沪西工人有一定影响，同时批评共青团在游行时打了一辆无轨电车的盲动行为。在这次会议上，省委根据中央决定，成立八一示威行动委员会，行委的主席团由周恩来、项英、罗登贤三人组成，罗为书记。省委各部照常工作，日常的经济斗争均应发展到政治斗争。^⑫

第二次行动是七月二十六日。因为得知国民党将于二十九日举行反俄大会，反帝大同盟便以反对

进攻苏联为中心口号，布置各区和各工厂举行飞行集会，以示对抗。

经过两次演习，八月一日那天，上海万余群众冲破中外反动派的戒备封锁，集中到南京路、福州路、外白渡桥、四川路邮局门前和天潼路等闹市区，示威行动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这是“四一二”以后，上海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在这次示威中，省委宣传部发动反帝大同盟、“工联会”、青年团和各区委，共组织宣传队一百多个，队员五百五十多人，印制的宣传品二三十种，总数达一百三十万份。宣传队员们深入到各工厂门口、公共车辆、游乐场所和市郊农村，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势极为浩大。^⑩周恩来在总结时说：“在这时，敌人一切的统治威严扫地，黑暗的地域顿成了革命的世界”，“论影响所及，不能只看到当天参加示威的万余群众，而应估计到一切受影响的群众；甚至动摇的巡捕警察，旁观的店伙小贩”。^⑪

这样的冒险行动，一直持续到九月一日世界劳动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活动日，这次活动因悼念彭湃等四烈士而增加了群众对反动派的仇恨情绪。

由于“八一”大示威后，反动派加紧搜捕共产党人。二十四日，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江苏省军委委员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五人因叛徒告密

被捕，三十日，彭、杨、邢、颜四人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这就给青年反帝大同盟主持的九一游行，频添了对反动派的仇恨情绪。游行队伍从福建路、南京路到福州路，不但打了两辆电车，还毁烧了《时事新报》馆的招牌。九月二日，在省委全体常委会议上，任弼时在报告情况时，再次批评了共青团干部的拼命行动。他说：政治示威主要是显示群众的力量，要坚决反对盲动行为。现场总指挥要负主要责任。鉴于五卅纪念以来，政治示威接连不断，群众过分疲劳，被逮捕的人数增多，党团组织之间彼此指责，任弼时说：“九五、九七当然不能再搞集中示威啦！”抗议反动派杀害彭湃烈士等和反对白色恐怖的活动，可以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进行。^⑮对于党组织批评共青团“盲动主义”和共青团指责有些党组织“消极怠工”等，任弼时在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共青团组织斗争是积极的，有缺点和错误，不应该掩盖，盲动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我们要始终以教育的态度说话。共青团不应骄傲，也不要因批评而灰心丧气。^⑯

五十七年后，李维汉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一方面说明，江苏和上海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激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仍然保持着革命热情，经过省委的发动，敢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斗

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省委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着‘左’的错误，把‘六大’提出的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公开的路线简单地理解为以公开的政治口号，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罢工、示威、游行”，以致付出较大的代价。^{①⑦}

八月中，根据中央决定，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上作了调整：康生、罗登贤先后调中央分配工作，李富春、陈云和顾作霖补为省委委员，李富春主管组织部和省军委，陈云主管农委，分别接替彭湃的工作，顾作霖负责共青团省委兼省军委委员。省委书记一职，暂由任弼时代理，并分工联系沪东区、淞浦特委和济难会的工作。^{①⑧}

这时，国民党当局准备召开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大会。上海公开的学生组织，多半掌握在政治上和蒋介石有矛盾的改组派手里，所以蒋介石企图通过“学生运动整理委员会”从改组派手里夺取领导权，预定九月一日在南京召开全国学生总会代表大会，这自然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中共中央估计，我们不可能在大会上造成一个赤色的学生会，但应该参加大会，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省委常委会在讨论《关于接受中央对学生运动与全国学生总会的通告》时，团省委主张，既然我们不可能取

得整个学生，策略上应放在争取贫苦学生方面。任弼时指出：学代会是蒋介石与改组派争夺学生群众的把戏，代表的产生多半由“学整会”包办，但我们要设法参加大会，竞选代表，提出提案，广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任弼时还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要求民主的思想非常浓厚，除了极少数官僚的子弟外，一般富有家庭的学生，也都有争民主的要求，如果工作限于贫苦学生，不但标准很难确立，而且会走向分裂路线，所以应当立足于争取大多数学生群众，不然会妨害争取整个学生的任务。^{①9}

由于城市斗争频繁，省委对农村的斗争只限于一般的接头。“八一”大示威结束后，省委着手布置农村的秋收斗争。这时，江苏省共有六个特委，除原来的五个特委外，新建了沪宁特委。任弼时分工指导中共淞浦特委工作。淞浦特委包括：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太仓、宝山、上海、崇明等县。如果说，在运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复兴城市工人斗争中，任弼时还没有摆脱“左”的倾向，那么在部署农村秋收斗争时，他对防止盲动主义残余是非常警惕的。这时，江苏农村许多地方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苏维埃运动的基础很薄弱，大刀会等武装组织虽拥有三十九万会员，但大多没有掌握在农民手中，而国民党在农村，却搞了一些改良措施，如：

办农民银行、贫民借款所，标榜“主佃合作”，“乡村自治”，个别地方实行“二五减租”等等，有很大的欺骗性。发动秋收斗争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抓住广大农民的要求，提出切合实际的斗争口号，特别是要不要普遍地号召农民发动游击战争。二是如何理解和执行共产国际提出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

八月五日，省委讨论农村秋收斗争的通告时，有同志认为今年秋收斗争要扩大到游击战争阶段。任弼时认为：（一）在目前形势下，农村斗争容易走向武装冲突，党应该积极准备群众和武装力量。但是，笼统地提出要扩大到游击战争阶段，可能使下面产生每斗必采取武装冲突的错觉。他主张马上派人巡视，发动党支部讨论，抓住群众最中心的要求，提出斗争口号。（二）过去农村盲动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农民攻打县城，目前江苏农村还没有夺取一县数县成立县政权的条件；秋收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和扩大组织，发动群众为土地斗争。（三）农村武装一定要掌握在农民手里，大刀会等武装组织，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的，要转移到农民手里来，成为真正的农民武装。游击战争起来后，在敌人力量薄弱时，一定要号召农民消灭它，如敌人力量强大，不应采取拼命主义的机械抵抗，要讲究策略，保存力量，开展经常斗争。^{②①}

对于富农，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因此，党应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贫民起来“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②①}这个意见显然是“左”的，因为它从斗争的对象和斗争的策略上，对待地主和富农没有区别；在苏维埃区域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富农的政策也没有区别，目的是加快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速度”。在党内讨论时，从莫斯科回国不久而又毫无实际经验的王明，从社会主义革命立场出发，认为对富农剥削，既要反对其封建性，又要反对其资本主义性；省委内部也有人认为：苏南地区的富农，有的虽然向地主租地雇人耕种，其性质仍然是地主剥削。任弼时指出：“六大”决议肯定中国目前是民权革命，我们在乡村中一切斗争，内容主要是反对封建剥削。但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农村，富农具有半地主性质，在土地革命中，政治上势必站在地主方面，从这个意义上，反对富农原则上可以确立，但是，中国农村阶级关系非常复杂，雇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当然包含反对雇佣劳动的意义在内，目前，我们主要是反对富农的封建剥削，而不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出发的。这一点应着重地告诉同志。^{②②}很显然，任弼时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左”的

策略是持有保留意见的。

当时在浦东一带做农村工作的刘晓，曾经这样写道：

“有一次，我们在浦东农民武装斗争失败以后，为着反对敌人镇压，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而来到上海，向省委请示时的情形：当时上海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们与省委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政治交通传达制度，我们的意见都已经经过交通传达给弼时同志了。但有一天他忽然来到了我所住的旅馆。我向他提出意见，说他到这里来是很危险的。他却很冷静地回答我说：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对工作是要负责的，不然也许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我听了他的话后，几乎感动得流泪。当时我认为他来了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决定，但出乎我的意外，他却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我答复。我说浦东的农民群众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极高，要求武装反抗，弼时同志就问：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具体事实？要我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典型说明。他又问了不少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复地提出了许多假定的问题来和我研究。最后他说：决定行动，还要与当地群众商量。因此他又要我邀约了与我同来的当地农民同志亲自与他谈话，

了解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等。谈完了，他一声不响地走了，只是说要我们很快地回去。就在当天深夜，他又到我的旅馆来了。这时他和白天谈话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用肯定而带说服性的语调对我说：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是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要取消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就非常具体地分析当时的情况，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理由。从这一个片断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弼时同志对革命事业是如何高度的负责，他的领导作风是如何实事求是，虚心客观，深入细致，面向群众，对党对人民是如何忠诚、勇敢、负责”。^{②3}

《红旗日报》曾经这样写道：“据中国共产党中央估计，一九二九年是中国革命开始复兴的一年”，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说：“一九二九年是中国反动统治全盛和稳定的一年”。^{②4}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估量，表明从这年下半年开始，党内斗争非常剧烈。

八月初，陈独秀写信给中共中央，认为“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根据这样的阶级

估量，他否定“六大”路线的正确性，认为“总的路线”“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⑤在组织上，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结成派别，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总的政治口号”。从莫斯科遣送回国的一些留学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也乘机积极活动，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在基层组织内煽动蛊惑，对党组织发动的群众斗争一概污蔑为“盲动主义兼有机会主义”。因此，政治局指示要和党内的反对派作斗争。

八月二十二日，江苏省委常委联席会议上，任弼时指出：反对派们以为帝国主义给了资产阶级相当的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从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这太轻视了帝国主义的作用。这些论调和首次大战时期社会民主党相类似，应当在党内开展讨论。他们所以能在部分群众中有活动余地，说明我们对“六大”政治路线的教育太浅薄。要联系实际，在党内进行教育。对持有错误观点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九月十二日，任弼时等向江苏常委会报告了彭述之等攻击党中央的言行后，出席会议的党中央主席向忠发说：他们如果不肯转变，不仅客观上帮助了敌人，事实上已经脱离党的立场，

象彭述之那样，已经无法再教育，应当采取组织措施。^{②6}

这之后，周恩来到上海各区找有问题的人谈了话。任弼时和王明谈了话，指出他在对富农政策上的“左”倾观点和非组织的活动。但是，他们中有的人或者避而不见，或者拒不接受意见。反对派活动最猖狂的是沪中区的民国日报馆党支部。十月十五日下午，任弼时出席报馆支部大会，会上，马玉夫、杜仰之等人一派胡说，什么中国封建制度“在鸦片战争时已被冲破”，“地主已经资本化”，中国“应是社会主义革命”，资本家的工厂“非没收不可”，甚至公开宣称“六大”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论断是“卖阶级的”，他们是“和‘六大’对立的另一路线”，^{②7}并且拒不参加当前的斗争。任弼时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后，省委决定：开除反对整个“六大”路线的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②8}

这时，经中央批准江苏省在十月革命节后、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召开党代表大会，政治局常委指出，目前任务是反对托洛茨基和机会主义派，在和反对派斗争中，党必须检查自己的工作，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实行自我批评，不给反对派以借口。党代表大会由李维汉为主筹备，从这时起，省委书记也由李代理。九月十二日，省常委会决定，党代表大会的开

幕日期为十一月十八日，代表人数三十五人，工人成分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二十。并成立了政治、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军事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等八个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李维汉为书记。任弼时为宣传委员会书记，并参加政治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②9}大会的会址在龙华路外日晖桥附近的泉漳中学。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初冬阴雨，寒意袭人。上午，任弼时冒雨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江苏团省委在公共租界的华德路竞业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住着母子两人，母亲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对外的身份是给人带孩子的保姆，四岁的小主人自然就是郭亮的遗孤郭志成。他们是党组织安排看守这个新近建立的共青团省委秘密机关的。

任弼时走进竞业里，没有发现周围有异常的迹象。他这才看准门牌推进石库门去。谁知刚进门，从门后闪出几个暗探，不容分说，将他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据同案的周朴农回忆：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栅栏），地下是阴湿的水泥

地。犯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水泥地上。我进拘留室不久，任弼时同志也被押了进来，我不禁暗暗吃惊。弼时同志冷静、沉着地环顾四周，然后跨过躺着的人，朝我走来。我刚要站起来打招呼，弼时同志即按住我的肩膀，并在我旁边的地上坐下。”^{③0}

周朴农原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秋，八七会议后，团中央从武汉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为了了解“四一二”后上海团组织的情况，周朴农曾经到平安大旅社向任弼时汇报情况。任弼时向他传达了团的“四大”精神。以后，周朴农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捕时，他是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化名周阿康，是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的职员。这天上午，顾作霖通知他到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他住在公平路，离竞业里不远，所以第一个到达团省委秘密机关。不一会，十来个中西巡捕冲进门来，涌上二楼，把周朴农和李灿英母子一起押到英帝国主义的汇山路捕巡房。在他们被捕之后，敌人继续埋伏在团省委机关，这才逮捕了任弼时。尽管任弼时和周朴农是认识的，但是，在敌人的眼皮下，他们不应该相认，所以任弼时按住他的肩膀，暗示他不要说话。

任弼时身上，除了一张电车“派司”外，没有任

何文件材料。他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被误抓进来的。

当任弼时知道周朴农并没有暴露身份，这才对他说：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要装作互不相识，敌人对我们虽有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当晚十时，他们被押解到闵行路巡捕房，后来审问时，周朴农果然按任弼时的关照，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其实，他三年前就离开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是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开设的，店主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朋友，所以后来敌人对质时，内山书店承认周朴农是该店的职员。

周朴农又回忆道：

“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营救任弼时的工作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由中央特科一科具体负责。后来才知道，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捕的原因，是敌人在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

1929 年 11 月任弼时在上海被公共租界汇山路捕房逮捕，化名彭德生，后为中央特科营救。这是捕房的判决书，内有指纹等印记

记、华侨青年张永和（化名张景云）时，从张的西服口袋里抄到一个竞业里的地址，就凭这个线索前去搜捕。因为敌人没有掌握其他的凭据，所以将任弼时当作共产党的嫌疑犯拘捕。据此，特科延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在公审时出庭辩护。

周朴农回忆道：

“十月二十二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北浙江路）开庭审判。我、弼时同志、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审判前，党派了潘震亚等两位律师为我们出庭辩护，并在候审室听取了弼时同志的口供。在法庭上，我们重复了在汇山巡捕房时编造的口供，随后，潘震亚律师出庭辩护。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被问得词穷理亏，宣布休庭。等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判处张永和刑期两月，我和弼时同志刑期各四十天。^{③①}

白纸黑字的敌档，是帝国主义者残害中国革命者的铁证，又表明了周朴农回忆的准确性。以中英两种文字书写的判决书，一页记载了任弼时的“案情”，另一页是任弼时的左右两手十个手指的指纹。案卷写道：

“姓名：彭德生

年龄：25岁，身高5呎6吋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29. 11. 22 判决 40 天
减刑释放 29. 12. 25”^⑳

周朴农回忆在监狱里的情景时写道：

“以后的日子是在上海西牢（提篮桥监狱）度过的。我和弼时同志又被关在一个牢笼。我们除互相交谈身世，家乡风俗习惯以外，更多的是讲革命的未来。……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但弼时同志对我说，我们都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要尽量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㉑

十二月二十五日，当租界里的洋人们正在欢度“圣诞节”的时候，任弼时和周朴农同时离开提篮桥监狱。帝国主义的“人道精神”和西洋文明，给任弼时留下的是背上被电流打击的两块深深的烙印。

至于那位华侨青年张永和，八年后，他到了延

安，在中央党校和周朴农同班学习。世界虽然大，但在革命征途上他们始终能走到一起！

十三、从湖北省委到长江局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股票猛跌，物价暴涨，生产过剩，失业人口激增，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它们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世界革命的新浪潮、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大革命即将到来。十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继关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信件之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几项重大任务，作了补充指示。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指示，任弼时列席了会议，这时，他出狱才十二天。帝国主义的电刑，可以摧残革命者的体肤，以致在他的背上留下了两块深深的伤痕，但是丝毫不足以动摇革命者的意志！

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宗明义就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这种危机，“转变到直接革

命形势的速度”，虽然现在“不能够预言”，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①

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估计“全国的危机与革命的新浪潮”时，是从以下事实出发的：一是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有继续扩大之势。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后，新军阀混战的枪声几乎没有一天停过，蒋介石击败了地方实力派桂系军阀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但是到年底时，阎冯联合各派军阀组成反蒋联合阵线，拥兵七十万，蒋阎冯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新军阀混战期间迅速发展，此时全国已经建立了大小根据地十五块，有红军十万，党员六万五千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城市工人运动正在复兴。因此，中共中央同意在“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紧急口号下，积极为武装暴动准备条件。中共中央虽然“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但对主观力量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不但没有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而且认为“中国党的领导力量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跟不上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黄色

工会的影响还大”；各地的政治示威与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能令人满意”；天津、武汉、奉天等大城市反帝运动的单独组织与经常斗争“都还缺乏”；广大的城市贫民还没有组织起来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力同盟军”，这些都妨碍着党“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发展者、组织者和领导者。”^②

为了准备群众条件，一月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提出要发展赤色工会组织，举行一次工会运动周。任弼时是支持的，他说：组织同盟罢工是群众自己的要求；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工人阶级的主观力量上，组织产业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分会，“客观需要很迫切，在革命复兴的形势中，非常需要”；“工会不能建立，支部不起作用，确是严重的问题”。他并且建议，在工会运动周里，每个党员都应加入工会，再发展一名工人人会。^③

如果说，在二月中以前，中共中央对于“革命新高潮”的理解，还是侧重于准备群众力量，那么，二月底，政治局对《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在“左”倾冒险方面是有所发展的。这个文件是二月十七日政治局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有两个客观方面的因素：一是国际来信中指出：要把广东、福建、湖南和湖北工农军队分散的行动协调起来，党应当“全力鼓动并加紧阶级冲突”，领导群众

暴动，随着冲突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告诫“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和倾向”，而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④二是，二月九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向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⑤因此，二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提出：目前在中国，“某一时期某一问题上，都有可能爆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到来“并非很远”，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不仅是宣传口号，而且是“动员群众的直接口号”。他还认为，在全国暴动中，“江苏是主要的领导力量”，但江苏直接革命要“迟一些”，顺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广东如广州和中路不发展，则“必无胜利前途”，“一省数省暴动，在今天应有坚决决定”，具备胜利条件的“首先就是湖北”。因为湖北城市工作“有很大发展”，“经济恐慌比任何地方都严重”，红军“已有五军，人数近三万，全国最多”，“以平衡发展的革命力量论，湖北的条件最好”，他要

求政治局“目前以湖北为中心布置暴动”。^⑥

政治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对李立三的意见几乎没有原则的分歧。周恩来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他提出：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总的策略既是夺取政权，组织上必然要加强主观力量。因此，他建议：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军委在长江与广东设立办事处，三月中建立长江局，派任弼时去主持工作。^⑦

列席会议的任弼时同样认为：军阀混战，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破产日烈，证明国民党政权有进一步崩溃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湖北暴动应是全国暴动的开始，“党的工作应向这一前途布置”。但他觉得目前“最严重的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问题”，武汉、广州党的组织很弱，铁路、矿工、海员的工作进步也很微弱，“改组派”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中央特别着重”。^⑧

这次会议后，中央在通告中首次提出：“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⑨

会议调整了有关组织，中央组织局原由向忠发、罗登贤、关向应、任弼时四人组成，会议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成立湖北工作委员会，调冯任去中共湖北省委工作，派任弼时即去武汉巡视。

一个星期后，任弼时向政治局报告湖北情况时指出：蒋阎冯战事一起，冯玉祥的部队必向武汉发展，目前蒋的嫡系部队集中在津浦铁路，平汉路为杂色部队，预计蒋阎冯战争中，湖北的战事必然剧烈；党现在湖北的工作，均应有组织暴动的意义。他建议：武汉组织同盟罢工“很有可能”，应立即恢复湖北省总工会，加紧建立各产业工会和各厂分会，加紧纱厂工人、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的工作；成立平汉铁路工会，以对抗黄色工会，开始组织破路工作；建立工人纠察队，加紧武汉三镇的士兵和警察工作，在学生和贫民中，加紧反帝宣传；扩大党的组织，注意组织的严密；在游击区域，应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赤卫队，加紧组织地方暴动等。^⑩会议决定由任弼时起草工作大纲，提交组织局，并交中共湖北省委讨论。

任弼时提出的初步方案，和李立三的设想在策略上是不完全一致的，李立三着重于集中红军力量攻中心城市，他认为蒋阎冯战争一起来，湖北本身也要爆发战争，统治阶级力量削弱，更要坚决暴动，要

“加紧应用更急进的策略”，湖南应加紧铁路、海员、长沙、安源的工作，平浏向鄂南铁路发展，湘西向常德、鄂西发展，江西向南昌发展，赣东北向九江发展，“对朱毛亦应根据这形势有新的指示”，把各地的力量汇合“便是全国总的暴动”。^①而任弼时则强调在武汉三镇发动群众，组织总同盟罢工；与此同时，在割据区域扩大发展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鄂西红军和贺龙的部队向长江下游发展，大冶的红军向长武铁路发展，外县有组织基础的地方，加紧地方暴动，然后汇合各种力量，发展到湖北全省总暴动。正是由于策略上的不同，就导致后来任弼时和李立三之间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回合是在四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上。这时，周恩来已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政治局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为了布置湖北省暴动的工作，立即召开中共湖北省党代表大会。李立三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指出：整个世界革命高潮日益接近，伟大的事变即将到来，如果中国发动大革命，很快会引起欧洲大革命及殖民地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最后决战；中国直接革命一天天接近，马上就有武装暴动的可能；中国革命有无产阶级领导，有苏维埃，革命胜利之后，吓跑资产阶级，没收工厂，组织生产，可以马上转变到社会主义等等。任弼时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不同意“最后决战”之说。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但是不一定必然会引起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不赞成决议中写的“中国革命胜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后决斗”。第二，不同意革命立即转变论。“如果说一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对于发动广大群众是不利的形势”，“我们自然不是说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的革命”，新的“政权自然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是以政权对付反抗的力量”，而是说“在革命胜利后，要更加充实阶级转变的力量，增加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增加雇农的力量。”第三，不赞成说革命高潮就是直接革命形势。“革命高潮不能就说是直接革命形势。例如，五卅时，是革命高潮，但在江苏并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第四，对湖北的分析太简单。李立三不以为然，坚持说，中国革命可以引起世界革命最后的决战，可以这样写，决议草案多加一点分析，“先付印”。会议决定任弼时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⑫

争论的第二个回合是在中共湖北省第四次党代大会上。党代大会于四月十五日在上海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二十二人，除湖北省的代表十六人外，还包括红军代表、湖南、江西、河南以及海员、铁路工人的代表六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李立三布置以武汉

为中心发动全国总暴动的动员会。会议一开始，李立三作了长篇的政治报告，他预计到实现他的主张，“必遇到许多右倾的障碍”，所以在报告中反复地强调了六个“坚决”，即坚决地组织政治的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就是武装暴动的前夜；坚决地组织赤色先锋队；坚决地组织地方暴动；坚决地组织兵变；红军应坚决地采取进攻的形势；坚决地反对红军在战略上的右倾观念——保守。^⑬

代表们讨论了李立三的报告后，由任弼时作结论。于是，任弼时和李立三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再次发生分歧，以致会议先后出现两次结论。

任弼时在结论中指出：

一，革命由复兴到高潮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以上海工人运动为例说，去年五月后，才由手工业而轻工业而重工业，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在武汉三镇要先促成纱厂、市政工人的同盟罢工，然后发展到两条铁路的政治罢工，“如果两条铁路的工人不起来，武汉三镇的政权，得了也不能保住。”

二，武装夺取政权需要一定的条件。“革命高潮到来是接近夺取政权，而不是可以和暴动混作一块。乡村城市的斗争普遍地发展，便是革命高潮到来。但是不可马上就暴动”。他认为暴动需要的条件：一是群众斗争非常剧烈，如实现总同盟罢工。二是要城市

小资产阶级仇视统治阶级并起来参加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三是士兵工作、警察工作要有相当的基础。如果“不建立城市工作，组织同盟罢工是空话。”

三，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权革命，在全国苏维埃政权形成后，才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工农政权担负着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不是马上“便是无产阶级的政权，便要没收私有财产”。那样，会“失掉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

此外，他还强调要重视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政治上加紧指导青年团工作，培养妇女干部。^⑪

应当说，当时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认识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任弼时的结论，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窠臼，但是，一年前他在江苏省工作的经验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的这番意见对于李立三的急性病和盲动主义不能不说是尖锐的挑战。因此，李立三非常不满意，在任弼时的结论之后，他不得不在会上重作结论。他虽然肯定任弼时在“总的路线与整个精神是对的”，却在“但是”后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他说：

“但是，还不能有系统的一贯的抓住问题联到实际，我们要做革命的领导者，若是没有列宁、马克思的理论的研究，单只从实际工作中找教训，是要碰许多钉子的”。显然，李立三对任弼时的结论中所说的

上海革命复兴的过程，颇不以为然！

“高潮不是武装暴动，但是，高潮以后必紧接着武装暴动。因为现在阶级斗争厉害，可以说，如果一发生大的同盟罢工，几小时后便可以发生武装暴动……今天，工人还没有起来，所以不是革命高潮，但是，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或许明天高潮便来。说要经过步骤的，是右倾等待主义，我们要反对。”

李立三承认中国革命胜利，必须要有全国革命的高潮，有各种力量的总汇合与国际的联系，“但是又不要等待，只要有湖北的首先胜利，便可使全世界革命起来做最后的决斗。”

“弼时同志对于革命转变问题的解答，完全正确，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便是将来的转变决不是和平的转变，所以现在就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肃清右倾。”

李立三又说，在湖北“准备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这是第一个中心战略，但各同志对此讨论太少，特别重要的是要反对阶段论。”他强调“在讨论中表现估量革命形势不正确，要坚决的反对，然后才能执行党的任务。”

李立三显然感到恼火，所以他直接间接地给任弼时扣了“右倾等待主义”、“阶段论”等帽子。^⑮但是，这并没有能够说服任弼时。

争论的第三个回合是在二十一日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汇报了湖北省党代大会的讨论情况，批评任弼时的结论“不正确”，强调“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党代大会的决议中要“批评右倾观念”。任弼时为此作了申辩，建议在决议中写上暴动必须具备的条件。他说，这“非常必要，我现在认为那不是右倾；并且在这形势下，左倾幼稚病是容易产生的。”二十六岁的任弼时，和李立三针锋相对，言词也有些激动。

在激烈的争论后，李立三同意在决议中删去“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这一句，增补加强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的内容。至于要不要写上暴动的条件，他不无挖苦地说：“马克思、列宁的论文中早已简单解释了，写这一段会使同志们产生一种右倾观念。”

周恩来离开后，李立三是组织局的实际负责人，而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向忠发认为，“目前反右倾的路线是对的”。这样，任弼时不再争辩下去。会议转入组织问题的讨论。^{①⑥}

湖北省党代表大会原定四月二十六日闭幕，因为发现敌情，为安全起见，不得不提前结束，所以对湖北暴动的军事决议案没有来得及讨论。二十四日，大会根据政治局提名，选举十七人为新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即任弼时、郭士杰、华少丰、冯任、王仕

卿、军部（一人）、冯方、曹玉璫、黄树扬、范白青、郑定海、吴智明、周一（逸）群、聂鸿钧、秦了君、葛树勋、杨国华。以任弼时、郭士杰、华少丰、冯任四人为常委，任弼时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规定，由任弼时主持政治工作，军事问题，由军委长江办事处负责。^{①7}

江流，暖风，长江轮；长袍，马褂，青布鞋。

五月初，任弼时化装成封建世家的年轻子弟，偕陈琮英逆流而上。他是大革命失败后离开武汉到上海的，两年半来，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了革命的复兴，此时此刻，他重返武汉时，蒋介石的鹰犬遍布三镇的车站码头、茶馆酒肆。三月，蒋介石任命十三军军长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这个刽子手于四月五日屠杀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毛春芳、秘书邓斌，二十一日，又逮捕了省互济会（即济难会）党团书记陈贯一等。湖北省委连电中共中央：中原大战行将爆发，“整个湖北入于军事状态”，“CP、CY 无一可靠机关，常委住处无一个不有相当问题”。^{①8}血和火在等待着共产党人。

任弼时夫妇到武汉后，与贺诚夫妇主持的中央军委长江秘密联络点——华中大药房取得联系。省委的同志打算为他物色一处僻静的住所，任弼时说：

越是热闹的地方越能避过敌人的耳目。这样，他便在汉口租界内的闹市区，租赁了两间住房。墙上挂满大小不同的镜框，画的是各类人物的肖像，布置陈设，完全是一个画像馆的模样。他以画像师的身份掩护，着手开展工作。任弼时自幼喜好绘画，在东方大学中国班悼念列宁时，他画过列宁的遗像；在五卅运动时，他为刊物画过漫画，现在，在白色恐怖的武汉，他又以画师来掩护湖北省委书记的政治身份。一手丹青术，在革命者身上发挥了多种功能！

这时，蒋阎冯中原大战的战火已逼近平汉铁路驻马店、漯河一带，夏斗寅为了巩固后方，对共产党人的搜捕非常严密。五一以后地下党发动的飞行集会上，一批又一批同志被捕，武昌区工厂的党团支部全部被破坏。十五日，原省委秘书长胡英生和红军干部张宝珍、汤玉珍夫妇等八人又遭屠杀。接着，武昌、汉阳实行宵禁……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如何开展工作呢？

当时，武汉三镇党员不足八十人，江岸铁路工人中只有党员二人，泰安、中新、福源、裕华等纱厂里，一般只有党团员一、二人，国民党军士兵中只有党员十四人，全市只有阳夏、武昌两个区委，而武昌区内的工厂党组织在红五月活动中受摧残后，只有中华

大学、博文学校、美专等几所学校中有少数党员。敌人的防范戒备却“异常缜密”：行人检查，火车船舶和旅栈检查，不定时不定地的户口检查，工厂、学校、监狱中，“均有化装密探散布其间”，“印刷商店及团体机关油印器之管理，复写器出售之限制，以及邮电检查”等，都有周密布置，连租界四周的出入路口也密布水陆军警监视，企图使革命者“一入华界即立遭捕获”。夏斗寅的警备部参谋处在报告中向他保证：“务令不出故障”。^{①9}在这样的局面下，任弼时认为，不发动群众，不把工作建筑在工厂、学校、兵营之内，只凭革命机关上层的一块空招牌，决不会有革命的高潮，因此，省委第一号通告指出：“湖北全省暴动，决不是仅靠红军的攻取武汉，如果没有武汉工人斗争的高潮与武装暴动，绝不能有夺取全省政权的胜利。”要求在武汉三镇铁路、海员、兵工厂等重要单位，迅速扩大和建立党的基础，在农村大批吸收雇农成分入党，引进并培养新的干部，建立支部生活等。^{②0}为了发动群众，省委批准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周”，中心任务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建立赤色工会和发展赤色先锋队，加紧行动的教育和演习，推进革命高潮。

运动周开始的第二日，六月十六日，省总工会在武昌和记蛋厂附近召集飞行集会。事为武汉警备司

令部探知，集会刚开始，立即被军警包围，将担任临时总指挥的省总工会纠察队长黄昌恒（绰号“麻子”）逮捕，前去和“麻子”接头的省委秘书长冯任（化名王亦吾）等亦遭逮捕。敌人从冯任身上搜出省委为派遣工农分子、党员加入国民党军第九师、第十三师堡垒团的紧急通知及“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周”的计划书和《红旗》杂志各一份，同时被搜走的还有中央军委派到武汉作兵运工作的张喜春的地址，事态立即蔓延。十八日，任弼时向中央报告：

“当此军阀战争逐渐逼近武汉，红军五、八两军占领大冶黄石港，鄂东全区的地方暴动惊天动地的起来，武汉正举行伟大的反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的时候，不幸遭此巨大损失，是给我们多么严重的教训！”^{②①}

“麻子”被捕后，立即叛变，做了敌人的“稽查员”，到七月一日时，由他带领敌人，指捕的秘密党员达二十三人，多系工人干部，以致五个工厂支部，及十余个其他支部被破坏，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说：“问题还有扩大的趋势，冯任在狱中，要求千余元作保。省委各机关仍在特别戒备中”。

任弼时离开上海以后，李立三加紧部署全国的总暴动。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

利》的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武汉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还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项英和中央军委常委关向应到武汉，成立中共长江局，加紧行动。七月十三日，李立三布置南京兵暴；要求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八月五日，向忠发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吁请联共中央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参加指导与工作。在李立三等的“左”倾盲动情绪达到了高峰时，任弼时一再向中央报告武汉斗争受挫的情况，李立三置之不理，反而认为任弼时思想右倾，工作不力，所以一再催促项英、关向应等迅速成行，以便扭转武汉的局面。李立三不但对任弼时的反映听不进去，就是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也非常反感。远东局看到中共中央的决议案后指出：周恩来、瞿秋白正在莫斯科和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病中，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决议，将来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李立三说：“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七月二十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并讨论了长江局的工作计划。接着，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批评李立三对形势估计不正确，在若干

问题上犯了策略性的错误。李立三认为共产国际是受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的“右倾观点”的左右，甚至说：等暴动成功后再和他们算帐。

正在这个时候，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乘敌之虚，于七月二十七日击败何键部队，袭占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兴高采烈，以为他的策略完全正确，便下令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要求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配合行动，其情其势大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之慨！

八月一日，项英和关向应还没有离开上海，中共、少共长江局即宣告成立，第一号通知规定：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今后统归长江局指导，与长江局建立直接关系，五省的党团组织自省委以至支部均须成立党团合并的行动委员会，湘鄂赣川红军及士兵运动，统归长江军委指挥。

李立三的紧锣密鼓和武汉的实际情况，使任弼时感到困惑和迷惘。

八月六日，项英和关向应到达武汉，第二天，召开中共长江局会议，宣布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华少丰、秦了君、李震瀛七人为委员，项、关、任、顾为主席团，项英为书记，关向应兼军委，顾作霖兼组织及青年秘书处工作，任弼时兼宣传并主持

长江局对内对外的接头工作。会后，项英、关向应联名报告中央称：长沙暴动后，武汉暴动的条件“客观上更加成熟”，“一般工人都异常兴奋，异口同声说‘我们大干一下’……党在兵工厂举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呼口号、燃放鞭炮，一二百群众相和。一般群众讲，国民党的戒严只有欺小百姓，却不能对共产党。”项英无法否认武汉三镇革命力量微弱的事实，但是，他的“辩证法”，似乎只讲主观能动性。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尽管目前三镇只有“党团员二百人左右”，赤色工会“会员百余人（还包括一大半是党员）”，支部“不能完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然而，主观力量薄弱“并不是严重问题，严重的还是路线的转变”。接着，报告批评任弼时主持的湖北省委前一段工作“是一种狭隘的小规模方式，尤其是对于客观形势估量不足”，对武装暴动的认识，“确是非常机械的，将总同盟罢工为中心”，以致造成“最严重的损失”，今后“绝对不能采取机械公式”，不然，丧失时机，将“变成革命罪人”。^②那么怎么办呢？项英布置：一切斗争要以在“武汉成立全国苏维埃为中心”。这时，占领长沙的红三军团，在湘军何键部队的猛烈反扑和英、美、日、意等帝国主义的十五艘军舰的协同炮击下，坚守了十天，不得不于八月五日退出长沙。但项英要求红军再次夺取长沙，包围南昌，

截断南浔路，并在九江组织兵士暴动等等。

在湖北省党代大会期间，李立三可以用组织的权威，断然否定任弼时的主张，但是，一到实际斗争中，事情的严峻发展就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了。除了长沙得而复失之外，上海八十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没有发动起来，李立三亲自指挥的南京兵暴，也以一百多人被捕，四十多人惨遭杀害而宣告失败。武汉三镇呢？在项英到达武汉前后，夏斗寅进一步采取了对革命的镇压和防范措施。一是从八月一日起，汉口宵禁，每夜九时至翌日拂晓，长江交通一律断绝。二是八月九日，颁布斩令十六条：“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而起暴动者，除当场枪毙外，其余均处死刑”；“造谣惑众扰乱公安者处死刑”；“鼓动罢工罢课罢市者处死刑”……。三是加紧公开的屠杀。八月七日至十日四天之内，在汉口六码头、和记蛋厂门口、民生路（即张美之巷）及武昌汉阳门等闹市区用大刀斩杀革命者四十一人，整个八月，先后公开处决的革命者六十七人。《铲共半月刊》杀气腾腾地写道：“这种恐怖政策，是慑共匪、建树声威的一个有效办法，应绝对无犹疑的严厉执行”。^{②③}四是增加防卫力量。继续调川军入武汉，驻扎武汉的国民党军共七团一旅，武装保卫队共十七队，合计一万多人。

这一切，在项英看来，是国民党政权“更加动摇

万分”的标志，因而也是武装暴动“有极大发展的可能”的根据。但事与愿违：

——八月十五日，原定举行的拥护三省苏维埃政府的示威，因“动员群众准备工作不充分，人数不到一百人，示威还未开始，就被捕二十余人，结果示威流产”；^{②①}

——长江局原定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一日的反白色恐怖运动周，一并推迟，“改在九一至九七与国际青年日联系起来”举行。^{②②}

这使项英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武汉形势之下，完全脱离群众的、只有少数先锋队的示威行动，非常危险，而且易于遭受打击”。^{②③}

在“非常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使项英感到“真是气极”和“真气煞人”的还有两件事：

一是，在敌人的严密防范下，新的工作布置不能迅速实现，不能用开会来解决问题，只能用个别接头方式布置工作，项英责备说，这是“过去工作路线的错误结果”，“不能在坚决斗争方式之下去指导一切工作，纠正一切工作方式，严厉批评不积极的工作精神”。^{②④}因此，他决定行委委员不仅要出席区行委员会，直接与区委书记接头，实际指导区行委各种委员会的工作。这是违反隐蔽上级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秘密工作原则的。四月十四日，政治局决定任弼时为

湖北省委书记时，明明规定“只出席省委会，不出席区委会”，这是正确的。项英显然是乱了章法。

二是，八月九日，远东局一名工作人员，从上海飞到汉口，当面向项英指出：目前武汉“唯一是组织总罢工来反对白色恐怖，不应该组织武装暴动”。项英立即表示：“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批评他“完全是阶段论者”。后来，项英还函告中央：“希望中央与他讨论时要严重指出，与他争论。”^{②⑧}

在“真气煞人”的心态下，长江总行委要求九月七日纪念国际青年日那天，在“武汉、长沙、南昌、九江、重庆、大冶、宜昌、沙市等”最中心城市，将群众从工厂、作坊、学校内调动出来，参加“壮烈”的示威，“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最后决战”。^{②⑨}在没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的条件下，这些“壮烈”的要求，其悲剧性的后果是壮烈的牺牲和一些人极不壮烈的背叛。从不完全的档案资料中，记载了发生在九月份的一笔笔血债：

——九日，在黄鹄书店被捕的王嘉今、张任铭、王斐然等三名兵运干部遇难；

——十日，在华景街铁路外发动罢工的张培信等三人遭屠杀；

——十六日，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被捕叛变，接着武汉市委委员兼汉口区行委书记秦了君，委员

邬聘三以及兵工厂、轮渡、铁路、烟厂、印刷、刘家庙等支部数十人遭逮捕；

——十九日，长江军委参谋长、不久前从俄国军事航校学习回国的刘云被杀；

——二十三日，夏斗寅根据“国府第十一号秘令”，将已判决的“共犯”五十一人，“更新判决，从重处办”，其中的三十九人“一律判处死刑”。蒋介石为此对“所有承办人员传令嘉奖”；

——二十六日，继市总兵委书记陈刚秉被捕后，长江军委总兵委书记张金刃（张慕陶）被捕，华中大药房秘密联络站遭破坏；

据国民党档案记载，一九三〇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五个月内，武汉公开枪杀的“共犯”共二百三十八人，其中九月份杀害者达八十二人，是五个月中数量最多的月份。^{③⑩}任弼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十分痛心地说：“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绝大打击！”^{③⑪}

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四日，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来四封信。第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力量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主要精神是反对我们今天在武汉、南京暴动”。^{③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共产国际收到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八月六日李立三所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

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之后，认为是错误的，立即与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及“六大”以后驻共产国际的瞿秋白共同研究，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③③}八月二十日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向政治局传达了国际决议，经政治局讨论后，立即函示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在九月一日至四日的三封信中，再次指出：“在今天在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③④}前一时期，长江局“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并通告长江局，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指定关向应暂时负责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取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武汉市委，“长江局缩小至三人”。项英继续任长江局书记，任弼时负责宣传工作兼武汉市委的工作，顾作霖主管外县工作及青年团工作。武汉市委由七人组成，任弼时、洪周、郭士杰、徐绍桢（CY）四人为常委，任弼时为书记。^{③⑤}

这时，关向应根据中央决定，去湖南指导工作；项英则乱了心绪，他在给中央的信中不得不承认“此地基础薄弱大出乎我们在上海所想象之外”，对中央的批评，他开始有所考虑：“或者我这种观念是犯了急性病也未可知”。他认为，当前“十二万分重要的”问题是请中央派干部来，拨给经费，“加强长江局及武汉市委、区委、省总组织”，并请求中央批准他参加中央即将召开的扩大会议（即党的六届三中全会）。^{③⑥}九月五日后，项英离开了武汉；而任弼时，几个月来的迷惘、困惑，开始找到了答案。九月十四日，他在致中央的信中写道：最近中央关于武汉工作的指示信“完全正确，且对目前武汉工作的实际帮助异常重大”，过去长江局工作总的缺点，是对形势估量上“偏于客观的发展的趋势，而忽略了主观的工作进行的可能”，“把武装暴动与日常斗争对立起来”，“一般是在高谈武装暴动，不能深入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发动和领导他们的斗争”，因而是“错误了的”。为了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他指出，对黄色工会，过去认为“全无群众”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而且是十分危险”；“有群众的工会应即加入进去，夺取其群众”；进攻长沙的红军，应“速以大部主力回过头去配合到湘赣边广大群众的力量消灭赣方之敌”。^{③⑦}

十天之后，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武汉坚持工作的任弼时和顾作霖，从上海的来人中，得知了会议的主要精神，虽然还没有收到三中全会的正式文件，却在九月底作出了《接受中央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他们从惨痛的历史悲剧中，冷静地、理智地回顾与反思，得出了非常有益的教训。决议案写道：

“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没有能把目前这个政治形势及其特点与弱点抓紧，犯了对目前革命形势过分估量的错误，以致策略上部分的冒险倾向，与离开群（众）忽视党与群的主观组织力量。

“‘长沙事变’把中国革命发展中一切的特点都更显明的开展了，这一事实教训了我们如何巩固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必要的条件与适当步骤。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集中的红军铁军；如果没有广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配合与农民士兵群众的配合与包围，即使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手中把中心城市夺取过来，也是很难巩固的保障这一胜利的开展以争取全国胜利。”^{③⑧}

科学地分析客观形势，实事求是地估量党和群众的主观力量，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铁的红军，在广大城市工人群众与农民、士兵的配合和包围下，逐步地争取全国的胜利。这就是任弼时在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困惑、迷惘中所得到的启示。

如何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呢？决议写道：“实现这一个任务的实际策略方面，应当注意到发展新的苏区，把许多区域与中央区联系起来，尤其是巩固的发展”。这就要“彻底实现”：“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依平均分配的原则来分配土地”；改选苏维埃，“吸引广大雇工贫农群众直接管理政权”；“组织贫农团，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建立集中巩固的红军，尤其要在红军中巩固无产阶级与党的领导作用，建立红军后备军与赤卫队”；在工人运动中，“要运用下层群众统一战线的策略夺取广大群众”，“抓住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领导”等等。

八七会议时，任弼时虽然鲜明地主张土地革命，但是，会后他长期在城市中从事秘密党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囿于依靠城市工人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武汉的教训，促使他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在认识上发生了深刻转变，开始出现一个飞跃。

松柏耐岁寒。

中共长江局缩小成三人后，书记项英去了上海，坚持在武汉的两人中，顾作霖负责共青团和外县工作，长江局和武汉市委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任弼时一身。这时，新军阀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大批的蒋军开进武汉。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强占学校和民房，成群结队地在街头横行，社会秩序和市面极度混乱，工厂停工，商业萧条，大批工人失业，一时民怨沸腾，国民党军和市民以至警察、宪兵时常发生冲突，甚至械斗。而夏斗寅搜捕共产党的行动越来越紧。自宋惠和叛变后，武汉市委机关、长江局机关、汉口的接头处、招待机关相继被破坏，长江局文书科长沈绍藩等先后被捕牺牲。警备司令部耀武扬威地宣称：对共产党的活动“了如指掌”，共产党人只要“一入武汉警备区，无不悚然变色，自知死期不远”云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有人称病求医，有人托故办私事，想方设法离开武汉。任弼时和关向应巍然不动，沉着应付。他们从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中，觉察到群众的愤怒和深藏在人民心中的斗争要求，象奔突的地火，坚冰下的潜流。他们要把反动派营垒里的种种矛盾收集起来，把被敌人摧残得很微弱的革命力量整理聚集起来，继续斗争。“双十节”前后，任弼时通过在街头的接头和联络，布置了多起工

人群众的经济斗争。

十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武汉三镇斗争的成果：

被服厂，经过两次罢工，厂方不得不答应“不再减少工钱”，收回开除工人十二名的成命，斗争取得“相当胜利”；

泰安纱厂，资方本来要解雇工人百分之二十，经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联合斗争，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结果“准许不开除工人”。当资方将一批工资待遇较好的落纱工换成工资较低的工种时，赤色工会两次“关车抵抗”，取得了“完全胜利”；

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裕华纱厂和被服厂的工人，在“双十节”前夕召开了代表会，宣布成立联合工会。铁路、码头、市政工人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都在斗争中发展工会组织，逐步走向联合。^{③④}

到十一月下旬，中共长江局统计，经过整顿，能够和区委保持联系的秘密党员共七十二人，中共党支部十六个，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革命分子五十七人。这是在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路线下，遭受敌人摧残以后幸存在武汉三镇的革命火种！^{⑤⑥}

蒋介石从中原大战中腾出手来后，准备纠集兵力向鄂湘赣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进攻，国民党军将领

何成浚、鲁涤平、徐源泉、何键等云集汉口。十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召开三省“剿共”会议，作出部署。十一月五日，蒋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十万兵力向江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限令三个月内肃清“共匪”。

苏维埃区域面临严峻的形势，中共长江局的工作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早在十月二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弼时回长江局，武汉市委书记一职另觅人代理。十七日，中央决定在江西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工作与红军工作，任弼时为苏区中央局成员和军委委员。^⑪二十三日，长江局在军事上作了新的部署：命红一、红三军团停止分兵攻打长沙、南昌的争论，“集中兵力，在打通苏区、肃清反动、坚强红军，以巩固湘鄂赣边境根据地的原则下，向外发展，相机击破敌人的一方以夺取中心城市”，一面则要求中央“速派负责人前往苏区主持指导工作”。^⑫十一月二十五日，又函告中共鄂西特委及红二、六军前委，放弃“马上夺取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的计划，集中主力配合一、三军团“打击进攻鄂西根据地的敌军”，巩固鄂西根据地。^⑬这样，关向应便离开长沙，返回武汉。

这时，长江局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自文书科长沈绍藩牺牲后，连技术工作都无人负责。到十二月上旬，中共武汉市委只剩二人，与苏区的交通站也因中共长沙市委被破坏而中断；海委与长江局中断联系，“铁办无人”，湖北省总工会的负责人李震瀛又被全总党团调去上海，李走后“消息全无”，以致“省总没有人主持”。十二月七日，顾作霖去沪后，共青团“一个机关也没有了”，留守在长江局的只有任弼时和关向应二人。任弼时以长江局名义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白色恐怖在今天是不可免的，我们只有坚决的执行在组织上的适当转变来抵抗，绝不因此影响工作停顿。现在工作还是能以在常态中进行，只是市委损失太大了，并且牺牲了我们极好的干部，现在市委只剩无魂及张学良二人。”^④

在这封信中，任弼时严重批评全总党团负责人徐锡根说：“我们坚决抗议全总党团对下级解决问题不负组织责任，……全总只知催大汉^⑤来，好了，现在大汉把省总带到上海去了。问题片面解决是不好的。锡根主持全总当然好，但是中央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锡根的绝无组织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是方式。”他何曾知道，这时在上海，党内派别活动

十分猖獗，正在酝酿一场集中攻击瞿秋白和周恩来、策划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严重斗争。这种反常的活动，使远在武汉的任弼时和关向应，从全总和省总的行动中，也能有所察觉。

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决定将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回，通知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二十四日前到沪”。在蒋介石大军进攻苏区，党内分裂活动异常严重的关头，任弼时偕陈琼英告别了武汉三镇。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时此刻，任弼时象一个最后离开阵地的战士一般，心情是异常复杂的……。

十四、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乌云压阵。

一九三一年初，中国革命面临着不平凡的斗争。

国民党军十万，于上一年十二月初，在西起江西省的万安、泰和，东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地带，“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企图摧毁全国红军力量最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消灭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率领四万红军，诱敌深入，从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由“中间突破”，五天之内两战两捷，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的一万五千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

但是，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里，却出现了一股反对党中央领导、分裂党的恶浪。这股恶浪是由王明（陈绍禹）和罗章龙等人掀起的，旗号是反对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至二十八日，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制止了“立三路线”最主要特征的军事冒险行动；解散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和工会的组织；李立三本人也承认了错误，离开了中共中央，全党工作中心正在转变到加强对苏区的领导，集中和巩固红军等正常轨道。当然，三中全会也有缺点，主要是对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没有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进行清理，并对他表现了“调和妥协的精神”。十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中说：李立三等推行的是同共产国际根本对立的错误路线，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战线的实质”。^①来信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就，这就使已经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势头无法继续发展下去，而使党内出现了混乱现象。

中共中央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国际来信的，而毫无实际工作经验又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王明等，却从上海远东局的代表那里先得知了国际来信的内容。他们便借机兴风作浪，一面四处串连，散发王明写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后来增订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公开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已没有保障

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甚至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与此同时，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搞派别分裂活动的罗章龙等人，也乘机猛烈攻击党中央领导人。这两股反对中共中央的势力，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党中央。尽管中共中央认真讨论了国际来信后，作出《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的意见，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这种不彻底性“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②并向全党发出了第九十六号通告（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号召全党）。^③但王明等人，不顾大局，唯恐天下不乱。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共产国际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到上海，他“下车伊始”，一面指责中共中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一面分批会见他所器重的王明，和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人，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中心议题是反对中共中央的右倾。

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为校长米夫所器重，党的六大期间，他是国际代表米夫的助手。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米夫认为中国党的领导人“理论很弱”，推举他认为“理论较强”的王明为中央

委员，被大家否决了。以后，王明为中山大学学生支部局的书记，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小宗派，他们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公开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蔑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说什么“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④这一次，米夫到达上海后，赞扬王明的《两条路线》是忠于国际路线的“杰作”，并向中共中央提议由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三中全会后一度改江苏省委为江南省委）书记。政治局没有完全接受，十二月二十三日决定当时在莫斯科任赤色职工国际执委的刘少奇为省委书记，刘归国前由王明代理。

有了米夫的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更加有恃无恐，一时派别活动越演越烈，使党中央处境十分困难，连日常工作都难于顺利进行。

刚从武汉回到上海的任弼时，还是在武汉的时候，就觉察到全总的徐锡根等人，不通过长江局组织，调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到上海“片面解决问题”，为此，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全总的做法表示过“抗议”，提请中央“注意锡根的绝无组织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知道徐锡根在“江苏事件”中曾表现出严重的派别立场因而受到中央的批评，所以强调他们的做法“不仅是方式”问题。至于王明，一九二九年八月，在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

问题》的通告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找“问题严重”的王明谈过话。当时王明承认：不经过党的组织直接向共产国际有关个人报告中国党的情况“是不对的”，但这是莫斯科有关的人要求他做的，并且答应今后“避免”这样做。^⑤当任弼时得知王明、徐锡根等人故态复萌，甚至发展到要求成立临时中央的程度，这使一贯反对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任弼时感到难于容忍。

王明、罗章龙等人，集中攻击中共中央领导这一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自从米夫和他们谈话后，王明放弃了召开紧急会议的意见；而罗章龙等则继续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于是，在一九三一年元旦那天，罗章龙等操纵全总党团，作出决议，宣称：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其余如向忠发、项英、关向应、温玉成、邓中夏、罗迈、贺昌、罗登贤等人，亦须离开指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并把这作为反立三路线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如果认为这是“分裂了党”，那便是“掩饰立三主义组织系统的错误”。^⑥

一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任弼时说：我觉得应当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国际的路线，才能真正彻底的反对立三路线，也更能表现两条

路线的斗争。当前，在纪念“二七”和发动年关的斗争中，特别注意发动海员和铁路工人，以针对国民党对红军和苏区的进攻。^⑦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四中全会决议的草案。政治局曾经起草过两稿，但都被米夫和远东局否定了。原因是米夫等根本不同意中共中央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估量。中央认为：三中全会一般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米夫却认为“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出”，“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党部的工作里，丝毫没有党的政策真正转变的痕迹”，“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责的”。所以，他把中央起草的决议稿搁在一边，越俎代庖，将他们起草的决议稿交中共中央讨论。在这种局面下，瞿秋白成为米夫打击的主要对象，他有口难言；相忍为党的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远东局所以不赞成政治局起草的两稿，中心问题是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不能领导，因此使党内不安；只要能使全党一致，就以这个稿子代替政治局的稿子，我的意见是将远东局的稿子提交会议讨论。

任弼时在立三路线时期，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此时的处境比瞿秋白和周恩来好得多，他虽然没有出席三中全会，但是，作为长江局的负责人之一，而又处在李立三计划中的暴动中心地区，他直接感觉到自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工作上发生的显著变

化：从九月初开始，中央明确指示武汉还不能暴动，又不是暴动前夜；承认将党团组织合并于行委是“错误的”；把加强红军和苏维埃列为“第一等工作”；“万万不可忽视”将军事干部派往各军中去，党的干部派往下层和外县去等等。这都是发生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事；三中全会结束不到二十天，中央又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和苏区军委，事实俱在。因此他公正地说：国际来信对中央工作有了批评，但对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还应有所估计，它的缺点是对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领导不够；现在有人以为调和主义的危险较之立三路线为大，这样将会减轻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心问题是如何教育全党认识立三路线的破坏性。我们不能说调和主义的错误比立三路线更大”；“四中全会后，中央要领导全党斗争，决议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现象是于党有害的”。针对全总党团和江南省委的分裂活动，任弼时批评说：如果象上海方式那样斗争是有危害于党的。^⑧

徐锡根立即责问任弼时：“三中全会的路线自什么地方来的？是由（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来的。调和主义是否较立三路线还要危险？是的。因为它模糊了立三路线。诗圃^⑨以为上海的斗争完全是极端民主化，这是不了解上海的斗争。”

针对任弼时提出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

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主张，王明以汇报情况的口吻说：在区委书记联席会上，有人以为用实际工作来压制同志是不对的；中央是在国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反抗之下才被迫接受国际决议的；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的企图还是想维持领导；恩来、秋白、立三应离开指导机关，由远东局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和反立三路线的分子开会。接着，王明强调说：“我意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反对调和，反对取消，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⑩

王明咄咄逼人的言词，无异是在警告别人：谁要是将对三中全会及会后中央的工作有所肯定，谁就是“右倾”、“调和”，就是“取消”共产国际提出的这场斗争。他要求中央有所答复。

周恩来这才说：对江苏同志的意见中央应该有答复。中央走向国际路线虽然迟缓，“但确是进步的”，这种进步“不是九十六号通告开始的”。至于说中央承认错误是为了维持领导，“这是不对的”，承认错误是一回事，领导工作又是一回事，两者当然有关系，但“不要混淆起来”，“为什么不允许中央承认错误？”^⑪

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康生和王明三人起草给江苏的答复，由任弼时负责。

任弼时和周恩来的发言，从党的利益出发，告诫

搞派别活动的人应有所收敛，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徐锡根仍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组党中央领导机关。

在思想混乱、派别活动猖獗、团结涣散异常严重的氛围中，党的四中全会召开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西式楼房里，党的扩大的四中全会在国际代表米夫的策划下秘密召开。到会代表三十七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人，还有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秦邦宪）等十五人。会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时间只有一天。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实际上处于政治裁判的地位。会议一上来，罗章龙等人剑拔弩张，首先发难，说：全总党团、海总党团、工联党团、铁路支部、苏区代表、江苏外县、中央各小组，一致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三中全会，改变领导。国际代表一再强调会议是经国际来电批准的，又经过表决，推举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和陈郁五人为主席团，这才进入议题。向忠发代表政治局报告后，会议进入讨论。周恩来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后，提出要与派别观念作斗争。他说：“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

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允许的。”^⑫

任弼时继周恩来之后发言。他首先表明：“我执行立三路线，同志们都晓得，不用我多说。”接着他讲了五点意见，主要是：

“第一，武汉暴动是没有群众基础的盲动，我们应该承认这错误。……中央决定在武汉暴动不要经过总同盟罢工，这证明不相信无产阶级力量，立三路线在武汉暴动是军事投机，……它取消〔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空喊总罢工”。

“第二，立三路线实质是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及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之混合物，……调和主义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如果我们不能肃清调和主义，仍旧不能执行国际路线”。

“第三，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进行斗争是对的，但特别要指出，要在实际工作中向国际路线的转变中进行”。

“第四，在反对调和主义斗争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一，全总同志，没有站在党的利益上，提议停止政治局职权，由远东局召集紧急会

议，这样不是站在党利益上来领导斗争；二，如有同志说，中央不漂亮，现在打了粉，企图来领导，这不是于党有利的；三，右倾的分子说，国际路线是不合中国实际的。对于这些倾向，都要作坚决的斗争。”

“第五，紧急会议问题，有同志保留要求开紧急会议。这是不对的。既参加四中全会，又对紧急会议保留意见，将来他是否可以否认四中全会呢？”^⑮

任弼时发言后，主席宣布每人发言只限五分钟。会议由国际代表作结论。他严厉批评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后，一面竭力抬举王明等人，说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将在莫斯科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一面则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最后，国际代表强调：“党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右倾，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⑯

会议补选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又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在国际

代表的竭力支持下直接进入政治局。这样做，虽然经过了选举程序，但主要是米夫的意图。

四中全会通过的以反右倾为纲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反而为后来王明、博古等推行新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奠定了基础。这个严重后果，当时无论是周恩来或是任弼时，都是没有预见到的，但是，他们从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的原则立场出发，和派别活动作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十日，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四中全会我们应有“一致的估量”，但会议“本身有许多问题”，政治局要有“一致的解释”，对下面同志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拒绝不同意见，这当然是严重问题”，但是，“下层的意见是否正确，这是要注意的。如果下层不了解，我们具体的答复是需要的；有许多要求不能实现，我们不能以为就是不采纳；这需要我们解释。有人说，传达贯彻不要与实际工作分离，这是对的。我们是否应确定具体办法。”会议确定，派任弼时、余飞去苏区传达。^⑮十三日的会上，任弼时又指出：目前“不正确倾向值得注意。若把不正确倾向都看成右倾是不对的”。但有人说，“现

在没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也）是不对的。如（说）中央要经过支部选举，这种办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向这种危险倾向作斗争”。他告诫说：“我们不能否认，现在中央是一步一步走上国际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指导机关，若能象一个人一样，则能保障执行国际路线，不可只注意小的不同意（见），而认为比执行国际路线还重要，这也不能执行国际路线的。这值得今天政治局注意。”^{①⑥}

尽管周恩来、任弼时等义正词严地告诫，却没有能转变罗章龙等人的分裂主义立场。一月十七日，他们操纵全总党团、海总党团等组织，纷纷集会，作决议，写小册子，坚持要召开紧急会议，散发《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竭力煽动分裂党，罗章龙还派人到各省进行活动；同一天，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克全和王凤飞等在江南省委常委会上，竟然宣布不承认中央决定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另行组织“第二省委”；他们称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为“立三派”，甚至污蔑他们是“革命的仇敌”。^{①⑦}因此，江南省委决定，要王克全立刻停止破坏党、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中全会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告中国工农红军书》和任弼时起草的《告在狱革命战士书》之后，专门审查全总党

团一月十七日会议和江南省委的报告。候补中央委员罗章龙等列席了会议。徐锡根、关向应向会议汇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王克全等人的意见后，团中央的负责人气愤地指出徐锡根、王克全、余飞、郭妙根、罗章龙等是党内搞小组织活动的主要领导者，要求政治局立即解散全总党团。接着，向忠发和周恩来责问组织江苏省“第二省委”的王克全。以下的记录，充分反映出当时会上的紧张气氛：

“少^⑮：你要回答组织第二省委问题。

克^⑯：这不是组织第二省委。

少：江苏省委是谁？

特^⑰：江苏省委〔已经〕改造了。

克：不承认这一改造。

.....

少：你是否承认政治局？

克：我不承认。

少：你来做什么？

克：我是四中全会的政治局委员。

少：你又不承认，你要来参加做什么？你服从多数决议没有？

克：我不同意，不服从。”

任弼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郑重地说道：

“今天暴露了锡根以及全总党团同志在假

的拥护国际而掩护右倾的实质，在过去，还不能说是反党的小组织，但经过克全组织‘省委’，发告同志书，这完全是反党的组织。他们的政纲是不承认国际路线，他们是破坏党，帮助敌人。今天党内斗争形势已有了小组织的行动，尤其是克全，今天又表示否认政治局而不放弃其态度，这是不能再领导党的工作。为了巩固党，全总、海总、工联党团都要解散；同意CY提议，小组织破裂党，不仅要解散党团，而且克全同志如挽救不过来，不可能再去领导”。^{②1}

最后，任弼时明确主张停止王克全的工作，并向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解散全总党团，责令王克全立即停止“第二省委”活动，并向政治局写书面声明。二十七日，政治局通过开除罗章龙候补中央委员及党籍，同时开除王克全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王克全等不履行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承诺，不交声明书，不停止“第二省委”的活动，甚至拒绝出席中央通知的会议，因此，一月三十日，政治局决定开除王克全的党籍。

二月初，周恩来等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

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作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

为了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二月六日、十三日，政治局研究决定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项英到达江西苏区，已于一月十五日在宁都县的小布，宣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二月六日，即将奔赴苏区的任弼时在政治局会上建议：中央苏区任务重，“过去分配的力量不足”，如周恩来去苏区有困难，最好另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王稼祥“必须去”，以利于加强理论工作；在苏区的中央委员也应加入。周恩来表示他准备去苏区，但不能马上成行。中央局成员先定七人：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共青团和苏区各一名。项、毛、任、王为常委，任管组织工作，王管宣传工作，毛管军事工作。向忠发说：周恩来两个月后可出发，任中央局书记，目前由项英暂代书记。十三日，政治局初

步决定：中央局由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顾作霖（共青团）和苏区一人共七人组成。会议同时决定成立由夏曦等负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沈泽民等负责的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确定赣东北、湘鄂赣、闽西三个特委的负责人。王稼祥建议：第一批去苏区的应成为政治局代表团，去传达四中全会决议精神。^{②2}

第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筹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苏区扩大，为筹建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了条件，远东局为此起草了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苏区组织法和军事训令五个文件草稿，为此，中央政治局将原定由任弼时、沈泽民、刘峻山三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扩大至五人，增加周恩来、王明两人，负责讨论远东局交来的五个文件稿，并对苏区军委和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名单提出方案。苏区的工作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统一由周恩来负责。二十日，周恩来代表苏区委员会，向政治局提出党内三十人左右参加政府的名单。临时政府拟设立外交、军委、土地、劳动、经济、财政、文教、政治保卫、交通等部门。苏维埃军委由周恩来兼任，军委委员二十余人，包括三方面的人选：红军各军长、政治委员和群众领袖（包括农民领袖和少年先锋队队长）。军委常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

改编后的有关军长等共八九人组成，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兼任。

关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一职，开始有人提议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但张闻天说，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王明接着说：“苏维埃主席问题，确是一个大的问题，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因此我觉除特生^{②③}以外没有别的人，但他又不在苏区，同时在秘密条件下又不妥当，这是要注意的。”在议论中明确了两项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苏维埃主席一职就自然地落在毛泽东身上。向忠发说：“我同意闻天意见，……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会议决定：主席人选与远东局商后决定。^{②④}

经过这两次政治局会议后，确定进苏区的人员先后成行。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在党内的分裂主义分子大闹党中央时，在江西发生了“富田事变”。

富田村在江西吉安，是江西省总行委机关的所在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根据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二十军

少数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一面包围省行委，释放被捕的百余名人员，并企图扣留总前委的来人，一面提出分裂红军的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扩大了事态。

所谓“AB团”，是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的打击，AB团即行解体。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变”的悲剧。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入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求处理。

大敌压境，红军内部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使中共中央感到十分忧虑。更加棘手的是总前委和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的性质认识有分歧：总前委认为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②⑤}，中央局虽然也肯定事变在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②⑥}

周恩来、任弼时等五人组成的苏区委员会研究了各方意见后，于二月二十日向政治局报告。周恩来说：大家认为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赣西南的

AB 团的组织是反革命，但尚有动摇及红军中不坚定的分子，在客观上亦可为 AB 团利用。由于中央对事件真相一时还没有进行调查，对总前委和中央局争论中的许多问题“还不能做任何结论”，因此苏区委员会主张“立即写一信去，候中央来解决，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的权限。现在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同时，派两位得力同志，分别从赣南、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先行考察，为中央代表团准备材料。

任弼时补充说：总前委反 AB 团是正确的，如有问题也是具体方法上的。我在委员会上即感觉到仅凭一面的报告是难做结论的。^{②7}三天后，任弼时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起草了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 AB 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的。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

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⑳

经过连日的研究后，三月四日，政治局决定：任弼时五日必须走，王稼祥七日走；去鄂西、鄂东北的人，本周内必须走，其余去各苏区的人，三月份内走完。由周恩来、邓颖超负责催促和安排。^㉑

二十七岁的任弼时，受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深感担子很重，一来，他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特别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的经验；二来，苏区工作复杂，转变路线必然面临许多旧的和新的问题。他曾经建议，派一名政治局常委进苏区，中央没有同意，幸而中央同意他的请求，派王稼祥和他同行。陈琼英，本来可以和他一起去苏区，但是，她的预产期已经临近了，行动不方便，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待分娩后再成行。任弼时向陈琼英一番叮咛后，由从大埔方面来的地下交通安排，启程奔赴江西苏区。

十五、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任弼时离开上海后，由中央特科交通局安排，先坐海轮到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起旱，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的瑞金。这条非常秘密的交通线，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九三〇年后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到达闽西永定县的虎岗。虎岗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中央代表团到达时，中央军委的秘书欧阳钦，也绕道香港先期来到虎岗。他是周恩来派到江西苏区作调查的。

这时候，四中全会的精神已经传到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也称闽粤赣省委）。二月四日，省委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闽粤赣特委根据省委“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于三月一日，在虎岗召开闽西工农兵审判“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

大会，判处了林梅汀等十七人的死刑。这是一起冤案，现已平反昭雪。^①

中央代表团向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这时，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开始，闽西苏区战幕已经拉开。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派红十二军的刘型率一个团前来迎接中央代表团。任弼时和欧阳钦等继续北行，经长汀的四都坪到江西瑞金，时间大约是四月四日；到大柏地后，改由一个排护送他们去宁都县的青塘。^②

春意盎然的中央苏区，战云密布。

在第一次“围剿”中，蒋军一败涂地，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向蒋报告说，“龙岗一战，十八师片甲不还”。所以，第二次进攻苏区时，蒋改变战术。经过三个月的部署，调兵二十万，总司令何应钦以“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的战术，在西起赣江，东到福建建宁，布下了七百里连营。到四月下旬，敌军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红军主力南移到龙岗至东固一带，离敌人占领的兴国只有六十华里，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也从小布、黄陂移驻到青塘。四月十七日，任弼时等赶到青塘，和毛泽东、朱德、项英等见面，当即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是三月十八日在黄陂开始

的，会议由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检查了红一、红三军团的工作，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土地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等，共进行了三天半。由于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的到来，四月十七日，中央局又召开一天会议，作为扩大会议的继续，由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据后来中央局的报告说，三月十八日后，“已将 AB 团总的破坏，重要的首领完全逮捕”，在代表团到达后的“继续会议”上，为了“纠正过去中央局的估量和分析的错误”，对肃反工作“新作一决议”。^③这样，扩大会议形成：《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和《共青团工作的决议》等五个文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等五人为中央局委员，一面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一面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工作。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央代表团虽然只参加了一天“继续会议”，但对会议形成决议是起重要作用的。代表团和与会同志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和总前委过去的工作，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充分的肯定。在《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洲会议^①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为工农政权而斗争”，“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

对汀洲（长汀）会议以后，立三路线时期红四军的军事行动的分析和估量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决议虽然认为，从长汀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但仍认为，在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

事实是这样的：一九三〇年夏，中共中央为了调动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特派涂振农传达命令，强调全国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敌人将在各路红军会攻下“一击就破”，要红四军、红六军（七月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等整编为第一军团，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打吉安进

攻南昌、九江；洪湖红军为第二军团，湘鄂赣红军为第三军团，鄂豫皖红军为第四军团，分别攻打长沙、武汉等大城市，以便“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对李立三的军事冒险行动先是表示怀疑，后来进行了抵制。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中央路线发生错误的情况下，下级党部开始往往不容易对全盘情况有具体而清楚的了解，即使有所觉察，也只能按组织原则提出建议，而不能轻率地采取坚决抵制和对抗，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朱德和史沫特莱曾经这样说道：

“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要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一军团从闽西北上向南昌进发。但在行动过程中，毛泽东、朱德是一直有所抵制的，部队进军到樟树坪后，没有直接打南昌、九江，而是一面派罗炳辉去南昌侦察，一面过赣江到上高、高安一带做群众工作。经侦察，南昌敌防守严

密，且城周多水池、湖泊，易守难攻，结果没有打。后得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打开了长沙，红一军团准备前去援助，南下途中，在浏阳的文家市歼灭何键所部第三纵队的三个团一个营及一个机枪连，毙纵队司令戴斗垣。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后，八月下旬，两军会合，在浏阳永和市召开联席会议，据中央命令两军合编成立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再次攻打长沙。但毛泽东不赞成硬攻长沙，因此，一方面军虽然在长沙围城十多天，因久攻不克，九月中撤到萍乡、醴陵一带。二十八日占领袁州，总前委召开袁州会议。尽管军委长江办事处的代表周以栗、湖南省委及红三军团部分同志，最初主张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仍不赞成，以致有人责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执行不执行中央路线？毛泽东说服了周以栗，改为先攻打敌人力量较弱的孤城吉安。十月四日，打开吉安，使赣江两岸苏区连成一片。十月下旬，蒋阎冯大战结束，蒋介石腾出手来，调动十万兵力向苏区进攻。面对强敌进攻，红军如何迎敌，在哪里摆战场？总前委于十月三十日在罗坊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击敌的主张。于是，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宁都县的黄陂、小布、洛口之线集结，坚壁清野，投入第一次反

“围剿”战争。

在李立三竭力推行军事盲动主义的时候，正在长江局的任弼时处于迷惘、困惑之中，对于下级党组织识别和抵制来自中央的错误路线，其处境之困难他是深有体会的。因此，对一方面军在此期间的军事行动，扩大会议决议这样写道：

“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底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底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⑥

这就是说，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抵制立三路线的成果。至于对红三军团，决议一方面指出它两次攻打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从战役和战术方面，仍然肯定他们“作了许多英勇战斗，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二次攻打长沙后，当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底战争底

教训”，而“红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的走上正确路线”。^⑦

如果说，扩大会议对红一、红三军团过去工作的评价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那么对苏区中央局的批评是有偏颇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置。任弼时离开上海之前，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性质虽然已有基本的意见，但还是觉得情况不完全清楚，责成中央代表团实地调查后，“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刚到苏区，还未及调查，就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新的决议呢？

原来，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包括任弼时在内的苏区委员会认为总前委和 AB 团的斗争是正确的，但在方法上是否妥当有所保留。当时，远东局的意见是未经代表团调查之前，在给江西的信中，连总前委反 AB 团“一般是正确的”的话也不要写，免得给代表团解决问题时带来困难。但政治局认为不肯定这一点，怎么能停止下面的争论呢？最后，任弼时起草的信中的措辞是：“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⑧可是，任弼时等正在赴苏区的途中时，三月二十七日，远东局认为二十军包围省行委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这一点用不到再争论”，要周恩来告中共中

央给下面发信，“信的形式可与远东局共同名义发表，立即发下去”。^⑨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决议案》，肯定事变的性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 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决议同时认为福建的社会民主党，各苏区的改组派等“都必然是江西 AB 团的第二”，要求“严厉的消灭 AB 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这是“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⑩至此，关于“富田事变”性质的争论就结束了，赋有“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使命的中央代表团，只能听令于中央，余下的问题只是贯彻中央决议。因此，中央局扩大会议“新作一决议”，并且对项英所持“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的立场，和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的正确主张，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⑪在中央“以反右倾为纲”的指导方针下，“富田事变”的重要分子受到“极严厉的制裁”，而中央苏区反 AB 团的斗争一度愈演愈烈，造成了许多错案冤案，形成历史的悲剧！尽管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不是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认定”者，和半年后他明确提出肃反“绝对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反对肃反工作中

的唯心论”，并且保护过一些同志，但是，毕竟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这时，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逼进，分四路向广昌、石城、宁都一带“分进合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以“剿共”的军事胜利，为蒋介石五月五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增加政治资本。面对四倍于己的敌人，红军如何战胜它？中央局和总前委内部对战略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四月十九日，中央代表团传达远东局和中央关于军事的训令，为保存实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的‘围剿’，则可考虑转移”。因此，会上有人主张“分兵退敌”，必要时撤退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朱德认为：敌兵虽众，但并非蒋介石的嫡系，第五路军王金钰部、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新从河南及鲁南入赣，军心恐惧；而红军自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养精蓄锐四个月，以逸待劳，军民协同，完全可以克敌制胜。会上争论没有结果。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各军军政负责人参加，再作讨论。据曾山回忆，在离东固不远的城岗圩的一片松林里，大家继续争论战略问题。^⑫大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主张坚决打。接着会议转入讨论先打哪一路敌人的策略问题。林彪等人主

张先打从兴国南来的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部，得手以后，可以伸开两手到湖南和赣南。毛泽东认为各路敌人中，以蒋、蔡为精；先打南路，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且红军自东往西打，西面限于赣江，回旋余地小；不如避强打弱，把红军主力向西拉到富田、东固一带，诱敌深入苏区腹地，然后自西往东先打王金钰、孙连仲部；再向东横扫过去，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为以后的战争创造条件。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后来说，在这场争论中，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⑮

五月初，中央局最后作出坚决进攻，艰苦奋斗，持久作战，在苏区内消灭敌人的决策。战略既定，红一方面军立即誓师，并向群众宣传鼓动，配合红军行动。任弼时和中央局同志即随军行动。五月十六日，红军首战告捷于东固周围的中洞、九寸岭、观音崖，十九日，再战告捷于吉水县白沙、沙溪，二十二日，又在永丰县中村击溃敌二十六路军。国民党“进剿”的六路军风声鹤唳，向广昌、南丰逃窜，二十七日，红军克敌于广昌。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追击逃敌，一路向东追击。三十一日，红军在闽西的建宁激战一

天，歼敌七千，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后一仗的胜利。

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歼敌三万余，乘胜解放了赣东北的南丰、南城、抚州和闽西北的泰宁、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宁化、清源、归化等广大地区。红军的胜利，使蒋介石渴望在国民会议期间获得的军事“捷报”成为泡影，而毛泽东则欣然写道：“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⑭

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特别是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他深深感到自己缺乏作战经验。他分析自己，也观察周围的战友，从中发现他们的长处，改变原有的印象。后来，他这样说：对毛泽东，“未到中区前是有毛右倾的观念的，到中区后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特别是在大军压境之际，毛深察敌情，临机果断，指挥若定，使他深为折服。而项英则“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⑮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决定，恢复一月间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毛泽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作战及战区的地方工作。^⑯后又向中央报告，“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

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求中央批准。^①

二次战争前，苏区中央局虽已成立数月，但因战事频繁，驻地不定，精力集中于军事，对地方工作，无暇顾及，实际等于是总前委。中村大捷后，才有条件改变过去的局面。所谓条件，一是打退敌人后，苏区中心地带战事相对平静，中央局机关和一方面军的留守处便离开战斗部队，固定在兴国，组织局工委在东固以南的农村。二是打通闽赣与赣江以西的联系，长汀、瑞金连成一片；歼灭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后，缴获了一百瓦功率的大电台一架，中央局、红军总部、红十二军和三军，均拥有电台，和上海党中央也建立了电讯联络。三是中央代表团到达后，人员逐渐增加。这时，苏区的工作日益向前发展：

第一，苏区的范围扩大，组织上作了调整。以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原来划分东西南北四个分委，实际管辖的区域很小。战争胜利后，苏区扩大，赣南工作发展，六月十七日，中央局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将赣江以东的大片苏区划分为赣南、赣东和永（丰）、吉（吉安、吉水）、泰（和）三个特委，直属中央局领导。赣南特委以陈毅为书记。赣江以西地区，按中央决定，与湘东南苏区合并，建立湘赣临时

省委。七月初，中央派王首道、甘泗淇到中央苏区传达中央决定，恰好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派张启龙、李孟弼来中央局请示工作。经中央局讨论后，由任弼时向王首道、张启龙传达组织决定：除王首道、甘泗淇外，增派张启龙、林瑞笙、袁德生三人参加湘赣省委工作。七月下旬，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王首道、张启龙、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五人为常委，王首道为书记，张子意任组织部长，张启龙任省军区总指挥兼苏维埃副主席和党团书记，袁德主任省苏维埃主席，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第二，整顿和加强地方武装。立三路线时期，曾要求把地方上的每一支枪均集中到红军中去，以致地方武装力量削弱，群众无以自卫。中央局决定，将二次战争中所缴获的步枪，大部分用来武装地方，赣江以东各县区共发出枪支四千，同时从红军中抽调一批下级干部到地方，建立游击队式的赤卫营、连及特务队、独立营等，并建立指挥体系，成立随营学校，有计划地训练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

第三，发展广昌、宁都、石城三县的工作，建立苏维埃，分配土地，并以红军主力一个师配合地方武装，消灭兴国、雩都、赣县的地主武装，恢复苏区，建立巩固后方。

第四，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六月一

日，苏区中央局发布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会原定八月一日在江西苏区召开，因为选举代表需要时间，加以全国各苏区之间交通困难，后通令延至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召开。

七月二十日，任弼时派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苏区中央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红军伟大胜利，使着南京政府一方面对北方军阀妥协，与两广相持，形成蒋系一部分主力，马上再来一个第三次进攻”，“蒋介石亲到南昌，罗卓英、陈诚、卫立煌、赵观涛及南京警卫第一师，均调到江西，现已集中南城，陈铭枢及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上官云相等集中吉安、吉水、永丰一路，何应钦为前敌司令，有马上进攻形势”；“中央局目前的状况，朱、毛、周、彭、林等^⑧均在前方，陈毅到赣南特委担任书记去了，现在中央局只有弼时、稼祥、项英三人”，“中央局的工作人员甚少，连技术工作都成问题”。^⑨

当时，王稼祥主持党报《战斗》，项英负责军委工作，苏维埃代表大会和苏区党代会的筹备工作，主要落在任弼时身上。由于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

剿”接踵而来，各地选举全苏大会和苏区党代大会的工作，就和发动群众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工作密切结合进行。七月，任弼时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一文，要求在整个选举运动中，“必须与加紧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中心任务极密切的连接起来”，同时，和新区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苏区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等工作结合起来，文章指出：

“要使全苏大会得到完满的成功，要能够改造出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就必须使每一个代表，真正能够代表工农群众的意见。要做到每一个苏区的工农，能认识苏大会重要意义而积极的起来参加选举运动，并且充分发表他们的真实意见；要极严密地防范一切富农地主 AB 团和其他反动成份的捣鬼和阴谋；要绝对禁止委派制的复现；要保障代表的成份和政府的委员，是真正的工人（包括雇农）、贫农和很好的中农。”^{②0}

八月，他又在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组织成分上“一般的是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产阶级份子”，

工作作风上“个人包办、家长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很普遍地存在着”。为此，要求通过召开各区的代表会改造组织，由工人、雇农分子来负责区委的领导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评精神上去详细检阅区委过去的工作”，讨论出办法，“培养在党的策略路线下独立工作的能力”。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在八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②①}

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步步退让，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却一面大举兴兵“围剿”，一面加紧搜捕镇压。四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又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的安全威胁极大。九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一周，王明经米夫同意离开民族灾难深重的祖国动身去莫斯科，周恩来则准备进入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九月中，经远东局提议由博古、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②②}、李竹声^{②③}等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洛甫、卢福坦为常委，随后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从八月三十日到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先后发

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八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九月二十日）等指示，指责“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缺乏全部的了解”，“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这些指示，特别是王明临走前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②④}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②⑤}的长文中称它是王明路线时期“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②⑥}它所描绘的“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表面上似乎好看，“其实却是一堆败絮”；^{②⑦}它由一系列“左”的估量而得出的“中国政治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的“决战论”，作为“紧急任务”提出的要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后，“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等，是“打大城市的根据”，推本寻源，“葬送红军自此始”；^{②⑧}它强调的要“更深刻的发展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后来推行“地主不分田”，

“富农分坏田”，“批评‘富农路线’的根据”；^{②9}它以“绝对主义”立场，说革命力量发展“必然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因而“九一八”日本侵满事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本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争取中间力量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后来竟然把包括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反蒋不反共的第三党等，一概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时，把满洲事变看成是“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保卫中国”的口号，“这是后来认为可以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决战的根据”；^{③0}决议要求全党“在最短期间之内，百分之百的”完成“紧急任务”，如若不然，便是“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与行动”，于是就要在全党大打“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以此为起点，向前发展成为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加完备的系统路线。^{③1}

任弼时曾经这样说：四中全会“并未能在思想上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故以后不久的‘左’的路线的产生，仍易为我们接受”，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在实际执行中还未能在这方面完全贯彻。比如，在分配土地上，他虽然接受中央关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非阶级路线”的批评，但在给中央的复电中则说：“以人口为标准，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广大群众

拥护，执行结果并不损害中农贫农的利益”。^{③②}又比如，在继续反 AB 团的斗争中，他主张不轻信口供而注重调查，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主义。为了制止各地肃反委员会“随便杀人”，中央局“规定肃反条例，在军委会之下成立政治保卫局，专负这一任务”。^{③③}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在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 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任弼时得知后，如何处理呢？张爱萍回忆道：

“主持此事的某负责同志轻信了口供，决意将我逮捕时，救星任弼时同志来了。‘他不是 AB 团的’，这是任弼时同志把我从由于大革命失败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连续被捕入狱；以后又被派入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连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结论。弼时同志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于是同弼时同志一道的顾作霖同志（是当时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被派来万泰地区检查我们的工作。他首先从下层组织，然后到上层的少共本身工作，到少年先锋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还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了弼时同志的论断是正确

的。”^{③④}

任弼时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兴国县召开团代大会，他率领少共中央的巡视员五六人，出席了大会。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回忆时写道：

“他扎着皮带，结了绑腿，脚穿草鞋，背支驳壳枪，浑身英姿焕发，朝气蓬勃。……

“当天晚上，我邀集团县委几个干部，围坐在一盏菜油灯下，向任弼时同志和巡视员一五一十地汇报团的工作。当我谈到广大少共团员、青年赤卫队员、儿童团员在党的领导下，勇敢机智地投入反‘围剿’的各条战线，无论在参军、动员扩红、支前、慰劳、担架、运输、侦察等项工作中，都表现了不避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时，任弼时同志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配合革命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广大青年组织到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这项工作很紧要，也很必要。’

“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同时一边记下同志们的发问。他听说兴国山歌在鼓动宣传青年人当红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后，便要当时妇女山歌手、县妇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他悄悄学会之后，一天在大会上居然操着兴国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

“当时，我们许多同志文化程度低，不少团的干部‘大字墨墨黑，一个认不得’。譬如，当时我任团县委书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级送公事来，还得东找西找求会认字的人来认，真感到没有文化做革命工作的苦情。任弼时同志就因势利导地对我说：‘正芳同志，你学文化要象我学山歌那样，一字一句认真学，是能够学成红秀才的。……你不错，已从一个苦命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党的干部了，至今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将来你挑的担子还会更重，你要成为全县青年的带头人，你就要认真学习文化，学习马列主义。你要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学习工作方法，学习革命思想。这样，你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在会议结束之后，他不辞劳苦，要我同他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作调查”，“后来，我又陪同任弼时同志到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那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与他短短相

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⑤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一方面军主力回到石城、长汀、于都、会昌一带，红军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瑞金是一个古城，地处赣江东源的贡水上游，是闽粤赣三省的要道。唐时置瑞金监，五代、南唐设瑞金县，相传建制时，掘地得金，故名瑞金，毛泽东和任弼时一同住在叶坪的一座小楼里。这时，离开苏区党代会和全苏大会召开的日子不远了，中央区的领导同志便集中在一起，共同筹备两个大会。

两个大会的筹备工作从指导思想到人事安排都是中共中央和王明走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指导下进行的。八月三十日，临时中央听取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的口头汇报后，当即发出了《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指示信》，在长达一万二千字的信中，评价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当前的任务。十月至十一月初，为指导两个大会，临时中央向中央局编号发出七次专电，就党代会决议的基调、临时政府人员安排等作了具体指示，要中央局根据来电的“指示原则进

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③⑥}于是，中央局分工由王稼祥起草党代大会《政治决议案》，任弼时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自毛泽东回到中央局后，根据中央局的初步决定，由毛泽东代替项英主持中央局的工作。^{③⑦}

在人事安排方面，中央八月底电告：中央局各同志应分工在政府中、红军中和地方党部中“实际参加苏区一部分指导工作”；临时政府候选人名单，“原则上应多推选各苏区的工农群众领袖，党的领袖只选其能实际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与一般的群众对他有信仰的人”，授权由中央局参考四中全会后中央酝酿的名单决定。^{③⑧}之后又电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朱德为主席，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外交部长。”^{③⑨}

来电提出：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应增加王明、关向应、徐锡根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政治保卫部和教育部部长，电中通知：“肃反邓发，教育部长秋白。”

中央局接到来电后，向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三项建议：一、项英为临时政府副主席；二、江西省政府主席曾山为土地部长，原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

为财政部长；三，增加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中央局的电中说：“革命军事委员会来电只提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我们提议加周恩来、毛泽东、贺龙、林彪（四军军长）、谭震林（十二军政委）、孔荷宠、邵式平。请讨论电告。”^⑩

苏区中央局的成员问题，自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曾发生过一些周折：

四月，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曾“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人为中央局委员，之后又提出“以毛代项”问题。但临时中央政治局迟迟未予答复，也没有说明原因。五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指出：“中央局或中央代表在任务上在组织上必须与当地最高党委分别清楚”，“两种组织绝不能混淆与合并起来”。区别何在？决议案指出：一是任务不同。“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当地最高党委则是领导所属地区党的工作的机关。二是中央局或分局的成员“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当地最高党委则是“由当地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必须“立即改正”把两种组织“混淆与合并”的“错误办法”。^⑪照此规定，中央局扩大会“选举”五名中央局成员就不合乎“中央派遣或指定”的原则；八月三十日，《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组

织问题决议》中答称：“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伍豪同志与现在苏区的项、毛、任、王、顾、邓、朱七同志共同组织”。^④这意味着中央局扩大会议的选举无效。但是，主管组织工作、负责筹备党代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弼时，在十月十一日（真日）向临时中央的请示电中，再次提出两项人事问题：一是“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二是“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即重新上报中央局扩大会议选出的五名成员，均“请中央批准”，并“望派人领导两个大会”。^⑤临时中央于十月三十日前发来“复中局十月真电”，电中答复：

“一、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绝不能随方面军行动。应在苏区根据地建立经常工作，指导军事、党、工会、苏维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党部、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份无任意变更之权，如对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见，应报告中央由中央解决。

二、中央局成份无扩大之必要，现中央局应负责领导党大会和苏大会。中局书记由泽东代理，弼时应仍任中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由地方干部中选拔。

三、……中央新代表即可出发来赤区会同

解决一切问题。”^{④①}

来电实质上批评了任弼时等在没有“报告中央”前补选了中央局成员和“决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等的做法，但仍同意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因此，十月三十一日，即苏区党代大会开幕前夕，中央局给临时中央的电中表示，“中央对我们工作批评是完全正确”，中央局“成分不扩大，我们同意”。^{④②}来电同时明确了“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从此，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在组织上统一了。两个大会就在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负责领导”下进行。

据萧克回忆：在延安对，毛泽东在提到扩大中央局成员这件事时，曾对任弼时说：我当时提出要增加五个人，保守主义一概否定。^{④③}

十一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的叶坪村一个大祠堂里开幕，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红军问题、苏区工会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等五项决议案。十一月五日闭幕。

关于党代大的决议案，临时中央政治局生怕八月三十日的长信还没有到达中央局，特于十月二十

日前后发来第四号电，将长信的“要点”包括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告诉中央局。主要内容：一是否定中央局扩大会议对总前委过去工作的估价，认为苏区路线的转变只是在“中央局扩大会后”才刚开始，“二全会、汀州会议、吉安大会都在执行立三路线”，即使扩大会议后“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目前“最严重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消灭地主阶级抑制富农政策还动摇”，“党内更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二是目前“中区中心任务”是最大范围发动群众，巩固扩大红军，冲破敌人“围剿”，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三是“发展苏区内部阶级斗争”，把反 AB 团的斗争和“内部阶级斗争很密切的联系”起来，“加紧反对各种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征服自己阶级内错误思想”。^{①7}这就是党代大会《政治决议案》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的基调。

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首先明确：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務，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

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⑧

如何保障党在政权和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呢？决议指出：“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经过无产阶级成份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些同志应“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份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要依据客观条件“推行党内民主化”，但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红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致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但要防止假借说服而“放松纪律的执行”，或“完全不用说服的精神，采用机械的过分的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在执行“当前苏区的重要任务”的肃反时，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而阻碍两条战线斗争，甚至于代替了这一斗争的错误”等等。这些原则的提出，对于在苏维埃区域的执政党的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

但是，《决议案》强调要在四中全会与国际路线的基础上使“全部工作彻底转变”，因此，“要深入两

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时，任弼时批评“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因此，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时，提出要“防止两种倾向，注意思想斗争”，任弼时当时写道：“一方面是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而且说“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④9

这里一再提到的“狭隘经验论”，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〇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鲜明论断，提倡面向实际作社会调查，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任弼时到苏区后，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因此离开毛泽东文章的历史条件和强烈的针对性，错误地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后来，当任弼时发觉自己

的错误时，他坦率地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时，他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⑤0}

在七大前夕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又说：

“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⑤1}

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继苏区党代大会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二百九十人，分别代表中央苏区，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琼崖等苏区，红一、三军团、二、六军、十六军，各独立师以及全总、海总等均有代表出席。是日，国民党军“有十余机轰炸长汀、瑞金，投弹百余枚，烧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但大会无恙”^{⑤2}，黎明阅兵，晚间提灯庆祝，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瑞金改称瑞京。

毛泽东为大会题了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九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接着讨论通过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告民众书，劳动法；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法和红军问题决议草案；制定经济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和优待红军条例等重要法令和决议。十九日，大会选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内的六十三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取消原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二十七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临时政府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部委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全苏大会期间，任弼时和代表们广泛接触。清晨，他和代表们一起出操，夜晚，给代表们讲党课。

尽管他这时才二十七岁，但是因为留着长长的胡子，拿着旱烟斗，穿着草鞋，模样象个老农民。王震回忆任弼时时写道：

“我是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幸运地第一次和您会面。您向我详细地询问了湘赣边区的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形；您以布尔什维克组织家和教育家的高度热情，把我们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化为一个训练班；您替我们拟出代表团的学习计划日程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同志的讲课，其中有您亲自讲授党的建设。”^{⑤③}

两个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是在战斗频繁，苏区分割，交通困难和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任弼时从指导选举代表，组织文件起草，党政军人事安排，以至大会期间各代表团的学习计划等，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显示了高度的组织才能，因而被代表们誉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他除了担任共和国执行委员和继续任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外，在政府中，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由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邓发等中央局委员已分别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中央局同志多已分任军政工作，书记必须请中央派人来担负此专职”。^{⑤④}

十二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十六、宁都会议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其间相隔四个月，第二次到第三次，几乎是接踵而来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扩大，版图面积纵约七百五十里，横约五百四十里，跨十八个县的范围。蒋介石不得不暂取守势。所以，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围剿”之间，时间相隔一年多。在这期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宣告成立，对全国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有所加强；二是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后，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宣布起义，主力红军由第三次战争胜利后的四万余人，迅速增加到六万余人，新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三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寇进攻东北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

分化，蒋介石被迫暂时宣布下野。所有这些，给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更加有利的形势。毛泽东和斯诺曾经这样说：“这时候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①

问题在于如何进攻。

中共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主张攻打中心城市，和国民党决战。他们不懂得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动，应该联合包括中间派在内的各派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革命，却强调九一八事变是各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导火线”，错误地提出“保卫苏联”，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临时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说：“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目前的紧急任务是要积极扩大苏区，“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这实质上是李立三路线的翻

版，而在政治形态上比立三路线更为完备。

为什么在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之后，党内不少同志包括任弼时在内，仍然会接受和贯彻呢？任弼时后来反思道：“四全会只做到改造组织，使教宗（教条主义宗派）入主中央，并未能在思想上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故以后不久的‘左’的路线，也仍易为我们接受。”^②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后，任弼时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局党校校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中央局书记。临时中央政府系统的人事没有变动。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苏区肃反工作错误的报告，这是他进入苏区时沿途经过调查后提出的，会议通过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

“过去反 AB 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过去因为对 AB 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 AB 团扩大化了，……更产生极严重的对 AB 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 AB 团的斗争简单化了”；“至对闽西肃反工作的估量，则是错误的”。^③

决议具体地指出各个时期发生错误的“领导责任”，认为中央局成立初期，因受立三路线与调和主

义的影响，使 AB 团等反革命“有一时期相当的发展”；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对于肃反工作中的根本错误，并未了解和执行及时纠正”；党代大会后，尤其是中央局指示信后，“才将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揭发出来，并指出了正确的出路”，但这一转变“还仅仅限于上级”，地方上、红军下级部队中转变还很微弱。作为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苏区党代大会的筹备者，说任弼时负有“领导责任”并不过分，因为他确实没有从根本调查清楚 AB 团组织的来龙去脉。

一月中，临时中央指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讨论时，多数通过先打赣南重镇赣州。战争决策既定，后方大量的战勤工作需要跟上。这时，任弼时的精力集中于贯彻全苏党代大会决议。中央局会议前后，他和陈毅出席了中共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会上得知，苏区党代会的精神特别是党内自我批评，思想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充分传达到下层去。他和陈毅一起向中央局报告了会议情况。十九日，中央局致函江西省委，要他们努力抓住目前便利革命发展的优越条件，积极向外扩大革命战争，发展苏维埃区域，“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的上面”，“首先要努力在目前去取得一二个较大的城市，使苏区打成一片。”

中央局对各地贯彻党代会精神不力是不满意

的，为了督促检查，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任弼时和项英分头出席江西省和闽粤赣省党代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

三月初，攻打赣州的红军正在艰苦鏖战之际，任弼时来到闽粤赣省委所在地长汀，出席省第二次党代会。这次大会是在捷报声中召开的。二月末，红十二军及独立七师先战败入闽的粤军钟绍奎旅于武平，接着乘胜追击，粤军弃上杭而逃。红军攻克杭、武，拔掉了敌人在闽西的两个钉子，闽西苏区面积扩大，和中央苏区打通了联系，为向北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胜利的气氛中，任弼时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传达了全苏党代会决议。大会遵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将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由罗明担任代理书记。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任弼时又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中心议题，通过土地、劳动、军事、财政经济、苏维埃建设等决议后，选举成立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即工农民主政府）。在此前后，项英出席了中共江西省代表大会和江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两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加强对红色政权的领导，统一政令，推动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战争和发展苏

区建设等，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两省的大会，都根据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督促地方为夺取沿赣江两岸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积极配合。二十三日，任弼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福建省苏大会总结》一文，他写道：

“大会严厉指出，过去在闽西提出‘准备革命战争’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由于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在策略上缺少积极向外发展的精神，而是偏重防御和保守的形势……今后，福建苏区总的任务是巩固闽西，与江西苏区成为一片，积极向闽北发展，配合江西和其它苏区来争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④

任弼时在长汀期间，出狱不久的陈琼英转道香港，到达闽西苏区。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夫妇俩分手一年后重逢了。这一年，陈琼英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经受了考验。去年三月十二日，任弼时离开上海后的第七天，陈琼英在宝隆医院生下女儿远志。四月下旬，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返回时，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握有许多党的机密，他的叛变，将给党中央带来严重的后果。幸而隐蔽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秘密党员钱壮飞，连夜派人从南京送信给在上海

的党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的协助下，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闪电式地在当天晚上布置搬迁机关，转移干部，销毁文件，改变活动方式，切断一切和顾顺章有联系的住所和社会关系，在敌人还来不及下手前，作了周密安排，避免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又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因向忠发的出卖，产后刚满一百天的陈琼英，怀抱着女儿远志被捕入狱。陈琼英这样写道：

“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二、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越霞与她当时丈夫张纪恩^⑤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相识，后知道都是因向忠发被捕叛变才被捕的。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

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⑥

陈琮英告诉任弼时，她进苏区来之前，曾赴湖南一行，把不满周岁的女儿远志送到老家。当时，任弼时的二妹培星，已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十四岁的三妹培辰，在长沙周南女中读书，老家只有任弼时的老母亲和在娘家养病的大妹培月。培月是一九二四年离家到上海的，后来被送到苏联，在纱厂里做工。一九三一年七月，她和丈夫秦龙一起回到上海。不久，夫妇俩被捕入狱，遭受电刑折磨。秦龙牺牲了，培月精神失常了。这时，在长沙第一纱厂任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正来到上海购买原棉，公共租界的巡捕突然到他下榻的惠中旅馆，传讯他对证任培月的身份。任理卿严正地说：“要对证，除非把人带到旅馆来”。因为任理卿并非上海公共租界的居民，租界当局无权传讯，巡捕房只好照办。任理卿对巡捕说：“她是我的侄女，他父亲是个教书先生，她是个无辜女流，你们应当把她送回老家去”。^⑦当陈琮英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时，培月被释放后正在母亲身边养病。从此，陈琮英和女儿远志一别十五年，直到一九四六年，才

把女儿接到延安；但她和婆婆及培月姑，却成了永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是亲人重逢。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任弼时一家人遭受种种不幸，但当任弼时得知亲属们的情况后，毕竟感到释然。他对陈琮英说：“得知你被捕的消息，我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知道你一定会经受住考验的。”又说：“我们是革命夫妻，我们的爱情是融在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里的。”

福建省的两个大会闭幕后，任弼时偕陈琮英回到了红都瑞金。

任弼时曾经说道：党代大会前后，“‘左倾’路线我们的执行也不彻底，故苏区党代大会仍被上海中央批评为没有反对右倾。”^⑧这个事实发生在他从长汀回到瑞金后。四月四日，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洛甫执笔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文章洋洋二万余言，其中指责苏区中央局的达七八处之多，如：对苏联力量的不信任，对世界革命前途消极悲观，党代大会决议“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甚至连深入土地革命，肃清苏区的地主武装也都被指责，说什么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把巩

固革命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作”，表示出“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又指责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中心任务“放在脑后”，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等等，总之是“十足的机会主义”。阻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只有最坚决、无情的”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⑨这篇严厉声讨“右倾机会主义”的檄文，后来毛泽东称之谓：“为了打击全党不同意见，贯彻自己的路线而写的一篇向党内宣布全面战争的文章。”^⑩十天之后，临时中央又在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强调目前要“进行坚决的革命进攻，来扩大苏维埃区域”，甚至提出“一寸苏区不让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队蹂躏”。^⑪又过六天，临时中央给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再次批评：党代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大会前后，对“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等等。^⑫

临时中央紧锣密鼓的批评指斥，苏区中央局的同志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既感到有压力，又感到

不甚服气。党代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是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是任弼时起草的。《斗争》的长文和来电横加指责，他们只好委曲求全。

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临时中央的严厉指责下，苏区中央局所作的决议中，开宗明义说：中央指示“完全证明了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⑬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诚惶诚恐地作自我批评。这个决议，和五月十一日的决议相比较，具有更明确的针对性。

针对性之一，是进一步检讨“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划清了犯错误的时间界限。在思想路线上，苏区党代大会没有指出“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实际任务上，没有规定“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在军事上，没有以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常常束缚在分散筹款，分散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上”等等。^⑭“一箭双雕”，既是批评毛泽东，又是指责任弼时在党代大会上对

毛泽东的批评不得要领，没有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

针对性之二，是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三大基本任务（作战、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早在一月间中央局讨论打赣州时，毛泽东曾反对打这一仗，但多数同志坚决主张打，结果红三军团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不得不撤赣州之围。三月中江口会议上，毛继续批评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利用“一·二八”事变后抗日反蒋的新形势，红军先打通赣南、闽西两苏区，沿武夷山向赣东北发展，在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发展游击区，进而向浙西、皖南推进，声援上海军民的抗日爱国行动。这和临时中央所要求的迅速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以配合和响应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在平汉路两边及长江流域，包围武汉”是大相径庭的。所以江口会议决定，红军分东西两路，继续“夹江而下”，向北发展。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东路红军行动的毛泽东，说服一、五军团向闽西发展，攻下漳州，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

这一胜利不但没有唤醒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反而又加以指责。在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下，苏区中央局六月决议中检查道：这

是“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的“保守主义”，不但“影响到红军向外发展的行动，还不能达到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为了使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与其他苏区红军配合行动，在“全战线上的一致”，决议规定必须建立起“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⑮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强调集中正规化，反对游击主义，将三大基本任务取消，强调作战中心等，这些与泽东思想对立的。^⑯

中央局两次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均未参加。后来他说：六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煌煌大文，茅塞为之顿开。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中央局“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的立场上”的这些决议，他虽然大不以为然，但他心领神会地说：这原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⑰

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和中央局的这些决议，是后来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毛泽东的前奏和思想基础。用任弼时后来的话说，是为推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扫清道路”。^⑱

六月，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

国民党当局的策略是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企图得手后南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湘赣闽粤四省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则已从东西两翼进逼江西、福建苏区。红一、五军团奉命从福建回师赣南，准备与红三军团会合，首先解决入赣的粤军。七月上旬，红一、红五军团激战粤军陈济棠部于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周围，浈水河畔，迫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水口战役是一场恶战，红军虽然击溃敌二十个团，但损失很大。战斗结束后，一方面军决定在信丰、南雄边境休整十天，以师为单位筹款，准备七月底渡赣江继续北上作战。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到前方，后方的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

后方的中心工作是扩大红军，动员担架民夫，筹集战费，抽调干部开辟新区工作，以及优待红军战士家属等等，头绪繁多，时间又很紧迫。周恩来到前方后的第二天，任弼时即主持中央局会议，作出《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计划》，要求江西、福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在七八九三个月内扩大主力红军五万人。

这时，周恩来来电，催要八月份的军费，须在“二十八送到”，并补充两千多新兵。九月份的战费“最好再于八月二十号多筹十万现款”。七月二十三日，任弼时、项英等电复，八月份战费“二十九日才能达前方”，九月份连同加筹的十万元“尽可能于八月底筹达二十九万元之数”，至于派慰劳队、洗衣队、编印宣传品等，“照来电办理”。

这时，战场形势起了变化。当红军正在休整期间，粤赣方面国民党军乘机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密布于赣江流域，阻止红军北上。这样，从七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底，前方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对行动方针和前方作战的组织问题，通过电波和信件相互磋商。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中央局：“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建议“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再取吉安等城市。电报还提到“如敌人渡河决战更好”。之后，周恩来又函告中央局，“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关于前方组织问题，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军东路军、西路军的番号，受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周、毛、朱、王建议：“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

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①⑨}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能否执行中央的军事进攻路线是有怀疑的，建议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于是，周恩来七月二十九日给后方的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从组织上理顺关系对顺利指挥作战的重要性。他建议成立“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他深感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方便之至”，因为主持大计，则与中央局代表或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形成“宝塔式的指挥权”。如按后方建议由周兼任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挥”，所以他主张由毛泽东担任总政委，“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②⑩}这就有必要召开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八月初，任弼时赶到兴国，出席中央局会议。兴国会议讨论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作战指挥方面，决定按周恩来的建议，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以毛

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八月八日，部队整编结束，中革军委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一天下达了乐安、宜黄战役军事训令。聂荣臻回忆道：“乐安宜黄守敌为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共六个团。这股敌人离中央根据地最近，又比较弱，因而先消灭二十七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②①}

八月十六日，战斗打响。

从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红军在一周之内连克三城，全歼敌高树勋部，逼使江西和粤边敌人纷纷移防布置。前方的胜利进军，对后方工作提出了火速要求：一是苏区扩大，亟待巩固，南丰、黎川、南城、宜黄，广昌五县，须立即建立县委，配备干部，打扫战场，搜集战利品；二是亟须补充部队，增加担架；三是组织慰问等。其中特别是扩大红军，各地工作进展不尽人满意，因此任弼时接连督促各苏区，立即采取措施。九月，他先后在《实话》和《党的建设》上，发表三篇文章。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②②}一文中指出：红军自一月份以来的一系列胜利，是对国民党企图在六个月内完全“肃清”湘赣闽粤红军的“最具体最实际的回答”，强调红军应坚决执行“积极向外

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的策略”。在《为扩大与巩固工农红军而斗争》^②一文中，指出扩大红军是“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经常中心任务”，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充分领导和运用政府、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的力量，努力完成三个月内扩大红军主力一倍的任务。由于各地方扩红工作不平衡，任弼时认真研究以后，九月十日在《以布尔什维克的冲锋精神完成中央局扩大红军的决议》一文中，列举一些先进的典型，来推动工作。有的地方说“壮丁少”，完成任务难，任弼时写道：“兴国要算壮丁较少的县份，但他们的事实告诉我们（一月至四月扩大一三二九人）”；赣县、瑞金七月份扩大的红军有五分之一的工作人、雇农、苦力，“事实告诉我们，‘工人没有农民积极’是毫无根据的”。文章要求各地加倍努力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并规定：

“一、江西要在九月中完全完成三个月冲锋季扩大红军数目的全部；

二、闽西延长到十月底完成三个月计划的全部；

三、从江西的兴国、永丰、公略、万泰、赣县、瑞金、胜利等县和闽西的上杭县，征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特别要注意多调工人、雇农、苦

力到红军中去，加强党与无产阶级在红军中的领导。

“每一个党员团员要学苏联共产党员在国内战争时期那种英勇到前方去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要认识党员是阶级的先锋，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剧烈最高的形式。怕到前方去，怕牺牲，便不配称为阶级的先锋，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

“每一个到红军中去的党员团员，领导两个非党团员加入红军！”^{②①}

乐宜战役胜利后，南昌、抚州、樟树之敌大惊。蒋介石一面加紧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一面调胡宗南的第一师从河南入赣。这时中央苏区三面受敌：西面，陈诚、罗卓英、吴奇伟部向乐安、宜黄袭来；北面周浑源的第五师由贵溪进到抚州、崇仁两点；东面，敌弃守经营达二年的南丰，集中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三个师，坚守南城。南面则是苏区腹地。

红军如何应敌，在哪里摆战场？苏区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领导人，意见出现分歧。双方电文来往，各陈利弊，从八月底开始的一个月里，争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八月底到九月初。由于南城攻坚不易，

前方决定撤到南城至宜黄、至南丰两线，“工作几天”，待东来之敌“进至相当地点，即给以迎头痛击”。这是八月二十七日的布置。第二天，任弼时、顾作霖联名复电：“主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因敌集结很大兵力，三面并进，使我内弧幅员短小，转动将感困难而将造成困难作战”，认为主力“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前方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集中主力“由黄陂山道袭击乐宜之敌——陈诚的后尾”。但战场情况变化。九月初，东来之敌先后进击乐安、宜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遭敌袭击，损失较多。周恩来电告中央局：部队撤到宁都县的“小布、黄陂、砍柴岗、安福一带休息整顿六七天，恢复连日的过度疲劳，以便打击和消灭陈、吴主力”。

九月七日，任弼时、顾作霖联名复电，总的精神是不同意休整待敌，而是“应机动的以秘密迅速行动，袭击取永丰”，向西调动敌人。特别是对撤退到宁都县青塘一带待敌的部署，批评是“不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样敌必南下广昌，向苏区中心进攻，使苏区的中心地带“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但国民党军此时对中央苏区仍取守势，故恢复乐安、宜黄的据点后，没有向南攻苏区腹地，反而将伸出东陂、黄陂、新丰的队伍撤离。这样，周恩来

电告中央局，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任弼时等也不再坚持。

第二次是九月下旬。这时，湘鄂西、鄂豫皖苏区红军连战失利。九月初，湘鄂西的红三军忠实执行“左”的军事路线，兵分两路，以“两个拳头打人”，国民党军乘虚进入中心苏区，红军不得不放弃洪湖根据地。九月中旬，鄂豫皖苏区也传来不幸消息：张国焘先是骄傲轻敌，称蒋军为“不堪一击”的“偏师”，强令红四军团南下威胁武汉，及至遭国民党军三面包围后，又惊惶失措，向临时中央告急，“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眼看不到一个月内，丢掉了两块根据地，中央局因而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向北出击，给鄂豫皖、湘鄂西红军以直接援助。但是，前方同志认为目前“不利于马上作战”，而“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并认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⑤

后方中央局的成员没有理解前方的合理意见，而又急于挽救鄂豫皖和湘鄂西红军摆脱困境，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明确表示：“不同意”分兵赤化南

丰河地区的布置，认为“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与鄂豫皖，湘鄂西红军“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指出“主力红军休息整理已将三星期，体力疲劳当已恢复”，可“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倘有困难，也应从南丰、黎川之间突出，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那才为左翼之胜利”。^{②6}前方考虑“再四”，认为攻乐安“不易得手”；佯攻南城，“无法打增援部队”；强攻宜黄，倘敌情不确，“虚耗时日”，因此，坚持原方案，即赤化南丰河地区，准备战场。电报最后提出：“无论中局同意哪一种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以确定行动方针，要后方中央局同志三十日赶到。^{②7}

后方的同志也坚持原方案，认为“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危险”，无论如何，“我军均应向北移动，靠近边区，以保有迅速出击”。^{②8}当时，项英、邓发在闽西参加会议，前方要求即刻开中央局成员“全体都到”的会议，客观上是有困难的。

双方各执己见，分歧如此尖锐。九月二十六日，前方再次提出，“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

论解决”，要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开会，“日期在十月十日以前为妥”。同一天，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决定“以十天为一期”，在南丰河两岸地区做赤化工作，准备战场。

正在这个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发来的“中央局转”周、毛、朱、王的急电，来电说：

“蒋由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机动。望即定军事行动计划，电告中央。”

这是湘鄂西、鄂豫皖两块根据地丢失后，中央苏区面临的紧急形势。这样，在中央局的任弼时和顾作霖鉴于情况紧急，如等到十月十日前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将贻误军情，便在九月二十七日二十时，致电周、毛、朱、王：

“……项、邓两同志要一号才能回瑞，为使会议迅速举行，讨论中央指示信及前方问题，我们提议恩来同志即回瑞开会，前方有毛、朱、王同志主持，无甚妨碍。若将来到前方开会，路程过远，费时太多，对工作影响甚大”。

当后方的同志收到一方面军下达的赤化南丰河地区的《训令》时，焦急、不满和责备之情交加：焦

急的是怕贻误时机造成损失；不满的是在双方意见很不一致时，前方发布了《训令》，于是就复电责备。这时，项英、邓发已回到瑞金，二十九日十一时，中央局给周、毛、朱、王的复电说：

“……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恩来同志可不来瑞，如已起程，望派人追回前方，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我们四人并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出发，星夜兼程”。

第二天下午，任弼时等一行五人，从瑞金出发向北赶路，预计十月二日晚可到前方。同行的刘伯承是周恩来二十四日来信要求他到前方协助工作的。这时中秋节已过，他们日夜兼程，日落以后，秋风飒飒，凉意袭人，但马不停蹄。临走之前，中央局特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周、毛、朱、王当天即向临时中央报告：“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赣、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②9}

如果说，中央局二十九日给前方的电中有点急不择言，那么十月一日在北行途中给前方的电中态度有些和缓，虽然仍不同意《训令》的布置，提出要

“待中央局全体会议后决定”，但是，如果方面军能“以最大决心”袭击地处乐安、南城、南丰、招携中心的宜黄，“并继续在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则是可以开展极好的局面”，那么，“我们昨日的急电所指出：如已出动白区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的指示是机械而有可能演成错误的”，要前方“根据情形作具体决定”。这表明后方的同志态度开始冷静，有条件地修正自己的意见。电中并告：任弼时等将于十月二日向东韶前进，请前方派人在东韶接应。

这就是宁都会议前夕，中央局内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十月初，任弼时等赶到宁都前线出席中央局全体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订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是接到临时中央急电之后，前后方同志都感到“急要”的内容。如果说，在这以前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还没有发展到公开斗争的程度，那么宁都会议上，却展开了一场“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③④}任弼时等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

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③①}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毛泽东自第三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抵制和反对“进攻路线”的所谓错误，如主张必要的休整反对连续的进攻；主张打“土围子”巩固苏区，反对不顾主观力量的向外发展；反对打赣南重镇赣州和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直到赤化南丰河地区、诱敌深入的《训令》，甚至连漳州战役的胜利，也被指责为“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③②}

周恩来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会议“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但是“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勤、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③③}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联名向临时中央的报告中则写道：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

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③4}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压倒多数的气氛下，后方的同志提出召回毛泽东。周恩来鉴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积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于是，他向会议提出两个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③5}任弼时等后方同志认为“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且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同时，周恩来也曾经在致中央局的信中反映：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尤令人无所适从”等。^{③6}因此会上有召毛回后方的提议。当周恩来提出留毛在前方，或“助理”或负指挥“全责”的两个方案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第一种方案。^{③7}毛泽东因

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也坚决不赞成周的第二方案。会议批准毛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

十月十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央局：要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③⑧}十二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二十六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在王明路线的统治下，在错综复杂的因素交汇下，宁都会议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铸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但是，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③⑨}

历史是公正的。真理决不因一时的蒙尘而掩盖它的光芒，而真诚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错误，也必然会在历史的检验之后，服从真理。对于宁都会议上的历史性错误，任弼时后来不止一次地进行自我批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延安整风时，他这样说：

“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

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致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⑩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言中，任弼时又检讨说：

“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⑪

十七、湘赣纵横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旬，任弼时调离苏区中央局，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同年十二月，接替蔡会文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他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①

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四个月后发生的事。

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留在上海，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组织屡遭破坏，处境日益险恶，在上海难于立足，一九三二年冬不得不分批迁入江西苏区。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抵达瑞金。他们一到，立即把党政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先是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约六月间，改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是博古。周恩来的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的副书记职务就不存在了。因为三月间要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暂时还保留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五月八日，又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行主席的职权；在前方另成立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军事行动完全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中央局在二月八日下达的指示中，不顾客观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在人口约一千万的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②并采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恶劣手段，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罗明是闽粤赣省委（也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闽西的主力红十二军和独立师被调到江西作战，主力一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乘机占领龙岩、上杭和永定的部分地区，情况十分严重。这时，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和正在养伤的罗明进

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认为毗连中央苏区的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漳州和龙岩的敌军，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省委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派罗明为全权代表深入闽西地区发动游击战争，省委机关工作由刘晓代理。博古等途经闽西时，得知这个情况后，颇为反感。中央猛烈扩大红军的任务下达后，因为时间紧，任务重，罗明不得不将上杭、永定、龙岩的地方武装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这一来，地方武装力量削弱了，群众情绪颇为不安。在敌人几个团的进攻下，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被逼撤离。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防止龙岩的敌人进攻连城，并积极与红军主力配合行动，消灭北面的敌人。罗明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是不好；在作战方面，“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应当说，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有益的。但罗明的报告也有一些不恰当的措词，比如他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

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③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的不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罗明的《意见书》断章取义地严加指责。二月十五日，中央局作出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对形势估计“悲观失望”，对敌人进攻“张惶失措”，而赤化汀、连、泉地区是对抗进攻路线，向后方“逃跑退却”等等，^④决定立即撤销罗明的职务，调回瑞金，轮番批斗。二十八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做法是不满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

“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⑤

在任弼时的“抗议”下，中央局在《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中，行文上确实有所区别，决议写道：“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

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刘晓等“省委大多数”同志则对罗明有“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紧接着指责说，他们“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因而也“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⑥

博古在向红军学校毕业生的报告中，含沙射影地指责说，对罗明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的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⑦

在中央局指责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前四天，对湘赣省委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斥责他们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书记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下令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的书记职务，任命从湘赣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为省委书记。^⑧三月底，又批判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五月六日，李维汉（罗迈）在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上说，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组织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⑨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半月内，接

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三个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用任弼时的话说：这种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⑩

恰恰在博古等人大耍威风的时候，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文章指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

“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

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是的。但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

“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⑪

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进攻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

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这是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这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任弼时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就为博古等人所不容。四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了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由李维汉接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后来张闻天曾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⑫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任弼时偕陈琼英离开瑞金，在部队护送下奔赴湘赣苏区，同行的有到瑞金来汇报工作的刘士杰和中革军委的工作人员江文。江是刚从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回总部的，任弼时此行，中央特配备无线电台一部，一路上，江就发报和中共湘赣省委保持联系。

任弼时一行，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出根据地，进游击区，在秘密交通带领下，走了十多天，才到赣江边。这时，赣江水流湍急，江面辽阔，北自新淦南至赣州沿江一带的县城全部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占据，他们江防严密，日夜派兵巡逻。任弼时等一面发电和省委联系，一面在江东岸隐蔽待渡。约莫等了

两三天，在一个晚上，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萧克和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委王震率部队到赣江西岸万安县城以北十多里的潞田渡口，先清理了敌人的碉堡，然后举火为号向江东联络。任弼时等便趁夜黑坐小船横渡赣江，安然到达湘赣苏区。萧克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六月十一日。^⑬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一水之隔，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在这一带首创了农村根据地，创造了一套包括建党、建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九三一年七月，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去湘赣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央局与他们谈了话，交待了政策，近两年来，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了土地，建立了主力红八军，扩大了地方武装，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二次党代大会时，根据地扩大到十一个县和一个中心县委，面积纵九百四十多华里，横一千零七十多华里，人口八十九万；全省有党员三万，团员二万多，武装力量一万三千七百多人，其中主力红八军辖三个师五千多人。

任弼时走马上任之日，根据地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一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湘粤赣地区的国民党军八万多人包围湘赣。为了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红八军奉命北上袁水地区牵制敌人，根据地内主要靠地方武装应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东面的安福，西面的宁冈、莲花和南面的上犹、崇义地区先后落入敌手。在任弼时到达前两个月，湘军王东原、陈光中竟直插苏区占领省委所在地永新的禾川镇，直到红八军赶来后被迫撤离；五月，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棠市两战告捷，虽然扭转了局面，但原有的根据地未能全部恢复，因此临时中央一再责备省委和省军区是“退却逃跑”，“处处是防御路线”，“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

二是在政治上，一九三〇年冬，“富田事变”后，湘赣地区大抓 AB 团，扩大化严重。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最初执行得比较坚决，后来，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捉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把一批省委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当地干部，也当作 AB 团分子；把两批工人纠察队统通打成 AB 团，省委开始怀疑，曾经批评了刘士杰；特别是国家保卫部下令把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当作 AB 团逮捕，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和甘泗淇等一致认为袁是安源工人，是和他们一起开辟湘赣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不同意逮捕，于是就派刘士杰到中央去汇报。博古等人听了刘士

杰的口头汇报后，未经核查便责备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即宣布改组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撤王首道、张启龙的职务，立即派国家保卫局的吴德峰和原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洪时和方维夏三人到湘赣改组省委，指定刘士杰、陈洪时、张子意等八人为常委，二十四岁的刘士杰就一跃而为湘赣省委书记。后来因为受到湘赣的干部反对，加上刘士杰不懂军事，这才改派任弼时为书记。吴德峰和陈洪时等到湘赣后，再一次掀起抓 AB 团的高潮，同时大反“罗明路线”。任弼时到湘赣时，袁德生已经被关在保卫局，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已被宣布为“湘赣罗明路线”的代表，一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机关所在地永新城里人心惶惶，保卫局里押着许多“反革命”案犯，嫌疑犯的名单中，包括省军区代理总指挥王震，政治委员甘泗淇，参谋长杨茂，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和独立一师政委陈韶等，气氛极为森严。

三是经济上极度困难，敌人长期封锁，群众连盐都吃不上，只得以硝代盐，省委书记任弼时，每月供给四两盐巴，这是很大的照顾了。战士们一天八分钱的伙食费都没有保障，成天行军作战，烂脚的、患疟疾的很多，离队不归的战士全省达三千余人。

千头万绪，等待着新上任的省委书记来处理。

任弼时对刘士杰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后来他评价道：刘“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有些小聪明，是“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从瑞金回湘赣后，担任省委副书记，“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有钦差大臣的味道”。打击王首道与张启龙“夹杂有刘士杰的个人报复主义”。到湘赣不久，任弼时发现他“好吃懒做”，因为和陈洪时有矛盾，就不择手段，在陈的恋爱对象、省苏维埃副主席李端娥身上作文章，说陈洪时和李端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说李在查田运动中贪污金子，逼得李端娥寻了短见。在没有认清刘士杰的本质以前，任弼时在工作上对他是信任的，“但还未完全任其发展”。^①后来，刘士杰和陈洪时先后叛变，因此任弼时称他们是“投机分子”。对于在湘赣一年的政治路线，任弼时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虽然在执行中“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②这是切合实际的估量。

六月中，任弼时出席省委原定的总结会议，会上代理书记陈洪时作了红五月工作总结，陈洪时在报告中继续打击王首道和张启龙，“无情的揭发”于兆

龙为首的所谓“湘赣罗明路线”，责令张启龙、于兆龙要“再向党写申明书”，而且要在党报上公开揭发。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战争动员工作和扩大红军，要求八月份内主力扩大到七千人，七月中以前，将各县的赤卫军、模范师按团营连编制完毕，“八一”以县为单位检阅。对肃反工作，他指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根据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已经逮捕的犯人”，抓紧结案工作。对查田运动，则提出要反对在农民中查五代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注意对中农的巩固联盟”。^⑮为此，省委建立了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对已受撤职处分的张启龙，当时许多干部对这种处分愤愤不平，经王震等提议，任弼时分配张去做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工作。

但是，刘士杰却不肯罢休。一次，趁任弼时在前方部队的机会，刘士杰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严重警告处分，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在报上写文章称他们是“反革命”，接着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张启龙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入保卫局。甘泗淇为此赶到前方，报告任弼时。任弼时赶回禾川镇，对刘士杰说：“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能当反革命对待。”接着他亲自到保卫局，放出张启龙，对他说：“把你判到保卫

局是错误的”。后来，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名义电示省苏维埃，说判张启龙一年零两个月徒刑不为轻。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去问任弼时，任说：“是说判重了。”^{①⑦}

王首道受打击后，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做基层工作，任弼时对他也十分关怀。王首道回忆道：

“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琼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上的关怀，内心确实感到十分温暖。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①⑧}

六月中，蒋介石亲揽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指挥大权，坐镇南昌策划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六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在单一的战略意旨之下”，迅速地给河西的湘敌以打击，然后北上作战。六月十八日，湘赣的红八军首先改编为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为师长，蔡会文为政委，李朴为政治

部主任，辖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

七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反“围剿”的准备情况：省委决定十七师准备与湘鄂赣的第十八师会合，伸出到萍乡、莲花、攸县、醴陵之间调动敌人决战。八月组建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加入主力红军；并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师，以便十七师北上后在根据地内作战。发行公债二十万元，并准备召开全省区以上的土地部长会议，抓紧在新区分配土地，老区纠正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的错误；开办党校，训练新干部，筹备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大会等等。二十九日，省委发布《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第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在全省群众中进行战争动员。

党代会前后，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在查田、肃反、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

在查田运动方面：八月十四日，省委专门作出决议，指出过去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不了解党对查田运动的策略”，有时“侵犯中农利益，形成反中农倾向”，以致发生中农逃走的现象。《决议》重申要“依靠雇农贫农巩固与中农的亲密的联盟，加强雇农及农村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应把地主与

富农分开”，区别对待，“一切消灭富农的过早方法（如查出了富农马上捉起来或没收他的全部财产等，同对地主一样处置）都不容许发生”；“中农在过去分田时特别分了弱田的，也应补好田给他们”。^{①⑨}十天后，省委在《怎样进行查田运动》的文件中，又明确规定，如发生将富裕中农当作富农处理的，“应当立即纠正，并向中农说明这一错误”，指出有些地方在农民中查三代五代阶级成分的办法“是非常错误的”，“必须〔然〕要侵犯到中农甚至贫农雇农的利益”；“不管在革命前二十年、十年前是地主或是富农，（如）他已经破产，到革命前已经完全是中农贫农的地位，就应当按中农贫农的地位来判定阶级成分”。^{②⑩}

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保障战争费用，改善群众生活，省委召开了经济建设会议，决定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对内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运动。指出经济建设工作是“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必须与扩红、查田、选举等工作密切联系，那种认为“我们工作中心已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了，或者以为经济建设工作不是目前革命战争环境中的事，而是革命成功后的和平事业，或者认为经济建设只有中心区域能进行，边区地方无法进行的”等等观念都是错误的。^{②⑪}会议决定增发革命公债

二十万元，扩大合作社股金十万元；查田运动中筹款四十万元作为建设资金；征调训练干部二百名充实财政和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吉安、安福、茶陵、萍乡等地设贸易局及采办处，向白区采办必需的货物，首先是食盐，并将苏区的土特产品销到白区去。一时，苏区内合作社、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迅速恢复起来。之后，又提出要“纠正和防止在经济斗争中一切‘左’的错误”，“吸引白区商人、资本家投资，来开发苏区的生产”，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颁布的税则完纳国税的私人资本，应吸引与允许其在苏区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反对经济政策中一切过早的企图”。^{②②}

在肃反斗争方面：任弼时主持起草的党代大会《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在目前反“围剿”战争紧张的环境中，“应当防止一切对肃反工作的消极与优容姑息和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同时要“反对一切夸大反革命力量和重复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盲动的错误”。^{②③}在《肃反问题决议草案》中，又指出，过去肃反工作中，由于“缺乏详细的分析与估计，忽而乱捉乱杀，忽而容忍放纵”，以致“造成群众的恐怖，同志间猜疑，抑制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使同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因此要防止“对反革命力量的扩大或忽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深自〔入〕警惕过去肃反

工作错误的重复产生”。^{②4}

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关心周围群众的生活，纠正过去认为群众生活是乡政府和合作社的事的错误观念，协助解决群众生活需要的食盐和粮食。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使每个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有初步的认识。要为“发展一倍新党员而斗争”，边区和新区更应扩大党的队伍，克服关门主义，纠正共青团员必须满二十三岁才能入党的限制。在执行党的纪律时，反对惩办主义，纠正不重视教育而“一批一批撤销”的打击政策，或者只顾阶级成分，“把个别社会出身是地主富农而忠实于党、坚决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党员无条件洗刷〔的〕‘左’的错误”，“彻底铲除”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监视、罚做苦工、坐禁闭等“惩办与非党纪律”的办法。^{②5}

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敢于有针对性的提出这些问题，并且以党的代表大会和省委等名义形成决议，作出规定，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来自临时中央的错误政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出席大会的代表二百十三人，会期十天。由任弼时主持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分析了形势，系统地提出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肃反和党的建设等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决

议在说到目前党内“主要是右倾的危险”的同时，强调“一切‘左’的倾向，如轻视敌人的进攻而放松动员工作，消灭富农与侵犯中农利益倾向等，同样是危害苏维埃的巩固与战争的动员，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任何一种不正确倾向的存在，都会削弱革命的力量；只有不调和的斗争，肃清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求得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才能保障目前各种战斗任务的彻底完成”。^{②⑥}

十一月三十日，大会选出新的省委执行委员二十三人，候补六人；监察委员五人，候补二人。任弼时、刘士杰、张子意、尹仁桂、谭余保、曾竹山、邹德虎和旷进媛九人为省委常委，任弼时为书记，刘士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子意为宣传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

党代大会之后，接着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

党代大会和苏代大会后，省委派张子意到中央局去汇报。博古等人非常不满意。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中央局给省委的《指示信》中严重指责：大会“没有能够正确的完成它的任务”，以任弼时为主任的“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和大会的政治讨论”，是“敷衍”的，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是“空洞肤浅的老套

和洋八股”，应当“立刻抛弃”，责令“省委本身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作出“新的个别工作的决议”，《指示信》虽然没有直接点任弼时的名，但是一再责令“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实质是要在全省范围公开批评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

为什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对湘赣新省委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呢？其原因正如《指示信》所称“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大会只是“对付王首道、甘泗淇那几只‘死老虎’”，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党大会写决议”；二是在军事上没有反对中央局早已指出的“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没有把以“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相反的却继续和掩盖了这一错误”。由此“证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着“保守主义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指示信》咄咄逼人地声称：要“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这时，任弼时政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央局声色俱厉的指责中提到的事实并非都是无中生有的，任弼时对王首道、张启龙的保护是确实的，被博古等人称为“死老虎”的甘泗淇，在撤销军区政治委

员职务后，任弼时仍然让他担任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十月，甘泗淇主持召开全省经济建设会议，第三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甘又任经济建设委员会和日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在任弼时心目中对已经接受批评的同志应该继续让他们为革命事业作贡献；就是在中央《指示信》后，当红十八师政委王震出席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任弼时致电朱德总司令，以甘泗淇为代政委。

至于蔡会文，尽管中革军委指责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不执行军委给予的战斗任务”，但任弼时到湘赣后，蔡继续担任湘赣省军区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红十七师成立时，军委又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五月，在升塘、九渡冲、棠市战斗中连战告捷，朱德、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在嘉奖电中称：“你们在积极进攻路线下，以百战百胜的英勇，连续消灭敌人，活捉敌人团长来纪念五卅，这表现了你们底英勇与光荣”。因此，任弼时在党代大会决议中肯定“红军主力自五月来获得了四次胜利”，结束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仗没有打好，并非都是蔡会文个人的责任，首先和军委的错误指导有直接关系。当时，湘军五个师在莲花、宁冈、攸县、茶陵一带推行蒋介石的“新战略”，即《剿匪手本》所说的“以守为主，以攻为客”，“多筑

据点，勤修碉堡，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并且准备“持久作战”，避免和红军打运动战。中革军委并没有提出适应新情况的战略战术，反而要求红十七师在永新、宁冈、莲花、茶陵间机动，规定九月份内消灭进攻湘赣之敌。^{②7}这样十七师便执行军委指示，在敌人的碉堡丛中强攻。八月二十日，四十九团强攻雪花坳的湘军彭位仁师两个营，未克，死伤二百余人；蔡会文建议“不应与强敌死抗”，被中革军委批评为严重右倾，之后，奔突于宁冈和萍乡、醴陵、莲花、茶陵之间，分散兵力，强攻敌堡，均未得手。这时，军委来电，要省委加强对省军区的领导，并由任弼时替代蔡会文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八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复电说：“……因军区事务繁多，省委工作亦很多，我近来体质更弱，在身体上很难兼顾，我意会文在前方时，仍由洪时代理政委”。^{②8}

党代大会后不久，蔡会文因不满于军委的批评，于十二月十日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请求调回军委“另分配”，^{②9}这是他第三次请求调动工作。这样，军区政治委员才由任弼时接任。任弼时后来说，“我对他的结论并没提及他是罗明路线，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萧劲光差不多”。^{③0}任弼时因不满意博古等人的打击政策，因而他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的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这一切或见

于文电，或形成决议，丝毫没有“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相反，是光明磊落的对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抵制。尽管博古等人倚仗权力，一再给任弼时以打击，但在湘赣的广大干部中，他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则说：任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③①}

随着历史的推移，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的认识统一于毛泽东思想，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说：“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指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仍自我批评道：“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③②}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二十二日，接着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③，会后在军事上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而转向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重申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④，任凭蒋介石派重兵“讨伐”，其结果是“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⑤

任弼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将“讨伐”福建人民政府的兵力调回江西，集中力量围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于是命令湘赣的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破坏南昌至九江的铁路交通大动脉，钳制国民党军。一月二十六日，红十七师离开湘赣根据地北上，留在湘赣的红军主力实际只有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和茶陵独立团（后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湘军便乘机攻占湘赣苏区的西大门梅花山，向省委所在地永新推进。二月十八日，

永新被占领。湘军占永新后，立即筑碉堡，修公路，企图打通永新至宁冈的交通线，莲花、安福、永阳各路国民党军分头推进，紧缩分割根据地。省委、省政府机关被逼迁到永新西北角，在象形、黄冈、花溪一带活动，局势十分紧急。至三月二十一日，萧克率领的红十七师在白区转战二千五百里，历时五十四天，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但因为“左”倾军事路线指导错误，使部队损失近半，回到湘赣时，根据地正处于危难之际。

三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出席全苏大会的王震传达大会情况和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尽管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毛泽东却对王震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毛泽东告诫王震道：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③⑥}讨论过程中，陈洪时主张按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同志鉴于十七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同志认为：占领永新之故，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我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同志，批评

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于是立即布置严密侦察周围敌人的动向。

在临战之前，任弼时重视敌情侦察，重视电台工作。到湘赣后，他曾交代电台的政委江文，研究破译敌方的密码。他经常和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破译密码的规律。他说，抄收到敌台的电码后，先要把抬头和落款弄清楚，然后根据当前敌人的动向，琢磨电文，一步一步地破译。对敌军中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他亲自和他们谈话，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在红军中服务，让他们一起参加破译敌方的密码，渐渐地掌握了一套破译的技术。为了寻找打运动中之敌的机会，电台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一天，电台破译了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和军长刘建绪的来往电报。王东原发报：东原所部疲惫已极，建制残缺不全，需要整编。刘建绪电复：令彭位仁带一师人枪由茶陵去永新接王东原防务，王东原部最近返回茶陵。^{⑤7}四月四日，永新地下党也派人送来情报，说王东原正在筹粮抓夫，准备五日出动，途经沙市。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对上了号，任弼时立即请萧克作出兵力部署。

沙市距永新城西四十五华里，南临禾水，北倚丛山，中间一条乡村大道，自澧田至沙市东西十五华里

地段，地形两头小中间大，状如口袋，是打伏击战的理想阵地。萧克将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三个团的主力部署在沙市、澧田一带待机。四月五日上午十时，王东原部成一路纵队进入“口袋”，前卫到达沙市东面时，红军全面出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一时许，全歼王东原部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俘一千余人，缴步枪二千余枝。这是赣江以西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四月中，又在安福、莲花间的利田，打垮了湘军六十二师的王哨瑛旅。这样，湘赣苏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是湘赣苏区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场的危机，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

这时，中央苏区战情告急。四月下半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分六路实行全面的堡垒推进。军事顾问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御”，“短促突击”，指示红六军团采取同样的方针，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平坝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七月，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先后失利，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省委和后方机关转移到牛田地区，红六军团被八个师的敌人压迫在牛田和津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国民党军准备将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集中永新，第十五师集中宁冈，协同作战，配合东线、南线之敌，与红六军团决战，最后企图用

飞机、大炮、瓦斯来消灭红军。红六军团已处敌严密包围中，西面是高山，不能发展和运动队伍，东面、北面，敌军筑碉推进，很难突破，如向东南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出路何在呢？

七月初，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行动方案。会上有两个意见：一是上井冈山，坚持在原地区打游击，任命王震为省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域，并派红十七师的四十九团和由李贞率领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开赴井冈山，恢复根据地，凭山险坚持。二是突出重围，向基本苏区的东南地区转移，准备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三月初，省委派出独立四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七月初，独立四团的第一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三县的十个区二十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有农会会员一万人以上，党员五百多人，并在郴县的五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正在分配土地，“群众斗争情绪很好”，独立四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三百余人增加到六百七十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三个支队，“另有繁殖游击队八个共二百六十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③⑧}

七月五日，任弼时和王震召集红十七、十八两个

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由任弼时向大家作关于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他强调说：这一转移不是失败与退却逃跑，要反对一切悲观与动摇。七月八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并请示“行动方针”。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临危不惧，未雨绸缪，这是完全应该的。

牛田墟是一个集镇，省委机关住在万寿宫的祠堂里。

七月二十三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指定由任弼时亲译。龙舒林协助任弼时译电。这是从军委电台发来的一个训令，要求红六军团往西向湘中发展。它开头便说：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游击队，应无例外的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捍卫苏区。

“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

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一切准备工作统限于八月中进行完毕”。^{③⑨}

龙舒林回忆道：“弼时同志看后，非常沉着，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我是兼搞统计工作的，他便问我：地方有多少人？我回答后，他又问，你是走还是留呀？我说跟主力走。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④⑩}

龙舒林的观察是对的。但是，受李德控制的中革军委，对下级的预见不但不加肯定，反而加以责备，在来电中认为任弼时原来在牛田会议上提出向基本苏区东南转移的意见，可使敌人了解我军企图而加紧封锁，因而给任弼时以“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央的训令，任弼时立即召开省委会和全军政工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中央来电指出：敌正在加紧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和包围，特别是加强其西边的封锁，阻止红六军团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质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指出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去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

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作战，并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会后，即进行紧张的组织工作：调整机关，缩减和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发动部队备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全军日夜不停地加紧准备，到七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中央汇报情况：十七师、十八师现有六千八百三十人，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至八月十五日，全军可补充至九千三百三十人，枪三千七百五十二枝；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二百五十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不能行动的重伤员三百五十人，分散隐蔽于永新东南山区；被服、修械、制弹三厂，人员三百三十，随军二百四十人，重材分散埋藏；全省现有苏区人口十三万，党员一万一千四百余人，莲花、安福、萍乡三县委合并，永新、吉安、吉水为中心县委，新峡、清宜两县合并，遂万泰新老苏区分成两县，各县干部无调动。现任省委常委决定以陈洪时、旷光明

(原宣传部部长)、谭余保(省苏维埃主席)、姚厚德(工会)、旷逸爱(原妇委)、张云逸等组成临时省委，中央指定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定八月半召开扩大会，补选省委委员。^⑪

正是因为任弼时对部队转移预为准备，所以能在中央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比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使突围的行动在时间上争得了主动。而在这期间，任弼时是忍受着“严重警告”的处分工作的。八月一日，他致电中央，说明牛田会议上讨论的并不是向西面突围的情况，“望加考虑”。^⑫

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正是三伏天气，罗霄山区，时而烈日当空，酷暑逼人，时而大雨倾盆，道路泥泞。下午三时，在严格的保密下，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九千多子弟兵，告别了长期哺育红军的湘赣人民，离开了无数先烈以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根据地，踏上新的征途；等待着他们的是强敌的围、追、堵、截，是山川的险阻，是无后方的长途跋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八、先遣长征

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用任弼时的话说“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调集了一百万兵力，企图用“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与红军决战。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占了统治地位，面对强敌，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造成这个错误和博古等对从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特殊信任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首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巴伐利亚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上海活动，化名李德，笔名华夫。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一个月进入中央

苏区，任中革军委的顾问。李德本来就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又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经验，到中央苏区后便实际上担负起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强敌面前，他采取单纯防御，推行“短促突击”、“以碉堡对碉堡”的所谓“新的军事方针”；他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在作风上独断专行，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因此，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屡战失利，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会战失败，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撤离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样危害着湘赣苏区的作战，除了将湘赣红军的主力第十七师长期调离苏区作战外，湘赣省委也在金华山、松山地区执行了两个月的阵地保卫战。后来任弼时说：“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他实事求是地说，“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因为省委本身也想保卫永新平坝子，在那里坚持一下。^①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向湘赣省委和省军区下达突围转移的《训令》之前半个月，七月上旬，中央已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以期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部分国民党军。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则说：“当时

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②

趾高气扬的蒋介石，发现红军的战略意图后曾对他的幕僚们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湘鄂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杀气腾腾地说，“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③但是，英勇的红军居然能突出重围，转战二万五千里，成为后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红六军团如何确定西征突围的路线呢？中央的训令规定，第一步是由永新以南的黄坳、上下七地域转移到湖南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络，“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④中央的根本目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转移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出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突围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根据地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但是《训令》没有将这

个目的全部告诉任弼时等。

六军团领导慎密研究后，认为训令规定的突围方向沿途山大路险，不便运动，容易遭到驻宁冈的湘军第十五师的堵截和驻永新的第十六师、六十二师的追击，而且会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行动意图，因此确定主力先向南移动，然后日夜兼程向西南急进，一鼓作气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这个行动方案的依据是：南面是湘军和粤军的结合部，敌人虽设有四道封锁线，但在这一带守防的都是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兵力较弱，其间空隙较大，便于红军迅速行动，同时也不致过早向敌人暴露战略意图。

八月初，任弼时等发现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何键的西路军从永新、宁冈向南推进，南昌行营又令驻南康的粤军向北“与西路军联络出击”，企图南北合围与红六军团决战。兵贵神速。必要的退却转移，愈有准备，愈机密，愈神速，对于保存力量待机反攻愈加有利。为了在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突出重围，任弼时等一面向中革军委建议提前于八月上旬行动，一面将主力推进到遂川县的横石、新江口一带隐蔽待命。

经中央批准后，六军团领导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令湘赣军区独立第一、二、三团在北面游击钳制敌人，独立第五团佯装主力继续在牛田、津洞一带活

动，一部渗入赣江沿岸的万安一带作东渡赣江的姿态，迷惑敌人。八月五日，主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攻占遂川县的衙前，建立突围的翼侧阵地。

八月七日下午三时，任弼时率领全军，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冒着三伏天的酷暑，秘密而神速地从横石新江口出动，当晚占遂川县的藻林，歼灭守敌，突破了衙前至横石，遂川至黄坳、至七岭的三道封锁，这时湘军尾追，粤敌北上，企图包围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的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六军团日夜兼程，大踏步前进，九日占左安，又突破了寒口至广东桥的第四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内层封锁线。

任弼时随军西征时，陈琮英分娩后不到半年，当时她任六军团的机要局长，为了行军方便，不得不将襁褓中的孩子“湘赣”寄养在当地群众家里。后来几经寻找，至今没有下落。

八月十一日，当蒋介石命令何键和余汉谋在汝城、沙田、遂川、上犹直至赣州一带赶筑碉堡“以便包围”时，任弼时等率领的西征队伍已安然到达湖南桂东县의寨前圩，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则奉命占领南面的沙田。十二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的初步胜利，誓师西征。任弼时以中央随军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公开宣布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名单。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最高领导机

关，由任弼时和萧克、王震三人组成，任为主席。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参谋长李达，下辖第十七、十八两师。十七师辖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师长萧克（兼），政治委员王震（兼）；十八师辖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三个团，师长龙云，政治委员甘泗淇。当天，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寨前至沙田敌碉堡二十余座已为五十三团全部占领，大部破坏。措手不及的国民党军根据上峰急令赶筑碉堡，已是“临渴掘井，缓不济急”。^⑤

红六军团入湘后，湘、桂军阀大为震动。首当其冲的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因为红六军团既入湘南藩篱，湘南平原已无险可守，只有湘江天险可以设防。他急令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驰赴湘南积极设防堵御”。刘建绪赶到衡阳，一面命十五、十六两师尾追，一面令第十九师一个旅，保安部队四个团，企图在北上的粤军配合下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汝城、桂东之间。广西军阀生怕红军进入桂境，即派两个师向北部边界调动。这一来，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的计划在湘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任弼时等当机立断，准备趁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强行军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进军。

誓师大会结束后，任弼时等当晚率师西进，经汝城、资兴，越过郴宜公路，进入桂阳，二十日打下新田后休息一日，继续西进，二十三日子夜，已到达湘江东岸零陵北面的蔡家埠一带。

这时，红六军团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一是横在面前的浩浩湘江，自南而北，江面宽达六百公尺，连日降雨，江水暴涨，不能徒涉；二是红军的铁脚板毕竟不如敌人的汽车，这时，湘江西岸已有湘军的八个团、桂军的一个团先期到达，在归阳至零陵地区展开，所有船只均被扣留在西岸；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后续的湘军一个旅从长沙车运到宝庆，桂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三是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已到阳明山西南侧，十六师车运向常宁急进。敌人企图在湘江以东地区摆开架势和红六军团决战。

横江困战，兵家大忌。

八月二十四日，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电告朱德：西渡湘江“已无可能”，建议“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暂时立足。第二天，全军东行攀登阳明山。红六军团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连续行军千余里，其间只休息了一天。原来打算在阳明山区暂时立足整理部队，分田扩红，开展游击活动，不料上山以后，方知这里地瘠人稀，山区狭小，部队供给都很困难，难于立足，

而敌人又分路从阳明山的南、北、西三面合围过来，军团领导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原来的计划。当时的电台政委穰明德回忆说：阳明山上有一个庙，当天晚上，任弼时和萧克、王震都宿在庙里，电台也架设在庙里。天下着大雨。我去放哨时，看到任弼时正在和一些身穿便衣的同志谈话，他们是地方党组织的同志。后来，我们交给他们一些武器，又把行动不方便的伤员留在当地，请地方安置，并向他们了解了情况。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下山了。^⑥

为了寻找渡湘江的地点，任弼时又向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袁任远询问情况。袁原是红七军的干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下从广西北上时曾渡过湘江，转战湖南、广东边境进入湘赣地区。任弼时问他何处可渡湘江。袁任远把详细的行军路线向任作了汇报。

部队下了阳明山后，东出白果市，和国民党军“兜圈子”，从四倍于己的敌军包围中摆脱出来，毫无阻拦地挥师南下，二十八日到嘉禾附近，待湘军追来时，红六军团折转西上，急行军三天，在道县、江华之间徒涉湘江上游支流潇水，到达湘桂边境，准备进入广西省灌县东北地区。

红六军团在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率领下，八月份内，冒着酷暑，在无后方的条件下横穿湘南，

历经汝城、郴县、新田、宁远、零陵、嘉禾、蓝山等八个县的县境，湘军保安团堵截于前，西路军两个师尾追于后，加上警备部队和补充总队分途“协剿”，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指挥机动灵活，避实就虚，将士英勇顽强，行动神速，使敌人的几次决战部署一一落空，红军化险为夷。国民党的军事史家哀叹：“计划不可谓不周，防线不可谓不密，追剿不可谓不勤”，但六军团“或南或北，忽东忽西”，“迷离惝恍，使湘军不易断定其企图，捕捉其主力”；兵力虽全，“无异以牛捕鼠，大而无益”。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旅长胡达说，他们“总寻不到匪的主力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将他消灭”，有时两军相遇，红军“马上将前卫变作侧卫或后卫，其最大目标突然隐匿不见，如遇有死守阵地之匪兵，虽极少数，抵死顽抗，非有上官命令，决不撤退”。^⑦这就是国民党军心目中的红六军团。

如果说，红六军团转战湘南时，广西新军阀白崇禧虽然派出主力第七军的两个师参加“协剿”，但内心是矛盾的。他手里只有十七八个团，一怕和红军较量输掉“本钱”，二怕蒋军乘机入桂，“明取西川，暗夺荆州”，自己的政治生命完蛋。在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的处境下，白崇禧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送客”，即陈兵广西边境，让开北面，打尾不打头。用他的话说，“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就行了”；那么，

当红六军团入广西后，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白在行动上转为“剿”而不“协”。九月初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的灌县地区时，刘建绪判断红军将在湘桂边的黄沙河地区渡湘江，于是，一面加紧前堵后追，一面电请桂军第十九师在兴安、全县间配合“协剿”。但是，白崇禧根本不予理睬，反而星夜将驻兴安、黄沙河的两个团调至湖南道县，将驻全县的一个团派往江华；另调驻柳州的二十四师北上增援，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广西境外。道县、江华是湘桂两军“协剿”红军的结合部，红六军团穿插其间，于九月二日在道县的蒋家岭村与桂军遭遇，激战四小时后，将它击溃，当晚占领文村（今文市）。

这时，全县、兴安两城，因桂军调离，兵力空虚，全县至兴安间一百多华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任弼时等抓住时机，率领全军于九月四日从全县南部的石塘地区出发，直奔湘江江畔。全长一千六百多里的湘江，自西南至东北，流经湖南汇入洞庭，源头却在广西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在上游，水流湍急，滩洲很多，全县凤凰嘴的董家堰，有一条卵石滚水坝，水浅可以徒涉，六军团全军未发一枪一弹，乘虚渡过了湘江。过了湘江，进入西延山区崇山峻岭，国民党军失去了铁路、公路和江运等交通优势，行动也只凭两条腿，而红军的铁脚板却显示了他的威力。

红六军团进入广西后，白崇禧调动了一万二千多兵力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连日派出空军严加侦察，迭次轰炸，六军团凭借五岭山脉的高山密林隐蔽，从九月二日至十日，转战在广西境内的灌阳、全州、西延（今资源）三县境内。

九月初，中央红军准备沿着红六军团开辟的路线转移，中革军委要求红六军团在湘黔边钳制国民党军，直接配合行动。九月八日，任弼时等在西延县的车田，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指出中央原来要求六军团在湘中的新化、溆浦间山地建立根据地，“在目前是不利的”，“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要求六军团“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然后从绥宁、通道进入贵州东部的锦屏，沿天柱、玉屏、铜仁，北上与红三军会合，在湘西及湘西北的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区背靠贵州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任弼时等即率部离开广西，再入湘境。这时桂军二十四师师长廖磊率部作“送客”式的追击。当廖部追到湖南大山时，红军已经远去，但见边界上竖着一块木牌，上书：“此是湘桂交界之处，不劳桂军远送！”

九月十一日，红六军团已进入城步以西的丹口

地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准备继续西进。十五日，任弼时等率部西进途中接到中革军委来电，批评“近几日来的行动是与军委九月八日的训令不合的”，具体指责三点：即不应过早进入贵州；不应强行军；不应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令他们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发展游击战争，目前“应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

这些指责不符合战场实际，又和军委四天前的火急电令自相矛盾，反映了李德控制下的军委在指挥上的混乱。十日二十四时，军委以朱德的名义给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令中说：湘敌十九师已逼近城步、江头、梅溪一带，可能向红六军团追击、堵截，六军团“抵丹口后，如因山大，给养困难，不便久停，应即于明（十一日）在丹口以西山地准备伏击追敌”。六军团的行动方向没有违背军委的电令。至于来电所说的绥宁、靖县、通道的三角地带，敌人正严阵以待，红军不宜硬攻。

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即将从江西南下，开始长征，何键感到湖南东西两面都将受到红军的威胁，西面，六军团有向城步、绥宁地区进出与黔东北的红军会合之可能；东面，中央红军行将从赣南入湘，何键当即调整部署，抽调主力固守赣江及长岳铁路，而把“追剿”红六军团的任务交给了桂军第七军军长廖

磊，由廖统一“指挥调遣”湘桂边的部队。廖磊即制定“追击计划”，十二日，令湘军李觉师向绥宁急进，十三日，又令向靖县截击，胡达旅开绥宁；绥宁至通道的要隘由湘桂两军的一个师一个旅防堵，廖本人则向靖远方向截击；贵州的国民党军正向黔东南地区频繁调动。如果红六军团按中革军委电令进入绥宁、靖县、通道三角地带，敌人前截后追，南北夹击，不但无法北上与红三军会合，且必然陷入腹背受敌的死胡同中。

为了争取主动，任弼时等决定离开城步绥宁地区，由通道向黔东南兼程前进，并向中革军委报告。九月十八日，进到通道西北的新厂地区时，湘军两个团追来。他们以为“疲困已极”的红军不敢应战，因此孤军突出。六军团领导决定集中兵力，杀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股敌人，争取行动自由再向贵州转移。于是，激战一日，给追敌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支湘军只得退回靖县，红军缴获甚丰。这就是红军入黔第一战——新厂战斗。这时，军委才同意六军团入黔，但又限定：“缩短行程”；“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这里是苗、侗两族人民聚居的地区。长期以来，他们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凌，仇恨很深，每当反动军队

进村，他们手持利器，扼守山寨，防被洗劫。任弼时严令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入民宅，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军行所至，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当时任军事裁判员的何辉回忆道：

“部队在贵州苗族地区时，有一次师部通讯连押送来一个老太婆，五十来岁，虽然用绳子捆着手，但毫不示弱，说一口土话，可惜我们听不懂。据通讯连的报告和来说，她不让红军在村里宿营，还想用刀砍杀红军战士。说着，来人将一把苗族砍柴的刀递给我。这刀长柄，钩头，非常锋利，是苗民上山劳动必带的工具。看来持刀行凶，人证物证俱在。如何处理？我去请示弼时同志。他看了报告，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简单化处理！’他考虑半晌，说：把人放了，刀还给她，向她表示红军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经过这里是过路，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我照他的意思把老太太的绑松了，用手示意表示红军和他们是兄弟，把砍刀交还到她手里，准备送老太太回山寨。这一来，苗族老太太脸上表情突然变化，不象押来时那样气势汹汹充满着对抗情绪。”^⑧

何辉至今还说：“任政委给我上了一堂民族政策的课！”

有一次，战士不慎失火，烧了一个苗寨，任弼时立即追查责任，部队离开苗寨时，留下一堆光洋和一封信，给予赔偿并致歉意。

进入贵州以后，红六军团行军作战处处被动，不象在湘南时那样机动灵活，有声有色。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山高路少，指挥机关又没有详细的军用地图，只凭中学生用的一张简图，而中革军委来电所规定的行军路线又很具体，有些小地名在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问当地居民，他们久居山寨，二三十里外的村寨道路就说不清楚。因此，任弼时曾电告中革军委：“希望以后布置行动时的小地名（要）指明其所靠近的大地名”。更主要的方面是：被彭德怀称为“只知道图上作业的战略家”李德，往往根据不可靠的情报或在地图上画直线规定部队行动路线，而且不得超越，不肯改变。这就使得在湘桂黔三省被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六军团大大削弱了机动性和灵活性，甚至几番与敌人遭遇，陷于被动。对李德的指挥，陈云（即施平）在《英勇的西征》文中写道：

“我们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结果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老早从地

图上知道了我们将经过何地，走向何方。于是我们自己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去袭击敌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本应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更快的速度占领地点，而我们却要在不利的条件之下搏斗才夺取了这些地方。敌人有汽车及其他转运工具，而我们则走直路，坚持不肯改变方向，可是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于是我们常常陷于绝境，而不得不重新折回。”^⑨

文章所说的，虽然是中央红军行动时的情况，其实也是红六军团转战湘桂黔边时的写照。

九月二十日，任弼时等接到以朱德名义发来的电报说：

“甲、据尚未证实的情报，我二军团^⑩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

乙、为取得协同动作，依据我们8日的训令不变。而我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谿、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在前进中将要渡过两道河……。”^⑪

两道河，一道是清水江，一道是沅水，均在黔东南镇远以东地域，来电规定了渡河地点，强调渡沅水时，向西不得过镇远。

这是一份内容极为混乱的电令。第一，“尚未证

实的情报”其实是错误的。这时，红三军既没有占领印江，更没有占领思南，相反，黔军五个团正从印江向黔东根据地大举进犯，企图把红三军挤出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等已转到外线作战，直到九月底，贺龙率第七师方在印江县的木黄村组织突围。第二，从黎平到江口的北上路线走的是一条地图直线，沿途要渡过清水江和沅水，行程虽短，但部队进入两水之间必将陷入被动。第三，镇远以南，清、沅两水间正是国民党军企图围歼六军团的地域。特别是镇远，是黔东门户，扼荆楚上游，据湘黔要道，山川险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早已调兵设防。按这条路线北上，六军团便接二连三地与敌遭遇，处处被动。

六军团离开清水江地区时，苗、侗人民积极协助，找渡口、绑木筏、架浮桥、收集船只，红军得以在清江县（今剑河县）的南家堡渡过了清水江，但行军到了八卦河，发现敌主力已在沅水北岸拦阻，不得不撤回来，改由大广、小广西移，不料在二十六日当先头部队行抵大广时，遇到湘桂两军伏击，主力在红十八师掩护下，进入大广偏西的大山，但担任前卫的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却遭受严重损失，团长赵雄阵亡，第五十四团因此拆散，编入其余各团。这是入黔后第一次遭遇战。

红六军团前临沅水，后濒清水江的处境，直到二

十九日，军委领导才认为“是绝对不利的”，要他们当晚渡沅阳河，迅速向江口前进。任弼时等只好进到镇远以西，越过施秉至黄平的大道，寻找空隙渡沅阳河，再向铜仁、江口北进。这时敌军已在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配置，红军又遭遇黔军四个团自东西两面夹击，战斗从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开始直到二日拂晓，终于突破敌军阵地，抢渡大沙河，袭占黄平旧城（即老黄平）。这是第二次遭遇战。

接踵而来的是第三次也是损失最惨重的遭遇战。

十月一日至四日，中革军委三次来电，一再肯定“贺龙已至印江”，“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一再督促“迅向江口前进”，“向江口县城前进”，但来电对江口的位置也没有弄清楚，电文说：“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地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特别是四日中革军委在命令中明确地说：“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⑫这时，六军团已到达乌江边瓮安县的猴场，本拟出敌不意，抢渡乌江，甩开敌人设法与红三军联系，接到军委连电催促后，不得不掉头向东北经石阡到江口地区。事实上桂军没有南开，四日，湘桂

黔军三方的代表正在镇远开紧急会议，制订联合作战计划。他们判断红军不会西渡乌江，北上必经余庆、石阡，于是星夜出动，企图消灭红军于石阡地区。

由于情报不准，疏于戒备，任弼时率部东进，准备在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时，对周围的敌情并未觉察。前卫部队在李达率领下行抵甘溪时，突然与桂军第十九师遭遇，战斗失利，李达只得率两个团向西翻过梵净山渡乌江去找贺龙的红三军，和主力失去了联系。军团部一时弄不清前面的情况，措手不及中难于定下行动决心，只好转入梵净山区。九日，向施秉的大庆转移时，又与敌遭遇，边打边走，一路上遭敌拦击，互相对峙。王震率五十三团在深山中临时辟路突围，后卫第五十团又被切断。经几次遭遇战后，部队被截成三段，在湘桂黔军二十四四个团的包围下，于石阡、余庆、施秉间孤军奋斗，以寡御众。十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电告朱德：七日甘溪战斗中“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的战斗十分不利”，因此向中革军委提议将部队分成两个纵队，由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萧克随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迅速转到黔东苏区附近，并准备十二日开始分头行动。但

未获得军委同意，仍令他们集结部队，按原定的路线向江口前进。

梵净山区，山高岭峻，居民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往往一天吃不上一餐饭；没有鞋穿，战士赤着脚在密林中转战。这时，任弼时病了，三天两头发疟疾，加上风餐露宿，日夜转战，身子十分虚弱，他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后来萧克找来了一匹马让他骑，但山势陡峭，骡马在羊肠小道上行走常常失蹄，只好拄着木棍徒步。队伍零零落落，电台的队长阎知非，背着机器，行走非常困难。任弼时见了，让通讯员把马牵来给阎骑，阎说我走得动，让陈琮英骑。这时陈琮英却掉了队，赤着脚倚在树下喘息，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发现后，连背带拖地把她带走，这才赶上了军团部。她知道陈琮英身上带着机要密码本。任弼时见了她们，高兴而诙谐地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却丢不起机要局长哟！”因为保护党的机密有功，陈罗英后来被提拔为湘鄂川黔省军分会的候补委员。^⑤

红六军团被困于梵净山区已经七八天了，眼看不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可能遭更大的损失，于是决定向南面的甘溪方向转移，由红十八师五十二团担任警戒。但这支队伍又与正在山上游击的湘军遭遇，当主力转到甘溪时，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

团又被截断。

十七日，主力到甘溪后，拟走小道，伺机通过石阡镇远间的敌封锁线。傍晚，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说：“哪怕牺牲一点也要突出去，等到明天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出去。”他们让陶汉章找来一个猎户，请他带路。五十多岁的老猎户说：“大军，我是穷人，我知道你们是为穷人干事的，我愿给你们带路”。^⑭

决心既下，任弼时便向部队作动员，他说：“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⑮军团长萧克立即布置了两路警戒，一路向南面的镇远方向，一路向北面的石阡方向，又占据了东去的路口。任弼时等以老猎户为向导，率领全军进入人迹罕到的夹沟。天很黑，沟里有尺把深的水，战士们人人头上扎一块白布，映着微微天光，紧跟着行进。陶汉章回忆说：“天下雨，风四五级，敌人在山上，我们在洼里走，不准说话，不准有火光，只听得子弹在头上呼叫。走了四个多小时，平安无事，又找到一条小路，这时弼时同志说：走对了。”^⑯

第二天清早，部队全部通过夹沟。萧克命令加快速度，跑步前进。终于突破湘军的防堵阵地，通过了

石阡镇远大道的封锁线。萧克后来写道：“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六军团大局的一个战斗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①7}

十月十九日，湘军通报：“黔军大索匪首任弼时”；黔军通报：“伪主席任弼时藏匿深山，未逃脱，正搜索中”；二十二日，黔军王家烈在电报中称：“伪主席任弼时负重伤，伪团长邹（郭）鹏被击毙，伪师长龙云、副师长吴厚仁等部，被击溃于四方铲”。电报又说，李觉、廖磊和王家烈“本日在石阡会商，结果圆满”，他不自量力地说：“期于两旬内，务将萧、贺两匪完全肃清”^{①8}云云。事实是怎样呢？

任弼时根本没有受重伤，他只是被疟原虫困扰着，发作时，穿上棉衣还冻得牙齿得得发响，过一二小时，又热得浑身冒汗，脸色蜡黄，唇边的胡子长而且乱。十月十八日黔军发出那份通报的前一天，他已走出深山，越过石阡镇远大道，率部和贺龙会师去了。红十七师五十团团长沙郭鹏也没有被击毙，自九日大庆战斗中队伍被切断后，他转战七日，十六日，继李达率领的两个团与红三军会合之后，在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第二批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合。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五十二团则确实受了严重损失，该团被截断后，十七日“激战一昼夜

……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第二天分四路冲出敌围，分散与湘黔桂敌激战十天，终因弹尽粮绝，全部受损，龙云化名黎光前，藏于深山，后为岑巩县的民团发现，被何键下令杀害。^{①⑨}

王家烈电报中所说“结果圆满”的“石阡会商”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二十二日那天，廖磊、王家烈、李觉在石阡制定了个“二十日之内肃清萧、贺”的计划，不料当天晚上，廖磊接到何键、刘建绪的电报，说朱毛大军已经由赣入湘，令廖、李“率所部星夜回湘、桂边截堵”，湘桂两军当即就地返师，“至追剿及善后事宜则由黔军负责办理”。这一来，三省联合在二十天之内“肃清萧贺”的“合剿”计划落到了王家烈身上，所谓：“今后仅以黔省一军，担负剿办两军”，“前途荆棘，顾虑孔多。”^{②⑩}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全军三千三百余人，和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于贵州印江县木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七十八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五千多里，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的兵力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完成了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蒋介石调动三个省的兵力由“协剿”到“联合会剿”，

满以为“穷追痛剿，扫灭殆尽”，但是，红军胜利会师的捷报，使国民党的军事史家，只好抱憾兴叹：“涓滴不塞，将成江河，星星不灭，势将燎原，九仞功成，亏于一簣。惜哉，惜哉！”^{②①}

十九、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当中央红军转战于湘粤桂边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上时，红六军团和红三军胜利会师，这件事，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中国的苏维埃运动都有很大的意义。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的蒋介石，十月中发现中央红军突围时，曾对幕僚们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但是，他内心里“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湖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所部红军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成一片苏区。”^①不料，不到半个月，任、贺两军在武陵山区树起了一面苏维埃的红旗，这无疑是给蒋介石凭添了心腹之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贵州印江县木黄的水浒庙里，任弼时躺在担架上和萧克、王震一起与率部前来接应的贺龙、关向应会面，大家心情是异常激动的：红六军团在无后方的条件下，行军作战七十八

天，其间只休息了一天半，甘溪一战，几番与敌遭遇，部队被切成三截，损失了师长、团长各一人，终于杀出重围，在红三军创立的黔东根据地找到了落脚点。红三军呢，由于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红军力量削弱，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得不撤离洪湖根据地，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在湘、鄂、川边“分散游击”，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占领贵州的沿河县后，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②中共湘鄂西分局这才决定在黔东建立根据地。七月，中央派出的交通到达沿河，送来了五月六日的指示信，批评了夏曦的错误。夏曦虽然接受了批评，但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正如贺龙所说：“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③

黔东特区地处贵州的印江、德江、沿河，湖南的松桃和四川的酉阳五个县毗连的地界，纵横二百华里，只有十万人口，中心在沿河县的土地湾，木黄还是游击区。任弼时和贺龙等在水浒庙紧急会商后，当天下午就率部经松桃的石梁向酉阳的南腰界转移。

南腰界在苏区的东北端，是一个倚山的大村，有近千户人家，红三军司令部设在这里。十月二十六日，两军在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联欢会。为防止敌机

空袭，联欢活动在树林里进行。会议由红三军政委关向应主持，贺龙和任弼时先后讲了话。贺龙知道，任弼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红六军团行动的中央代表，所以尊称他为“任代表”，任弼时则向大家介绍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军的总指挥。两军上下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无分彼此。在庆祝大会上，任弼时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以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军第七师改为第四师，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各辖两个团，共四千余人；红六军团仍以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暂时缩编成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团，共三千二百余人，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

两军会师后，一系列新的问题等待着任弼时、贺龙等处理：一是确定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方向，二是整顿部队，解决红三军在夏曦领导时期的遗留问题。

在确定战略行动方向的过程中，任弼时和贺龙等同李德操纵的中革军委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焦点在于：两军是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向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呢，还是分散兵力红六军团单独去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任弼时、贺龙等研究后，认为：第一，

地处梵净山区的黔东特区还不是巩固的根据地，四周高山，离群众太远，活动范围窄；冬季大雪封山，部队过冬有困难。所以贺龙在庆祝会师的大会上说：“黔东根据地是新开辟的，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是在我们的脚板上，还得走，还必须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第二，两军现有兵力合计七千多人，其中有伤病员五百余人，合则两军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两军会师前夕，十月二十二日，中革军委曾电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据熟悉情况的贺龙介绍，那里是苗族和土家族人民聚居地区，自清乾隆年间起，统治阶级为镇压苗、土人民的反抗，修碉堡，筑边墙，在此“屯田养兵”，民族隔阂极深。盘踞在这一带的湘西军阀陈渠珍和苗汉地主豪绅勾结，“受陈渠珍节制”的民间武装就拥有枪支万余。红六军团孤军深入，情况不熟，一时难于立足。两军领导会商后，二十五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①，并决定将黔东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两军现有的伤病员合编成独立师，留在黔东特区坚持，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两军不顾疲劳，立即行动，并于二十七日致电向中革军委报告：我二、六军团明日向龙潭前

进，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并说明不直接向乾城、凤凰地区行动的原因。^⑤

二十八日，任弼时、贺龙率部进到酉阳、龙山道上的蚂蝗井，接到中革军委二十六日发出的复电，来电批评说：“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⑥，坚持要红六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

任弼时和两军领导审慎研究后，当天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再次陈述利弊：

“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之〔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⑦

不料，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再次复电批评：“二、六两军团绝对不应合并”，并且规定了两个军团分开行动的具体地域。^⑧这个复电和甘溪战役中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的电令一样，既不符合战场实际，又不采纳下级的合理建议。尽管红二、红六军团已表明“暂时集中行动”，“将来分开行动”，中革军委竟连一点

机动的余地都不给前方指挥员，而指示的内容又自相矛盾：第一，来电说：“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但这时，川、黔、湘三省国民党军已从四面向黔东苏区的中心地域合围拢来。他们的这一次行动采取所谓“军团合一”的办法，除三省的正规军之外，还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的民团、保卫团结成“剿共联防”，由川军刘湘任总指挥；黔军王家烈则亲自督师，扬言要将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黔东苏区顿时被分割，独立师转入梵净山区打游击，哪里还有供红六军团休息的苏区。第二，来电既令红六军团休息，令红二军团背靠乌江“向黔敌积极行动”，但最后又说：“湘敌将移其大部抗击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二、六军团之环境可〔如〕有改善，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⑨

为什么中革军委如此执着要红二、红六军团分开活动，分别去建立根据地呢？原因是：这时中央红军八万多人，携带大批辎重，在湘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作甬道式的缓慢行进，企图沿红六军团西征时开辟的道路行进；如果红二、红六军团分开活动，二军团留在黔东，六军团单独到湘西北另辟根据地，这样，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和二、六军团会合时，在湘西有一块较大范围的落脚地，然后放下背包再打仗。这个主观意图，中央并没有告诉二、六军团领

导。但是，客观情况变化了，这个计划已经难于实现。因为蒋介石已经发现中央红军的进军意图，急调重兵二十五个师，其中的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由何键指挥，分五路专事“进剿”，四个师在湘粤桂边进行袭击；其余的五个师在天险湘江边截击，形成中央红军前进道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

中央既然来电要他们“向湖南大发展”，任弼时、贺龙等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不去乾城、凤凰地区，而是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北进军。十月三十日，两军进逼川东的酉阳县城，守军慑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的声势，弃城逃跑，红军顺利通过酉阳，接着，连日急行军，经湖北来凤县的百福司，渡酉水，向湖南龙山县的招头寨前进，吸引从永绥、保靖出动前来追堵的“湘西王”陈渠珍部向北调动，待他们进到招头寨附近时，红二、红六军团突然调头东进，十一月七日乘虚占领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这一来，两军摆脱了川黔军的羁绊，甩开了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部队集结永顺县城附近，获得了一周时间的休整。在此期间，召开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宣传群众，打击土豪，征集物资，着手整顿部队，加强政治建设。

贺龙说：“打下永顺后开了个会，解决夏曦的问

题，很仓促。”^⑩红三军在夏曦领导时期，先后四次掀起肃反高潮，共逮捕了一千六百多人，冤错案甚多，后果是严重的。正如八月四日，中共湘鄂西分局决议所说：由于“不正确的估计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解散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举行重新登记，取消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⑪，使政治工作机关陷于瘫痪，干部战士非常气愤，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的领导，早已不满”，所以九月十五日分局向中央报告，要求“加强中央分局的领导力量”，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明确地说军分会“由夏曦负责是照顾不来的，反致妨碍党的工作”，同时“非常迫切”要求中央“加派理论的军事的干部”以及参谋人才等。^⑫由于原红三军官兵的迫切要求，两军会师后的第三天，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的主席，萧、任副之”^⑬。这时，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支部”，“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严重地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任弼时等立即采取措施，从红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两个师的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工作干

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的党支部。十一月一日，部队向湘西北进军途中，任弼时和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致电周恩来：“我们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⑪部队在永顺休整期间，任弼时等原打算召集大的会议，解决夏曦的问题，因军情紧张，仓促间开了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初步批评了夏曦的错误。这些措施，使红二军团的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并且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党籍。红二军团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代表任弼时和红六军团给予的非常深远的帮助。

红二、红六军团攻占永顺后，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非常惊惶。原驻鄂西的徐源泉部急调两个师开赴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县，与常德的警备部队联络；湘军何键严令陈渠珍尾追，陈即派三个旅的十团兵力共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企图将立足未稳的红二、红六军团围歼于永顺地区。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认为何键的主要兵力正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徐源泉部分散在鄂西的施南（即恩施）和洞庭湖滨一带，当面的陈渠珍部，虽然人数、装备优于红军，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

规束，兵无严纪，士兵多是吸鸦片的“瘾君子”，实际战斗力不强，但又非常骄纵。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士气高涨，指挥统一，正如贺龙所说，战斗部队“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⑤，因此决定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选择有利的地形，伺机在运动中打好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仗。

十一月十三日，任弼时、贺龙等率部弃永顺城北撤，以部分兵力与敌接触，且战且走，故意示敌以弱，陈渠珍果然以为红军怯战。往永顺县城追来。为了慎重初战，红二、红六军团一边走，一边选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先后经过三次选择：第一次选在永顺城北附近，因敌军主力尚未完全离开县城，如此时动手，他们容易回缩固守，决定继续北撤；第二次，拟设伏于钓矶岩，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追敌，又作罢。最后选定了永顺城北九十华里的十万坪谷地。这个地区南北长十五华里，东西最宽处四华里，包括杉木村、碑里坪、把总河、龙家寨，谷底平坦，可装入大量敌军，两侧茶林丰茂，山势较缓，既利于隐蔽，又便于出击。十五日下午，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作出部署，将红二军团司令部和红四师师部摆在毛坝，红二军团的部队埋伏在正面的杉木村一带山上，红六军团的三个团分别布在杉木村的东山和

北山，等敌入瓮。陈渠珍部尾追了两天，没有和红军接上火，越发显得骄纵，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担任前线指挥的萧克对十万坪伏击战这样写道：

“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十多里，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五里地左右的把总河筑构工事，企图顽抗。我六军团第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第十八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①⑥}

十一月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收复永顺城，同一天，红二军团一部乘胜占领桑植；二十三日主力从永顺、桑植出发向大庸进军；二十四日，解放大庸县城永定镇。

红二、红六军团在十万坪初战告捷，歼灭了湘西

军阀陈渠珍部两个旅大部，击溃了一个旅又一个团，歼敌一千余人，俘参谋长以下二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二百余枝，轻机枪十挺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军威大振。这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局的转折点，奠定了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创立根据地的可靠基础，也证明了两军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向湘西北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月十三日，朱德来电：“我西方军已进至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①7}这份电报最先表明中革军委已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接着，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批准任弼时、贺龙等屡电请示的重要问题和作出在湘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策：

第一，中央决定在湘川黔边创立新的苏区，“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萧、王等为委员”；

第二，“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

第三，两军仍保存二、六军团名义，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

对夏曦的问题，书记处来电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组织”，但红三军领导在没有党中央经常指导的情况下保存有生力量，在黔东“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的苏区”，其成绩“绝不抹煞”，指示要求通过“对过去错误的斗争”，实现“团结一致，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⑮。

永顺、桑植、大庸攻克后，十一月二十五日，朱德代表中革军委电令：“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在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的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具体要求是“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应留下二军团一部分的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⑯

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和中革军委在战略行动方向和两军统一行动方面的争论，历时一月，在两军胜利的事实面前宣告结束。尽管当时以任弼时、贺龙为核心的两军领导对中革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情况并不知道，但是他们敢于从实际出发对党和革命事

业负责的精神，临机决断敢于坚持正确主张的革命魄力是可贵的。同时，也表明中革军委由李德独揽大权发号施令的不正常方式已经难于继续负担复杂的战争指挥任务。五十天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决议在谈到中革军委的领导方式时指出：“××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②①}这是切中要害的批评。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城宣告成立，并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②②}同时成立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以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中共大庸地委由夏曦兼任书记。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是在红二、红六军团执行中革军委命令继续湘西攻势的同时进行的。省委研究决定，将力量分成两部分，由任弼时、王震和张子意率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五十三两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留在后方，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贺龙、关向应和萧克率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继续向东伸出，大踏步地进攻沅陵（辰州）、常德、桃源，策应中央红军。

十二月五日，贺龙率部从大庸出发，进袭沅陵城，围城激战三昼夜，未遂。十日乘虚改向常德、桃源地区进攻。拥有十万人口的常德市，是湘西的政治、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何键害怕红军攻下常德，南渡沅江，进取益阳、安化，逼近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蒋派国民党军独立三十四师罗启疆旅从湖北黄陂乘轮船赶到常、桃一带布防。十七日红军占领桃源县城后，接着在沅溪河南边击败赶来增援桃源的罗部，又先后占领澧市、河洑，打得罗部措手不及。这一来，自恃装备精良，准备在常德外围与红军“决战”的罗启疆，吓得丢下汽车，扯掉中将衔领章，逃回常德。十八日，红军围攻常德。

这时，中央红军已渡过湘江。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艰苦的一仗”，部队人数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蒋介石为了隔断中

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调重兵在中央红军前进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地区，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成口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与敌决战，势必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向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前进。十二月十八日，正是红二、红六军团攻常德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②第二天，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区积极行动，以便调动湘军；当湘军北援时，应乘机向永顺、黔东急进，以牵制在铜仁的薛岳部队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中央红军入黔后，蒋介石在湘西与中央红军决战的计划落空，于是改变部署，急令在湘南的第十九师、第十六师及第六十二师兼程北上，回援常、桃；调在赣西参加“围剿”的川军郭汝栋师驰援常德；令“陈渠珍师迅出大庸”，断红二、红六军团归路。十二月二十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主动撤离常德，先后到桃源、陬市、溪河、漆家河一带休整。红二、红六

军团在常、桃地区活动七天，打土豪，开仓济贫，筹集物资，扩大红军数千。二十四日，撤离常、桃地区，经慈利，于十二月三十日西返大庸休整。红二、红六军团凌厉的湘西攻势历时两个月，胜利告终。

当贺龙等驰骋在湘西战场时，任弼时派出工作组，正在以永顺、大庸、桑植和龙山为中心的地区的发动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进行土地革命。十二月十日，他率省级机关从大庸县城迁往永顺县的塔卧。永顺是湘西北的中心，北宋时设永顺州，清时改为县，并设永顺府治，后为湖南第八专区所在地，塔卧在永顺、桑植大道之间，永顺河流入酉水，汇入沅江，东北面是澧水的上游，交通较为便利。省委机关迁到塔卧后，任弼时便集中精力，制订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十二月一日，省革命委员会颁发《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接着省委发出《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的决定》，《分田工作大纲》；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等重要文件，规定了基本政策。十二月二十四日，将永顺划分为永保、郭亮两县。

省委的决议指出：“我们同敌人新的决战已经迫近”，“党必须以最大决心，用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速

度，来创造这一新的苏区”，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向群众解释党目前的政策、主张，“发扬群众为巩固发展苏维埃政权斗争高度积极性与创造性，造成群众一切为争取决战胜利的热忱。”^{②③}在布尔什维克精神激励下，革命的巨潮席卷新生的湘鄂川黔苏区，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政权建设方面，省委要求“立即发动群众，分发地主粮食、财产，斗争中建立城区乡的临时政府——革命委员会”，吸收大批工人、雇农积极分子参加政府各部门、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在广大群众中树立革命委员会强固的威信，使之成为当前剧烈开展的群众斗争和革命战争强有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②④}。到十二月底，以塔卧为中心的郭亮、永保、桑植、大庸四县已建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龙山县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苏维埃区域的版图从大庸的溪口到永顺的洗车河，东西四百多华里；从桑植北到永顺的石堤溪，南北二百四五十华里，人口四五十万，之后随着版图扩大，苏区共建立九个县级政权，五十一个区级政权，二百三十个乡政权。

任弼时深知，土地改革是发动广大基本群众、巩固革命根据地、保障战争胜利“最基本的紧急任务，一切工作最中心的一环”。因此省委决议要求：“立即开始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任何“迟延消极”或

是“由少数人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没收分配”都是危险的。十二月初，省委在大庸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进行布置，大庸，永顺两县分别办了短期训练班，然后在大庸县城附近及永顺的塔卧、龙家寨、刘家寨、颗砂等乡进行试验，取得新区土改的经验。

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制订的政策，尽管仍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但是在保护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方面，规定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并且一再加以重申。省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条例》规定“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平分土地时，中农的土地“如中农群众多数愿意平分，即使有少数不愿意，应即实行平分。如中农群众多数欲保留原有土地，不愿意平分，应不实行平分”^⑤；省委制订的《分田工作大纲》又规定：“乡村没收分配土地委员会可在群众大会上选举，应注意吸引中农参加”，“中农的土地是否平分，必须特别集合中农，征求大多数中农的意见，由中农表决”，同时“要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行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倾向”^⑥。

试点工作结束，省委要求各县召开政府负责人员、土地委员会与贫农团主任联席会，在训练县区两级骨干后，组织分田突击队，深入各乡，分两批展开分配土地的突击运动。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省委总结经验后，又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制定“以农村无产阶级为基础，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以消灭地主和削弱富农”的方针，指出“首先必须正确的分析阶级。判定其一个地主或富农，必须经过工会支部与贫农团会议的讨论，再由群众大会表决通过。对于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以及没有把握判定的成分，必须报告上级批准”；“反对‘左’的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倾向”，“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为了使突击分田运动沿着党的政策健康发展，决定中规定“实行严格的工作检查，执行‘三日检查’制，随时纠正下面的错误与给以分别的指示”^②。

在突击运动中，任弼时经常在王恩茂陪同下，到区乡去检查指导工作。他明确地在省的活动分子大会上说：我们从打土豪分东西起，直到分田，都不应侵犯中农利益，“特别要防止把富裕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的要立刻纠正，并赔偿他的损失。把富农当地主打，消灭富农的个别错误也必须纠正和防止，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引起中农动摇的”^③。这些政策

和湘赣苏区时期相比较，更加稳妥，特别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政策，和一年后中央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既是雷厉风行又是严格注意政策的分田突击运动中，湘鄂川黔苏区迅速完成了分田工作，广大的贫雇农获得土地，中农和工商业户情绪稳定。广大基本群众在阶级斗争获得初步胜利的氛围中欢度苏区建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在广大基本群众获得斗争果实的基础上，省委号召：“为着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进攻，保卫分田胜利而积极参加主力红军、游击队、赤少队的组织”，要求在三个月之内扩大红军一万二千人，创立模范营二万人，不脱产的赤少队十万人。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在《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中，向地方党部郑重提出：“立即派遣最坚强之共产党员去担任游击队政委”，“大胆征收先进之工人、雇农、贫农及最好之中农入党”，建立党支部，开展军政训练，严明军纪，随时注意和侵犯工农利益、乱打土豪的破坏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斗争，并“以最高度的阶级警觉性来破获一切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企图与组织”^{②9}。到一九三五年春，大庸、永保、慈利、龙桑已成立了县的独立团，龙桑、永沅建立了独立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湘西攻势中，红二、红六军团俘虏

甚多，这些人中有许多“瘾君子”，能不能把他们补入红军队伍呢？张子意对任弼时说：“弼时，你下决心。”任弼时说：“要，俘虏不收编回过头又来打你；留下，戒烟！”

千头万绪，加强党的领导是核心。省委决议强调：“必须广泛的建立党的组织”，大胆吸收工人、雇农、苦力和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迅速在每个工厂、作坊、街道和每个乡村、每个武装部队的连队和游击队当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③，六天之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作出《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定》，要求“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等组织，成为党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

湘西攻势胜利后，前后方领导干部会合。省委决定召开两个大会：一是全省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二是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他代表省委作报告，分析了目前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他说：英勇善战的红二、红六军团在短短的两个个月当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夔卿）和刚由湖北调来进攻红军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

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进攻辰州，^{③①}包围常德，给了湘军和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③②}在红军胜利的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下，新创立的苏区，工农奋起，普遍建立了临时政权，组织了游击队，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主力红军扩大了一倍以上。由于这块根据地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红军前进的一个阵地，同时又是敌人进攻中央红军和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的侧后方，在红军整个战线上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湘鄂国民党军已调集几十个团兵力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继续牵制和分散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袭击它的后方，直接帮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任弼时号召大家努力扩大红军，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消灭新区内的地主武装，彻底完成分田任务等。

三周以后，一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又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会议在大庸县的丁家溶举行，参加会议的是红二军团的军政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红六军团也派代表参加。任弼时在会上总结了三个月来红二军团工作转变的成绩和弱点，批评了夏曦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红二军团当前建设的紧急任务。

两军会师以来，红二军团中“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会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三个月来已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增加了四倍，“各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为了进一步把红二军团建设成“铁的红军”，转变“游击主义习气”，任弼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的建设任务。

任弼时说：作为正规的红军，“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但是现在“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所以我们要“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干部要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由于红三军中政治工作长期瘫痪，以致“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任弼时强调要“建立巩固的无

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发展党团的组织，“要作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

面对湘鄂敌军的进攻，任弼时在检查中发现：有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有的指挥员认为“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任弼时说：“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要“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有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军事技术训练和政治教育，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养。

同时，任弼时还提出要“健全军事行政机关”，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努力“创造新的师、新的团”，短期内使部队扩大一倍。^③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把夏曦的错误归纳成三个问题，一是“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二是“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在“肃反中心论底

下，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造成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怖现象，“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三是“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③④}在此同时，任弼时充分肯定红三军在湘鄂西时期粉碎敌人无数次进攻的“最光荣的战绩”，离开湘鄂西以后“尚能保持我们基本的有生力量，这可见我们指战员能够艰苦奋斗，为阶级利益流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在分析产生错误的背景时，他深有感触地说：

“因为与中央交通困难，两年多曾得不到中央的指示”，“这确实是一件很痛苦困难的事。不过我们今天是在于彻底揭发错误，来教育全体党员，绝不能因为有这个原因来减轻或是放松对错误的揭发。”^{③⑤}

这一天，参加会议的人特别踊跃，连礼堂的窗外都站满着人。夏曦坐在主席台上，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批评。

任弼时的报告和同志们的发言，总的说是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指示的精神为依据的，态度也是同志式的，但是，由于当时

全党对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还没有系统的认识，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没有从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上找出真正的原因，而对肃反扩大化和对干部的打击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又充满着义愤，过多地把责任归结到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身上，批评他“走上了公开取消主义道路”，因而一度撤销了夏曦的职务。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来电肯定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应该的”，指出“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应该处罚这些同志。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这反映了遵义会议之后，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组织路线在中央的工作中正在逐步恢复中。五月，任弼时批准调任夏曦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十年以后，经过延安整风，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这种打击政策一直继续到六中全会时，才基本上结束。”^{③⑥}

在苏区建设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任弼时特别注意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他说：“我们要认识，党、政府、军事机关在领导革命战争当中，是三个主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干部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指示工作方法，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而

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为了树立苏维埃政府的权威，他说：“党不能去代替包办政权的日常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培养政权独立工作的能力。大的问题决定了，大胆交给政府工作人员去做，建立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权力，使群众认识政权是自己的权力机关。”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任弼时指出：在尊重军事机关“直接指挥系统”的同时，“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③7}。党的各级委员会要贯彻省委决定：“须建立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制，深刻了解下层实际情形，收集各地斗争的经验”，“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少空谈，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③8}。

随着苏区建设迅速地发展，大量的新干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在苏维埃政权系统，区乡两级的苏维埃主席全部是地方干部，县级百分之八十是地方干部，党的区委机关也“不是依靠上级派干部”，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领导经验，省委在塔卧办了党校和红军学校，县区经常办轮训班，派巡视员指导工作。每逢下乡检查工作或开大会时，任弼时总是挤出时间，和干部谈话，他的谆谆言辞和艰苦朴素的风

格，象润物的细雨，感染和教育着干部，在政治上产生很强的凝聚力。

湘鄂川黔苏区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在龙家寨，书记是十九岁的土族青年田玉祥，他是铁匠出身，在十万坪战役中曾积极为红军带路。龙家寨乡苏维埃成立时，他任苏维埃主席，不久被提拔为永顺县的财政部长，永保县建立时，又任县苏维埃主席。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期间，田玉祥穿着打土豪分得的皮大衣、皮靴，手指上戴着金戒指。会议休息时，田玉祥到了家大院来看访任弼时。田玉祥回忆道：

“弼时同志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嘴上蓄有胡子，个子很高，看样子是四十多了（其实他只有三十多岁）”，“房里陈设很简单，一床灰布棉被，一条灰色军毯，一口木箱，桌子上有一大堆书，壁上贴有列宁像和一张地图，外面有部电话机子。火炉盆子里装有一罐子药，看来弼时同志身体是不太好的”。

省委书记任弼时的穿着陈设，和田玉祥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任弼时没有声色严厉地批评这个新干部，而是启发和教育使他觉悟。田玉祥写道：

“弼时同志问我的出身，问我识字不识字，问我工作困难不困难，还问了当地一些风俗习惯，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弼时同志要我好好工

作，不要脱离群众；要我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作风。他说：艰苦朴素是革命的传家宝，还要我多读革命书，懂得革命的道理。”^{③④}

临走时，任弼时送给田玉祥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土地改革法》，一本是《红军作战战术》。

对新区党内的思想斗争，省委的决定中指出：“必须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反对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特别是对于新的干部的个别错误应采取教育而不是动辄撤职”，任弼时正是按这些原则做的。

任弼时对人的处理是慎重的，也是宽厚的。大庸地委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袁任远，因为在收编游杂武装时和个别领导意见不一致，被撤了职。袁任远后来到省委去向任弼时汇报。事情是这样的：大庸县有愿意向红军投诚的游杂武装约一千六百多人，成员大多是破产的农民，间有少数退伍士兵和流氓，他们反抗官府，抢劫财主，但也骚扰百姓，省委决定收编游杂部队，成为游击队，在大庸成立游击支队，经过做工作，已经集中了四百多人，其余的还在观望。担任大庸游击支队政委的袁任远主张把更多的游杂部队先编入游击队，再逐步编入主力部队。但个别领导认为这是和游杂部队“和平相处”，是“严重右倾”，急于把这些游杂部队编入红军主力，袁任远因而被

撤了职；已集中的四百多人被强行改编入主力部队。这一来，犹豫观望中的游杂部队产生敌对情绪，不时袭击红军。任弼时查明了情况，对袁任远说：“你辛苦了，休息几天以后再工作”。过了一周以后，他通知袁任远回省委担任秘书长。一月四日，省委在给各级党部及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中说：对于一切反动武装，在采取军事上进攻的同时，“应采取政治工作，号召民团与土匪士兵回家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其家属亲朋去作宣传，“这里‘杀土匪’、‘剿匪’的口号，以及不分阶级、不分首领，捉到便杀的办法，只有帮助敌人，巩固敌人的阵地”。应该“去争取他们，说服和领导他们与我們一起去进行武装斗争”^⑩。

作为湘鄂川黔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任弼时时处处注意调查研究、讲求政策的优良作风，促进了两军的团结，使苏区各方面的工作沿着党的政策顺利发展。十六年后，贺龙深情地回忆道：

“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对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建设更加健全了，群众运动更加开展

了，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与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离的。”^{④①}

二十、湘鄂川黔保卫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议确定中央红军新的行动方向是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并加强对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①。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被战场分隔着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没有能参加遵义会议，因此，对“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战略战术的严重工作，认识有个过程。

这时，活跃在云贵川地区的中央红军和湘鄂川黔的红二、红六军团及在四川仪陇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互成犄角之势。蒋介石急调重兵，企图隔断红军

“聚而歼之”。

“围剿”湘鄂川黔苏区最卖力的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但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又在湘西初败，深感“力不从心”。红军的湘西攻势告捷后，何键和蒋介石相互利用，讨价还价。蒋要调湘军的七个师到黔东的石阡、印江地区，沿乌江防阻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何键深恐失去控制，他一面请求蒋把他的亲信部队李觉、陶广、章亮基三个师留在湖南，一面加紧部署，先后三次制定作战计划，电请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派兵“会剿”，其用心是在蒋介石面前和徐源泉争夺“主剿”红二、红六军团的专职，借此机会把川军郭汝栋的第二十六师和罗启疆的独立第三十四师纳入他的作战计划，归他指挥。但蒋介石偏偏把“主剿”红二、红六军团的专职交给徐源泉，徐有恃无恐，对何键的请求“受而不答”，按兵不动。何键因而向蒋介石叫嚷：“欲靖川黔，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除萧贺”，而他本人“不仅负军事之责，亦负地方之责，兼筹并顾，无可诿卸”^②。二月初，蒋介石得悉遵义会议的情况，认为红军“内部分歧”，将各据一方，利于各个击破，这才重新调整部署，以何键为一路军总司令，围攻湘鄂川黔苏区。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何键、徐源泉终于制定“协剿”计划，集中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合计八十

一个团的十一万兵力，并配有两队战斗飞机，分六路向湘鄂川黔苏区分进合击。除了军事进攻之外，还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严禁药材、布匹、粮食和食盐等物资运入苏区。

年轻的湘鄂川黔苏区，面临着湘鄂两省国民党军滚滚而来的烽火。

在蒋介石集团内部吵吵嚷嚷调兵遣将的过程中，任弼时通过电台侦察，从一月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天内，先后六次发电向中革军委详细报告国民党军的“进剿”、“协剿”计划。早在湘赣苏区时，任弼时就布置电台工作人员，抄收和破译敌人的电报密码，了解敌人动向，到湘鄂川黔后，电台增加了，他又布置建立了专门的侦察台，称“小电台”，日夜监听破译。“小电台”在任弼时直接领导下工作，成了总指挥部的耳目。

为迎接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一月六日，任弼时在活动分子会上进行紧急战斗动员。这时，两军团的主力部队已扩大到一万一千七百多人，地方部队约三千人，但和来犯的敌人相比在数量上只及十分之一。任弼时指出：苏区现有四五十万拥护红军的基本群众，“我们组织和领导得好，这几十万群众能当十万、二十万军队的力量”，因为他们能从四面八方“迷惑、钳制、疲困敌人”，断绝敌人的粮食，便利红

军主力来各个击破敌人。他代表省委要求“每个党员都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成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③一月份内扩大主力红军四千人，把游击队和模范营整排整连地动员加入红军，迅速把赤少队编起来，利用土枪、土炮、土炸弹配合红军行动；积极开展阶级斗争，加速分田步伐；同时，要各区乡组织粮食委员会，负责收集和保管。一月底，省委又发出指示信，要求“筹足革命战争经费，收集粮食，统一财政，反对贪污浪费”^④。一时，苏区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厉兵秣马，以人民战争来粉碎强敌进攻，保卫根据地。

二月初，国民党军编成六个纵队向苏区合围拢来：东南方向，以湘军为主，陈耀汉纵队从石门经江垭向大庸以北推进；郭汝栋纵队配合李觉纵队向大庸以东地区推进；南面，陶广纵队的主力向大庸以西的永顺地区推进；西北面，以鄂军为主，徐源泉、张振汉两个纵队以一部扼守乌江，其余的向龙山、来凤地区推进。他们以苏区的中心大庸为总目标，迅速分进合围，企图把红军压缩在狭小地区，陆空配合，“聚而歼之”。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任弼时、贺龙等制订作战部署，于一月十一日发电请示中革军委：“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去消灭敌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

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庸、永之间待机”，以便首先侧击从南面沅陵地区来犯的陶广、章亮基部队，“若能在永、庸、沅地区迅速顺利击灭敌人陶、章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敌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庸、桑、永城市均有被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桑、龙较小地区进行战斗。”^⑤

这个部署，和省委提出的“保卫大庸”、“保卫永顺”等中心口号，政治上是正确的，但从军事行动的策略上说，则是反映了从正面迎击的消极防御思想，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之翼侧后方，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因而在第一个阶段的作战中，战果并不理想。

第一阶段的反“围剿”战斗中，集结在大庸、永顺地区的红军远出迎击从东南方向来犯之国民党军，共包括三次战斗：二月八日，和郭汝栋纵队战于大庸东南面的溪口；三月十四日，和章亮基的第十六师一部及两个保卫团战于永顺县城东南的高粱坪；接着三月二十一日，和李觉纵队激战于大庸、永顺之间的后坪。在连续作战中，红军虽然分别给予郭、李、陶三个纵队以创伤，但未能大量地消灭其有生力量，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伤亡较大，而大庸、桑植县城仍然先后被占领，省委所在地塔卧和基本后方

龙家寨离国民党军只有一日至一日半行程，红军被压缩在狭小地区。任弼时说：“这是我们处境最困难时期”。但也是军团领导战略和策略思想逐渐转变的时期。

溪口战斗后，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曾来电指示：认为红二、红六军团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因此在战略上“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须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来电并指出：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了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中央批准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⑥夏即夏曦。

中央的来电体现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新的战略战

术原则，不但要求在行动上高度的机动性，而且在活动地域上有很大的广泛性，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根据地。这些指导思想和过去大不一样，原因何在？对于省委主要领导人任弼时来说，迅速地适应这个转变确实是严重的工作。为了吃透精神，十八日任弼时致电中央：“对粉碎五次‘围剿’战争和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及最近重要决议盼电告。”^⑦十天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长电，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通告“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⑧。

恰恰在这个时候，任弼时从敌报中得悉何键令陶广、章亮基、李觉、陈耀汉四个纵队于“三月一日一齐开始进剿”，先行“肃清湘西”^⑨。军情紧急，军分会决定：集结于大庸、永顺间的主力继续按原计划打击南来的陶、章两纵队。因此三月十四日的高梁坪战斗仍然没有摆脱正面迎敌的消极防御思想。直到后坪战斗时，军分会在战略思想和行动部署上才有明显的转变，当时决定：

“集结主力八个团，首先在后坪地域于运动中击灭李敌，估计在李敌覆灭后，陶、章不敢急进”，然后红军主力“转移（至）石堤溪永顺之线迎击陶、陈两敌，这样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整个战役计划，中以击灭李敌为一重要关键。”^⑩

任弼时在战斗总结时写道：“当时在兵力、地形、天候上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有大部以至全部消灭李敌的可能”。但是因为对敌估计上的错误，和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未按时移动部队占领阵地，致使我们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①。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月二十日，湘军李觉纵队准备渡澧水西进，红军以一个团扼守后坪东面的鸡公垭高地，准备在一侧是武陵高山、一侧是滔滔澧水的狭长河谷里伏击李觉部。这一天，午后一场大雨。李觉因前进道路情况不明，先头进到澧水东岸突然停止了。红军以为李部突然仁兵停渡是因为发现了红军的伏兵；同时也顾及雨后夜寒，战士过于疲劳，便留下一个团在鸡公垭附近的后坪警戒，主力撤到阵地后十多里的龙爪关一带休息待命，准备第二天一早返回阵地。谁知第二天拂晓，敌先头两个团渡过澧水抢先占领鸡公垭高地，加紧构筑工事，保障后续部队渡河。红军发现后，反复发起攻击，力图夺回高地，但一着疏忽，影响战斗全局。三月二十一日，红军与敌激战一天，毙伤敌近千，但本身伤亡亦大，而击灭李敌的关键一着并未能实现。到黄昏时，不得不撤出战斗。任弼时、贺龙等为此深感遗憾。

后坪战斗后，陶、李两军会合向西威胁永顺县

城，其余各路则分途进逼塔卧、龙家寨，苏区的地方工作受摧残不小。红军内线作战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在此情况下，省委和军分会决定：一面继续以最大决心保卫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牵制敌人，一面为保存力量考虑突出敌围，转移地区。按当时情况，红二、红六军团南渡沅水或西渡酉水乌江，均无可能，北面的施南（即宣恩）、鹤峰和桑植均为湘鄂两军占领，不能立足，因此三月二十二日，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分会致中央和军委的电中说：“万一二、六军团被逼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请中央给以指示。四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指示任弼时：

“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你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⑫

接到中央指示后，省委和军分会断然决定：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集中全部主力，并将大部地方武装编入增强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从敌军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来击破其对红军的包围、封锁与

合击计划，力争继续留在长江南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开展新的胜利局面。接着，任弼时向全军团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和省委、军分会的决定。“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以恢复，而且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遵义会议的这些论断，给处于困境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以极大的精神力量。会后，省委和军分会收回地方工作队，编制地方武装，把省委机关移至龙山的兴隆街，四月十二日，继永顺县城失守后，全军有秩序地撤离塔卧、龙家寨，向北转移。当天，川军郭汝栋纵队进占塔卧。

这时，何键以为在桑、龙、永之间“合围聚歼”红军的胜券已唾手可得，下令各路纵队广筑碉堡封锁线，令陈耀汉纵队从桑植西进，迅速构筑碉堡线，“堵匪西窜”。陈立即令第五十八师的一七二旅从桑植出发，沿澧水西上担任警戒，主力随后跟进，“务于十二日进抵两河口、陈家河一带”。十三日，红军先头第四师行抵陈家河，和陈耀汉的警戒部队遭遇。

陈家河位于桑植县城以西六十里处，四围重峦迭嶂，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桑植。贺龙和任弼时等认

为，陈耀汉的警戒部队孤军远出，工事还没有做好，而且士兵多系北方人，不善山地作战，决定围而歼之。于是一面命令红四师占领有利地形加以监视，一面集中十一个团的兵力，形成局部上的绝对优势。十四日黎明，部署完毕，萧克派通讯员向总指挥部报告。不到半小时，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跃马来到前沿阵地。萧克对贺龙说：“老总，干掉它！”贺龙手握望远镜转身问任弼时：“弼时同志，怎么样？”任弼时说：“你下命令吧！”随着军号吹响，红军一鼓作气居高临下冲向河谷，打到敌军阵地的纵深。敌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红军激战一日，陈耀汉的第一七二旅大部被歼，旅长李延龄被击毙在澧水河畔。在桑植的陈耀汉闻讯，即率五十八师师部直属队和第一七四旅赶来援救，途中得知一七二旅已被红军歼灭，只得掉头南窜，准备向塔卧靠拢。

陈家河战斗告捷，红军士气大振。

十五日，滂沱大雨。两军领导分析，陈耀汉南窜塔卧，桃子溪是必经之地。萧克、王震即率先头部队两个团冒雨急行军九十里赶到桃子溪。萧克这样回忆：

“下午四点了，离桃子溪还有十里路时，发现小河里的水有些浑，判定一定有部队过去。于是我们继续向桃子溪前进。路上遇见一个老乡，

说桃子溪刚才到了敌人，后面还在继续来。这样，我们立即决定打，……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岔路上，把两个团展开，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被冲垮了，敌人退到后山，我军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战斗才结束。”^⑬

是役，除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以外，共消灭湘军一个师部、一个旅部、一个山炮营和一个整团，缴获山炮两门，活捉了师参谋长。其中的一门山炮，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收复桑植县城，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

三天之内，红二、红六军团在陈家河和桃子溪两战告捷，不但歼灭了五十八师，而且将何键的合围圈撕开了一个缺口，正如任弼时所说：“敌人原有的包围封锁合击我们的计划已失其效用，而我们依据以桑植为中心的广阔地区转入自如的有利的地位。”^⑭

从此，冲破敌人“围剿”的战斗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国民党军由主动地位转入被动，红二、红六军团运用遵义会议确定的新的军事原则，握着主动权转入反攻和进攻。两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指挥下，进退自如，仗打得有声有色。

为了调动敌人离开基本根据地，四月下旬，任弼

时继续随军行动，和贺龙等率主力大踏步地东进，占江垭，出慈利城北，威胁湘军后方的常德，并夺取慈利、石门，进占津市、澧县，故作横渡长江的势态，以威胁湘军后方及长江交通线，调动合围的湘鄂军。果然，各路敌军惊惶失措，力图自保：湘军生怕红军断其后方补给线，急令李觉纵队全部和陶广纵队一部回师东来，援救慈利；鄂军怕红军渡江后深入湖北腹地，徐源泉将西面龙山、来凤地区的两个纵队转移到鹤峰、五峰、渔洋关、长阳一线，固守长江防务，同时电告何键，将驻塔卧的郭汝栋纵队东撤，要何键派兵接防。何键只得从陶广纵队的第一八四旅抽出两个团进驻塔卧。这一来，何键苦心经营的合围计划土崩瓦解。五月初，红军在象耳桥、江垭地区筹款集粮，扩充新战士一千余人，然后把主力拉回永顺、桑植间寻求新的机动。

陶广纵队的两个团刚刚在塔卧接郭汝栋的防，第二天，五月七日，红军在塔卧永顺道上消灭其一个营，并包围了塔卧。塔卧、永顺吃紧，何键手忙脚乱，复令刚到慈利的李觉回师援救。

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何键原来企图把红军压迫在狭小地区“聚而歼之”，结果，被困于狭小地区的首先是陶广所部的两个团。自六日接防后，该部当即被红军包围，团长朱再生、钟涤菴频频向纵队

司令陶广告急。其狼狈相且看何键自道：

五月八日，红军的两个师“将塔卧包围，枪炮并举，势极凶顽”。

十一日，钟、朱两团“粮弹渐缺，恐乱军心”，即派人去永顺向旅部请援。

十二日，章亮基报告陶广，援军李觉原定十一日抵大庸，十二日到石堤溪，“但未到”；而被围的两个团已“粮尽弹缺，实难为济，各部宰杀牛马，搜索菜根树皮，以维军食”。

十三日，陶广报告何键：“若不急援，守塔卧官兵将全部牺牲”，“似此迁延，则弹尽援绝，坐使陷围孤军沦于危殆，可痛孰甚”。何键即电第一八四旅旅长钟光生等，“兼程赶到石堤溪，向塔卧进援。救兵如救火，毋稍违延”^⑮。

直到十四日，钟、朱两团已被围六日，钟光生才赶来解援。

五月九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全部北渡金沙江。战场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任弼时、贺龙认为：红二、红六军团牵制吸引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存壮大力量，坚持在长江以南进一步打击消灭湘鄂两军的有生力量，恢复和发展苏区。五月中，军分会讨论研究，大家认为：过

去，两军团为了牵制敌人，主要是对湘军采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因为两相比较，湘军力量较集中，和红军作战经验较多，鄂军分散薄弱，又不善于山地作战，当前湘鄂两军在地势上已被红军分割，湘军在东，鄂军在西，他们指挥不统一，红军有矛盾可以利用。应当据情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所以，从五月下旬起，任弼时、贺龙和关向应等率两军团主力向西进逼驻防龙山、来凤的鄂军。六月九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西面突破龙山、宣恩的封锁线，准备包围宣恩城。

宣恩，地处徐源泉的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即施南）的南面，徐部的“协剿”军驻防的龙山、来凤的北面。红二、红六军团包围宣恩，南可扼来、龙，北上可进逼恩施、利川和四川的万县，直接威胁长江交通线。任弼时、贺龙等之所以包围宣恩，不仅是因为城内守军只有两个团，更重要的是“攻其所必救”，可以“围城打援”。于是，红二、红六军团统一指挥，密切协作，由红六军团先占宣恩城北的椒园，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铜山堡，切断北通恩施的大道，显示红军必取宣恩的决心；红二军团隐蔽在城南二十里处，随时准备打击北上的援军张振汉纵队。敌慑于红军的威力，迟迟不敢动。但宣恩一旦被红军打开，势必危及恩施。围城三天后，徐源泉坐不住了，电令驻来

凤的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率九个团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约定的集结地点是距宣恩九十里咸丰县的忠堡。张振汉将行动路线、行军序列和途中休息地点电告徐源泉。谁知这份密电为任弼时直接领导的“小电台抄收”破译。十二日凌晨，贺龙、任弼时率善于山地作战的红二军团急行军奔向忠堡。午后三时，红二军团先敌一小时到达；红六军团随后赶到，投入战斗。经三天战斗，红军在忠堡地区击败徐、张两纵队九个团，俘纵队司令张振汉。十五日，红军撤出忠堡地区，以小部围困龙山，大部休息整理，并在李家河召开祝捷大会。这次战斗，“小电台”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使红军能掌握先机，所以贺龙风趣地说：“一个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当红二、红六军团正集中主力和徐源泉部作战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任弼时大为困惑的事：

六月中，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大雪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偏偏在这时候，红二、红六军团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突然中断了。自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长征后，随军行动的党中央机关行踪不定，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红六军团总部则地区相对固定、且和中央保持着电讯联系。因此周围的游击区常通过省委向中央转报情况，取得中央指示。省委上传

下达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一九三五年二月，中革军委指示坚持在湘鄂赣的红十六师，要他们和在湘赣的陈毅等部联系，“争取在湘粤赣边区打成一片”。中央的方针就是通过红二、六军团转达的。党中央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也是经任弼时沟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遭敌人破坏，党中央和上海局及共产国际联络中断。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海的地下党再次受摧残，临时中央局、共青团、工会、特科等机关“干部牺牲很多”。上海局的交通员两次来找红二军团，还带来了上海局与党中央联系的通用密码。任弼时对来人经过考察后，三月五日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建议“开始建立此间与沪经常交（通）线，拟于津（市）建立中（转）站”。^{①⑥}党中央得此情报后，张闻天立即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潘汉年，准备随政治局委员陈云到上海，设法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并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潘汉年化装成商贩经贵阳到香港，转辗到上海。六月，陈云从懋功出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经成都、重庆到上海。八月与上海地下党及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取得联系，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才得以恢复。^{①⑦}

党中央和省委电讯联络突然中断，任弼时并不知道那里发生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六月十六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决定两军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决策，于是党内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七月十八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党中央决定张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中央和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因此也交给了张。这样，党中央和任弼时的直接电讯联系便中断了。不明真相的任弼时，陷入困惑中，他深知当年夏曦撤离湘鄂西根据地后，因得不到党中央指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确实是一件很痛苦困难的事”。因此，任弼时布置机要科的同志抓紧电台的侦察工作，密切注意党中央电台的呼号。机要科长龙舒林回忆道：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机要科来讯问和指示，情况紧急或准备作战时，一天要来几次，甚至通宵守在机要科等待情况，有时，看到我们太疲劳了，便亲自动手帮助工作，让我们休息一下。”^⑬

任弼时说：“在我们的兵器条件下，攻击具有新式武器且有工事的城市，一般是应该避免的”，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当时“以少数兵力利用休整时间围困

龙山城（不是强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根据是什么呢？一是忠堡战斗后，红军给徐源泉部两个纵队以惨重打击，“敌人增援部队在半个月至二十天内没有到达的可能”。二是龙山的守敌只有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共约一千四五百人，城内居民近万人，城内的守军至多能维持十天到半个月的给养。三是龙山城地处湘西边缘，和来凤相距十五里，中间夹一条酉水，是湘鄂两省的交通要道，攻下龙山，可能逼退来凤的守军，“我们若能取得龙山、来凤，在地理及其它条件上最适宜作我们根据地”。于是决定围困龙山，一面挖坑道破城，一面围城打援。命令两个师先扫清龙山城外的碉堡，长期围困龙山，相机夺取县城；主力大部分散到周围各地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扩军和整训。

六月十八日，红军开始包围龙山。一周以后，红军以政治攻势将西北两面城外守碉的敌军争取过来，“碉楼为我据有”；东面碉楼的守军仍坚守待援。这时，红军已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几门山炮，但是，炮弹不多，瞄准技术又不熟练。贺龙沉思后说：“就那么几发炮弹，要一发顶十发用，弹无虚发才行。”他和任弼时商量后，决定把张振汉叫来。张学过炮兵，被俘一个多月来，红军按政策给予优待，让他留下当教员。张振汉选好炮位，瞄准一千米远的碉

堡，只两炮就把它摧毁了。张振汉后来在红二、红六军团的随营学校担任教员，全国解放后，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政协，并当选为政协委员。

扫清了龙山城外的碉堡后，守军龟缩城内，用石头把城门堵得严严的，城内城外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围城内粮食恐慌，徐源泉只得派飞机空投，可惜红军对空射击技术差，尽管敌机在三百米的低空掷投粮食，仍无法予以击落，使守军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在打救援部队方面，红军却接连获得战果：七月三日，主力一部在永顺洗车线上的小井，击败湘军陶广纵队；十日，在来凤、龙山间的象鼻岭又击溃潘善斋旅，月中，又在咸丰、来凤间的胡家沟打击鄂军黄新纵队。

这时，蒋介石从江西调来两个师到湘鄂川边增援，归徐源泉指挥。湘军何键亦命陶广、章亮基两师援解龙山之围。任弼时、贺龙决定撤龙山之围，集中力量迎击援敌。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七日，红军主力一部围龙山四十天，城虽未克，但主力大部得到休息整理，在几次打援中，接连给敌以打击。

撤龙山之围后的十三天内，红军进行了三次重要战斗，即招头寨、板栗园和芭蕉坨战斗。特别是板栗园战斗，红军奇兵突出，创造了楔入纵深歼敌的战例。

这时，谢彬的第八十五师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军的一个师已赶到湘鄂川边。徐源泉立即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分别命令：要谢彬向宣恩南面的李家河开进；要驻鹤峰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和驻高罗的第四十八师一个旅推进到沙道沟，由驻来凤的第一二三旅先占李家河予以掩护。“小电台”的政委龙舒林回忆说：八十五师调到鄂西事前我们并不知道，监听的敌军序列表中没有他的番号。有一天，一个报务员无意中抄收到谢彬给徐源泉的电报。我们从电报中得知，八十五师已到达咸丰，准备经板栗园、李家河增援龙山。敌军的行进序列是以一个团为前卫，中间是师部，后卫两个团，定于第二天中午到板栗园休息。

任弼时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和贺龙等分析：认为谢彬新到鄂西，情况不熟，他规定的行军路线是一条地图直线，沿途山高林密，峡谷深邃，道路崎岖，不但部队运动困难，侦察搜索不易发现目标，而且当地守军仅限于县城和大的集镇，中间空隙很多，红军可以乘隙活动，设伏歼敌。

任弼时和贺龙决定，立即出动部队，以“声东击西”的办法迷惑敌人，然后奇兵突出伏击谢彬师。

八月二日，徐源泉命令三个师分头南进，中间夹着大山。红二、红六军团从兴龙街兼程北上，徐源泉

产生错觉，以为红军矛头所向是对着东面的三十四师和四十八师，立即命令他们停止行动，在沙道沟待命；西面的谢彬也产生了错觉，以为红军的行动方向和他的行动路线相距甚远，仍按原计划经板栗园向李家河推进。三日拂晓，到达沙道沟附近的红军，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疾行，楔入谢彬部八十五师的翼侧。红军抄山间小道，力争在上午十一时前赶到板栗园附近的利夫田。

利夫田是板栗园东南七八里的一个谷地，是谢彬去李家河必经之地，谷地长十五里，宽不足一里，南面山势陡峭，北面森林茂密，红军依据地形把一部分主力置于谷地北面，一部分放在南面的进出口，封锁隐蔽，严阵以待。

谢彬满以为红军距离尚远，近在咫尺的李家河又在友军手中，从板栗园到陈家河沿途，老百姓种地的、砍柴的、钓鱼的平静如常。谁知一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二、红六军团伏兵突起，被打得晕头转向。师长谢彬胸腹中弹后，督军顽抗，但前无接应，后无援兵，眼看大势已去，难于挽回，只好拔枪自杀。这一仗，红军掌握先机，奇兵楔入敌人纵深，共歼敌一个师，两个团，一个特务营大部，缴获长短枪支九百八十多枝，迫击炮六门，弹药六百多箱，银元六万多枚。

八月八日，红军转移至芭蕉坨，再击败陶广纵队的十个团。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奋战半年的反“围剿”战斗胜利结束，国民党的“进剿”、“协剿”军原来部署的六路纵队和后来增调来的兵力均被红军击败，他们依靠现有的残部已经无信心也无可能组织“围剿”或反攻，只能重新麇集力量再作打算。而红军却乘胜组织反攻，创造了打破国民党军新的“围剿”的条件。八月二十日，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率主力再次东出津市、澧州地区，先后占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城镇，在这个地区发动群众，宣传红军抗日反蒋的主张，没收分配地主恶霸的财物，严惩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年，津、澧洪水成灾，贫苦大众衣物入当者甚多，红军打开当铺，让群众持当票取回押物；又打开官盐仓，低价卖盐给群众。红军在津、澧地区活动半月，缴获敌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军费银圆十多万枚，赶制了冬衣，扩大新战士三千多人。九月中下旬，红军主力集结于石门西北地区整训。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将国民党军的“围剿”线从慈利的江垭附近往东逼推了二百余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游击区扩大：东起洞庭湖的西岸，西至四川的酉阳县境，南临沅陵边境，北达长江边鹤峰的太平镇，西北至湖北咸丰的忠堡和宣恩的椒园，人口约有百余万。

九月二十九日，任弼时在石门县的磨岗隘（今磨市）召开全军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总结半年来反“围剿”的战果和经验教训。全军在湘西地区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多次，先后与八十六个团的国民党军直接作战，除倚城或据点固守的十个团敌军外，均被红军击败，先后占领过七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军两个师，一个旅，一个师部，活捉纵队司令兼师长一人，师参谋长二人，毙师长一人，俘旅长以下军官百余人，士兵八千多人，毙伤敌一万人以上。在和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战斗中，红军扩大到二万一千多人，重建了红十八师和十一、十七两团，提高充实了独立团营和游击队的战斗力。

如果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强大的追敌，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遵义会议之后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胜利，那么，红二、红六军团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再一次证明遵义会议的正确性。在强敌面前，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的指挥下，时而在运动战中以少胜多，时而声东击西，时而围城打援，时而又奇兵突出，楔入纵深歼敌，从而积累了系统的作战经验。任弼时在总结大会上说：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

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力，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⑬

那么，红二、红六军团粉碎敌军的“围剿”，保卫湘鄂川黔根据地，在战争全局上的意义是什么呢？任弼时总结说：

“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

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起来。”^{②①}

以任弼时为核心的红二、红六军团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历史任务。萧克这样写道：

“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②①}

二十一、长征途中（上）

中央红军北上后，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柱石”，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发动第三次进攻。这次进攻的特点一是兵力多，二是以“中央军”为“主剿”力量，因为蒋介石认为靠省军已不可能达到“彻底消灭”红二、红六军团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蒋介石在宜昌设立“行辕”，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的职权，从江西、湘鄂边、鄂豫皖抽调汤恩伯、孙连仲和薛岳等十余万精锐部队作为“进剿军”，原有的湘鄂各军为“堵剿军”，合计兵力一百三十个团，等于前两次的总和。十月十八日，陈诚发布第一期“进剿”计划，要旨是利用碉堡封锁线，将红军“竭力向西压迫”，缩小其活动范围，然后“进剿军”、“堵剿军”协同作战，限十一月五日前占领红军总部所在地磨岗隘。

强敌压境，省委和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与中

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任弼时独当一面，沉着地应战。在情报来源困难的条件下，他非常关注国统区的报纸，《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乃至伪满洲国的《盛京时报》，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剖析这些报纸上的消息，估量形势，了解各地红军斗争的动向。九月二十九日，任弼时在磨岗隘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进行作战动员。他指出中央红军、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四方面军以及游击队广泛的活动证明，“苏维埃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蒋介石将华北大量权益出卖给日本，激起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怒潮，连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兵也不满于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任弼时号召大家，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克服不相信红军力量，动摇、悲观或者是轻视敌人，放松战争动员等思想，全力投入战备。

就在这一天，机要科的电台收到了一份出乎意外的电报。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回忆说，这是一份明码电报，大致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①任弼时喜出望外。他知道，“豪”即“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简称，“密留老四处”，可以理解为中央和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四方面军那里。但是，任弼时并不知道这中间发生的事情，他立即用密码复电，投石问路，电文是：

“恩：（一）我们八月廿七日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二）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三）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连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②

当天收到复电，但署名的不是周恩来，而是“朱张”，来电准确地列出了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和书记的姓名后说：“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望你们以冲破敌人之‘围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③这是任弼时等第一次收到以“朱张”署名的电报。大家知道，“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来电既是总司令、总政委联名，使用的又是密码，因此任弼时确认中革军委和红二、红六军团已经沟通了联系。至于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任弼时一面请“朱张”转报，一面几次询问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

十月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联名向中革军委报告敌情，电中询问：“一四方面军是否已入陕境，今后行动大的方向盼告我们，以便依据来决定我们行动。”^④

十月九日，贺、任、关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并转中央，提出行动方案：如能得到“一四方面军向川陕鄂豫边活动配合着，我们决定在桑、龙间苏区及慈（利）、石（门）、桑（植）、鹤（峰）口地区进行战斗，首先取得击破东面樊、孙纵队”；但据此间情报，“一四方面军似在甘肃地区行动，这对我们配合作用较小”，现有地区狭小，不利于与强大敌人持久战斗，“应迅速突出敌包围线转移方向退黄平之线”。事关两个军团行动方向，因此电中再次询问：“一四方面军将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及其发展方向盼告，你们行动方针望速以电复。”^⑤

十五日，朱、张电复：“……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们配合。”^⑥对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在甘肃南部突破天险腊子口，翻岷山占哈达铺的胜利进军不置一词。

十九日，朱、张来电中又只说：“……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⑦对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捷报避而不谈。

一直到十一月十二日，“朱张”来电仍然只告知红四方面军“攻占芦山”，“雅安、名山不日可下”，强调说：“这一胜利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胜利基础，

建立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⑧对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北建立革命大本营、中央红军和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会师等重要决策和胜利讳莫如深。

为什么红二、红六军团在一个半月内一再询问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而“朱张”联名的来电竟然只字未肯透露？看一看张国焘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和朱德的处境，答案是不难明白的。

原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先取甘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同意，行动上处处作梗，他拥兵自重，坚持南下川康，党中央一再说服等待。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中央任命张为军委副主席及红军总政委。到八月初，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将红军分编成左右两路：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左路军，约定走出草地后共同向甘南进军。但是，张国焘行抵阿坝，不顾中央一再要求迅速北上的指示，直接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为避免红军内部发生冲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转移，张国焘变本加厉，诬蔑中央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九月中，张发布

《大军南下令》，十月五日，也就是任弼时等接到朱张名义的电报的第六天，张国焘在卓木碉竟然另立中央，进行其反党分裂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任弼时等一再询问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张国焘自然严加封锁，竭力通报他南下川康建立根据地的胜利。

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不明真相，按正常的情况，把“朱张”的来电当作中革军委的指示。一直坚决抵制张国焘搞反党分裂活动的朱德后来对红二方面军的干部这样说：

“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这时，因为电报密码由总部带下来，被张国焘掌握了，二方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不经过他不行”，“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关于军事上的指挥，是我和刘伯承同志搞的，向你们发电报也是他同意的。”^⑨

任弼时等就在敌情严重、党内斗争非常复杂的局面下开始长征。

敌人围攻日益迫近，红二，红六军团如何动作？中革军委两次来电，都是要红二、红六军团在原有苏区周围击敌，同时又叮嘱：“一切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但是，十一月一日来电却一反常态，说“你们现处地区很重要，应坚决在现地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继续逃跑”^⑩。这封电报同时也是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电文措词严厉，简直使任弼时等如堕入五里雾中！难道说按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在不利条件下为保存实力作必要的转移是逃跑？“继续逃跑”的指责从何说起？！

十一月十八日，省委和军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大家认为：中央红军北上后，红二、红六军团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保存和壮大力量，寻求新的机动，而原有苏区的条件是不利于长期坚持的。因为这时，根据地的东面是步步紧逼的强敌孙连仲、樊崧甫纵队，且受湖泊河网限制（东面是洞庭湖）；西面碉堡密集，乌江敌置有重兵，北面封锁线外有清江、长江障碍；只有南面，虽然横着澧水和沅水，但敌方兵力较弱，突破封锁线后便是人多物阜的湘中，得手以后，可以在广大无堡垒地区活动，筹粮筹款，扩大红军。于是，任弼时和贺龙等决定：以高度机动南入湘中，调动敌人。若能伺机歼敌，可创造条件返回原有

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5年11月—1936年7月

根据地；如不可能，则向西远出到黔东的石阡、江口、镇远、黄平地区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后第一个战略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上午，两军团分别在桑植的刘家坪和瑞塔铺召开誓师大会，当晚，任弼时和贺龙率全军一万七千多人出动，留下红十八师在根据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南进。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走的是湘西的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这一带，现在已开辟为自然风景壮丽的旅游胜地，可当年，这里山荒岭野，林荫蔽日，被人称为“峰三千，水八百；强人隐，虎豹行”的“鬼魅之乡”。红军攀崖而上，缘石而下，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澧水北岸大庸、慈利交界的安坝、杨林渡、张家湾一带。这里是湘军李觉和保安团防区的结合部，他们意想不到红军会走这条人迹罕至的道路，所以疏于防守。当晚，风雨交加，两军团乘夜黑抢渡百米宽的澧水，接着兼程前进，二十一日傍晚，任弼时和贺龙随二军团到达沅水边的大晏溪渡口，红六军团到达洞庭溪。

湖南有四水：湘、资、沅、澧。湘水最长，沅水最急。特别是中段沅陵附近，北岸是武陵山脉，南岸是雪峰山脉，两山夹一水，浪急滩多，所谓“三垸九洞十八滩，滩滩都是鬼门关”，大晏溪、小晏溪以下，

岫嶙乱石，或突兀河中，或隐藏水下，远看只见岩石不见水，近看，河水在巨石中间咆哮直撞。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在此遇难，至今，伏波庙犹在。这时，国民党的空军出动了，坐在木船上的贺龙风趣地指着在沅水上空盘旋的五六架敌机对任弼时说：“他们来晚了。再见吧！”

红军在山岭小道上急行三百八十里，渡过沅、澧两水，终于冲破了李觉自夸“可保无虑”的封锁线，使陈诚的第一期“进剿”计划化为泡影，长沙、宝庆大惊。国民党的军事史家说：“自命不凡之陈将军，大权在握，唯我独尊”，以“逐段筑碉为指皈”的“进剿”，不过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结果“失其效用”，其“首次发号施令，见地计划也不过如此！”^①为了挽回面子，陈诚下令追查责任，给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记了两次大过。

当任弼时、贺龙等率部向湘中进军途中，红十八师来电报告：十一月十七日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刘士杰叛逃，请示处理。

刘士杰在湘赣苏区时原任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因为卖力地推行扩大化的肃反路线，向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诬告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肃反“右倾”，王首道因而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而刘则成

了“被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一跃而为湘赣省委副书记。任弼时到湘赣后，逐渐觉察到此人品质不良，所以成立湘鄂川黔省委时，只安排刘为省委常委。^⑫后来，他乘任弼时在前方由张子意代理省委书记时，大搞派别活动和独断专行，反对省委。省委全体会议决定撤销了刘的职务，他因此心怀不满，竟然趁大军转移之机，诡称“大部队马上要突围，急需军粮”，企图带省革委会的警卫连逃跑。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回忆刘士杰叛逃的过程道：

“所到之处，对筹到的粮食他又不不要，也不分给群众，一直往北走。到细沙坪时，张启龙已察觉到刘企图带领部队叛逃，于是除嘱警卫连张连长和徐指导员提高警惕外，亲率四名干部回桑植向省委报告。这时，刘带队伍继续往北走，沿途不敢在群众家住，一直在野外露宿。刘的警卫员周智高与张连长已发觉刘士杰企图叛变，他们商量后决定逮捕刘士杰，押送省委。”^⑬

这时，省委已经转移，刘因此被押送到坚持在根据地茨岩塘的红十八师师部。

任弼时一边详读电报，一边问袁任远：“怎样处理？”

袁说：“如在平时，还可以关押，等省委开会解决，现在部队已经转移，无法开会，如万一疏忽，让

刘跑掉了，那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我看你决定好了，将来交省委追认。”

刘士杰此次叛逃，企图带警卫连的一个排，“长短枪及手枪、花机关共五十余枝”，幸而警卫连官兵警惕，未能得逞，但临危叛逃，情节是十分严重的。所以，红十八师当机立断，处决了叛变分子，并将情况报告省委。十一月二十五日，任弼时将刘士杰叛变及决定永远开除党籍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⑭

后来，有人说：刘在湘赣时就是反革命。任弼时说：“我认为刘士杰和陈洪时都是投机分子。当革命胜利之时，当他们在党内有地位的时候，他们可以留在党内，当革命困难之时，当他们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离开革命，叛变革命。”^⑮

钢与渣，在斗争的烈火中显现了不同的本质。

湘中地域广阔，红军兵分两路：任弼时、贺龙随红二军团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相继占领湘西的辰溪、浦市、溆浦等城镇，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同期占领湘中的新化、锡矿山、蓝田等。当即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反蒋主张，筹集物资，扩大红军。是年湘中丰收，新谷登场，灌满冬水的稻田明亮如镜，山坡上，黄澄澄的新桔把枝头压得弯弯的，红军在湘中腹地获得了短时间的休息。

在此期间，陈诚无可奈何地撤去湘鄂、湘黔防线的兵力，改“围剿”为“追剿”，令李觉、樊崧甫、陶广、郭汝栋、汤恩伯五个纵队的十二个师和一个旅向湘中追来，他们正面追击，两翼迂回，先后占辰溪、溆浦，企图围歼红军于沅水、资水之间。任弼时和贺龙决定收拢部队，撤出湘中，于是率部向东连续行军九天，把追敌吸引到资水一带。十二月二十日，部队到达武岗以北的高沙市、洞口地区，此时桂军已开始北调，在边境防堵，红军折转向西，经武岗、绥宁间的瓦屋塘，再次渡过沅水，冒着纷纷大雪，抄山间小道急进到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敌甩在后面，于是杀猪宰鸭，在芷江迎来了一九三六年的元旦。

樊崧甫、郭汝栋、汤恩伯三个纵队眼看红军北去，均放慢了进追的步伐，只有湘军李觉、陶广两个纵队尾追不舍，特别是李觉，因为在大庸“守备不力”受了处分，所以格外卖力，率先头第十六师沿芷（江）、晃（县）公路紧追，后面有两个师跟进。任弼时、贺龙决定：以一部西取晃县、玉屏作为临时后方，主力在晃县龙溪口地区准备打击李觉所部，以挫其锐气，得手后在湘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便是一月五日开始的便水战斗。

一月五日上午，红二军团率先出动，午后二时六军团出动，计划把跟追的国民党军两个师隔在沅河

以东，集中力量歼灭已渡过沅河的第十六师。可惜两军团动作不齐，配合不协调，战斗进展缓慢，使跟追的两个师得以渡沅河赶来增援，红军原计划打一个师，这一来，发展成为打三个师，激战二日，结果打了一场消耗战。王震后来说：

“便水战斗，给了李、章纵队以创伤，大挫‘追剿’敌军之士气，虽未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然而我军浩荡地向西进攻，六军团占领江口、闵家场，二军团占领石阡县城，主力取得两星期的休息。”^{①⑥}

便水战斗未收到预期效果，红军第一个战略目标即在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已难于实现，任弼时深感遗憾，所以，十九日在石阡总结经验教训时，他对有关指挥员处置失当进行了批评。贺龙回忆说：任弼时讲到战斗的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任弼时来说，的确是不多见的。

便水战斗后，红二、红六军团完成了从湘鄂川黔到黔东的转移任务。留在原根据地的红十八师也完成了钳制任务后奉命突围，向主力靠拢。他们浴血奋战，历尽艰辛，来到江口县的茶寨。任弼时和贺龙电令他们开至江口县城，归还红六军团的建制。时，红十八师幸存六百多人，后缩编为红六军团第五十三

团。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末，任弼时接到由红四方面军转来的长电，内容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决议案》的摘要，分析了全国抗日反蒋的新形势，制定了十项行动纲领。这是全党工作从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折的开始。当时部队正在由湘入黔的转移途中，没有可能召开会议传达讨论。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部进入黔东的山城石阡，总指挥部设在天主堂里。这时，任弼时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推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质是“以华治华”。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声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北平的学生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示威运动。全国的形势正如中共中央来电所说：“更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进入石阡后，任弼时立即召开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向部队作报告。一月中的一天，石阡天主教的福音堂里，济济一堂的是头戴八角红星帽，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战斗的红军指战员。任弼时站在“神坛”前，分析全国形势，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

由红四方面军转来的长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会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一结束，中央便将决议的摘要电告“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由于中央和红二、红六军团电讯联络不通，会议所作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特别提出要在半年内“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①7}在此之前，中央只能交由掌握密码的张国焘转发，因此中央在给张的电中特叮嘱“望负责转二六军团”。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国焘在转发的电报中，竟然卑鄙地在电文中做了手脚。例如：在分析“苏维埃运动转入一个新的胜利时期”时，中央说：“中央红军与二六、七（即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之后，对敌向陕甘苏区之三次‘围剿’彻底粉碎是这个时期的鲜明的标帜”。任弼时所收到的电文则成了“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都说明苏维埃运动没有低落，而且得着新的发展”。这样一改，作为新时期“鲜明的标帜”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彻底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的内容不见了，只轻描淡写地留下“陕北的新发展”六个字，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胜利”却被强调为苏维埃运动新发展的主要内容。张国焘的用心和两个月之前对红二、红六军

团封锁中央红军胜利的消息及中共中央的行动方向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前者用的手法是“瞒天过海”，那么后者便是“偷梁换柱”，远在江南而又不能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任弼时自然是难于了解此中奥妙的。

红二、红六军团自离开桑植后，近两个月内，行军数千里，且战且走，到石阡后，部队才得到一次大休息，在瓦窑堡会议的重要精神鼓舞下，部队情绪饱满。这时，国民党方面估计红军可能返回湘鄂川黔，急忙调动十五个师的兵力，其用意一是当红军向北移动时，消灭于乌江以东、铜仁、松桃以西地区；如达不到目的，第二手是压迫红军南下到桂、黔边境，借桂军的力量与红军厮杀，以收一箭双雕之利。一月七日，军委来电：“二六军（团）可在黔滇湘一带广大地区活动，在敌力较弱之处行动，寻求各个消灭敌人之机……但勿入大荒野地，敌力虽多，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并指出：“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⑮一年前，朱德、刘伯承随同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曾经经过这一带，所以情况很熟。十九日，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石阡会议）。任弼时从实际出发认为，敌原有碉堡线已成碉堡网包围迫近，我军处于狭小地

区渐成被动局势。何况以石阡为中心的地带，居民稀少，粮食缺乏，地形不利于运动战。会议讨论决定向黔西进军，争取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后第二个战略目标。

石阡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和贺龙看望了伤员，当晚，部队分别在驻地召开联欢会、聚餐会，欢迎在石阡地区入伍的八百名新战士。

一月二十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部离开石阡，开始了抢渡乌江的战役。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先向南行，进入余庆县境。二十三日，朱德来电：“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①⑨}任弼时、贺龙等率部继续南进，二十四日克瓮安，二十六日占平越，二十八日麾头向西折转取龙里县的洗马河，先锋直指贵阳。防守乌江上游鸭池河渡口的国民党军九十九师、二十三师忙向贵阳收缩，鸭池河防务削弱。三十一日，红军在离贵阳北六十华里的扎佐突破封锁线，挥师西进占修文县城，一面摆出经息烽北渡乌江之态势，使乌江北岸的守军不敢南下，一面于三月一日星夜从修文西进，连夜抢占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东岸，消灭守敌，抢架浮桥，二日清晨，主力赶到渡口，压住对岸

的火力，开始渡鸭池河，到四日，全军乘虚渡过乌江。当企图阻击红军的九十九师、二十三师赶到时，已是四日傍晚时分，但见红军西去，望滔滔乌水，唯有兴叹而已！

二月三日，任弼时等率部占领黔西县城，为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根据地揭开序幕！

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是云、贵、川三省要冲，毕节居西，与云南省东北部毗邻，向北可通往川南，是黔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黔西居东，是黔西北的东大门，鸭池河附近的烂泥沟，设有四川省盐务局，管理八大盐号，存盐数十万斤，是川盐的集散地；大定（今大方县）在黔西和毕节中间。一年以前，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入黔经过这一带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当时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争取建立背靠云南面向遵义、重庆的根据地。这个地区少数民族的自卫武装很多，去年蒋介石利用“追剿”中央红军的机会，“假途灭虢”，收拾了王家烈的黔军第二十五军，其流入山林的残部也在这一带活动。中央红军走后，省工委负责军运工作的邓止戈先后在毕节建立党支部，了解社会情况，搜集军事情报，在反蒋的少数民族武装和黔军残部中开展工作，这对红二、红六军团深入黔西北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红军转移到黔西北后，国民党的数路大军被甩在黔东，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飞往贵阳，“临阵换马”，命令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将万耀煌纵队从汉中抽调入黔，由顾统一指挥八个师的四十多个团直奔黔、大、毕，连同云、贵、川外围堵截的部队共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同一天，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一）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二）入川……”，并说，“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是在极有利条件下采用。”^{②①}

二月五日，任弼时主持在黔西召开会议，决定继续留在江南，立即在黔大毕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第二天，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夏曦、甘泗淇等率红六军团机关及第十六、第五两师向大定、毕节进军；贺龙、萧克、李达率主力第四、第六、第十七三个师阻击来犯之敌；红十八师留驻黔西城鸭池河。

六日凌晨，任弼时等到大定时，守敌已弃城而走，红军便在地下党组织的群众欢迎下，浩浩荡荡列队入城。这时，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派人前来联系，说毕节地区由地下党掌握的或和地下党有联系

的地方武装共有三支，一支是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的毕节支队，由阮俊臣领导，人数达二千；一支是席大明领导的彝族人民反蒋自卫武装；另一支是周质夫领导的川黔边团队武装，他们已控制了毕节周围的要塞，正等待红军到来。任弼时等当即决定由王震率部进取毕节。九日，王震、夏曦率十六师在席大明部接应下，不费一枪一弹轻取毕节。

红二、红六军团在黔大毕的活动，时间不过二十五天，政治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

一是建立了革命政权。二月八日，任弼时主持在大定的孔庙召开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陈希云代），朱长清为副主席。并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民众抗日武装，保护发展工商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政纲，出示布告，张贴于通衢。接着毕节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等相继成立。十七日，任弼时率省革命委员会进入毕节，第二天，和毕节中心县委书记李国斌谈话，说：“中心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在斗争中建立党的组织和乡村政权。”李当即组成四个工作组，深入附近山寨。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黔大毕地区共建立八个区、九十五个乡村的苏维埃临时政权。

二是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省革命委员会布告：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队伍，不愿受蒋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的白军官佐士兵及民间绿林，“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联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以扩大民族革命战争。”^④进占毕节后，王震、夏曦和邓止戈便着手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贵州省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出任司令，邓止戈为参谋长，辖三个支队：席大明部为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红六军团派干部担任政治委员。

五十七岁的周素园，辛亥革命时在贵阳主编《黔报》，后任贵州省行政总理，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因不满于军阀混战，一九二五年后回毕节赋闲，从此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九一八事变后，老人深感报国无门，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红军逼近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要他出走，他断然拒绝，而红军礼请他组建抗日救国军时，他欣然接受，立即在毕节城内十字街周宅门前挂出牌子，一时，散落山林的反蒋抗日队伍纷纷来归。任弼时到毕节后，特地宴请了周素园，二月二十四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小教场正式

宣告成立。

三是贯彻民族政策，打击土豪劣绅。全区共打击土豪七百多家，将没收的粮食、盐巴、银元等分给群众，许多山寨建立了游击队，大定八堡六个苗寨还成立了苗族独立团。长年受反动政府压迫的少数民族一时反蒋、求民族解放的情绪高涨，黔军犹国材向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吴忠信报告说：“似共非共，遍地皆是”，^②可见群众革命气势之蓬勃。

黔大毕的根据地建设是在敌人猛烈进攻的条件下发展的。这时，顾祝同令万耀煌纵队兼程从四川綦江赶到黔西北，伙同郝梦龄向黔西东北面的打鼓新场（今金沙县）、三重堰方向袭来，红二、红六军团以主力三个师英勇阻击，不料万部得悉红军主力不在黔西城，不与红军正面交锋，径直南下，于三月十四日袭占黔西，立即将被红军阻隔于鸭池河东的郭思演纵队两个师接应过河，红军主力虽在黄家坝、将军山两次击敌，但这时万、郝两部齐头并进，十四日抢占黔西，十八日又占大定，毕节告急。二月十二日，朱、张电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本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③省委和军分会决定主动放弃毕节，撤离毕节地区，再一次作战略转移。

二月二十六日晚上，毕节的小教场里聚集着上万军民，灯笼火把将偏僻的山城照耀得如同白昼，这既是红二、红六军团和山城人民的告别大会，又是两军团向乌蒙山转进的誓师大会。会后，成千上万的群众举着融融火炬举行盛大游行。由于红军在黔大节地区扩红五千多，红二、六军团的队伍已壮大到二万多人，抗日救国军的第二支队编入了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红二军团组建了一个新的团即第五师第十四团。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到黔大毕，长途行军已达六千一百四十六华里，部队人数和出发时相比，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二十，高度地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正如萧克所说：“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②④}

第二天，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军团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面的赫章进发，王震、萧克率红六军团向南绕道准备在七星关、平山堡地区会合。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坐在滑杆上，挥手告别家人和红军一起踏上征途。后来，部队进入云南，昼夜行军作战，任弼时和贺龙鉴于他年迈体弱，拟拨一笔款，送他去香港，一面治病，一面做统战工作。邓止戈将领导的意图转告周素园时，老人说：“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近六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

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后来，周素园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称他为“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任弼时、贺龙率部过了七星关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溺水牺牲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红六军团行抵七星关时，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的政委李国斌向夏曦报告：席大明的队伍开不动，请夏曦前去说服动员。周素园说：他的枪支是彝家二千户出钱买来保家的，如果不离开黔西，他们是红军的同盟军；红军远去，他们要保家乡了。夏曦便和邓止戈、李国斌一起过河，准备再去说服。过河以后，得知席大明已经带着队伍远去，临走托人捎话：对不起贺老总，我不能离开地方。夏曦便让邓、李前去追赶，自己返回河对岸等候消息。不料徒涉过河时溺水牺牲，时年三十五岁。夏曦，一九二一年入党，在湖南和毛泽东、李维汉、郭亮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北伐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党的“二大”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六届四中全会时增补为中央委员，后来在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时执行了“左”的肃反路线，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批评了他的错误，改做地方工作。后担任红六军团政

治部主任。萧克说：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议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⑤三月二日，任弼时以“深痛惜”的心情向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至于席大明，贺龙说：花了那么多光洋队伍仍拉不走，要不是党的政策，我就对他不客气。任弼时说：“人家说对不起嘛！后会有期。”^⑥红军走后，席继续与国民党战斗，抗战初，被四川军阀杨森诱杀。

安葬了夏曦之后，红军指战员忍着悲痛继续前进。如今，毕节的七星关上，矗立着夏曦的纪念碑，毕节的烈士陵园里，夏曦的陵墓在绿树环抱中供后人凭吊！

任弼时说，撤离黔大毕后“为我军长征中处境困难时期”。其所以困难，一是敌情，二是天候地理条件。

红二、红六军团原来准备到“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地区，但坐镇贵阳的顾祝同企图压迫红军于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边境。他一面令樊、郝两个纵队

沿毕节大道平行向西逼进，以李觉在郝、郭两纵队协同下，抢占威宁和水城一带，堵截红军南进安顺的道路；一面则令滇军孙渡纵队在威宁、昭通地区防堵红军入云南，又以川军的十个团沿金沙江北岸布防，防堵红军入川。三月二日两军团领导在赫章的野马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西进入乌蒙山区。

黔滇边的乌蒙山是贵州的乌江、南北盘江和云南的牛栏江的分水岭，逶迤千里，群峰壁立，气势磅礴。红军虽可利用山险回旋转战，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三月春寒，岩崖上峡谷里冰雪未消。红二、红六军团在赫章、威宁、镇雄和云南的昭通、彝良一带回旋转战，伺机突出重围，和在梵净山受困时不同的是：那时行军作战只凭一本中学生用的地图，这次，已有了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了，这是忠堡战役中的战利品，所以对贵州的地形比较了解了。

三月八日，红二、红六军团西进到滇黔边的奎香，樊崧甫纵队追来。军团总指挥部令第四、第十七两师从奎香、寸田坝折返五十华里，在以则河地区杀一个回马枪，伏击樊部，歼其先头两个连后，二进奎香。接着向滇东北的镇雄前进，伺机南下到安顺地区。顾祝同以为红军已走投无路，下令将追兵全部东调，企图前堵后追将红军消灭在镇雄西南的大山中。三月十二日，万耀煌纵队的三个师已先期到达镇雄，

万亲率后梯队第十三师正向镇雄集中。总指挥部抓住战机，在则章坝伏击万部，该部急忙收缩，在镇雄的万部和郝纵队赶来援救。红军虽歼敌两个连，但没有打开南进的道路，当晚，在折向西进途中又与从威宁北上的郭汝栋纵队的前卫遭遇，这一来，部队被包围在三十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餐风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之势。但是，贺龙和任弼时冷静分析，认为敌主力东调后，南面的兵力必然减弱，立即紧急动员，减轻辎重，丢弃驮担和重装备，从郭、万两纵队的隙间突出，三进奎香，而后乘虚南进，二十三日，在云南宣威城北的来宾铺击退滇军两个旅，沿乌蒙山东麓直趋滇东，二十八、二十九日两军团先后进占黔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到南北盘江之间。至此，红二、红六军团历时一月，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大回旋宣告结束。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因粮困难，气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总共伤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⑦但国民党军也被拖得精疲力尽，李觉伤亡过半，樊、万、郝等叫苦连天。结果，顾祝同的“围剿”计划落空，重蹈陈诚的覆辙，红二、红六军团却绝处逢生，争得个柳暗花明又一村！

黔西南的盘县、兴义地区，是黔滇桂三省交界处，东隔北盘江与安顺相邻；南临南盘江，是黔桂的界河；西接云南，有乌蒙山为屏障，物产丰富，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任弼时和贺龙等决定在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桑植后第三次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三月二十三日，朱张来电：红四方面军已放弃天全、芦山，江南敌人“已陷入严困状态”，“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并指定六个渡河点。来电最后说：“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②⑧}二十九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联名复电说：依据目前情况，红二、红六军团“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渡河技术虽然幼稚，但按照来电所示，在元谋、龙街或向西经邓川、鹤庆、维西过金沙江“在春水未涨之前不致感受大的困难”。问题在于全国红军的行动犹如一盘棋，是一个整体，红二、红六军团是一个局部，局部应当服从整体，是否北渡金沙，首先应着眼于全局利益。任弼时、贺龙以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目光郑重提出：

“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汇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以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²⁹

当此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陕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二月，组成中国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且和张学良的东北军秘密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关系。但是张国焘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向远离抗日前线的青海、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和中央的方针对抗，任弼时等要他首先明确“整个战略”，张有难言之隐。所以，三十日以“朱张”的名义的来电说：“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对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来电说：“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汇合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³⁰

任弼时等慎重研究后，认为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声浪日益高涨，红军北上，与主力会合，将接近于抗日前线，有利于直接和日本侵略军作

战，这是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战略方向当服从于政治任务。“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③。当即收拢部队，电告中革军委：“我们决经华坪之线北进，四月一日前后向滇西方向移动。”^④即从元谋北上渡金沙江。

四月二日，任弼时、贺龙率部分两路过平彝，占寻甸，进入滇中。这时，蒋介石觉察红军的意图是北渡金沙而不是返湘黔边，急令刘建绪指挥樊崧甫、郭汝栋、孙连仲和李觉四个纵队追入云南，同时任命龙云为滇黔“绥靖”主任，统一指挥，蒋给龙的急电中说：“应从速设法紧追，乘其根蒂未深，喘息未定之时，努力歼灭，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务严飭各纵队兼程追剿，并代悬重赏以鼓励之。”这一来，龙云面临了难题，他一怕红军深入云南腹地，二怕“中央军”入滇，“假途灭虢”，成为王家烈第二。于是精心部署，让郭、樊两纵队到远离滇中的元谋、永仁至金沙江一线，奔命于山林之间；以滇军为先锋沿滇西大道追堵红军，湘军李觉纵队则尾随于滇军之后。四月九日，红军西进到普渡河，与滇军一场恶战，西渡未成，即改变从元谋北渡的计划，向滇西丽江上游的石鼓挺进。与此同时，红军请周素园出面写信给滇军孙渡，告以红军北上抗日宗旨，要孙渡给红二、红六军团让

道，指出“中央军”入滇前车有鉴。周的信切中龙云的心病，所以普渡河战役后，红军绕过昆明西进时，滇军主力尾随红军，作“送客式”的“追剿”。萧克写道：

“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③

石鼓在丽江县中部，咆哮奔腾的金沙江自西北直泻东南，迎头撞着海罗山，急转东北，回流二百里，呈一个“V”字形，此为长江第一弯，两岸山崖壁立，飞瀑如练，三千米深的峡谷里，江水势如万马奔腾，这便是令人胆寒的虎跑峡。四月二十日，蒋介石飞到昆明，偕同龙云在空中察看宾川、鹤庆一带，寻找红军踪迹，还亲笔写信给孙渡，企图在大渡河畔重新导演一出太平军石达开部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当他发现红军在石鼓至中甸间渡河时，已来不及部署兵力，只得命令空军轮番轰炸。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任弼时、贺龙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在一百三十华里河段上分五个渡口梯次渡金沙，至二十八日下午，全军一

万八千人，凭着少量船只和木筏胜利渡过天堑。红军的宣传员在岩崖上写道：

“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是日，朱德和红四方面军电贺：“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黔滇，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二十二、长征途中（下）

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是任弼时、贺龙等在抗日民族革命新形势下，适应历史潮流发展作出的断然决策；也是党内斗争各种因素交织的条件下促成的。

一九三五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日益紧迫的一年。七月，在“何梅协定”^①中，南京政府将冀、察两省大量主权让给日本；年底，日本又在标榜“防共自治”的要求下，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沦为“满洲国”第二。这一年也是全国民众抗日要求日益高涨的一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后，十一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工农红军时刻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远在西南边陲的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遵

照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登高一呼，偏僻的山城蛰龙四起，贵州省抗日救国军的旗帜顿时树起，而红二、红六军团的广大指战员，抗日爱国的热忱已经难于按捺了。因此，在接到以“朱张”名义的来电后，任弼时、贺龙等权衡战略大势，决定北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他们敢于独自决定行动大计，这反映了中央随军代表任弼时的政治敏感和魄力。

当时，中共中央和红二、六军团电讯联络不通，不可能直接向他们下达命令，但是，任弼时等的决策是符合中央意图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以陕北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方针后，一再争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北上。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中央向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一方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靠近苏联，希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电中强调说，“这一方针自是上策”^②。在这过程中，中央几次要张国焘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电报密码告知，张国焘一再拒绝。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③二月九日，张竟然答复：“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④五月十八日，林育英、周恩来

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⑤。张国焘仍不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得知红二、六军团渡江后，五月二十日，中央再电张国焘：“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现在“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欢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二十五日，中央已与东北军秘密商定，对两军北上不加阻拦，电催张国焘：“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中央将派红一方面军出天水、兰州策应。这一切，张国焘完全瞒过了任弼时和贺龙等，但是，红二、六军团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他们凭借对党和民族的忠诚，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排除迷雾，确定正确的航向。

那么朱德、刘伯承对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持什么态度呢？朱德后来说：

“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过江不过江不是个人决定（的），要以敌人的力量来决定。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的，把团结搞起来了”。

“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军

在会合之前是不知道张国焘反中央的。在会合后，二方面军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二方面军拥护中央，迫使他（指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⑥

张国焘的态度又如何呢？那时正是他搞反党分裂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他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身份，控制了密电码，切断了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红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在答复林育英、周恩来的电中说：“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⑦对红二、六军团是否北上，他完全从搞反党分裂活动的需要出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用朱德的话说：“他在没有决定北上之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北上。”^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在阿坝抗命南下，命令红四方面军从草地折返，十月七日，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向川南进军半个月，击溃了杨森、刘文辉部六个旅，因此得意忘形，十一月一日，一面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战计划》，一面向红二、六军团及红一、三军

团发号施令，这就是那道措辞严厉、要红二、六军团“坚决在现地区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继续逃跑”的电令，其用意是要他们留在湘鄂川黔作前梯队，为他“建立川康苏区”的“战略任务”服务。不料，他的“大战计划”受挫，打下天全、芦山后，在百丈关一战，伤亡近万人，十一月下旬被逼撤出。时冬天来临，在天寒缺粮的困境中和敌人对峙两个月，正如毛泽东预言，南下陷入了“绝境”。在这期间，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当张国焘要共产国际承认他的第二“中央”时，林育英把共产国际的意见电告了他，接着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责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停止一切反党分裂活动。二月上旬，张国焘不得不率部向西康东北的懋功、甘孜、瞻化（今新龙）、泰宁一带转移，部队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在四方面军内部，他的企图又受到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有力抵制。如果说，张国焘南下碰壁是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开始，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支持宣告了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彻底破产。这时，他无可奈何地致电林育英和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表示希望

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与他会合北上。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顺利渡过金沙江后，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军团沿着玉龙雪山山麓北进，红六军团跟进。这一带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西面是层峦叠嶂的横断山系：高黎贡山、怒山、云岭、大雪山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相间排列，平行南下。玉龙雪山山高谷深，素有“关山险阻，羊肠百转”之称，部队经小中甸，翻过玉龙雪山，五月一日抵达滇西北高原的中甸。

中甸，海拔三千多米，群山环抱，雪峰林立，虽是县城，但只有几百户人家，十几家汉人开的铺子。离城二三里的归化寺，是云南最大的喇嘛寺，政教合一，主事的是八大老僧。任弼时、贺龙等当即与寺僧接头，言明红军宗旨，此番取道北上，目的是抗日反蒋，军行所至当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并派部队看守寺院经堂。喇嘛们以礼相待。贺龙特书赠“兴盛番族”的锦幛留念（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时出示布告，望沿途群众及喇嘛僧侣，“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惶逃散，尤望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红军本来想在中甸休整扩红，不料这里居民稀少，大军难于久留。五月三日，两军团集结中甸附近后，当即召开连以上干

部和红二军团的党团积极分子会，动员部队继续北行，并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严禁部队毁坏经卷、神像和干扰祭仪。任弼时告诫大家说：“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

五月五日，总指挥部按朱、张来电“两军团沿金沙江走巴安（今巴塘）、白玉之线为好”的建议，决定兵分两路：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红二军团为左纵队，当天向德荣、巴安、白玉一线行进；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为右纵队，九日开始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向甘孜齐头并进。队伍出发前，总指挥部抽调几名干部，聘请几名藏民通司（翻译）为向导组先行。何辉回忆道：“弼时同志交代我们要和通司打成一片，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叮嘱我们要学习藏语。我们每到一地，通司就写一封鸡毛信，告诉前面一个村子，一路传过去，使沿途藏胞了解我们的政策。”^⑨

任弼时写道：“迄我军进入中甸后，因藏民区物质、地形上限制，‘追剿’部队过于疲困，乃停止而成防我南进之部署。另以川军（刘湘部李家钰）及驻川西蒋军，由大渡河及理化、巴安截断我们与四方面军联系，并向西南金沙江边逼迫。在四方面军配合接应下受阻后，其‘追剿’消灭二、六军团计划乃全归

失败。”^⑩红二、六军团从桑植的刘家坪到毕节，行程六千一百四十六华里，战斗达四十九次；毕节至金沙江畔，行程四千七百二十五华里，战斗三十三次，而从渡金沙后到甘孜，行程一千八百九十华里，战斗只有十三次，且规模并不大。作战虽然少了，但新的困难却来临了。一是语言不通，战士们不习惯吃青稞酥油做的糌粑；二是高原缺氧，举步艰难，特别是过雪山时，战士衣衫单薄，靠姜汤、辣椒刺激起来的热量，难以抵挡行军的疲惫，倘若脚下一软倒在雪山上，从此再也起不来了！部队行军速度虽然降到平均每日二三十华里，依然是“病亡增大，体力甚疲劳”。三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日期逼近，政治上和张国焘的斗争将越来越具体而尖锐。身为两军团的政治核心的任弼时，虽然自大革命以来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面目有所了解，但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到分裂的情况无从知道，敌区的报纸上虽然有些报道，是真是谣，难以凭信。因此，他言行谨慎，尽量多了解情况。

五月十日，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军团占领西康的德荣县城；十二日，红六军团占领定乡，至此，两军团走出云南省，在西康省境内徐徐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派罗炳辉率三十二军前来接应，队伍到甘孜附近的普玉龙时，朱德和刘伯承也前来欢迎。二十一

日，红六军团快到稻城时，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六军团无与军委通用之密码”，部队在未与炳辉军会合前，一切联系“暂仍须经我处转”；同时电告：红二军团将抵达巴安，“可否由炳辉或甘孜派一游击部队送党、政府、中央及军委总政治部文件来巴，借增二军战士之兴奋。”^①

这期间，张国焘在继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同时，竭力鼓吹他北上建立西北根据地的主张。张所谓的北上，并不是与中共中央会合，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而是单独前出到甘肃“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②随着红二、红六军团的来到，他便大造舆论，企图施加影响，拉拢红二、六军团和他一起走。五月五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张说：“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迫近了，这将要更大的增强我们的力量”，“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在党的路线上团结起来，在卧薪尝胆的时期更加团结起来，坚决与敌人奋斗到底。”^③半个月后，在《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张又说：“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④六月六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但仍然明目张胆地说：“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⑮在张国焘的心目中，党是一个股份公司，红军是他个人的资本，不讲原则，没有是非；谁资本大，谁就应当占有多大权力。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工作团”，借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机会，在指战员中进行分裂活动。对张国焘的这些活动，朱德坚决反对，他郑重地告诫张说：“无论如何，弼时是宣传不倒的！”

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军团部和第十六师首先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师在理化附近会合，二十四日，在甘孜附近的普玉龙召开会师大会。朱德和刘伯承向连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三十日，红二军团也在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八十八师会合。这时，朱德、刘伯承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诉他们近一年来党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去了。”^⑯三十二军原属红一方面军九军团序列，红一、

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划归红四方面军指挥。这一来，张就不能直接指挥了。王震回忆说：“我们到甘孜，刘元帅就来通消息了。他说对张这家伙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①⑦}

七月一日，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于甘孜附近的甘孜海子，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从炉霍赶到甘孜。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当即发来贺电：

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于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①⑧

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孜地区后，一方面是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筹集了粮食、牛羊，腾出了住房，备下了木柴和开水，还组织了数千件毛衣毛袜来慰劳阶级兄弟，沿途张贴的标语上写着：“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另一方面，由

于张国焘蓄意分裂党和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王震等围绕着分裂和反分裂、控制和反控制，维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表现：

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师会合时，张派出的“工作团”应任弼时的要求送来的一批包括《干部必读》等的文件和材料，内有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指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王震发现后，立即下令把文件材料烧掉，并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贺龙等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八师来人的谈话中，同样地听到他们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而且“讲得很坏”。任弼时立即告诉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又指示：将文件材料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

二是坚决抵制张分化和并吞红二、红六军团。先是张国焘要红六军团快走，“下令要六军交给他指挥”。朱德和王震谈了一个晚上后，使他明白要和张斗争。王震回忆道：“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

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后来和贺老总一说，贺说：这是我们以前干的！”^{①9}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任顶了回去。七月五日，中革军委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②0}罗炳辉和袁任远分别担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这样，张国焘分化、并吞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没能得逞。

三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据贺龙回忆：张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张要召开党的会议，“任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把张顶回去。……党的会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

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如何对付。任弼时又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开成。”^{②①}任弼时后来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说：“我敢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②②}

在甘孜的日子里，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和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了党的原则，又立足于对张的争取和团结，斗争的方式是非常艺术的。两军一会合，任弼时就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了电报密码本，从此和在陕北的党中央沟通了直接联系。在和张国焘谈话时，当张指责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任弼时词锋尖锐地说：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张国焘为成立第二“中央”作狡辩时，任又指出：“似乎太过分了！”在张国焘的心目中，任弼时原是一个“富有青年气味的“小弟弟”，此时此刻，他虽然对任弼时的意见“未置可否”，但他觉得任“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成”，不但“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②③}而且在任弼时的一身正气面前感到一筹莫展。

在甘孜期间，任弼时还巧妙地营救了被张当作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关押着的廖承志。廖回忆道：

“……谁都不敢和我们打一个招呼，我们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

就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和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山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弼时同志。我们的队伍正是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地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

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候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么？’

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

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

‘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

这之后，我们到了炉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部分的自由。”^{②①}

廖承志等后来终于到达陕北，在周恩来安排下，

到香港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民族战线的工作。他说：“那就不能不感谢弼时同志在那时候对张国焘严肃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七月二日，在荒凉的甘孜草原上，红二、红四方面军召开庆祝会师的大会。任弼时代表红二方面军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推动和促进了张国焘北上。会合之前，张国焘虽已向中央表示六月底出动北上，但他的意图不是和党中央会合，而是向夏河、洮州（临潭）西北行动，企图到青海、甘肃、新疆等边缘地区独树一帜。因此六月十九日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因为甘南敌人兵力较弱，特别是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反蒋抗日的事变发生后，蒋抽调胡宗南部南下向广西用兵，连空军也大部调去，松潘、甘南一带兵力空虚，仅剩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对红二、四方面军出甘南非常有利。如果出动到靠近青海的夏

洮地区，马步芳各部将与甘南王、毛、鲁等部集结于一个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非常困难。在朱德和徐向前的促进下，六月二十八日，动摇状态中的张国焘发布了《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甘孜后，大家一致主张按中央指示的方向北上，张处境孤立，终于同意北上了。这时，两个方面军分作三路先后出动：七月二日，徐向前的中央纵队率先离开炉霍向毛儿盖前进；三日，朱德、张国焘率左纵队从甘孜出动向包座、班右前进；十日，董振堂率右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动向毛儿盖、包座前进。红二方面军由贺龙、关向应等率领马不停蹄地沿左纵队的进军路线跟进。任弼时则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随红军总部和朱、张一起行动。几经曲折后，两个方面军终于按党中央的意图进军了。

在过草地时，任弼时分别和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交谈，大家对目前形势和中央的策略路线认识趋于一致，徐向前说：“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⑤在徐向前的记忆中，当时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在乐观的气氛中，任弼时致

力于进一步促进党内团结的工作。

七月十日，他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邓发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

“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玉阶^{②6}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②7}。

电中还向中央报告，两军会合后“部队战斗情绪极高”，对“党内争论问题尚未讨论”，但是“在目前

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对任弼时的建议，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两天以后，张闻天电复任弼时并告红四方面军：

“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俟国际回示并其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确定。此会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会议的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②8}

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中说：“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六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②9}尽管任弼时、贺龙等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十个月之久，尽管朱德“受国焘挟制”长达一年多，其间与张国焘的斗争复杂曲折，但是时间和空间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中央对朱德、任弼时等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是中央对他们的党性的评价，可谓一语千金！

从甘孜到阿坝是茫茫草地，天地相接，一望无垠，杳无人烟。据说这里每年无霜期只有五天，七月的气温是摄氏十度多一点，因此人们说这里没有夏天，只有延长的冬天。红军进入时正是草原雨季，时而细雨蒙蒙，时而大雨滂沱，部队露宿草地，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特别困难的是粮食，部队出发时，最多的只带半个月的干粮，少的只有七八天，行抵阿坝时，开始断粮了，大家只好挖野菜、钓鱼来充饥。彭富九回忆说：到噶曲河（又称白河）时，我们没有吃的了。找弼时同志，他给了我们一口袋粮食，让我们和着野菜吃。正在困难之际，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了，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眼看产妇没有粮吃，婴儿没有奶吸，朱德便钓了鱼熬汤给陈琮英喝，虽然找不到盐巴，淡而无味的鱼汤却较野菜富有营养，母女俩就此度过困难。任弼时给女儿起名“远征”，以纪念这次不平凡的行军。

走在左纵队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困难就更大了。前面的队伍把可吃的野菜挖尽了，他们连野菜都难于找到，只好把身上的皮带，帽檐上甚至草鞋上的牛皮收集起来，割碎、煮熟用来果腹。饥饿、疲惫、风雨雪雹交替出现的气候折磨着战士们，体力每况愈

下，疾病、掉队、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七月二十二日，一日雨雪，仅六师抵达绒玉之夜，死亡的人数达一百四十人。从阿坝往西的五六天行程里，走的是一段水草地，遍地是混浊的污水，长年累月的腐草积成的沼泽地，人在上面行走，一步一摇晃，象是走在摆动的浮桥上，稍一不慎，人马踩入腐草坑，立即陷了下去，越挣扎陷得越快，终至不能自拔，多少红军战士为此葬身沼泽！但是大家前赴后继，怀着共同的信念：“走出草地就是胜利！”

七月下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集结在包座、巴西、救济寺一带。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得知两个方面军走出草地，中央八月一日来电表示“无限欣慰”。为了避免敌人封锁岷西线，部队北上发生困难，来电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尽管刚出草地的指战员们体质羸弱，形容憔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联名电复中央：“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部为目的来配合你军。”^{③⑩}中共中央对两

个方面军不顾疲劳和牺牲，连续行军作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为赞赏，八月三日来电说：

“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完全是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这时，蒋介石的重庆行营急忙命令在甘南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构筑从西固到洮州、兰州到天水两道封锁线，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并从川、康两省抽兵“分途追击”；由于两广事变已经解决，蒋令胡宗南返师北上，参加甘南战役，力图凭借天然险要和碉堡线封锁，消灭红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境。中共中央鉴于敌军仓促布防，主力集中需要时日，岷州地区仅鲁大昌的六个团，毛炳文到岷州需七天以上行程，而胡宗南部尚在长沙，远不济急。八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红二、四方面军：“以一部速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五日，西北局救济寺会议通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为第一、二纵队，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从包座地区向甘南挺进，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九日，一

纵队抢占腊子口，十日，占哈达铺、大草滩，随即包围岷州；二十日，第二纵队占洮州旧城。第三纵队策应一、二纵队到哈达铺后，向礼县、西和、徽县、两当、略阳地区发展。至九月七日，红军先后占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县城及岷州、临洮、陇西、武山等广大地区，为大军北进打开了道路。

三军大会合指日可待，任弼时写长信给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及陈伯钧、王震、张子意等：

“……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

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达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③①}

任弼时的长信，给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以极大的鼓舞，八月十日，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为了中国革命的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任弼时拳拳此心，彪炳史册！

陈云后来评价说：

“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的（对张国焘）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

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弟兄，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③2}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南占洮州、通渭等地区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左权、陈赓率一个师南下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不料张国焘又一次企图改变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八月二十二日，张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主力大部准备在永靖西渡黄河，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这不但违反甘孜会议决议，脱离目前政治形势，影响红一、红二两方面军的行动，而且事实上也无可能。因为冰封以前，要西渡黄河既无桥梁，造船又费时日，将使敌军有先机控制兰州到西宁间的湟河和黄河北岸之可能，届时，红军前临黄、湟天险，后有王均、毛炳文等部及川军的压迫，红四方面军将再度陷入困境。因此，彭德怀对张国焘的这一主张称之为：“鬼话。”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来电制止张国焘西渡。八月三十日，中央提出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

的战略行动计划，准备三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具体部署是：红一方面军南下占西兰大道以北的海原、固原地区；红四、红二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岷州、武山等地区后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毛炳文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西南部，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牵制与迟滞车运到陕甘边的胡宗南部钟松旅，隔开他与西北其他国民党军的联系。这一计划的发展，便能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先机控制西兰大道，进而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因此，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③

为着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的战斗任务，任弼时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九月八日，和贺龙、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刘伯承也到红二方面军和任、贺等工作。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告红二、红四方

面军：关于战略方针“彼此意见大体一致”，为滞阻胡宗南西进，对东路敌军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二方面军的支队“直出宝鸡、都县以东”，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红一方面军“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第二天，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电朱、张、任，恳切地希望“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在抗日民族革命形势的鼓舞下，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率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按计划挺进，至九月十九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接着又以一部兵力进攻凤县，并立即发动群众在以徽县为中心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

当任弼时等在积极完成“最重要”的战斗任务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交付的“最重要着”。先是在九月十八日的岷州会议上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被朱德、陈昌浩等否定后，二十一日，他回到红四方面军

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又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制定的《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战役计划》，二十四日，兵撤通渭，执意西去。经中共中央明令制止，才表示“决不再改变”。这时，中央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提出了静宁、会宁作战方案，集中三个方面军打击进入西北的胡宗南部，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静宁、会宁地区，红二方面军在外翼制敌。

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同志感到难于容忍。九月十九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电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同一天，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三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商量态度不便作战。”可谓所见略同。中央当即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当时，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昌浩）三同志一起工作。”

二十一日子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立即向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表示同意：

“静会战役计划已收到。我们认为这不独是

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有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个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着配合一、四方面军之行动，我们拟以六军全部开出都宝地区，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祝一、二、四方面军之大会合。”^③

张国焘率军西撤的反复，给胡宗南西进获得了时间。九月中，胡的四个师从长沙、衡阳乘火车赶到咸阳，十月初，先头十余个团将进到清水、秦安一带与在天水的毛炳文部靠近，从北面威胁红二方面军所在地域；南面，王均的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九月底袭占成县，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到康县一带，使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被隔断于西兰大道和渭河以南陷于孤军作战之危险。十月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电红二方面军“宜乘胡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任弼时、贺龙等决定放弃成、徽、两、康地区，分左右两纵队经盐关，从天水以西北移。这时，蒋介石令胡宗南进占隆德西北的将台堡，准备发起通渭、会静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令红二方面军迅速集中到通渭，在隆（德）、静（宁）大道以外和红四方面军一起“抗击胡敌”。

十月七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左纵队，兼程向盐关进军，右纵队行进时，突然遭敌人陆空袭击，第六师师长张辉阵亡，政委晏福生和六师的第十七团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十日，左右两路军分别涉过渭河，在红四方面军的掩护下北上，准备经界石堡转靖远、静宁、固原、隆德之间，牵制胡宗南部的侧翼，滞其西进，并接替红一方面军固原以北的防务。

这时，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将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合。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红二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红四方面军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是有诚意的。会议决定派林育英前往红四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

一九三六年十月金秋，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经过史无前例的长征，终于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在会宁县青江驿和隆德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一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隆德西北的平丰镇与左权、聂荣臻等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人会合，次日，两个方面军主力在隆德将台堡会师。中革军委宣布：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中共中

1936 年 11 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作
“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
经过报告”，这是报告大纲手迹

央及军委决定十一月七日，召开庆祝红军大会师、誓师抗日及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

在伟大的长征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的帷幕，之后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一年后继续长途远征，到三军会师，先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在中华大地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纵横两万三千九百多里，大小战斗一百十余次，先后占领县城三十九座，历尽了艰险。三军会合前夕，红二方面军仍保持约一万二千余人（其中第三十二军一千三百余人）。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祝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时，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⑤

二十三、西安事变前后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的左权、聂荣臻、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二方面军同志对张（国焘）不满，与一方面军甚谊”，虽然连日作战，“部队非常疲劳，体力差，病员很多，但会合后情绪很高。”^①部队的精神面貌，是检验任弼时、贺龙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领导工作成效的客观标志。

这时，日本侵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蒙伪军进犯集宁，国民党在绥远省的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全国民众要求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但蒋介石置绥远抗日于不顾，却集中兵力在西北“剿共”。

综观各方情况，时局正处在大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电示朱德、张国焘和三军首长：“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共和平转向抗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共中央的斗争策略已由“抗日反

蒋”转变为“逼蒋抗日”。一面从政治上敦促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一面指示三个方面军短暂休息后，十一月份集中主要力量攻打宁夏，沟通与苏联的联系。^②

宁夏战役尚未开始，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严重变化。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这时仍认为：红军远征疲劳，在西北立足未稳，调动二百六十个团的兵力，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靖远一带。

十一月二十二日，蒋从南京飞到西安，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从东、南、西三面向集结在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的红军大举进攻。二十九日，蒋转到洛阳，命令在青海、宁夏的“中央军”和马鸿逵部向红军进攻。两天以后，蒋在洛阳大摆五十寿筵，名曰“避寿”，实为督战。当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曾在洛阳举行五十寿庆，所谓“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③。如今，蒋介石摧残了南方各省的苏区，平息了两广事变，踌躇满志地继续向红军“进剿”。还组织了“国人献（飞）机”六十八架为他“上寿”。他“环顾宇内，雄视左右”，与昔日的“吴大帅”相比，简直有大巫小巫之感！

面对国民党以五个军来势汹汹地向甘肃境内西

兰大道以北地区推进，红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逐次转移，诱敌深入，伺机打击胡宗南部，牵制威胁毛炳文、王均两部；对东北军则加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到十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先后占领通渭、静宁、界石铺和会宁等地，红军主力转移到海原、打拉池地区。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和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总部在打拉池会合。

军委主席团形成后，十月十四日，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曾电告彭德怀：前线指挥由朱德、张国焘担任，认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尽管张国焘一再违反中央的作战部署，但中央仍持容忍态度，对彭德怀说，对张“不可求善太急”。这一次，为突击消灭胡宗南先头一二个师，转变局势，中央军委特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三十日，前总发布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规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为突击集团，从东西两面夹击来犯的国民党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五两军钳制毛炳文、王均两部，保障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一带红军右翼安全；任弼时、贺龙则率红二方面军移至海原以北及西北地区，保障左翼安全。

海打战役的计划因故改变后，十一月一日，任弼

时、贺龙在关城堡出席前总会议。会议决定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求战机，坚决消灭胡宗南二三个师。为了加强政治保障，军委特指定任弼时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并电示第三十军军长阎红彦：“为配合西线作战，自即日起，三十军改变（由）前敌彭总指挥、任政委指挥”。从此，任弼时和彭德怀一起，共同负责指挥前线部队作战。^④

在部署海打战役的同时，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领衔，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六十四人，联名发出《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竭诚呼吁：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只要国民党当局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感召下，国民党军队内部分化加剧，驻甘肃平凉一带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并没有积极进攻红军，王均的第三军占同心城后也有观望之势，惟有胡宗南的第一军，恃强骄纵，继续向红军所在地豫旺堡紧追不放。因此，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连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和任弼时：要求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主力在豫旺堡、盐池、环县的三角地区“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第二天，彭德怀、任弼时命令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运动，集结待机。著名

的山城堡战役已经箭在弦上了。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利于红军设伏。在准备作战的过程中，为保障前总统一指挥，排除张国焘的干扰，任弼时、彭德怀和从保安来到前线的林育英联名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和周恩来，建议在前敌总指挥部移至河连湾时，中央派一人来陪同朱德、张国焘到保安与党中央会合，“解决一切的问题，进一步的团结，原则上统一指挥”^⑤。十五日，中央军委电复：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⑥。当天，周恩来从保安赶到河连湾，协助前总指挥山城堡战役。

经过周密部署后，十八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和任弼时联名下达《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出：“当前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非常之大”，参战部队应“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人民的礼物。”

十一月十九日，根据前总会议的部署，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

一军隐蔽集结于山城堡东、南、北三面待命；红二方面军和第八十一师在洪德城、环县一带策应；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左路。各部到位后，立即构筑工事，封锁消息，坚壁粮食，封闭水井，严阵以待。

敌胡宗南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向撤退”，即令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其中的七十八师经豫旺堡、古城，于二十日占山城堡，二十一日下午，继续东进，孤军闯入红军的伏击圈内。聂荣臻写道：“当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时，预伏在山城堡周围之我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突然地向敌展开猛烈的反击，首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尔后由东、南、北展开三面攻击。敌人凭借围寨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一昼夜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⑦

山城堡大捷，是三军会师后第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是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役，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之后，遭受红军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西撤到大水坑、萌城堡、甜水堡一带。二十三日，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经验，庆功祝捷。会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率全军团以上干部致电毛泽东主席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

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为“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⑧。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命令规定：“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⑨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转发中革军委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朱、周、张、彭、任、贺七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在组织上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

十二月初，任弼时离开红二方面军总部，到前敌总指挥部工作。临行之前，他和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提升关向应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这时，三个方面军主力集结在环县、定边一带休整。任弼时到前敌总指挥部后，首先抓了三件事：

一是加强政治教育、整顿部队。山城堡战役胜利后，胡宗南兵疲粮缺，停止追击。前总决定红军以备战姿态，自十一月二十九日起，进行七天为期的整理

和教育。内容包括红军将领致国民党西北各将领的公开信，统一战线政策等，发动指战员“讨论和测验”，提高军政纪律，整顿军容，以及改善连队生活等。林育英到红二方面军考察后，发现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战士赤足单衣，部队粮食自筹”，“不但无肉吃，也无油吃”，他呼吁各兄弟部队予以援助。前总于是发动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组织慰劳团，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去二、四方面军慰问万里长征胜利的同志们”，以促进和巩固部队的团结。

二是检查纪律。十一月三十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向各军指战员发出指示，强调“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指出个别分子烧毁群众的麦子、门板，宰杀牛羊等行为“不特是红军的耻辱，而且是破坏全国人民所敬爱的英勇红军的光辉荣誉”，着令各部首长及政治机关“以彻底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入的检查各个部队中的纪律”，对群众的损失“一律估价赔偿”，并听取群众批评，挽回影响。^⑩后来，连以上普遍建立纪律检查队，部队一到驻地，便宣传群众，和群众联欢；离开时，上门板，扫院子，向群众道谢。特别是经过友军区域时，红军秋毫无犯，群众说：辛亥革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任弼时的笔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夜间演习，群众以为队伍开动，起

来送，有些群众挽留我们。部队移动后，有原住地群众送东西来看我们。^⑪

三是总结长征经验，深入部队调查。在此前后，任弼时还撰写了《二、六军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⑫十一月三十日，又撰写《关于二、六军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⑬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他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驻地谢家堡，详细了解该部所辖三个师连营以上干部的情况，包括家庭成分，个人经历，文化程度，个性特长等，同时检查了休整期间部队的军政训练的情况，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门的财务、粮秣、工厂、兵站等单位的工作。十二日，听取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的汇报。朱原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三军会合后调到二方面军。他向任弼时汇报说：第六军“制度上与一方面军相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干部相当的强，比较弱的是团一级干部；刻苦耐劳精神好，活泼。经过一周的休整，部队各方面都有相当进步，连队上过二至六次政治课，但教育工作还不深入普遍，给养计划不能完成。^⑭在作调查时，任弼时保持多年来养成的良好作风，用心听取，详细记录。

山城堡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

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国民党军队发展着四种矛盾：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上层严令进攻与下级对红军恐惧的矛盾以及官长与士兵的矛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的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⑮毛泽东以革命的辩证法对国民党军队的剖析，切中要害。山城堡大捷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对“损失勿向他部实报”，甚至声称没有损失，可见他内心的空虚。十一月初，晋绥军傅作义部在绥远“孤军抗日，迭获胜利”。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致书傅作义“遥为声援”，“敬以一瓣心香祝将军之胜利”。^⑯二十四日，傅部收复百灵庙，歼敌千余，蒋军抗日与“剿共”的矛盾更加尖锐，陈诚不得不令汤恩伯以八个团出绥东地区；至于肩负“家仇国难”的东北军，自“九一八”以来，流浪入关，被蒋介石驱使作“剿共”的马前卒，心存不满已久，此时此刻，“团结抗日，披甲还乡”的声浪日益高涨，蒋介石洛阳“寿庆”时，张学良曾请求到绥远和傅作义并肩抗日，蒋回答说：“你太天真了，就是我叫你去，经过山西时，阎百川也不会叫你去哪。”^⑰不但不纳所请，反而被蒋认为东北军政治上不稳当。十二月四

日，蒋从洛阳坐专列到临潼，一下车便咄咄逼人地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训话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⑧在蒋的威逼下，张学良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营包围临潼华清池，拘捕蒋介石；与此同时，古城西安枪声四起，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十余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这时，红军集结于洪德城与盐池间，这里地处沙漠边缘，红军拟待胡宗南部通过沙漠疲乏和饥渴之际给以打击。任弼时和彭德怀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这是牧羊人聊避风沙的土洞，一米高、二米来宽。深夜，洞外狂风，飞沙弥漫。彭正举着马灯看地图，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继续打击胡宗南等部上。因为山城堡告捷后，胡并不死心，仍然兵分三路准备向盐池、定边、保安、华池方向进攻，红军如能再歼胡部两个旅，即可打退这次进攻，巩固陕北根据地。这时，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了！”一时，部队激奋异常。胡宗南部则乘夜撤走了。^⑨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事变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②0}，都有积极意义，是应该拥护的。他强调指出：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在军事上采取防御的方针，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

由于事变爆发的突然性，中共中央事前并未与闻。为了直接掌握事变发生后各方的动向，和张、杨共商大计，在张学良来电后，毛泽东接连三电请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在军事部署上，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红军集中延安、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到直迫南京”；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二军和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项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水下游攻潼关，有待观察和与张杨协商。^{②1}

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彭德怀和任弼时为核心的前敌总指挥部及时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调整行动部署，在促进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其间重要的调整有两次：

第一次是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十三日，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褫夺”

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亲日派何应钦执掌军权，立即电令在徐州的刘峙，“速回汴集结部队，准备西进”。刘峙回忆道：“我当即电驻陕县之第七十一军军长樊崧甫，速占潼关阻止叛军东进”，并电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将驻洛阳原属东北军之重炮旅缴械，另通知其余驻豫皖苏各部队严密戒备，整装待命”。^{②2}刹那间，蒋军挺进陕东咽喉潼关，围华县，逼渭南。这时，洛阳、潼关、华阴一带，国民党的十个军和一个教导总队全力对付张、杨，人数不下数十万，并有飞机数百架。北面，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和集中在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一带的红军对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十四日，彭、任致电中央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彭、任提出的建议要点是：第一，估计何应钦可能发动对张、杨的战争，“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第二，为把握主动，应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战胜胡敌后即行南下掩护张、杨；第三，鉴于红军以进攻姿态出河南巩固西安，可能延长内战，在北面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而从河南迁回到敌后援救西安，需时二十天，时间来不及。因此主张红军目前主

力不宜出河南。^{②③}

这项重要建议，在抗日援绥，与张杨两部建立统一指挥方面，和中共中央的考虑完全一致。当天，毛泽东等十人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②④}。对北面的国民党军，毛泽东认为“胡、毛、曾、关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红军在北线“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东面则军情甚迫，一是已进入潼关的樊崧甫和咸阳的万耀煌企图围城救蒋，张、杨所部仓卒未能集中，“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所以十四日电复彭、任，红军“第一步到西峰镇”^{②⑤}。显然，毛泽东也考虑了从河南迂回到敌后远不济急的因素。当天，彭、任立即发布命令，规定三个方面军主力七天内南进至西峰镇、庆阳地域集结待命，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及骑兵团留在北线，封锁消息，监视胡宗南等部，掩护主力南移。

第二次调整是十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

十五日，胡宗南部的孔令恂、周详初两师有经惠安、金积向宁夏撤退的迹象。第二十八军领导人宋时

轮、宋任穷向彭德怀、任弼时建议：为着不失时机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应移大水坑击敌。彭、任认为在胡部撤退时，消灭其二、三个师，可以争取毛炳文、曾万钟两部，中立青宁四马，^{②6}所以一面命令红二、红四方面军按原定计划十六日南下，一面要左权、聂荣臻指挥第一方面军“坚决消灭”大水坑的胡部，得手后“再行待命南下”。^{②7}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四次电示。十五日，第一次电说：胡、毛两敌移动“时间尚不能定，且大水坑、豫旺堡节节有坚工〔事〕，打难必胜，仍应向西峰方向行动”。二十时又电示：目前“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现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十六日凌晨二时，第三次电示彭、任，“请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应即开始向延安出动，以十天到十二天到达延安”。十八时，又电示：“主力秘密东移，切勿暴露；能八天赶到延安最佳。”^{②8}彭、任对放弃打击胡宗南的有利战机虽然感到可惜，但从全局出发，他们对中央的焦急心情是心领神会的。兵贵神速，一个小时后，即电复中央：“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计划”，即命令部队：“战略改变，野战军本月二十日集中肤施、甘泉待

命”^{②9}，和毛泽东来电要求的到达时间提前了六至八天。

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从南下西峰镇改为东出延安、甘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筹集粮食，占领延安飞机场，保障周恩来尽快赶到西安。从十三日开始，中央几乎天天电催西安方面派飞机来延安接周，但是直到十七日，周恩来等已等候在延安城外，而延安县城和飞机场仍在国民党的民团手中。红军改变行动方向后，十七日，毛泽东电示彭、任，首先攻占延安、甘泉两城，“将飞机场占领”。当天中午，张学良的专机降落延安机场，下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一行九人，终于飞抵西安。

如果说，周恩来未到西安前，张学良、杨虎城对国民党进攻西安应战尚无把握，那么，周到达后，和张、杨商定了一系列措施，张、杨便感到有所倚恃。这些措施包括：提出和平解决的五项条件；^{③0}成立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形成“三角同盟”，即以十七路军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红军立即接防延安、甘泉，主力南下渭北侧击蒋军。被困在西安的蒋介石，摇摆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此时，他急于返回南京，十七日向张学良提出停战三天，并给何应钦下了一道手令：“星期六（十九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战争气氛暂时有所和缓，

但各方调遣兵力的活动片刻未停。何应钦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等部经天水南下，待到达宝鸡时，从东西两面向西安发起总攻。他洋洋自得地以为西安“聚歼在望”。东北军立即集中渭北。彭德怀和任弼时则命令红军主力经庆阳、西峰镇，到泾川、长武之线协同友军准备首先消灭东面的刘峙部。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和张、杨已商定了作战计划，报告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要点是：东北军、西北军尽量迟阻刘峙部于临潼、渭南间；红军由庆阳、西峰分经正宁、邠县，在咸阳、兴平过渭河，进到西安东南面的蓝田、商县，以便和渭河两岸的东北军南北呼应，摆开阵势。周在电报中说：“张杨坚决主张，但决定关键在红军。”毛泽东因此电促彭、任：“野战军分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集中咸阳，消灭刘敌。”到二十四日，彭、任报告毛泽东，野战军主力二十六日可全部集中庆阳，再十天可到咸阳。^⑪张、杨及西安的左派“闻红军东来均甚高兴”。

十二月二十日，扣蒋后的第八天，宋子文从南京飞抵西安，翌日返回南京，二十三日，宋美龄在宋子文陪同下到达西安。这时，双方正式谈判开始，宋子文代表蒋方，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二十四日谈判结束，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停战撤兵；释放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三个月后

发动抗战，共产党公开等十项。当晚，蒋又向周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整个局势转变。毛泽东说，这“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蒋介石没有履行先决条件、对承诺的条款未作出不再动摇的保障的情况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和宋子文、宋美龄离开西安经洛阳回南京。由于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这一天，竟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令人遗憾的日子！当天，毛泽东在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中说：“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尚待证实。”因此他指示：“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⑫第二天，彭、任在庆阳北门总指挥部发出命令：红军主力二十七日分三路出动，南进到咸阳、宝鸡间的兴平、麟游、岐山地域，意图是把红军主力置于国民党军天水集团和潼关集团之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外侧，隔开东西两面的蒋军，占领机动的战略要地。

放蒋介石以后，东面国民党的刘峙、樊崧甫部开始撤离潼关，东北军、十七路军以为和平局面已经形成，要求红军停止南下。但是，彭德怀和任弼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他们连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三军领导人，一面认为“中

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较多可能，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西安事变后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蒋〕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一面则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更积极组织亲日派，利用英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全民抗战的动摇态度来威胁蒋，“因此蒋介石回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③。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紧紧地抓住两个环节：一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二是扩大红军。

十二月二十六日，东北军王以哲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奉副司令面谕，与周恩来同志商妥，红军进入庆阳，停止南进。彭德怀、任弼时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西线的“胡、毛、曾、关等部向会宁、静宁转移，有向平凉、扶风进攻可能，为此红军决向扶风、岐山前进，占领要点，以便随时协同抗日友军从敌外翼击该地〔域〕，或威胁该敌退出陕甘境域，巩固后方”。毛泽东复示：“用一切可能的快集中兴平、扶风、凤翔线，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④为了照顾统一战线政策，毛告诫：红军不驻咸阳，驻乡村不驻县城，不打土豪，粮食等一切靠购买。与此同时，毛电请周恩来、博古与杨虎城交涉。当时，杨虎城等以为张学良很快就会返回西安，所以，周、博复电中说：

“张两日后回再商量我军驻地。”这样，毛泽东于是致电彭、任：“似此，野战军可暂在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域休息待命。”^⑤这一着，直到一个月后，在事实面前才被东北军的于学忠所认识；他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但是西边胡宗南的军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前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沟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二十八日，彭、任又主张在交涉红军的永久驻地时“最中心的是宁夏全境，甘肃凉州，及陕北靖远、固原、庆阳、宁县、枸邑、中部、韩城之线”，但由于张学良还在南京，红军永久驻地仍有待与之协商解决。

扩大红军的问题，前敌总指挥部紧抓不放。“三角同盟”形成后，在友军协助下，红军执行新任务进入人烟较稠密、物产较丰富的区域活动。十二月二十二日，彭德怀、任弼时和杨尚昆（前敌政治部主任）联名指示各部：“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在目前抗日运动新局面中，猛烈扩大红军，千百倍地加强红军的有生力量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要各部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扩红，“争取一九三七年二月底扩大一倍”。二十七日，又建议军委主席团：最好能与张、杨交涉，红军“全部进至渭水流域活动一时期，……不打土豪，不破坏其政权和其他机关，目的在扩

红，但须以至诚态度与张、杨商议，划一个人口较密区域扩红，同时亦可进行地下党的组织”^{③⑥}，使之将来成为扩大红军的主要泉源。

这些建议和措施，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反映了前总领导在复杂的形势下善于捕捉时机的远见卓识。八年后，任弼时在党的“七大”期间曾经总结实践经验说：

“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统一战线之形成和今天我党之成为重心，就是由于我们有力量，有群众和有武装。”^{③⑦}

事情果然不出彭、任所料，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蓄意对张学良报复，政治、军事双管齐下。

政治报复是一套既狠毒而又虚伪的把戏。先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张”，判处张有期徒刑十年；四天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蒋介石具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当晚发表“特赦”令，令中规定“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张”令一下，张从此失去自由达半个多世纪！

军事报复则是调派三十四个师的兵力向陕西推进，在虎视眈眈的武力威胁下，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前往潼关解决西安问题，企图分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孤立红军，瓦解“三位一体”的联盟。一时西安方面极为震动，所谓“奔走骇告，莫知所措”，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思想十分混乱。

一月五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要求红军立即派大部队开到关中地区，给以全力支援。当天，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要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③，两天后，任弼时随第四军前出到咸阳北面的口头镇，彭德怀率直属队到了淳化。七日，毛又电示：野战军十日前全部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十二日前作好准备，以大部出商雒、控制陕、豫、鄂边境，留一部于渭北，“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京汉、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就范。”^④到一月中，红军相继到达三原一带，在内线策应友军；一部进到南山、蓝田一带，在外线摆开阵势，威胁东线国民党军的侧翼。红军一硬，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心甫定，军事上出现可战可和的态势。国民党不得不派人向西安方面提出关于

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个方案，于是谈判重开。

蒋介石提出的甲案，主要内容是：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案是：东九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甘肃两省政府主席分别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委任。蒋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中共中央的基本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团结抗日；坚持“三位一体”，和坚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团结，防止蒋介石分化。两案相比较，甲案有利于维持“三位一体”，乙案则联盟分散，因此倾向于以甲案为基础谈判，或和或战，应由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左派打定主意，红军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于是，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代表奔走于西安、奉化（蒋在奉化）、南京和潼关（顾祝同在潼关）之间。谈判结果，双方互有让步，国民党进驻潼关、西安的部队由十二团减为三个团。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在致中共代表团和前敌总指挥部的电中说：“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④⑩}但是，东北军方面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一批少壮派军官坚决主战，主张先

救张学良回西安，其他一概不论。主战派的调子越来越高，使主和派不能公开讲话，矛盾越演越烈。中共代表团的苦心斡旋，也是几经说服，几经变卦。毛泽东于是电示周恩来、博古：“请以红军代表资格正式向左派申言，为大局计应即撤兵。”^①

大约一月底，彭德怀、任弼时从云阳镇赶到西安，和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在金家巷张公馆的大厅里出席了一个座谈会。据参加座谈会的十七路军交际处长申伯纯回忆：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东北方面有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久、苗剑秋、应德田等，孙、苗、应是坚决主战的少壮派军官，十七路军方面有南汉宸、申伯纯、杜斌丞、王炳南等。会议开始后，主要由红军代表彭德怀和任弼时讲话，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向大家申述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善后问题的立场。

据申伯纯回忆，彭、任讲话的要点：

一是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它是要灭亡全中国的，中国实在是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必须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共同抗日。

二是指出中国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因此阶级

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希望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政策。

三是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在华利益上有矛盾，蒋介石受英美的影响，抗日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西安事变放蒋走是对的，争取和逼蒋抗日，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可能性都大。只要我们好好团结，配合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对蒋施以压力，张汉卿先生是能够回来的，蒋是可以抗日的。

四是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因为打仗不利于张先生回来，反而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⑫

彭、任讲完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但大家都不肯发言，座谈会便结束了。

这次座谈会，没有说服东北军坚决主战的少壮派军官，以致发展到一月二十七日晚上，东北军青年军官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要求红军参战，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长跪不起，激烈反对和平解决的方针，甚至急不择言，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先破裂。”事关重要，周恩来表示：容我们好好商量后再答复你们。

一月三十日，天空飘着小雪，云阳镇前敌指挥部

里，从西安赶来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周、博、彭、任、洛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我们现有两个方案：参加或不参加同友军一同打，但不论打或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和平谈判，如打得好和平仍有希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放张学良，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当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复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等。^{④⑤}

任弼时在三十一日的工作笔记中写道：

“……我们的方针：一、基本的：和平统一，联合御侮。方针应不变。蒋在现在最能控制亲日派，联蒋抗日。二、不放弃现有的同盟者，否则可引起其他的同情者失去同情，认为我们不讲信义；三、保存扩大本身的有生力量，这是为着民族的利益。

实施方针，同他们一起打，但使同盟者知道和平解决方针，要南京送张回，免战争发展。要打我们也应参加，指导这一战争——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也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

我们应争取打几个胜仗。

变成长期内战的前途也是有的，但我们应争取战争很快结束。这前途是可能实现。

我们应为和平而斗争。”^⑭

二月二日，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失去理智，枪杀主张接受甲案的元老派王以哲。对此，申伯纯写道：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团结的东北军，“表面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内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也有新老和学系的派别，它没有健全的干部政策，也不会有正确的政治思想作主导”，在张学良被扣，群龙无首的状态下，“平时内部的许多矛盾趋于尖锐而表面化，从新老派利害之争，到主战主和的分歧，一直发展到互相残杀”，这样的发展，“和它本身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因而不能过于归咎于某些个人的作用。”^⑮

“二·二”事件发生后，当天，彭德怀、任弼时电示第十五军团、第二方面军和后方办事处的有关领导：

“甲、国内和平，一致对外是我们的基本主

张，唯一正确的口号。

乙、对南京策略，应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目前只有中间势力才能控制亲日派，蒋介石是中间势力代表者。

丙、我们主和不主战，因和平在任何方面均有利，故决定接受蒋之甲案……”。^{④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进入了国共再度合作的新时期。在这场严重的斗争中，毛泽东坐镇陕北，运筹帷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奔走于古城西安和云阳间，纵横捭阖，苦心斡旋；彭德怀和任弼时，则驰骋沙场，和友军结成三角联盟，调兵遣将，以军事行动保障政治谈判，以政治路线统率军事活动。

“共产党自西安事件后地位是大大提高了”，三月二十六日，任弼时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应争取南京，不要使它受日本的引诱。日本企图用‘以华制华’的策略来破坏中国，我们必须揭破。对于托派污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亦必须揭破。我们应竭力巩固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并使它更向前发展。”

“我们应从哪些地方努力呢？”任弼时接着说：

“这包括着在目前的抗战准备时期与抗战

爆发后的时期，都应表示我们对民族的忠诚。我们应巩固我们的武装，争取民主权利，这一个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这工作中来争取与巩固我们的领导权。”^{④7}

1937年2月11日任弼时日记手迹

二十四、从云阳改编到山西抗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七时，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杨尚昆联名通知第一、第十五军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有关首长，于十八日到云阳镇报到，出席红军高级干部会议，议题是“检阅过去三个月工作及改编事宜”^①。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增调三个师团，关东军一个旅团到平津地区作战，企图以速决战夺取平津，控制华北。在中共中央“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的口号声中，迅速改编红军，共赴国难，便成为云阳会议突出的中心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任弼时曾离开云阳镇将

近两个月。三月下旬，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后期，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会后，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先后到红一军团驻地宁县和援西军驻地镇原等地，向指战员传达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四月二十五日，听取了从西路军归来的干部的详细汇报，又在镇原附近的平泉出席了援西军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这时，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黄河以西率部苦战四个多月后，终于脱险回到援西军总部。任弼时和徐向前是在过草地时分手的。那时，大家深为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担忧，半年多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越来越深入人心，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已有结论，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高度团结统一的红军，奋力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斗争，已成为参加神圣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力量。此时此刻，老战友重逢，彼此促膝夜谈，不禁悲喜交集！

五月中，任弼时和徐向前等一行，离开镇原，经宁县的宫河，于十六日到达云阳镜。一路上，任弼时每到红军驻地，都要深入部队调查。高干会议的通知发出后，七月十六日，十八日，他还是在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军和二方面军进行调查，为云阳会议作准备。

进入七月后，西北地区连降暴雨，山洪爆发，道路冲断。会议原定二十日开始，可是等到二十一日，朱德总司令还没有从延安来到。彭德怀、任弼时一面派人到耀县去接应，一面决定二十二日会议开始。

二十二日上午，任弼时报告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下午，彭德怀就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做了系统的报告。彭回顾了十年内战期间红军发展的历程，强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部队应保持党的领导，保存固有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和开展反倾向斗争等重要问题。任弼时则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加上英法对中国抗日态度暧昧，美国旁观，因此当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时，日本敢于在东方进行军事冒险。他估计，事变的前途一是南京当局屈服，或是部分抵抗后和日本签订和约；一是在全国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下，促使政府实行全面总动员。任弼时说，后者是我们应争取的前途；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红军的改编有利于发展和推动统一战线下的全面抗日。^②二十三日，朱总司令到达云阳，会议便进入讨论。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这是二月间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

要求和四点保证的重要内容之一。^③从二月开始到卢沟桥事变时，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已经谈判过三次。为了抗日救国，促进国民党政策转变，中共中央一再作出让步，在军队改编问题上，原来中共中央提出红军改编为四个师，人数保持六七万，蒋介石只答应编三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但蒋介石坚持“溶共”“限共”的政策，在谈判中出尔反尔，忽进忽退。六月四日的第三次谈判中，蒋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问题上，忽然改口：“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各边区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许离开”，甚至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谈判于是陷入僵局。

卢沟桥事变后，七月中，蒋介石在庐山邀集各界人士开座谈会，没有正式邀请中共代表参加，而是秘密约请周恩来等上庐山继续谈判。这是第四次谈判了。尽管中共中央顾全大局，表示“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④。蒋介石仍不允许，坚持“三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人选上“要周或□，不要任”，最后提出由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这个要求当即被周恩来拒绝，谈判再

次搁浅。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等回到上海，将谈判的情况电告云阳，并向会议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都能独立工作”^⑤。

国难当头，蒋介石不肯捐弃成见，不能不使在云阳的红军将领们感到难以容忍。二十六日，云阳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朱德、林育英、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和军委：

“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拒绝谈判，必要时准备将谈判经过公布。

“估计蒋介石以经济及粮食的封锁来对付我们，我们应立即采取必要的准备，特别部队中动员吃野菜筹粮，使全体将士了解争取抗日斗争的艰苦，使全国人民了解红军抗日真诚，同时向远方^⑥征求意见，且请求接济，并须在国内外募捐。

“改编部队应留足够的地方武装，以廿七军、廿八军、廿九军、卅军，独立师，给陕北警卫师或旅”等等。^⑦

云阳的意见和延安是一致的。二十七日，书记处电复：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办理“决不让步”，

“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周博林庐山谈判坚持了这一方针，拒绝了蒋之条件”；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构必须是总指挥或军部，“我们可以同意你们的意见”，出动抗日时，三个师中“留一个师至少一个旅在后方”。会议结束时，任弼时在讲话中强调说：红军改编后，具体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但红军的宗旨没有变；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表现形式起了变化。有人认为改编以后，我们也是国防军，和国民党军队没有区别，这是错误的。因此，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对政治工作和红军传统的破坏，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⑧

云阳会议结束后，八月一日，总政治部即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草稿，会前任弼时曾送延安审核，七月十五日，毛泽东电示应“加改直接抗战的内容”，任弼时等便重新起草提交会议讨论通过。在湘鄂川黔时期，任弼时曾经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因此，红军能在装备落后，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以少胜多，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将取消政治委员制，采用单一的首长和官阶制度，政治工作的地位和组织形式都将起变化，同时，估计到新的战斗环境和战斗任务，军阀军队的影响容易侵入，因此决定中强调：党的组织和作用，依然是“一切政治

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保持和发扬“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奋斗”等传统，是红军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并且要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友军，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和巩固其战斗力。^⑨

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者从四面包围南苑和北平的北侧地区，猛烈攻击，古城北平遭受敌机轮番轰炸，蒋介石即要红军迅速出动。张闻天和毛泽东电周恩来，将云阳会议上红军将领的意见告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并请他转告蒋介石：红军八月十五日编好，二十日出动，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以便指挥作战；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计；红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⑩要求南京当局照发军饷，补充装备。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塘沽相继失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赶到云阳，指导红军改编和商讨出动后的作战原则。这时，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出席国防会议，商定国防计划。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

叶剑英出席。于是延安和云阳之间电讯往还。遵照张闻天、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战役战术上不受约束等原则，^⑪八月四日，云阳方面向延安建议：为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领导，红军出动后，“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特点与优点；为便于作战，红军三个师节约兵力，谨慎使用，开赴察、绥、晋三角地区，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以绥远、宁夏、陕甘一部为后方，便于补充联络；作战序列只属于一方面的指挥路线，由韩城、平民分两路渡河，经同蒲路北上等。^⑫第二天，张闻天、毛泽东电复：“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所谓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作战地区不限于察绥晋“三角地区”，而是“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即“四角地区”。^⑬蒋介石一面迟迟不肯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不许红军设指挥机构，一面却要红军迅速、全部开往前方；而他在陕甘地区却摆下十个师的兵力，这就不能不令人警惕：他的用意或者是让红军在与日军硬拼中消耗掉，或者是想乘虚袭击陕甘宁边区。因此，张闻天、毛泽东来电说，红军主力出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按情况用兵

力，其余兵力则须保卫“我们唯一可靠后方”。^⑭中央的重要指示，既是前总布署红军出动的依据，又是周恩来、朱德等去南京力争的基本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前总制定了红军改编和防区配置的方案：一，以第一、第十五两军团及第七十四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共一万五千人，辖第三四三、第三四四两个旅；二，二方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加赤水警卫营，特务团的一个营和骑兵第一团合编为第一二〇师，共一万四千人，辖第三五八、第三五九两旅；三，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九军，加第三团，陕甘宁独立师的四个团，合编为第一二九师，共一万三千余人，辖第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各部留守部队分别划定防区，担任地方警戒，负责后勤辎重任务。^⑮八月六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全部集中云阳地区待命，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则离开云阳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任弼时后来说，抗战初期“中国政府的抗战方针是动摇不定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时还不愿立刻爆发全面的抗日战争，尚希望用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八月十三日，日军又大规模进攻上海，南京告急，“由于日本进攻的逼迫，我党抗战的号召，全国人民与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乃定全面抗战方针”^{①⑥}。十八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编入第二战区的序列。久拖不决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和人事，终于解决。虽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仍以“修改”为由延搁不发表，但他在谈话中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八月二十二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消息见报，朱德、彭德怀宣布就职，全国各界纷纷致电祝贺。这时，在陕西洛川县的冯家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任弼时出席了这次决定军政大计的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就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在作战中，要发挥红军的特长，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作战的原则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不同敌人打阵地战，硬拼。在处理两党关系上，毛提出“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的问题，告诫：党的阶级的独立性应引起全体党员注意。

任弼时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谈判交涉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最近中央采取的立场是对的。在谈判中，能争到的应该力争。红军出动抗战是全国人民的切望，出动前《宣言》最好要求用国共两党名义发表，“蒋或者还想拖延，用修改来拖延”；但是否《宣言》如不发表红军主力就不出动呢，“这要估计到人民对红军出动是切望的，这在全国政治影响上有些损失，国民党还可以造些谣言”；另一方面，如果修改得坏一些，“就会损失独立立场，因此要国民党完全承认我们宣言发出去，在今天还困难。我意由我们自己发”，另外可从别的途径公开，如办报问题，“使全国都看到国共合作的事实，把现在军部亦可以公开活动，逼迫国民党承认，争得公开合法地位”。对于抗战问题，任弼时说，这“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保持战争的领导，一方面要发挥我们特长，一方面要保持我们的力量，基本上用此原则保持我们持久的模范。因此队伍的补充是很大工作。后方要努力于争取有几万人的补充”；但后方扩兵与国民党交涉“希望还少”，“最主要的还要靠前方”，要抓紧在战区扩红。部队的使用要争取独立自主，两方面指挥，万一蒋的命令下来，使我们自主范围很小，这就要求在山西“我们有得力军事代表，能共同解决问题”。部队出动后，要“不失时机地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

灭敌人，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①

洛川会议开了四天，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为委员，朱、彭、任三人为常委，朱为书记，彭为副书记，任弼时为秘书长，这是党内的职务。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时离开冯家村，同行的还有傅钟。傅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这次大军出动，任弼时特请他担任政治部民运部长。他对傅钟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做居民和友军的工作，面很广，党政、军事、外事都要做。

任弼时一行，行抵离洛川不远的桥山镇时，稍事停留，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元祖轩辕黄帝陵所在地，陵墓坐落在“百里荒原青一点”^②的森森古柏丛

中。四月清明时，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为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前来祭扫黄陵，轩辕庙内的供案上，毛泽东手书的祭文还陈列着，文中写道：“……东等不才，剑履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任弼时等一边阅读，一边交谈，说“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

九月一日，朱德、任弼时等回到云阳，彭德怀则和周恩来一起去太原同阎锡山交涉八路军入晋事宜。这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已于头一天在韩城芝川镇渡黄河，紧接着九月二日，第一二〇师在富平县庄里镇誓师出动。四天以后，朱德、任弼时和邓小平率总部在云阳镇的大草场里庄严誓师出发。这天，蒙蒙秋雨压住了路上的尘埃，总部机关和随营学校的三个团，担任总部警卫的特务团，浩浩荡荡在秦川大地上疾进，村里的群众和田间收秋的农民，热烈地挥手致意，送茶水、鸡蛋的，送大红枣儿和梨子的络绎不绝。十五日，队伍到达韩城的芝川镇。

芝川镇是陕西入晋的重要渡口，天堑黄河自北

而南，在韩城县境内流长一百四十多里，禹门以北是峡谷区，两岸峭壁对峙，河面宽仅六十米，河水奔腾咆哮；一出龙门，河面顿时开阔，最宽处达十多里。芝川镇附近，河宽五里。韩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他的千古名著《史记》，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列为“世家”，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业绩，文章结尾处写道：“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其事也。”可见作者承认“亡秦”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力量，在封建时代的史著中，堪称首创。司马迁的墓和祠庙，至今留在芝川镇东北黄河峡谷出口处的龙门。在马克思主义武装下的三万红军，半个月从司马迁的家乡东渡。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从军帽上摘下五角星，换上青天白日徽，以准备吃野菜的决心，高举抗日义旗，奔赴沙场，当代的史家对此理当大书特书的！

时近中秋，风和日丽，任弼时和朱德、邓小平、左权等登上木船。在平时，这里水势平稳，泥沙较少，但连日暴雨，山洪宣泄，泥沙俱下，河心浊浪汹涌。萧萧秋风，令人略觉寒意。在船工们熟练地把握下，木船安抵彼岸——山西的荣河县境。这是九月十六日。由荣河到同蒲路的侯马二百里，任弼时一行率部东进，二十日到达侯马火车站。这时，展现在眼前的

是一幅惊恐、杂乱的战时流民图：裹着纱布、绷带的国民党军伤兵，拖儿带女的难胞，在他们的呻吟、哀号中，突然一支队伍唱着抗日歌曲，雄赳赳地登上列车，大家以殷切的目光注视他们，期待着他们带来胜利的捷报。

二十一日，总部到达太原，驻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成城中学。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都住在办事处，他们正在传达贯彻洛川会议精神。

在八路军入晋的期间，华北局势急转直下，北面，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寇，于九月十三日进占大同后，向平型关、雁门关逼进，企图突破晋北屏障，攻占太原；东面，沿平汉路进攻保定，夺取石家庄。两路进犯的敌人中，以北路为重点，兵力达三个师团。在日本侵略者陆空配合猛烈进攻下，国民党守军“仍以消极防御，彼此观望，集守工事，轰炸下静待，绝少机动及袭击、伏击”，而且给养运输极坏，“汤师有时四日一饭，卫部二日一饭”^①，毛泽东预感到“彼辈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险”。特别是大同弃守后，晋军退守雁门关，刘汝明师从蔚县返回津浦路，汤恩伯部精锐已失，全部开回平汉线整理，只有卫立煌的四个师尚在涞源东北坚持。高喊“守土抗战”的阎锡山，此

时陷入矛盾中：不打一仗，难以向山西人民交代，打一仗又感到力不胜任。毛泽东因而指示总部：“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②0}估计到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日本侵略军将以重兵进取太原，八路军三个师集中晋东北一处“多兵堆于狭地”，既无可能，更无必要，他一面指示总部改变部署，按照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用兵，一面要彭德怀“偕恩来去南京一行”，嘱咐他们在晋、在冀、在南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用兵的基本原则，“取得他们彻底了解与同意”，并规定在彭德怀“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②1}

作为第二战区新到的生力军，八路军的兵力展开是毛泽东直接指挥进行的。任弼时回忆道：“当时我们认为，与日本军队作战，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单纯采取正面防堵、依靠坚固阵地与敌对战是不适宜的，……应当采用新的战法，求得能够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持久，这就是利用山西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同时组织和武装广大的民众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以这样的作战方针来配合我国其他部队达成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战局的任务。”^{②2}

在新的作战方针下，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签署了《训令》（又称华北军分会的小册子）。

晋东北一带，自东北向西南有三道天然屏障：恒山、五台山和太行山脉；晋西北的管涔山脉，由北向南，山峦起伏。在连绵的山地，重炮、坦克均失去威力，日军深入后，后方联络线延长，运输补给困难势必增加，现有的七个师团，非增兵不能奏效。八路军虽然在决战上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他的拿手好戏在于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友军在敌人的翼侧袭击、扰乱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正如彭德怀所说：“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因此朱、彭、任的《训令》规定的部署是：一，第一二〇师向晋北及绥东方向游击，在恒山以西，管涔山东西两麓地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派得力干部领导。留王震旅的第七一八团在五台山东北相机参加战斗，并着手布置五台山以北及以东，恒山以西的群众工作。二，第一一五师的陈光旅控制平型关东面地域，“小部经常袭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徐海东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并组织游击队，向紫荆关、蔚县涿鹿间收编散兵，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三，即将入晋的第

一二九师到正太路以南，掩护并开展太行山脉的群众工作。^{②③}

在《训令》发布的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中表示：“我完全同意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并向彭指出：有个别同志对太原和整个华北“危如累卵”的形势，对分散兵力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方针“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目前情况与国内战争时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并请彭“给与深刻的解释”。^{②④}二十二日，毛电朱、彭、任：“你们意见与我们意见是一致的。”^{②⑤}

毛泽东给彭德怀电中所说的“个别同志”，首先是林彪。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林彪的表现时写道：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②⑥}

因此，九月十六日，当日军从天度镇南下广灵，关东军从蔚县西进时，毛泽东特电告诫林彪：“我军

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②7}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并要林“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②8}林彪仍主张集中一个旅“暂时不分散”。因此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中说：为了相机给敌以打击，“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使战略方针“归于一体”。^{②9}

在八路军总部的部署下，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揭开战幕。

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朱德、彭德怀电示林彪：“据阎电，敌于昨夜以来，忽奇袭我平型关阵地，现在激战中。一一五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当天，军分委常委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毛泽东报告：“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涞间及灵丘以北活动”，^{③0}同时又由朱德、彭德怀联名报蒋介石。二十四日晚，第一一五师的三个团在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指挥下，冒雨进入平型关至东河南镇沿二十华里的公路两侧伏击阵地，隐蔽待命。二十五

日清晨，雨停了，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四千多人，分乘百余辆汽车，从灵丘方向驶来，后面是二百多辆装运物资的大车，骡马大炮和骑兵。这里地处山西河北交界，日军以为华军防守薄弱，更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如此神速地出现在这里。七时整，八路军奇兵突出，把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切成几段，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敌人虽然顽强抵抗，但经不住八路军战士的英勇拼杀，激战到下午一点钟，八路军歼敌一千余，击毁汽车、大车全部，缴获步枪一千余枝，步兵炮一门，机枪二十余挺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的二千多敌人向东跑池高地逃窜。东跑池原是晋军的出击目标，但他们没有按计划行动，直到黄昏“始见晋军的出击部队，所谓二路出击全是鬼话”，^③使这次伏击战未能全歼敌人。

平型关首战告捷，八路军声威大震，南京当局宣布：“此为华军在平绥线之空前胜利”^④。二十六日，毛泽东来电“庆祝我军第一个胜利”。随着，全国各地各界祝捷电纷纷飞来，其中包括蒋介石、杨虎城、龙云、马鸿逵以及国民党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等。林彪则著文介绍经验，文章的开头，特地表明这是“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不但值得第八路军全体指挥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也愿意把它贡献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民众”，文

章的结尾则写道：“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但“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③二十一年之后，一九五八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这位当年受总部之命出动平型关作战、曾经洋洋自得宣扬他“个人体会”的师长，以为平型关胜利的历史要重写了，竟然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④翻云覆雨，不顾历史事实，岂是“健忘”所能解释！平型关之役，八路军付出多少代价呢？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林彪、聂荣臻向总部的报告：“我伤亡约三四百名”，“我军伤亡三四百，负伤副团长二，营长二，其余待查”。^⑤十月一日，经核实后，毛泽东向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及在上海的潘汉年通报：除“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我军伤亡四百余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二三名”。^⑥单就人员伤亡来说，敌我的比例是三比一，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至于其他方面的收获，任弼时回忆道：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

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在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就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⑧

对平型关战役前后的山西战局，当时中共北方局认为华北地区正规战已经结束；而华北军分会认为国民党增派了卫立煌、汤恩伯两个纵队入晋，阎锡山对保卫山西抗战还持积极态度，如果八路军积极影响和配合国民党军，利用有利地形，在娘子关以东、雁门关以北地域，以主力寻求运动战相机击敌，以少数兵力分散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地区可以作长期坚持华北抗战以及反攻日军的基地。双方认识有一定差异。九月二十五日七时，前总立即发出《关于动员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明确表示“接受山西同志批评我军宣传工作不够，特别口头宣传差”。第二天，二十六日上午，平型关告捷后，毛泽东来电：“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二、全部军队照朱、彭、任二十五日七时电部署”等。对此，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承认，他们当时“对国民党进步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量过大”，本质是“轻敌”。

毛泽东说：主要是对洛川会议精神宣传不够，“除此项外是好的”。^{③⑧}

平型关战斗后，总部立即部署：动员组织游击队，困扰向太原进攻之敌，断绝其后方运输，增加其恐慌和疲劳，分散其兵力，“只有这样才能便于主力打击敌人”，要求在敌人占领区内“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把经济斗争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取消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没收汉奸财产分给抗日人民，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在战区内，要广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纲领，发动群众，实行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收分配日寇和汉奸的财产，减租减息减税，督促政府执行优待抗日军人条例，号召“好男儿上前线去”^{③⑨}等。

各地游击战争展开后，任弼时集中精力制订政策，着手建立敌后根据地。

一是配备干部，深入敌后打开游击战争的局面。一天，任弼时和邓小平找王平和刘秀峰谈话，指示他们按照北方局的决定和李葆华三人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到阜平去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王平回忆道：“弼时同志双目凝视着我们，强调地说：‘贯彻上面的方针，最

根本一条是发动群众抓武装。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象妇女绣花那样；再一条是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他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远。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当时，一一五师正向察南和平汉线挺进，师政治部在阜平，因此任弼时和邓小平又告诉王平：“这次前去，在党内受北方局领导，在社会上，以太原‘动委会’的面目出现”，“形势好得很，你们人手虽然少些，但到阜平也可以直接找罗荣桓同志要。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可以直接向他请示”。并说，毛主席指示要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派不少干部分批分组到华北广大敌后，“中央正考虑从一一五师留下一位负责同志，统一领导晋察冀三省的对敌斗争”。^⑩十月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晋察冀军区成立军分区时，王平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⑪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政权——行政委员会。毛泽东曾赞扬晋察冀边区为“模范根据地”。

二是恢复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云阳改编时，《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还被蒋介石搁置着，为顾全大局，改编后的八路军曾采

用和国民党军队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原有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九月二十二日，宣言发表了。平型关战斗后，任弼时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在检查中发现取消政委制后，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师部首长很赞成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黄克诚回忆道：“我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时要我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⑫十月十九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央。张闻天、毛泽东电复：“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⑬这以后，部队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为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政治委员“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⑭为了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⑮。

三是开展敌军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在平型

关战斗中，战败的日军拼死不肯缴枪。有一次，我军的一个电话员，沿公路查线时，发现一个半死的日军士兵，躺在被击毁的汽车旁。电话员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个日军士兵不懂中国话，扬手一刺刀，刺伤了电话员。在打扫战场时，有同志去背负受重伤的日军士兵，结果耳朵被他咬伤了。任弼时认为，这一方面是他们中法西斯的“武士道”的毒太深，另一方面是语言不通，不了解我军的政策。目前入晋的敌人屡遭打击，给养困难，军心恐慌动摇，这是我们瓦解敌人的良机。十月六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要各部广泛张贴和散发《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宣传我军优待俘虏，医治伤兵等政策。指出“在火线上坚决拒绝之敌人自应杀伤，但已被缴枪俘虏者，即应多方弄回，加以政治宣传后，再行处置；不应因其拒绝而再行加害”。要求各部队组织战士宣传队，开展政治宣传，学会用日语呼口号、喊话。各师团的敌工部，配备适当人员，吸收懂日语的干部战士和留日归国的爱国青年，培养他们成为敌军工作的优良干部；在敌工部领导之下，成立敌军工作委员会。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日军政治情报和敌人遗弃的文件、日记等，加以研究，总结经验，报告上级。^{④6}之后，又发出《关于对伪满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对被俘的伪满军，处置应特别慎重，

因为他们是受日本侵略者欺骗压迫入关作战的，首先要教育他们认识到帮助日军屠杀同胞是关外同胞自取灭亡，他们“应与关内同胞联合驱逐日寇收复东北才是唯一出路”，伪满军的俘虏经教育后“尽量放回，有组织地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伪军，争取他们暴动哗变”，即使上层官长，“仍采用争取方式”，考其履历，依其实情，宣传我们救国纲领和政策，“在一定的工作基础上及可能范围内，互派代表洽商具体办法”^①。

美国著名作家路易斯·安娜·斯特朗访问任弼时后，记载下这样一个故事：

“八路军的一支小部队，把从日军运输队里俘虏到的三十来个来自满洲的中国人，带到了——一个村子的群众大会的会场上。当地的农民高呼：‘枪毙汉奸！’军队的政治指导员要这些吓得发抖的满洲人讲讲他们是怎样会去给日本人做事的。他们说，自己是如何被困在‘保护村’里，一个汉奸又如何骗他们说冬天要给他们一个好差使干，引诱他们来到日军运输队。在那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而且毫无报酬。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晚上用铁链子把他们的手腕同马腿锁在一起。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当作人质留在满洲，迫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卖命”。“会后，政治代表们

同这些满洲俘虏进行了谈话，告诉他们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抗日同胞中间了，他们愿意出力吗？这些衣衫褴褛、两足疼痛的俘虏们哭着举起双手，恳求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干，告诉我们该怎么干！’他们被组织起来，为伤员抬担架。”^⑮

如果说，在游击战争的战场上，八路军能将持有先进武器的敌人俘虏过来，那么，在另一个战场上，他将改变他们的心理和立场，使用的武器就是革命的真理和正确的政策。因此，毛泽东把正义的、革命的战争称作“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⑯

雁门关等长城各口失陷不久，保定、沧州、石家庄相继陷落，平汉线上的国民党军队撤到阜平、获鹿，河北落入敌手，晋东、晋北的日军矛头指向太原；如果从海州登陆的日军进占徐州，山东可能不战而失，整个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将被迫移到黄河以南。蒋介石命卫立煌的四个半师车运到太原转赴晋北，协同晋绥军保卫太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九月三十日出动，沿正太路东进和一一五师靠拢，其中的一个团沿同蒲路北上向雁门南面的原平山地挺进。毛泽东估计：山西境内中国军队数量在十五万以上，八路军与卫立煌军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如果

国民党军队能在龙泉关、娘子关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布置适当，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⑤0}。这就是忻口激战。

忻口战役从十月十三日开始，历时二十一天，八路军和友军密切配合，“成为华北抗战中光荣的战绩”^{⑤1}。卫立煌、杨爱源^{⑤2}统率两个集团军在忻口以北地区分别在中路和左路担负正面作战任务，抗击从朔县向阳方口南进和从代县、崞县向西进攻太原之敌，第十八集团军司令朱德指挥的右路集团军在五台山区占领阵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雁门关附近，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地区配合友军侧击敌人。任弼时回忆说：“我们对于崞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是非常钦佩的”，他们在崞县、原平都经过一个星期的固守，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进攻；“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重大伤亡，毫未动摇”，郝梦龄、刘家祺两将军在前线壮烈牺牲。在平型关、灵丘以北，及在崞县、雁门关、大同活动的八路军，则“以最高度的负责的积极行动，打击敌之掩护部队和运输队”，使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崞县的道路，大同至崞县和代县至宁武的交通不断被我切断，蔚县敌总兵站、沿途大小兵站及医院，不断受我袭击，大小战斗共计四十余次，“被我

杀伤的人马，不亚于在正式战线上的伤亡，毁车千数，资材被夺，弹药被焚”，其中著名的有阳明堡袭击，击毁敌飞机二十余架，雁门大同道上，烧毁敌炮弹子弹数十车，崞县、雁门道上夺取汽油、资材数十车，几次强占雁门关；并以相当兵力直接配合忻口侧翼作战，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③③}但是由于平汉线上的敌人经正太路向娘子关、太原进攻。忻口守军的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十月二十五日，卫立煌向蒋介石告急，请求派兵增援，但因晋东战事转紧，未能满足要求。十一月二日，忻口失守，六天后，太原陷落。

但是，八路军却已经为在敌后作战创造了条件。早在十月十二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指示各部，“猛烈开展地方工作，动员扩大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本身”；重新划分了开展地方工作的区域，^{③④}乘势收复了平型关、繁峙、沙河、大营、灵丘、广灵、涞源、蔚县、阳原、易县、完县、唐县、行唐、平山等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山脉东面的广大地区。十一月四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指示各兵团，将团以下之副职干部，教导团及大部政治工作人员组成地方工作队专任在指定工作区活动，扩大本身。^{③⑤}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任弼时向毛泽东并张闻天报告说：“武装民众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晋西北，

八路军领导的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五千余人，晋东北有七千，正太路以南千余，现正集中进行短期军政训练，一部已开始随部队活动，“我们准备争取一部或大部加入主力，一部留作建立地方独立师团营基础”，八路军驻地已开始建立党组织及工会、农会等。恢复区域的政权机关，“原则上是建立以我们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初到时，委任进步分子为临时县长，宣布政纲，再进行民主选举”。“涞源最近已经过全县代表会，选出了县政府，区乡亦取委员会组织形式，经选举产生，民众对我军甚表拥护”。五台、盂县对我伤兵招待可谓无微不至，如轮流派人招待，转运时派担架，另派人随行等，“但纪律太坏之友军，群众见之多逃跑，且收缴其散兵枪支”。

当时，薄一波等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发动群众，在许多地方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八路军的民运工作便和他们密切结合。任弼时在报告中说：

“山西当局在抗战、特别当敌入晋后，感觉发动民众之必要，乃有战区县区（乡）战争的动员之组织，我们亦公开参加，其纲领内有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人民武装，争取委员会等规定，权力很大，带有政权作用。初只限于在雁北各县执行，依战况扩大至正太路及以南我军活动地带。动委会虽有其他团体及

政府合作进行，但多在我们领导下”。

但是，阎锡山发动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替他“保驾”，他曾这样说：不发动民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他在内部的决策会上说：“现在要手执电鞭，把群众发动起来为我所用。”任弼时在报告中说：

“阎最近认为民众动员非三个月工作不能生效，断〔但〕见我们短期内组织大批游击队，乃对我生戒心，其亲信之梁化之对人称：山西抗战失败固无论矣！即胜利亦将是共产党的。从中阻挠，如经省府命令各县不许捐款，集中过去的防共保安团派其教导团到我们工作区担任战争动员，停止发〔给〕动委会枪支，放出红军不愿牺牲空气。但我们对此一方采取批评态度，一方影响其派来之教导团，争取其与我们合作，并设法经过牺盟会得到部分枪支武装游击队。”^{⑤⑥}

太原陷落后，国民党军大溃，阎锡山动摇无主，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八路军在华北分为四大块：第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移到吕梁山区，开辟晋西南根据地，一部在晋东北依托五台山脉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第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根据

地；第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根据地；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率总部离开五台山区南移，过正太路到和顺县的马坊村和石拐镇，邓小平率总部直属队教导营赴汾阳、洪洞之线以西，指导吕梁山脉及汾河以西地区工作。十一月十一日，总部召集林彪、刘伯承、张宗逊、宋时轮等在石拐开会，布置创建根据地问题。会后，朱彭任向中央报告：“晋中大势已去”，蒋介石调樊崧甫、汤恩伯的四个师入晋，也“只能起掩护收容作用”；八路军各兵团准备“乘机抓一把扩军”，并开始收编溃军。^⑦于是，第一一五师派出二百余干部到晋东南的黎城、武乡、襄垣、涉县突击扩军；一二九师派出九个工作组到同蒲路南段的太谷、祁县、介休和晋东南的沁县、沁源、长治、潞城、平顺、黎城开辟工作，以实现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⑧，开创全面抗战的新局面。晋察冀军区工作基础较好，十一月中，全军区已划分为四个军分区，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按总部要求，发展成为独立师。

当八路军有秩序地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时，阎锡山撤退到晋西，之后又过黄河到了宜川，无力再干涉八路军的地方工作，因此各部可以放手工作，发展甚快。原来总部要求到一九三八年一、二月底，前方部队扩大十二个新团，十二月十一日总部通

报说：“以现在情况，本年底组成十二个新团（每团二千人计）及充实原有老团的计划可以完成”，规定“从一月十号起开始军政教育”^③。这次突击扩军，新战士的成分好，文化程度较高，而且经过壮丁训练，有一定的军事常识，在军政教育中进步很快。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任弼时向毛泽东报告说：总部创办的《前线》周刊，已出版了四期；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帮助阎锡山扩充部队，八路军准备动员一万游击队，另帮助他经过政府、牺盟会和决死队，“于三月完成两万人之数”。但是，阎锡山戒心十足，“怕我们乘机打入其军队”，托故拒绝，并且“以怨报德”，还在他的决死队、教导团中“注意清查八路分子”，使以前派去的干部有些不能立足。^④在八路的队伍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蓬勃发展时，阎锡山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根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枝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又说，只要政权在他手里，将来还有办法。这使人感觉到，阎手中的“电鞭”快要扬起来了。联系到两个多月之前博古和叶剑英从南京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两党关系有恶化之势，西安上海均有磨擦”，蒋介石不满意宣传“国共合作”的口号，反对改善民众生活的口号，对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邵力子“责难很多”，说：“你们都替八路军宣传。”种种迹象集

中到一点，说明蒋介石“溶共”“限共”之心不死，他们的政府及军队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十分懦弱，而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众面前所表现的“自大主义”却十分顽强，这预示着统一战线内部斗争这股暗流正在表面化。为着报告部队情况，讨论新的战时政治工作条例，解决一些干部问题，任弼时准备回延安一行。

八路军在山西抗战中的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吸引着国内和国外的记者们、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来战地访问，体验和慰问，美国的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法兰克福》报记者、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莱特莱先后到八路军各部访问，作家丁玲率战地服务团一行五十余人，从延安来到山西前线。任弼时热情地接待他们，向他们介绍情况，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后来，丁玲回忆红军主力会师后在定边及在山西抗战前线，同任弼时的接触时写道：

“那时，前方的指挥员我都不认识，我觉得弼时同志容易接近，所以一路便跟着他。一路上，他教我骑马，讲马的习性，帮助我，照顾我。到宿营地，他就坐下来看书，读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

“当时，他和彭总在一起，工作很紧张，一

到宿营地，就挂起地图，看电报，忙极了。可是生活很艰苦，部队吃的很不好。他和彭总那里的伙食也办得不好，贺老总那里，比他们搞得好些。那时津贴很少，一个月，他们每人五元钱，彭老总的钱由警卫员替他管。彭总有胃病，警卫员就给他弄点炒面糊，冬天有时买只鸡做给他吃，但彭总总要问，是不是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的，违反群众纪律没有？我跟着弼时走一路，没见过他的警卫员给他买鸡吃，他自己不大花钱的。我陪史沫特莱回延安时，他还交给我五元钱，让我带给陈琼英同志。他对陈琼英特别好，陈琼英对他也很体贴。”^{⑥1}

由于部队迅速扩大，经费有限，八路军的官兵，一律过着极清苦的日子。许多扩大来的新兵，还没有发衣服、鞋袜、毯子，冬季没有棉衣；士兵虽规定每月发一元钱的零用，常常不能保证；伙食费每人每月五元，也不能发足。至于干部，则与士兵生活相等，虽规定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二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也难于保证。和友军比较，相差很远，他们的薪水连长每月百余元，师长八百元，总司令在千元以上。但是，八路军有准备“吃野菜”的革命精神，斗志始终是旺盛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许多人表示钦佩不已。丁玲写道：“弼时

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我常去向他汇报工作。有一次，我在演出费里报了点浮帐，记不得是几元钱，有炭火费，钉子费等。他就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我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装需要烤火。’‘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又问：‘钉子干什么用的？’我说：‘挂幕布。’他又说：‘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吗？’我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那时八路军就是这样艰苦，这样节约。我们的演出费很少，在农村演一次，才花两三块钱，可弼时同志工作作风是那么细，那样严肃认真。”

日军占领太原后，为了保障后方安全和维持交通运输线，随即以两万兵力向年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围攻，又分六路攻正太路南面的寿阳、昔阳、和顺地区。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迁到武汉，日军重新调整部署，将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在山西境内暂时停止南进，这就使得在山西抗日中过于疲劳的部队，得着机会收容、整理与补充，保持晋南大块土地。这时，任弼时开始总结半年来山西抗战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武汉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任撰写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月底，总部的《前线》和延安的

《解放》杂志同时刊载此文。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在后一篇文章中，任弼时写道：

“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将在持久抗战中涌现，滋长、生息、培养、发育起来。在最大的决心与努力之下，国防军队可以巩固与扩大，军事工业可以建立，人民愈发动愈团结愈有力量，游击运动愈扩大愈斗争也就愈坚强。这一切的总和，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日寇在被迫延长侵略战争情况之下，只有加重对国内人民和其殖民地的压榨，以图困难之解决。然而因为壮丁的被征调，对外贸易大为减低与入超，国内生产更趋凋零，人民忍受不了国家的增税与无止境的公债负担……厌战与反战的情绪日益增高。殖民地的斗争活动，也将乘此时机而开展”。“因为战线纵横的延长，其困难必为之大增，兵力将更加分散，前线战斗实力必更见削弱，弱点也就会随之而更加暴露与生长”。“这种时期从何时开始，是由各种斗争力量成熟的

过程来决定的，然而这是可能产生的过程”。“敌人困苦愈急，或由于我们最后将其驱逐与歼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败”。“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一种最艰苦奋斗的过程。这过程中的磨折，必然也会很多”。^⑫

“努力巩固培植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力量，以争取胜利局势新时期的迅速到来！”这就是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发表前四个月，任弼时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所觉悟到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发展的规律，和排开种种悲观论调所预见到的胜利曙光！

二十五、在共产国际的日子里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元宵节，任弼时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会议，十五日，任弼时向会议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延安的《新中华报》连续三期登载了任的报告。三天后，他又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八路军的发展情况及战区统一战线问题。

八路军入晋抗战以来，一面英勇作战，一面壮大队伍，到一九三七年底，主力三个师已由出动时的三万四千人发展到九万二千余人，另有游击队两万五千人。特别是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各军大溃，阎亦无主”，八路军则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抗日，在统一战线原则下，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建立民主政权，招纳左翼人士，打击汉奸，组织游击队，收编溃军，自己筹办粮饷，坚持敌后长期抗战。阎锡山

守土无能，但对八路军的发展却深具戒心，时常引起摩擦。为了进一步发展敌后抗战力量，避免和阎锡山摩擦，任弼时在汇报中说：总部认为八路军主力可向河北敌后发展，并以一部向苏鲁边活动，一部到平汉路去发展。

对总部的战略性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

这时，日军正准备向西安和武汉进攻，依据地势，敌攻西安，必以潼关为决胜点；攻武汉必以武胜关为决胜点；而进攻潼关，敌将调集平汉、同蒲两路的兵力，分数路向晋南的临汾、风陵渡进攻，驱逐抗日军队出山西。敌人如占潼关，将控制平汉、陇海两路，武胜关岌岌可危。根据这个判断，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①提出“总的方针”是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配合内线主力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的军事政治形势。如果国民党各军能固守郑州至潼关一线，八路军全部将与阎锡山、卫立煌部一起“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歼敌。如阎、卫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武胜关无险，八路军“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如武胜关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以东”地

区配合友军作战。如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告危，八路军“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作战；倘潼关、武胜关均有危险，应抽出两个师南下，分别在平汉以东、以西地域，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必要时，不撤回黄河以西。这个战略部署，反映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配合友军、真诚抗战的决心，为后来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成为坚强的抗战堡垒指明了行动方向。

二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为什么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保卫武汉的战斗即将展开时，中共中央要抽调正在前线工作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去莫斯科呢？这是因为在实施以国共合作抗战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方针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和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国的。他自一九三一年九月离开上海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整整住了六年，他既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战争，也没有经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根据共产国际建立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他主持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在政治上起了好的作用。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并经过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促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如何在全面抗战的路线下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这是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作斗争的新课题。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出现了分歧。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回国以后，便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责。在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抗战、坚持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重点是对四个月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央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

估计不够；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在统一战线中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不应提出要对包容着汉奸和亲日派的旧政府机关进行改造的要求，在抗日根据地不应成立抗日人民政府等等。^②毛泽东等不同意王明的观点，十二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然按照原来的方针领导八路军和抗日游击战争。而王明则到当时国民党当局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地武汉去推行他的“新政策”了。

任弼时没有出席十二月会议。王明的报告，他是在二十多天之后，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正式传达时方才知道的。应当说，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和王明所讲的是格格不入的。

比如，在争取民主的问题上，任弼时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将会“利用日本的和缓而对抗日力量加以限制，特别是对我们更采取苛刻条件”，因此“争取民主主义的实现，这是很大的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这样做的，需要很大的长时间的斗争”。^③

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任弼时曾说：“土地问题的

解决在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并不是完全把它取消，在相当时期，我们可以采取改良办法来满足群众要求”，“在前方，最近发生忽视群众利益的观点，我们是应该反对的”^④。所以晋察冀边区的政府成立后，开始组织简单的经济建设，“地租、利息、捐税等有些减少”。而王明则认为现在共产党是“政府党”，“改善人民生活问题，工人简单的只提出行会的要求也是不对的，防止过左的口号”，一切“要争得合法。”^⑤

在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上，任弼时在党的会议上曾经明确地说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比，斗争将“更复杂些”，因为“我们党的力量与群众的力量和上次不同，我们有武装与地区政权，并且有丰富的经验”；“国民党也有十年内战的经验，它必将到处来限制我们”。他主张要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来争取与巩固我们的领导权”，这关系到民主共和国发展的两种不同前途。^⑥王明则说：“空喊领导只能吓走同盟军”，“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⑦

在敌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上，任弼时的主张和王明发生了直接的对撞，这就是如何看待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由晋察冀军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是第一个统一战线的敌后临时政权，曾发出通电向蒋介石、阎锡山报告。王明在武汉看到通电后颇为不满，认为“没有维持原有政权形式”，二十八日，他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北方局的刘少奇，电中指责：晋察冀的做法是以“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提出“以后务须避免此种工作方式”，为了不“刺激”国民党当局，“最好不用边区名称”，并要求“对此事应首先设法取得阎百川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阎呈报”国民党当局。王明的电报是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的最好说明。因此，任弼时在二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县长会议上明确地说：“在被敌占领地区，原来政府负责人跑了，政府被敌摧毁”，八路军收复之后，“设立县区政务委员会，有各救国团体派代表参加，成为议事机关，县区长兼政务委员会主席，村长由人民选举”，县长或由山西省政府委派，或由“当地提出请省府加委，吸收当地有名之士参加政府工作”，使“政权机关与人民关系更加密切起来”，按统一战线原则组成的行政委员会领导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将成为不可摧破能够继续持久斗争的坚强堡垒”。^⑧

二月二十八日，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题为《目

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虽然承认他在武汉时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⑨中，向国民党让步较多，但并没有改变迁就主义的基本立场。当天下午，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在讲到日军占领地区的工作时，他有针对性地说：“敌人占领区域，模范的区域晋察冀是好例子。在这些区域，要使之成为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比别的区域要进步一些。”当时，山西的阎锡山处在新旧两种势力之间，拥有四万人的晋军旧部是他的统治基础，新军是在“牺盟会”、决死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对徘徊于新旧势力之间的阎锡山，任弼时说：他要维持山西，必须采取进步的办法，但他又建筑在旧的基础上，不可能有很大的进步。^⑩接着，任弼时不指名地批驳了王明的另一个观点。王明曾说，打倒维持会的口号是不对的，“这样就帮助日本建立社会力量的基础”。王明要大家学习东北的经验，说“满洲人民革命军与地主关系弄得很好，使地主不反对我们”。^⑪任弼时在发言中说：

“东北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不能机械拿到华北来用，如有人说，利用东北的经验，‘打倒维持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想，维持会是应该打倒的。日寇维持统治的社会基础不是整个的

地主阶级，有许多有钱的都逃出去了，它的基础是流氓及一部分反动的豪绅。”^⑫

王明曾说，他的报告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的经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产国际所以派王明回国，正是为了贯彻这些“新政策”。很显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三月五日早晨，天空飘着小雪，一辆卡车出延安南门驶向西安，任弼时化名陈林，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坐在驾驶舱里，后面的车篷里挤坐着他的爱人陈琼英，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烈士遗孤张太雷的儿子以及蔡和森的女儿等。当晚，他们到达由林伯渠为主任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抗战爆发后，苏联的志愿航空队在兰州设有飞机场，

运送抗战物资的车队在西（安）兰（州）公路上来往不绝，西安—兰州—新疆成为中国通往苏联的一条热线。任弼时一行便改坐苏联的运输车队离开西安，一路上严格保守秘密。这时，同行的人员中又增加了彭迪夫妇和林老的两个女儿。

“冷冷关中月，飏飏塞上风”，车队沿着西兰大道西行。三月十五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弼时等来此。”在兰州办事处，任弼时遇到了赴苏联学习的方志纯和张子意、马明方，以及应国民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邀请前去工作的林基路等。方志纯是原闽赣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长征后他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此番他们从延安坐汽车到兰州，一路颠簸，身子孱弱的方志纯显得十分疲惫。任弼时便说：“你坐我们的飞机走吧！”于是随任弼时西行的行列中又增加了方志纯和张子意等。二月十六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弼时等二十人，晨西飞”。三月下旬，任弼时一行时而坐飞机，时而坐汽车，经哈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盛世才正在标榜“反帝、亲苏、民主、平民、建设”等进步政策，共产党人毛泽民、邓发等应聘在新疆工作，任弼时等在迪化受到了礼遇。

在任弼时西行途中，突然接到一封从延安转来的电报：三月十八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他的母亲

去世了。^⑭任弼时夫妇深感悲痛。但是关山万里，重任在肩，他们只能对空遥祭，治丧的事只好电请堂叔任理卿代为料理。略可告慰的是去年十月间，陈琮英曾带着在长征途中出生的女儿远征去湖南探望了婆婆。临别时，又把远征留在婆婆身边。如今老人去世，任弼时在湖南老家的两个女儿——七岁的远志和不满两岁的远征也只得请堂叔照料了。

大约三月底，三十四岁的任弼时一行乘坐苏联的飞机到达了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公寓。这时，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是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任弼时到达后，王就准备回国。

四月十四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这份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大纲，分五个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⑮

五月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就四月十四日的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主要之点是：

第一，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蒋介石和南

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七七事变后，蒋不愿立刻发动全面的抗战，希望以局部抵抗解决中日冲突。上海失陷后，在共产党推动和全国人民奋起、某些实力派要求抵抗下，才确定全面抗战的方针。太原、上海和南京相继陷落后，日本和平引诱，蒋介石丧失了阻敌深入的信心，寄希望于苏联出兵。由于蒋全面抗战的决心下得太迟，政治上不事改革，军事上采取正面防堵方针，对群众抗日运动不肯放开，遭受某些失利是不可避免的。南京失陷后，“显然有一些新的进步”，目前的“困难与危机”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决心将政府中的亲日派、汉奸、托派及主和分子和贪污作恶分子“驱逐淘汰出去”，万一武汉、西安失守，在这些分子的破坏、阻碍下，政府对抗战“可能产生严重动摇”；二是财政困难；三是国民党畏惧群众的抗日运动，并加以限制。因此，中共目前“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任弼时说，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政策，这“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中共中央指出在同其

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既要反对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倾向。但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抱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一方面表示自大主义，不愿以平等地位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惧怕共产党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害其统治地位，故想尽方法来削弱共产党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借“统一”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于他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溶化共产党”，或者“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任弼时依据历史经验指出，当国民党起革命作用的时候，他便靠拢小资产阶级以至工农；当他离开革命的时候，他又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联合起来，逐渐将工农、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

第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任弼时说，从内战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有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他武器比较陈旧而不整齐，但是他在运动战游击战的方针下，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

联系，能从敌人的侧后克敌制胜，建立根据地。对这样一支强大的武装国民党却想尽办法加以限制和削弱，一是限制扩大，二是不补给武器，三是不增加经费，不准就地筹粮。汪精卫曾说：“中国共产党要统一战线，就要取消红军和苏区”。我们公开提出：“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并把经过群众中的政治动员扩大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任务。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

第四，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任弼时说，中国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推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地位大大提高了，“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目前统一战线尚偏重于上层活动，下层基础不坚实，不宽广，我们将把广大无组织群众吸收到各种团体中去，“成为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最重要的迫切工作”，国民党惧怕真正的群众运动，又怕共产党从中取得领导权，但他的许多团体没有群众基础，我们号召群众加入，“逐渐充实其群众基础，争取内部民主，推动这些团体进步，并逐渐在其内部扩大我们

的影响”。任弼时列举事实说，在山西，八路军协助建立起来的游击战争的群众团体中，“共产党已经起了很大的领导作用”，特别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游击战争在中国有特殊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万一武汉失陷，它将成为在敌后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中国党正以极大的努力，在敌人占领区域内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并使中国党在游击战争中起到主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和推动作用，主要“依靠于中国党政策之是否正确”，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⑩。

任弼时的补充和说明，生动，翔实，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王稼祥在任之后也作了补充发言。

六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肯定：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能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

“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边区内应该实行彻底的政策与工作，以组织民众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要使边区民主化，使它成为中华民国全国中最民主的组成部分”；

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正是包含着经常反对亲日的妥协的分子。他们企图投降日寇，与日寇妥协，并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①7}

自从任弼时抵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报刊对八路军抗战的宣传明显地增加了。四月十四日，《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八路军》一文，《共产国际》杂志五月号发表了朱德的《八路军抗战六个月的经验和教训》及任弼时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两文，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五一节宣言》中号召全世界反法西斯

斯者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七月五日，《真理报》以《山西的保卫者》为题，摘登了英国记者J·贝特兰的特写。^⑮六日，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一周年”的通栏标题，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事迹，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的合影，同时发表了任弼时（陈林）撰写的《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之后，又发表了《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延安》，介绍第一一五师的《八路军的一个年轻师团》的专文，报道了新四军成立的消息。

如果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和蒋介石血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经有所怀疑；对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又缺乏基本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沟通了情况，阐明了团结斗争的真实状况，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原有的认识。如果说，六月十一日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那么，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和王稼祥、任弼时的重要谈话，则从组织上支持了毛泽东。七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他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

出三十万美元托付王稼祥转交中共中央。^{①9}

九月十四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谈话。半个月后，王稼祥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四十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宣称：“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其要害是牺牲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重要地位。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当延安正在纠正王明的错误，进一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的同时，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之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以及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②0}不久，国际援华运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包括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集会，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迟滞对日军用物资的运输等群众制裁，派遣医

疗队、新闻记者和有声望的代表来中国，以及发动募捐运动等，于是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相继来到中国战场。

从六中全会的召开到国际援华运动展开，这一切和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有效工作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他卓越的工作，使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有较多的理解，从而予以信任和支持，任弼时的历史功勋是全党公认的。

远离延安的代表团既是中共中央派驻国外的一个宣传站，又是了解世界政治风云的前哨站和参谋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和号召发出后，各国的兄弟党和苏联人民中对中国的抗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任弼时为此经常撰写文章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 and 毛泽东的思想。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九月，任弼时在《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关于持久战的口号意味着什么》一文；十月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发表，任弼时又为《真理报》撰写《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并组织力量，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译成外

文，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同时，他还应邀参加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各方要求频繁，代表团人员有限，任弼时便组织从国内派去学习的有关同志一道工作。方志纯回忆道：“根据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和马明方、张子意等人，都分别去做过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报告。我出去讲过两次，一次是给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中共的情况，一次是给莫斯科的一个区组织的群众报告会讲中国革命情况”。他们以亲身的经历，介绍红军长征，陕北抗日根据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共产党对抗日的主张等等，“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和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②1}

一九三八年秋，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由于法西斯势力猖獗，国际投降主义活动抬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背着捷克政府，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是英法对法西斯的侵略纵容妥协的表现。欧洲如此，中国呢？十月，武汉失守，蒋介石将政治、军事中心移到重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再一次对华进行诱降，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了远东。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一面同情中国抗战，一面却企图和中国的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太平洋会议”，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同日本达成

妥协，以维护他们在远东的旧秩序。这就是搞“远东慕尼黑”。中国代表团在任弼时主持下，成立了研究组，搜集国际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有同志说：“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很容易。”任弼时说：“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代表团及时将搜集的情况和意见报告中中共中央。^{②②}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在帝国主义纵容德国法西斯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时，苏联为了维护和平，保卫自身的安全，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谁知这个条约签订后一周，德军进攻波兰，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国际舆论界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连共产国际的不少工作人员也不例外。任弼时立即把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发表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

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告诫世人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②③}任弼时立即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分发给兄弟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并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兄弟党的同志心悦诚服地说：中国共产党已是政治上成熟的党。^{②④}

这期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苏联外文出版局正在翻译出版中文本，任弼时和代表团的同志参加了翻译和校订工作，其中的第四章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由任弼时负责校订，他对译文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初稿译出后，就组织在莫斯科的中国学员试读，听取意见，认真修改。有一次，方志纯提问：译稿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鞋子搁在草席底下”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直译苏联的谚语，苏联的读者读来是生动而有幽默感的，但中国的读者却感到不好理解。任弼时反复琢磨后说：用汉语的意思表达就是“束之高阁”而不去应用。方志纯听了恍然大悟。后来就意译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后，发现王明和康生政治上极其不正派。一是许多场合竟悬挂着王明的像，据国

际列宁学院中的中国学员反映，康生到处鼓吹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甚至串连一些人上书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②⑤}蔡畅也听到反映说：这里经常有人喊王明万岁的口号。^{②⑥}而王明竟然心安理得。二是竭力奉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利用清党、“肃托”的机会，排除异己，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他不满的干部，对一些同志既不让回国，又不安排工作，长期把他们放到基层进行劳动惩罚。他们申诉无门，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发生困难。任弼时到达后，认真地进行调查，负责地给以解决。

吉合（张期生）原是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五年组织遭受破坏后，和省委书记刘仁（王崇义），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国代表团。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带着电台回国到陕北去找红军。吉合准备起程时，康生突然变卦，责问吉合：“你怎么带王逸伦来，他什么人？”吉合说：他是模范县委书记。康生竟然说：“越是敌人，他才越好好工作，争取信任。”不但不许吉合回国，而且一并加以“审查”。吉合从此被放在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一“挂”就是三年。吉合对教员许之桢说：“我实在受不了啦！”许之桢指点他给任弼时打报告。不久，任约吉合去谈话。吉合写道：

“我向弼时同志说：你给我查一查，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我回国？弼时说：你没有问题，你愿意回国吗？我说：为什么不愿意，我在这里算干什么！弼时说：那简单，你回去吧。又问：你有钱吗？回去买个箱子，到军事书店买些书籍。我买了两箱子。弼时说：明天中午有汽车去接你，学校方面你不用管，我负责。”^{②7}

第二天下午，在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里，任弼时和国际列宁学院的教育长、干部部长一起招待回国的同志，其中包括陈龙、朱光、刘英、刘锦平、陈英、李桂林等，都是抗联的干部。任弼时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特地为大家饯行！”他接着宣布：回国的四十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吉合任大队长，陈龙为副队长。当天，吉合化名吉兴国，率队登上火车，然后换乘汽车，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到达迪化。吉合早年毕业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莫斯科步兵学校，俄文很好。经邓发安排，吉合留在迪化的新兵营里任教。其余的人便奔赴延安。^{②8}

师哲是一九二五年赴苏学习的。一九二九年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苏联政府和中国代表团商定，挑选一批人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师哲是其中的一个。在王明任代表团长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工作，但都不予理睬。一九三八年，苏联政府

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八月间，失去工作的师哲从西伯利亚再次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安排工作或送他回国。接待他的是任弼时。师哲写道：他耐心地听明情况后，“给国际干部处打了个电话，把处长叫来询问详情，那人肯定了我的话全部属实，并说还有另外两个干部其遭遇和我完全相同，也来干部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随后，‘陈林’对我说，他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我的工作，要我回去静候消息。”事后，干部部从西伯利亚保卫机关调阅了档案，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国代表团工作。师哲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②4}

对待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王明的手段更加阴险。陈郁因为对米夫等人操纵下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不满，参加了罗章龙搞的“中央非常委员会”^{②5}犯了错误，后来作了检讨，中央没有给陈处分，一九三一年六月，送他到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后他在学院担任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这所学院是共产国际管理的。十月王明抵达莫斯科后，通过检查工作和改组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部，对在中国部学习的陈郁进行残酷斗争，公开在学员中煽动：

“右派首领到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对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王明以“政治路线错误”、和陈郁“勾结”“反对中国代表团领导”的罪名，连同在该院担任教员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一起进行批判斗争。赤色职工国际派陈郁出席在汉堡召开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王明一再加以阻挠。清党、肃托时，王明将包括陈郁、周达文等在内的人，一概列为托派分子进行斗争，并且要开除陈郁的党籍。清党结束后，陈郁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即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则被赶出学校。陈郁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代表团一直没有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工厂去，整整五年，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陈郁先后写了十二次申诉信，工厂党委也发过两次公函，但王明一概不予理睬，直到他回国时，也没有向干部处作交代。^⑤他的用意是使陈郁政治上从此失落，在他乡了此一生！

一九三九年初，任弼时为首的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信。任弼时和陈郁同是出席四中全会的代表，他对陈郁的历史情况是了解的。看了申诉信后，便约陈到莫斯科谈话。陈郁接到通知后，见任弼时的署名，知道王明已经离开代表团了，喜出望外地连夜乘车到莫斯科。这次谈话后，任弼时将材料送交共产国际干部

部，提出要解决陈郁的问题。

九月中旬，周恩来赴苏治伤，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十二月下旬出院，开始处理工作。任弼时协助周工作。一九四〇年一月，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长达五万五千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青年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在莫斯科中央党校作中国抗战的报告，分别会见了德国、西班牙、芬兰和罗马尼亚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向季米特洛夫回答问题时，陈述了王明回国后的种种错误言行。任弼时一一帮助安排，陪同周恩来一起活动。在这过程中，任弼时向周恩来提出解决陈郁的问题。他们共同商定，一面通知陈郁办离厂手续，移住到莫斯科的柳克斯公寓，一面由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监委会提出复议。在周恩来、任弼时的关怀下，由王明、康生强加给陈郁的处分，沉冤六载，终于撤销。陈郁是幸运者，在王明的打击迫害下，象李立三那样被逮捕入狱，象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那样长期下落不明或含冤而死者又有几许呢！^⑫

一九四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任弼时等回延安。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工作了将近两年，这期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陈琼英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远芳，俄文名字为卡佳。任弼时夫妇准备回国时，远芳

才一岁零两个多月，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祖国大地上弥漫着抗日烽火，他们将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激流中去，夫妇俩商定，把远芳寄养在国际儿童院。这是国际救济会办的一个儿童组织，寄养和收养许多革命家的子女和烈士们的遗孤。陈琮英再一次克制母女感情，将远芳送到儿童院。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任弼时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到苏联的阿拉木图，两三天后，改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回国。同行的有邓颖超、陈琮英、陈郁、师哲，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负责人阿里阿罕等九人。

季米特洛夫在临别的家宴上对周恩来和任弼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二十六、回到延安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延安北门外杨家岭的大操场上，数千群众集会，隆重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和陈琼英等一行。为了防空，大会在下午五时开始。当时，朱德总司令在太行前线，刘少奇在中原局，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邓发、李富春和刚从重庆回延安的博古都出席了欢迎会。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词后，周恩来、任弼时等向欢迎群众讲了话。接着，由女子大学的学员表演了集体舞。这时，薄暮降临，会场四周燃起了篝火，大操场上火光熊熊，舞影翩翩，春风吹开的延河里，流水淙淙，山城延安沐浴在一派春意中。

但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国内的政治气候却是严峻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停止正面进攻，以主

力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创造的十八块根据地，在侵华日军的四十个师中，担负着和十七个师团作战的任务。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蒋介石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顽固派到处制造反共磨擦。到了年底，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和镇原五县被侵占；阎锡山也发动了“晋西事变”，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把时局闹得乌七八糟。在“亡国与复兴，逆转和好转”两种可能性同时并存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任弼时等回延安之日，正是中共中央团结全国抗日人民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时。

这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顽固派又在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的重点是分布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归路困死饿死”。^①

二是，财经困难。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已壮大

到五十万人，国民政府却仍然只发给四万五千人的经费，平均每人每月不到一块钱，加上“票子跌价，打个二折半”；而各根据地的工作中，“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毛泽东因此焦急地说：如不加整顿发展，“必遭破产之祸”。^②

三是，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六大以来，全党经历了十年内战，将近三年的抗战，其间通过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范围越来越深入人心，并且得到共产国际的一再肯定。革命斗争已由苏维埃运动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全党还没有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适应新时期的许多政策和工作方法，亟待制订。召开党的七大，越来越感到迫切。

正因此，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的归来感到十分欣喜。三月十日，得知周恩来、任弼时已在返延途中，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恩来已回，七大快开”；二十五日，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甘泉时，和毛泽东通了电话，四月二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说：“恩来、弼时二十五日到延，七大决定快开”。四月四日、十六日，毛泽东又分别致电彭德怀和项英：“华北各地各军到七大代表请你筹划一下，务使及时安全到达”；“新四军代表尽可能渡江速来中央”，其殷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任弼时和周恩来回延安后，向中央详细汇报了情况后，五月上旬，因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遇到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周恩来离开延安去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任弼时则留在延安。当年在中央苏区时，任弼时曾受临时中央委托，筹备召开苏区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烽火中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因此，中央决定，任弼时留在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此，任弼时参预中共中央的重要决策，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之一。

回延安之初，任弼时住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蓝家坪，毛泽东住在中央军委所在地杨家岭。三年前还只有三四万人口的延安，现在是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心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后方，同时又是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所在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共有干部两万多人，留守部队四万多人。一时机构重叠，办事交错。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管理论宣传机关，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陈云主管中央组织部，李维汉主管统战部。由于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

管理机关，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三大系统各管一摊，许多事情无人负责，或是无章可循。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散漫拖沓的“游击作风”，任弼时便着手建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由他兼任办公厅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担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建立了行政制度，干部供给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使三大系统的机关工作逐渐条理化。

任弼时离开莫斯科回国后，中国共产党再没有派出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但是和共产国际的空中联系却非常密切。原因是任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机要处曾交给他两套电讯密码，一个电台呼号和一批通讯器材。回延安后，任弼时着手在靠近中央警卫团的小砭沟，建立了一个专门电台。这个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由任弼时直接指导，吴德峰和帅孟奇等负责日常工作。经过多次调试，通讯准确无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开始正式收发报。这部电台供毛泽东专用，凡是从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和“万万火急”电报，均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翻译成俄文后，都经过任弼时校审定稿拍发。为了工作方便，从这时开始，任弼时和张闻天的住所也由蓝家坪搬到杨家岭，以便随时和毛泽东联系协商工作。这是一项艰苦细致而又高度机密的工

作，参预这项工作的师哲回忆道：

“任弼时在挑选干部、行政管理、解决技术难题，以保证通讯畅通无阻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精力，但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成绩却鲜为人知。任弼时轻易不同别人谈及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因为弼时从不炫耀自己，二是他善于保密。”^③

五月，任弼时开始集中精力筹备党的七大。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回国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曾经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二十五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委员会设毛泽东为首的由五人组成的秘书处；规定“准备的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干扰，大会的准备工作拖了下来。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准备”，各根据地便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猖獗，形势恶化，大会再次延期。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中，最后提到准备在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召开党的七大。共产国际对此作了原则的指示，希望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对王明的问题，当共产国际了解了王明回国后新的错误以后，季米特洛夫向周恩来表示：希望王明放下架子，服从党的统一领导。任弼时等回国时，共产国际要随同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工作的师哲及时向国际反映大会情况。这也就是毛泽东、王稼祥电告朱德等“七大决定快开”的背景。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大会难于如期召开，但是筹备工作仍在任弼时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第一件事是准备会场。

五月中，任弼时和李富春一起，乘坐爱国华侨赠送的一辆救护车到安塞县的真武洞，为七大选择会址。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接着又去枣园的后沟视察，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但后沟地方窄小，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住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选定的会址是杨家岭，在这里兴建礼堂，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

第二件事是审查代表资格。

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十二年来，国共两党的关系由破裂到再度合作，斗争非常残酷而复杂，各地选出的代表有的来自抗日根据地，有的来自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其中有的同志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审查资格时，既要考察代表们在政治路线

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清楚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在战场上、监狱中的政治气节。这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对党负责，又要查核种种复杂的斗争环境，对代表本人负责。在根据地分散，且受日军和国民党包围封锁的条件下，增加了审查工作的难度。五月二十九日，任弼时主持召开第一次审查工作会议，之后，每隔一、二周召开一次，到一九四一年四月，先后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已审查了二百五十二名正式和候补代表的资格。在审查过程中，任弼时认真分析材料，遇有政治上不清楚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旁证，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情况，或者亲自和本人谈话。有一位曾经在白区担任过省委书记的代表，为了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任弼时和陈云、王鹤寿一起先找在延安的曾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委员陶铸核对情况，再和本人谈话。他耐心地听取本人申述，即使是和已经掌握的情况不相一致的辩解，也让本人把话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指出本人申述中的矛盾，讲清道理，不首先加重对方的精神负担，最后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师哲回忆道：

“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决不

随便抛弃他们，决不一棍子打死”，“弼时同志教诲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他人害怕；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以至不敢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④

任弼时对干部热情、诚恳和耐心的作风，同康生的武断、虚伪、傲慢和冷漠，成了鲜明的对照。作家丁玲，一九四〇年时，得知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历史有问题。丁玲便写信给中组部部长陈云，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请组织上做出结论。丁玲晚年深情地回忆道：“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咣咣地问我，他过去也是这样叮叮咣咣地问的。我们象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陈云、李富春同志亲笔签名，结论作得很好，我非常感激。”^⑤

第三，是准备七大的文件和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财政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和华侨工作，政权工作和除奸工作，以及各根据地和南方国统区的工作等，要求中央各部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分别准备。十月二十一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有关材料限十一

月底完成。

这时，欧洲的战局发生了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局势。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初期，英法利用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企图迫使德国反苏。九个月过去，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法国战败投降，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力量起了变化。这对于中国的抗日战局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这时，朱德已经回到延安，周恩来正在重庆。任弼时在会上发言认为：法国战败后，英德战争仍将继续，但英国力弱勢孤，如果美国不参战，英国不可能维持很久，这样，德意力量增强，反苏的危险将会增加，而英法在欧洲的锁链打破后，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将会发展，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可能转化为革命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将利用德国在欧洲的有利形势继续进攻中国，压迫中国投降，企图腾出手来把战争向南方推进，在太平洋地区进攻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日美矛盾势将增加。为了牵制日本南进，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任弼时预言：今后，国民党亲日派投降的危险将来自日本的压迫

和德国的引诱。出路何在呢？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党的力量扩大，使亲日派投降更加困难，但我们力量的发展还是局部的，还不是主要的因素，我们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既要反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又不应忘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数量上只及国民党的五分之一，但质量上对抗战有决定作用。国民党政权内部是不统一的，中产阶级有进步作用，这是“争取中国形势好转的基点”。为了争取时局好转，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实行进步的政策，而在某些问题上应作必要的让步。要强调团结抗日，但不排除团结中的斗争，华北、华中和边区可以和国民党划界。他重申不在友军中发展共产党组织，不采取任何对内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等。在党与非党关系上，实行党内严、党外宽，在国统区的党组织实行精干政策。同时，要在党内加强统一战线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策略教育，在统一战线和政权问题上要规定具体办法。这是任弼时回延安以来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纪念即将到来抗战三周年时，中共中央要发表宣言，中央各同志应发表文章，并且召开二百人的干部会议，传达会议的精神。

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在延安的干部会上就欧

战的新形势与中国抗日战争问题作了报告，七月五日，《新中华报》的“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上，毛泽东发表了《团结到底》一文，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都发表了文章。任弼时在《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文中指出：

“处在今天国际国内条件下抗战的中国，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更加团结一致，认真地彻底地实现抗战建国纲领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废除一切足以破坏团结、阻碍抗战建国纲领实现的设施。顽固不化的人们，如果继续着倒退、顽固的政策，那只是帮助敌人来灭亡中国，甘心去作日本的奴隶。”^⑥

文章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一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对一切不顾国家民族危机，不以全力对付外敌，专事制造反共磨擦、破坏内部团结的分子，“应给以迎头的痛击”；二是充分发动全国人民，完成抗战建国伟业，对那些惧怕广大人民兴起，用各种方法限制民众抗敌救国活动，排斥一切进步设施的人们，“必须加以坚决反对”；三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国策。对那些不相信中国自己的力量，不认真采用适合于抗战需要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调解的人们，“也必须给以无情的指责”。

七月七日，延安八路军总部公布：八路军和新四

军的正规部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五十万人，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人口已近一亿，在广大的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日军达四十万，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中共中央为克服“空前投降危险”所采取的严正立场和显示的實力，对挽救时局起了重大的作用。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八日，任弼时连续参加了五次政治局会议，听取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的详细报告和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统战工作有大的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中间势力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南方局的工作是带有全国性的。过去中央工作偏重于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占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统区，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战区。“国民党区域的党归恩来全责管理”。会议还决定成立天津工作委员会，由陈云、张闻天、王稼祥、康生和任弼时五人组成，陈云为召集人。之后，又成立敌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王稼祥、陈云、任弼时、邓发和吴德七人组成，周为主任，康为副主任。

董必武向中央建议：要加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建设。他说：过去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有许多负责人参加，现在的边区政府人材不健全，须派大员去工作，边区政府要成为真正的模范政府，须派得力的干部，并可派外来干部去任职。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九月十一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和谢觉哉商量。

陕甘宁边区辖二十三个县，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在反磨擦斗争中，为了保卫边区，中央将第三五九旅从雁北调回陕北，边区的财政经济负担加重了。据李富春汇报，下半年财政预算相差四百二十三万元，加上入夏以来，旱灾、水灾、雹灾、风灾接二连三地袭来，六十万灾民嗷嗷待哺。为此，政治局常委会两次研究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朱德、李富春提出了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发展商业、手工业，组织边区合作总社，加强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建议。经过反复协商酝酿，九月二十五日，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十九人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八人为常委。边区的工作原来由王明分工主管，中央局成立后，经毛泽东提议，会议决定改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和

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为主任。军委系统的财经委员会、中直机关的财经管理处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经济生产工作归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政工作分系统管理。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成立，统一了边区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十九名委员中有本地干部十一人，外来干部八人，为了保障统一领导，协调好工作关系，促进干部团结和落实工作，任弼时受命以后，做了细致的组织工作：

第一，他建议请毛泽东出面召集一次边区中央局的常委会议，张闻天和他一起参加。会议于九月底召开。会上，大家一致肯定原边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成绩，本着增强团结，互相谅解的精神，大家从工作作风，领导方法方面作了自我批评。高岗表示：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忍耐心。张闻天认为过去边区的工作分散而不集中，没有树立党统一领导的观念，中央对边区政权工作注意不够。任弼时指出：外来干部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尊重地方干部，向他们学习；地方干部也须向外来干部学习。中央局成

立后，“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在总的工作方针下发挥创造性。”

第二，调查情况。十月一日，任弼时听取了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的详细汇报，包括现有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经济能力，财务开支等。之后又听取李卓然关于宣传教育方面的情况汇报。

第三，研究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干部和部队吃穿全部自给的办法。根据初步框算，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多干部和部队，每年需要口粮十三万石，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点五；约合一千万元，日常开支约一千五百万元，合计二千五百万元。每年公粮、税收、国营工业和自给性的生产收入共约八百万元，外来的收入断绝后，全年赤字一千七百万。如果留守部队吃穿自给，发展国营事业，扩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每年可以增收一千五百万元，再加有组织地发动军民运销食盐，按年产三十万驮计算，可增收三百万元。因此，任弼时说：“要有决心，有信心，做好组织工作。”

经过初步的调查和计算后，十月五日，任弼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对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后的工作提出了初步方案。首先是明确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他提出：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

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二是加强和充实中央局各部门的干部。任弼时建议：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原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改任建设厅长，原建设厅长改任民政厅长；调陶铸帮助民政厅工作，以加强建设和民政两厅的领导。会议同意任弼时的建议，并拨出七十万元作为开展经济建设的资金。会议并决定：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二，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四十万元。三，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公开职务是秘书长。四，由中央组织部调三十名干部充实中央局机关。不久，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以边区政府工作为主，西安的工作为副，林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为副部长，实际工作由李负责。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和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

是互为依存的。任弼时提出的这些切实措施，为陕甘宁边区后来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后，大家分头行动。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地区，有计划地开荒生产；边区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加紧经济建设，为做到吃穿完全自给而奋斗。

春天来临时，延安军民掀起了更高的生产热潮。

当英法在欧洲的力量削弱后，任弼时曾经估计：今后中国的投降危险不再来自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而是来自日本的压迫和德国的引诱。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此。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互助同盟条约，德意日和英美法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间矛盾加剧，他们在中国的斗争异常激烈；为了拉蒋加入英美集团，英国对华开放滇缅公路^⑦，美国给蒋一亿美元贷款；日本企图从中国战场的泥潭里拔出腿来南进，以某些“让步”作饵，诱蒋投降，德国为了分散英美的力量，由陶德曼大使出面，以“调停中日战争”为名，劝蒋妥协。站在抗日与降日的交叉路口的蒋介石，待价而沽，利用矛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蒋看来，此事一举三得：一可以削弱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二可以为需要时降日作准备，三可以向英美集团敲竹杠。因此，十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自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要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

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两军合并缩编为十万人，真是来者不善。一个月后，何应钦又下令停发八路军的经费，连十月份欠发的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与此同时，又遣将调兵，准备向新四军进攻。

在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活动甚嚣尘上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⑧将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的部队移到长江以北，又向党内发出指示^⑨调整政策，以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在日军与国民党顽固势力夹攻中取得我党我军的发展与巩固，挽救时局，坚持长期抗战。

十一月二十九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五周年纪念前夕，任弼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青年与当前时局》的专论。文章指出：

“亲日派阴谋家现今正在策动和包围压迫政府当局，调动大军，进攻华中的新四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目前时局到了极端严重性的时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危险，驱逐亲日派，挽救时局危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是当前人民最急迫的任务！”

文章要求中国的青年，“应当协同全国不愿亡国当牛马奴隶的人们，尽自己一切的可能，用自己一切的力量，来揭破亲日派、内战挑拨者的阴谋，制止内

战的爆发。在枪口对外、中国人不应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被逼‘剿’共军队的青年战士，应当拒绝开赴‘剿’共的战场，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军队，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的胜利！”

十二月四日，任弼时出席政治局常委会。会上，毛泽东告诫：要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阶级利益，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为了预防和检查实际工作中的过左行为，要本着客观、谨慎和讲道理的精神，“总结过去的政策，写成条文”。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博古、凯丰组成研究政策的专门委员会，任弼时主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所说：“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只有端正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⑩

正当任弼时等着手研究政策的时候，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

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大部壮烈牺牲，接着重庆当局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声称要对被扣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是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毛泽东为此以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责问和抗议，在延安和重庆，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进行揭露和声讨。

任弼时日以继夜地搜集事变后全国各党各派和各阶层的反映，汇集整理，通过“农村工作部”的专用电台，向共产国际通报。二月七日，在《新四军事变后各方动态》中写道：“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中委及名人，联名致书蒋介石，指出何应钦亲日派阴谋，深望蒋勿为奸小所惑，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说何是阴谋”，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表示无办法，没脸见人”；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地方实力派的多数“感觉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在重庆的外籍人士“要求英美当局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不使事态扩大”。而德国通讯社说，“目前中国内部矛盾尖锐，前途恐有

蒋汪合作”；“南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演说，谓蒋介石近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不错”；日本当局则“兴高采烈”，“十八日便开始调动七个师团，廿四日便大举向河南进攻。现国军仓促应战，许多将领感觉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

《动态》指出：

“蒋何白原估计到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的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综合各方情况，截止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又汇集《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的动向》和《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两份通报。

与此同时，二月十三日，任弼时向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作了政治报告，分析皖南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下旬，又在会议上就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

任务讲了话。他指出：时局有好转的可能，但“我们的工作还是要放在最坏的即可能破裂的基础上”，他强调说：

“不管时局将如何发展，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时局好转，它是我们的后方，把这个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那边区就更加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持抗战局面。当然，那时可能有大部分国民党的军队会到我们方面来，我们只消灭那少数的顽固派”；“不论时局或好或坏，我们的统战工作、建设工作仍是要继续坚持的。”^①

任弼时强调要继续“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反对和防止出现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部队中的个别同志出于对顽固派反共的义愤，主张打出去；一是群众中惧怕发生内战，影响抗日。这些思想倾向不符合党的方针，妨害对边区开展必要的建设。

对建设边区，任弼时在报告中明确提出：“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忽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三三制”的民主政权要用大的注意力推进经济

建设工作，“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地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我们边区政权的基础”。对于边区的经济建设，当时边区政府提出，一九四一年内，要增收四十万石救国公粮，准备运出盐六十万驮。任弼时说：“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这是一个麻烦与细致的工作。”^⑫为此，他提出了几点方针性的意见：第一，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要“有远大的眼光和长期的计划，可能开始时不会在短时期内看到成绩，但我们不要怕这一点，我们要有决心，大胆地做。”第二，要建立经济统一战线工作。“我们需要外面的东西，外面也需要我们的东西，像我们的盐外面都要。在这贸易往来的关系上，建立经济统一战线。这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巩固我们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有利于抗战”。第三，要培养经济建设干部。经济建设已经提到党的面前了，“上级党部必须培养我们的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要重视技术工作，不但要依靠外来的技术人才，而且要大量培养党内的技术人才。”第四，要转变工作作风。“我们过去是习惯于而且有经验做群众动员工作的，但对一点一滴的细密的经济建设工作，我们就不行了。”必须“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这方面来”，“在乡村工作中，不能妨碍老百姓的生产，这是第一个原则。”

这时，延安一场春雪，清凉山、宝塔山耸立在一
片洁白晶莹的世界中。任弼时高兴地说：

“粮食生产一半靠天一半靠人，现在雪下了，其
他就要靠我们人的努力了！”

二十七、整风运动的前奏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军事上采取自卫防御，政治上积极发动攻势，揭露事实真象。中共中央的强硬态度，切中了蒋介石欺软怕硬的要害。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延安《共产党人》杂志全文发表任弼时《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一文时，鉴于政治上处于严重孤立的蒋介石反共气焰开始下降，三月十九日，任弼时在文末的按语中写道：参政会后，“国民党当局向我们表示愿意和缓两党尖锐对立的状态。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时局有继续拖下去的形势。”^①于是，他继续集中精力主持中央交付的政策研究工作。

系统地研究和调整党的政策，一来是为了纠正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而引起实际工作中“左”的倾向，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二来是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材料。二月二

十一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前开会”，请周考虑届时“有无回延可能”。在准备五一前召开七大的设想下，政策研究和各项筹备工作自然都加紧了。

政策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是一月十一日召开的，到四月二十一日为止，先后举行了九次会议，讨论制定了七项政策提纲，即文化教育政策，劳动政策，财政经济政策，土地问题和合作化政策，锄奸政策，以及“三三”制政权建设政策。会议有时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举行，有时在任弼时住的窑洞里召开，先由委员会指定的人提出草案，然后逐条讨论修改，编号分送中央主要领导人审阅。为了广泛征求意见，从三月开始，《共产党人》月刊先后登载了《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和《劳动政策讨论提纲》两项草案。

历时三个多月的政策研讨，其特点是：第一，以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同年十二月发表的《论政策》为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第二，是为了适当调整各阶级的利益，广泛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和阶层，坚持长期抗战；第三，参加讨论的人员，除了中央决定的任弼时、博古、凯丰三人外，还有在延安的有关负责人，包括王明、康生、王若飞、李富春，以及先后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北方局负责人

杨尚昆和晋察冀分局的彭真。

在此过程中，三月十二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七大的准备工作情况。经过一九四〇年的工作，各地选出的代表共三百四十人，其中的三百零六人已来延安报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大会的议程初步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组织工作报告，准备形成三项相应的决议，并由刘少奇发表职工运动的演讲；政策委员会草拟的七项政策，决定印成一册，由政治局讨论后提交大会。为了加强大会秘书处的的工作，政治局会议通过：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秘书处下设三处一所：秘书处由王首道兼任处长；总务处由叶季壮任处长；警卫处由李克农任处长；医务所以傅连璋为所长。会议还决定，参加大会的代表除增加黄火青、陈潭秋、蔡畅、李延禄等外，另吸收一百五十人为旁听代表。委托任弼时、陈云和李富春提出名单。会议要求五一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陕甘宁边区正在筹备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自边区政府元旦修正公布《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②后，全边区的选举运动正在进行，准备四、五两月召开乡、市参议会，六月后召开县和边区的参议会，边区中央局为此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各根据地中居于领袖地位，边区的施政纲领对各根据地有示范的作用。因此，中央政策研究会特别予以重视。四月五日，任弼时和博古、凯丰、王若飞、杨尚昆等五人研讨修改后送交毛泽东，毛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后，于二十七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定于五月一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布。

《施政纲领》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解放日报》^③社论指出：“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纲（十大政纲）之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是我党二十年来——特别是抗战四年来无限丰富的斗争经验之总结和结晶”。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此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之际，实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由于这个纲领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制定的，它在“人民控制权、司法制度、廉洁政治、十小时工作制、新文字教育、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外国人政策”等方面，均为各抗日根据地所“尚未提出的”，因而赋有时代的特征和崭新的政治内容。中央要求：在重庆、香港、上海、菲律宾、新加坡、纽约等地召集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任弼时转

边区中央局，“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识字少者当作识字课本读。并张贴于通衢。”^①

在制订新的施政纲领的同时，为了统一整个西北地区工作的领导，四月十六日，政治局原则决定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委托任弼时、陈云商定西北中央局成员名单。同时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五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行文通知：中共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陈正人为委员，高岗为书记。

政策纲领解决了，组织系统理顺了，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了，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任弼时等正在研讨政策的时候，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在自序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是一九三〇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最早提出的。在三月十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要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的文章，不久，中央又委托王稼祥起草关于增强党性

的决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他尖锐地提出：理论与实际分离的主观主义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革命的“大敌”，“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能胜利”。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论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卷篇。

如果说，十年前任弼时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对危害红军的“本本主义”尚未认识，更没有亲身感受，曾经认为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革命理论，因而指责毛是“狭隘经验论”；那么十年后，对“本本主义”有切肤之痛的任弼时，深刻地认识到毛的论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战斗意义。如果说，当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针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么，今天他在号召反对主观主义时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内涵就远远超出军事工作范围了。正如毛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所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⑤任弼时非常理解，也感到非常亲切。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把党性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形成决议向全党提出来，从理论上说，这是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创造性发展，从实践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七十余万党员，五十万军队，在几千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民主政权，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⑥。

决定发出之后，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进行了阐释。他首先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很大比重，又处在需要与各阶级合作，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阶段，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培养、锻炼和增强党员的党性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党员的党性是以“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为标志，“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测量的，所以提高党性修养应当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不盲从，也不能满足于对党尽义务的水平。“盲从者的忠实性和坚定性都是相对的东西”。二是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执行党的政策策略。他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就

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为着捍卫马列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要反对“妥协投降主义”，同时要对“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三是要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对党内和党员自身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倾向“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是产生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党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的根源”。四是遵守党的纪律，“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而且首先应从本身做起。五是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倘若党的组织脱离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党员个人脱离群众，“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⑦

为着实施毛泽东的提议，系统周密地研究敌友我三方经济、财经、政治、军事、文化和党务各方面的动态，正确地指导全党工作，中共中央继八月一日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之后，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的组织机构作相应的变动。

第一，建立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扩大书记处的工作班子。会上，任弼时提议，七大以前书记处的组织不变，因工作需要可以吸收有关同志参加工作会

议。有同志提议由住在杨家岭的七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和凯丰组成书记处工作会议，开会时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三人必须出席。

第二，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今后书记处及政治局的会议议程由秘书长负责提出。不久，又将中央秘书处的业务班子和书记处的业务工作机构合并，由任弼时统一领导。

第三，成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局长，任弼时为副局长，下辖两室一部：政治研究室由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分经济政治研究组、国际政治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党务研究室由任弼时兼主任，王若飞为副主任，分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和海外研究组等四个组，任弼时和王若飞兼任根据地组正副组长，陈云、康生分别担任大后方组和敌占区组组长。原有的中央情报部隶属于中央调查研究局，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一切情报工作统受情报部领导。

经过这次组织机构变动后，任弼时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了，他兢兢业业地处理中共中央和书记处的大量日常工作，使毛泽东得以摆脱许多日常事务，集中精力考虑军政大计。

这时，陕甘宁边区军民正在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斗争。

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头一年水旱风雹诸灾并发，生产受了损失，更主要的是人祸严重。以皖南事变为高峰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虽然被打退了，但是他们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并未改变，除了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外，还调动了四十多万部队，在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延数省的边区周围筑起了五道碉堡封锁线，下令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六月苏德战争爆发后，顽固派在军事上更是蠢蠢欲动，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七万多干部和战士所需要的棉花、布匹、药品及日用品，无不发生困难。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

怎么办？中共中央的回答是由半自给过渡到完全的自给。如何实现这个方针？三月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主张从发展经济入手来解决财政困难，建立自己的“家当”。二月间，任弼时曾和有关同志专门作过研究，因此他胸有成竹地在会上提出方案。

任弼时说：“从半自给过渡到完全的自给自足的转折过程中，困难是有的，但不是没有出路。”具体

办法：一是军队实行屯田政策，除了粮食暂时需要政府供给外，其余开支全部自给。二是开荒六十万亩，全边区现有耕地二千万亩，每亩增产细粮二升，可增产粮食四十万石；向人民征募救国公粮二十万石，公草二千六百万斤。三是盐的生产归军队经营，实行“官督民运”，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搞好交通运输。边区每年从敌占区和友区进口的棉花、布匹等共约法币三千万元，外援断绝后，如能运出六十万驮盐，就可以平衡出入口。四是整顿税收。几年来，边区休养民力，税收都比其它根据地轻，商业税根本没有收。据任弼时调查，晋察冀边区民力负担每人每年十八元，晋西北的临县为二十二元九角，而陕甘宁只有八元，许多地方管理薄弱，有“财”无“政”，如加以整顿，每年可增加关税二、三百万元，商业税七、八百万元。有人主张用节省和拖欠行政经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任弼时说：“节省是对的，但基本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经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进一步说：我主张发行边币九百万元，作为发展生产的资金。国统区通货膨胀，增发的法币每人平均四十元，我们发行边币九百万元，每人只有八元，虽然边区经济不发达，但也并不算多。

任弼时强调说：问题是要早下决心。早发行，可以流动经济，各项生产马上可以展开，粮食的收购，

解决冬装所需的羊毛的收购就有了资金，盐的运销进度可以加快；拖下去便不能解决问题。^⑧

毛泽东支持朱德和任弼时大力倡导的发展的方针，他说，要教育干部，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并且责成边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财政、贸易和建设厅的工作。

新的方针确定后，朱德亲自踏勘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的南泥湾、金盆湾，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屯垦，王维舟、甘渭汉、耿飆等率三五八旅到陇东地区开荒种稻。延安的机关、学校人人订生产计划。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菜地，任弼时置了一架手摇的纺车，一有空便盘腿坐下来纺纱。三八节那天，中直机关举行纺纱比赛，任弼时在比赛中获得了奖励。边区军民热气腾腾地为克服困难而奋斗着。

边区政府的部分同志在执行新的方针政策时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在以下两个问题意见颇不一致：

一是盐的“官督民运”。

陕甘宁边区盐的产地在北面靠近内蒙的定边、盐池一带。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地区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地区依靠宁夏、青海，边区的盐也有重要的地位，销量逐年增加。一九三八

年时，年运销只有七万驮（每驮一百五十斤），一九四〇年时增到二十三万驮，对这项资源毛泽东十分重视，四月，胡宗南所部有向盐池进攻的企图，毛致电周恩来向重庆当局抗议，电中说“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⑨但有的同志看不到外边需要边区的盐是抗战的经济形势决定的，对“官督民运”的办法又颇多顾虑，认为让群众“自由贸易”，同样能增加产量，而采用“官督民运”的办法，动用民间的畜力劳力，靠近盐池的庆阳、环县一带固然有利可图，但延安附近的宜川、延川、宜君、中部、延长等县，距盐池甚远。《延安府志》中说：“崎岖险隘，往返三千里，运载艰难，驮盐一引，脚价与引价不啻十倍”，所以有“赔折之苦”，“脚力之苦”，“伤农之苦”。^⑩如照历史的结论办，只能是放弃督运，望盐兴叹；如果为了解决军费，则可按清代“盐法成例”，发盐票向群众摊派以钱代运。这样做，从旧时代的官吏来说，民不劳而课税到手，仿佛是体察民情的“良策”，殊不知在草贵粮涨的情况下，群众运盐的积极性下降，产销量势必大减，结果是资源闲置，财政徒呼奈何，出入口贸易难于平衡。有偿地组织民力运盐，赖盐以交换外货，可以解决军民所需，调节物价，稳定金融，使资源为革命和战争服务。只要统一指挥，安排好沿途的生活，任弼时和朱德都认为运

盐是大有可为的。

二是发行边币。

由于国统区通货膨胀，法币贬值，顽固派和日伪经济封锁，边区不能生产的生活用品奇货可居，一时物价随之上涨，边币也有所贬值，有同志把主要原因归于发行边币多了。

自六月以来，争论始终不停，问题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为此多次与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通信并当面恳谈。他认为“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⑪又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他规劝有关同志，“客观的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⑫

边区政府的同志提出的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利弊相权，只能趋大利而避小弊。倘若争论不休，必然涣散士气，贻误工作，影响团结，因此，任弼时向政治局汇报了情况，他认为问题的焦点是进一步统一对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的方针的认识。八月六日，政治局讨论决定由毛泽东邀边府有关同志商讨，进一步统一认识。

八月十三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时，任弼时报告说：各县已组织七万头牲口运盐，一个劳力管两头牲口，今年运盐四次，其中三次牲口可以放青，只有一次需要出钱买饲草。边币已发行一千五百万元，八百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和运盐的投资，这些资金现正在运转中，但却度过了半年困难。如果今年边区政府再借支六十万元草料费，每月保证提供中直机关经费二十二万五千元，今年的困难可以度过。朱德强调要奖励边区的土特产出口换取外货，运盐的道上要组织递步哨，增设骡马店，盐栈，可以分段运输，税收方面，羊按百分之二征税等。

毛泽东说：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供养八万人，生产自给只能解决五分之一，五分之四靠人民负担，负担是重的。现两大矛盾，生产与消费，出口和入口。能增产二十万石细粮，才能军民兼顾；运盐四十万驮，才能平衡出入口。农民运盐一次可赚百元，能增加民富，流通经济，促进生产。如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盐栈屯栈，官民两利，方能解决两大矛盾。采用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特点，其次才是边区的其它特点。他明确表示：“官督民运”盐含有部分的强制性，公私交利，这部分强制是必要的。第一，农暇必须去，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也是必须的，这和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

大有区别。我们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党和政府尽力为之。无成绩时责任在于政策不好；如组织不力，责任是政府的。党政军民各自纠正缺点，方针是团结第一，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③

自六月开始，各县的运盐队先后出动。第一批运盐队回来后，任弼时听取各县汇报，作了一次调查，包括出动的劳力和畜力数，每头牲口驮盐的数量，沿途的伙食及草料开支，以及离盐池远近的各运盐队所获的纯利等，从中探索规律。他发现延安的运盐队，一般每个劳力赶二三头牲口，盐运销以后，每头牲口可赚百元。越是壮的牲口，驮盐数量多，获利越多，真正亏本的是那些对运盐抱犹豫态度，用弱牲口应付差使的运盐队，长途跋涉，牲口一出毛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延安东区有一个运盐队，平均每驮盐的运费为四十九元，如果一人赶四头壮牲口，每驮盐的运费可减为十九元，获利更多。有了这个调查，在运盐问题上，任弼时取得了发言权。

八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鲁忠才长征记》一文。鲁忠才是鄜县（今富县）城关区副区长，一个细心、负责而有经验的老脚户，他率领的运盐队，二十八头牲口，十四个劳力，从鄜县到定边往返二十五天，每驴驮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十斤盐，扣除全部费用，至少可赚三十五元至七

十五元。若用好牲口，每驮一百五十斤，保证可赚百元以上。鲁忠才回答说：有人怀疑，无信心，认为运盐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有人说运盐要赔本，“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这是“不合事实的瞎说”。事实是“驴子越好，赚钱越多”，若出乏驴、坏驴，不但不能驮盐，“每一驴白费一百六十五元”等等。在运盐的问题上，鲁忠才通过自己的“长征”取得了发言权。所以毛泽东在文前的按语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①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会议，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进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会议。任弼时说过，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测量的，那么，检查党性既应当联系现实问题，也必然涉及历史，是一场思想政治方面的革命。九月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和学风。他回顾了从苏维埃革命后期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指出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号称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其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路线和立三路线相比，政治上和组织上错误更加完备，危害更加严重。要求政治局把掌握思想列为“第一等业务”，检验六大以来有关的中央决议，

“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分析研究”求得肃清主观主义的遗毒。这以后，政治局连日开会，到会的同志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先后谈了各自的体会。

九月十二日，任弼时在发言中说：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唯心主义，表现在政治上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是“更高明的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充分发展。它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必须要宗派主义在组织上来维持。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不愿与群众接近，自己规定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以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而当革命危机时，表现为悲观动摇。”

任弼时说：“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便是真正的理论。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理论与实践联系，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如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新的创造”，它“是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工作问题的，是根据当时可能的客观条件来解决问题，是抵抗那些不正确路线的。”

任弼时以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例，说他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主张诱敌深入，

在苏区内部击敌的方针，认识上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但在南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特别是“当时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⑮

心底无私天地宽。任弼时的发言真诚，坦率，磊落，表现了共产党人服从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王明的虚伪、欺诈，口是心非适成为鲜明的对照。

王明在九月十日的发言中说：“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但是他说“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博古和洛甫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政策他是“不同意的”，五中全会提出“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意的”，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早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执委会上就已提出了“全部办法”等等，竟然对他应负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政治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所表示的“从头做起向下学习”，实际上是毫无诚意的虚伪之词。他所谓的“对我有很大好处”，就是以反别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来掩盖自己的责任。

王明的虚伪性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后就已经表露出来了。王明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曾经作过《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口口声声称毛泽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

家”，“公认的领袖”，“鹤立鸡群”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等等，几乎用尽了最美好的词汇，这是一九四〇年五月间的事。但是今年五月，在女子大学传达《改造我们的学习》时，同样是王明，却对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却十分反感地说什么“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子大学学生要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问题自然会运动（用）”，甚至针锋相对地说不要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①⑥}这种难于抑制的反感情绪，恰好说明一年之前王明所谓《学习毛泽东》云云纯粹是虚伪的。

如果说，王明在女子大学的讲话对毛泽东的攻击还只是情不自禁的发泄，九月十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还是对错误的辩解和推诿，那么十月八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王明的长篇发言便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进攻。王明为什么在这时候发难呢？事情是这样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崔可夫一再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的部队向进犯晋南、豫西等中条山脉一带的日寇发起进攻，以牵制日军北进。蒋介石眼看苏联战局吃紧，反共的劲头又

上来了，一面造谣攻击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中共“对日妥协”，企图用“激将法”让八路军去和向中条山进攻的二十四个师团的日军单独作战，一面则派兵进攻在豫皖边区的新四军。如果八路军孤注一掷，蒋袖手旁观，可收渔利。七月二日，日本内阁表明态度，在苏德战争中将恪守中立。形势明朗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答复崔可夫并告苏方：八路军“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⑦。苏方对此表示不满，以致后来通过季米特洛夫来电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答复，如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日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等，言辞颇含责备。十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将来电交给王明看并商量如何答复。七日晚，毛泽东偕王稼祥、任弼时到王明的住处共同商量复电问题。王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共中央。

十月八日下午，在书记处会议上，王明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昨晚我是随便说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意见”。他认为一九三七年十

二月会议后，他在武汉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他进而对党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系列原则问题进行指责：说在统一战线时期将反帝反封建“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政权问题和经济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可提出“与国民党大同小异（形式上）”，而现在是“小同大异”；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央应向国民党当局“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在反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中“有些斗争是可以避免的”，“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他咄咄逼人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权在你！”

王明的攻击理所当然地遭到书记处其他成员的反驳。

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最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毛泽东澄清：王明今天说

的有些问题和昨晚不同，作了一些修改。昨晚他说，当前我们要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说《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而要与蒋介石搞好关系。批评我们的方针是错的，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对蒋介石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蒋介石对我们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我们要依靠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能上他们的当。所以，我曾多次说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同志，而王明没有一次说到陈独秀主义的错误。

自一九三八年以来，任弼时、周恩来先后向共产国际全面报告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共产国际两次形成决议，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王明错误地以为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对共产国际过去决议的否定，所以敢于向中共中央挑战。这样，王稼祥和任弼时不得不以见证人的身份向书记处报告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一些评价。王稼祥说：我没有听到共产国际说过中国党的路线不正确的话；相反，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搞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说：“我与恩来在莫时，季米特洛夫与我

们谈话说到王明一些缺点，要我们告毛泽东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说过，对王明也没有说，因为感觉不好对他说。有一次毛找王明、洛甫、康生、陈云和我谈过话，批评过王明一些缺点。后来他担任□□边区工作，开始实际工作的调查研究，我感觉他有进步，但前次政治局会议，王发言批评别人无党性，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前几次毛与王谈武汉时期的错误，王还不愿接受。昨晚谈话更提出新的原则问题。今天书记处会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⑮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来了解问题。”

任弼时说：“首先是曼努伊尔斯基^⑯问我三点，我只记得下两点：第一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第二问，王明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而季米特洛夫的评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据共产国际的干部反映，有一次出去参观，米夫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王明居然默认。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⑰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接着说：“根据国际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情形，王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⑱

树欲静而风不止。本来，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的

错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已经大体作了结论，事隔三年，王明利用时机想要翻这个案，并且提出许多新的原则问题，书记处认为有必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在会上把问题说清楚。毛泽东特别叮嘱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批评可以不必说。”^{②1}

在书记处同志的批评下，气势汹汹的王明突然一反常态。十月十三日下午，任弼时向书记处报告：王明病了，不能出席政治局的会议。他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十月八日结论”。二，关于目前局势的意见，请政治局到他住室去谈；以后政治局讨论的内容，他会后看记录。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休养时不参加书记处的会，只参加政治局会议。^{②2}

十月八日毛泽东所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几个问题”上的错误，具体内容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

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②③}

王明以翻《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为目的所挑起的党内斗争，不到一个星期，却又出尔反尔地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结论，表明他在严肃的政治问题面前，根本不是按是非标准办事，只有从个人出发的政治需要，这恰好证明季米特洛夫的评价：“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这样，毛泽东便在会上说：王明因病，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只好停止讨论，以十月八日书记处会议作为定论。如他还有意见时，等病好了随时可以说。委托弼时向他说明。^{②④}

会议决定：对苏维埃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政治局应作一结论草案，提交党的七大形成正式结论。毛泽东说：要在这次讨论得到一个教训，从检查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使犯过错误的人逐渐纠正；要采用治病不“治”人的办法使犯错误者客观地看问题。^{②⑤}

从九月十日开始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中共中央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决定了几项实际措施：一是成立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参加学习的成员名单由任弼时、康生、陈云和李富春商定。二是成立研究党的历史问题

的委员会，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五人为委员，毛泽东为首。三是成立以陈云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在错误路线下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重新进行审查。

为了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将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即“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前反映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的九个文件，作了详细的剖析，送给任弼时阅读。这九个文件是：《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1年2月26日）；《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以及《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等。毛泽东以犀利的笔触系统地揭示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

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指出这条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错误路线不但是立三路线“一个胎胞里出来的双生子”，而且是比前者形态“更加完备的系统的路线”；批评它是打着国际路线招牌的“极端主观主义、极端冒险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任弼时对此条错误路线已具有一定的认识，那么，读了毛的一系列批判文字后，认识就更加系统，更加深刻。十月，政治局详尽地检讨了中央过去的路线，并由毛泽东以党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名义草拟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这就是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底本。

毛泽东关于九个历史文件的批判稿，当时只给了任弼时看，后来刘少奇回延安，又请刘看。为什么阅读范围那么窄呢？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有人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了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毛泽东，毛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们吧。”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毛泽东处事严谨，同时也说明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渊源。

毛泽东曾经说：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是对革命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②6}任弼时以全部精力协助毛泽东抓住对革命有重大意义的“两个环子”，并随着掀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的新篇章！

二十八、延安整风（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八日，又在干部会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标志着经过长期准备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地展开。

这时，任弼时的工作特别繁忙。原因之一是，一月底，书记处成员张闻天响应党中央反对主观主义的号召，率领调查团深入神府、米脂、绥德等地作农村调查去了，而王明自去年九月后因病休养，书记工作会议的七名成员只有五人坚持日常工作，原来分工的工作就得有所调整。任弼时除了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外，还分管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青年团、妇联和西北局的工作。原因之二是，整风运动开展后，向各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集中情况，交流经验以及提供学习材料等的工作量大大增

加了，秘书长是管“家务”的，在财经困难、同各根据地间联络不便的情况下，工作更加艰难。

整风运动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严重的转捩关头进行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尽管这时希特勒的大军开始在莫斯科郊外遭到苏联红军的反击，但德意日三个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国却在十二月十一日签订联合作战的柏林协定，其进攻的目标首先是苏联；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等二十二个国家则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整个世界形成反侵略和侵略两大阵营的对垒，人类正面临着血和火的严峻考验。如果德日勾结，向苏联发动春季攻势，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届时，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估计：战争扩大，德日两国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法西斯集团从此陷入战争泥坑，“整个轴心国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蒋介石虽然想乘火打劫，如果日军南进切断滇缅公路，英美的援华物资必须经过苏联运入中国，估计蒋“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①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两年，将是“破晓前的黑暗”时期，度过这段困难，光明就在世界人民面前了。处变不惊的中共中央，确

定的战略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②一九四二年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③实施的办法就是抓住时机，通过整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应付时局的变化。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要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创立新风，首先就是改造党校、党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任弼时积极协助毛研究改造三个部门的工作。

关于党校。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掌握思想方法和党的政策等原则，停止原来设置的课程，一年之内，学习研究党的路线，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一书为研究内容；延安各机关的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的成员共约三四百人参加党校学习，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并入中央党校；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上大课，十里路以外来听课的干部由党校招待餐饭。今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党校，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日常校务由校长邓发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主持。四月十一日，政治局讨论党校的教学计划时，任弼时提出：党的路线的学习和研究是今年的安排，第二年起，学习政治经济学、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学习马

列著作主要是掌握原著的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第三年，研究党的政策。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的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④

关于《解放日报》。自一月下旬至四月初，政治局先后讨论三次。任弼时在二月十一日的会议上说：报纸的内容，过去与中国及根据地的实际联系不够，存在着浓厚的党八股、公式化。报纸的党性表现不够，在整风中党性表现更不够。他诚恳地说：过去我们还没有把党报当作贯彻党的政策的武器，各研究机构也没有注意向报馆供给材料。今后，报馆应主动与各部委联系。编辑部可以派人参加党务研究室的工作，各地反映党的工作的电报、资料和中央通讯，编辑部可以改写成消息发表。报纸要允许讨论问题，开展批评。最后，他建议：为了工作方便，主笔博古应搬到杨家岭来住。他一面批评报纸的缺点，一面想方设法为编辑部创造条件，提供方便。^⑤不久，由书记处出面，为《解放日报》聘请了一批特约通讯员，并提名由王鹤寿、胡耀邦、匡亚明等十一人为《解放日报》党的生活栏的编委。^⑥

关于党务广播。这是帮助各地党组织了解政治

动向，掌握政策，交流工作经验的党内传播工具。在当时，这是最迅速的传播手段。用任弼时的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办一个党内刊物作用还要大。整风开始后，书记处通知设有电台的地委、区党委以上的党委，军队中独立的战斗单位，每日早晚两次收听党务广播，收抄的内容可以刊登党内刊物。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任弼时立即批示向各地播发。政治局还决定中央各部委每月向党务广播提供一篇稿件。遇有不按时交稿的部门，任弼时便致函催索。为了加强党务研究室的力量，四月三日，任弼时向书记处提议调杨尚昆参加党务研究室工作。

关于生产。由于上一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共中央确定陕甘宁边区本年仍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全区财政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各机关、学校除由边区政府发给粮食、衣服外，办公费、菜金等由各单位自给一半。政府的建设经费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用于农业贷款，因为只有农民的生产扩大，财政收入才能有所增加。军队方面，一月初，任弼时和王稼祥受政治局委托，召集三五九旅、留守兵团负责人开会，决定继续实行屯田政策，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以边区政府拨给的预算的一半，补充机关、学校经费之不足，保证大家安心参加整风学习。

此外，二月六日，书记处决定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设立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地委以下不设青委和妇委，但青年团体如青救会、青抗先、学生会等团体中，建立党团，保障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

所有这一切，集中到一点，都是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创造条件，使运动沿着中央指示的精神顺利进行。

当整风运动正在各地展开时，出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干扰。

一种干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二月底，政治局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均须根据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的指示精神检查工作，端正党风、学风、文风，改造工作。这时，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对党的历史上“三风”不正的危害并不了解，对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整风精神缺乏正确认识，而对物质条件匮乏的延安在干部生活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婚姻、娱乐方面的某些限制，以及上下级关系方面的某些隔阂不但十分敏感，而且以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态度来对待，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青委系统的《轻

1942 年 6 月 25 日任弼时工作笔记手迹

骑队》以及西北局机关和《解放日报》上的某些杂文，表现得最为明显。《矢与的》从三月十二日后，共出版七期，如王实味的文章，言词尖刻，情绪激烈，冷嘲热讽，不利于团结。有几期竟然贴在布上，悬挂于延安南门外的闹市区，一时前往观看者川流不息。这些既不核实事实，又不署名的文章，耸人听闻，转移了人们注意重点，给正在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检查工作带来不健康的倾向。

在四月二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指出：过去在莫斯科时，曾经发生过的把检查工作看成是反领导的坏经验不应重复。任弼时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主张检查工作第一步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讨主观主义的表现，第二步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发扬民主相结合，第三步是作出改进工作的结论。任弼时说：在座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要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首先是发动群众，但须加以领导，另一种意见是完全放任。前一种意见是对的。因为放任会造成无原则的斗争，引起纠纷，使检查工作没有结果。针对当前出现的偏向，任弼时又说：轻骑队的文章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在发动群众检查工作的初期这种倾向是难免的，因为有的单位的领导人，平时缺乏民主，又不参加党的生活会，群众有意见没有机会发表，但极端民主化要防止。今

后各部门的领导要注意发扬民主，否则在整顿三风的旗帜下会出现新的三风，因为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主观主义更多，所以一开始就要有领导。^⑦

四月三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指出：在整风中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给各地党委的信中也指出：党内三风不正“是一个历史问题，现在仍有残余存在，所以还要整顿”，这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如果“不从整个历史上、思想上、领导上去看问题”，只是以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点从待遇问题、婚姻娱乐等枝节问题上去揭发，就“走了偏向”，既掩盖了真正需要整顿的主要目标，又有害于干部团结、党的团结，告诫各地加以防止和纠正。

另一种干扰来自国民党顽固派。

一九四二年入春以来，国民党采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以外宽内紧的手段，暗中布置企图把国民党统治区内中共的力量搞干净。自蒋介石声言要来西安的消息传出后，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当局，便大修工事，从秦岭到平凉增筑了一道封锁

线，名曰抗日，实是防共。边区周围国民党摆有五个军，他们调查地形，征集粮食和民夫，蠢蠢欲动；特务头子戴笠专程到西北，布置各省室主任和实验区区长，派特务打入中国共产党县委以上机关，军队师以上部门及办事处，寻找中共内部的不满和动摇分子，进行突击发展，要求是“少而精”，“重质不重量”，每个单位一二人。^⑧至于大后方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控制可以说无孔不入，如宣传法西斯主义，成立反共思想研究所，编译出版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监视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限制出版进步书刊、上演进步戏剧，殴打《新华日报》馆及报贩，没收邮寄的延安《解放日报》；搜捕地下党员，迫害民主人士等事件层出不穷。连寄给周恩来的《解放日报》都被国民党扣留。^⑨为了提高警惕，加强自卫，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防备措施：一是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任命贺龙、徐向前为正副司令，统一指挥边区的防务；二是训练民兵及自卫军；三是裁减和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成立以任弼时为首的裁减委员会和以叶剑英为首的后方委员会，^⑩准备向延安以北地区的下寺湾、绥德、靖边以南地区疏散人员，并将部分物资转移到保安等地；四是由边区政府的保安处加强防奸工作，肃清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等。一时，延安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五月

三日，政治局讨论时，任弼时认为：顽固派若发动进攻，最大的可能是袭占关中地区，直接进攻延安目前对国民党并不有利。毛泽东最后说：要作好准备，但目前春耕期间不作正式动员，肃清破坏分子和精兵简政两项工作须切实抓紧。

五月底，形势逐渐明朗：希特勒对苏联的春季攻势并未发动，日苏战争亦未爆发；日军则向南打浙江，占云南腾冲。国民党将原驻陕西中部、三原一带的第七十六军由汉中入川，这样，顽固派向边区的进攻一时难于发动，而离开延安几个月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又返回延安。于是，形势和缓，中共中央决定暂不进行疏散，一切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不违农时，不误整风学习。^⑪

原来的学习计划是四月初中央讨论决定的，规定延安各机关、学校除必要的日常工作外，集中全部精力学习中宣部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其中包括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和讲演。四月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书记处决定：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按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党校、延安各学校及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五个系统进行，分别组织学习委员会。中央党校

系统由毛泽东直接领导，边区系统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凯丰、康生、陈云、李富春五人组成，毛负总责。^⑫

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共有一万多人，其中陕甘宁边区系统有三千二百四十多人，不但人数最多，而且因为边区在全国所有的根据地中是“政治意义最大的”，下决心学好文件，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在“反对黑暗，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的斗争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四月十日，经书记处批准，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王世泰、陈正人、高长久、高朗山和白爱玉等十人组成，边区政府所属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及群众团体分别组成三个分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统一领导。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大礼堂里，任弼时向边区系统的二千多干部进行了学习动员。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国际形势，指出：如果德国再次进攻苏联，其实力已不可能有侵苏战争初期那样强大了，但战场上互相进退的可能性是会有有的；如果日苏战争爆发，中国内部局势可能会紧张起来，我们要有迎接这种局面的准备。任弼时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遵义会议前，曾在党内占着统治地位，现在它“是在党内保存的残余”，哪

些部门三风不正，哪些部门工作就要受损失。我们整顿三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我们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改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党更加巩固、团结，更有战斗力量，能度过黑暗，“培养出大批坚强的干部，等到政治上光明的局面到来时，他们能独当一面开展工作”。他强调，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是“历史的血的教训的总结”，要以文件作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本部门的工作。开展批评时，“对自己要严，对别人要宽”，要全面看问题，所谓全面，就是对历史上发生的错误“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和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既要看到缺点错误，也要能发现优点。各部门领导亲自负责，发扬民主，上下结合，从四月二十日起到七月二十日止学习文件三个月，然后以一个月时间检查工作。高级组的成员工作经验较多，要求联系个人的历史实际、工作实际和思想的实际，下决心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初级组的成员则以分班上课为主。五月一日，边区学习总委员会组成七人的巡视团，分赴各地检查学习情况。^⑬

一个空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和部队干部中全面地展开。好雨知时节。这期间，西北高原普降春雨，据榆林一带反映：多少年来没有这样好的雨水。边区的一百四十万人民和七万

多干部战士，在自然界的春雨和马克思主义春雨的滋润下，预示着将要获得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大丰收。

中央学习组和高级组的成员，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就阅读《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这两部历史文献集，对党的历史分段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一再叮嘱要下决心“把理论、方法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在研究、检查中间“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行动”。任弼时认真地进行反思和写心得笔记，从中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获得新的认识。

任弼时在笔记中写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几乎是同一时期，党一成立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这应当给我们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如何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 come 来发挥马列主义”。但是，党内许多干部理论准备不足，少数人曾在外国学过一些书本上的理论，他们“既少有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活，又不会真正把学到的原理原则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溶合，结果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对中国革命“造出了很多罪恶”。党的六大虽然基本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与估计，就没有了解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再度参

加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可能”，九一八事变后，资产阶级内部有了分化，一部分带有民族意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对蒋的统治不满，发动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活动以及福建事变^④，“这种具体的客观事实，硬没有引起当时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注意，而认为这是比国民党还更加反动可怕的东西”。教条主义者离开实际的变化，“死死地啃着”中国要暴动、要苏维埃化的公式，不顾成败地发号施令。“这种人不问天高地厚，儿戏革命斗争和人的性命，还能把革命弄好吗？还能算得马列主义者吗？”教训何在呢？他写道：

“不依马列主义的方法，不根据真实的阶级力量变动的分析，不考虑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按照群众政治觉悟程度，不是用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具体政策，是过去我们党内领导上最严重的缺憾。”^⑤

“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任弼时这样认为，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他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斗争中，毛泽东综合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比如：中国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首先是要努力求得民族的解放，这就产生要与资产

阶级合作；合作破裂了，为着这种目的又要与资产阶级斗争；外敌侵入国土，再度与资产阶级合作。合作中又免不了磨擦，而反磨擦又是为着要团结，要能有理有利有节制。为着无产阶级的远大利益，有时不得不暂时牺牲某些局部利益，以求得当前民族解放的利益；然而牺牲局部利益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又会损害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正确地处理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团结和斗争等的辩证关系。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是一种带创造性的文献，对于党对中国人民确有极大的教育意义。”^{①⑥}

任弼时认为：精通马列主义决不是背诵词句和公式，而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革命运动中的实际问题”，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环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要注意吸收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廿多年的历史，“经过在复杂条件下长期残酷的斗争应当是可以总结一些新的经验，成为适合中国环境的马列主义理论”。因此，以整顿三风为目的的历史运动将使全党在思想

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如果中国“有几十个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的干部，能够负责地独立处理问题的干部，那对党的事业的胜利才可以说是有保障的了。”^⑦任弼时的这些新鲜活泼的观点，无论是在当时以至现在，都能给人以启迪。

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中央党校的学员在学习研究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文件时，提出了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向干部作报告，进行了解答。他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决定从组织上讲，“中心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呢？他根据客观的事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抗战开始时，全党只有四五万党员，三万多部队，五年来，在抗战的过程中党的面貌和党的事业大大发展了：全国已有党员八十万，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五十多万，在几千万人口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在坚持抗战，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空前的胜利。因此，它“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他指出：第一，由于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民族敌人，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企图用一切办法来瓦解和分裂共产党。第二，八十万党员中，有七十五万是

新党员。他们是抗战开始后入党的，绝大多数是非无产阶级成分，他们长期在分散的游击环境中战斗，没有受过系统的党的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自然会反映到党内来。第三，党组织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还存在一些弱点。历史上曾出现过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到最后叛党的事实；皖南事变，从党的工作上讲，没有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有教训的。现实的工作中，某些党组织的同志对中央不尊重，方针政策贯彻不力；某些做部门工作的干部强调工作的特殊性，甚至闹独立性；个别党部或个人，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等等，“如果今天我们不是统一的集中的党，就不能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任务”。在长篇的报告中，任弼时对与党性相对立的宗派主义进行了分析，他说：

“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⑮

任弼时这一次报告，把无产阶级的党性阐述得

更加深刻，更加丰富，对于党的思想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和不久中央指示中提出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一致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中心思想是解决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使某些地区党政军民关系中还有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党政军“三权鼎立”等。因此朱德说：军队没有党政民不能存在，根据地没有军队也不能巩固。今后，党政军民关系要弄好，党内要进行法治教育。

任弼时说：华北地区，过去地方的党组织大体只管地方工作，对军队工作领导差，但政策是党统一管的。现在，党委要注意组织战争的工作。过去中央没有规定地方党委管正规军的工作，地方也无法管理。现在地区分割，根据地的建设要求领导一元化，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主力军在该地区亦应当受当地最高党委的政治领导。他建议文件的名称可改为《关于党对军政民领导关系的决定》。^{①9}九月一日，政治局通过这个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晋西北分局，贺龙为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聂荣臻为书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也召开了会议，贯彻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组织一元化的精神，决定将边区的军事指挥机关由过去的联防司令部、留守兵团和保安司令部三级改变为一级，联防司令部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萧劲光为第二副司令员，对外仍用留守处名义。取消保安司令部。边区的部队编成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设三边、关中、陇东和中央直属四个军分区，组成统一的军政委员会，高岗为书记，贺龙为副书记。八月二十二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意这个方案，他说：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组织上一元化。西北局党政军工作由任弼时负责指导，军队缩编由王稼祥负责。会议委托任弼时和王稼祥指导召开高干会议。这就是以整顿三风为中心议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

这次规模很大的重要会议，是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说：高干会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②①}

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议题，一是通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二是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三是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任弼时说：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②1}

边区参议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都在延安南区，和中央机关所在地杨家岭南北相距约十华里，中间隔着延河。为了具体指导这次大会，会议期间，任弼时和他的政治秘书师哲一起住在西北局机关“蹲”会。

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组成五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整政的委员会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负责，整军委员会由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负责，整党整学委员会由西北局委员陈正人负责，整财经的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负责，整党政军民关系的委员会由留守处政委方强负责。任弼时多方听取汇报，进行调查；西北局宣传部在临固县农村作典型调查后编印了《临固调查》一书；林伯渠视察了郿县、甘泉两县；中央青委和妇委也去绥德、米脂地区调查；贺龙召集旅团领导人座谈了整军问

题等。可以说会议的筹备过程就是一次对边区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过程。高干会议原定开半个月，因为内容丰富，结果历时八十八天，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结束，除了节假日和因故休会外实际开了六十五天。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先由各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报告，然后以半天阅读文件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逐项进行。许多干部以整风精神揭发事实，开展批评，作自我检查，所谓“思之不得，梦寐以求”。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接连十一天，讨论原陕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这是思想斗争最为剧烈的阶段。

陕北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一九三四年夏，这两支队伍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战

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组编成红十五军团后，又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不幸，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有些领导人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陕北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等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杀害了二百多人，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曾经作过初步结论，由于当时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因此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认识有局限性。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于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②列入西北局

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高干会议在严肃的气氛中，本着“是就是，非就非”的求实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干部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在紧张而有秩序的讨论中，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八时。尽管立冬以后，西北高原气温已很低，但会议始终保持着热烈的气氛。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报告，他生动具体地向大家阐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向会议作了报告，康生、叶剑英、贺龙、彭真等领导人也在后期就当前工作分别作了报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气氛中，徐向前、王震等七十多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一九四三年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了系统的报告。他的长篇报告分三个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他开宗明义说：这次会议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要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这样就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

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就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基础”。

针对会上揭发的事实，任弼时尖锐地指出：某些领导干部对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不尊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党员对党团不尊重，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闹“青年主义”，闹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这一最高原则”，“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边区的军队中，也有些高级干部把部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似乎军队和党是平列的，甚至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持这种认识的人，似乎没有责任要接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和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和阶级立场的不坚定”。他强调说：“没有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这对于党的队伍及其领导的军队将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在民主问题上，任弼时批评了那种不看实质，认为“边区政治距民主还有天远”，甚至说“民主政治，选举第一”，这是把选举“偶像化、神圣化”的资产阶级观点。他指出选举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单单只有选举一项，并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特别是边区各级参议会和“三三制”政府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政府是为人民

办事的，“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只有在进行与领导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也只有在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②。

遵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任弼时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的“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

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②④}十二月十二日，会议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②⑤}。

任弼时感慨地说：“如果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这次陕北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中也可以得到一个明证。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任弼时指出：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经常遭受日军的“扫荡”和“三光”政策的破坏，边区的环境，尽管敌人与我们隔河相望，边区周围的几十万友军时有向我们磨擦的威胁，使我们不得不时刻戒备，但是边区毕竟处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中。“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

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要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他根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所撰写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所总结的经验，向会议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任弼时强调：随着边区中心任务的发展，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也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要由适应战时需要的动员方式，转变到深入细致的精巧的生产组织工作，这“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的艺术”。我们不能用建设军队或建设机关的方法来建设工厂，更不能不计成本、不讲劳动纪律；在对待办工厂，修水利，组织合作社，开荒，移民，运盐，纺纱等繁杂的工作中，必须去掉粗枝大叶的毛病，而是要“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因此要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党员和干部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我

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人。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如果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那就可以逐渐培养一种新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②⑥}。

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因而陕甘宁边区党的责任也就特别重大。在这个区域里为党工作也就非常光荣。尤其在今天，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斗争进入更加困难的环境，国共两党关系有走向好转的趋势，就使我们边区党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要在这个地区里坚持贯彻各种进步的政策，才能进一步地巩固自己，提高自己，并且推动全国的团结和进步。^{②⑦}

历时近三个月的高干会议胜利地结束了。这时已是农历腊月初十日。边区人民在除旧布新的传统气氛中，迎接一九四三年的新春佳节。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初一日，欣逢立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

“爆竹，年画，红灯比去年热闹，表现民生比前富裕。

党政机关人员相互拜年。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有约会，自然地互相道贺。”^{②8}

二十九、延安整风（下）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任弼时抓紧落实精兵简政的工作。

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冬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倡议的，两年来中共中央几经提倡，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即使延安各机关，“一国三公”，往往认识不一，贯彻也不平衡。高干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一项大政策，一篇大文章，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捩时期，意义极为深远。

这时，苏联红军粉碎了德军的冬季攻势，单是斯大林格勒战区，就毙俘敌军三十一万人，战争正在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推进，如果英美在欧洲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不出一年，希特勒将被打败，然后英美苏中等国集中力量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共中央估计，中国结束“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在这期间，

工作的总方针是保存骨干，积蓄力量，联系群众，准备反攻。为适应这个历史趋势，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中指出：许多根据地存在着“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等现象，这与分散的游击环境是“完全矛盾着”，在日本侵略者向根据地“扫荡”、“蚕食”的局面下，再不实行精简，“简直是自杀政策”，要各根据地合并机构，减缩人员，充实下层，并派送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保存”。指示督促各地要自觉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①

各地如此，延安怎么办？任弼时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

延安亟待解决的是“鱼大水小”的矛盾。一九三七年，中共中央初到延安时，脱离生产的人员为一万四千多人，六年来，猛增了五倍，达七万三千多人，按毛泽东的要求，脱产人员最好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三，而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延安地区已经高达百分之五，因此，粮食的供应量增加，一九三七年时所征的公粮只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一二八，一九四一年上升为十三点八。一九四二年军队实行屯垦，机

关、学校生产自给率提高，公粮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石减为十六万石，但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延安地区来说，负担还是重的。这就是“鱼大水小”。如果脱产人员减至六万人，任弼时经过调查，从吃、穿、用、烧等多方计算，每年口粮可以由十三万九千石减为十万石，另需棉布二十万匹，纸张八千令。任弼时是一个很精细的人，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连四个干部一盏灯每年的用油量，六个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开支，都一一作了计算。在这基础上，他逐渐形成几个概念，在工作笔记中写道：一，保障六万人生存和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照顾人民生活；培育民力，开辟财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保证军事和干部教育的需要，组织人力物力，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三，机关、学校的生产在自给自足的方针下，由各自为政走向统一领导，统筹统支，建立供给制度，包括照顾老年干部、病号和儿童。四，安排好编余人员，其中大部从事纺纱、织布、运盐、造纸等生产事业，一部分“解甲归田”。为此，决定边区政府一九四三年发放农业生产贷款二千零八十万元，比上年增加四分之三。

中央机关的精兵简政则是要进一步统一集中，增强领导效能，人员由七千缩减为四、五千。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政

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初步方案。他说：中央的组织机构，自前年九月会议后，作过一次调整，组织更加统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改变了，但机构仍比较分散，现经过整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更加具备，有可能使机构更加简便灵活，办事权更加统一集中，进一步增强领导效能。接着，他汇报了方案的具体内容：一是明确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任弼时说：内战时期，在白区和苏区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现在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是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应当明确规定它的性质和责权。书记处应当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针下，主持日常工作。书记处的主席应由政治局会议决定。二是在政治局之下，设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同时，按地区指导各地工作。三是设立民运委员会，统一领导职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对外保留各组织的名义，保存干部和传统。四是合并同类机构，五是调整研究工作机构等等。^②

三月十六日、二十日，政治局两次会议讨论后，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主要内容和人事安排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

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中央党校，中央文委以及出版局。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组织委员会管理中央组织部（含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统战部，民运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委。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和任弼时八人组成，刘少奇为书记。

地区分工是：华北的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指导；华中由刘少奇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由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由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各地区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

与此同时，对许多职能机关采取缩小规模，同类合并和合署办公筹办法，达到精简的目的。如取消原中央财政经济部，设经济建设材料组，由张闻天负

责，直属中央书记处。取消原调查研究局和中央研究院名义，另成立精干的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为局长。中央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取消原中央机要局，将军委和社会部的机要科并入中央机要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行政事务部门，统一由中央管理局管理。

工、农、青、妇的机关合并，成立民运委员会，下设四个组。邓发为委员会书记，蔡畅为副书记。

政治局委托李富春主持精简委员会，照上述方案具体实施，于四月中旬完成。^③

这次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意义深远：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如果说，遵义会议时，限于历史条件，主要是在军事方面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那么，这次调整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是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组织上的最大成果，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二是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三是为全党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榜样。

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中共重庆办事处由毛泽东直接管理；西安办事处由任弼时管理。^④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精兵简政这篇大文章。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之一的任

弼时，在党内的责任更加重了，这时他三十九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华！

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规定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在延安的各机关，从四月份起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分期分批转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重点已由屠杀政策改变为自首政策和特务政策。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一九四〇年末，在国民党反共高潮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保安机关曾在关中地区破获一起特务案，查出戴笠在汉中地区训练的特务四十多名。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又来到西北，布置“突击发展特务”，从一九四二年冬以来的半年中，西安和榆林的特务机关组织的“反共同盟军”，分股在绥德、米脂、清涧、安定、安塞等县袭扰的事实不断发生。因此，在审查干部时，有意识地清查内奸是一项必要而极严肃的任务。中共中央在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指出：“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而完成这项任务，“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⑥。但是，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

杂，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没有能避免发生偏向。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委和第八战区的朱绍良、胡宗南，派陕西省行政专员胡公冕^⑦和少将副师长侯声来延安设联络机关，他们一行十余人，携带电台，定四月三日到达。书记处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暂时放弃军事进攻，加强政治攻势的具体表现，决定委托社会部长康生采取措施，防止有暗藏的特务乘机活动。

四月一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政府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提出拘捕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这样，“一夜之间抓了二百六十多人”^⑧。

事情发生后，为了向党内党外说明情况，讲清政策，安定干部情绪，书记处决定立即召开中直、军直和边区政府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对处置特务的方针政策。四月九日和十二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中直机关的全体干部作了题为《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

任弼时首先指出：被保安机关拘捕的有敌伪的特务和国民党的特务，逮捕敌伪的特务，大家很容易理解，至于国民党的特务，照道理讲，他们不应该对

我们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但事实不然。因此我们不能不将其中的重要分子加以拘捕，“我们这样处置，是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因为他们这一政策是损害团结抗战的，但我们并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我们是欢迎各抗日党派参加‘三三制’政权共同团结抗日的”。

任弼时揭露了特务机关的种种毒害青年的手法后说，误入歧途的青年中，真正甘心情愿替敌伪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效命的“是很少数”，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给予这些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就是号召他们决心出来忠诚坦白，改过自新，使他们有可能脱离这种特务机关的圈套”，号召他们“秘密地向本机关的主管人和党的负责人，或者是直接向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直属党委组织部，或总政直属政治部组织部去报告”。他代表中央郑重宣布：“绝对不会因为他们忠诚坦白向党讲出了过去自己的错误和罪恶，真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对他们再治以特务之罪。”

与此同时，任弼时警告：“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对于不肯坦白自新的分子，一旦被发觉被检举出来，那就会受到加倍的处分，“因为对这些人的宽大，就是对抗战对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残酷！”^⑨

任弼时全面地阐明了党的政策。干部大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任弼时的报告印发给机关干部进行讨论。四月二十八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关于防奸工作的几项措施：一是，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反内奸斗争的专门委员会，由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为主任。二是，五六月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中央总学委会，负责领导学习，日常工作由康生主持。三是，责成各机关首长亲自负责这件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⑩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

五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的和法西斯阵营的，不论何党何派，都加以极度注意。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当晚，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主持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中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身份，在大会上作报告。

当时，美国的通讯社称：共产国际解散是一件

“划时代的大事”，既然如此，国内国外的反共势力势必会利用这个机会大作文章。国外有人提出：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毛泽东曾在大会上说，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还没有公开评论，因此中共中央一面持谨慎态度，一面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以便后发制人。

事情不出所料，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公布后，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六月底完成部署；叮嘱胡宗南行动绝对保密。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调动河防大军，企图先攻占延安南部的“囊形地带”，进而攻占陕北地区，内定的行动日期是七月九日。^⑪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但是，纸包不住火。蒋介石的反共计划终于“过早暴露”了。六月十二日那天，国民党西安劳动营的训导处长，一个在国民党出钱办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的张涤非，受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指使，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会，“通过”了一纸给毛泽东的“通电”，叫嚣要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等等。

七月六日，即胡宗南内定“闪击”边区的前三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个“文化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电讯。眼看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两年来，相忍为国，一再诚恳表示愿与国民党“忠诚合作，决不启衅”^⑫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抓住这个契机，以宣传对宣传，军事对军事，制止内战，克服危机。具体措施是：

第一，七月四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致电胡宗南；六日，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揭露事实，呼吁团结。

第二，七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将朱德致蒋、胡电速即向外传播，尤应印发英美使馆等。同日，任弼时致电西安办事处周子健并转告正从重庆返延安途中的周恩来、林彪，主要内容是：（一）请周恩来等注意，西安及洛川特务机关准备借欢迎之名，在会上向周提出责难，甚至扣留有关人员；（二）蒋、胡进攻边区似具决心，西安办事处应将一切机密文件即行销毁，免遭查抄，办事处只留必要人员坚持工作，其余人员尽可能撤回延安；（三）朱总司令致胡宗南呼吁团结电，即印多份，秘密发给社会人士，引起各界注意。^⑬

第三，从晋西北调四个团兵力渡河南开，准备作战。七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不得已时恐须一

战”；九日，又电彭德怀：如战端一开，拟“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

第四，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延安召开群众示威大会，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对国民党顽固派表示高度的义愤。大会由任弼时等负责指导，并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指示，发动群众，准备作战。

七月九日，在延安文化沟体育广场，三万群众愤怒集会，朱德、林伯渠、高岗、吴玉章、贺龙、萧劲光等出席并讲话，刘少奇以新四军代表身份在大会讲话，大家一致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强烈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大会并向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电。当天，《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的社论。十二日，又发表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在中共中央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决心。十一日，胡宗南被迫下令将第一军军部由邠州开回华阴，第九十军军部及第二十八师由洛川一带开回韩城、郃阳。胡宗南电复朱德，推托说：“为实施整训将第二线部队接替防务，并视察军师”，因而造成误会，“此皆由于弟之疏漏所致，不胜遗憾怅惘”云云^①。毛泽东说，这说明他们的理完全输了。胡宗南

一面撒谎，一面大骂张涤非和中央社是混蛋。通过这件事，任弼时预言：日本赶出中国后，中国内战必起。

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全党继续整风。这时，离开延安三年的周恩来从重庆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十五名委员除了彭德怀在华北前线，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之外，都已集中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由中央再次提上日程。八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通知彭德怀、聂荣臻、朱瑞、薄一波、吕正操等来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同时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讨论党代大会文件，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总学委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当晚，延安两千多干部集会，欢迎周恩来等，任弼时代表中央致欢迎词。

从九月八日开始，中央学习组连日召开会议，朱德、博古、康生、叶剑英等先后发言，批评王明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指出自党的四中全会以来，王明在组织上、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以来，大多数同志觉悟了，所以今年的九月会议比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开得更加深入。思想斗争，既要放手，又要谨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完全适用。在九月会议的基础上，十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并经政治局同意，

在总学委会领导下，以三个月时间，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中，研究党的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有关决议，即《两条路线》一书。

接着，从十一月一日开始，高级学习组在杨家岭召开大会进行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对王明自四中全会后，借批评立三路线的机会推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揭发了大量事实。由于这条错误路线是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在中央居统治地位长达四年，因此迷惑了许多同志，大家在发言中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后来，中央书记处肯定：“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要求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高级干部范围“很慎重的组织这一研究”^⑮。

十一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学习组的会上，总结了他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剖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

在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间，前两年，任弼时在苏区中央局工作，任弼时说，在他率中央代表团进入苏区之前，已听到在上海的中央对毛泽东有右倾的非议，进入苏区后，通过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的争论，他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

上，领导战争能力弱，故有推毛为书记事”。但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他曾误认为毛“不重视理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他集中精力筹备召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当时他认为毛泽东对“二、三次战争的领导是成功的”，但是，临时中央却来电批评：“苏区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没有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任弼时说：“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的中心领导思想”，在他起草的党代大会《关于党的建设决议案》中，提出要“打击狭隘经验论”，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以及离开实际的“空谈主义”两种倾向。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是不指名的指责毛泽东，“总之，党大、苏大的结果，在反毛的整个过程来说，是一种思想准备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任弼时说他也“是主张积极进攻的”，这就是造成宁都会议错误的思想基础。

任弼时说，在中央苏区两年，他虽然执行了“左”倾路线，但“不是极端的‘左’，极左的往往感觉我是右的”，中央局书记“周在实际执行中还未能

在各方面完全贯彻，故在博（古）、洛（甫）等来后，乃有打罗明路线的一举”。

对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开展反罗明路线的实质，任弼时指出：一方面认为中区对极左路线不贯彻，另方面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干部”。任弼时当时不赞成他们这样做，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中批评了临时中央推行的“单纯军事进攻路线”，因此“被博、洛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到湘赣省后，“一般说是执行博、洛等到中区后的路线的，但应估计没有全部贯彻，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因此临时中央对湘赣的工作不满，对任主持召开的全省党代表大会“有严厉的批评，以及后来中央对我的处罚，其中不免抱有成见”。

任弼时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到毛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提高了对毛的认识。回到陕北后，又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问题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他处理国共关系问题，思想领导（整风运动），各种政策之掌握，才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毛泽东

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①⑥}。

任弼时的发言，朴质，鲜明；不浮饰，不推诿；心底无私，敢于直言，闪耀着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光芒！

当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倾全力于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和研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时，由康生主持日常工作的清查暗藏反革命工作，走偏了方向。

康生惯于看风使舵。四中全会后，他在驻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伙同王明搞宗派主义，混淆矛盾，排除异己，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许多冤错案。当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审干时，康生在会上说：抗战前，国民党十年党化教育与特务工作，比北洋军阀更加反动，对青年有影响，对大后方的工作，“过去认为好的，现在观点应有改变”^{①⑦}。这就是他所谓“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的立论基础。由此出发，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即行政学院）“制造”了一个“典型”。西北公学有一名十九岁的学员张克勤，在甘肃秘密加入党的组织，后由中共甘肃省工委介绍，通过西安办事处来延安学习。因张平时言词偏激，整风时受组织审查。在逼供下，他承认是打进来的“特务”，成为康生树起来的“坦白典型”，五月中，康生在大砭

沟八路军礼堂召开干部会，让张克勤作“典型报告”推广“经验”，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后来又污蔑河南省委是假党，是“红皮萝卜”，进而污蔑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三日，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最紧张时，康生在政治局会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六十多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没有根据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毛泽东在当时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七月一日，他批示康生：“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并要康将上述指示刊登在《防奸经验》第六期^⑧。但康生不听，说：“咱们逼供而不信。”有一次，康生布置师哲抓人，师哲说：光凭传说没有证据不行。康生咄咄逼人地说：“你若认为他没有问题，你就签个

字！”在这种气势下，许多人不敢讲话。

任弼时和周恩来却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任弼时说：既然不可信，为什么还要搞逼供呢？师哲回忆道：任“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①9}。周恩来说：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组织的状况我是清楚的，从没有听说是什么“红旗党”，一定要甄别。边区政府系统“坦白”大会结束后，七月二十八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当着康生的面说：“抢救运动”中，某些地方“左”了点，不是特务的也承认是特务，数目还不能确定，这虽然是免不了的，但要很快把材料整理出来，其中有假自首的，有避重就轻的。大会突破好比开荒，下一步要精细地核实材料。^{②0}八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这些毛病，本来康生是应承担责任的，但他仍“顾左右而言他”，津津乐道他创造的“新方式”，说某单位的“坦白”大会会场上贴着：“欢迎欢迎再欢迎，坦白坦白再坦白”等等，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左”的表现有三种，一是群众的“左”倾行动；二是自首分子故意积极“左”倾；三是有些部门的领导也有“左”倾，但也

有人表示消极的。^{②1}总之，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这个决定详细地阐明毛泽东提出的九条基本原则。在阐述“争取失足者”时，文件没有提到康生“创造”的抢救运动“经验”，而指出：延安审查出的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②2}。这项决定下达后，康生将“抢救运动”改称“自救运动”，错误的做法有所收敛，但“抢救”所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是严重的。

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根据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机关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帅孟奇任主任，十二月开始甄别。^{②3}十二月六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说：对已经坦白的人，分别是非轻重进行甄别是一项大的工作，这里有四种不同情况：一是职业特务；二是党派问题，如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等，但不是特务；

三是政治历史问题；四是有错误思想的党员，所谓“半条心”的。他说：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坦白”的比例那么大，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应很好的清理。^{②4}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任弼时在发言中首先否定康生所谓的新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特务的谬论。他仔细地调查了国民党自一九三一年以来的组织状况，其中报到并编入组织的约占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报到的人数中，初中以上的在校学生约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两年，每年约三万四千人左右；三青团是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的，初期只有一万零五百多人。国民党决不可能把这些人大批训练成特务，派到延安来。根据数据分析，任弼时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四万人，大多数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进来的，其中三千六百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我认为他们中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投奔延安来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

任弼时接着说：

“审干工作的九条原则是正确的，发动群众

也是需要的。最初，党校第一部审查是好的。在‘抢救’运动中是被逼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弄出来的，有很多弄错的。整个运动收到很多成绩，现在延安进行甄别工作，取得经验教训，使其他地区不重复此缺点。在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方式，要防止群众运动中的逼供信。此外，真正的职业特务不容易在‘抢救’运动中冲出来，只有个别职业特务才能在群众运动中冲出来。审查重大特务主要靠调查研究。”^⑤

毛泽东支持任弼时的意见，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一次会议，边区各分区过年后召开甄别工作会议。后来，毛泽东说：“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这实际上是对康生的批评。但是，康生缄口不置一词。为了团结干部，承担领导责任，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以免“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⑥，并向大家鞠了一躬。

师哲晚年回忆道：“在那个时期，人们注意到康生只怕两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主席。但他也只是不敢在任弼时、毛主席面前拨弄是非而已。”同是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怕任弼时呢？师哲回

答：“对这个问题，后来我曾问过他，康生这样解释：‘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现在想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②⑦}

三十、整顿经济，发展力量

一九四四年《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指出：新的一年将是“纳粹复亡的一年”，中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后一年，但也许将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年”。

科学的预言依据事实。这时，世界范围内进步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屡遭苏联红军打击的希特勒已进入穷途末路，意大利军事专政政府向英美投降业已半年，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土崩瓦解；而反法西斯的苏、美、英、中诸国首脑，分别通过开罗会议^①和德黑兰会议^②，商定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消灭德国法西斯，然后主力移向远东收拾日本军国主义。两个会议的宣言为法西斯的彻底复亡敲响了丧钟。

为了牵制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兵力，盟国希望中国的国共两党继续联合抗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告蒋介石：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期与延安握手，组

织一个联合政府。于是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全国掀起了一个以争民主为中心的“宪政运动”，进步的力量空前活跃。尽管国民党的反共势力照常在各地制造摩擦，甚至收缴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绑架工作人员，中共中央以大局为重，力求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毛泽东向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中共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不变。

一月六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说：陕甘宁边区今年的工作中心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抓好军队，而“目前亟须解决的是财政金融困难”。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以来，边区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金融出现紊乱，以致党内党外颇有意见。毛泽东为此提议由任弼时负责，朱德、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等参加，共同研究治理财政金融问题，并以此为中心议题，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

自一九四〇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是惊人的，特别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后，各项政策初见成效，反映在生产方面的成果是：一九四三年内军民开荒百万亩，粮食除自给外有余粮二十二万石；全区植棉十五万亩，产量可供军需民用的一半；运盐六十万驮，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农村劳动力已有四分之一走上合作化道路；党政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自给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三八年后白手起

家的工业，现有工人一万二千人，日用工业品的自给程度正在提高。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诙谐地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头，笔头；六臂就是一双手握枪，一双手握锄，一双手握笔写文章！”

为什么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出现紊乱呢？任弼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了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银行行长王亚光、物资局长叶季壮、建设厅长高自力和边区政府副主席陈希云的发言和大量的经济数据。

造成财政金融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为了充实边区防务，中央决定从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区抽调十一个团的兵力，征集新兵四千人，边区增加了两万人的开支。二是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加剧，国统区物价飞涨，但对边区输出的物资如盐等，却被国民党压价统销，造成不等价的交换。三是边区的财政、金融、供给、贸易等机关没有领导广大的经济运动的经验，政策不配套，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等等。比如贸易部门对进出口贸易没有实行保护政策，奢侈品的输入缺乏控制；财政部门没有致力于开辟财源，而靠发行边币来弥补开支；在边币和法币的比价上，银行不随着法币贬

值而相应地浮动，长期固定以边币二元一角兑换法币一元的比价，结果边币贴本兑出；而有些公营商店，单纯营利观点甚至囤积居奇，破坏政策法令，买卖黑市，助长了物价波动。摸清了问题的症结后，任弼时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去年金融波动是一件坏事，但有积极作用，引起大家来研究。这次高干会要以整风精神，彻底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中找出规律，明确方针和办法。^③

四月七日至八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对财金问题讨论了半个月后，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

任弼时首先指出：现阶段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的两大特点：第一，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第二，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他说：这种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因此我们能用开展劳动竞赛的办法，充分发扬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社会经济的活力。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令》之下，民众一切受统制，一切被垄断，以致工农业生产日趋萎

1943 年底任弼时安排陕甘宁边区
1944 年生产计划笔记手迹

缩和破产。

任弼时理智地指出：国民党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边区以很大的困难，我们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贸易来往，又要善于作尖锐的斗争，制订“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那种不主张全面管理出入口贸易，不相信在金融问题上能采取独立自主方针的观点和办法都是“偏右的错误”。针对当时的情况任弼时提出了关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三条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任弼时认为解决当前财政金融波动问题，除了调整政策，理顺关系外，“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这是保障内外贸易平衡，稳定金融，提高边币信誉，稳固财政的物质基础。因此，他向边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提出：今年再开荒百万亩，争取余粮一年，并能以部分粮食平衡出入口贸易；扩大棉田一倍，明年不再输入棉布；生铁今年自给一半，明年全部自给；发展手工业，组织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扩大生产能力，增加税收，减少奢侈品的输入。要求各经济部门克服单纯营利观念，遵纪守法，“对内力求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任弼时强调说：经济战线的斗争

是复杂的，“犹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

为了端正有些干部鄙薄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

“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④

任弼时要求各地党的组织“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他深谋远虑地说：“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

提出来的严重任务。”^⑤此时此刻，任弼时提出了培养建国的专门人材问题，既反映了他一贯倡导的、关于抓住中心环节从一个环节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战略目光开始注视到加强城市工作。毛泽东审阅了任弼时的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五千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第一部去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发表的《学习和时局》的重要讲演中，提出党的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毛向全党提出要有两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⑥在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的同时，中共中央告诫大家在全国反攻前，华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暂时不会改变，因此要准备力量和日寇“熬时间”，“避免轻敌速胜观念”。五月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讨论晋西北根据地的工作时，任弼时说：太平洋战区反攻日寇的时间可能在明年夏秋，如果日本国内起变化，反攻的时间可能来得快一些，否则就会延长一些。领导机关布置工作宁肯把时

间估计得长一些，至少三年，发展结果时间缩短则更主动。

接着，任弼时对地处抗日前沿的晋西北地区如何准备力量迎接反攻，提出了要求：一是发展经济，培养民力，发动群众通过彻底的减租减息工作，改造基层政权。二是注意做好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把瓦解和争取伪军看成是准备反攻的后备力量，也是与国民党必争的一部分力量。三是改进地县两级党委的领导方法，学会领导生产，培养地方干部，创造适应新形势的工作经验。四是研究收复区党组织的巩固工作，边境区、收复区对地主阶级仍然要讲联合。五是抓紧防奸斗争的甄别、定案工作。任弼时肯定防奸斗争是有成绩的、必要的，但对“抢救”运动中的“坦白分子”要认真甄别，其中职业特务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党派问题，政治历史问题等，除确有证据的职业特务外，其余的首先摘掉“特务”帽子，本着先易后难，先多数后少数的精神，予以解放，手续简单一些。他说“这就能增强我们的力量”。对今后的防奸工作他说可以改用组织学习的办法，“区级干部采用轮训班的办法为好”。^⑦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延安整风的基础

上，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以及城市工作等问题，会议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历时十一个月，其间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七中全会设主席团，由原中央书记处成员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周恩来共五人组成，任务是在全会期间负责处理中央的常务工作，原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履行职权。全会初步议定：七大的议程是：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工作报告，朱德作军事工作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并公开讲演，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历史问题报告；并由高岗、彭德怀、陈毅分别就陕甘宁、华北和华中根据地的工作发表讲演。全会上，毛泽东就抗战准备时期和抗战以来的工作作了重要报告。

任弼时向全会报告了七大的准备工作情况，提出了各项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组织情况，除政治报告不设委员会外，军事、组织、统战工作和历史问题等四项报告均设准备委员会，由报告人负责召集。

全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一致通过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七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和七大各项报告准备委员

会的名单。自此，七大的筹备工作和中央的常务工作就在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领导下进行。^⑧

党的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真和高岗八人组成，任弼时为召集人，负责起草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这是七中全会对任弼时等的重托。这项起草工作首先是对党的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总结。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来说，这方面的讨论始于一九四一年秋，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历史的学习，认识臻于成熟，其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为成员的清算委员会，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由于当时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尚未经过学习和检讨，草案并没有提请政治局正式通过。第二阶段是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几次讨论党的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汇编，组织高级干部阅读，联系实际检讨思想作风。第三个阶段是今年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先后

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了讲演，即《学习和时局》，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党史上的重大问题的结论。

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又阅读过毛泽东所写《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一九四二年冬在任弼时主持下，西北局高干会议总结了陕甘根据地党内的历史问题，取得了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精神处理党内问题的直接经验。正因为任弼时有长期的酝酿和思考，所以在毛泽东讲演后，他便在《历史草案》的基础上草拟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

任弼时起草的《决定草案》共九千多字，分六个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决定草案》的第一部分，重新评价了党的四中全会，指出会议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没有指出中国革命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反而说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在组织路线方面“又犯了严重的打击政策错误”，成为后来“党内极端恶劣的宗派打击政策的根源”，因

此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并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应加以否定”。第二部分，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方面对这条形态最完备的错误路线进行剖析。第三部分，揭露了这条“很大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它使党在白区“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的力量”，在苏区损失“十分之九的力量”，分析了它的思想根源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第四部分，指明了在错误路线下党的工作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认为这条错误路线“不是说总的革命方针也都是错误的，就是在策略问题的某些部分，也非毫无一点正确的地方”，例如“对于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目前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认识是共同的；对于党的六次大会所规定中国党奋斗的总方针，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也是一致的”，但是严重问题“在于执行党的这一总方针时，对于当时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对于策略路线（包括政治，军事路线与组织路线）作了错误的规定”。

《决定草案》的第五第六两部分，集中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性。任弼时写道：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

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不独未因立三路线的错误受着重大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⑨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纠正过许多的错误”。“这一党内存在着发展着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路线，因为被中国党内许多时期内错误路线的统治所抑制，而不仅不能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占着重要地位，反而时常被孤立起来”。“历史事实证明了谁是谁非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重新能够团结中央大多数及红军中的将领，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了错误的领导路线”，“遵义会议实际上完成了由错误路线到正确路线的转变”。^⑩

七大的各项报告要求在六月上旬成文，因此任弼时夜以继日地赶写。原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张树德回忆：“为了赶时间，我们是连夜复写的，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琼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⑪

任弼时赶写的《决定草案》是在《历史草案》的基础上，把整风以来党内高级干部经过学习和检查

取得的新认识集中条理，体现了整风运动的思想理论成果，他及时地将《决定草稿》的复写稿提交给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积聚力量准备迎接反攻之际，日本侵略军为救死计，以四十万兵力先后发动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目的是打通平汉、粤汉两路，控制纵贯中国大陆南北的交通线，为孤悬在南洋的四五十万日军准备退路。从四月十七日开始，日军五六万人由豫东的中牟向平汉铁路南段挺进，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及蒋鼎文部共四十万人，一触即溃，在不到三周时间内或逃或降，全线崩溃，平汉路自郑州以南的长葛、许昌、郾城、漯河、确山等城镇全部落入敌手。豫西方面，日军占陇海路的重镇洛阳，豫陕边的卢氏、潼关告急，胡宗南的两个师被歼十分之九。连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也不得承认河南惨败，“一般人认为奇耻”。^⑫湖南方面，日军沿粤汉路南北对进。六月，长沙、衡阳相继陷落，美军在华南地区的空军基地岌岌可危。下一步，日军的矛头是打通湘桂铁路，向云贵川挺进，企图把蒋介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

在六月五日的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局势变化将有几种可能：一是国民党大削弱，靠美国帮助恢

复战斗力；二是滇缅路被切断，国际援助受阻，蒋介石退守天水维持残局；三是国民党内部分裂，一部分投降，一部分继续抗战；四是全部投降。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第一种可能较小。蒋介石三大主力，汤恩伯垮了，陈诚损失很大，胡宗南也不能打。蒋寄希望于美军替他训练六十个师，短期内没有可能。有的认为第二种可能较大，我们要敢于胜利，如能在敌后战场扩大一百万军队，胜利是我们的。

任弼时说：“我看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国民党大大削弱，何应钦投降，我们和地方实力派及民主政团联盟结合，成立民主力量的同盟，以共产党为领袖。”毛泽东说：弼时同志说的就是第三种可能的必然结果。^⑬

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局面下，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和鄂豫皖区党委，抓紧时机，适当集中兵力作战与分散的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在巩固华北、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下，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拔除根据地周围的敌伪据点，攻取敌占城市，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把华北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整个上半年，敌后战场上攻占县城二十四座，克复据点一万三千余个。^⑭这一来，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威望一落千丈，延安成为中外人士瞩目的中心。六月

上旬，中外记者参观团二十一人到达延安；七月下旬开始，盟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遣的军事观察组十八人在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率领下，先后来到延安。通过广泛接触，他们了解了中国广大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截然相反的事实真相：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充满着危机。美军观察组成员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在报告中写道：“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⑤

战场的格局在变，民心和舆论在变，但是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不变。他一面表示要开放民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限十个师，其余的限期取消和解散，对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概不承认，对被捕的中共人员不肯释放。中共中央认为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在蒋处境更加困难及国际方面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九月一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即将开幕前夕，毛泽东在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和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主张。任弼时说：“蒋介石真正起变化可能在明年春夏之交，联合政府和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可

以提出酝酿”。他又说：“我看决定的因素是我们的力量是否壮大。目前我们的弱点是在华南的力量还不够”。这个问题，毛泽东曾和王震商谈过，由三五九旅派一个加强营，护送一批干部到新四军五师的根据地和广东的游击区去，加强敌后的力量；陈毅也向毛泽东提出过书面建议。当任弼时提出华南力量不够时，毛泽东便说：王震等走应下决心。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领步兵十个连，干部四到六个连挺进华南，并在湘鄂赣等敌后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嘱咐：由弼时、少奇、彭真共同和他们谈话，专门搞几个文件，如“三三制”、土地问题，沦陷区工作等，学习一个月然后出动。^{①⑥}九月十五日，当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由抗日的党派代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时，正在组织南下队伍的任弼时，在西北局的会议上布置扩大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问题。他说：正面战场失败，外国人到延安，引起国民党内部矛盾加深，地方势力向我们靠拢。民主同盟已经成立了，地方实力派现在还没有核心，还不团结，我们要联络他们，帮助他们；还要注意在乡的军人的工作，使进步的势力更加扩大。^{①⑦}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之一，是原

湘赣苏区红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朱毛红军开创的井冈山传统影响很大。他们英勇战斗，但是在立三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后的王明路线时期，政治上风风雨雨，留下许多是非。现在，他们肩负重任，将深入敌后万里远征，作为当年湘赣新省委的书记、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有必要也有责任在战友们出师之前，共同检讨历史的经验教训，彼此获得共识，使他们心情舒畅地奔向抗日战场。十月二日至二十六日，任弼时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湘赣工作座谈会。在延安的湘赣苏区的老战友王震、萧克、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吴德锋、袁仁远、王恩茂等都出席了座谈会。十年前，他们在错误路线下被迫离开湘赣根据地，转战十年，在迎接抗战胜利的前夕，他们聚首回顾历史，大家无不感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温暖。

经过二十多天的畅谈后，二十六日，任弼时作了初步总结。

自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湘赣苏区在“左”倾路线越演越烈的条件下发展着。立三路线时期，湘东南五次暴动，赣西南八次攻打吉安，许多党员干部对左倾盲动路线颇为不满。党的四中全会后不久，成立了以王首道、张启龙、袁德主等为核心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省委，所

执行的是临时中央制订的“左”的政策。但临时中央到苏区后，反而指责湘赣省委，以“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罪名，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打击了张启龙、袁德生等省委领导同志。一九三三年六月，任弼时到湘赣后成立了新的省委。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已经完备，“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是新省委是否满足了临时中央的要求呢？任弼时说，“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任弼时说：这条“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它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还觉得很合胃口，同意了那个路线，拥护了那个路线”，现在来反省，就“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目的在于提高认识，吸取经验教训，“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任弼时认为，新旧省委虽然都执行了四中全会后的错误路线，但实际工作中仍然有成绩。旧省委时期的“显著成绩”是：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巩固了（恐怕还发展了）苏区；建立和发展了武装，如独立第一师等等，“新省委虽然是更‘左’了，但也还有它的成绩。概括地说，是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上，在扩大武装及组织长征上，都有成绩”，原因是广大的党员和干部

“对苏区是热情保护的”，“对于苏维埃政权还是爱护的”，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许多干部当中还是存在的”，因此，在执行错误路线中，“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在分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任弼时明确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对王首道，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这种对干部的打击政策一直到六中全会才基本结束，所以任弼时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上也有错误”。

在军事方面，任弼时说：“旧省委在执行‘左’的军事路线方面，只是打过一次分宜，而新省委在五、六两个月基本上接受了新的军事路线”，修碉堡，筑工事等，准备打阵地战，但“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

在肃反问题上，任弼时认为，旧省委时期因为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新省委时期设立了裁判部，杀人要经省委批准，但政策更“左”了，伤害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尽管当时肃反工作由中央保卫局直接领导，由“中央很信任的”省委副书记刘士杰主管，但任弼时承担了领导

责任，他检讨说：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对刘士杰，“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以致“他就利用我对他的信赖进行私人活动”。对长征途中叛变逃跑的刘士杰，有人说他当时就是反革命，任弼时回答：“我看这没有根据”，这类人是“投机分子”，“当革命困难之时，当他们个人地位动摇时，他们就可以离开革命，叛变革命。我们对这样品质的人，当时没有看清楚”。

任弼时最后说：新旧省委都犯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毛病，新到一个地方，对当地的斗争历史对政策没有深刻的调查研究，往往割断历史，不能接受那个地区的历史教训。他诚恳地告诫即将南下的战友说：“这一点教训，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是将来任何一个同志到任何一个区域工作时，必须引以为戒的”。^⑮

湘赣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三五九旅南下的队伍已集结延安郊区整装待发了。十一月一日，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在延安东关的飞机场举行誓师大会，全军五千人分编六个大队，其中战斗部队四个大队，调赴新四军五师和赴河南及湘鄂等地开辟工作的干部两个大队，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刘

型为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为参谋长，郭鹏、王恩茂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及副政委。部队出动时，用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名义，到湖南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以衡山为中心地区建立敌后新根据地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王首道、王震、贺炳炎、廖汉生、文建武、刘型、王恩茂、张成台和聂洪钧等组成，王首道为书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等参加了誓师大会，并讲了话。任弼时在讲话中形象地说：“你们要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

画一张什么样的地图呢？十一月四日，任弼时向南下部队的干部详细地阐明了中央的指示。他说：

“中央有决心要在平汉路南段及粤汉路日寇最近占领区去开辟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方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打日本，准备反攻。同时要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预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这一道‘堤’的修筑是很重要的。”

任弼时从战略的高度阐明了筑这道“堤”的意义和目的。一是反攻日寇，二是促进国民党进步和防备它的反共阴谋。当时，美军已在菲律宾登陆，控制了太平洋的交通，日本“为避免它的完全失败与无条件投降”，可能将南洋的四五十万孤军撤到中国的华南

地区，以此作筹码和英美进行交易，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可能撤到长江甚至黄河以北地区，挑动中国内战，他坐收渔人之利。我们要尽快地在两湖和华南的敌后打下工作基础。二是据半年来的国共谈判，要蒋介石“实行民主之希望不大”，他在抗日方面是消极的，而反共反人民则是积极的，处心积虑地准备“反攻与反共一同进行，反攻即将日寇、共产党一起攻下去”。任弼时说，如果国民党不进步，届时它的逆水会分三股从西面冲下来：一股从西安向洛阳、郑州；一股从宝鸡汉中冲向襄阳、武汉；一股从重庆沙市冲到武汉，“来破坏我们，阻碍我们的反攻”，我们这道“堤”将成为防御和遮挡逆水的堡垒；如果国民党进步，改组统帅部，执行民主制度，我们共同进武汉、长沙和郑州。任弼时强调：八路军和新四军现有六十三万人，“只有当我们的力量更大的时候，才可以使国民党在某些方面表示一些进步；也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地方实力派和中间派才会跟着我们走”，因此，南下部队的任务是三项：在两湖地域的敌后特别是长江以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组织千百万要求抗日和对国民党不满的群众；准备进城。

由于日军新占领的地区是平原和交通要道，新的敌后根据地的布局就和内战时期不同。任弼时指

出：“内战时期我们在山上，国民党在平原，现在是国民党在山上，我们则在平原，在靠近交通要道的地方，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得到发展”。如果湖南的新根据地开辟，我们就可以把新四军五师在平汉路东西两面及鄂南的部分根据地衔接起来，和新四军所在地九江、无为地区打通，形成一个新局面。“你们这个方向担负的任务是很重大的，斗争也将是很残酷的。”^{①⑨}这就是这张红色地图的战略意义和绘制方法。

在福州、柳州相继陷落的恶耗声中，在大后方和延安各界强烈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的呼声中，重庆当局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为了利用中共的军事力量反攻日军，十一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曾经担任美国陆军部部长的赫尔利飞到延安。这位被周恩来后来评为老朽昏聩、刚愎自用的美军少将，携来一个与中国民意格格不入的“五点建议”，要旨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的军队须经政府“改编”，“服从与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在此前提下“承认”中共及国内各政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赫尔利说：建议所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且蒋介石“已经同意了”的。八、九两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谈判桌上据理反驳，并且根据不破坏解放区的抗日力量，不妨碍实行民主政治

的原则，将“五点建议”修改而成《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议草案”），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赫尔利“经过考虑”认为修改后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可以在协议上签字。他非常自信地说：协议签字后，毛泽东能到重庆和蒋介石举行一次“伟大的会见”，那肯定会“解决许多困难”。

九日晚上，中共七中全会讨论“五点协议草案”。任弼时认真地推敲了草案的文字后问道：用中国政府名义有什么讲究？因为条款中写明了“国民政府应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之代表构成”，毛泽东说：用中国政府名义好。任弼时比较了条文内容后说：两个方案内容基本不同，赫尔利想用它来打我们，结果打了他们自己。周恩来说：在蒋介石心目中，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将两者混而为一了，所以以为蒋介石不至为难。任弼时估计：蒋介石不会签字，结果是拖。在谈到是否可以在协议书上签字时，任弼时又提出：照外交程序不好单方面签字。因为赫尔利已向毛泽东表示，他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他自己也将在协定上签字。任弼时当即说：我们可以签字。^{②①}七中全会批准了《五条协议草案》。

历史常常有许多巧合的细节。十一月十日，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出动的日子，又是毛泽东和赫尔利签订协议的日子。这天清晨，延安东关的飞机场上，西北风吹得南下支队的旗帜猎猎作响，指战员们穿着新制的冬装，挂着崭新的子弹袋，背着自织的毛毯，沐浴在朝阳下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检阅。几年来，在国民党不发军饷，不给一枪一弹的困境下，三五九旅的健儿们自己动手，开荒屯田，把个昔日荒凉落寞的南泥湾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现在他们背负民族的希望，奔向最艰苦的敌后战场，表明这支队伍持枪能战斗，握锄能生产，困难压不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缩影。检阅完毕，队伍依依地告别战友和亲属，离开延安。

就在这天上午，在枣园的小礼堂里，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一式两份的协议书上签字，文本上留下了由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地位。下午二时，南下的队伍离开不久的飞机场上，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腾空而起，周恩来和赫尔利、包瑞德同机飞离延安。

准备反攻日寇的队伍奔向湖南，争取民主政治的使者飞向重庆，东关机场一天内出现的两件事，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旋律。

事情果然不出任弼时所料。蒋介石对“五条协议

草案”迟迟不表态，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赫尔利向周恩来转交了蒋介石的三条反建议，他把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抛在一边，坚持由国民政府“改编”中共的军队，“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给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然后“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一句话，就是交出军队，党治不变，给中共几个“官”做。扬言“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协议的赫尔利赖账了，他轻描淡写地对周恩来说：联合政府“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虽然他认为协议“是适当的”，但是他“并不处在同意的地位”。第二天，蒋介石当面对周恩来和董必武说：“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宴请部分参政员的席上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他不能接受。^{②①}蒋介石的顽固立场和赫尔利的盲目自信形成莫大的对撞，难怪有人说：赫尔利连蒋介石姓“蒋”还是姓“石”都没有搞清楚。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不抱幻想，一面不放弃一切机会争取民主，促蒋进步，一面积极地准备力量。十月中，在组建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向日军新占领的南方地区挺进的同时，中央又决定增派戴季英、王树声等率两个老团及一批干部，开赴河南，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奋斗。十一月十九日，戴季英等

向七中全会主席团汇报队伍组织情况，任弼时在会上说：我的基本意见是趁着日本人向华南进攻的机会，我们多拿一点本钱向南方敌后进军，是否可以考虑从黄河以北再抽点部队向南，将来可回头向北。在此次反攻胜利中，使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胜利，包括武汉、长沙。看先遣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来决定。如老百姓欢迎，政策好，还可以抽点力量到大别山地区去活动。^{②②}

由于蒋介石的顽固，国共谈判停顿。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当晚，七中全会主席团听取周恩来、董必武的汇报，会议决定：周、董不回重庆，写信通知赫尔利；并积极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九日，十二日，主席团两次开会，拟定了筹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毛泽东先后说：成立解放区联合的目的是：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它不是第二政府，我们还是要讲团结，全国的总任务是成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就是党的七大也应采取这个态度。会议决定：先集中力量召开党的七大，其他的事待七大以后再说。有关的筹备人员集中到枣园，文件先扯后写，写了再扯。^{②③}

于是，任弼时为召开党的历史性盛会日夜奋斗！

三十一、党的历史性盛会

枣园静悄悄。

它坐落在延安城西北十五华里的枣园川。中央社会部机关住在这里时，国内只有几排窑洞和一些果树，曾更名为“延园”。一九四三年初，毛泽东由杨家岭迁入枣园，这里先后修建了一些窑洞和房屋，成为中央书记处的驻地，社会部搬驻后沟。一九四四年十月，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的住所也由杨家岭迁来，只有朱德还住在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迁入枣园。

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的山坡上，一排五孔窑洞。东西两边隔着围墙，是周恩来、张闻天和后来朱德的住所。山坡下一条水渠横穿而过，这是一九四〇年由军民共建的。淙淙的东流水灌浇着枣园川一千多亩旱地，乡亲们因而称它为“幸福渠”。渠畔的两排石窑洞，东面五孔是刘少奇的住所，西面三孔

便是任弼时的住所。跨过“幸福渠”是一个小礼堂，毛泽东和赫尔利曾在这里会谈和签订协议。

园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怀安诗社的谢觉哉老人，曾以清人吴敬梓的词句“风雪漫天仍作客”为上联，补一下联“梨花满地不开门”。他说这“有些乡思在里面，合乎我这个人！”但“这是言其静”。后来谢老在枕上得句：“公余一卷延园静，又是梨花压葛巾”，^①既咏其静，又赞毛泽东的好学精神。其实，枣园是开门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春节那天，吃罢早饭，任弼时和毛泽东等就带着年礼，来到附近的枣园乡政府给群众拜年。他们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里亲切地拉着乡亲们的手，递纸烟，敬年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询问乡亲们打的粮食够不够吃，部队砍柴时毁了树没有，机关的羊群啃了庄稼不？大家七嘴八舌，亲如家人。临走时，毛泽东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跟大家接近得少了，以后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也到我们那里去！半年前，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当年在成都出生、从小受过中国教育的谢伟思曾经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②

现在，静悄悄的枣园内，七大的秘书长、党的历史报告准备委员会召集人任弼时，正在“先扯后写，写了再扯”反复地修改《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稿子是一九四四年五月赶写成的，曾分送委员们讨论，同时交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修改。任弼时在胡的修改稿上，先后又改了三次，加上了标题，对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上，增加了约五百字，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不少“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教条主义宗派则不同，“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因此就使得“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的纲领”，“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③陈毅很赞同任弼时的意见，认为“有考虑的必要”。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教条宗派在党内形成较迟，有领袖，有纲领，有具体组织形态，形成党内的小党，霸占了全党的领导机关，对党危害最大，这些已大白于党内，从

这方面看，经验宗派是不能与其匹敌，而是甘为驱策的。弼时同志不主张平列，这对。”^④

任弼时修改的第三次稿上，对王明路线的错误内容和政治教训从理论上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七点：

（一）不了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离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条件，在城市斗争与乡村斗争，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策略上发生一系列的错误，坚持革命可以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二）背离中国的国情，混淆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内容；

（三）在革命的动力上，不承认除工农外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夸大革命主观力量，把局部现象看成全体；

（五）不了解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城市中心论；以北伐战争和苏联的经验作教条，否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六）不懂得利用矛盾，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能灵活地组织进攻和必要时的防卫和退却；

（七）以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来抬高自己的威风，实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强制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⑤

之后，任弼时将修改稿连同上述提纲一并交给张闻天再作修改。

张闻天在党的四中全会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五中全会后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为中央起草过许多文件和社论，遵义会议上认识转变，支持毛泽东，之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他率领调查团深入农村做了一年调查，对王明路线先是左倾盲动后是右倾投降的发展，认识较深刻。他在任弼时修改稿的基础上，以任的七点意见为经、四中全会后一系列事实为纬，并和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对照，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增补，把任弼时提纲式的七点意见（后来曾增加为八点）形成较严密的文字，抄清以后提交给毛泽东修改。毛泽东当时说：这个文件是犯过错误的人自己起草更好。^⑥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作了修改后批示：“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为定议，再交七中通过。”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印发给代表们讨论的稿子，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月三十一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七中全会。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准备的党章草案。毛泽东说：如

1945 年 3 月 16 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会议任弼时记录手迹

果大家同意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正后印发给所有代表，大会上仍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任弼时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向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意见：

（一）建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段落中把国民党的成分分析一下，“区别具领导的统治成分和下层广大党员群众之不同”，说明它的统治集团“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大地主和买办阶层，他们惧怕群众起来，这是他们对内采取反动政策的根源，这也就是他们采取抗战两面政策——抗日又与日勾搭，和抗日消极的原因”，“同时指明国民党内有进步的民主力量，但因国民党对党内是独裁统治，又有CC、复兴社特务，没有内部民主，故民主分子还未能形成一种较有组织的力量。”

（二）建议“强调地说一下”“中共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若不得中共同意，不与中共商量就不能解决。”

（三）“说明中国人民在这次抗日战争胜利中，应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外国的束缚压迫，对英美取消不平等条约表示欢迎态度，并希望战后的合作。”

（四）加一段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包括党的力量的发展，几年整风教育的收获，内部团结一致”；指出“加强教育、改善作风、巩固发展组织”，以及

工会、青年、妇女运动的方向等。^⑦

任弼时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采纳。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⑧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问题，毛泽东七大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庄严宣称：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⑨

外交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宣称：“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

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⑩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宣布美国政府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毛泽东的话具有极尖锐的针对性。

对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四月五日，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指示》和《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指示》，《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社论。

这些事实表明，任弼时与毛泽东认识上的一致性，和毛泽东从善如流的民主精神。

三月三十一日的七中全会，对七大的议程作了重要的更动，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改为由七中全会讨论形成决议，七大的报告及有关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不再涉及历史问题。

为什么准备已久全体代表至为关心的历史问题的议程不放在大会讨论呢？主要的原因是便于使大会能集中精力，同心同德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即走民主团结的路线，争取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一月间周恩来第二次去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等一口拒绝，蛮横地告诉周恩来说：“统一是无条件的，国民党是唯一的革命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

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面对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应当调动全党的力量，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国际进步势力，坚持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走光明的道路还是走黑暗道路甘当蒋介石的顺民的大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六大以来的十七年间，特别是党的四中全会到抗战前的时期内，中央领导路线不断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惨重损失，许多同志遭受打击，许多同志牺牲生命，因此在讨论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大家愤气难平，言词激烈，有的潸然落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全国局势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把着重点放在向前看，而不是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上，这就必须加以引导。朱德说：“代表们对算旧帐感兴趣，要防止。”毛泽东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政治上不成熟，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鉴于改变原订议程需要向代表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因此毛泽东说：要经过一个步骤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不能勉强。^⑪

四月初，任弼时为了贯彻七中全会的意图，“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他一方面召集座谈会

听取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三次召开代表团负责人会议，收集意见和了解代表们的情绪，由毛泽东择善而从地继续修改决议稿。从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八日的半个月內，毛泽东又先后改了六稿。另一方面和王明谈话，征求他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希望他能向代表们表明态度。这就是任弼时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去杨家岭在王明住所的两次谈话。

在四月一日至二日的第一次谈话中，王明承认一九三七年回国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调查研究”，后来在武汉工作时“组织上对中央尊重不够，这是不对的，但主观上不知有何原则错误”；他主管的《新华日报》不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恐发表后又有不同意见，反而更不好，但另方面对毛尊重不够”等等。他抛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就一些事实的过程为自己开脱、辩解，仿佛他的错误是别人对他的“误解”。十三日，第二次谈话时，王明说：最近他“稍看了一些毛的旧著，考虑一个基本问题”，“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王明表示：对中国的革命“毛有自己的思想系统”，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遵义会议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军事的经验，提出最高斗争方式手段

——最大的优点是用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在这些基本思想上产生建党——一方与资联合，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反‘左’的拼命，也要反右的逃跑；一方反（对）不要资（产）阶级，一方反（对）迁就资（产）阶级；一方领导农民，一方又不要受农民意识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王明认为毛对中国革命性质与斯大林估计不同，“如保留过去的看法则会想不通的”，因为毛泽东有自己的道路，将新旧三民主义加以区别，使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是“马恩列斯毛，毛在中国下发展了马列主义”，他赞成在决议中“将毛正面多讲点”。至于他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王明说：从现在观点与毛的思想看，则是“有错的”但它“不仅起消极作用，也起了些积极作用”，决议稿“现在是过了些，把国际的错误都（成）我的。如以我的小册子做代表我可以接受的”。^⑫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详细的记录。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十一个月的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当天，任弼时收到王明写的声明书，请他阅转毛泽东及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

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③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军事工作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任弼时向全会报告：各代表团经过几次讨论，一致同意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形成决议，并向全会报告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他说：起草决议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和犯错误的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印发给代表们讨论的共有三次，任弼时说明：第二次修改（四月八日印出）主要是确认王明的小册子与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稿中是把八点概括性意见集中写的，后来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从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再提交代表们讨论。任弼时又说：第三次是将前两稿中的八点作了修改，把毛泽东的思想从正面加以强调说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都准备将来修改时考虑采纳。王明写的声明，也对决议表示拥护，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④

接着，张闻天、博古等发言，拥护这个决议，诚恳地向错误路线下受打击的同志致歉，对决议所体现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政策，感到温暖。博古说：这也就是纠正了党内斗争的恶劣作风。我知道这个目的是给我们留余地，但治病救人要有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信心，有决心。

任弼时也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批评，他坦率地说：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由于看到《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关于战略问题的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⑮

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高屋建瓴地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决议上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票子是要兑现的。把党内关系认为不是政治关系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政见既然相同，就不应该再有意见，这才是政治关系。对王明的声明书，毛泽东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⑯

全会一致基本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的修改委托给七届一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统一全党认识达到高度团结的有力武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六届七中全会后，从任弼时起草《决定草案》起，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和七大的代表，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十多次易稿，最后由毛泽东总其成，经过近一年的奋斗，任弼时等终于完成了党的重托。

王明信誓旦旦的声明书，是否如任弼时等所希望的在“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呢？事实证明这是一张空头支票。一九七九年，莫斯科的进步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编的《王明诗歌选集》，^{①⑦}其中有一首题为“所谓七大”，诗曰：

四载整风七大开，毛丢马列独登台。

不知国共战争迫，反要联合政府来。

矛盾战时异战后，方针东倒又西歪。

延河嘉岭烟尘暗，一马横行万马哀。

这首很不“优美”的诗，注明写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也就是王明提交《声明书》后的半月，诗中极尽诋毁七大、攻击毛泽东之能事，和《声明书》相对照，充分说明王明的虚伪性；而他临死前定稿的《中共五十年》^{①⑧}一书中讲得更加“丰富”了。王明写道：七大前夕，任弼时等和他谈话时，他开始“没有同意”写

声明书，出发点是苏联战胜德国已为期不远，他即使不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也未必开除他的党籍。但又考虑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意见，七大也未必能改变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果他拒绝七中全会决议，就会被开除党籍，“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从这一情况出发，我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的决议。”这就表明他在声明书中所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称“马恩列斯毛”云云，只是他等待时机进行翻案和反攻的韬晦之计。这是同当时抱有团结愿望的毛泽东和任弼时等对他的期待背道而驰的。

四月二十三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

这一天，延河欢笑，嘉岭生辉。下午，春意盎然的杨家岭，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聚集在庄严肃穆的中央大礼堂里。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口号，和会场后墙上“同心同德”的题词交相辉映，融汇成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主席

团成员、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如果说十七年之前，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为了摆脱白色恐怖，党的六大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那么经过土地革命，经过抗日战争，党的七大得以在全国敌后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如果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七大时，全党还只有五六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不超过十万人，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和晋察冀两块，那么现在，全党已有党员一百二十万人，军队九十一万人和民兵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根据地拥有人口近一亿，中共已经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这是党成立以来空前的成就。因此，任弼时说：

“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利益。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洪涛险浪中的舵手。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

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①9}

大会原计划在半个月內开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要报告之外，各部门和解放区代表的发言只安排了九人，由于代表们的踊跃，发言人数增加到二十多。任弼时也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题为《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内容包括：（一）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二）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三）建设事业的重要；（四）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任弼时认为：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因为国民党号称有六百三十万军队，又有国际援助，中国可能出现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在长江或黄河以北区域实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內，暂时保存以国民党为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变化，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以至于达到优势。这是“决胜负的过渡局面”。他说：“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大”，“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因此，要以

主要精力巩固扩大解放区的力量，扶助争取同盟者，瓦解争取敌方力量。^{②0}

在讲到经济建设时，任弼时说：“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在战争状况下，一切建设必须服从战争利益”。他强调指出：

“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

“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入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②1}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任弼时说，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优待和改造”原有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总之，“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②2}

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

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通过了党的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选举的过程中，为了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五月十七日，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五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和各代表团商议提出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经过细致的工作，六月九日，大会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和在新疆狱中的陈潭秋等四十四人为正式中央委员。在当选的委员中，获得全票的有四人，任弼时是其中之一。由于向大会提交了欺人之谈的《声明书》，又由于主席团向代表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王明也以三百二十一票当选。当李富春报告选举结果后，任弼时请在场的中央委员走上主席台，一一向代表们介绍。

第二天，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向代表们作了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

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②

大会选出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为候补委员。

六月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在中共七大召开过程中，国民党于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六大。这个大会以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为张本。五个月前，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后来他完全变了卦，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在该国有强得足

以抗拒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时候，一个自由的、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总不能在这次战争中出现”。^④蒋介石在大会上得意忘形，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独裁统治，“绝对禁止”违反政府法令，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制止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断然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六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向中外记者宣布：“美国对中国租借武器近来已增加”，“如中央部队遭受不友好之部队袭击时，若望中央部队不用其所有武器自卫，亦为不近人情之事”。^⑤陈诚咄咄逼人的言词，剥去了国民党六次大会某些假惺惺的“民主”外衣，赤裸裸地宣告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决心以美国提供的武器来大规模地进攻共产党，发动内战。

蒋介石的行动，实际上在陈诚谈话之前已经开始了。

三月下旬，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已经进入湖南，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正在湘鄂赣边开辟敌后根据地。这些地区在日军进攻时，因蒋介石“自卫”不住而丢给了日本人，而当湖南人民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准备反攻日寇时，蒋介石却出来“自卫”了。四月初，蒋命令薛岳、王陵基集中了四个正规军，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共六

万兵力，企图乘抗日救国军立足未稳时，一举歼灭之，大有内战时期发动“围剿”的架势。整个四月，湘北战斗方酣。五月四日，毛泽东电示王震：“顽军现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如何机动呢？一是“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一是酌情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但作为“南北枢纽”的湘鄂赣根据地“必需创立”。^{②③}

五月十六日，七大主席团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增派尚在延安的三五九旅后梯队为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延安警备旅一部为第三支队，由张启龙、刘转连和雷经天、文年生分别率领，任务是经湘鄂赣边待机去湘粤桂边，在南方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扩大华南的新局面，预定队伍于二十九日集中。

六月十二日，七大闭幕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彭真，在枣园召集南下部队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南下的主要方向是粤汉路，与东江的北上队伍会合，战略方针还是集中、分散。困难的时候分散，发动群众也要分散；打仗就要集中兵力，以多胜少。

任弼时说：“任务和王震一样，还是筑堤挡水。目前主要对付日寇，日寇消灭了，武装制止内战，对付蒋介石。三种地区：根据地，活动区，武工队区。要

由华北到广东东江接成南北的长蛇阵。”

毛泽东当即说：长蛇阵好，但也要准备接不上。首先接头尾，头在东江，尾在鄂南。现王震他们尾巴已经接上了，你们要接头部，南方有了头才能制止蒋介石内战。王首道已经建立了湘鄂边党委会，是很大的胜利，王震可以去湘赣边建立根据地，作为腰，你们就作头。如此就可以有湘鄂、湘赣、湘粤、广东四块敌后根据地，广西、湘西南还可以组织武工队。

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彭真相继发言之后，任弼时嘱咐南下的同志说：“队伍到湖南，大家一定要顾全大局，团结在以王首道、王震为中心的领导下，这个中心又须服从郑位三和李先念。”到湘粤边的第三支队，“要团结在雷经天、文年生为中心的领导下”。他谆谆告诫：

“你们要尊重当地干部，他们的资格比你们嫩，但他们在本地打了六七年仗，有了更现实的资格。有了方针，加以领导上的团结，和气生财，就能够完成任务。你们一去要设法诱敌，抓住其弱点，打个把胜仗，群众才易发动，财政才易解决。队伍不要发展得太快，要在财政上、枪支上有办法的条件下逐渐扩大。”

朱德也关照说：“能得人心者为英雄，一个光棍

十个帮衬，不能懒也不能忙，按照环境切实去做，到各处去训练干部。山山有美玉，处处出贤人！”

接着，会议通过了由任弼时提议的湘粤赣军政委员名单，共十八人组成，雷经天、文年生、莫文骅、陶铸、卢绍武、欧阳家祥、黄良、伍晋南八人为常委。^{②7}

中共湖南省委的成员，中央已于五月十六日决定，同意王首道和王震的提议，由王首道、王震、王恩茂、刘型、聂鸿钧、谭余保、张启龙等组成，另加第二、第三游击支队的晏福生、雷经天、文年生和冼恒汉；中共湘鄂边党委属湖南省委，由张启龙负责。^{②8}

六月十九日下午，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举行。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会议的临时主席。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为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在全党最爱戴的五位书记中，四十一岁的任弼时是年龄最轻的，但是，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诊断，他已经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灶，因此时常出现头疼。他坚持着工作。

三十二、保卫胜利果实， 制止反共内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随着，苏军从双城子到赤塔分四路进入我国东三省。中共中央估计，在同盟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日本投降已无可避免，“伟大的历史突变”即将到来。中共中央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迎接反攻，在战略上是有所准备的，但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则是出乎意料的。

九日下午，任弼时主持召开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七大委托定稿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会议的中心集中到反攻日寇、制止内战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对时局概括为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四个问题，请大家讨论。

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浴血奋战，抗

击着百分之六十九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建立了十九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中流砥柱。但是大家深知，要使抗战胜利的成果保持在人民手中，面临着和蒋介石集团一场严重的斗争。因此，提出在对日反攻中要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等。毛泽东说：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要广泛发动向日寇的进攻，扩大力量，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取之于敌伪，壮大自己，然后回头来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南方筑“堤”也已做了；当前要力争华北，力争太原和陇海路东段地区，水东地区^①。时机不同了，这样做战略上没有错误，不要怕冒险。

十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向同盟国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向同盟国投降。消息传到延安，山城轰动，锣鼓、唢呐，从王家坪、桥儿沟、杜甫川涌向南关新市场，入晚，游行队伍的火炬像无数条火龙，从山沟里蜿蜒向延安市区汇游，火树银花，蔚为壮观。

形势的剧变，改变了延安和整个解放区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方式，因为一旦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八路军和新四军理所当然地要作为胜利者，在自己的作战区域内，令各敌伪军投降，进占大小城市和

交通要道，并制止反共内战的发生。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日夜繁忙，部署力量，起草文电。毛泽东把办公地点由窑洞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公务，一面接待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领导人和将领。任弼时虽然经常出现由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眩，但是，迎接胜利的喜悦和旺盛的斗志抑制着正在慢性发展的病情。为了部署力量，避免临事仓卒，八月十日，他为中共中央一连起草了几份重要电报，向全党发出应变指示：

一是指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一旦日本投降，新四军立即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由第二师担任夺取蚌埠至浦口之线；第四师夺取徐州，第三师集中津浦线共同担任夺取津浦线并巩固其占领，兵力至少十万至十五万人；由第一、第六两师及苏南、苏中部队夺取上海南京之线，浙东部队担任沪杭甬之线，第七师夺取芜湖。兵力至少七万人；新四军五师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同时，“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湖北省主席和武汉市长由五师发表。^②

二是指示各中央局、分局转各区党委，动员一切力量，布置“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今日军缴械投降，伪军立即

1945 年 8 月 10 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关于
日本投降后的行动指示电手迹

接受改编。如国民党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③

三是指示中共河南区党委，“放手扩大地方，相机占领平汉线、陇海线，夺取武器，发动群众，坚持河南，迅速打通五师与水东，配合八路军夺取全华北”，在蒋介石军队东进与北犯时，应积极袭击侧翼，迟滞蒋军向华北解放区进犯。^④

十日深夜，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号命令：着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日军，“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一切伪军及伪政权“率队反正，听候编遣”。

十一日，总部又发出六道命令：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诗、万毅和八路军驻冀热辽边区李运昌所部，分别从山海关至张家口以北沿长城内外线，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和外蒙军作战，接受日伪投降。贺龙、聂荣臻所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向北推进，并由贺龙统一指挥在山西的八路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日伪军，从日伪军手中夺占太原等城。同一天，任弼时又为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并鄂豫皖区党委电：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边中央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现五师活动范围内之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在中央局书记徐向前因病未到职前，由副书记

郑位三代理书记。^⑤

令出军行。十二日清晨五时，八路军延安总部战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雄师百万，整装出动，向华北、华中、华南所有城镇及交通要道两侧大举进攻，贺龙、聂荣臻、吕正操、李运昌所部，分头向绥、察、热、辽、吉迅速进军，挺进三十至八十里不等，李运昌部前锋已楔入东北，军行所至，群情振奋。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也下了三道命令，要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制人民军队受降；而对解放区的人民武装，则下令“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发言人，竟然公开指责八路军延安总部的命令是“唐突和非法之行为”。延安总部为此严词驳斥，指出蒋介石给八路军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一面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一面督促各部坚决向敌伪占领地区进军。十九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拟电，指示中共晋察冀分局：“你们立即注意乘红军扫除察热之敌后，应派遣必要兵力和干部，向察北、热北通外蒙之大小道路开展我之工作，并巩固其交通是有特别意义”。^⑥

为什么蒋介石敢于对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下令不

得“擅自行动”呢？除了他“反攻和反共同时进行”的迫切心情外，原因有二：一是仗着美国人的支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向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称：日军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盟军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则下令：在华日军不准向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缴械。二是中苏同盟条约已达成协议，即将签字，苏联允诺“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上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赫尔利因此报告美国国务院，“我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但是，得意忘形的美蒋都忘记了一个客观事实：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抗战有功，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军民守土有力，日寇所占的城镇、交通线及沿海口岸，大部分在人民力量的包围之中，盘踞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仅仅凭借“正统地位”，想独吞胜利果实，不但人民不依，而且他的力量也办不到。这一点，连上台不久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感到焦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蒋介石“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

能”。^⑦这就迫使蒋改变策略，作出和平姿态，于八月十四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同时，立即致电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二十日，二十三日又两电催毛成行。

对于蒋介石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时机，调兵遣将部署反共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洞若观火，但是，经过八年战火的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满目疮痍的国家需要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有鉴于此，从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接连召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一是发布《中共中央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团结、民主的总口号。二是鉴于美国对蒋的支持和中苏条约的限制，人民的武装力量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战后中国的局面一定时期内，可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这就是任弼时在七大的书面发言中预计的三种联合政府的形式之一。毛泽东说，这个弯路将使我党在各方面更加成熟，人民更加觉悟。三是蒋介石灭共的方针不会变，但他兵力分散，内部矛盾甚多，国内外舆论有所制约，短期内他不可能公开发动全面内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我方愿作出不伤害根本利益的让步。其中第一批准备让出从广东到河南（不包括黄河以北）的地区，第二批是长江以南地区，第三批是长江以北地区，但在陇

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占优势。东北三省按中苏条约的规定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派军队去则要视情况来作部署。四是为了取得全部主动，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去重庆谈判。毛泽东提议，在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他的职务，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在延安建立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陈云、彭真五人组成的领导核心。毛强调说：党的领导核心还是在延安，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至于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担忧，毛说，可以设想，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有力量，民心向我，蒋有困难，又有国际力量制约，有了这些，谈判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⑧

八月二十八日中午，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组成的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当飞机在延安东门外机场腾空而起时，任弼时和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团体的代表们，目送自己的领袖向重庆飞去时，大家内心里充满着期待、祝福和难于排除的担忧……。

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后，任弼时等以刘少奇为核心，肩负重任，兢兢业业地为配合重庆谈判努力工

作，首要一着是大力派干部去东三省开辟工作。在七大期间，任弼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中，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以为应当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获得胜利，至少也要争取在黄河以北（包括东北、陕北）能够获得我们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实现，将来再走到全国的胜利”，“如能避免内战，这种过渡局面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利的，而且若有五年十年的休战状况更为有利”。他认为这种形势是可能的，但是国民党是惧怕的，因此“也可能经过局部内战之后，达到休战分治局面”。^⑨毛泽东则说：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因为现有的根据地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⑩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延安的东北籍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调集，在一星期之内组成去东北的干部团，其中包括由连一级到旅一级的军政干部，随吕正操、林枫进入东北工作。二十九日，任弼时又为书记处拟电，指示中共山东分局，由胶东派出一批干部，经海道去东北开辟工作，用各种式样和名称展开活动，创造力量。电中嘱咐：“不必去找红军指挥机关正式接洽，因为他们受条约限制，是不会正式与我们有什么接洽的。南满各市，红军也不会交我们接管”，但非正式的接洽是

可以的；“你们要注意在红军不到达的县镇和农村中去开辟工作（大城市可派少数人去作群众工作）。建立起来的武装，可用义勇军或东北（自治）军名义；群众团体，可用工会、农协或其它通俗名称均可”。^①九月二日，中央军委空军组又派出第一批航空干部王弼、吴凯等，乘坐从汪伪空军起义的“建国号”飞机去张家口，然后进入东北，筹建航空队。

到八月底，各解放区按中央指示派赴东北的干部纷纷组织出动：

延安的东北籍干部团和另两个团整装待发；

晋绥军区派出准备组建十个团的连以上干部四百余人，随吕正操、林枫开赴东北；

晋察冀军区从冀晋、冀察、冀热辽分区派部队，抽调干部，分赴绥东、察北及热辽边区开辟工作；

山东的万毅支队四千余人向热河边境进发，相机进入东北；

而李运昌所部以部分兵力分三路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并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向沈阳、辽南、辽东等地发展。

在这些日子里，任弼时忙于出席会议，起草文电，还分别和奉命离开延安的干部谈话。褚志远是东北籍干部，一九四〇年从莫斯科学学习返回延安后，在延安市青年救国联合会担任宣传部长，这次由中组

部抽调，夫妇俩携不满两岁的孩子赴家乡开辟工作。临出发前，他到枣园去向任弼时辞行。褚志远回忆道：任弼时和蔼可亲地询问了情况后说：你和萧梦带着孩子行军不方便，去东北的路程很远，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我们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褚志远说：他们夫妇编入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那是一个家属中队，必须带着孩子化装进入东北。任弼时接着就问：有牲口吗？有什么困难？发现褚志远不肯提要求，任弼时诚挚地说：“咱们都是一无所有，我知道困难是很多的。好吧，我给你写个条，到中央办公厅找赖际发同志，让他批你一点钱”。随着，任写条请赖拨给银元三十块。写到这里，他停下笔来又问：“还需要什么物品吗？”当褚志远提到一个“烟”字时，任弼时哈哈笑了，立即又添上一笔：“请再给一大包好烟”。任弼时把批条交给褚志远时说：“青年人最好不吸烟，当然，这次行军路程远，少吸一点也可以，但要节制。”半晌，任弼时谆谆地嘱咐：“你十年没有回老家了，到家乡后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威望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接着又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东北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还很复杂。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苦，还要保持延安的生活、工作作

风，和党的光荣传统，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九月九日，褚志远和萧梦夫妇带着孩子依依离开了延安。^⑫

九月上旬，任弼时召集中央青委的冯文彬、蒋南翔和宋一平等谈话，要中央青委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辟工作。蒋南翔回忆道：

“他作了这样指示：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象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东北这个地方很重要，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他还说：过去我们是在乡村，这回到东北，有可能进入一些城市，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先进青年组织”。^⑬

这次谈话后，中央青委组织了九十多人的青年工作队，由蒋南翔、宋一平率领于十月十一日从延安出发，经三个多月的徒步跋涉，到达冰天雪地、战火纷飞的东北。第二年八月，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在哈尔滨市诞生，这是东北光复后最早建立起来的革命青年组织。

与青年工作队同时出发的还有第二批去东北的航空干部常乾坤、刘玉堤等十余人。刘少奇和任弼时当面向他们交代了任务。这时，东北已成立了三百余人的航空队，拥有日式飞机四十六架。

九月中，重庆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上。蒋介石对于谈判没有丝毫诚意。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刚刚抵达重庆，谈判的帷幕还没有拉开，国民党当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剿匪手本》。这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围剿”红军时编订的材料。不久，蒋密告各战区司令长官说，谈判是为了“窥测”中共的要求与目的，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①因此，在日寇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蒋已调运二十七个军，七十三个师的兵力，沿着平绥路、正太路和平汉路分为西路、中路和东路向解放区进犯，企图夺取华北，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分割解放区，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在东北方面，蒋介石虽然没有一兵一卒，但他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继续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兵，并先后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保安司令，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为了缩短

战线，集中兵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团密切配合，共同为保卫人民利益而奋斗。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准备作出有原则的让步：在军队数量上，提出按一比六的比例将中共的武装力量缩编到二十四个师，相当于原来要求四十八个师的一半；在军队驻地上，先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八个解放区；第二步，再让出苏北、皖北和豫北三个地区，而将所有的军队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大部分，绥远的小部分以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但是，蒋介石只答应编十二个师，双方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在给贺龙的电报中说：“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⑮望他们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在这个战略思想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民，率先向侵入晋东南地区（上党）的阎锡山部进行自卫反击。九月十日，上党战役打响，至十月六日，战斗告捷，歼敌主力十三个师，三万五千余人，一举消灭了阎锡山的三分之一兵力，显示了解放区军民的威力，直接对重庆谈判起了配合作用。晋察冀和晋绥的主力也着手准备在平绥路打傅作义部，阻止其东进。

正在这个时候，九月十四日上午，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沈阳飞到延安，走下来的是苏联后贝加尔湖军区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陪同前来的是新任沈阳市卫戍司令的曾克林。曾原是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负责人，日本投降后，和唐凯一起率四个团一千五百余人，作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挺进辽宁后，以“东北人民自治军”名义展开活动，九月六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他担任卫戍区司令。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来使。贝鲁罗索夫中校口头转达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正式通知，要点是：按照中苏条约，“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部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行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等。最后，中校转达：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⑩

任弼时立即为中央拟电将上述口头通知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请代表团的电台派人守候，以便当晚继续收报。

接着，政治局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的情况。晚饭后，政治局继续开会，集中研究对东北的战略决策。会议一直进行到十五日凌晨。参加会议的除三位书记、两位候补书记外，还有康生、林彪、高岗、博古、李富春、叶剑英和杨尚昆。会议认为东三省战略地位重要，北倚苏联，西接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面是朝鲜，三面都是友好邻邦，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而且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国民党虽有美国帮助海空运兵，但是他们“姗姗来迟”，我方控制东北，目前是最好时机。鉴于东北是蒋介石势所必争的要地，斗争复杂，会议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赶赴东北，在沈阳设立办事处。至于撤出单个部队问题，会议同意按中苏条约办理，一部分可转入附近农村。会上，张闻天、李富春等纷纷要求出去工作。

十五日，由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出面，将我方从沈阳、长春和大连撤军的决定答复来使，同时向他说明：地处热辽边境的平泉属于热河省，“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并向来使出示根据地的地图。^{①7}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

针，并告：重庆谈判无进展，“东北及热、察控制在我手中，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十七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即搭乘苏方的飞机和贝尔罗索夫中校及曾克林一起离开延安，到山海关后转乘火车奔赴沈阳。

这一天，任弼时对日本投降前奉命南下的八路军第一、第二、第三游击支队的行动作了新的部署：当时，王震，王首道所率的第一支队已进入粤北，任弼时以军委的名义，要他们迅速北返，渡过长江到新四军五师活动的鄂东地区会合行动。张启龙、文年生等所率的第二、第三支队，返回黄河以北，全部向东北转进。

在谈判桌上尖锐斗争、谈判桌外调兵遣将的氛围中，延安的领导中心为了抓住时机，创造从东北到华北的大的战略根据地，争取大的胜利，形成了一个战略决策，这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九月十七日二十三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致电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要旨是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冀东，屯重兵于冀东，以便十二月初苏军、蒙军撤退时掌握先机进入东北；巩固华北现有根据地，打击沿平绥、平

汉两路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实现这个计划，须“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冀热辽地区是战略要地，应设中央局，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同时决定再从延安各机关抽调各种干部一千三百人去东北，在延安的炮兵学校一千人左右亦开东北，在那里建立炮兵基地。由于大批领导干部离开延安，中央书记处只有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人，张闻天、李富春再走“则政治局留延者也是少数”，因此建议：“组织一特殊的中央领导机关主持全局。”^⑮

毛泽东、周恩来“完全同意”书记处提出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十九日中午复电：“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的人选，请书记处考虑；同时，“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⑯

一刻千金。当晚，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按照新的方针，重新部署兵力。会议决定从山东军区抽调六万兵力，三万去热河，三万去东北，要求十一、十二两月在冀东屯兵五万。四天之前，中央已决定从华

中、山东、晋察冀、晋冀鲁建军区调配一百个团的干部架子去东北，就地招兵十五万，连同冀东所屯集的五万兵力，在苏军撤退后挺进东北，届时东北的人民武装可达二十万人。会上，任弼时宣布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和冀热辽军区，由李富春、林彪、萧劲光、李运昌、程子华为中央局委员，李富春任书记；林彪为军区司令员。会后，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指示，同时指示华中局将浙东、苏南、皖中和皖南的部队北撤，“越快越好”。

这样，许多重要将领的任务和行止立即发生变化。本来，在七届一中全会后，八月二十五日，陈毅、林彪、萧劲光等一行已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去太行，陈毅回华中局，林彪、萧劲光准备就任山东军区正副司令员，这时，他们正由太行向冀鲁豫地区转进途中。根据新的部署，中央通知林、萧改去冀热辽，陈毅不回华中，取捷径去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而罗则率部去东北。

如果说，兵家捕捉战机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着，那么争取时间就是重要的保障，所谓兵贵神速。任弼时按新的方针在部署兵力时的工作作风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快和细。这时，东北局急迫需要一批中上层干部分布到各重要城市开辟工作，而奉命去东北的

部队和干部仅靠两条腿兼程行军仍感缓不济急。任弼时采取的办法是“将帅先行，大军随后”，九月十八日，他为书记处起草给贺龙、吕正操、林枫等的电中指出：掌握东北是“当前党的最大任务”，望林枫能从随军去东北的干部团中，和晋西北派赴东北的干部中“先挑选一、二百精壮而重要的中上级军政干部（老弱女不带），多配点牲口，兼程经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赶去东北；同时着已到绥远的吕正操迅速率一营兵力取捷径赶往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进入沈阳（部队停留在锦州），经沈阳卫戍司令曾克林转找彭真或陈云接头。“此间派彭绍辉即来绥，平绥战役后，原应随吕去东北之部队，即由彭绍辉率领，开赴东北与吕会合”。如此，吕正操和林枫所带的干部团中“精壮而重要的中上级军政干部”便可以尽快进入东北。

但是，从古北口或山海关前往东北的铁路是否通车呢？任弼时要总参谋部查明情况。当已经进入张家口的聂荣臻等报告说“从承德经山海关至沈阳均通车”时，任弼时又提出三个细节，批示“再电问”：“一、我武装人员是否可乘车；二、乘车是否买票；三、由承德至沈阳几日？”人们记得：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常常是用尺子量地图直线来指挥部队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李德要任

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去贵州印江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师，但当时红三军根本没有占领印江，而李德对印江在乌江以东还是以西也没有搞清楚。正因为吃过瞎指挥的苦头，所以任弼时养成了一丝不苟的精细作风。

在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的一周内，书记处除了调兵遣将外，还形成了两项重要指示：一是要各中央局及区党委，在十月至十二月的三个月内，扩兵数十万人；二是要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晋绥和华中等战略区，集中本战区内脱离生产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编组成旅和纵队，“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这种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是能够调离本战区到其它区域作战的野战军。

经过一周的高强度工作，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估计“在一个月內我可在冀东集中八万到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在两个月之后有把握进行作战”。^{②①}任弼时在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了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中国革命提早若干年成功；掌握不了，可能延迟若干年”。“只要掌握东北，别的地方失掉一些也没有什么”。任弼时估计，国际形势不会有大的变化，美国“也不会大帮国民党打内战，今天

的问题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力量竞赛。”^{②①}毛泽东后来说：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动军队！

十月十日，也就是晋冀鲁豫军民上党自卫战役告捷的第四天，国共两党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历时四十三天的重庆谈判，在和平建国，避免内战，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以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对军队的数量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问题，双方各持己见，留待以后协商。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回到延安。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讲到会谈纪要时说：这个东西，第一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②②}

十月十二日，国共双方公布《会谈纪要》。谁知第二天，蒋介石向各战区长官发出密令。这道密令弃纪要中“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两党“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等承诺于不顾，撕下假面具，诬共产党为“奸匪”，命令部下照他所订的手本“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连最起码的信义都不讲。于是半月内，八十万国民党军南起广东、北至察哈尔向广大解放区进攻，平汉路上，胡宗南、孙连仲以二十万之众，配合敌伪军汹涌北上；平绥路上，傅作义的六万军进

攻张家口，企图夺取华北，进占北平。这样，中华大地上，和平建国的希望蒙上严重的暗影，华北和东北成为人民保卫和平争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战略中心。

先说华北。为了打击蒋军的进犯，十月十八日，聂荣臻、贺龙率晋察冀和晋绥军民，奉命反击，在平绥战役中，歼灭傅作义所部一万二千余人，打破了蒋军控制平绥铁路的企图；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军民发动邯郸战役，歼敌四万余，俘敌二万余。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方针，率新编第八军一个军和一个纵队近万人在邯郸附近的马头镇宣布起义，打击了蒋介石进攻华北解放区的反动气焰。

高树勋部起义后，其家属留在西安的有三百余人。十一月三日，任弼时即致电中共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我们已电渝办汇款一千五百万元，交你接收”，用来接济高树勋部的家属和被捕人员。

平绥战役后，傅作义部全线西撤，退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绥远、察哈尔两省分属的蒙古族人民居住处联成一片，为了统一察蒙、绥蒙地区的工作，统筹安排民族干部，聂荣臻、乌兰夫等根据蒙族人民的要求，向中央请示，准备实行内蒙古自治，组织内蒙人民解放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委托任弼时和高岗研究提出方案。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向晋察冀中央

局和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是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古人民的地方自治运动，“在乌盟、锡盟等纯粹蒙古区域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权的形式出现”，“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应有统一领导与政策”，并且提出“借供参考”的工作意见：

“1. 在扩大各阶层蒙人中揭发历史上国民党及日本欺骗与统制内蒙的罪行，消除蒙人对国民党的幻想。

2. 对德王、李守信一派，应采打击、分化与孤立政策，德王已去重庆，应迅速消灭其影响，防止将来国民党利用其活动。对过去反德王及不与德王合作的上层分子，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政府，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少限度。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渐改造。

3. 各盟旗自治政府，目前可进行以下工作，如颁布简明纲领，建立地方武装，提拔与培养当

地蒙古干部，检举蒙奸，举办有利蒙民的各对文化、经济及社会公益等建设事业。

4. 我军必须保持良好纪律，尊重蒙人风俗习惯，绝不随意夺取蒙人的财物、牛羊和触犯蒙人的禁忌。应由乌兰夫同志负责拟定我军入蒙区及对蒙人的纪律及必需注意的事项数则，以资遵守。扶植蒙人的进步力量，一切处治蒙奸、没收主要蒙奸财物等工作，须发动蒙人自己进行”。^{②③}

指示还规定察绥两省蒙人区的工作统一领导，“大的方针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实行由晋察冀中央局及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委托乌兰夫负责与晋察冀、晋绥两局联系，“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蒙族干部“应统一由乌兰夫分配”等。这项指示，奠定了内蒙工作的发展基础。

再说东北。

自从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确定后，罗荣桓率山东军区主力六万余人，黄克诚率新四军三万五千余人，先后出动，三五九旅南下第二游击支队张启龙、刘转连、晏福生所部约三千人，第三游击支队文年生所部约三千人，回师黄河以北，开赴东北，于十月下旬两部分别进入本溪、抚顺和锦州地区。到十一月底，大军十一万，干部两万，陆续到达。

干部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十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人。十一月四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宣告成立，中央决定：林彪为东北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萧劲光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十六日，成立以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等为委员的中共北满分局，以巩固东三省的后方，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大连、安东、辽北先后成立民主政府。

十一月十二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提出：苏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可以提出自治的口号，成立东北自治联合会。十一月二十二日，东北局原定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三百人已集中沈阳，准备通过代表会议，发布宣言，成立半政权半群众性的东北人民自治联合会，以资号召。但形势突变，会议搁浅。

这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十月十三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到达长春，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洽谈蒋军两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问题，后见中共方面势大，又有加派三个军的计划，苏方已允许国民党这几个军十月底在两地登陆，十一月初进至锦州、海城一线，二十日进至沈阳。同时，美蒋结合向苏联展开外交攻势。由于

中苏条约限制，苏方不能不将东北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蒋介石派人接收，苏军原定十二月三日撤退完毕，因蒋要求延期一个月。为了维护苏联的国际信誉，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大城市已无可能，必须改变方针和策略，令入满的部队撤出长春路沿线及苏军占领的大城市，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积蓄力量，将来转入反攻。于是，已经召集的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停开，所拟宣言不公开发表，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建立城市的秘密领导机关与组织，将军队、政权和已经公开身份而在大城市不能立足的干部，迅速撤出，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留下的干部，利用合法形式广泛活动。

十二月十日，任弼时为书记处起草致东北局书记电，指出：

“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大城市和红军撤出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势难避免，但双方都无足以击败对方的力量，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

“我们在东北宣传政策上要照顾到上述情况，不是表示完全拒绝国民党进东北，而是要求

民主，实行地方自治，并主张建立地方联合政府，在东北乡、县、省市都要实行民选；要求改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要求取消行营，设立各党派参加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要求八路军也有驻东北之权；保障东北经济力量不用于内战等作为施政主张”。

从此，东北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个多月来，为了制止内战，保卫人民利益，任弼时奋不顾身地日夜工作，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十二月初，毛泽东主席请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为在延安的负责同志检查身体，不久，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还算健康，唯有任弼时一人堪虑。他脑血管硬化，影响到双目视力，这不是好兆头，表明他的病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毛泽东听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沉默表示对战友和助手健康的担忧！^{②①}

三十三、全面内战前夕

任弼时曾经说过：要蒋介石反动集团赞成和实现联合政府，除非“是在外部影响援助之下，内部民主势力抬头，反动集团完全孤立。”^①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国大地和平、民主的奇葩象昙花般地一现，这是任弼时所说的各种条件暂时交汇的结果。

在中国人民武装奋起自卫的三个月中，蒋介石夺取华北、独占东北、分割压缩解放区的目标没有达到，而撕毁“双十协定”，逆民主潮流而动的面目却暴露无遗。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则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五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八万；在关内，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建立了三支野战军，新四军调整部署后，建立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豫西南下的部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在江淮河汉间建立中原军区。特别是经过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徐州至济南

段)几次战役后,共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十一万多人,解放区的面积达二百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拥有
人口一亿四千多万,中小城市五百零六座。

这个事实不但教训了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蒋介石,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国民党“绝对没有可能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反而“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②。因此,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另辟蹊径,企图运用政治手段,迫使蒋接受某些民主措施,以换取中共的武装力量,实现“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战略目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声明,任命刚刚举行过退休仪式的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替代因采用“扶蒋反共”的办法调处失败而成为中美舆论界众矢之的的赫尔利。与此同时,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呼吁:“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必须广泛地由民主分子参加,并且内战必须停止”。^③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十二月二十一日,被称为“和平使者”的马歇尔到达上海,二十七日,国共谈判在重庆恢复。一个多月后,国共双方在谈判中互有让步,为中国的局势带来了生机:

一是有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委员会,于一月十日签订《国共双方关

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为实行停战协定，三人委员会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当天，国共双方各自向武装部队下达命令：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共两党十八年的武力冲突倏而停止，三人委员会俨然是“联合统帅部”。

二是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会议经三周的激烈争论，终于就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问题、军事问题、召开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草案等五项达成协议。由于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和平民主大业，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在文本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

如果蒋介石切实履行协议，那么战后中国的历史将掀开和平民主的新篇章。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

停战令下达的第二天，一月十四日，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政治委员郑位三致电中共中央：“光山县城今日已失，刘峙^①之先遣队已接触，后面有几个师未作停止，我军数万人处在经扶、光山、罗山和礼山（今大悟县）四县间之狭小地区，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年关迫近，地方上更不便筹粮、筹款，

因此不仅提议中央送钱给我们，并提议中央用种种方法早使我处得到停战”。^⑤

中原军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南临武汉三镇，北迄陇海路南的许昌、洛阳，东接合肥、安庆，西连湖北襄樊和河南的南阳，拥有八百万人口，部队六万；平汉铁路纵贯南北，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分区。由于这个地区是蒋军出川的大门，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开始，蒋介石就调集四个战区的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人，在刘峙统一指挥下，沿平汉路南犯，把中原军区分割为二，然后分区“围剿”：胡宗南分兵一部从西北沿陇海路南侧东进；顾祝同向鄂中、鄂东及大别山区合击；薛岳所部封锁长江，防我南渡。近两个月来，顽军先后占江汉军分区和河南军分区豫中、豫南大部分地区，鄂东分区也严重缩小，到停战令下达前，中原部队已被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停战待命。

为什么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第二天刘峙竟敢继续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呢？原来十日那天，蒋介石明里要中央社广播停战命令，暗中却下了一道命令，要各军尽量秘密制控军事要地，“以免共军利用之”。^⑥

接到中原军区的告急电后，任弼时受中央委托，立即致电周恩来，设法与北平军调部交涉停战，同时积极筹款接济。十六日，中央电复中原军区，“已电

华中、太行为你们筹款带北平转你们，最近飞机接你们代表时，可能带三、五千万（元）给你们”。^⑦当时，大米的市价每斤法币一百三十元，六万部队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就需款八百万元，三、五千万元至多能维持一周。所以，二十二日，军区又来电：年关在迩，无米为炊，万万形势，生活危险之至。为了救急，任弼时紧急向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凑集法币，得二千万法币。第二天，他电告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并转中原军区：“五师^⑧供给异常困难，此间曾电华中、太行筹款送平转送五师；陕甘宁也由赖祖烈带来约二千万法币给五师，请交涉派机，在旧历年前送一次款去（至少五千万）”。^⑨

这时，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中，重庆各界人士为关心和平民主大业，每天晚上邀请政协代表在沧白堂演讲。十六日晚，郭沫若、张东荪演讲时，国民党特务起哄捣乱，演讲被迫中断。十七、十八、十九的演讲会上，特务变本加厉地在会场放鞭炮，掷石块，甚至大打出手。二十六日，竟然非法搜查中国民主同盟的政协代表黄炎培、张申府的住宅。

尽管马歇尔兴奋地向杜鲁门报告说：“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进行的很好，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基础”。^⑩但是，蒋介石的密令，刘峙向中原军区的蚕食挑衅，光天化日

下特务的横行，不能不使任弼时凭添几分担忧和保持高度警惕。

一月二十八日，政治协商会议行将闭幕，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汇报，并商议提出参加政府和宪法审议委员会的人选名单。当周恩来谈到东北问题时，任弼时思考着一个问题：依据谈判纪要，国民党军开入东北及在东北境内调动不受限制，但双方默契，国方在东北“不得驻兵过多”。任弼时因此说：“兵力限制能办到吗？”^①这就是说，倘若国民党借口接收东北主权，大量运兵入东北，进犯东北民主联军的驻地，军事冲突仍将不可避免。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还是协商好，可以由军调部先派一个考察组去。

二月二日，任弼时出席书记处会议，听取在军调部工作的饶漱石和参加军调执行小组的谭震林、王震等的汇报。当谈到中原军区面临的困境时，任弼时说：“中原军区因地域缩小，且被铁路和公路分割开，现最大的区南北百十多里，东西数十里，周围有顽军主力约十万，所以粮食极为困难，现靠借米维持。国民党税收机关林立，百姓极为困苦。我们的队伍最苦是两个纵队，师长^②的意见，今后只留下万把人，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王戴部^③可以调开。现在的问题是和平可靠不可靠？部队调动会不会出现第二次‘皖南

事变’？”^⑪有的人说：可能性是有的，但和平也是可靠的。至于部队怎么转移法，任弼时主张：为了恪守协议，不给国民党以口实，“最好是经过交涉，合法地走，否则对留下的队伍特别不利。”

任弼时的耽心并不是多余的。二月十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闭幕的万人大会，国民党特务竟然殴打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二十日，国民党特务又纠集一群暴徒，闯入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办公室，殴打工作人员；二十二日，国特在重庆发动反苏游行，组织暴徒捣毁《新华日报》馆。为此，二十四日，任弼时电告中共西安办事处的周子健，“你处应有所准备，以防他们捣乱西办；文件密码和存款须即妥善处理。”

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形成后，党的工作局面扩大了。除了派人参加北平军调部外，国民政府定五月五日还都南京，中共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将移往南京，上海也要设立中共公开的办事处，创办英文的《新华周报》，《群众》杂志也将迁到上海；香港的中共办事处还要增设统一战线和华侨事务的办事机构；北平要创办《解放报》，香港《华商报》需要定期补贴经费，特别是在中原的六万部队，国民党对转移问题一拖再拖，企图在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双

管齐下的恶毒手段下，加重其困难，伺机歼灭。中央不得不持续筹款接济。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增加了中央的财政开支。各解放区虽然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一些逆产，但部队整编复员需要巨款。在军队整编完成前，国民政府仍然不发一文饷金，因此，各地财政都很拮据。拿陕甘宁边区来说，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今年财政正规收入只及要支出的十分之二（照预算，实际恐还不及此）”。^⑮摆在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面前的一大难题是筹款理财。重任在肩，他按轻重缓急，统筹调度。于是，延安和重庆、北平及各解放区之间，函电往还，多方筹措：

一月中，重庆派人到延安，向中央要求在短期内筹集十几亿法币。十四日，任弼时电告周恩来：由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及晋西北解放区，各“负担国区工作经费每月九千万元”，华中每月四千万元，合计每月四亿元。三月，重庆又提交了在香港设办事处的预算，十五日，任弼时在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电中说：“各解放区财政均叫困难，赤字很大”，所需预算只能令华中分局每月追加一亿元寄上海，“另电商华中拨出一批食盐和物资”给上海充作经费；再由延安另设法筹集，其数“不会超过两万万”。电中还说：“你们上半年能支配的暂只此数”，“请你们注意，在审核批准每一项预算时，须尽量缩减一切

不急需、能缓办的用费，更须防止各地铺张浪费（特别在设公开机关时），提倡我党素有之刻苦朴素作风”。^{①⑥}

北平方面：三月中，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人员需要制作夏装；二十二日，钱俊瑞、姜君辰、周扬等为创办《解放报》三日刊，需要开办费和日常经费，“最近即需一万万五千万之谱”，^{①⑦}叶剑英、饶漱石还提议将《解放报》改出日报。就开展宣传工作来说，这是非常需要的，但财政拮据，实在力不从心，任弼时和朱德商量后，电复叶、饶并告钱俊瑞，“……目前筹款相当困难，而各方所需紧急。因此，北平《解放报》暂不必以大报规模出现，而且各种费用应力求节省”。^{①⑧}任弼时是精细的，钱俊瑞等来信说：报社“每月经常费三千五百万元”，任弼时在此批注：“应除（去）一千×百万元收入”，含意是报纸发行后每月的报费收入应从经常费中扣除。最后核定拨给开办费八千万到一亿元，经常费用中扣除收入部分，经与聂荣臻商定由晋察冀中央局支付。至于报社所需电台、编辑、营业和会计人员，以及资料，任弼时立即从延安抽调，及时派送。

唯有五师所需，任弼时有求必应。三月十四日，部队有一万六千人已全无粮吃，如不及时转移，每月需粮款五亿元，不然，军民争食，如来电所说：“关

系恶化，军心不稳”。为救燃眉之急，当天，任弼时为中央草拟《关于给五师筹款给各地指示》电，电中说：“五师地区共有脱离生产人员八万”，虽多次向国方提出主力转移到苏北或华北，但“国方故意拖延，现在该部财政已到山穷水尽，十分困难境地”，除已筹款一亿七千万元接济外，要求各地“半月内接济四万万四千万”；^⑩一个月后，根据中央指示，中原部队复员二万人，主力转移，因此需中央拨款十亿元。鉴于形势日紧，部队随时有遭国民党军袭击的危险，任弼时致电重庆和北平，将中央存在两地的款项先行垫付。五月一日，电告北平军调部叶剑英、赖祖烈：款项“争取三日内用飞机送去，并最好能在宣化店用降落伞投下，否则恐来不及”。^⑪

为了筹措经费，任弼时曾批准周子健的建议，挤出一千万元向当地某进步商人的商行投资，以所得利润或股息来支付西安办事处的日常开支；又告诉谭震林，用同样的办法，以一部分物资委托可靠的商人经营，以求弥补财政，他为革命理财，真可谓千方百计，呕心沥血。

这时，各地民主运动高涨，在各方舆论压力和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奔走相助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陆续释放一部分被捕的知名人士。三月四日下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陪同

下，回到中共重庆办事处的驻地红岩村。叶挺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加入共产党的，一九二七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左”倾领导人不公正的责难和冷遇，脱离组织侨居海外。抗战爆发后，他怀着民族大义，出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不幸身陷囹圄，被国民党顽固派囚禁于上饶集中营，后来辗转被囚于广西桂林和湖北恩施。抗战胜利后，押至重庆，失去自由达五年之久。出狱后，叶挺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共产党”。^{②1}两天后，三月七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草拟复电，同意接受叶挺入党，并请示毛泽东，复电可由新华社公开发表。毛主张将来来电当晚由新华社广播。第二天，延安《解放日报》以“中国人民的光荣，叶挺军长加入中共”为题，发布头版头条新闻。中共中央的复电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三月七日”

从此，行年半百，身陷缱绻五载的一代名将，回到了党的怀抱。叶挺当天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的信中恳切地写道：

“……在我的自传尚未写完得到此宣示，其愉快可知。……今晨写此信时，我的热泪不时泛起，不可抑止。我分析这种眼泪的成分，首先是感激与喜悦的，再则是痛苦和郁闷的，它们并泻并交流，结束我的过去，开展我的新生！但我自知，痛感自己过去所获的浅薄知识，决不足以应付中国复杂的局面。就目前而论，不问党把我放在任何岗位，我都不敢自信的。如何学习，补其空虚或不足之处，尚祈考虑指示为幸！我噙着眼泪写这封信，一则表示感激党中央对我的殊遇，再则请求帮助我解决学习问题。至于我的最后一部分自传，当即赶写奉上。我很高兴，从此之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②

信的落款署名“姚尔觉”，即叶挺原名，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晨”。

释放政治犯，本来是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信誓旦旦的“四项诺言”之一，但是，叶挺出狱后，当时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竟然有人攻击邵力子，先是说他“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三

月六日，CC 分子甚至要求开除邵力子等四人的党籍，理由是对国民党“不忠心”。^②这就足以说明国民党内蓄意破坏政协协议的法西斯残余分子大有人在，这也就是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之后，肆无忌惮地公开撕毁政协协议的重要背景。

令人痛惜的是一个月后，四月八日，叶挺偕夫人及男女二公子，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博古），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等一行十三人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时，因气候恶劣，在山西兴县东南一百一十华里的黑茶山，突遇空难，全机连同美国的驾驶员等共十七人无一生还！黑茶山海拔二千余米，三十华里方圆内渺无人烟，因此查找三日，至十一日才发现出事地点。噩耗传来，十三日，延安成立“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十五人为主席团。十八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到延安东门外飞机场和一万多干部群众一起，哀迎“四八烈士”们的遗体。在一片哀悼声中，由任弼时、蔡畅、杨尚昆等亲自主持遗体入殓。十九日，风沙弥漫，延安三万多干部和群众，隆重追悼和公葬烈士。毛泽东为此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任弼时题词：“你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一九四一年，叶挺被捕时，周恩来悲愤交集，曾

在《新华日报》赋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如今，和平、民主大业在风雨飘摇中，关内关外，同室操戈的战火愈演愈烈，而一代名将竟长眠于西北高原的黄土垅中，成为千古憾事，中共中央的复电竟成了叶挺将军的墓志铭！

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停战协议的事实首先是在东北问题上。三月中，苏军撤离东北时，美军已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进五个军的兵力，国民党因此以沈阳为中心，从东南北三面向东北民主联军展开“扇面攻势”，三月三十一日，马歇尔又答应为国民党再运兵五万，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共达十一个军，超过了整军方案的规定。马歇尔此举，无异是为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冒险火上加油。此时此刻，他已经抛开了有限的“公正”而步入赫尔利“扶蒋反共”的后尘。关内呢？自停战协定后到五月，蒋介石调动四十二个军一百一十八个师的一百三十万兵力，开赴内战前线，向解放区频繁挑衅和骚扰，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三月十五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时局和对策，讨论了整军复员计划，和解决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蒋介石有两条主张，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

之；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他又说：我们的方针，七大讲了。凡是起风波，就翻出来看看。资产阶级稍微放一下长线，有人就会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校场口事件一来，人们又记得了。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指出：要严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挑衅，华北、华中各地在军事上应作好准备，有步骤地抓紧整军复员工作，以精简机构，减少财政支出，但整军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同时要抓紧推动“减租、生产两件大事”，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②1}

会议讨论减租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时，任弼时说：华北和华中各地农村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如果按照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目前运动中许多地方妨害了中农利益，对富农和中小地主斗争过火，是“左”了；但是群众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若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又右了，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中央是否批准。他主张，在彻底减租清算的名义下，克服某些过火斗争现象，争取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对于巩固解放区是一个重要步骤”。康生说：老解放区，土地问题一九四三年就着手解决，日寇投降前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新区约有三分之一地方也已解决，但是有偏向，这是一个极大的问

题，是否批准农民的要求，要仔细考虑。最后，毛泽东说：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民不聊生。这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⑤

会后，任弼时和各解放区来的负责人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一起座谈调整土地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说：抗战期间，我们在土地问题上让了一大步，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根据这个精神，任弼时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情况。翻开至今保存的笔记本，任弼时记录了大量的情况，其中包括二千九百四十六户土地占有的数据，分析了阶级关系；又研究了十一个村子的七百四十六户，经过减租减息后经济地位上升和下降的情况，以及农村各阶层的负担状况。他一边记录，一边思考，整理成调整政策的提纲共十三条。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任弼时的意见在文件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五四指示”是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制订的，当

时，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破裂，在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必须对土地政策作重要的改变，但“不是全部改变”。同时，原来的减租政策“并没有全部废止”。因此，任弼时提出的十三条紧紧地把握住以下的政策界限：

首先是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有计划地谨慎地加以领导。任弼时的提纲第一条就指出有人“恐怕发动群众斗争过火的想法”。《指示》表述为：“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对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中间派的怀疑和党内不正确的观点，应分别加以驳斥、解释和教育。

第二，对待中农，提纲写道：“不侵犯中农利益”。《指示》表述为：“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提纲中对“中农属于走狗之类争取坦白”，《指示》表述为：“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

之属于中农、贫农及其他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须给以应得利益。”

第三，对地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提纲写道：

“对地主的政策”。《指示》规定：“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七分三分”，是指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之一，即《指示》中：“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杀人经过法律手续，过火斗争”。《指示》表述为：“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人民群众要求处死者，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派方面的借口，不使群众陷于孤立”。

第四，对待工商业。提纲写道：“不要过于侵犯中小商人”。《指示》表述为：“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

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

第五，区别敌我友，即提纲所谓“我们，人家”。《指示》完整地表述：“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一道”。

第六，正确处理斗争果实和促进生产。提纲中有“反奸清算之后要公平的处理斗争果实”和防止“发生均产思想”“算帐到何时止”三条，《指示》综述为：“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在农民已经公平合理得到土地之后，应巩固其所有权，发扬其生产热忱，使其勤勉节俭，兴家立业，发财致富，以便发展解放区生产”。“凡由于自己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无底止地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的生产兴趣”。

至于“大量抽调干部去进行”，即《指示》中所

要求的“调动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派到新区去进行这一工作”。这个指示，适应形势需要，是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的政策保障”。

四月下旬，任弼时主持的座谈会转入对解放区经济建设的讨论。

这时，解放区扩大且连成一片，不但有广大农村，还包含许多中小城市，境内有一批煤、铁、石油、金矿和盐等战略性的资源和原材料可供开发利用，但是，八年战乱，农村畜力减了百分之七八十，平均亩产只及战前的一半多，农民负担普遍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上。如何苏息民力，发展生产，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需要党和人民政权制订政策，扶植工农业。五月初，在座谈的基础上，任弼时起草了《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一文，提出“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文件提出一系列的措施来调动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包括：组织起来，改良技术，培植耕畜，举办农业试验场；大力发放农贷，兴修水利，制造廉价的农具，和设法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劳力动

员等。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如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来开发解放区的资源，繁荣解放区的经济，这是“发展解放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的任务”。由于民主政权既不可能举借外债，也没有强大的工商业基础来积累资金，因此，文件强调：“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力量”，同时，在尊重主权与法律的条件，除开有重大军事意义的企业外，允许外国资本来解放区投资，“外资可以独办某些企业，约定一定年限（十年至多二十年）由政府收回；也可以合股经营，按股分利。”

为了吸引民族资本以至外国资本来投资，人民政权必须“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而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同时，要调整劳动政策，纠正某些“左”的残余，“我们必须坚决向工人领袖及群众说明，无论公私企业，在规定工资、工时及其他工人权利时，必须以各该企业在当地能够继续发展（扩大再生产）为标准。即是说，既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又要使企业所有者有利可图。”

任弼时最后写道：

“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即算内战还有一个时期的延长，也必须开始有计划地按照上述方针组织解放区的经济事业。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②6}

事隔近半个世纪，人们重温任弼时的见解，不能不赞叹他的远见卓识！

在任弼时起草这个文件前一个半月，三月十三日，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和尹瘦石一起经北平飞到延安，要求向中共中央领导陈述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意见。十七日，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谢觉哉等和梁作了恳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中写道：当时，梁认为中国多年战乱，经济落后，“这一落后的局面，使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固有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顶用”，他希望“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因此特地来延安请教，“算是留个题目吧！”当梁无可奈何地感叹“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没有彻底改变现在的政治局面，因此对开展经济建设问题，答不上来？梁回忆说：“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回答。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话。”^{②7}

民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是梁漱溟直率地说过，他在理论认识上与中共有“差异”。参加座谈的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了这种“差异”：梁“言中国文化不同欧洲，欧美自由主义文化，布尔塞维克、纳粹，均不适于中国；言他思想与人异，行动与人同，现则要开始讲自己的话了”。又说：“共产党行动不要和社会太隔阂，使他们做朋友的难说话。”^{②8}正是这种“差异”，使这位曾经为和平民主事业奔走于国共之间“心力交瘁”的朋友，在半年后，既“退出和谈，也退出了民盟”，于十一月六日离开南京，到重庆去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撰写《中国文化要义》去了。

任弼时起草的这个文件，由于全面内战在即，暂时被搁置起来，但在这以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了

强有力的全国政权，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设了条件，从而对梁漱溟留下的题目作出了正面的回答。梁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可惜，他直到一九五〇年初重庆解放后，才“离川北上”，所以未能出席一九四九年九月召开的政协第一次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四月末，四平街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中，白崇禧在河南新乡召开军事会议，命令刘峙向中原军区进攻。中共中央发言人于二十九日严正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②9}随着，周恩来和军调部的代表赶赴宣化店协调，签订了《汉口协议》。

五月四日，延安大中学生在边区参议会礼堂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主席团成员任弼时发表了讲话。他揭露国民党顽军破坏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阴谋围歼中原新四军的事实后，严重指出：国民党正采取积极扩大内战的方针，全面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摆在全国人民、全国青年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反对内战，并准备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之爆发”。号召解放区青年应“联合全国的正在发展着

的民主势力，向反动派作斗争”，并提高文化，学习技术，加紧生产，发展经济建设。^{③④}

在全面内战的火药味弥漫关内关外时，六月六日，西北边陲的新疆传来了一个佳音：被盛世才和蒋介石囚禁达四年的一百三十一名中共人员获释，十日从迪化返回延安。对虎口余生的同志归来，延安、南京极为关注。十五日，任弼时电示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路经西安时，请注意照顾。”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对新疆鞭长莫及，新疆省督办军阀盛世才，曾标榜反帝、亲苏、平民、清廉、和平、建设的六项政策，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工作。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在中国西部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人员与物资往来的通道，中央积极予以支持。这批干部大体包括三部分：一是从延安选派去的；二是先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时奉命留下的；三是抗战前夕西路军转移到新疆的一批指战员。这批干部中，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盛世才分别录用，在民政、财税、文教、新闻、军事及群众团体的部门和外县担任领导工作。另有四十多人，在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飞行和航空机械等技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后，中央任命陈潭秋为驻新疆代表、八路军

办事处主任，^{③①}陈潭秋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提出：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应赞助六大政策，积极、负责地帮助工作，不在于“发展组织，不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和盛的合作。一九四〇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时，向在迪化的党员讲话，要他们安心学习和工作。但是，盛世才周围的反动势力视友为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反苏反共，叫嚣“新疆快要被共党赤化了”。盛世才开始大批撤换共产党人，甚至寻找借口，予以逮捕。鉴于盛的政治态度正在变化中，中央电示在新疆的同志“严守纪律，安心学习”。从这时开始，新疆的来电毛泽东多次批示：“请任复”，“请任注意”。苏德战争爆发后，盛“背信弃义，日益趋向反共”，任弼时曾电告陈潭秋：“在迪同志回延安事正在重庆交涉中”，^{③②}但国民党当局蓄意拖延。一九四二年五月，国民党准备调三个师的兵力入新疆，七日，蒋介石派代表向盛世才的代表在兰州谈判时转达：“只有先解决新疆，才能解决中共”。从此，蒋、盛合流。七月，蒋派第八战区副司令朱绍良等到迪化，与盛协议：在新疆设国民党党部；集中中共人员听候处理；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和外交办事处等。不久，任命朱绍良为西北行营驻迪化主任，吴泽湘为行政公署特派员，新疆的政权完全落入国民党手。盛世才即下“逐客令”：新疆的

一百四十名中共人员除四人外，集中于迪化郊区的八户梁等地，名曰“保护”，实为“软禁”，使他们陷入“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境地。

任弼时一面致电共产国际，要求将这批干部撤回苏联，一面请周恩来交涉营救，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在致周的电中说：“中央已决定除留下之四人，其余一百六十余人（家属、养病者在内），均撤回，惟经兰（州）西（安）无保障，正交涉向远方撤退。……在此情况下，潭秋急需款用，请设法迅托友人寄五万元给潭秋”。^③不料，九月十七日，盛世才以“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骗去，全部予以“软禁”，不久，分别投入监狱。从此，中央和新疆的人员失去联系，音信杳无。

中共中央对被囚的同志十分关怀。一九四三年一月，得知国民党将派“审判团”审讯中共人员，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设法营救陈潭秋等。二月，蒋介石指令从重庆派出的“审判团”：对中共人员“首要者杀”。六月五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在蒋盛合谋下，被秘密处死。

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多次设法打听，均无结果。但是，作为党的组织，对在狱中斗争的成员始终十分关怀，包括尊重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时，任弼

时向全会报告到会人员时，特地说明“审查委员陈潭秋在狱中”，因此，党的七大选举时，陈潭秋以五百三十二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亲自向国民党方面提出释放政治犯。十一月二十日，任弼时得知国民党“审判团”开释叛徒数人，即电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设法探明在迪化一批前被盛拘捕同志的近况，特别是徐杰^{③4}、毛泽民、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等同志的消息”。^{③5}但千方百计，均未奏效。

为什么蒋介石在积极策划全面内战时，竟会释放中共被捕人员呢？事情是复杂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张治中将军出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周恩来当即托附这位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三到延安”的朋友，按蒋的“四项诺言”释放在新疆的中共人员，张治中向蒋介石进言：“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意愿，应该全部释放”。蒋初表示犹豫，几经电报往返说明，才同意了。这样，六月十日，一百三十一名被囚四年的同志，终于分乘八辆大汽车离开迪化，张治中特派新疆警务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并先后电甘肃省主席谷正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请予沿途放行。

1946年8月14日，任弼时致续范亭的信手迹

六月十日，出狱人员起程回延安之日，任弼时致电周子健，“注意照顾”，并拨款二百五十万元。

从迪化到延安车行旅程长达六千多里，沿途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扣留或杀害的危险，所以每到一站任弼时和周恩来互通信息，以防不测。果然，车队到陕西邠县时，胡宗南心怀叵测，竟想改变张治中的命令，要车队改去咸阳“招待所”（这里是关押共产党人的集中营），没有得逞；他又节外生枝，车队原定日程六月二十九日可到陕甘宁边区，任弼时便派人在茶坊接待。一等四五日未见来车。七月二日，周子健电告任弼时，胡宗南不予放行。若要送人员到延安，必须请张治中批准。任弼时立即请朱德总司令向胡宗南致电交涉，同时电告周恩来从南京方面交涉。在多方催促下，胡宗南不得不按照张治中的电示放行。五日，车队离开西安，九日抵达护送终点吉家村。这才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朱德总司令亲笔写信感谢张治中将军，边区群众并向刘亚哲等馈赠礼品致谢。

七月十一日下午六时，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康克清、李伯钊等，偕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干部、群众代表等候在离延安数十里的七里铺。当跋涉月余、行程六千的出狱人员，改乘七辆边区的大汽车，在晚霞中徐徐驶来时，这时锣鼓喧天，彩旗舞动，车上车下，激动的泪水交相挥洒，有的人跳上车去，

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欢呼，道路为之拥塞。十三日，毛泽东主席到中央党校慰问。中央决定：大家休息三个月，普查身体，各医院、休养所腾出床位供他们疗养。可惜，因途中劳累，有两人不幸死去，实际回到延安的为一百二十九人。

当延安人民正在慰问生还同志，悼念死难烈士时，二十三日，东北航空学校的负责人常乾坤、王弼来电要求中央：将新疆归来的航空干部，和六月二十六日驾机起义的国民党上尉刘善本等一起派往东北航校，担任教学训练任务。九月，刚结束铁窗生涯的四十几名新疆归来的航空干部，向中央写了《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的报告》后，和刘善本等，踏上新的征途，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达在安东的航校，成为航校建设的重要骨干。一年前，当常乾坤离开延安时，任弼时曾和他谈话交待建设航校的任务，现在，新的力量增添，航校发展，令人十分欣慰。

三十四、当和谈之门被关闭时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内战格局，突然起了变化。三、四、五三个月，蒋在东北大举进攻时，根本不理睬停战调处，说什么“东九省^①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内政问题可言”^②，待到国民党军攻占四平、进入长春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无力再进攻时，六月七日，他不得不提出休战十五天（后来又延长到六月底）。“休战”成了蒋缓兵再战的“挡箭牌”。在东北大战的同时，蒋介石在关内的军事蚕食不断升级，一月至六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大小进攻达四千三百六十五次，占城四十座，村镇二千五百七十七处。六月底，他竟然撕毁一切地区性的停战协定，从围攻中原开始，发动全面内战。蒋的战略意图是：以华东为战场重点，用四十六万兵力，由南向北推进，先歼灭中原解放军，攻占苏皖解放区，进而将华中野战军逼向山

东，然后进行决战，以求稳定江南；又以二十五万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二十六万兵力进攻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企图打通华北的交通线，聚歼解放军于黄河以北，得手以后，抽出兵力增援东北。按此部署，六月二十六日蒋密令刘峙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陈诚踌躇满志地说：李先念部“政府决不能放开一条路让其去延安，李部逃得脱，算他本领好，政府军不能消灭他，算政府军不行。”

二十七日黄昏，中原部队按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分三路西越平汉路突围：王树声率左路纵队奔向湖北钟祥；王震率右路纵队长驱直入向湖北的随县、枣阳地区挺进。刘峙和胡宗南以为中原部队的总部在右路，于是陆空配合，前堵后追。右纵队一路血战，且战且走，越唐河、白河，出荆紫关，抢渡丹江，进入秦岭山区。李先念率总部随中路纵队越平汉路后，由于右纵队吸引了大量敌人，乘虚突击荆紫关，向西北前进，活跃于鄂豫陕边界。至七月五日，全军奇迹般地突出重围，摆脱困境。中原部队在被围困的近一年间，拖住了国民党军三十万，为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迎接全面内战赢得了时间。

为了向全国人民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罪

行，表明中共对时局的立场，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函示任弼时并告胡乔木，“请考虑七七发表宣言，以便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进攻”。七月七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揭露中外反动派合作企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内战的立场，向国内外各方发出紧急呼吁：（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止军事冲突，停止运兵、征兵和建筑工事的命令。（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三）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军；送还美国租借给国民政府的一切军火，谢绝美国军事顾问团，通知美国立即撤退在华陆海空军。（四）要求美苏英三国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等等。^③

“七七”宣言发表后，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对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甘乃光说：中国问题不能用马歇尔之和平民主办法解决，用武力半年可解决。在这种黷武主义的言论怂恿下，蒋介石继中原大战后，又揭开了苏北大战的帷幕。国民党军由徐州向南，津浦路向东，由长江向北，三路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解放区，然后打通津浦、平汉两路，战火向北延伸。中共中央的对策是：“待敌向我

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④

苏北大战打响后，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七月中以主力三万主动向十二万国民党军迎战，一个月内，七战七捷，共歼敌五万，创造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一部的内线作战经验，证明小米加步枪的人民武装完全能够战胜美式配备的蒋军。

在中原、山东、苏北和晋南四个战场激战方酣的同时，蒋介石使用一切手段来镇压进步力量。七月中，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昆明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八月二日中午，竟然出动美制B24式轰炸机八架，向延安空袭，投炸弹十一枚，在八路军总部附近用机枪扫射，弹约一万发。人们记得，日本侵略者最后一次轰炸延安是一九四一年，现在，抗战胜利将届一年，蒋介石居然将美制飞机用于内战来残杀人民，为此，延安总部提出严重抗议。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失败。中原部队脱离险境后，分别在鄂豫陕和川陕鄂边广大地区自由活动。八月六日，任弼时电示李先念、王震等，在鄂豫陕边成立党委及军区，任命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二日，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

健向任弼时报告：中原突围后，“此间官方惊惧，自八日起即急调二百五十辆汽车，向荆紫关增加军队，以防我军进入商雒，同时由汉中向安康集中，以防我军进入汉中区。”^⑤面对胡宗南的十万“精兵”和人烟稀少的八百里秦岭山区，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陕南难于立足，经中央同意，决定夺路返回陕甘宁边区。

八月五日，蒋介石在牯岭向中共提出五项条件，名曰“商谈”，实为政治讹诈。五项条件是：（一）苏北共军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共军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共军应自承德及热河承德以南地区撤出。（四）共军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五）共军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六月七日以后占领的地区。要求中共必须在一个月至六星期内实行这些条件，“否则，停战与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两天后，陈诚声称如不接受条件，“就是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蒋介石不但要点而且要面，这种漫天要价的所谓条件，和“爱的美敦”书式的蛮横姿态，当然不可能为中共接受。蒋的用意在于：如果中共不接受条件，就以此为借口，将他排除在外，片面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然后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嫁罪于中共，而以“剿匪”为名下令“讨伐”。蒋介石假谈真打，拖中大打的伎俩，用心可谓毒矣！

蒋介石提出五项条件后，马歇尔和新到任不久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立即出来唱和。他们明知蒋内战决心已下定，便改变题目，用解决政治问题来掩盖军事调处的失败。八月六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向蒋提出一个“新方案”，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特别委员会来讨论改组国民政府问题。这个“新方案”正中蒋的下怀，他欣然表示接受，但前提是中共接受五项条件。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新方案”本身违背政协决议。按照政协议定，必须首先改组政府，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新方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没有任何约束，反而为蒋介石单方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涂上一层“民主”的油彩。如果共产党人按照他们的“方案”参加政府，其必然结果是牺牲政协决议，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中去当“官”，为蒋介石的独裁政府装点门面。中共当然不会以原则作交易。这样，八月十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国共谈判陷入僵局，美方将退出调处。十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坚持如期召开国大。马、司的联合声明，无异是让蒋介石放手大打，在战场上决定胜负；而蒋的文告，则以“调处”失败为由，将国共分裂和全面内战的责任归于中共。

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委

托任弼时起草复电。复电确认周恩来等对马、司发表公报后的形势分析和应付总方针与办法，指出：“马、司既已发布此种公报，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过去调处的失败是由于美国援蒋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对美错误政策可彻底清算与批评”；请周恩来发表一适当谈话，公开披露“半年多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⑥

国共谈判陷于停顿后，八月中“大打大闹”开始了。

这时，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兵力共一百五十一个旅，已达到了他可能调动的最大限度。中共中央认为：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歼灭蒋的有生力量，“要从这一五一个旅中，歼灭约四十几个旅就能解决问题”。^⑦八月二十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给华中野战军的复电：“为了调动和消灭敌人一两个旅，同意主力南下行动，但不必去强攻城市，更不要去搬动南通等地的纱厂（不管是官僚资本或私人资本），因为搬动工厂将产生不好影响。部队如进城时，必须严格注意纪律，事先进行教育，要做到秋毫无犯，以扩大政治影响。”^⑧

为了配合苏皖解放军作战，吸引围追中原部队

的国民党军，八月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出击，连同豫东作战，歼灭敌一万六千余人，之后转入内线，迎击由徐州、郑州向人民军队钳击之敌。九月初，诱敌深入，集中主力，在鲁西南的定陶附近一举歼灭由郑州南下的四个旅共一万七千多人，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山东菏泽地区合击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至九月底，共歼灭国民党军五万余人。在此期间，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控制了同蒲路忻口以北大同以南段，共歼敌二万余。苏中大捷、定陶战役，再次证明人民武装力量依靠解放区，在内线作战，可以大量歼灭敌人。

在蒋介石不顾一切的全面军事进攻下，国共关系已濒临全面破裂的边缘。因此，八月二十三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致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周子健电：“在战争范围扩大情况下，国方很可能袭击以至封闭西办，请作一切必要准备。秘密文件应毁去，注意气节教育，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⑨果然，四天以后，胡宗南通知西安办事处：“本战区内各办事处统限于八月底以前撤销，人员九月十日前一律返原部队”。二十九日，周子健电告任弼时：“九月五、六日，可能失去自由，我们已作坐狱及牺牲之准备”。三十一日，任弼时电示周子健：“此

间已用朱总名义电胡，要其保护安全，并给返延车马便利外，请即结束办事处，具报撤销，率领全体人员返延。据悉胡宗南、祝绍周有扣留你们之意，你们已作精神准备，甚好。积极争取回延”。^⑩

九月十日晚，正是农历中秋节，周子健率西安办事处干部一行二十余人，分乘两辆卡车，在皎洁的月色下，心情忐忑地离开了“七贤庄”北行，“护送”他们的是国民党一个班的武装宪兵。当年的警勤战士王浩礼回忆道：

“走时，我们把各房间的电灯一一熄灭，把珍贵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端端正正地挂在门旁，将大门掩好。这时，同志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好像办事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和我们骨肉相连，都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怕由于我们的离开而遭受敌人的践踏和蹂躏。同志们站在门口，凭着月光凝望那块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牌子，久久不肯离去，好像告别亲人那样。同志们心里默念着：再见吧，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回来的……”^⑪

西安办事处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初设立的，九年来，“在老百姓的眼里，办事处的存在就是国共合作的象征”，是反映国共关系变幻的“气象台和温度表”，^⑫国民党反动派下令撤销，是蓄

意断绝与中共交往的一个严重信号。

为了准备长期战争，任弼时着手在解放区重建青年团组织。如果说，解决土地问题是发动广大农民支持战争的根本保障，那么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培养教育他们，则是掌握未来，形成一支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的突击力量。这时，全国各解放区共有青年两千多万，其中有四百万左右的积极分子。抗战初期，为了广泛团结各界青年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作出决议，“改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在各抗日根据地以“青救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还可以用其他形式组织青年，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半武装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等，成为青救会的团体会员。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这些组织发动青年，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支援前线，巩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约有百分之二十的骨干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抗战胜利后，青救会完成了历史任务，组织逐渐松懈。新的历史时期，青年工作需要新的奋斗纲领和组织形式，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在为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在成都，在昆明，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在解放区，中共中央又指示各地建立青年联合会。如何

把全国青年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为了重建青年团，确定青年团的任务、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任弼时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央青委工作团去东北时，他曾嘱咐蒋南翔等在当地相机成立青年团体；今年二月，他又派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到重庆、上海，调查国统区青年运动的状况；五月，他通知山东的青年干部杜前等专程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王治周等一起向他汇报情况。

从五月以来，任弼时在枣园的窑洞里，多次听取汇报。他坐在一把帆布的躺椅上，手持烟斗，一边悉心听取，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要点。他平易近人，不轻易打断别人的发言，使大家感到亲切，敢于陈述各种意见。当他们谈到青年工作方向不明，干部情绪消沉时，他沉思片刻说：“形势发展了，团体不求得有所改进，工作方法不改革，自然就会消沉。”汇报结束时，他胸有成竹地说：“是否把解放区的青年积极分子先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这样，六月二十五日，中央青委草拟了一份《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稿）》。

八月十九日，任弼时通知已从重庆转到上海的冯文彬，“最好搭飞机返延”。二十六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历史上，

青年工作有成绩，也有过缺点”，“在抗日战争初期，很多地区还没有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建立政权，那时农会这个组织可以代替一切。有了党组织和政权以后，农会、青救会应转变工作方式，青年组织应适合青年的要求和特点，但有些地方未跟上，因而感到工作方向摸不着了。有的解放区，青年组织单搞一套，闹独立性，遇到反对，由此也就消沉下去了。”他强调，历史上青年团所以犯先锋主义和“第二党”作风的错误，“主要是因为未去研究青年的特点，未去研究适合青年的一套方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今后，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如不认真改进，还可能重犯以前的错误。现在党的领导强了，青年团不容易犯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团如何领导一般青年去参加各项建设”。

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他说：“按实质，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再扩大一点，防止其成为狭隘组织，也可以叫民主青年团。”

关于团的性质，任弼时说：“是带政治性的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如何着手建团呢？任弼时主张采取示范的办法，在工作基础好的地区，“首先

从团支部搞起，然后再建立团的区委，县委”，不要先搭一套空架子，脱离生产的人员应尽量少。^⑭这是非常务实的工作作风。

这次会议之后，任弼时主持起草了一个试建青年团的文件。九月十三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座谈会，在延安的有关领导人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康生、陆定一、蔡畅、习仲勋、饶漱石等出席了会议。任弼时说：“书记处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大家是赞成建立青年团的。也问过毛主席，他说，搞青年团是好的，可以征求一下各解放区的意见。现在起草了一份电稿，请大家讨论。”座谈会结束时，任弼时说：“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同国民党作争取广大青年的斗争，青年工作就特别重要。国民党建立了三青团，在他们统治地区的学校中，三青团对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我们为了同国民党争青年，也应注意组织青年，但目前国民党统治区不一定用统一的名称。”在解放区，他说：“现在总的情况是：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高涨了，而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反而减弱了。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⑮

经两次座谈讨论后，大家认识一致，于是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⑯指示各中

央局和分局，总结过去经验，“择地试验”。中央青委也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派出工作组，在延安附近的冯庄、丰足火柴厂和行知中学三处建立了试点，为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建立青年团取得工作经验。

从西安到延安，沿途八百华里，西安办事处的干部在国民党宪兵的“护送”下，提心吊胆地整整走了十八天，终于安全回到延安。恰好在这时，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历经艰难险阻也回到了延安。这支英勇的队伍，从中原突围后，日夜兼程，进入茫茫秦岭，后经中央批准，从陕南北上，冲过陕川公路，渡过渭河，越过陇海铁路和西兰大道，夺路前进。为了接应这支队伍，中央调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旅，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组成左右两翼兵团，分头向泾川、长武南下。九月八日进入渭河平原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终于和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于庆阳，二十七日，顺利回到离开两年的延安。

两年前，任弼时在南下支队的誓师大会上，嘱咐他们到南方敌后去“画一张红色地图”，弹指一挥，他们北返延安，行程两万两千多里，“威震华夏”，被誉为“第二次长征”。当蒋介石围困中原之日，参加调处的军事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郑介民曾说：不能让中原部队撤走，“这是抓住共产党的一条尾巴，共产党

要打，就先消灭它。”中原部队俨然是他们唾手可得的盘中餐，如今，三五九旅回到延安，另外两路，则在鄂豫陕和鄂西北地区创建了两块游击根据地，使来势汹汹的蒋军“一无所获”。

三五九旅回到延安后，任弼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天，王震带着金忠藩到枣园来看访他，任弼时高兴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打得英勇顽强。有几天和你们失去联系，我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金忠藩后来说，“因为我们进入秦岭后，敌人紧追，来不及架设电台，几天没有向中央发报，使弼时同志夜不成寐。弼时同志对我们说：‘我担心是不是你们被胡宗南搞掉了！’他讲得很感动，很亲切：‘我们的心是相通的。’”^{①⑥}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回到延安时，幸存二千二百多人。因此，王震向任弼时建议，派干部到人烟稠密的胶东解放区去补充队伍。任弼时当即同意，亲自写信给陈毅，请华东军区给予支援。三五九旅便抽调三百余名军政干部，配备齐一个旅的干部架子，任命张仲瀚为旅长，曾涤为政治委员，于一九四六年秋末，进入山东根据地，在陈毅和张爱萍的安排下，在渤海地区发动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几个月后，组成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渤海教导旅。一九四七年八月，胡宗南疯狂进攻大西北时，渤海教导旅归回建

制。在河北武安举行的全旅大会上，陈毅豪爽地说：“自古山东出好汉，你们渤海教导旅是当今的山东好汉。从今天起，我把你们交给王震同志，由他率领你们到西北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从此，教导旅编入由王震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师序列。追本溯源，第六师的指战员念念不忘任弼时的决策和陈毅的支援。^{①7}

经过七、八、九三个月的“大打大闹”，国民党军以二十五个旅的代价，占领了解放区几十座城市后，它的正规军能担任野战任务者，不过半数多一点。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但是，蒋介石的战争狂热已到了发昏的地步，继八月二十九日占承德之后，九月二十九日，竟然下令以九个军分三路限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与此同时，他再一次玩弄“政治解决”的文明戏，企图以军事压力迫使中共作“城下之盟”。蒋在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向中共提出两项条件：（一）国府委员名额为中共八名，民盟四名，中共可推荐一名无党派人士，共十三名；中共应即提出国府委员和国大名

单；（二）迅速规定中共十八个师的驻地，限期进入。马歇尔、司徒雷登便以这两项最后通牒式的条件，向中共代表团游说兜售，形成一个“和平攻势”。三十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送致备忘录，同一天，中共代表团受命致函蒋介石，提出严重警告。函中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⑧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决策会议，会议在任弼时主持下，集中讨论毛泽东起草的《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和平攻势”的对策。任弼时在会上说：蒋已占领了解放区不少地方，如果他有和平诚意，我们未尝不可以考虑。但是，他增兵攻打张家口，又在过去三个月征集新兵一百五十万，目的何在？这不是要和平的样子。要我们参加政府，必须遵守政协协议，退出一月十三日停战命令后占去的地区；复员一月十三日以后调动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改组政府和召集国大”，不然所谓“和平是假的”。最近他提出的两条，只是为了调集兵力继续再战，我们不要上当。过去三个月，我们消灭了他二十五个旅，但他还有优

势。如果按毛主席提出的设想，今后三个月，再消灭他二十五个旅，我们可转入反攻；反攻后，再消灭他二十五个旅，双方力量平衡，“要真正达到休战和平，必须打破其优势”。任弼时又说：“要提高信心，已失掉些地方，可能还要再失掉一些，如张家口，哈尔滨，邯郸，准备他还要打延安”，“我们能守的即守，有的不必死守，如张家口，而是要争取主动打击敌人”，“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请大家考虑，这个方针是否对！”^⑩

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徐特立、徐向前、林伯渠、王明、陆定一、饶漱石和王震等，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三个月总结》，提出要抓紧冬季练兵，加强战争动员，增加生产，精简节约，准备长期作战。最后，任弼时说：大家同意《三个月总结》，既然蒋介石和平是假的，“和，打，我们打定了！”。他说：“过去三个月，国民党打弱了，我们打强了；……丧失了地方，但队伍加强了，老百姓认识提高了，信心提高了。现在困难仍很多，但和十年内战时期比，我们的力量和困难都不同了”。^⑪为了支持长期战争，任弼时强调，要扩大部队，训练民兵，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开展“高树勋运动”。^⑫党的七大期间，任弼时曾说过：“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发展力量有

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争取敌方的力量，三是扶助争取同盟者”。^②在迎接全面的大规模的内战的时刻，他正确地体会和运用了毛泽东的基本思想。

停战协定签订十个月来，蒋介石谈谈打打，形成一条规律：当他军事失利时，便以和平谈判、政治解决为幌子，骗取时间，求得喘息；一旦调整好部署后，便背信弃义，放手大打。正是在这种交替使用的伎俩前，人民看清了他的本质，也暴露出马歇尔调处的虚伪性。而中共中央是深知蒋介石本性的政治对手，所以，一面委曲求全，一面通过谈判向他作政治斗争以教育人民，但决不抱幻想。十月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准备应战的决策后，任弼时秉承中央的方针，接连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时，司徒雷登以蒋介石的两项条件为基础，向中共代表团提出四点建议：（一）同意国府委员名额为中共九名，民盟四名；（二）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三）撤出苏北；（四）撤离大同附近。^③这四条的核心是帮助蒋介石召开“国大”。十月四日，接到董必武三日来电报告司徒雷登的建议后，任弼时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中表示：因蒋攻张，一切不谈；如停攻，则在三人会上提出恢复一月十三日

位置。并告周：要马歇尔给飞机回延。^{②4}

十月五日，蒋介石故作姿态，表示接受马歇尔停战十日的建议，商谈司徒雷登提出的四条。七日，任弼时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中说：美蒋所提十天停攻张垣计划，完全是为了蒋军增援再次，我绝对不能接受；我应声明，攻张即全面破裂；要求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在外交宣传上，应采取强硬的立场和态度，等等。^{②5}八日，书记处听取李克农关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情况的汇报后，鉴于大战在即，执行部已无事可做，会议决定：缩减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并请周恩来向美方声明：要求美军撤离中国。^{②6}

十月九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严正指出：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停攻张家口，我方仍愿意商谈。如政府当局“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②7}

果然不出所料，十月十一日，蒋介石不顾中共的一再警告，下令攻占张家口，当天下午，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这就意味着谈判之门为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关闭。同一天，任弼时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于十二日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代表团九月三十日致蒋介石马歇尔备忘录》，《蒋介石十月二日致马歇尔备忘录》，以及

《十月九日周恩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严正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单方面决定召开的“国大”。至此，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家寡人的尴尬境地。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为最后挽救时局，力图从中斡旋，但蒋介石万变不离其宗，声称：只有中共同意他的条件，宣布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交出名单，他才能下停止军事冲突令。在“第三方面”人士的劝说下，中共代表团和国方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等准备举行非正式的直接谈判。十月二十日十五时，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非正式磋商中，我方拟提出的主张是：“先开三人会议及综合小组，根据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商讨一切，然后停战”，“对我军事情形是否有利请速复”，“以便能作全盘了解，便于运用”。^{②⑧}二十日十八时，任弼时按书记处决定，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周恩来，董必武电，电中说：“你们可以根据中央声明的两点应付一切”，以观其变。关于我方军事部署情况，电中答复：

“张垣退出后，平绥及平汉北段，敌人表示骄傲轻敌，我正布置打击继续向蔚县深入之敌；陈毅、粟裕主力会合，布置打东进之敌；刘邓为使敌暴露弱点，故再退一步，以利歼击。胡宗南

可能向延安进攻，我正由晋北调部队增强延安防御力量。二十二军²⁹九千人中，已有四千起义，占领横山城及石湾、波罗、镇川等处，尚有千余可起义。各地敌主力前进，其后路即空虚，进攻冀东之敌，主力转入平绥后，冀东大部已为我收复。胡军主力北进洪赵，我军即恢复汾南广大地区。胶济虽被打通，但并不巩固，各地情形大都如此。蒋方进攻时间至多还有两个月，尔后即再无进攻力量。”³⁰

尽管从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以来，十四个月之间，中共方面委曲求全，先后作了八次让步，但蒋介石对于亲自签署的命令和作出的诺言、保证，一再任意撕毁，今日的协议，明日成为废纸，既不讲最低限度的诚意，竟连信义都可弃之不顾。为了不负“第三方面”人士的最后努力，顾全大局，中共代表团仍愿委曲求全，再作一次让步。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李维汉等和张君勱、沈钧儒、黄炎培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上海乘飞机抵达南京，蒋介石只用了八分钟时间和大家见面，敷衍搪塞地说：一切交孙科办理。当天下午，他便离开南京飞往台湾。

事情非常清楚，蒋介石已经铁了心，谈判已无丝毫可能。既然如此，二十八日，任弼时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通知周恩来回延安。三十日，书

记处同意周恩来二十九日来电，“不以国大名单交换停战”。^{③①}

在蒋介石一面决定召开“国大”，一面调动一百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的严峻形势下，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函示任弼时：敌大军攻占焦作，将来有攻上党的可能，太行地区也并不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进行”；如榆林为敌攻占，而延安又紧，中央机构“则以迁绥德等处为宜”。^{③②}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十一月六日、九日两次召开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通过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决定由彭德怀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联络，在一两周内将笨重的器材疏散完毕，同时任命杨尚昆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以应付事变。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出席的代表一千六百人，其中国民党的代表占百分之八十五，有九百多是十年以前选出的旧“代表”，另外就是卖身投靠的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和几名“社会贤达”，充当大会的配角，“第三方面”和无党派人士大部分拒绝参加，正如《民主报》所说：“这幕独脚戏将是国民党最丑恶的一幕历史”。

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中共驻南京、上海的办事处仍保留，由董必武及钱之光分别主持。

二十一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国共谈判一年多，工作做得好，教育了群众，在党内也是一个教育过程。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更清楚了，美国的欺骗也清楚了。第一次国共决裂时，我们完全被动，这一次，我们有了准备。在分析军事形势和战争前途时，毛泽东说：曹操八十三万大军，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事情要分析。近四个月来，我们消灭蒋军已达三十八个旅，现在有攻势的是薛岳八十个旅，顾祝同三十个旅，胡宗南二十个旅。再过半年，如果刘、邓再打几个胜仗，共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双方力量平衡了，往后，要超过就容易了。蒋介石多年准备的力量，被我们一年打破，那就很便宜。他的威风就只那么大，不要信那个邪。我们第一年在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到外线去，三到五年发展到南方去。美国可能进一步帮助蒋，我们要藐视他们，又要重视他们，要周密，不要疏忽。总的说来，战争是长期的，中间会有许多曲折。我们现在的口号还是坚持一月十三日停战会和政协决议，不提打倒蒋介石；土地问题，今冬明春可以解决，这是根本。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于我们，我们就输了！^{③③}

这时，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进攻陕甘

宁的兵力也部署好了：南线，胡宗南封锁陕甘宁的兵力原为四个旅，分别从陕南和山西增调来六个旅，共十个旅；西线，宁夏的马鸿逵抽两个师的五个旅进攻边区。延安一派备战气氛：疏散物资，坚壁粮食，演习防空，训练民兵。恰恰在这个时候，任弼时接到三妹任培辰夫妇的来信，要求来延安工作。

任弼时有三个妹妹，大妹培月，二妹培星，她们参加革命后，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几经坎坷，培月受敌人摧残后，健康受严重影响，培星贫病交加，于一九三六年病故。三妹培辰，自一九二七年秋，任弼时回湘阴探亲后，一别二十年从未见面，家书也写得很少，怕国民党迫害他的家属；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这才托人带过几次信。一九四四年夏，日军进攻长沙后，国民党军弃守平江，向浏阳逃跑，驻守平江县城的是警察局长单先麟率领的两个警察中队。单先麟就是任培辰的丈夫。一九四五年三月，王震、王首道率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③南下平浏时，单先麟率部起了积极的作用。王首道这样写道：“当时，平江驻有顽警察三中队两个分队。我事先早已查清，县警察局长是我党一位领导同志的亲属，过去同情革命，对国民党一向不满。我们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派人同他取得联系。我军一到，他即率领警察部队虚放几枪，迅速撤出城外，使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县城”。^⑤抗日救国

军离开以后，不久，任培辰夫妇被控为“奸匪”，单先麟被撤销职务。两人离开平江后，便到南京梅园新村，去找王炳南和童小鹏。这时，国共关系已濒于破裂，南京没有去延安的飞机，他们便到北平找军调处执行部，留驻执行部的薛子正将他们给任弼时的函电转到延安。任弼时在回信中写道：

“厚康兄、培辰妹鉴：

接读转来函电，已悉抵平。惟时局不靖，关山阻隔，仍以不来延为妥。如有事须告我者，请立即面告薛君，彼当可负责转达。如返湘路费有缺，亦请与薛某商洽，请予资助。相会有期，勿念。

二南 子陷”^{③⑥}

战争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共中央将要撤离延安，任弼时正集中精力致力于复杂细致的组织工作。

三十五、风雨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国驻华使馆声明退出军事调处的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接着，限令南京、上海、重庆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撤回延安，并且查封了《新华日报》。为时一年的军事调处和政治协商的成果付诸东流，国共两党的关系重新退回到二十年前武装对立的状态。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和最高形式。

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偕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西安，亲自部署三十多个旅的兵力，和一百架左右的美制飞机，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东面，隔着黄河是晋绥解放区，其余三面均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威胁。南面，担任主攻的胡宗南，率十五个旅的十四万兵力，从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延安进犯；西面，有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共十

二个师的七万人；北面，有榆林邓宝珊的两个师一万多人集结策应。胡宗南预定三月六日开始行动，扬言“三日之内占领延安”，以便在三月十日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为美蒋增添政治筹码。

三月十一日上午，美军驻延安的联络官赛尔斯上校等三人刚刚飞离延安，下午，延安保卫战便在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揭开帷幕。这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的部分人员，率先迁移到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保证中枢机构正常运转；毛泽东和周恩来留在延安，迁入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冒着敌机的空袭指挥延安保卫战。

任弼时在工作笔记本上写道：

“蒋、胡以极大的决心和力量进攻；是企图占延安，围歼（我）主力和首脑，否则驱出西北；

这表现（敌）强了，弱了？顺利，困难？我之方针：吸敌在边区，配合旁区发展胜利，使其分散疲劳而聚歼；中央机关与人民共存亡；

有一个时期的艰苦斗争。注意点：要求军事化，战斗化，加倍努力，艰苦。”

简短扼要的提纲，充分反映出在临战之前，任弼时那种沉着、镇定的心态和克敌制胜的决心。

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是表现他的强大还是虚

弱呢？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和敌情，有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历时一年多的和平谈判，以蒋介石召开“国大”告终，他坚持独裁反对和平、民主的顽固立场，在政治上日益孤立。军事方面呢？国民党当局用于全面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共二百一十八个旅，占其总兵力的百分之九十。在八个月的自卫反击战中，人民解放军已歼灭了他五十六个旅，超过了四分之一。这期间，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大片地区和一百多座城市，但每占一座城市平均要付出七千人的代价，而且占领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派兵守备。国民党军一方面被歼灭，另方面，大量的兵力用于守备，战线越长，可用于野战的兵力越打越少。从三月分起，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捉襟见肘，兵力日感不足，已无力继续全面进攻，不得不变换策略，改为重点进攻：集中九十四个旅的兵力，西面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重点；东面以对南京、上海威胁最大的山东为重点，企图在东西两翼得手以后，分头进入华北与人民解放军决战。从本质上来说，所谓“重点进攻”，分明是虚弱的表现。所以，任弼时对随同他一起离开延安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由于战略上的需要，为了更便于同敌人周旋，我们必须放弃延安。这是主动放弃，不是败退”；“既然主动撤退是一种策略，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他

希望苏方理解我们的意图。^①

蒋介石进攻山东的兵力是四十五万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是二十三万人。从兵力论是山东第一；但陕甘宁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两万多部队，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边区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因此各大解放区的领导人纷纷来电，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迁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晋察冀或晋冀鲁豫的后方去。为了保卫延安，掩护中央机关转移，三月八日，十日，中央军委先后电令在山西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率第四、第九两个旅，和晋绥的张宗逊率新四旅立即西渡黄河，参加延安保卫战。十六日，军委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组成左、中、右三个兵团，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兵团作战。

从三月十二日开始，在历时七昼夜的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兵团以六百九十多人的极小代价，毙伤敌五千后，完成了中央和边区机关的安全转移。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从容离开延安。第二天下午，胡宗南的第一师以悬赏一千万元作饵，忐忑不安地进入延安时，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由于敌机的轰炸，新华广播电台于十四日被迫停止工作，但是，先期到达王家坪的任弼时等预为筹划，在瓦窑堡附近象鼻沟的备用电台立即接替工作，

使红色电波没有因此中断。二十日，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称：此次保卫延安，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轰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三月十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三月二十四日，胡宗南的“前进指挥所”进入延安原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②可谓得意忘形。但是，胡宗南在“前进指挥所”里对下一步如何“前进”，却感到茫然，因为他不但没有找到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连共军主力的去向也一无所知！这时，转移到子长县任家山的毛泽东利用敌人急于寻找主力求战的心理，一面设置疑兵，将胡部第一军董钊的五个整编旅引向延安以北的安塞，一面批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第一、第二纵队，新四旅和教导旅设伏于延安东北青化砭的群山里。二十五日，董钊在安塞扑了一个空，“武装游行”回到延安时，在延安东北警戒策应的胡部第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却进入了西北野战兵团设置的伏击圈，不到两个小时，二千九百多人被全歼于青化

砭，生俘旅长李纪云等少将三名。这一仗被称为“稳定人心之战”。

这时，任弼时和刘少奇、朱德正在和二十日到达王家坪的周恩来共商战局。鉴于胡宗南“武装游行”的队伍将向东北方向行动，西面马鸿逵部占领盐池后正向定边进攻；北面榆林的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傅作义的步、骑五个旅配合胡宗南有出神府或向晋西北进犯的可能，任弼时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以“丙丁”名义致毛泽东电，提出三项建议：（一）西北野战兵团除在正面留二、三个旅阻滞敌人前进之外，“大部分散到敌之侧后行动”，打击敌人的运输队，夺取弹药，消灭守护交通的敌单个部队，“待敌更分散后，将来集中力量各个消灭单个敌人”，这就“要准备敌进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窑堡、绥德”。（二）王震、张宗逊部入陕后，晋绥兵力单薄，对傅作义可采两种办法：一是从晋察冀调动适当兵力打击南进的傅部；一是将傅的主力吸引到陕北或晋西北，以便在其它区域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如采取第二方案，则中央机关准备分散，在适当时期转移至太行地区，减轻晋西北负担。（三）敌正准备北进，“我们可能月底或下月初间即须东进。”电报最后说，他们有一些问题想和毛谈谈，如毛今晚未动身“我们几人明晚来你处谈”。^③当天晚上，毛泽东立即驱车到王家坪，和刘、

朱、周、任会商。这是三月十二日延安分手后，五位书记首次聚在一起议事。

这天的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留在陕北，但拥有五千多人的中央各机构必须转移到安全地带，继续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使全国各解放区和各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克敌制胜。这是一件极其紧迫而又细致复杂的组织工作，因此中共中央在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接连发出指示。

二十五日当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晋察冀、晋绥和太行等区《关于掩护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其要点：一是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除留极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老、吴老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二是如傅作义部南下，晋绥后方受到威胁，届时“一部分中央机关经同蒲转入五台地区”，要求调集冀晋部队在同蒲路北段、大同以南地区，配合向平绥路活动的冀察地区武装，“分散和钳制傅敌的行动”。三是暂需留在晋绥的中央军委机关“不应过于集中”，并置于安全地区，“必要时经同蒲过太行去”，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失”。^④

二十六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为了与贺龙、叶剑英和杨

尚昆面商转移的路线，决定“派恩来同志即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⑤任弼时即通知王震，从停泊在延水关的船只中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拽到辛关渡备用，并叮嘱“对此勿声张”。^⑥

十年来，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这次战火逼近，延安的干部群众迅速转移，埋藏物资，抢运档案，安排老幼妇孺，编组行军队伍……工作不免有些混乱。经历过湘赣突围和长征的任弼时，深知此时此刻，特别需要沉着镇静，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从精神上奋起压倒敌人。三月二十日，延安各界赴山西慰问部队的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在王家坪向任弼时汇报了青年英雄刘胡兰在敌人面前慷慨就义的事迹。

事情是这样的：一月初，阎锡山出动三万多部队，向吕梁军区汾水、孝义一带猛烈进攻。一月十二日，阎军第七十二师第二一五团包围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强迫村民集会，将十五岁的村妇联会秘书、候补党员刘胡兰等七人捆绑，当众拷打。刘胡兰大义凛然。敌人问她：“今后还给不给共产党办事？”刘胡兰答：“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敌人抬出铡刀，先铡死了七十多岁的老汉杨桂子，威胁刘胡兰说：“只要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她斩钉截铁地

回答：“那办不到。”敌人张开铡刀准备动刑，刘胡兰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罢慷慨就义。这是一位可歌可泣的青年英雄。张仲实回忆道：任弼时“听完汇报，当即对我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⑦三月二十五日，五位书记会合时，毛泽东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奋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当即广播了刘胡兰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题词，一个向刘胡兰学习的热潮，在各解放区掀起，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同仇敌忾，英勇奋战。

三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当胡宗南的队伍侵占延长、延川，向青涧侵扰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领导分工的决定，三十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电告正在晋绥的周恩来，电中说：“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并请周恩来“于

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任三人主持中央”。这时，胡宗南所部正向清涧进袭，河西河东的来往有被切断的可能，因此毛、任在电报中叮嘱周恩来，“为避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方面的事，在刘少奇、朱德过河后“由刘、朱、董、叶处理。”同时，中央又在致贺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⑧

中央领导的分工决定后，任弼时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宣布将留在陕北的人员按军事编制成立中央纵队，下分四个大队：第一大队为直属队；第二大队为军委二局的前梯队，由二局干部中挑选的二十多名机要人员组成，负责情报工作；第三大队负责电台和通讯工作；第四大队是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另加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内卫排和一个团部，共约八百人。纵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为了保密，中央纵队的代号是“三支队”，毛泽东的代号是“李德胜”，周恩来的代号是“胡必成”；任弼时为“史林”，陆定一为“郑位”，取司令和政委的谐音。毛泽东诙谐地对任弼时等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的“国家”，你们

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⑨

三十一日，胡宗南侵占青涧城，先头部队已到九里山，离中央纵队驻地仅三十里。傍晚，狂风大作，毛泽东、任弼时和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从石嘴驿出发，驱车向西北方向行动，到田庄镇稍事休息。这时，上弦月还没有升起，老黄风夹带着从毛乌素沙漠吹来的飞沙，强劲地向人们刮来。大家走下车来，握手道别。刘少奇和朱德一再叮嘱任弼时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在“七大”的开幕式上，任弼时说过：“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⑩现在，强敌压境，全党把保障领袖安全的重担托付给他，他感到刘少奇、朱德的临别留言字字千斤。说罢大家踏上征途：刘、朱驱车东行，渡黄河，奔向山西临县的三交镇，任和毛西行，到达子洲县的邱家坪。

四天以后，周恩来、叶剑英和刚到三交的刘少奇、朱德会合商定后，由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联名电告毛泽东、任弼时：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共五千五百人，除七百人留河西外，决定留一千余人在晋西北及去五台工作，三千八百人经五台去太行工作，第一批三千人，四月十六日开始出发，其余陆续起程，

估计月底可到达。^①同时贯彻中央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为书记，杨为支队司令。安排就绪，周恩来便起程返回陕北，四月十日与毛泽东、任弼时会合于靖边县的青阳岔，共同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样，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适应战时需要，分成两个组成部分：毛、周、任率中央纵队坚持在陕北前线主持中央工作，所以有人常常称之为“前委”；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率中央工委前去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工委带走的中央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解放日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及中办的秘书、机要、卫生和军委总供给部的一部分。这个战事体制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月九日，中共中央将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等三项决定通告全党全军。任弼时立即向中央纵队的全体人员传达。他对大家说：“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有些同志可能想不通，告诉同志们，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大家要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要象正月十五

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疲劳，相机加以消灭。我们要提高胜利信心，增强战斗意志，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来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的光荣任务。”

从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在一起，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跋山涉水，历经惊涛骇浪，从一个山村转移到另一个山村，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胡宗南进入延安后，不到半个月，他的十五个旅有四个半守备在鄜县到延长一线，一个旅被歼于青化砭，其余的十个旅攻安塞，占延长、延川，到处“武装游行”却找不到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士气低落，逃兵增加。四月初，他继续北进，以全力攻瓦窑堡和绥德，“预定四月半攻下绥德”。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这时，国民党军如惊弓之鸟，行动十分谨慎，行进时，以十个旅组成横直约四十里的方阵，不敢走大路，而在蜿蜒的山间小道上艰难地行动。西北野战兵团采用“蘑菇战术”，主动放弃清涧、瓦窑堡，引敌北进，主力隐蔽在绥德、清涧之间，伺机歼敌。四月十四日，胡部整编第一三五旅向蟠龙靠拢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瓦窑堡西南五十里的羊马河突然发起进攻，全

歼第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入，俘代旅长李宗禹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名少将。这一胜利奠定了粉碎胡部进犯的基础，证明了以边区现有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即可逐步解决胡军”，又证明了“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⑫

任弼时对中央纵队的指战员说：“敌人对边区重点进攻，我们要保存力量，跟敌人‘蘑菇’，不能硬拼”。他又说：“毛主席说过，敌人像五块豆腐，撂在一起，我们的口没有那么大，吃不下，等他摆开来，一块一块地吃，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已经吃了他两块，第一块是青化砭，第二块是羊马河，第三块也快到口了。”

果然，二十天以后，第三块“豆腐”又被吃掉了。

羊马河战役告捷后，胡宗南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两军从永定、蟠龙向绥德北进，又令在榆林的第二十二军和第二十八旅向葭县（今佳县）、米脂方向南下，企图南北夹击，迫使我东渡黄河。这一来，胡宗南部的补给基地蟠龙空虚。五月二日，胡部第一、第二十九军占领绥德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当晚向蟠龙发起猛攻，全歼守军整编第一六七旅等部六千七百余入，俘旅长李昆岗、副旅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四名少将，并且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四万套军衣

1947 年元旦任弼时给军委二局的题词

和一万二千袋面粉等。同一天，西北野战兵团收复绥德。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告捷，稳住了陕北的战局，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已由靖边的青阳岔迁到安塞的王家湾，安然住了二十多天了。

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到六月八日为止，中央纵队在大理河上游的王家湾先后两次住了近两个月。

王家湾村座落在半山坡上，坡下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双羊河，傍山依势住着十七八户人家，新华社等其他几个大队分别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老乡们的住处本来不宽敞，中央纵队一到，就更拥挤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挤住在贫农薛如宽腾出来的两孔半窑洞里。土窑一进两开，左边一孔是毛泽东的住处；进门的一孔是出入的通道，由周恩来和陆定一挤住；右边是一孔半截窑，陕北人称“爽堂”，向阳一面是土炕，炕下是个土台，存放粮食和杂物，几乎没有炕脚地，任弼时就在半截窑里办公和睡觉。后来，毛泽东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老乡们说，这支队伍马多，驳壳枪多，线线多。

线线是指电话线。每到一地，任弼时安排好毛泽东的住处后，立即指挥第二、第三大队架设电台，安装电话，这是畅通信息，使领袖们运筹帷幄、发号施令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四月下旬，后委的叶剑英、杨尚昆电告中央：联络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前后方和蒋管区的八个通讯电台，二十八日可以全部通报。^⑧五月一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致后委的复电中指示，在晋绥设立一个转报台，负责收转各大军区前后方给中央的电报，根据内容的轻重缓急，有的由中央专用台直接联络，有的由转报台收转或译转，以免误时和重复。十二日，又代中央军委签发《中央与各地通讯办法》，通告各中央局、分局和各大军区，电中说：“中央处于战时环境，但急需恢复和加强与各地联络，除中央自带几个小电台与少数地区直接联络外，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联络办法：转报大台共联络十四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东军区前后方以及冀热辽分局、中原局等。朱、刘及晋绥台仍与中央直接联络。中央与各分局，东北的东满、西满、南满的来往电报，归口由所属的中央局、分局转达。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区

应经常保持与中央工委和后委台联络。电中强调：拟定电报的等级要严格，电文要紧缩，密码要分清，收发译电力求细心正确，避免误译、错发和延时。^⑭同时，电示李维汉、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委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而重要的军政、特务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和密台，“如认为有必须通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你们自行决定。”^⑮任弼时是精细的。通讯办法规定后的第三天，他满意地电告后委：“刘邓、陈粟、聂萧、罗林四个主要前线台现在通报还很顺利”，要求转报台每天将收转的电报“作日报表一次，以便检查”，在敌情变化，“中央行动时，全由转报台负责收转”各地来电。^⑯

内部交通站也逐渐建立起来。在敌人的残酷搜查下，李克农得知从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通站全部被破坏，惨淡经营十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有泪不轻弹的李克农，为此潸然泪下！但是，六月初，中央在绥德建立了与河西的交通站，在山西崞县建立与晋察冀的交通站，晋察冀的社会部已送来了第一批蒋管区出版的书报刊物，此后每半个月送一次。这就使在西北黄土高原的群山中辗转流动的“最小指挥部”得以综观全局，对蒋管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了如指掌，及时作出反应。五月中，华东野战军发起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

势，蒋管区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声势浩大地遍及各主要城市，工人的罢工示威浪潮汹涌而起，形成了第二条战线，三十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全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王家湾头年遭灾，这时老乡们正在为春耕播种发愁，一是春旱严重，春荒出现，二是村里的一部分青年和牲口支前去了，劳力畜力都有困难。任弼时得知后，立即布置各大队派出工作组，将缺口粮缺种籽和牲口的农户一一登记下来，然后发动大家节衣缩食，帮助群众度荒，又组织劳力和从纵队的二百三十多头牲口中抽出一批帮助群众整地。这些日子，任弼时特别忙碌，除了到各大队去检查干部战士的生活和群众纪律外，经常到地头和老农交谈，商量抗旱播种的办法。经过军民协力奋斗，这一年王家湾一带的庄稼出苗整齐，等到中央纵队转移时，满山遍野的高粱、玉米已经绿油油地长得很高了。

为了保证这个八百人的“国家”顺利进行工作，大量的后勤工作需要任弼时归口安排。中央机关分散转移后，原来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据曾三来电说“机构已解体”印刷厂的机器坚壁在子长，工人们有

的去陇东参加土改，有的转移到吕梁，油印、速记等人员分散去做地方工作，短时间“似尚不易复元”，留在后委的只有一个材料科。在延安时，由各职能部门负责供应的物资，比如办公用的文具，保健用的热水袋、体温表、灌肠器，以至二百三十多头骡马所用的马掌、肚带、缰绳，以及电台的手摇发报机需要的摇手等等，都要由任弼时汇总，电请后委置办，事情虽小但不可一日或缺，中央纵队和后委隔着黄河，为保障中央安全，人员来往又不宜太杂。所以任弼时电告叶剑英、杨尚昆：请通知河东各中央机关，不得随便介绍人来河西，统一由中后委发给介绍信和路条。

敌人“武装游行”所到之处，百般摧残，中央坚壁在各地的文件档案是否有损失呢？这些档案包括整风时编印的《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军事文献》及各种废旧印章；一九四〇年后各根据地的文件，甚至还有记录党内机密的笔记本。任弼时分别电示杨尚昆、师哲、西北局秘书长马明方和材料科的曾三，查明情况，“设法抢出”，转运到安全地区。六月中，马明方报告说：埋藏在永坪七乡的材料被敌刨去百余箱，任弼时特电师哲，与绥德地委商量，派妥当人员“化装秘密去永坪地区查明并处理敌未刨去之物件”，^①而坚壁在安籐岭农场的十六箱中央文件，据曹力如报告“已全部焚毁”，这是任弼时一再叮嘱曹

“负绝对保管责任，在危急时彻底烧毁”，^⑮因此未落敌手。

至于对人的安全，任弼时自然更加操心，四月十七日，到王家湾的第四天，他致电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保护保育院的外籍儿童。这是在延安协助中央工作的国际战友的子弟，撤离延安时，他们的父母随机关转移，在保育院的孩子则和西北局、边区政府一起到子长县的马蹄沟一带。由于敌情紧张，过河不易，任弼时在电报中说：这批孩子“目前只好化装疏散在群众家中。他们（的）父母很挂念这些儿童的安全，将来情势稍稳定，交通安全时，再考虑送去晋绥”，他特别关照林老：“随去护理的人员中最好有护理员带些药品去，请拨边币一千万交这批儿童的负责人，以备急需”。^⑯

敌人的进攻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任弼时的家庭何尝不是如此。国共谈判期间，任弼时把长期在湖南老家的女儿任远志和任远征接到延安，团聚不到一年，战火又使他们分离，陈琼英带着七岁的儿子任远远过黄河到了山西兴县，十六岁的远志和十三岁的远征，任弼时夫妇决心让她们跟随行知中学和抗敌小学的队伍一起行动，经受锻炼。后来行军途中，任远志因患夜盲，跌伤了右脚的趾骨，右腿从脚尖肿到大腿。林柏渠夫人朱敏得知后，把姐妹俩留在她身

边。中央纵队到王家湾后，远志、远征就被送到父亲身边。这一来，任弼时住的半截窑里，增加了两名家属，她们的铺位就在存放杂物的土台上。任弼时叮嘱她们千万不要吵闹，免得影响毛主席、周恩来伯伯的工作。晚上，在孩子们的酣睡声中，他点起油灯伏在炕桌上处理公务。他电请邓颖超转告陈琼英，“我和远志、远征……等都好，因敌进绥德，她们暂仍随我们行动。”早晨起来时，如果周恩来、陆定一还没有睡醒，他们就从窗口爬出去，到村子里去散步。有几天，远志发高烧，任弼时端一盆凉水，拧一条湿毛巾，敷在她的额头，继续去工作，过一会，又换一次毛巾。任远志说：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就能出现父亲忙碌的身影。蟠龙战役后，任就把孩子们送往河西。临分手时，任远志掏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欣然同意，提笔在小本上写了“光明在前”四个字。任远志依依不舍地和远征一起离开王家湾。这天是五月十七日，她们在父亲身边住了二十天左右。鲁迅有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②0}革命者是热爱后代的，所以他们倾注全力为新一代生活在和平、民主、富强的新社会而奋斗！

蟠龙大捷后，胡宗南夜半惊起，令董钊、刘戡两部回师到田庄镇、老君殿、瓦窑堡一带，在绥德不留

一兵。显然，他“盲目乱窜，已失主动”。这时，中央对关内各战场作了部署：一是由刘、邓，陈、粟两军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是准备调吕梁军区陈赓、谢富治兵团的四个旅三万五千人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协力在陕北解决胡宗南系统。五月十二日，任弼时代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并陈赓电，电中说：董钊的“五十五旅向绥德推进已不可能”，陈谢的第五旅到绥德后隐蔽休息，然后相机收复榆林西南的波罗、响水及横山等地，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刘戡的“二十八旅一部，逼退该敌”，主力在晋南停攻安邑、运城，负责肃清乡宁、吉县、蒲城、大宁，“开辟至陕北之道路”。^{②①}

五月十四日，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周恩来在五万人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大会之后，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全军出陇东”，打击青宁二马。这些举措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消灭胡宗南部的信心和决心，同时钳制胡宗南的兵力，使他不敢离开陕北，以便对蒋介石另一个重点进攻的山东战场以支持。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果然，胡宗南说：“就是牺牲两个师的兵力，也要捕捉住中共首脑部”。

一个惊涛骇浪向中央纵队袭来。

六月七日，敌机轰炸王家湾的前后村，但造成的损失不大。第二天，任弼时派出的侦察员们报告：刘戡率四个半旅从东南方向向王家湾袭来，先头离王家湾只有十五华里；董钊所部也从南面经安塞的高桥向保安（志丹县）方向北上。这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进军陇东，远在六七百里以外，留在陕北的只有警七团，随中央纵队行动的仅只四个连，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中央决定撤离王家湾。

如何确定行动方向呢？参谋人员提出的方案是先向北走，再折向东，万不得已时可以到河东暂避一下。任弼时是同意这个方案的。他认为敌人从南面和东南面袭来，中央纵队若往西转移，那里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即使能避敌主力，不远处便是马鸿逵的防区，回旋余地很小；往北行折向东是去绥德方向，那里胡部不留一兵；紧急时秘密过河暂避，也无不可。他的中心目的是保障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这时，毛泽东漏夜工作后刚刚入睡，为了不惊动他，行动方案就这样定下了。下午，毛泽东醒来后，认为这个方案欠妥善。他主张往西走。西边荒凉，胆颤心惊的敌人怕中埋伏；如大部队行动粮食更加困难，即使追来，行进也非常迟缓；往北走青阳岔是一条大道，敌人行动快得多，至于过黄河暂避，毛坚决不同意。毛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胡宗南正希望我过

黄河哩！尽管任弼时认为毛的意见很有道理，但毕竟风险太大。他剴切陈词，但毛不为所动。最后，队伍按毛泽东的意见西行。

六月九日傍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中央纵队派出警戒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离开王家湾。山道泞滑，马不能骑，战士们拉着他们连成一线，在狂风暴雨中跋涉在山岭上行进。不一会，夜气如磐，但见周围的山岭上篝火堆堆，手电筒的光点来回晃动，不时，传来声声冷枪，刘戡的队伍正在漫山遍野搜索。敌人备有美制的测向器，能测出附近的电波，但中央纵队的电台已下令关闭。雨下个不停，警卫战士们知道，毛主席已是五十四岁高龄，从重庆谈判回来后病了大半年；年近半百的周恩来右臂带有旧伤；任弼时虽然小毛泽东十一岁，但他是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老病号，接连奔波身体越来越虚弱。为了保卫首长，战士们站成一圈，用手臂扯起一块油布，让首长们挤坐在中间挡一挡雨。这时，任弼时下令：不许抽烟，不许出声，更不准打手电。队伍走走停停，天色微明时，到了小河村。本想在小河歇歇脚，烤烤衣服，但侦察员报告，敌人窜到了王家湾，离小河村只隔十来里路。队伍只好继续向西转移。

十日晚，又是一个风雨之夜，队伍继续摸黑行进。走到月亮山山岭时，突然停了下来。这是为什么？

原来夜幕漆黑，向导迷失了方向，急得什么似的。任弼时一面安慰老乡，一面派人到半山的一个小村里，另找了一位向导。半夜，队伍到了两山之间的月牙口（也叫月崖口），这里离靖边的天赐湾还有十来里。雨过天清，红日升起时，中央纵队进入天赐湾。

天赐湾村在山岭上，山村比王家湾和小河更小，也更艰难，连喝的水都要到山沟里去挑。大家住得就更加挤了。

队伍在天赐湾生火做饭时，小河方面的敌军出动了，离天赐湾只有二十多里。午后又接到报告，另一路国民党军自南向北袭来，距天赐湾只有十五里地光景。这是董钊的整编第一军。霎时间，形势再度紧张。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围着地图，镇定地仔细分析敌情。据侦察员说，刘戡到了王家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呆了一晚后，往东追赶去了。毛泽东认为敌人没有群众，在边区他们是瞎子，只是盲目乱窜，未必发现我们；南来的敌人可能是去保安的，如果向山上袭来，我们立刻就走，如果他们顺着沟过去，我们就在天赐湾住下。于是布置一个排在村东准备阻击敌人，另派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和敌遭遇，且战且走，把敌人引向西南。这样，中央纵队就在敌人眼皮下，化险为夷。

国民党军远去后，中央纵队在天赐湾住了一周，

架起电台同彭德怀和后委恢复联系。十二日，叶剑英转来王维舟、周士第的电报：董钊的队伍已到巡检司、四乡二村、马家台，十一日尚未到石湾，“你们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此间尚有六七十里空隙）东向小理河”。^{②②}于是，中央纵队重返地处“六七十里空隙”间小河村。任弼时接报后，庆幸之余，不免捏一把冷汗，而毛泽东则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本月九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②③}

在这个惊涛骇浪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坚定意志，和任弼时为保障领袖绝对安全的万一之虑，后人广为传颂。四十多年后，师哲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个小插曲：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中央曾电示，要他立即赶到山西的三交镇，“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②④}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蒋介石的造谣机器，耸人听闻地散布：中共在陕北受挫，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云云。斯大林得到巴黎的传闻后，准备派飞机来接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但第二天，师哲“收到任弼时发来的一封急电，令我暂停前进”。^{②⑤}联系到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造假坟，设假集中营，向中外记者

宣称俘虏共军五万的鬼话，人们自然觉得：蒋介石、胡宗南在战场上极端无能，但制造谎言的惯技却堪称一绝，令人啼笑皆非！这个插曲说明，对毛泽东安危的关怀，岂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事啊！

六月十七日，中央纵队再度转移到小河村，在这里住了一个半月，迎接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

这时，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过去的一年里共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四百三十万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一十万增加到一百九十五万。在兵力分布上，国民党军从山东、晋冀鲁豫、到陕北共摆下一百五十七个旅，其中九十四四个旅深陷在东西两翼，山东六十个旅，陕北三十四个旅，两翼之间的广大地区能机动的兵力仅四十个旅，战场态势状如一个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鲁西南、鄂豫皖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人民解放军除在山东、陕北尚处于防御地位外，“哑铃”中部已取得主动，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六月初，中央和军委立即组织主力，向包括苏、皖、豫、鄂、陕五省的中原地区实施中央突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三万人从鲁北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捷报飞来，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攻克

费县，歼敌一个整编旅，乘胜向枣庄、峄城、兰陵、向城、卞庄（苍山）挺进，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共中央誉之为“大胜利”。^{②6}正在这个期间，三五九旅在山东扩建的渤海教导旅一万一千人在河北武安归建，编入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称独立第六旅。对华野的“大胜利”和陈毅的豪爽风格任弼时颇为赞赏，特为之题词：“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负了最大的任务，立了最大的功劳——华东军民万岁！”^{②7}

面对各战场的胜利，如何使用在晋南待命的陈谢纵队，中央重作考虑，或按原议入陕协同解决胡宗南系统，或渡黄河沿陇海路挺进豫西，不但可以从外线配合陕北作战，迫使胡宗南分兵救援，而且利于刘邓大军南下经略中原，一旦华东野战军在豫皖苏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协同南下，人民解放战争将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七月十九日，陈赓奉令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当面向他交待任务：挺进豫西。

为了适应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小河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了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山东局面最近可以转变，边区基本上停止了敌之进攻，为转变造成了基础。他预计，我

们如能把主力生长到一百五十万，用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有可能解决和蒋介石的斗争。这用不到讲出去，“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在内线作战的一年里，敌深入解放区腹地，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解放军在人力、物力上遇到很大困难。陕甘宁边区在军事和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因此中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负责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项任务。对地方工作，毛泽东说：中心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他强调说：“这些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我们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②⑧}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番号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

在会议期间，任弼时特地请阿洛夫医生到河西来，给到会的同志检查了身体。

小河会议后，任弼时的注意力集中到支持长期战争的土地改革和克服财经困难方面。早在三月间，他致电贺龙派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陈希云和白如冰一起去邯郸，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四月，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

经办事处，着手讨论各解放区共同的财经方针和各项政策。七月初，他请西北局贾拓夫将白如冰等带回来的华北财经会议的各项文件，包括各地的报告和各项统计送他阅读研究，月中，又电示在后委的李维汉和李克农，对各地送来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中，有关土改、财经和武装政策以及反映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的内容，加以整理，分别写成简短扼要的材料，“负责选出其中重要者送此间，帮助我们了解各区的情况”。^{②③}

小河会议前夕，七月十七日，中央工委在河北建屏县（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主持会议的工委书记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问题将牵涉很广”，会议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它未成熟的若干问题，先行讨论，“不作决定”。这时，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已下达一年多时间，各地工作进展颇不平衡，有的地方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而运动展开的地区，已经发现一些“左”的苗头，小河会议上，晋绥的同志向中央作了反映，特别是如何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发扬民主，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纠正基层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如有的地区提出在运动中“农民代表会议暂时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任弼时密切注意这些动向，他为中

央起草复刘少奇的电中提出：“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③④}

为了把土改中发动起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很好地组织起来，任弼时还要求在平山参加土改、整党工作的冯文彬和青委的全体成员，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和各地代表研究如何在运动中试建青年团的组织。

小河会议后，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

地处长城线上的榆林，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是国民党军在晋陕绥边境的重要据点，与西面的宁马、南面的胡宗南集团互成犄角，北面与绥远的傅作义部相呼应，榆林的得失对陕北战局影响甚大。八月七日，刚结束三边战役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包围榆林之时，正是蒋介石亲自到延安督战之日。蒋命令胡宗南：趁共军胶着于榆林外围的时候，国军一举占领陕北各县，然后迅速北上，把共军主力压向黄河边，逼他们背水一战，或者来个半渡而击！

敌人被调动起来了！胡宗南命令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由安塞，靖边出长城，沿伊克昭盟边缘之线

驰援坚守榆林的邓宝珊；董钊、刘戡两军的八个旅从安塞、保安分两路挺进绥德，会合后向黄河边的葭县急进，与钟松部南北夹击，实现蒋的意图。

刘戡沿大理河东进，小河是必经之地。八月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离开小河，赶在敌人之前沿大理河东进，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拢。这时，中央纵队的番号改称“九支队”，由周恩来任司令兼政委。时值陕北雨季，又是入伏天气，晴天骄阳如火，雨天行军艰难，和后追的胡宗南部又只隔六七十里地。队伍在二十天内跨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葭县六个县境，住过十三个村庄，真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八月十九日中央纵队过无定河到达葭县的梁家岔时，董钊、刘戡的队伍还正在向绥德的途中哩！直到八月十五日，董刘两部才在绥德会合。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八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停攻榆林，集中兵力打即将到达榆林的钟松部。十二日，军委又电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将联防军在无定河、黄河之间地域的各后方机关及医院“于五日内分路渡过黄河东，俟敌情变化再回来”。西北野战军则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这时，到达榆林的钟松为抢得头功，即将所率整编第三十六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孤军南下向沙家店东面

的乌龙铺进袭；董钊、刘戡两部会合后，刘的五个旅向葭县北进，董则向米脂进攻。胡宗南得知解放军东渡黄河，以为是主力东撤，为此兴高采烈，严令各军“迅速进击，勿失此千载良机”，钟松口出狂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这时，中央纵队正在黄河与无定河之间东西不过五六十里，米脂和榆林间南北只有三四十里的狭小地域辗转行进，十五日到乌龙铺，十六日深夜到曹家庄，十七日至大会坪。^{⑤①}这一带，周围都是国民党军，战斗一打响，到处是战场，用随行的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的话说，这是中央转战陕北途中，继小河村之后“最危急时”。

彭德怀得知后急电中央涉葭芦河北进，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拢，同时命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连夜赶到乌龙铺一带掩护。任弼时亲到葭芦河边视察水情，但见暴雨过后，河水陡涨，水面洋洋难于徒涉，只好移到“通秦寨南二十里中间土东南五十五里之白龙庙”。^{⑤②}

第二天傍晚，“行至距梁家岔二十五里之杨家园子，为暴雨山洪所阻”。^{⑤③}队伍下得山来，迎面由西向东横隔着的是葭芦河的一条支流五女河，平时水小川宽，所以又叫五女川，但暴雨过后山洪暴发，五女川发了性子，浊浪滚滚，令人目眩头晕，如果徒涉，

脚下一个趔趄，人就会被巨浪卷走。这时枪声炮声从乌龙铺方向传来，敌机又冒雨在头上盘旋。当年在场的陈永清回忆：此时，打前站的队伍已过了河，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亲自来到河边指挥军民架便桥。我们从老乡那里借来一些木料和门板，但是水流湍急，木料递不过河。有位老乡机智地爬上树去，把绳子甩过河南面，拴着木料拖过了河，这才架好了便桥。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先在桥上来回走着试了试，然后请毛主席过桥。

过五女河后，队伍沿河岸向西行。天色黑下来了，一阵雷闪后，大雨跟着倾盆而下，行进不得，纵队部决定重返杨家园子，这里川更宽，河水较浅，毛泽东等便骑马过河。到河心时，只听得上游水声“呜呜”，岸上的人惊呼：“快走呀，山洪下来了！”待毛泽东、任弼时等跃马上南岸，洪峰劈头盖脑地泻了下来。大部分战士被洪水隔在北岸，他们准备强渡。为了大家的安全，任弼时对通讯员说：“快到河边告诉他们，今晚不要过了，就在河北边的村子里住下吧！”当晚二十二时，毛电告彭德怀我们“即在此宿营，明十九日进至梁家岔。”^③

十九日晚，转移到梁家岔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彻夜未眠，在油灯下查看地图，等候隐蔽在葭县西北东元村的西北野战军前敌指挥部的报告，直到

二十日凌晨，前敌指挥部报告：已将钟松的前后梯队在沙家店地区分割包围。接着发起全面进攻。到黄昏时分，胡宗南的三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被分别歼灭。钟松改装换束，乘夜黑逃遁而去！“一战结束”的不是人民解放军，而是骄纵的钟松部！

沙家店战役告捷后，西北野战军转入了战略反攻。

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梁家岔出发，骑马来到前敌指挥部，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在彭德怀陪同下察看了战场。二十四日下午，纵队转移到葭县的朱官寨。这时捷报传来，陈谢兵团八万余人在陕县、洛阳之间飞渡黄河，乘胜切断陇海路，东逼洛阳、郑州，西叩潼关、西安。同一天，西北野战军收复关中分区全境。胡宗南在“千载良机”中，丢了一个主力整编师，急命董、刘两军回师米脂，二十七日，沿咸（阳）榆（林）公路南撤，拱卫西安和关中。他已经手忙脚乱了！

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今后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⑤令出行随。刘邓大军“坚决不要后方”，渡黄河后，千里跃进大别山，而后“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建设大别山根据地；陈谢在洛阳至陕县间避强

打弱，以运动战广占敌区，奋战月余，十一月建立了鄂豫陕边根据地；华东野战军的西线兵团，九月上旬在郾城沙土集歼敌一个师后，打开南线局面，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路间创造巩固根据地，扩大了豫皖苏解放区，协助刘邓、陈谢创建鄂豫皖、鄂豫陕两大根据地。三路大军向外线挺进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坚持内线作战，原来是蒋介石进攻的两个重点，此时转化为在东西两翼钳制敌军、保证外线兵团站稳脚跟、促进全局变化的重要战场。

在捷报频传中，中央纵队从八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二十日的三个月间，始终在葭县境内辗转，在朱官寨住了一个月，在南河底住了八天，在神泉堡住了近两个月。

在战局迅速转变的重要时刻，前方后方，新老解放区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及时制订政策，提出办法。这期间，任弼时致力于研究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部队进入外线后的新问题，以及正在蓬勃展开的土改整党运动。这是进一步打击敌人，巩固内部和克服目前困难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先说财政经济工作。

早在五月初，华北财经会议期间，任弼时研究了

会议第十八号情况报告后，曾为中央起草给薄一波的电报，要求会议制订各解放区共同的财经工作方针和政策，研究脱离生产人员的比例，人民负担的标准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相互调剂的办法等。会议形成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目前财经工作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在精兵简政、艰苦奋斗的原则下，努力开辟财源，即一部分取之于民，一部分取之于己，一部分取之于敌。取之于己者，即鼓励各机关部队将生产收入、公营商店企业积累的资财捐输归公。为支持长期战争，会议认为人民负担可能占其生产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兵员人数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一点五。支用民夫，除战斗部队抬送伤病员，运输粮食弹药外，“其它当严厉禁止”，等等。十月二十四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了《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存在；对于发展农业、副业、手工业生产，发展合作事业等，“尚缺乏认真的坚持的贯彻到底的精神”，因此对于保护和扶助解放区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缺少注意，或注意不够。“这就不可能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并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指示规定：

“在土地改革完成地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要注意节用民力），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它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内部的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③⑥}

关于出征部队的供给，这是部队进入外线后的新问题。考虑到各军所到的地区经济条件和工作基础各不相同，十一月十一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出征部队供给等问题的规定》中，实事求是地指出：五大战略区统一财政收支的条件尚未成熟，“过早实行统一，其困难将比各区独立收支自编预算还要大得多。因此，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准备将来实行解放区财政经济完全集中统一。出征部队独自经营的规定是：

（甲）伸出蒋管区作战的部队进到新区后，应利用缴获和没收的物资作自力更生的打算，支持长期

战争，“不仅粮食应当取给于当地，弹药取之于敌人”，被服、菜金与办公费用也要就地解决，兵员补充“除争取俘虏外，还得努力就地扩兵”，以适应部队离原解放区距离较远、运输困难的特点，也为了减轻部队原属地区的负担。原所属地区“应当就力之所能来补助出征部队，使他渡过困难”。

（乙）和老解放区联在一起的新开辟区，出征部队的供给“仍由原区统一筹划”，其缴获的粮食、资财，“除一部分分给群众外，要充作自己预算以内的开支；一切多余资财必须负责保存上缴”。

（丙）新开辟区与老区尚未联接的地区，可扩大老区的货币流通范围；离老区较远的新创建的游击根据地，可建立银行，发行纸币。高级党委和财经主管人，要切实掌握发行数量，巩固票币信用，保障金融稳定，“绝不能单靠发行来解决财政困难”。

电中告诫出征部队首长和党的领导：在新创根据地内，如果不能一开始注意建立财经工作，不规定严格的财政供给制度，“那是很容易发生浪费财力物力以致于后来遭遇严重困难，甚至被迫要放弃已经取得阵地的”，而基本的是在于“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土地改革，组织群众生产运动，以及正确的组织税收贸易金融等工作”。^{③⑦}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的道理，而人民解放军却能够在无后方作战的条件下，制订正确的政策，依靠人民，在新开辟地区生根开花，发展生产，提高军民生活，这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

再说群众组织的建设。

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在刘少奇和朱德的关怀下，对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闭幕后，青委和妇委的负责人分别召开部门会议，先后向中央报告工作。

九月二十二日，在葭县朱官寨，任弼时收到刘少奇、朱德和冯文彬的来电，向中央提议明年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青年团。来电认为这不但是形势发展和“整个群众”的需要，也是当前土改和战争的需要；从提高党组织的质量来说，也“需要一个助手，还需要一个训练后备军的学校”。中央青委计划：半年内，在冀中和平山两个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取得在土改中建团的经验，半年后，开办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出版团刊《中国青年》，并已派人去东北传达会议精神，帮助建团工作，去山东挑选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十月二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拟电，复刘少奇、朱德和冯文彬，同意建团的提议和布置。^{③⑧}从此，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九月二十六日，在葭县神泉堡，任弼时又收到邓颖超、康克清等五人关于妇女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十月六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复电，表示同意妇委所提方针，目前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为中心；土改完成的地区，要全力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运动。在土改、生产和支前中，大批妇女干部会涌现出来，“我们在这些运动中要好好努力去提拔培养她们，使她们不仅能作妇女中的工作，而且参加政权的各个部门和党的以及其他各种工作。”^⑨

至于工人运动，任弼时电告廖承志，派人先在晋冀鲁豫及晋察冀收集材料，然后在中央工委领导下，对解放区工运方针“作一次有系统的检讨”，总结经验，制订工作方针。并说，届时可请在东北的李颀伯参加。^⑩

这时，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土地法大纲》草案由中央工委送来了。任弼时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因此毛泽东委托他对《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认真地加以研究和修改。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⑪

任弼时感到，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批评右的错误相比，难度更大，需要更多了解实际情况，明确政策界线，特别是端正分析阶级成分的标准，而这是全国土地会议所没有完成的，但是必须加以完成的。

可惜，正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病犯了！

撤离延安后的八个月间，他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山峁和纵横交错的沟岔间，辗转行军；盛夏的骄阳，深秋的风霜；月牙口的暴雨，五女河的山洪；加上工作繁忙，起居无定时；在朱官寨吃的是用米糠秕谷、瓜菜和黑豆片熬成的“钱钱饭”，^⑫这对于一个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任弼时，怎能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身子从炕上摔到地下，他病倒了。

遵照中共中央的安排，他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这时是十一月中旬。

三十六、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胡宗南缩回延安。西北人民解放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用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人民解放军连克米脂、葭县，胡宗南部向绥德、清涧一线南逃。到十月中，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十月底，人民解放军以三个纵队，开始进攻榆林外围的据点。这时，中央纵队准备在葭米地区长驻。因为葭县距榆林较近，为安全计，中央纵队于十月二十二日，从葭县的神泉堡移到米脂的杨家沟。

杨家沟是陕北出名的地主庄园集中的地方，全村七十二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十八万亩土地。这里离米脂县城约四十华里，环境安静，窑房宽敞。特别是西边山峁上的“扶风寨”，碉墙高筑，院

内一字儿排开九孔窑洞，有传统式的拱形窑，现代式的平房窑；细石砌成的窑面，顶上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下面是明晃晃的玻璃窗。出寨门，一条石砌的盘山道通往沟底。沟口的大路两旁，林林众众树着马姓地主的神道碑和石牌坊。这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标本。如今换了天地，那些神道碑已被推倒，这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一个老红军李盛林，亲手刻了一块劳动人民翻身纪念碑；而“扶风寨”和附近的庄园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中央纵队。此时，纵队的代号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十月中，为了加强警卫工作，从太行来了六百名新战士，原有八百人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人。现在，这里正集中全力指挥各路大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进攻，指导着一场反对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

任弼时住在距杨家沟约十里的钱家河。这个小山村是骑兵连的驻地，环境幽静，利于休养。因为这时他的舒张压（高压）已经升到二百二十水银柱，超过健康人近一倍，所以经常头晕，行走时拄着手杖。为了照顾他的生活，陈琮英带着任远远从兴县来到钱家河。不久，苏联医生阿洛夫也到了杨家沟。

在钱家河养病期间，任弼时每天要阅读来往的

电报和文件，头疼时，便在炕上躺一会，接着又让秘书或陈琮英念给他听；时而到村子里去散步，背着猎枪去打猎。这时骑兵连正在紧张地冬训。一天，任弼时来到连部，伫立在墙上张贴着的战士们投手榴弹的成绩表前，他发现有一位叫金万荣的战士，投弹成绩达六十米，便问指导员方仲实：“他一定是个大个子吧？”方指导员回答说：“个子不大，是个副排长，从小放羊出身！”任弼时惊讶地说：“快请来让我见见，他有什么好经验。”金万荣来到连部向任弼时汇报了他起早贪黑刻苦训练和掌握要领的办法后，任弼时高兴地点点头，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很好，你要把经验教给大家。”临走时，他对方指导员说：“战士们练兵这么累，以后不要给我们派警卫了。”又指着警卫员背的枪说，“我们自己警卫自己罢！”指导员得体地回答说：“我们只能听团长的。”

在神泉堡时，任弼时曾电示廖承志派人收集解放区工人运动的材料，作一次系统的总结，并说届时可请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秘书长李颀伯参加。一天，李颀伯从东北来到钱家河，向任弼时汇报东北工人运动的情况。对远道来汇报工作的干部，任弼时热情地问这问那，谈话时间很长。护理人员提醒客人：“弼时同志身体不好，请你注意时间。”李颀伯为难地说：“我越谈得简要，可他问得越详细。”有时，

护理人员劝他们出去散散步。任弼时一边散步，一边又开始问话。这是为什么？因为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是任弼时负责主管的，青年团和妇联的工作方针，中央已发了文件，而在工人运动方面，由于解放战争的发展，各地工人运动走向大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可能和必要召开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任弼时和李颀伯围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筹备召开全国劳动大会问题进行详细交谈。谈话时停时续，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一九四八年一月原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朱学范从伦敦进入东北解放区，声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由陈云主持，八月在哈尔滨召开。

一天，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来钱家河，在汇报电台工作时，提到有些业务人员和电政人员，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机房收发译校电报，健康状况逐渐恶化，需要有一种休息制度。任弼时十分重视这个意见。他立即写信给后委的负责人叶剑英和杨尚昆，应“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此种补助应从人员的体质出发，打破平均主义，“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经与戴同志初步商定，在三交约有四五十名左右（河西除外），拟每月每人补助三斤小秤的猪肉，从本年十二月份起每月上旬按市价由特会科

付款”；至于休息制度，任弼时写道：“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除军委二局的人员外，“三局与机要处同志也须有轮流休息之必要，可合并决定办法。”^①他关心别人比自己为重。

当然，最令任弼时关心的事，莫过于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股“左”的错误倾向，它破坏党的政策，搅乱阶级阵线，冲击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正确航向。

这股“左”的错误倾向是怎样出现的呢？首先来源于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晋绥地区是老解放区，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七年，其间经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和“四大动员”^②等运动。由减租减息转入土地改革后，晋绥分局调查情况，制订《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训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在分局副书记张稼夫领导下准备分四类地区加以指导。二月中，中央派康生、陈伯达到晋绥，分别在临县的郝家坡和兴县的后木栏干村“蹲点”。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下车伊始就批评晋绥土改右了。他指着晋绥编写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小册子，说：“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定，那是搬教条”，“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的，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在晋绥是不能用的。”甚至下令将后来毛泽东称赞为“马列主义文件”的小册子烧

掉。随着，他提出划分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三条都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用陈伯达的语言说，是要查三代历史，看铺的摊摊大小和看政治态度。这样就搅乱了标准，扩大了打击面，康生所在的临县，据一百二十一个行政村统计，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陈伯达在后木栏干村，为了查三代历史，竟派人去查看墓碑，全村五十三户，定为地主富农的二十一户，占户数的百分之四十，远远超过了地主富农合占农户百分之八的正确估计。这样就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地主，中农错划成富农。抗战期间，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中央正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土地改革开始后，不少基层干部阶级观念模糊，有的包庇地富，有的多占斗争果实。在运动中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应该的，其中有些干部对康生等的错误做法不满，于是康生一律把他们看成是土改运动的阻力和“绊脚石”，提出要“搬石头”，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抛开党的基层组织，甚至发展到解散党的县委。在七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康生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以致流毒各地；而晋绥地

区则越演越烈，发展到乱斗乱杀，破坏统一战线，把爱国人士、开明绅士晋绥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牛友兰游斗致死，副议长刘少白在三千人的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宣布撤职。

病中的任弼时，读了《晋绥日报》发表斗争刘少白的长篇报道和《土改通讯》上《后木栏干调查报告》时，感到非常吃惊，非常不安。他特地请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过河来汇报情况。

对于土改中“左”的倾向，任弼时在钱家河之前就开始注意。早在九月二十六日，中央工委对中共冀东地区党委的指示中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名称或称农民代表会，或称人民代表会均可”，“但在土改中，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反动分子，均不应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③这是从抗日战争转入人民解放战争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反映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新情况，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因此，任弼时“再三考虑”后，致书毛泽东，一面同意将工委原电转发各地“采择试行”，一面建议在原电中加两个“注”：“一个是指出各级代表会的名称以用人民代表会为妥”，他根据掌握的实际情况写道：“现在许多地方的农会多系贫农会，其中只有少数好的中农参加，如用农民代表会，则将有一批中农也不能参加，而用人民代表

会，人们感觉要民主一些”，对此，他曾经征求了葭县县委的意见，“葭县县委同志有此意见”。另一个注，“是在指出地主富农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地方，加上‘新式富农应除外’”的限制。他写道：“在民主政权下，由贫雇中农上升为富农者，剥去其选举权似不妥，也不必要，如吴满有式的富农，剥去其选举权将产生不好影响。”

鉴于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左”的做法正在发展，任弼时在信中进一步写道：

“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否应完全如旧式富农同样处理，也值得考虑。下面由富农手里拿出多余财产等，多是采取逼、吊、打的办法；同时，新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都拿出来，在农民中会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可否规定对新式富农多余的土地，应当劝说他们自动拿出平分（如对富裕中农一样），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财产、耕牛和农具，除自愿献出分给贫苦农民者外不动，或简直规定不动他们多余的东西（土地除外，即土地应平分），以示与对旧式富农处理的分别。”

对新式富农多余财产的处理，任弼时谨慎地说：“究应如何处理为妥，还无成熟意见”，提请毛泽东“考虑一下”。^①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这样，在中

共中央转发工委的指示时，在政权名称处加上了：“一般以称人民代表会议为妥——中央注”；在地主富农“均不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处，又加上：“新式富农除外——中央注”。这两个注，对于团结全体中农及其他阶层人民，在民主权利上区别对待新式富农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任弼时注意“左”倾偏向的第一项举措。心底无私天地宽，任弼时的政策观念和直陈己见的风格，于细微处见精神。

全国土地会议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分的基本政策，为在全国推翻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但是，会议对土改工作没有形成纲领性的总结，没有制发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对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也没有及时注意。任弼时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正如刘少奇所说，土改运动中“问题牵涉很广”，如果政策不完善，就会错乱阶级阵营，影响社会安定，最终影响革命战争的成败。为了贯彻当年二月指示^⑤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群众，孤立少数封建反动分子的精神，和小河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指示，任弼时认为纠正群众运动中“左”的倾向，关键是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他从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以及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多次面临过这个问题，

因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最后写道：“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得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对这个问题，既需要作历史的考察，又要研究各地现行的做法。一九三三年十月，毛泽东为了纠正查田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曾经起草过一个《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批准后下发执行。但这个文件这时已难以找到。十月九日，即土地法大纲公布的头一天，任弼时电示在晋绥的曾三，请他查找一九三三年的这个文件。过了半个月，谢觉哉来到神泉堡，任弼时和周恩来、陆定一同谢老“夜谈至十二时”，^⑥他乘机打问谢老。谢老记得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把划阶级成分的两个历史文件作为附件下发过。二十六日，任弼时跟踪求索，致电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此间急须此件，请嘱人查出并即派人送给我们。”^⑦十一月八日，他为中央致电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局、太行局：“请将你区在土改中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即如何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的材料，日内电告我们。”^⑧其殷切的心情，溢于电文。

电报发出后不久，任弼时病了，移住到钱家河。他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

的村子进行调查，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同时，布置身边的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调查一个村、一个户的人口数、土地数，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又让他们在外出购物时，问小商人生意好不好做，怕不怕被没收等，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任弼时。处处留意皆学问。这样，任弼时汇总分析，掌握了周围三十几个村子的基本情况。

十一月下旬，任弼时终于找得了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二十九日，中央决定将这两个历史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中央指出两个文件中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要各地党委、政府、农会及土改工作团根据“具体情况，参考此项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各地“规定阶级成分时，应召集有经验与有正确观点的同志开会，经过正式讨论通过，并将有争论之点电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话：“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

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⑨与此同时，毛泽东派胡乔木专程将这些文件，送给晋绥分局的领导干部，请他们改正划分阶级中的混乱现象。这是任弼时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的第二个举措，是中共中央根据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文件中正式提出要“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的开始。

任弼时在钱家河养病还不满二十天，便回到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尽管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因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他又是会议的秘书长，所以到杨家沟后即投入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会前，毛泽东撰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文章，提交会议讨论，又重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毛泽东写的《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和有关的资料，包括军事和土改的情况等。

杨家沟会议（又称十二月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到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分成政治、军事和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任弼时主持土改小

组，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都参加土改小组讨论，大家集中地反映土改中有关的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

谢觉哉在会议期间的日记（十二月十三日）中这样写道：

“分析阶级只有一个即生产手段的占有。……不用生活而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是我们分析阶级与其他分阶级不同的界线。……中国没有中立中农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封建，经过了三次革命经验，无产阶级能给他利益。以后也没有中立中农问题，他不是中间派。

“为了打仗与生产，必与中农团结，牵涉中农的事，必要得中农同意。……农会可以贫雇农三分之二，中农三分之一。不可没有中农代表或太少。对中农不可用强力。”“地富（旧）只能是人口百分之八左右，平均数，有地方多或少一点。……某些乡搞到地富占百分之二、三十，领导机关应看到这件事。……化形，化为工商业了，没有坏处”。^⑩

谢老说的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二三十”的地方，指的是兴县的蔡家崖。那里划定的地主富农户合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六，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六，“其中以北坡最多，占户数百分之七十二点七，占人数百分

之七十八点八”，另一个就是陈伯达“蹲点”的后木栏于村。叶剑英因此语重心长地说：“内战时由于‘左’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的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⑪习仲勋、李井泉、赵林等都在会上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情况。任弼时认真地听取情况和大家中肯的意见，为他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作准备。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政治上，蒋介石孤立了，人心向我。蒋虽然下了“戡乱”的总动员令，^⑫但城市群众运动并未低落，地主富农子弟的学生，土地改革以后，并不是造我们的反，而是造蒋介石的反。军事上，我们转入了进攻，蒋转入防御。经济方面，蒋的困难已很严重，我们虽然也有困难，但我们有了土地改革，主力又打出去了，我们的困难可以克服。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就是主要得力于土地改革。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

的政策，依靠群众，不间断地进攻，准备四五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打倒蒋介石。因此，在统一战线方面，总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土改和整党方面，注意“左”右两种倾向，反对对于消灭封建阶级和驱除党内坏分子的动摇，反对对工商业和知识分子、对开明士绅的冒险政策。地主阶级中，和我们同过患难的人士，在不妨碍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个别情况加以照顾还是必要的。杀戒问题，也要反“左”反右，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从群众利益着想当作劳动力保存。世界反动势力发动第三次大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各国人民的方针应是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⑩。会议完全拥护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并在决定中指出：毛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带有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经过相当一个时期的研究和思考，综合了准备会议阶段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他鲜明地对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他说：

“双十节发表的四个文件^⑪提出了打倒蒋介石、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任务。消灭

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组织，是一件大事，党内党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用种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有些‘左’，山东渤海的情况亦然，恐怕各地均不例外，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接着，任弼时针对运动中业已出现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若干政策界限。他说：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和被选本权。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土地平分，

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订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应尽可能退回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由于划分阶级的标准中央已发了指示，因此，任弼时的发言中着重从财产处理、政治权利和斗争分寸方面来区别界限。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中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但缺点跟着来了，这就是党内不纯，有一些基层组织被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

氓分子所把持，他们利用职权，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土改不能彻底，因此必须在土改运动中“整编党的队伍”。任弼时同意毛的估计。他说：

在历史转变时期，必然会有一批人从前进的列车上被摔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据晋绥一个地方估计，需要洗刷的党员约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陕甘宁可能也差不多，要下这个决心，在群众运动中加以审查、清除。有些基层组织被地主、富农和坏分子操纵了，必要时超越旧圈圈是应该的，但是好的支部不要抛开。晋察冀的做法是经过支部，先召集贫雇农党员骨干开会，再召开党的支部会，吸收群众代表参加，进行批评审查，这个经验可以试用。

任弼时又提出：干部脱离群众要作分析，其中有一部分应由上级负责。在群众审查中，一时激愤，难免出现打人现象，“因此，可以规定：放手批评，不要打人；承认错误，准许说理；如果违法，依法处理。依法处理的好处是可以调查，比较冷静。”最后，他说：“土改整党是很细致的工作，欲速则不达。期以三年，今年、明年、后年，分期分批，全部彻底搞完。”^⑮

毛泽东非常重视任弼时的发言，十二月二十八

日，他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①⑥}

杨家沟会议后，任弼时回到钱家河。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准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中央决定由任弼时在会上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因此，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元旦假日，任弼时集中精力起草讲稿。他进一步阅读各地送来的材料，非常细致地核对各种基本数据，精确估量客观情况。比如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乡村工人及其他一切无地少地农民“在老解放区一般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估量和其他解放区的统计和估计，有明显的出入。为了核实情况，一月八日，任弼时致电刘少奇：“据太行《团结人口百分之九十》小册子中统计，则中农在土地分散地区，在抗战前即约占人口百分之四五十，现应更形增加。晋绥、陕甘宁，新旧中农合计，据估计与部分统计，亦多在农村人口半数左右”，如此，则老区雇农、贫农及其他无地少地的农民占人口的比重不可能“仍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在电报中询问，“所说是否根据其他各地情况，望告。”^{①⑦}十日，刘少奇复

电说：“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不很充分的，因此以不写这个数字为宜。”

一月十二日，在杨家沟小学的大教室里，任弼时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稿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传达了中央扩大会议的有关政策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意义上阐明了：分析阶级的标准，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六个方面的问题，这是纠正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力作。

根据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任弼时说：“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在农村，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因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这关系到毛主席告诫我们的“要划清界线，分清敌我，孤立敌人，分化敌人，不要孤立自己”问题。但蔡家崖行政村却错误地加上了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三项内容，所评定一百二十四户地主富农中，有五十多户是错的，他们被“算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这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把自己队伍里面的人，送到敌人方面去，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他具体阐明了分析地主、富

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后说：区别富农与中农，“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他根据中央最近决定，在报告中宣布：中农如雇人放牛或拦羊，请零工、月工，甚至雇个把长工，或有少量土地出租，或放少量的债，“而这种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这项新规定比一九三三年规定百分之十五的限度更宽一些了。毛泽东在划分阶级问题上，加写了一段话：“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分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那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关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任弼时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占人口的比重，“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他们在过去打日本人和现在打蒋介石，出钱出力不少，支援战争有功劳，现在我们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在由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新老中农，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比较完备的生产工具，可以

给贫雇农以帮助。在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因此，错订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在这里，毛泽东又尖锐地加写道：侵犯中农利益，“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和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是保障胜利的条件，也是清醒的革命家和鲁莽分子的重要区别。任弼时指出：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为保障斗争胜利，他从策略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不但混淆了政策，过火地打击富农，是会引起中农惧怕的。

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打下其威风，“是必要的”，中小地主与非恶霸，只要拿出土地财产来，政治上低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在这里，任弼时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对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发展的机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我们对地主个人所以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其劳动改造，是“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小的一批生产力，我们不应当抛弃这批生产力”，而且，“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为了发展生产力，他强调“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陕北神木地区的高家堡，我军收复时，连小商贩也没收了，“这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

正的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其中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地主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者，是否没收呢？他说：“不可以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保护和鼓励这些工商业，因为这样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需要的”。农民从眼前利益出发，要求没收分配，应加以说服教育；“如果我们批准这样做，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要受处罚”。毛泽东加写道：“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任弼时高瞻远瞩，从建立人民共和国需要的高度来阐述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他说：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是可以为着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国家服务的”，“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同时教育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地富家庭出身现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还没有事做，只要他们遵守政策法令，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任弼时重申，在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吸收开明绅士参加“三三制”政权“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他告诫到会的军队干部，“你们假如出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毛泽东加写道：“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任弼时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

“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中很多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所忠诚拥护的”，任弼时说，“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做了许多对不起群众的事。”对他们的错误应当有分析，属于完全违背领导机关历次指示的，如多分果实，贪污腐化，假公济私，横行霸道等，“那是要干部本人负责的”；属于强迫命令，作风不民主，甚至在催粮草、派担架等紧急任务中，打骂了群众，“这样的事不能完全由下面地方工作干部负责，上面领导机关交给任务太多，时间规定太急，平时对民主作风的教育太少，也有责任”。这些区别群众常常不容易分得清楚，审查时，一面要准许群众放手批评，但不准动手打人；同时要被审查的干部向群众承认错误，不许报复。在审查会上“准许被审查者有充分说理之权，不准说理是不民主的”。毛泽东加写道：“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⑮

对任弼时的这篇讲话，毛泽东给予高度的重视，他亲笔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

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①9}

杨家沟会议期间，中央工委送来《关于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指示》（草案），鉴于当前“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建议“不发这个书面指示”，而是“针对目前运动中发生的新鲜问题”请刘以个人名义写几篇文章发表。^{②0}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原则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几个基本政策的决定》（又称《中央一月决定》），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的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三月一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指示，仅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六篇。任弼时的公开讲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系列对党内指示，使纠正“左”的错误形成了强大的声势。

任弼时的讲演播发后，各方反映强烈。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员作新解放区土改工作报告时说：“这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

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②①}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②②}同时，中共中央根据杨家沟会议的新精神，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六条，关于按乡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加上了一个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周恩来起草的“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②③}

尽管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左”倾错误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支流，但是，任弼时以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和思考，率先敲响警钟，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工委的同志们一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旗帜，拨正航向，推动历史前进！

这年，陕北葭米地区，久旱不雨，农民收成薄，

加上敌胡宗南骚扰，所到之处，宰鸡杀猪，抢夺粮食，入冬以后，有些农户靠吃山药蛋、菜蔬过日子，十天二十天不见粮食。但是，为了打胡宗南，他们节衣缩食来完成公粮任务，他们不说负担重，只怨收得太少。任弼时深知群众的困难，尽可能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中央纵队用的信封多是用旧报纸糊的，起草文电，常常用废旧印刷品的背面。纵队的陈永清向任弼时转达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的意见：中央的经费我们全包下来，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任弼时总是告诫陈永清：“边区政府也很困难，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东西，可以要一点；有些东西可要可不要，没有那东西也可以过日子！”有一次，陈永清看到任弼时炕上铺的单子，破得不像样子，打算给他换个新的。任弼时说：“不要，不要，你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②①}他自奉总是那样俭约。

春节快来临了，任弼时从钱家河搬回杨家沟。毛泽东委托他召集附近村里的烈军属，开个座谈会。农历正月初五日（二月十四日）那天，杨家沟、寺沟、巩家沟、李村屹崂的烈军属代表四五十人，聚集在“扶风寨”附近的院里座谈。任弼时代表毛主席问大家春节好，向大家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接着问大家：“马上要春耕了，你们的亲人多在前方打仗，家里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咱们一块想办法解决。”

大家说，毛主席领导咱们闹土改，发救济粮，又派医生给治病；就是有点儿困难，咋能好意思提出来！经任弼时一再动员，这才说：“家里缺劳力，就怕不能按时种上地。”这时，中央已督促地方政府做好烈军属的代耕工作，纵队也派人帮助村里到保安去买牲口，所以，任弼时说：“大家放心，一定不教耽误春耕。”中午，任弼时陪同大家吃了一餐饭，伙房给焖了小米饭，又炒了猪肉。饭后，大家交谈到太阳偏西，任弼时送大家下了“扶风寨”。

这时，经过新式整军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三月一日，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师部和所辖四个旅，共二万三千余人，击毙中将军长刘戡、第九十师师长中将严明，少将旅长两名；俘师和旅级少将五名。当天晚上，“扶风寨”院里举行了祝捷晚会，毛泽东、周恩来带头和大家一起扭大秧歌，任弼时精神焕发，坐在一旁拉着胡琴伴奏。

接着，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凌厉攻势，发起黄龙出战役。半个月之内，先后攻克宜川，解放中部（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郃县。三月十九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公报：撤离延安的一周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多人，生俘六万三千六百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

与解放城镇二十二座。残敌向延安、洛川方向溃退。

一年来，“最小的指挥部”在陕北的山峁沟岔间，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如今，国民党军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区还有主动权外，“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为了直接指挥全国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把陕甘的军事全权委托彭德怀等“独立担任”，决定率中央纵队离开陕北，东移到华北和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前，任弼时给米脂县县长乔备果写信请他到杨家沟来。乔备果原在延安县工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中央纵队移驻杨家沟后，为照顾纵队的生活和安全，西北局调他到米脂县担任县长。乔备果回忆这次见面时写道：

“毛主席很风趣地说：撤出延安时，我稍微走得慢了点，彭老总就命令我快走。我是属于他管嘛，得听他的命令。今天，我们准备离开杨家沟，要走了，所以才请你来的。我们是属于你所管的米脂县的黎民嘛，我们是你所管的庶民，不能不办迁移户口手续。总不能不告而别，悄悄地走呀！

“任弼时同志接着说：我们和别的机关部队一样，节约粮食，支援灾区嘛。从去年八月份起，规定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二两，共计节省粮

食两千来斤。现在交给你们，去支援灾民。

我说：谢谢党中央、毛主席对灾民的关怀和接济。

任弼时同志紧接着说：这还要谢吗？这些粮食不是陕甘宁边区农民生产的，便是河东那边的农民生产的。如果说有点意义的话，那就在于它是从每个人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用来接济灾民，理所当然。我们多少年来不就是这样渡过来的吗！”^⑤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任弼时和叶子龙、乔备果爬上杨家岭山顶，去观察天色。这时东方微熹，群山染上一层朝晖，天空瓦蓝瓦蓝，没有半点乌云，预示着不会有大风沙。下山后，战士们正在挑水、扫院子，归还借用群众的东西。上午九时许，丽日照进山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离开驻住了一百二十一天的杨家沟。

队伍转过山岭，下了坡，刚出东门，只见男女老少乡亲排列着队伍，等候毛泽东等到来，妇女们手里提着一串一串的“燕儿”，准备送给中央首长和战士们。

送春燕是陕北老乡的风俗。每到清明时节，妇女们使用积攒下来的白面捏成飞燕、卧猪、跪羊、蟠龙等象征吉祥的动物，蒸熟以后，上面点着胭脂，用绳

子穿起来，每两个中间串一粒红枣，小的每个半两，一串二三十，供孩子们吃着玩，大的春燕，每个四五两，大燕儿背上驮着小燕儿，这是敬长辈的，琳琅满目，颇为好看。虽然农事节气还没有到清明，为了欢送中央纵队，妇女们提前蒸了这稀罕的礼物。见队伍过来时，大家便捧着“燕儿”迎上去，献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当毛泽东等婉言谢辞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军民间说说笑笑，互相叮咛，军民的队伍融合在一起，向东南方向徐徐移动。尽管任弼时几次劝老乡们回去，可谁也不愿意，不知不觉，到了离杨家沟十华里的蔺家寺，任弼时这才让战士排成一行横队劝阻老乡们继续送行。大家依依不舍地站下来，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挥手致意。队伍走出一段路以后，回头看，远处的山岭上还聚集着一部分老乡，遥望着朝螳螂峪方向走去队伍，影影绰绰地看到他们挥动着手臂……。

三十七、春风送暖到平山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离开葭县的刘家坪，经螭蛭峪镇，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这时，十几条木船和几十名船工已等候在渡口。

川口渡一带，黄河河面开阔，水势平稳，要不是夹带着泥沙的黄澄澄水色，和对岸笔陡的石崖，仿佛和悠悠湘江一般。这时，离清明节还有十来天，春风艳阳中，中央纵队安然地渡过黄河。

过了黄河，便是晋绥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骑马沿河东而下，经碛口，在寨则山村宿营。这一天，任弼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薄一波和华北财经会议的电报。

华北财经会议是三月十五日在石家庄开始举行的，这是一九四七年邯郸会议之后，研究财经问题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从今年年初起，南渡黄河的各路人

民解放军，为消灭蒋介石集团的主力正在向前推进。北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经联成一片，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拔钉子”，即扫除占据平津、太原和临汾等孤城的敌军。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大区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财经办事处为此召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研究解决统一华北各区的货币，交流物资和制订金融、贸易、商业政策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任弼时起草的电报中提出：（一）如何节用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人民负担，支持长期战争。（二）出动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部队所应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以便在新区立足。同时，应讨论尽快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工业，“达到解放区经济上基本能自给”，希望会议提出适合可行的解决办法，“再提中央审查”。^①

三月二十四日，一场春雪。毛泽东、任弼时等沿着崎岖山路，骑马踏雪，循湫水河上行，到临县的三交镇，这里是一部分中央机关的驻地。因为中央后方委员会驻在附近的双塔镇，队伍便驱车继续北行。这时，后委书记叶剑英已率一部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去河北建屏县的西柏坡村（今属平山），由秘书长杨尚昆负责接待。晚饭以后，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到三交镇看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随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共同商定分两路行军：毛、周、任

和陆定一、胡乔木等，携带一部电台和一部分警卫人员共一百多人，乘吉普车经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所在地先行，其他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徒步向西柏坡行进。第二天下午，队伍出发前，召开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任弼时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勉励大家说：“我们的前面是中央机关的队伍，很庞大，吴老、徐老都在前面，还有又说又笑的小朋友，一个毛驴驮两个，一头骡子驮四个，他们快到目的地了。我们是经过战争锻炼的，十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胜利进军，沿途要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完成行军任务。”

在双塔镇住了一宿后，第二天上午，队伍即坐车出发，此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中型吉普，陆定一、师哲、胡乔木坐小吉普，电台和警卫人员分乘几辆军用卡车。这都是美国制造经过“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所提供的，说来耐人寻味。冰融雪化，道路泛浆，车行时常受阻，有时不得不停下来，在田间劳动的群众帮助下，用石块、树枝填道。机械化仍然离不开群众，又颇发人深省。直到傍晚，车队才到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蔡家崖。

蔡家崖是个大村，军区司令部在村西头，原是开明绅士、晋绥解放区临时参议员牛友兰的宅第。牛是爱国人士，抗战中拥护八路军，向群众献了土地，把

宅第让作军用。宅第宽敞，内有花园，园门一联：“蔚水映衡居，隐居求志；环山结茅舍，小住为佳。”现在宅第完好，牛友兰却死于土改的“左”倾潮流中。杨尚昆回忆道：毛泽东在三交时曾严厉批评，“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究竟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②第二天，贺龙、李井泉向毛泽东等汇报工作时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地纠正了土改整党中“左”的或右的偏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使我们每个干部增加了许多新知识，加强了政策观念。贺又说：我们在解放区呆惯了，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那些工厂，好象都是反动派的，都应当没收，现在才知道，进城后，我们还要发展工商业，来为城乡人民服务。

在蔡家崖的十天里，任弼时陪同毛泽东，听了三天汇报，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在《晋绥日报》编辑部讲了话，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工作成绩，分析了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的原因，指出去年十二月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后，“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③。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④

四月四日，毛泽东等一行驱车离开兴县，为了安全，车队取道雁北地区，从北面的岢岚、五寨、神池，出长城要塞阳方口，再入古塞雁门关到代县，然后翻

越五台山，进入河北平原，到达目的地西柏坡村，行程二十天，一路晓行夜宿，不辞风雪，特别是从离开兴县到城南庄的八天里，几乎每天走一站。有人说：夜宿晓行应容易，客中早晚多闲暇。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却不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干部和群众，听取汇报，指导工作。这是一次调查情况之旅，视察工作之行。

四日傍晚，车队到岢岚县，县里正在召开总结土改整党工作、布置春耕生产的三级干部会。晚饭以后，任弼时约请县委书记丛一平和组织部长王富元，到他的住所来座谈。岢岚县地处高寒，无霜期短，不能种小米，只能种莜麦和土豆等。他们围着炭火盆，促膝夜谈。岢岚县是老解放区，据十八个村的统计，平分土地时，因为实行了“原则上不动中农”的政策，所以比较稳妥，从中农手里抽出的土地只占土地来源的百分之三点六。话题从土改整党谈到发展生产，从调动农民积极性谈到稳定农民的负担。任弼时最后说：现在征粮的办法是农民打得多就多征，打得少就少要。这个办法，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是不利的。是否可以考虑改为征收农业税的办法，税率三年或五年不变。这项改革，在土改后的农村是否可很快实行，实行起来会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他平易近人地和丛一平等一起探讨，几乎忘却了行旅的劳

累。第二天清早，任陪同毛泽东在贸易公司的大院里接见了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后，便出发去五寨县。

出岢岚县城，地势由丘陵转入盆地，遥望管涔山，顶上白雪皑皑，但盆地里春光融融，和风送暖，车队在平直的公路上行驶，车速加快，八十多里地，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五寨县城。

五寨是专区和军分区的所在地，军分区副政委王定一接待了毛泽东等一行。大家一边进午餐，一边询问当地土改和整党的情况。这顿午饭，实际是调查情况的工作午餐。在五寨逗遛了两个多小时，车队继续往东北行。傍晚时分，但见车窗外一池清水，波光粼粼，映着落霞，当地人叫它西海子，神池因此得名。县城在西海子东面，这里是同蒲铁路北段的要地。当晚，任弼时又听取了土改工作团团团长郑林的汇报。

四月六日上午，车队离开神池，越过尚未修复的同蒲路，穿过阳方口出塞，经雁门关，向代县进发。这一带是晋北的屏障，有名的古战场。抗战初期，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率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入晋，面对强敌，他们以红军多年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同时组织和武装广大民众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的作战方针，配合正面部队，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伏击日寇的运输线，

使八路军大显神威。现在，虽然东面的几个县还在阎锡山手里，但去冬今春，徐向前率领的第一兵团，横扫晋南，包围临汾、太原，阎锡山部再也无力进犯解放区了。车队在雁门关稍事休息，任弼时陪同毛泽东等参观了古战场，浏览了历代记述战功的石碑，然后趋车进入代县城。

代县是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结合部，全县东西六十里，地势平坦，人口十三万。城内一楼雄踞，重檐四层，号称“雁门第一楼”，又叫“靖边楼”。谢觉哉过代县时，曾登临靖边楼，有句：“登上巍峨第一楼，平原万里望中收。导渠选种春壤足，预兆今年大有秋。”^⑤这时，晋察冀军区已派保卫部长许建国来迎接。任弼时和许建国相识，许原名杜理卿，所以见面后，他亲切地对许说：“你这杜理卿，现在改了许建国，有远见，我们快要建国了！”许建国知道任弼时有高血压病，晚餐时没有向他劝酒。

晚饭后，毛泽东、任弼时的调查活动又开始了。应约前来汇报的是来代县参加土改的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清，他兼任县委的代理书记。代县土改时，掌握政策较稳妥，没有动工商业，没有动中农；对富裕中农，政策有过反复，先是动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后改为“自愿就地”，今年一月后，改为“基本不动”。杀人一律经土改法庭审判，上级批准。所以社会情绪

安定，市场秩序正常。谈到整党时，郝德清说：土改中，上有工作团，下有贫农团，党支部成了挨整的对象，这样做后遗症大，对工作不利。他认为：一般地超越党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并不见得要比经过支部为好。如果经过初步改造领导成分，工作组协同支部去进行土改，可能使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否则，不仅党员情绪受打击，而且要失去群众的同情。任弼时赞同郝的意见，对他说：“毛主席在公开发表的兴县讲话中，关于整党部分已作了必要的修改。”汇报结束时，毛泽东关照郝德清：明天再向弼时同志谈谈整党和土改法庭问题。

这一天，任弼时收到中央工委转来冀东党委四月一日的电报，内容反映任弼时《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在当地试点传达后，农村各阶层的思想情绪：“中农稳定，认为不会斗他了，生产情绪增高”；分得错斗户房子的贫雇农对退房有意见：“几辈子没有住过像样的房子，好不容易有房子了，死也不搬”；“你们不是说贫雇农翻身吗，翻个蛋？”被斗的地主富农，和被错斗的中农，生活困难，要求退回些东西等。这是纠正“左”的偏向时必然出现的新问题。一月底，在晋绥参加土改的曾三，写信向任弼时建议：要有步骤地处理错斗户的问题，如果硬性规定“原物原数退还”，可能“再出岔子”，首先是改正成分，政治上

“取帽子”，经济上的退还，粮食第一，耕畜第二，再及其余。同时，领导上应该担担子，不然群众和基层干部“很难说服”。冀东来电说明，在纠正偏向的过程中，需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四月七日，天色微晴。下午，车队在许建国的向导下，向五台北麓前进。这时，司机加大油门，汽车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回旋爬坡。山高日落早，五台山区云山雾海，山村里炊烟缭绕，农民开始做晚饭了。车队到了鸿门崖下边繁峙县的伯强村，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周荣鑫正等在村边迎候。他报告说：山上正在下大雪，已派部队清扫公路上的积雪，车队明天可以通过。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一行在山村里宿营。伯强村一百二十多户人家，在五台山腹地是一个大村。为了减少群众的麻烦，随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们只好在草圈里、草棚里过夜。不料当天晚上，伯强村上空浓雾弥漫，细雨夹着雪花，沉沉下降。大家都关心着明天能不能上山。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在许建国陪同下上山勘察。午后，周回来对大家说：“昨天从下午到深夜，下了一场大雪，现正清扫公路，如果明天天气好，我们可以通过五台山。”趁着这个时间，任弼时向伯强村的贫农团主席耿香民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至今，还保留着这次调查的记录。

任弼时先从耿香民的生活和村里的基本情况问

起。耿香民原是阜平县人，早年给人放过羊，要过饭，到伯强村已七八年了。全村一百二十几户，四百三十多人，土改时评定两户地主，三户富农。任弼时详细地询问了划分阶级的标准：

李九近全家五口人，其中三个小孩，有二十多亩地，一块树山，土地没有出租，雇一个长工，土改时土地都平分了，留给他家七八亩。

任弼时（以下简称任）：地主在家做什么事？

耿香民（以下简称耿）：什么也不做，人家是念书人。

任：分给他七八亩地，他自己可以种吗？

耿：可以，去年他就没雇长工，短工非雇不可，因为这里种地时最少得三个人，一人种，一人撒粪，一人撒籽。

任：他婆姨和女儿能劳动吗？下地“受苦”还是在家纺线？

耿：婆姨能下地“受苦”，女儿还没有参加。

任：象李九近这样三十来岁的人，变成个好劳动得几年？

耿：要慢慢来，我们一次能背柴一百斤，他只能背五十斤，慢慢就好了。种庄稼也得慢慢学，我在平山种的是谷子、高粱，来这里种莜麦就不会。

任：把体力锻炼出来得几年？

耿：得三年。

耿香民接着又讲地主李秀春的情况：全家八口人，老俩口六十多岁，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各有一个小孩。在村里有三十几亩地，出租七八亩，收八石租，沙河大川里还有六十几亩，雇短工种的。大儿子念过书，养两头骡子，往来阜平、聂营跑运输，很少回家。二儿子也是念书人，贫农团成立时跑了。土改时，川里的地没收了，村里的地留给他八亩。

任：房屋用具分了没有，怎样拿出来的？

耿：房子分了，还分了两个大瓮，五十几块白洋。

……他说有廿一个包袱，大家很高兴，结果才值五块钱，连几块烂布也算一个包袱。

任：李九近拿出东西了吗？

耿：……拿出三块钱，连衣服算在内值百十来元。

三个富农，一个叫李富越，全家三口人，养两头骡子，自己在外边赶脚，地只有三四亩，雇过两年长工。工作组说“雇二十五个工以上的划为富农”，斗他时，……拿出五十二块白洋，两个骡子。后来又向他要白洋，他说没有了，用他中农哥哥的一头骡子顶替。现他到铅矿上工作去了。另一家是李直，两个儿子，全家十二口人，有五个大人下地劳动，土改前自

耕七八亩地，租种五台山的庙田七八亩，雇一个长工，养一头骡子一条牛，去年雇三个月短工。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外舅，是老光棍，靠他家生活，帮助他家劳动，不给工钱。评定成分时，大家说：“外甥剥削舅舅”，就此定为富农。

任：怎样才算富农？

耿：上级规定雇二十五个工就算。

任：谁规定的？

耿：畜牧场的工作组规定的。

第三家富农叫李宜，老俩口六十多岁，大儿子二十六岁，二儿子十六岁，共三个人“受苦”，自耕二十几亩地，租入十几亩。因为放过粮账钱债，所以划为富农。（这时胡乔木也来参加调查）

乔问：你们分下骡子怎么办？

耿：卖钱分了。

随着，任弼时又问了中农贫农的情况。耿香民说，全村四十多户中农，七十多户贫农，没有雇农。分田时，从二户地主那里没收了三十多亩地，七户中农每户抽九分地。

任：四十几亩地怎么分呢？

耿：过去这里是种的五台山和尚的地，连和尚庙的地算在内就有三百多亩，补给大家，地坏的户补些好地，数目差不多，好坏有些不同，

不过也差不多。

原来这个村许多户租种五台山和尚的庙田，耿香民一语释疑。这样，任弼时问话就转向干部分占斗争果实的情况。这时，周恩来也来参加座谈。

耿：我分了四亩地，白洋还没有分。上级说，分浮财是填穷坑，选大的坑填，全村挑了四户最穷的，其中一户少分些。剩下我们三家，每家分得一个骡驹，一床被子，一百元银洋。后来有人说分得太多了，要打我呀，捶我呀！

任：分时开了会没有？中农到场吗？

耿：开了，中农也到了会。

任：说要打人的是谁？他到会了吗？

耿：是贫农，他也到会。会上宣布填穷坑时，到会的六十几户马上走了二十几户，说咱们分不到东西，以后大家就嚷嚷，说分得不公，要打架。我说咱是靠上级做事的，分得不公平可以再分么，为啥要打架呢！后来，干部开会去了，浮财停分了，等他们回来再说。

任：评议委员会里有中农没有？

耿：有，都到了会，二十几个委员中，中农多。

讨论时有三家嫌补的地坏，要挑。^⑥

任弼时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学孔夫子“每事问”，通过这次座谈，他解剖了一个“麻雀”，掌握了

许多第一手材料，从中洞察由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混乱，政策界线不清所造成的工作中“左”的偏向，为指导工作积累了素材，提供了依据，启迪了思想。“问君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

这时，窗外雪霁，五台山群峰洁白，乳冠罗列。周恩来说：“明天可以上山了！”这一天，毛泽东发出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四月九日，车队离开伯强村，向五台山北台的鸿门崖前进。五台山群峰连绵，山岳交错，东西南北中五峰，龙盘虎踞，状如垒土之台，故名。东台望海峰，西台卦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主峰是海拔三千零五十八米的北台叶斗峰，是“华北的屋脊”，公路可通上二千八百多米的鸿门崖。据记载：五台山周穆王时，“已有声教及此”，至北魏全盛时期，共有寺庙三百余处，之后几度兴衰，至今台内台外还保存寺庙四十七处，台怀镇居五台中心，有三十七处寺庙，黄绿琉璃，华盖相接，殿宇楼台，金碧辉煌。它和四川的峨嵋，浙江的普陀，安徽的九华称为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车队在残雪斑驳的高山公路上盘旋上行，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邃的沟壑，其势十分严峻。忽然一阵风起，雪花纷纷扬扬下落。路滑坡陡，毛泽

东等只好舍车步行。患有高血压病的任弼时，在高山攀登，步履更加艰难。他揪住马尾巴，在陈琼英和警卫人员围护下，一步一喘地翻过了鸿门崖。有时在哨兵垒起的雪窝里避避风，息息脚。途中，先行的周恩来几次派骑兵来接应。过了鸿门崖，顺坡下山，不久，几声车笛，周恩来乘车上山来接了。当晚，队伍借宿在台怀镇杨林街的塔院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同住在寺内一个幽静的禅院里。这时，晚钟嗡嗡，风铃叮当，室内炭火熊熊。第二天上午，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罗睺寺，显通寺，菩萨顶，十方堂和万佛阁等主要寺庙。午饭后，大家和方丈道别，驱车下山，进入河北省境。这里春光融融，农民正在田野里忙春耕，和五台山比，判若两个季节。车队经过龙泉关，当晚投宿于阜平县的下关村。这里属晋察冀解放区管辖。

在下关村，任弼时喘息甫定，又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应约前来的是阜平县六区和附近村子里的党员干部。他围坐在十多人的中间，小凳上照例放着一杯茶水，一个笔记本。这里土改已经结束，准备发放土地证了。任弼时着重询问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基层干部的编制和待遇，勉励大家说：“现在政策明确了，大家要好好教育群众，积极搞好生产！”他风趣地说，“有人说阜平不富，平山不贫。阜平有山有水，

政策稳当，大家发挥积极性，阜平一定会富起来的，到那时该叫做富平！”座谈会后，他介绍大家和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面。下午，车队离开下关村，途中，聂荣臻和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坐车前来迎接，在他们的向导下，车队直驶晋察冀军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阜平县的城南庄。

中共中央在城南庄住了十二天，在这里会见了华北的有关党政领导人，任弼时继续注意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会合之前的一次重要调查活动。如果说，中央纵队在离开兴县后，沿途调查的对象限于有关的县区和基层干部，那么，从四月十二日起，由任弼时主持的座谈会，是包括阜平、曲阳、定县的县委和部分区委书记的区域会议，同时还听取了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冀中的林铁和晋察冀的黄敬的汇报。汇报的内容，除了土改整党之外，还包括恢复和发展新解放的城市和土改后的农村生产问题，战争扩大和延长后财政情况和民力负担问题，以及为了推进革命高潮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问题。林铁反映：冀中地区农业产量由于连年战争，和战前比减低了百分之三十五，耕畜减少了百分之五六十，特别是大牲畜。定县县委书记刘秀峰认为恢复农业生产面临三个问题：全县四万口水井，需要修补

的约五千口；两万架水车，有三分之一待修理，如果旱田改水浇，亩产至少可以提高一倍；全县五百零五个村，每村补三头大牲口，需一千五百多头。急需贷款五十七亿元（折合小米三百三十五万斤）。他说：“本地已无战争，如果没有天灾，负担不增加，三至五年可以恢复到战前水平。”黄敬汇报：石家庄纺织厂原有三万多纱锭，日寇拆走两万五，现开工约六千锭，五百台织布机，因为棉纱供不上，有四百台闲置着。井陉煤矿战前日产煤三千多吨，现仅产一千吨；阳泉五个矿，三个未修复，现日产只有三百多吨，工程师只留下一人，熟练工人有三分之二失业。三百多个土煤窑，资本家走了，由农会接办，大都办不好。冀中工会主席陈宝玉反映：职工运动中，同样有“左”的偏向，非贫农出身的干部不能做职工运动，地主富农出身的不得加入工会。三月冀中地区召开了工业会议，纠正这种偏向，但林铁说：“纠正偏向时遇到了抵抗。”

薄一波向任弼时汇报了晋冀鲁豫地区的战争负担情况。自刘邓大军远出大别山区，陈谢南渡黄河以后，晋冀鲁豫是他们的后方基地，出兵出夫出公粮，负担最重。因此，东渡黄河那一天，任弼时特电参加财经会议的薄一波，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薄一波汇报说：拿兵力动员来说，一般占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半，

还是可以的。晋冀鲁豫已达到百分之四，冀鲁豫个别村已达到百分之九；战地民夫，平时四兵一夫，因为刘邓大军远出，运输任务重，已上升到一兵零点七夫，增涨了近三倍；财粮方面的负担，一九四七年初计划，预算赤字折合粮食四亿二千多万斤，到八九月间，预算追加，赤字达六亿一千多万斤。农民的直接负担加上村款、战勤补贴等地方负担在内，每人每年出粮一石，占农副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一枚八二炮弹相当于三户中农一年的收入，一九四六年内战初期，每月消耗“八二”炮弹三千二百多发，一九四七年平均每月二万四千发，增长了七点五倍，特别是打运城、打临汾两役，消耗炮弹十四万发，手榴弹三十六万颗。他概括地说：“这个地区人力负担已到了饱和的程度，财力负担也已饱和，不能再增加了。”至于干部，已派出一万人到新开辟的中原地区，新组成的四个纵队十二个旅，每旅从地方抽干部一千五百人，共一万八千人，因此，“区党委、地县干部换了三次”。^⑦所有这些情况，都是革命发展和战争推进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的困难，是中央决定方针大计时必须统筹考虑的客观事实。

城南庄座谈会持续了七八天，每天上午汇报研究，下午准备。为了把土改整党工作的经验集中起来，形成一个纲要性的文件，座谈会后期，毛泽东将

由他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文件稿，提交大家讨论。这个文件，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将“由土地改革到生产的全部工作过程”归纳为十项要求，首先强调要调查乡村情况；“按照正确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正确政策”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一系列党内指示，经略加修改后下发的一九三三年的两个历史文件和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整党“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不是抛开支部，更不是“搬石头”；分配时要求“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而不是“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分配土地后要“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并将工作方向“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⑧包括兴修水利、发放必要的农业贷款等。文件最后指出地委和市委以上党委，应对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的领导放在“适当位置”，不应“忽视或放松”。

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纠正工作中的偏向是一篇大文章，近半年来，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通过调查研

究，兢兢业业为此而奋斗，此时此刻他在工作笔记中写道：

“运动过程中‘左’的倾向基本纠正，这正由于我党发动了群众，并与广大群众有联系，同时也证明党的威信很高。

这次的收获很大，封建力量最后打垮，群众发动起来，贫雇农得到利益，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

有些人被运动中的现象未纠正所模糊而怀疑运动本身及领导上的成功，是错误的。过去产生的‘左’倾偏向应被重视，纠正只是为着使运动更有力量。

土改与整党使我党在农村中更加依靠广大群众，依靠贫雇团结广大中农，我们政策更具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观点，而这在抗战时期曾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发生过某些模糊。

因为思想上明确了，土改真正发动了群众，发扬了民主，强调了自我批评，这也打击了一切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使整个情况焕然一新，使我们能够完成战争支援并渡过灾荒。

“分得（土）地，使改善生活有了物质基础，使生产力获得发展的条件。然而要大改善生活，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如果群众中及政府缺乏

这种坚固的思想认识，并采取实际的步骤，那穷苦的情况还不能起重大变化的。

分地后，还有广大剩余劳力，这必须努力去使用，深耕细作，改良技术，发展副业，使之创造财富，防止荒废；要有计划的改造二流子及地主使之劳动，对地主应帮助他改造，就是变为真正劳动力量。

如果只满足分地，不使运动向前发展，那就会犯错误。”^⑨

这时，捷报飞来，西北人民解放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中共中央特发电庆贺“伟大胜利”。一年多前，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曾幻想首先消灭中共首脑机关，然后分区“剿灭”共产党。结果，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损兵六十五万，折将级官佐连毙加俘共三百七十六人，其总兵力已由四百三十万减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老兵多被消灭，质量下降，士气低落，而且兵源枯竭，补充非常困难。特别是五十七个美械师，在关内比较完整的只有两个师，六个旅，在东北的新一军、新六军也分散了。解放洛阳的攻坚战中，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六师。而人民解放军，则由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百九十二万，增加到二百七十万人，解放区面积扩大，据有县城五百八十多座，石家庄、鞍山、四平、

潍县、运城、洛阳、临汾等一批中等城市先后解放，人口达一亿六千万，战争由反攻转入进攻。因此，中央在收复延安的贺电中说，蒋介石占领延安时，“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⑩

延安收复后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由城南庄到达滹沱河畔的西柏坡，和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及先期到达的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等会合，从此，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完成了历史使命，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毛泽东暂时留在城南庄，因为他准备赴苏联一行。二十五日，毛泽东通知书记处成员，就以下问题准备意见：一，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二，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和大力发展生产；三，讨论二月中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和县村市人民政权建设问题；四，邀请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讨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等重大事项。这些重要任务，后来毛泽东概括为三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任弼时出席在城南庄

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是五位书记从延安分手以后第一次聚首。参加会议的还有有关战略区的负责人：李先念、陈毅、粟裕、彭真、聂荣臻、黄敬、罗瑞卿和薄一波等。五月三日，任弼时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综观全局集中概括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是战略性的，是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面”。杨家沟会议时，毛泽东曾经提出：争取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打倒蒋介石，任弼时说，“战争五年胜利，现在跨入第三年，到了接近胜利的时刻，但面临许多困难，老解放区人民的战勤负担很重，已是精疲力尽”，如何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呢？他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大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既是消灭敌人主力，决战决胜的需要，又是缓解老解放区人民负担的出路。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解放区扩大并拥有一批中等城市，政策应该“统一集中”。二是迅速发展生产。他说：“土改后，农村新的战略任务即是生产。但此区许多干部对生产重视不够。要在全党进行很好动员。这是一项基本任务”。一九四六年时，全解放区的预算为粮食一千二百万石，现在解放区人口一亿六千万，实际负担人口以一亿计算，“如果每人每年增产一斗细粮，便是一千万石。如新的预算

是每年两千万石，则相当于预算的一半；如是三千万石，便是三分之一”。发展生产要采取具体步骤和办法。据冀中反映，旱田改为水浇地，亩产可由四斗增加一倍多，因此，“农业贷款要用于水利和农具上，三年就可以还本。要充分利用剩余劳力，注意发展副业”。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他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抓住要害问题。他说：领导者要学习黄河船夫，舵手在惊涛骇浪中把准方向，预见风向水势；要认真作一两个村的典型调查，掌握规律性的问题，发现一点新经验，及时推广。调查不要陷在材料中，要认真分析，抓住实质性问题，象宰猪一样，切中要害。

这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军事方面研究了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根据粟裕关于先不渡长江，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建议，军委决定：“目前粟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①为坚定不移地把战争引向长江以南创造条件。这个重大决策，是后来发展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淮海战役的基础。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向前发展，毛泽东不便离开国内，决定暂不去苏联，五月二十六日，也由城南庄进入西柏坡村。

任弼时回到西柏坡后，集中思考的是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安定社会情绪，全力巩固后方。他觉察到，由于战争延长，人民负担很重，天灾疾病流行和土改斗争中一些过左政策，造成华北某些地区，群众情绪动荡不安，人民内部不很团结，有些干部“躺下”，以致迷信活动及会门团体有些发展，反革命特务借机利用。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干部的思想工作。林铁曾反映：去年土地会议后，冀中地区上万干部下乡土改整党，在“左”的思想政策下，全区二十五六万基层干部，被撤职和停止党籍的约有四万人；阜平全县六千一百二十多名党员，受撤职处分的一千四百十六人，错划成分停止党籍的一千九百五十二人，打击面占半数以上。因此干部情绪消沉，有的说：“当了几年党员，结果变成了蒋根！”太行五月会议反映，遭打击的县区干部思想上有许多“包袱”和不满，要求解决整党中遗留问题；要求明确责任，由上而下实行自我批评；要求物质上的补偿等^⑫。毛泽东曾估计：“左”倾错误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⑬任弼时深入了解后，深感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因此，他为中共中央两次起草致晋绥分局电，这就是五月八日电《完全抛开党的支部是不妥当的》，和六月二十八日电《正确分

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

第一个电报中指出：据晋察冀至晋绥党的状况，党员成分土改前属贫雇农的约占百分之六七十，在几年过程中相当部分上升为中农，现在贫雇农成分占百分之三十左右，新旧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支部的情形大体可以分成三类：一部分是好的，大部分是平常的。这两类支部，只要经过初步改造，就可以协助工作团领导土改工作。只有“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他们拒绝或破坏党的政策的执行，实行反土改、反支前等活动”，这样的支部当然不能依靠，就完全应当超越或“宣布解散，吸收其中好的党员另行成立支部”。但这种支部“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缺乏具体分析，“笼统地确定应当超越一切乡村原有组织”是“冒险的整党政策”。^⑪

第二个电报中指出：“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而采取不信任，不主动积极帮助改造，“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是“自流主义”的方针，它和“当时错误的‘贫雇农路线’，认为贫农团比党要好些，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就“一定要减弱党在土改中的领导力量，也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且

必定是伤害广大党员及一批干部的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一些困难”。对这种错误的方针和做法，领导“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态度加以适当的指出，才利于团结广大党员和一批好的或基本上还是好的干部”。

任弼时起草的电报中明确认为：党内思想作风和组织上的不纯情况，任其发展，不加整顿，“则我们的党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一切认为‘整党是多余的’一类说法，那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对一个党员干部或支部组织，“要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有过什么功绩；看他现在，也要看他的过去”。须知，农村极大多数党员，是生活在分散的农村经济的环境中，受着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的影响，党员“在掌握权力以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以及自私自利等，是很容易并且是必然要产生的。假若党的领导机关不能规定适当的办法和制度去加以防止，及时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并且不断地进行教育，则这类不纯的现象就必然更会发展”。过去领导机关布置工作，又“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促，任务繁重，这就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因此，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

对于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和党员，只要他们认

识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去处罚他们”，他们的工作中的错误，既然和领导上“疏于教育和防范”有关系，如果群众要求处罚他们，领导应作“适当的与必要的解释”，承担一定的责任，“适当地保护他们”，给犯错误者以改正的机会。“决不可采取‘让群众去处理’的放任政策，更不要受某些群众一时甚为高涨的宗派报复情绪的影响，而动摇自己正确的与坚定的方针”。现在，若干新干部不肯放手工作，怕将来受处分，“就是受了这种处分过多过重的不良影响而来的。这一点，群众在当时常常是看不到的，常常激于一时的气愤，要求过多过重地处分一切犯错误及犯罪行的分子。但是领导机关则应该看到这一点，应该向群众解释，说服群众，在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以后，万万不可作过多过重的处分。”至于个别违法乱纪，民愤很大的，给以“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甚至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

为了从“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整党过程中“首先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电报明确指出：下面所犯的或“左”或右的错误，有些是因为领导机关“对某些具体政策缺乏及时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例

如，“如何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规定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整党也缺乏详细具体的指示”，有些党员和干部可能由此存有各种意见，“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入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等等。^⑮

任弼时起草的电文中，原则坚定，旗帜鲜明，而又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对犯错误的干部和党员，宽严相济，合情合理，分寸恰当，而又充满着阶级感情；它鞭策同志决心改正缺点错误，提高思想，分清责任，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为党的事业奋斗，从而使党产生极大的凝聚力。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它象春风暖流，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强大动力。

三十八、西柏坡的日日夜夜

西柏坡村，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背倚群山，东临华北平原。绿荫森森的柏树林前面，茂密的枣树梨树掩映着七八十户人家，一条被山洪冲刷而成的小河，把村子分为东西两部分，中央工委住在村子的东头，土房平顶泥墙，院内竹丛碧绿，桃李并茂。河的南面是一片梨山，春天，花开满坡，现在，枝头上挂满了鸡蛋大的梨儿，沉甸甸地弯了树枝。

中共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后，近万人分住在滹沱河两岸十几个村子里。中央办公厅分住在西柏坡、北庄和夹峪村；中组部在南庄村；中宣部在东柏坡；中央军委和青委在夹峪村；新华社、电台、外事组在陈家峪。原来中央工委的院里，新盖了一些土房，修起了院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集中住在大院里。宁静的山村里，白天骑兵来往，汽车奔驰，入晚，滹沱河畔灯火通明。中共中央和中央

军委正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组织关系到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大战役，迎接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任弼时一家，住在贴近周恩来住所的平房里，门前一条狭窄的小巷，入夏以后，雨水淋漓，潮湿的泥土地上，烈日一照，水气腾腾，真是“院小房低巷狭长，炎蒸气滞闷难当”。为了避暑，有时候，他和陈琼英一起带着孩子到附近郭苏河边的林子里歇息。他躺在帆布椅上，在树荫下阅读书报，处理公务。

为了迎接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了郭沫若的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在前言中指出：“……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提议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这是中共中央在迎接胜利时，向全党高级干部敲起的警钟。

如果说，七八两月，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周恩来，正协助毛泽东指挥华东、中原解放军进行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和华北战场上的晋中战役，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刘少奇正在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那么任弼时集中精力，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研究党的政策。七月，他先后听取了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和张清华关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汇报，陈华关于浙东、皖南、闽浙赣、华南、琼崖以及南洋华侨中党的组织情况，华北学联负责人荣高棠等关于平津两地学生运动和学校中党的组织情况的汇报，阅读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出版的报刊。所以，周恩来通知政策研究室的廖鲁言：凡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速送弼时同志阅审。^②

这时，任弼时的病情渐渐加重，医生嘱咐他：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单独行走；穿平底鞋不穿带跟的皮鞋，生怕不慎跌倒，发生意外。这几项，他都能遵守，只有多卧床休息，不参加会议，他实在很难从命。他对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

为了使各部门的领导人了解中央的精神，参与

研究各项政策，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召开有各部门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今后行政技术方面的电报，由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批发，叶子龙经办；文件处理交政策研究室。这样就减轻了身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的工作量。但是，第二天的办公会上，由于李维汉要去石家庄工作，原来由李负责的城工部工作，便决定由任弼时主管。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八月上旬召开，会前有许多问题要中央讨论决定，所以办公会开得很频繁，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的十二天里，接连开了九次。为了防空，会议从下午六时半左右开始，有时一直到深夜才散会。任弼时一次也没有请假。在研究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长人选时，任弼时建议：“议长还是由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出任为好。”后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推选董必武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

军队向前进，解放区扩大，干部配备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八月三日，安子文在各部门负责人会上汇报，老解放区因为大量抽调，干部青黄不接，太岳地区十六个县，缺干部八百二十多人；冀南地区三十多个县，每县平均只有县委委员两人。华北局成立后，由原来的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的华北大学，训练地方干部的计划是：为每个地委培训一名骨

干，县和区各培训两人，全区应培训四千人，但现在到校的地方干部只有两千人。新解放区，就更加困难了。任弼时根据调查推算，新开辟地区，每个县至少要配备骨干六十人，其中党的县委四人（书记、组织、宣传和秘书），县政府十二人（县长、秘书、财经、税收、民政、教育、司法等），公安和人民武装部门九人；按每县七个区计算，每一区配备五人。目前华北、山东新区共有四百个县，至少需要两万四千地方干部。任弼时主张，每个县都应配备一名能主持训练班的骨干，以便就地培训。

随着华北地区政权的建立，青年团和妇女工作也应统一集中。七月二十九日的办公会上，听取了邓颖超汇报后，中央决定先召开华北、晋绥、山东、东北和中原五个区为主的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妇女联合会。任弼时因此多次和邓颖超、帅孟奇、罗琼等中央妇委的负责人谈话，他指出：今后妇女工作不仅限于农村，要学会做城市妇女和民主党派中的妇女工作，还要加强和国际民主妇联的联系。妇女运动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学说和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和妇女的特殊要求结合起来。他强调说：“你们要在结合点上下功夫。”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妇女代表大会暂时推迟，于十月二十日在西柏坡召开了妇女工作会议。

建立青年团的工作，自一九四六年秋，中央发出试建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后，各地试点已经两年了，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召开了青年工作会议，开始训练建团的干部。八月一日，任弼时听取了还在平山县做土改工作的冯文彬的汇报。这时，附设在华北大学的青年干部班，有学员一百九十人，其中半数以上是作过群众工作的区级干部，其余的是来自平津的学生运动骨干。但中央青委的许多干部都还在土改工作团。为了加快建团步伐，十三日，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决定：将冯文彬等调回中央青委，筹划建团工作。任弼时指示冯文彬：一要扩大干部训练工作，开办团校；二要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之前先办《青年工作通讯》，交流工作经验；三是起草团章。九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校成立，青年班从华北大学分立出来，由冯文彬兼任校长，荣高棠任教育长，第一期学员三百五十人，校址据冯文彬回忆：先是在平山泊头镇，后来搬到良乡。任弼时说：“这是建团的种籽，种籽一定要选好。”接着，又把杨述、韦君宜抽调来筹备编辑《中国青年》，把黄华从外事组抽调来和冯文彬等一起起草团章，两年来，各地已经建立了一批团组织，草拟了章程，有的叫毛泽东青年团，有的称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起草组在各地草拟的章程的基础上，逐章逐节地讨

论修改，形成团章初稿后，经任弼时阅核，送给中央讨论。

八月间，任弼时还约请河北永年县的县委书记李新到西柏坡他的住处来谈话。李新原是晋冀鲁豫的青委书记，华北局成立后，任弼时准备调他到华北局青委机关工作。在谈话过程中，他详细地询问了永年县从县区两级的干部配备情况，和有关的工作情况。永年县是个贫困县，过去，经常受国民党驻军的骚扰，有大片的无人区，群众生活困难，依靠上级救济。永年县委采取了积极的救济办法，用救济款作资金，办了一个大合作社，组织群众打渔，纺织，搞各种副业，解决了几万人民的生活。任弼时饶有兴趣地听李新汇报，他说：“你们的办法很好”，接着，他提出一个新问题和李新探讨，这就是“用你们的办法，来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自己办党行不行？”李新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任弼时说：全国有许多党派，共产党执政以后，靠国家来养，其他党派怎么办呢？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把国家变成党的，党很少受监督。我们执政以后，党和政权的关系怎么处理？领导党和其他党派的关系怎么处理？你在永年县工作，县委是怎样管理政府的？我回答说：通过政府部门的党团（党组）。任弼时又说：如果党自己能解决经费，又有监督，党政分开，才能做到人民的国

家，党的领导。”^③

这次谈话以后，任弼时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以下的思考要点：

一、颁布一般固定的法律，如财产权、民法、刑法，税率，违反的处罚，抗〔战〕勤、兵役（对逃兵等）。

二、县级在集中统一下的地方权力，在不违反上级〔规定〕可以制定地方单行法，如水利，打渔。

三、可立村公约，经上级批准（处罚报上级批准）。

四、县必须有经费权，即附加财政（先预算，批准），地方可以提适当口号……^④

这表明任弼时正在考虑包括领导体制、政权建设、集权分权、法制建设等重要问题，他敏锐地觉察到有关国家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这些思考，有的反映在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

九月八日至十三日，任弼时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七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的工作人员十人。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以后所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正式

会议在中央机关院内的小食堂里举行，预备会则从八月二十八日开始进行了十一天。

城南庄会议后的四个月间，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五月五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赞成召开新政协，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策进完成大业”。^⑤平、津、沪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也纷纷通电响应。国民党统治区内，则反蒋反美的工人斗争、学生示威游行风起云涌。共产党得道多助，民心归向，使得刚刚当上“国民政府总统”而还没有就职的蒋介石，一面向参加“国大”的国民党籍代表说，要“自信（恢复信心）、自强（知道自己有力量）、自反（要自己反省）”，一面则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⑥很显然，他在内心深处已经不那么“自信、自强”了。五月二十日，蒋虽然在就职演说中声称：要“在短期内戡平内乱”，但战场上的事实是：六月开封解放，七月豫东战役胜利歼国民党军九万；晋

中战役胜利，歼阎锡山部七万四千；临汾解放，太原、济南完全孤立。八月七日，南京的国防部检讨战局后作出的“新决策”是：稳定东北，巩固华北，华东、华中则要“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这是四面楚歌声中的被动招架之势，而毛泽东，在九月七日政治局正式会议的前夕，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周恩来、任弼时和李维汉则电示钱之光：同意租用苏联的货船，将在香港、上海的一批民主人士，秘密地途经朝鲜，接运到东北解放区，然后进入华北。^⑦九月十日和二十日，任弼时先后电示东北局，拨出一批黄金交钱之光，作为接运民主人士的活动经费。^⑧

九月会议，可以说是五月城南庄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两年来军事上的胜利，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时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再次强调“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项基本要求。

九月十日，任弼时主持会议，十三日下午，他在会上发了言，围绕毛泽东提出的三项要求，他讲了四个问题：（一）战争问题。（二）纪律性问题。（三）民主问题。（四）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

两年来，人民解放军歼敌一百九十多个旅（师），

二百六十万人，打下了一批中等城市，开辟了中原解放区，老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了土改，整顿了党的组织，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战斗力强，坚定了战争胜利的信心。现在，民主人士打背包进解放区，胶东有民族资本内流，美国感到救蒋太迟了。任弼时说：这又“证明大家都知道天下是共产党的。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所谓不犯大错误，“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大成问题”。他进一步说：

“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们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

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

为了保障军队南进，任弼时提出：老解放区要搞好生产，“在不伤元气太甚的条件下多努一把力，多下一点本钱”。中原地区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好在第四年第五年战争中支援向江南进军的部队，成为他们的后方；兵力补充上，“要努力争取俘虏，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总之，“要做到原则上不扩兵，既准备第三年的胜利，又要准备‘出嫁’”。

任弼时认为，加强纪律，是部队正规化、集中力量作战、和地区统一后发展生产的客观需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明确地说，执行纪律是无条件的，但养成纪律性是有条件的。他说：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

人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⑨，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⑩

遵守纪律，强调集中统一，是否会削弱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任弼时回答说：“加强纪律性绝不是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去掉盲动的积极性，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纯属地方性的问题，各地应主动地想办法，自己处理，送上面审查。“来请示问题必须提出自己的意见草案”，紧急性的问题，事后报告。县一级要有一定的财政权，有预算，甚至可以发行地方公债，如用来修桥修路之类。“县的自治权不要废除，这与加强纪律性并不矛盾”。毛泽东插话说：这部分自治权废除是不利的，但不妨碍请示与报告。^⑪

加强纪律和发扬民主是矛盾的两个侧面，是相互制约而又相辅相成的。任弼时说：战争期间，特别是直接作战的区域，要求集中，强调一元化领导，这是对的，“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

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他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有同志说，现在群众说话有官话、私话之分。私话就是“小广播”；党员对直接领导有意见不敢越级反映，其原因，任弼时说：“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有了批评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他又认为：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质是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不能公开在会上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又插话：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⑫

在党的建设上，任弼时强调要增加工业无产阶级成分，健全组织生活和加强纪律性。

由于连日出席会议，任弼时的体力支持不住了。十月六日，他给大女儿远志的信中写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时期。”^⑬周恩来得知后，即召集黄树则、金岳茂等五名医生讨论，大

家一致主张让任弼时休息。

在休息期间，他经常和朱德一起到滹沱河边散步，一起打野鸭。有一次，他们来到打靶场，提出要和射手们比赛。规定用美制卡宾枪，距离五十米，用五十厘米的十环靶，每人五发子弹。朱德先打，他经验丰富，技术熟练，五发子弹打了四十九环，堪称宝刀不老。接着任弼时射击。他选了子弹，卧倒在工事里，翻了翻沙垫，试瞄了一下，然后上好子弹，屏住呼吸，“呼！呼！”两枪，只听见报靶员大声说：“都是十环，但偏下了些。”任弼时调整了一些姿势，“呼”的一响，报靶员说：“红圈中心。”第四第五两枪打完，总成绩是“优”，就是说有四枪打进红圈，一枪在五环以上，成绩亚于朱德但高于他的卫士长。阎长林写道：“通过这项活动，不但可以向首长们学习射击技术，提高我们的射击本领，更重要的是，能够学习他们那种团结友爱、平易近人的好作风，好品德。”^⑭

这期间，《中国青年》杂志的组稿复刊工作已经展开，任弼时精心地为刊物设计内容。他对这个刊物有深厚的感情。一九二四年秋，任弼时从东方大学学习归国时，曾应主编恽代英之约，写了不少文章，五卅运动中，他作为团中央的总书记，曾运用这个阵地，发动青年，向形形色色的反共势力作斗争，指引

青年沿着革命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后，刊物被查封，改名为《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秘密出版，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苏区，不久，在瑞金出版了《青年实话》。红军长征时，又不得不中断。直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由胡乔木主编，皖南事变后，因纸张紧张，发行困难，再度停刊。现在，中央决定：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青年联合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工具，刊物应当以新的面貌问世。在任弼时的指导下，复刊第一期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登载了朱德的文章《中国青年当前的任务》和董必武写的《中国青年发刊纪念》，毛泽东并重新为《中国青年》题写了刊名。编辑部后来在回忆任弼时的文中写道：“本刊的方针，编辑计划和第一期全部稿件，都是经他亲自审阅过的，他看得非常仔细，就对于小文章，短通讯，也都不放过，都是提到政治原则高度来审查”。第一期刊物原计划登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付印之前，因为需要修改，临时抽了下来，但预告要目已经在报上登出。任弼时发现后，对编辑人员说：“这不行，你们向读者预告有这一篇，实际上没有，这就是对读者失信。

一个刊物决不应该这样做。”后来，编辑部在第一期刊物上登了一则说明原委的启事。在任弼时的关怀下，《中国青年》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和读者见面。

从九月会议结束那天起，蒋介石派飞机一连五天轰炸石家庄。但是，华东野战军十四万人却在九月十六日猛攻济南，激战八昼夜，歼敌人十万余（内有两万多起义）。十月中，锦州战役告捷，长春和平解放，整个辽沈战役已近尾声。坐督北平的蒋介石为此哀叹，“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⑤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十月二十三日，蒋介石策划偷袭石家庄，幻想乘人民解放军在冀中兵力空虚之机，炸毁石家庄，突然袭击西柏坡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制造挽救失败的“奇迹”。这项行动由蒋调集第九十四军三个师的兵力，外加百余辆汽车，大批炸药，并命令傅作义派出骑兵新二军的第四师和第十二旅，在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指挥下，协同向石家庄进犯，准备二十七日集中保定，傅作义不敢不动。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西柏坡大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任弼时和周恩来坐下不久，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急电，任和周当即回到办公室。这份电报是北平秘密

党的学委通过城工部系统发来的，具体报告了蒋的偷袭计划和北平西直门火车站匆忙运输的情况。周恩来和任弼时立即报告毛泽东，并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联系，核实情况，作出紧急部署。中共中央机关也紧急动员起来，作疏散的准备。毛泽东连夜为新华社撰写电讯。二十五日新华社揭露《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二十七日，又发出《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号召大家充分准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蒋介石的阴谋曝光后，他“寸中”更加“焦虑”，便不敢轻举妄动了。十一月一日，当偷袭部队缩回保定以北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之日，第二天，沈阳、营口同时解放，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七万二千多人，全副美式配备的蒋军“精锐”，在东北没有逃脱“尽墨之命运”。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宣称：“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辽沈战役一结束，中共中央东北局即着手部署一九四九年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准备利用冬闲开展整党、建党及建设各级政权。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发展党的若干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任弼时在修改这项文件时，加写了以下内容：

第一，东北局计划在半年之内，发展党员三十万，相当于原有的四倍。遵照中央提出的根据主观力量，“采取逐步地巩固地发展”的指导思想，任弼时写道“发展党员是一种经常工作，年年都可以发展，决不要犯急性病，只要你们能经常督促各级党委，健全党务工作部门，经常不放松地去进行征收党员及教育党员的工作，就可能在一二年内普遍建立东北党的组织，并合于我们所要求的标准，而没有拉夫现象，如果性急，就必然要发生拉夫现象，就必然要走弯路。”

第二，在发展的方式上，东北局报告中提出“采用群众公议的办法”，任弼时指出：“不要规定必须经基本群众多数通过。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接收什么人入党，应该由它自己来决定；同时，也为了防止在群众公议为宗派分子所操纵时，使党陷于被动。”吸收新党员的方式，应是“由支部大会决定区委批准，才符合党章。”

第三，为了避免会议过多，任弼时强调：“必须严格告诫我们的农村工作同志，在工作中要十分注意节省群众的时间，要严禁开会太多浪费群众的时间，妨害群众生产及必需的休息。因为各地群众都普遍批评我们开会太多，把我们的开会当作一种不可忍受的负担。”^⑩

十一月六日，淮海战役揭开战幕。在和国民党军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集中办公，尽管米尔尼科夫大夫告诫任弼时不要熬夜，任弼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每天晚饭后，他和朱德一起，照例扶杖在院子里散一会步，然后到毛泽东的住处，通宵达旦地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参与决策。在五位书记中，六十二岁的朱德年事最高，四十四岁的任弼时虽然是最年轻的，但和朱德同属于照顾对象，因为他的血压经常高达二百二十多水银柱，脉搏每分钟跳一百一十多次，加上血管硬化，脑供血不足，视力已受到影响，但是他和朱德一样，坚持不要照顾。有时候，夜深了，任弼时常常对朱德说：“老总，劳逸结合，你打一会盹，精力会充沛些。”朱德说：“你虽然年轻，但有病在身，得注意。”任弼时说：“我年轻些，应该更多的做事，不舒服时，靠一会就行了！”

十二月一日，是朱德六十二岁寿辰。没有摆寿筵，没有开庆祝会，但是淮海前线的指战员却送来了最有意义的“寿礼”：这一天徐州解放，捷报飞来作寿礼。

为了避寿，十二月六日，任弼时陪同朱德视察了岗南村军委二局的驻地。二局是负责情报工作的机

要部门，自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时建立，至今已有十七年历史。作为中共中央和军委的耳目，无论是在反“围剿”中，在长征途中，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二局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因此，朱德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工作得很好，很及时。”在戴镜元局长等陪同下，他们视察了各业务室。戴镜元说：淮海战役以来，同志们每天工作在十五小时以上。任弼时说：“太长了！”接着他问：有多少高中生，多少大学生，外语水平怎么样？戴镜元说到，敌人收发报都用机器，一分钟能发一千多字。任弼时说：“比人快十倍，自然我们就抄不下来！我们也应当想办法改用机器。”朱德说：“不久北平打下来，就有自动收报机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这一天，朱德在任弼时陪同下，在事业发展，战争胜利的喜悦中度过。

不久，保卫工作干部训练班举行开学典礼，任弼时代表中央在会上讲了话。他说：

“我们已经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农村重要，城市更重要，更复杂。我们的工作范围扩大了。敌人被打倒之后，还要向我们作更残酷更巧妙的斗争，企图复辟。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都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我们若不赶上一步，就会措手不及，胜利不能巩固。我们搞建

设，敌人要破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就斗不过他们”。

任弼时说：进城以后，要建立公安机关，改造旧警察，保卫工厂企业，和暗藏敌人斗争，还要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斗争，工作方面很多，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一条特殊的战线，要做好这项工作。他系统地提出：

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特殊工作，不能单纯靠技术，主要是依靠广大群众。依靠群众，再加上特别技术才能完成任务”。

要总结历史经验。任弼时回顾说，党的保卫工作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在上海就有特科，那时敌人很残酷，许多同志流了血，“我们党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所处的环境也是最残酷的，如果没有这项工作，党受的损失要更大。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过过左过右的错误，特别是‘左’的乱捕乱杀”，其原因是不依靠群众，对反革命力量估计过高。抗战初期，大批学生进入解放区，后来审干时，也有“左”的错误，打击面很大。这里面确有混进来的特务，但没有那么多。扩大化的原因，任弼时说：“固然有坏干部乱闹，但上级机关听到这些毫不觉得惊奇，这是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以要好好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左’的右的都要研究”，因为

“‘左’了脱离群众，右了也脱离群众。”

要学好技术。任弼时说，敌人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技术，并加以发挥和创造。“但他们是代表没落阶级，他们的人是雇来的，没有钱不干；我们的同志有艰苦奋斗、自我牺牲精神。”我们夺到敌人的技术即可以用，而且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有责任心，能研究，有积极性与创造性。

要学习理论和党的政策。任弼时说：“保卫工作是有阶级性的，要有理论根据。比如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看起来是划阶级问题，实际上是理论问题。六大的决议明确规定，要团结中农。毛主席讲：马克思主义有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打击劳动人民？所以要学习理论。学而时习之，才不致变成教条。如果没有理论基础，政策上就要发生‘左’的或右的错误。”任弼时例举事实说：打下开封后，我们宣布只杀刘茂恩一个人。有人批评我们宽大无边，右了。“右当然不好，但开封不是右，是我们的策略。”相反，打下石家庄，抓的人多了。“过了界限就‘左’了。有些人是否可以放在那里待一下呢？”正确处理这些问题都要提到理论、政策和策略的高度，把原理原则弄清楚。^{①7}

越是胜利，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大军南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党的政策要及时跟上，否则无章可

循，各行其是，必然会破坏统一，影响生产，导致社会不稳定，对人对物，都有政策问题。任弼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断地研究新问题，为中央起草规定政策的文件和提出政策性的建议：

十二月十一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郑州、许昌解放以后，如何处理这些产业？能不能没收作为党产？指示中说：“对于矿业及城市房地产的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的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二）城市中的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屋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三）“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⑧

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地方，军管会规定，反动组织人员必须限期到指定的机关登记，逾期不登记者，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将其逮捕法办。任弼时认为，对

反动组织人员登记是完全必要的，但范围可以研究。鉴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者（自然少数是自觉的），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对国民党、三青团关系本来不密切”，因此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打下石家庄后，在工人中搞“挖蒋根”，群众颇有反映。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任弼时书面向毛泽东建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如中统、军统等）的人员，必须强制他们登记；国民党的党部委员和三青团的团部委员，从下层的区分部起，也必须强制登记，“党部和团部委员登记时，规定必须将该下层组织所有党员或团员名单交出”。普通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任弼时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在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要好一些。”这是任弼时在城南庄会议上所说的团结争取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百分之十的策略思想的具体运用。五天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予履行登记手续。”^{①9}

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国历史由渐变走向突变。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结束，歼敌五十五万五千，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消灭殆尽。十五日天津解放；二十日，当了二百四十六天总统的蒋介石“引退”，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十一日下午，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大连起飞，降落在石家庄机场，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随同来的有苏联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伊凡·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担任翻译的中国问题专家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和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七天。

二月一日至三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和中方翻译师哲，同米高扬等正式会谈。头一天见面时，米高扬说：斯大林派他来是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任何问题都由斯大林决定。会谈主要由毛泽东介绍情况，阐明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各方面的政策。任弼时、周

恩来等其他几位书记偶尔插几句话，作些解释。

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比预计的要快一些，不久我们就能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估计不会再遇到特别顽强的敌人了。在讲到人民政府对待帝国主义时，他说有几笔大帐要算：一是废除一切特权，二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三是撤退全部驻华的军队。至于外国侨民，按国际惯例处理。毛强调：新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朋友有真假之分。真朋友，对我们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讲友好；假朋友是表面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出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这点我们是会警惕的。^{②0}

会谈之后，周恩来、任弼时分别和米高扬进行了个别交谈。

二月四日上午，任弼时到后沟米高扬的住处和他单独交谈。双方寒暄之后，就进入实质性的谈话。任弼时介绍说：从红军时代起，人民军队不是单纯为打仗而打仗，而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甚至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和做家务；今后，大军南进，他将起工作队的作

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时说，除了建立青年团之外，恐怕还要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形式的青年组

织。米高扬问：有几个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力量，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就够了？毛泽东说，中国有一亿青年，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统起来呢？对象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显然，米高扬并不理解这个问题。因此，任弼时在谈话中重点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近一亿青年，有的在解放区，有的在蒋管区，东北的青年，抗战胜利前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他们的认识有差别，觉悟程度有高低，单纯用一个青年团的组织，不可能把大家组织起来，要嘛降低了青年团的先进性，不然就是对青年要求过高，所以，除了青年团之外，还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开展青年统一战线的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而青年团则是共产党团结教育一代青年的核心。这是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米高扬听了感到非常新鲜。

在讲到革命的转变时，任弼时说：战争结束后，我们将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方面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时，将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等，实际是为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铺平道路。^{②1}

当天下午，米高扬等上山游览。在谈到他和任弼时的谈话时，米高扬对陪同的师哲说：任弼时的谈话

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②

二月七日凌晨，任弼时和朱德分乘吉普车欢送米高扬一行飞离石家庄。

送别了斯大林的使者后，中共中央立即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前，任弼时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主要是在北平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他分别检查了筹备工作后，预定三月一日召开学代会，三月二十四日召开妇代会。二月十六日晚，任弼时将学代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草案》送给书记处，“务请在十七及十八两天轮阅完毕，以便十九日再作必要修改”。十八日，他召集中央青委负责人研究团代会和民主青年代表会的问题，预定四月召开团代会，五月四日召开民主青年代表大会，以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同时成立了团代会的筹备委员会，任弼时任主任委员，冯文彬、廖承志、蒋南

翔为副主任委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这时，全国已有十九万青年团员，平均每两千团员选出一名代表；青年代表大会总名额五百人。通知规定了代表产生的办法，要求两会的代表分别于四月五日、二十五日到达开会地点。

由于任弼时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学代会和妇代会，都无法参加。他给妇女代表大会题了词：“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朱德则为学代大会题了词。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任弼时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农村进入城市前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出席者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委员十九人，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食堂里举行，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

五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他庄严宣布：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是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斗所达到的伟大转折。他指明了军事上解决国民党一百多万残余兵力的三种方式后，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月六日，任弼时主持会议，十三日，他在会上发了言。会议生动活泼，毛泽东多次插话。

任弼时说：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总之是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

任弼时从三个方面来阐明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意义：

第一，是贯彻独立自主方针的需要。“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第二，是革命事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需要。“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旧中国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

1949 年 3 月 24 日任弼时给中国妇女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题词

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任弼时认为，新中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

第三，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将来工业发展了，还要向农业提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扶助农业走向集体化，而农业要以大量粮食和原料，剩余的农产品和劳动力，支援工业，发展外贸，平衡出入口，“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后，将有大批干部抽调到工业战线去，这是重要的。在这里，任明确提出“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毛泽东插话说：中央局、分局要通知各区党委，凡农村中的党，不要去搞工业为主。^{②3}

实现工业化，资金从哪里来呢？任弼时说，一靠

工业利润，二靠农业增产，三靠税收，四靠举借内外债。对第四点，他说“这也是取得工业发展资金的一个来源，但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由于帝国主义阵营对人民政权敌视，任弼时说，“我们外债不会很多的，内债可以在适当时期举办。内外债都是需要偿还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五是提倡节约。任弼时认为：积累资金，“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他强调“要提出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口号，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

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在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等；发展速度太慢，对工作会有损失。如何保证党的质量呢？他提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这“对于党员是有教育意义的”。毛泽东插话说：北平入城式是三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

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②④}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

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②⑤}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党的成分，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在谈到中央政府主要成员时，毛泽东向全会报告说：现在尚不能定，须与民主人士商量整个配备，但有两个人要报告：毛、周是否加入。周一定要加入，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我不参加有好处，可以有时间想问题；但不参加有缺点，内阁上面要设主席团，总主席。请同志们看是否妥当。刘、弼时不加入，不要全加入进去，全加入是不行的。^{②⑥}

在中共中央由农村跨步入城的历史时刻，任弼时对于依靠工人阶级，实现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促进革命转变以及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融汇贯通，讲出了一篇道理，这是他对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构想。在新中国

的宏伟事业需要他挥洒新的篇章时，他的健康条件已经不允许了！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三十九、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崭齐地停放在西柏坡附近的河滩上，这是第四野战军从平津开来接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北平的。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历史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胡宗南。任弼时曾对干部和战士们说：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预示着将来要进入南京。一年过去，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进发。革命战争迅速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原来预计五年取得全国胜利，没想到第二年三月，中央机关就迁往北平。这时，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早已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古都北平。郭沫若在欢迎会上吟诗一首：“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光荣。思之

泪欲坠，欢笑不成声。”他在欢迎词中说：“要把这光荣永远保持下去，不使它降低、变质、失坠。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登上吉普车离开西柏坡时，他们的共识：“我们不做李自成！”

这天上午十一时，任弼时一家乘坐的第八辆中型吉普，随着浩浩荡荡的车队，沿山间公路颠簸前进，经灵寿、行唐、曲阳，到唐县的淑闾村宿营。第二天，车队继续北行，在保定吃罢午饭，傍晚就到达涿县，下榻在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军部大院。当晚，新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和滕代远专程赶来涿县迎候，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进入北平的安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入北平，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北平市各界人民准备夹道欢迎。但是，中共中央提出：场面不要太大，形式力求简朴，尽量节省民力；待生国胜利时再举行盛大庆祝。最后决定，在西苑机场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傅连璋医生建议，任弼时身体不好，不参加欢迎大会和阅兵式，中央考虑到政治影响，最后还是决定参加，特派医生任玉洪在身边照顾。

三月二十五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日，又是紧张热烈的一日。凌晨三时，列车载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徐徐驶出涿县车站。从涿

县站开出的火车共有三列：第一列，八节硬座车厢，载着警卫人员和一部分干部，预定到西直门车站下车，改坐汽车去驻地香山。第三列，五节硬座车厢，三节行李车厢，供高级干部乘坐，到前门车站下车，乘汽车巡城观光一周，进入香山。第二列八节软卧车厢，供中央首长乘坐。为了不惊动群众，便于警戒，列车开到清华园车站为止。从涿县站到清华园站六十多公里，车行两小时，清晨六时左右，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在晨曦中出清华园站，乘汽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三时，五位书记到达西苑飞机场，会见了北平市各界代表和已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共一千多人；然后，分别登上检阅车，检阅了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当西山脚下，五十门火炮向天空发射起五百发照明弹时，天幕上落英缤纷，停机坪上红旗招展。在欢声如潮，人人挥臂致意的热烈气氛中，仪式告成。这时已是暮色苍茫。晚上，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宴请曾经和共产党共患难的朋友们，宾主频频祝酒，但任弼时遵医嘱，滴酒未沾。深夜十二时，他和毛泽东等一起住进了香山静宜园，这是中共中央迁入中南海前的临时办公地点，任弼时和朱德住在来青轩，与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靠近。对外称“劳动大学”。

1949 年 4 月 6 日任弼时致毛泽东
的信及毛泽东批示手迹

北平浸润在旺盛的革命激情中。三月初，全国学联成立，北京大学校园里举行的营火晚会上，学生们在“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的高歌声中，激起了“火一样热烈，火一样英勇”的热情；接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平；第四野战军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整装待发。一时，北平四万青年纷纷报名入伍。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青年是最活跃的。

进城以后，任弼时尽量地减少社会活动，但三月三十一日晚，五位书记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和干部，欢送他们南下长江，为解放江南两万万同胞奋战，任弼时抱病参加了接见活动。事后，傅连璋医生看他体力实在支持不住，劝他赶快休息，他这才说：“等公务稍加清理后，即搬到玉泉山休养所去。”

这时，任弼时最主要的公务是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筹备五月四日召开全国青年大会。四月二日，他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及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通知报送中央书记处核定，四天以后，又将他亲自起草的在团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稿送毛泽东阅正。这个报告，长达一万二千多字。至此，召开团代大会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四月十一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三百四十六名代表欢聚一堂，代表着各条战线上十九万青年团员，这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往开来的重大节日。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朱德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第二天，四月十二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任弼时向代表们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已经在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打垮，不管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国取得胜利。全党面临的任务是用最后的努力来实现全国胜利，同时要用更大的努力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巩固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他强调说：

“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

量。”

任弼时肯定：三十年来，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中国青年“对人民革命运动作了很光辉的贡献”，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到抗日时期的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应当估计为在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成绩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要有青年群众自己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领导的核心，才更能够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保证党对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曲折的斗争历程中，青年团的工作曾经发生过“先锋主义”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任弼时认为其源在于“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者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领导发生某些偏差”。因此，今后团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团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确立对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自己的领袖的“完全信任”，“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而各级党的领导“应该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的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并且“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应当如何工作？任弼时

明确回答：

“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

为了正确地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鼓励青年工作的干部解放思想，放手工作，他向大家阐明青年运动中两个根本界限：

第一，把发动青年在工作中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他说：“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但不要走到先锋主义。先

锋主义是不顾共产党的领导，而企图去代替党的领导，这种偏向我们应当反对”。

第二，把青年组织应有的独立性与“闹独立性”加以区别。向党闹独立性的偏向应加以反对，但同时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任弼时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放手一些，让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大胆地去进行建团的工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多多加以指导和帮助”。^②

任弼时的报告，方向明确，是非鲜明，可操作性强，使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能够遵循这些原则，大胆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有同志说：在任弼时面前，慌张的人会变得镇定，落后的人会变得前进，糊涂的人会变得清醒，软弱的人会变得坚强。这就是任弼时的风格。

作长篇的政治报告，对任弼时当时的体力来说，是超量的负荷。他讲罢头一部分后，开始感到头晕，心悸和气喘。休息的时候，许多同志关心他的健康，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讲稿。他遗憾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不肯中途退场。所以当中央青委的荣高棠代他宣读时，他坚持坐在主席台上，直到会议结束。

会后，傅连璋医生约请了心脏病专家吴洁和眼

科专家罗宗贤为任弼时检查后，一致建议他休养。四月中，他接见了朝鲜青年代表团以后，十八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当天下午，伍云甫陪同任弼时移住到玉泉山休养所。傅连璋特派黄树则医生为他主治，派刘佳武医生特别护理。

象一匹奔驰的千里马被捆住了蹄子，象一只翱翔的雄鹰被绑住了翅膀，被疾病缠身的任弼时，不得不住进休养所，他面临着一场对待疾病的特殊的斗争，他的精神始终是亢奋的，乐观的，但是，作为一个重病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主治医生规定下，由特别护理刘佳武来安排。

刘佳武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医生，四月二十日那天傍晚，香山门诊部派他到玉泉山休养所任弼时的身边来工作。开始，他有些拘谨，因为他没有在大首长身边工作过，何况任弼时的模样又显得很严肃。任弼时看出来了，主动对他说：“刘医生，我是一个听医生话的休养员哩！”以后，任弼时有意识地和刘佳武聊天，问他的家庭，问他的经历，刘佳武显得自然了。他很尊重这位年轻医生，从不直呼其名，一直叫他“刘医生”，吃饭的时候，也请他同桌。那时候，他们全家的伙食标准并不高，而任弼时因为要减肥，

每天吃的粮油菜都是按定量的，每周还要实行一天饥饿疗法，不吃粮食，光吃蔬菜和水果。任弼时开玩笑说：“长征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现在想吃又不让吃！”^③

任弼时始终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阅读困难，每天他坚持一刻钟到二十分钟，由秘书给他念电报。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有令人激动的捷报：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大军三十万，胜利渡过天堑长江。侵入长江的英帝国主义军舰“紫石英”号等四艘，和国民党军舰一起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解放军奉命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中于镇江附近，其他三艘英舰迅即逃走，令人感到扬眉吐气！两天以后，南京解放，陈毅将军率部进入蒋介石的“总统府”；同一天，国民党四大舰队之一的海军第二舰队二十五艘舰艇在南京东北的长江笆斗山江面宣告起义，其余八艘舰被迫投降。任弼时听了，情不自禁地用手杖在悬挂的地图上，查找每个地点。本来，在任弼时听电报时，刘佳武是不进他的办公室的，但这时候，他不得不进去，劝任弼时保持平静。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正因此，他不惯于过安闲的疗养生活，医生们设法，要使他的精神松弛下来。他爱文学，好弹钢琴，能挥笔作画，喜持枪打猎，医生们便为他安

排这些活动，他非常有兴味。但是，当他独自在屋子里时，他总是抱着书本读书，医生发现后，他便立刻释卷。

有一段时间，刘医生给他读古典小说《西游记》，每天读一个多小时。念到唐僧取经时，如来佛要阿傩·伽叶将真经给予唐僧。阿傩·伽叶问唐僧：“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唐僧没有理会，结果交给他的是一本无字的空本。孙悟空告到如来佛那里，如来佛说：“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后来，唐僧把紫金钵盂送给了他们，才得到了真经，但也只给了三分之一。任弼时听了，哈哈大笑：“原来西天极乐世界也并不干净啊！”^①

任弼时喜欢摄影。每摄一帧，他都把使用的光圈、速度和距离在小本上记录下来，列成表格，待相片冲洗出来后，对照检验效果。每次打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定标尺，对准星，向大家介绍射击的要领。他每做一件事，都非常认真，仔细。他反对粗枝大叶的办事作风，时常对周围的同志说，“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专心！”

有一次，大扫除之后，他在散步时，发现有一堆垃圾没有铲干净。邱秘书说：起先大家干得挺认真，临结束就马虎了，任弼时恳切地说：“但是，你应该坚持。要知道，对于每一件应该做而又能做好的事

情，坚持到底，就是领导！”他言简意赅，给人以启迪，而又丝毫不令人感到是在教训他。

玉泉山顶的宝塔，高耸挺立，状如延安嘉岭山上的宝塔。每次，朱德总司令来看访他，他们在山下漫步，很自然地联想到延安的岁月，回顾在艰苦的年代和群众鱼水一般的亲密关系，他送朱老总出疗养所大门时，两人总是要翘首望望山上的宝塔。有一天傍晚，刘医生和卫士陪他到附近田野里散步，这时，稻子快成熟了，穗子沉甸甸地弯了下来。薄暮中，只见一位老汉拄着竹竿伫立水塘边。任弼时上前问老汉：多大岁数，收成好不好，打的粮食够不够吃？当他问老人吃晚饭没有？老人说：“没有啦，这两天得看庄稼，不然就被休养所的鸭子遭蹋了！”任弼时回头问卫士，鸭子哪儿来的？卫士说，是伙房放养在水塘里的。任弼时明白了，原来是鸭子侵扰了群众的庄稼。他向老汉表示了歉意，马上吩咐不要把鸭子放在水塘里。第二天一早，他又到塘边去散步，为的是检查鸭子是否还放在那里！^⑤

任弼时原来使用一辆中型吉普车，后来斯大林馈赠给他一辆“吉姆 150”轿车。但工作人员进城办事，他总要嘱咐：把进城去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去办，可以减少用车的次数，节约汽油。人们记得，为了从香港接运民主人士来解放区，他一次拨出一千

多两黄金的租船费。该不该花，看革命事业需要。有一天夜里，邱秘书的爱人分娩期到了，他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没有使用汽车送产妇。第二天，任弼时知道了，批评说：“你们太机械了，该用车的时候不用，倘若孩子生在路上怎么办啊？！”^⑥这时，中央机关准备从香山迁往北平城里，中央办公厅在城内为任弼时物色了一处住所，开始选定的是某机关办公的一个院子，任弼时说：“这不行，不能因为我们的住房而让他们搬家！”这才改在景山东街一个临街的小院，并且进行了必要的修缮。任弼时知道后说，花钱太多了。^⑦

任弼时有一个小妹任培辰，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九四七年春，培辰夫妇到了北平，准备通过军调处，进入延安，当时正是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任弼时劝他们暂不启程。这样，兄妹二十二年不见了。这次，培辰夫妇一起来北平探望兄嫂一家，久别重逢，大家倍感亲切。任培辰看到他哥哥穿的一件毛背心，是陈琼英用一条延安时用过的旧围巾改织的，孩子们穿的衣服有的是用旧制服改缝的，吃饭时，用的餐具都是搪瓷碗和竹筒碗，筷子上系了绳子，好象是行军时用过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家庭生活竟然如此简朴，这是培辰夫妇始料不及的。培辰临走的时候，希望任弼时能给湖南省委写封信，为他

1949 年 6 月 9 日毛泽东致任弼时的信手迹

的丈夫安排工作。任弼时说：“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你们的工作，当地政府是会安排的。”任培辰后来写道：“他每发觉我们带有旧社会不健康的思想时，总是循循善诱。他这种与人为善的批评，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⑧

五月四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开幕，任弼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当天，北平市三万学生结队游行，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晚上，国民大戏院里召开一千多人的纪念晚会。遗憾的是任弼时的健康不允许他参加，但他精神上感到很兴奋。五月八日，当青年代表大会继续在进行中时，任弼时出现了昏迷的症状。医生分析，可能是眼底血管出血引起的。毛泽东得知后，特派人送来一缸红鱼，并致亲笔信：

“弼时同志：

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六月九日”^⑨

这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筹备会，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正在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重要文件，刘少奇即将出访苏联。在紧张繁忙的时刻，

毛泽东派人送来红鱼，小小的红鱼，寄托着战友的无限深情。

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这一天，庆祝的秧歌和锣鼓，遍及北平的各胡同。晚上，先农坛体育场上，三万多群众集会庆祝，任弼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这时正是北平的雨季，忽然一场滂沱大雨，雨丝洒落在情绪炽烈的群众身上，但会场秩序井然。大家唱歌，欢呼，张开双臂象是接受一场庄严的洗礼。躺在玉泉山休养所里的任弼时，心系着大会场。这时，医生黄既从城里赶来看访任弼时，他关切地问有多少群众参加集会和游行，说话间，远远传来群众呼喊口号的声音，医生告诉他，参加游行的学生队伍返校了。任弼时问：“你在路上看到他们了吗？”，“雨淋得很厉害吗？”过了一会，他平静下来，医生以为他入睡了。他接着自言自语地说：“大家很疲劳，这样一淋，恐怕会病的。”这天晚上，他的血压又升高了。^⑩

玉泉山疗养所附近，有个程家花园，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私宅。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水从疗养院的围墙外淙淙地流向青龙桥。一天清晨，程砚秋带着弟子在河边借着水音和墙壁的回音练嗓子。任弼时得知后，就把程砚秋请到疗养所里，亲切地交

谈起来。任弼时说：“听说你抗日时期在这边种地？”程说：“是的，日本人来了，我不想演了。”临别时，任弼时请程砚秋有时间常来交谈。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八月三十一日，任弼时请总参二局的戴镜元陪他去访问程砚秋，任弼时说，这是“我等印象极佳”的一次访问。九月十日，任弼时致书程砚秋：“……先生有意研究马列主义，甚为钦佩。现送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及《中国革命读本》各一册。这是比较容易看的课本，希笑纳，并祝健康！”这段交往，成为一桩具有纪念意义的佳话。

十月一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任弼时和陈琮英一起坐在休养所的廊下，全神贯注地收听天安门城楼传来的实况广播。“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二十八年前，他赴俄留学时在给父母信中的述怀言志。当年，他认为“达此便算成功”，可现在，他感到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征途遥远，重任在肩，所以毛泽东说夺取全国政权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于是他坐在钢琴前，弹奏起《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铺开

宣纸，挥笔誊抄《木兰辞》。

不久，张爱萍来访。张爱萍在中央苏区时，曾担任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负责人，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有人诬陷他是“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决定逮捕他。任弼时说：“不应只凭口供”他派人经过调查，终于撤销了怀疑，张爱萍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队伍里。现在他是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是一个年轻的兵种。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接着四月二十三日，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五月一日，华东军区成立了海军司令部。任弼时和张爱萍阔别十八年，有多少话要谈，但医生一再关照谈话不宜太久。在任弼时一再询问下，张爱萍说：有的同志想回陆军工作。任弼时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多是从海上来的，要说服大家，安心工作，不会作海军，就努力学习。有了海军，我们才能保卫海防，就不怕帝国主义的海上侵略了！^⑪

十月二十九日，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内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傅连璋在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

“……瓦西林柯同志认为是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著明硬化之征，心脏初期机能障

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起自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最近情况稍好，乃是在心理上患者自觉转佳，实际并未好转……昨晚又由科罗大夫检查眼底，亦证明较前次所查为重，并有小的出血部位，诊断与瓦大夫所述洽相符合。目前正待苏联大夫继续检查。”^⑫

两位苏联医生最后建议任弼时应去莫斯科治疗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系任弼时的治疗问题。经斯大林同意，十一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治病。

在准备赴莫斯科时，任弼时主动提出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他提出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也不必配备，“我自己会讲俄语，只要刘医生去就可以了，主要是陪我说说话。”卫士呢，也不需要。同志们说，你虽然懂俄语，但你是病号，说话多了也是很累的。后来中央决定，加派朱子奇任秘书。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他乐观地估计，此行时间不长，莫斯科冷，冬季皮大衣是需要的，但夹大衣就不必做。他对陈琮英说：“人家送给我一个皮大衣领子，送给刘医生吧！”

临走前，周恩来总理来看访他，给他送来了护照。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景山东街的寓所来看访任弼时。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刘医生来给任弼时服药，毛主席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说：“我马上就谈完，我就走。”

大约十一月末，任弼时在苏联医生舍琴科陪同下，和朱子奇、刘佳武一行四人乘坐国际列车启程，卫士长郭仁随车送他们到满洲里。^⑬

经过九昼夜的长途旅行，十二月上旬任弼时到达莫斯科。这是他第四次到莫斯科。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春，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建中，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赴东方大学的学员，一颗革命的火种。第二次来时，他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在青年共产国际的会上，他介绍了中国青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斗争业绩，赢得了国际战友的赞赏。但是风云变幻，他回国时，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奔赴农村，实行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三次到莫斯科，他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使者。他在国际的讲坛上系统地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毛泽东通过党的六中全会，奠定了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一次来莫斯科，虽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

任弼时给子女远志、远征、远芳、远远的信手迹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是，他没有公务，是作为病号来求医的。因此，不讲礼仪，不作报道，一到莫斯科就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朱子奇和刘佳武则住在莫斯科大旅社，隔一天来探望他一次。

十二月二十四日，任弼时给家属的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已有两星期，检查过程大体已告结束。……总的方面说，是有进步的：血压早晨还在一百九十——一百一十（低压）上下，因为白天少运动，晚间比上述数字稍低一点。脉搏早晨九十多次，晚边八十多次。医生说血压不会恢复常态，总希望能降到一百七十左右就好。……我在这里医治和休养的时间，可能比预定还要短一些，就是说我能回得比预定时间要早”。^①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到达苏联。二十一日，斯大林七十寿辰，任弼时在朱子奇陪同下出席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晚会。不久，毛泽东主席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来探望任弼时，他报告毛主席，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转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

任弼时充满着康复的信心和乐观情绪，他预计在苏联疗养的时间“大概也是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他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为恢复工作作准备。他生活有规律，每天按医嘱散步，坐两次雪橇进行室

外活动，其余时间阅读《真理报》和《党的生活》杂志，把其中有关的文章摘录下来，译成中文，从摘录的文章内容看，任弼时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方面，如：《在建设事业上党的组织工作》^⑮、《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学习》^⑯、《集体农庄干部的培养》^⑰、《在苏联党和非党的合作》^⑱、《论知识分子中的政治工作》^⑲等。不久，朱子奇提前回国时，任弼时特地嘱咐他，购买一批新出版的有关经济建设的图书带回来，他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和经验是不行的！”

一九五〇年元旦来临了，任弼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这一天，他的女儿远芳要来巴维拉赫疗养院看望他。

在血和火的年代，任弼时的家庭始终在颠沛流离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民，是在陈琼英营救任弼时出狱的奔走中，得肺炎夭死的；大女儿任远志，出生不满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囚禁；红军突围西征时，儿子湘赣寄托给老乡，至今下落不明。一星期之前，任弼时在给陈琼英的信中还提到“湘赣的消息望继续去打听”；^⑳女儿远征，是在茫茫的草地上出生的，产妇没有乳汁，是朱德总司令钓鱼熬成汤，才挽救了小生命；任远芳呢？她虽然出生在莫斯科，但

当任弼时夫妇奉调回国时，国内抗战正在艰苦阶段，不到两岁的远芳就寄养在国际儿童院。一别十年，直到今天父女俩才得以重逢；只有小儿子远远，始终生活在父母身边。任弼时的简单家史，足以反映中国革命的残酷性，艰巨性。但是，和无数革命烈士比，他是幸存者。

任远芳来到了。一个十一岁多一点的儿童，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卡——嘉！”任弼时张开双臂迎上去，把孩子搂在怀里。

“——”任远芳瞪着圆溜溜的眼珠，有点不知所措，连叫声“爸爸”都感到嗫嚅。

任弼时慈祥地爱抚她，问她在儿童院里的生活，查看她的学习成绩，教她认方块字。由于任弼时能用俄语对话，父女俩很快便沟通感情，他们在一起散步，讲故事，照相，转眼过了八天。卡嘉临回学校时，任弼时希望她一起返回祖国。他非常尊重孩子的意愿，一月二十日，他在信中帮助远芳分析：如果回国去，可以学会中文，更加了解祖国的历史和生活，能和家人共同生活，“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不利的一面是要补习一年中文，延长一年学习时间；如果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可以掌握了专业知识后再回国去工作，但不会中文，“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

1950年6月26日任弼时致毛泽东及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迹

困难”。是回国还是在苏联深造，“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②1}二十七日，他又在信中说：“最近接到你妈妈来信，也提到你回国的事，她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国”。任远芳终于决定和父亲一起回国。

任弼时的血压已由原来的二百四十（高压）下降到一百六十，三月二十五日，他致电向中共中央报告：“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迅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至六星期后回国”。^{②2}

三十日，任弼时在刘佳武陪同下，坐火车离开莫斯科，四月一日到达黑海疗养所。这里，频临黑海，自然风景幽美，气候宜人，夏季可以游泳，对任弼时进一步恢复健康都十分有益。五个星期之后，任弼时自觉身体坚实了许多。他想念着祖国，想念着战友和亲属，盼望早日恢复工作。五月九日，他和刘佳武返回莫斯科。五月十六日，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给任弼时检查身体。五月十七日晚上十时，从莫斯科发出的列车，终于载着任弼时父女和刘佳武一起返回祖国。

五月二十八日，车抵北京站。站台上，朱德、聂荣臻和陈琼英带着孩子们一起早已等候着。看到任弼时康复归来，大家由衷地表示祝贺。任弼时和朱德、聂荣臻等，谈笑自若，扶杖步出车站，回到景山

东街的寓所里。第二天，傅连璋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译成中文报告毛泽东主席：

“……苏联大夫的诊断为：一，高血压症，糖尿病。二，心肌营养不全。三，血管硬化。

他们建议：一，自今日起休息两星期（五月廿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止）。二，每日上下午工作时间总共不得超过四小时。（璋意开始时先做二小时）。以后根据病情可以酌量增加。星期日必须休息。三，九月一日仍要到疗养院再休养一月。四，经常要有医生照顾他。弼时同志仍拟以苏联大夫白祖比克为他的主治医生，我亦同意。”^{②③}

这时，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肃清残余敌人，完成统一大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对于历经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多么渴望。六月初，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研究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任弼时要求出席会议。考虑到他的健康，中央同意他参加部分会议。会后，他继续休息，医生建议：从六月二十六日起，“可以在家中开始练习工作，每日二至四小时”。^{②④}

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总

统杜鲁门向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训令：“对韩国予以海空军支援”。第三天，美国第七舰队竟然向我国领土台湾省出动，阻挠我统一大业。周恩来总理为此严正宣布：“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将万众一心为保卫我国神圣领土而奋斗到底！在这样的时刻，任弼时致书毛泽东和书记处诸同志，要求“照莫斯科医生所嘱，现在开始每日四小时工作为好”，“如夜晚开会，则白天多休息，到晚十一点退会”，到九、十月，可再休息一个月，任弼时在信中恳切地说：

“……这样不但对身体没有坏处，而且对于巩固身体、恢复工作能力反会有某些好处。我也很同意他们的意见。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⑤

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⑥从此，任弼时开始“练习工作”。

一个离开战斗岗位一年多的老战士重返第一线，任弼时觉得有许多事需要马上去做，他一恢复工作，就听取组织部和团中央的汇报，详细了解一年多

以来的工作发展和当前的安排，特别是对邻邦朝鲜的战局和美帝国主义在中朝边境的挑衅，他更为关注，每天阅读电报，查看地图，工作量实际超过四小时，但自我感觉“无不适”。如此两个月，至八月底，他满怀信心地对傅连璋说：“我现已经好了，请你给刘医生安排个地方去学习。”接着，主治大夫白祖比克也返回苏联，临行叮嘱任弼时：练习工作到九月需要休息。九月初，刘佳武依依不舍地惜别任弼时，到天津医科大学去深造。任弼时无以为赠，拿出一个旧皮包给刘医生：“你拿去做纪念吧！”陈琮英说：“这是弼时长征时用过的。”^{②7}

白祖比克和刘佳武走后，傅连璋督促任弼时从九月开始休息。任弼时说：“不如继续练习工作，到十二月再休息。”任弼时情真意切，傅连璋只好同意。不料九月初，一次感冒，任弼时的高压回升到一百八十五水银柱，卧床十天，才得以恢复。^{②8}十月一日，任弼时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检阅了海陆空三军队伍和四十万群众的游行队伍。

这时，朝鲜的战事在不断扩大。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七万人在仁川登陆，向北方进犯，矛头指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飞机竟然侵入我东北领空，进行扫射和轰炸，肆无忌惮地对年轻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威胁。中共中央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十月八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主席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出动，协助朝鲜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这期间，中共中央连日开会，尽管医生规定，任弼时到睡眠时间应退席，但他常常坚持到深夜。

十月十八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欢迎世界青联代表团的宴会，席间，他对陆定一说，他的体重已经减轻，血压已经降低，对自己的健康很乐观。^{②9}

十月十九日，上午八时，任弼时约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党支部书记，到他的办公室座谈，调查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为召开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作准备。座谈会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正是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几路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他仔细阅读前方发来的战报，深夜，他的办公室里灯火依然亮着。

这时，欣逢《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他为刊物写了纪念文章，二十一日日的《人民日报》和当天出版的《中国青年》刊载了他的文章。谁知道这竟成了他的遗教。他写道：

“办好《中国青年》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刊物，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一个结合实

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在团结教育中国青年一代的历史事业上，能够发挥很大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为了更进一步办好这样一个刊物，《中国青年》应该继承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③④}

十月二十三日，任弼时和师哲谈话，当晚，出席了中共中央的会议。

十月二十四日，秘书送给他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等电报，晚上，他继续在灯下查看地图。陈琮英劝他快些休息，有事明天再忙。他说：“明天有明天的事啊！”他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疴在身，却坚持一个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夜深了，他在地图上标了最后一个红圈，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十月二十五日，他也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他迈向第一百步的日子……

十月二十五日清晨，任弼时的病情严重恶化了，傅连璋医生紧急赶到景山东街，立即组织医生抢救，

同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任弼时同志今早七时发现中风现象，右半身瘫痪（即半身不遂），失语，血压二百三十，脉搏一百，大汗，病情严重……”^{③①}

两位苏联医生全力抢救，但病情没有好转，中央的同志多方设法，彭真介绍的朱宪彝医生二十七日凌晨四时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会诊，但病情危急，天不假年……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二时三十六分，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四十六岁！

他离去得太早了！就在这短短的四十六年中，他对人民作出的贡献却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讣告中评价道：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在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

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⑫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十月三十日追悼任弼时的大会上评价道：

“任弼时同志是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的”。^⑬

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刘少奇题词：

“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周恩来题词：

“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

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革命精神；

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朱德题词：

“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是有尽头的，但是，他以实际的言行凝铸成的革命精神，是和他为之奋斗的人民事业共存的。叶剑英形象地礼赞任弼时：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死而不亡者寿，英年早逝的任弼时永生！

注 释

一、童年纪略

- ① 易祖洛：《任凯南先生传》，未刊稿。
- ② 送给教师的报酬。
- ③ 访问任理卿、任理安谈话记录，1985年3月19日。
- ④ 《毛塘任氏四修支谱》卷十一之五荣房支系第八十七。

二、少年纪学

- ① 湖南省分立作民两等小学堂文凭。
- ② 任培国（弼时）在序贤小学作文：《民生在勤》，手稿。
- ③ 任培国（弼时）在序贤小学作文：《自立》，手稿。
- ④ 《长岳两关对外贸易统计》（1900—1911），《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第219页。
- ⑤ 任培国（弼时）在序贤小学作文：《拟御侮之策》，手稿。
- ⑥ 任培国（弼时）在序贤小学作文：《合群说》，手稿。
- ⑦ 任培国（弼时）在序贤小学作文：《戒纷争》，手稿。

- ⑧ 任培国（弼时）在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文：《南城游记》，手稿。
- ⑨ 《毛塘任氏四修支谱》序。
- ⑩ 任培国（弼时）在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文：《追悼蔡松坡感言》，手稿。
- ⑪ 任培国（弼时）作业本，手稿。
- ⑫ 任培国（弼时）在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文：《我国割让地之痛言》，手稿。
- ⑬ 任培国（弼时）在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作文：《言志》，手稿。

三、五四启蒙

- ① 任裕道（思度）致任裕宽（益谦）、任裕慎（混卿）的信，1918年5月10日，手稿。
- ② 任弼时（培国）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手稿。
- ③④ 任弼时（培国）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作文：《提灯会纪事》，手稿。
- ⑤⑥⑦⑧ 均见任弼时（培国）作文。
- ⑨ 任弼时：《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12页。

四、“到俄国去！”

- ①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第12页。

- ② 斯大林：《不要忘记东方》，《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28 页。
- ③ 《上海党史》月刊，1990 年第 2 期。
- ④ 任弼时给父亲任思度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 2 月出版，第 93 页。
- ⑤ 蕴良：《游俄通信》，长沙《大公报》，1922 年 2 月 3 日。

五、在东方大学的熔炉里

- ①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半月刊第 10 期，1922 年 8 月 10 日。
- ②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 5 月出版，第 90 页。
- ③ 中共旅莫组会议记录，1922 年 12 月 7 日。
- ④ 中共旅莫组会议记录，1922 年 12 月 18 日。
- ⑤ 1922 年 11 月，陈独秀在莫斯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其中包括政治问题、劳动运动、农民问题三部分，中文稿题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119 页。
- ⑥ 中共旅莫组会议记录，1923 年 4 月 9 日。
- ⑦ 《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共 34 款。
- ⑧ 秦抱朴给高尔柏的信，《民国日报》，1921 年 7 月 4 日“觉悟”副刊。
- ⑨ 李汉俊脱党后，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27 年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他为烈士。

- ⑩ 任弼时：《给任思度等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2月出版，第95页。
- ⑪ 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出版，第671页。
- ⑫ 中共旅莫支部会议记录。1924年1月24日、1月26日、1月27日、5月20日、6月22日。
- ⑬ 《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第142页。
- ⑭ 任弼时（时）：《在中国是否应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团刊》第12期，1924年9月30日。
- ⑮ 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大会记录，1924年7月25日。
- ⑯ 旅莫斯科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王若飞同志六至八月份工作报告，1924年8月1日。

六、共青团的“三大”

- ① 周启新：《上海大学始末》，《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
- ② 《姚天羽同志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第267页。
- ③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63页。
- ④ 团中央常会第51次、53次记录，1924年9月15日、22日。
- ⑤ 赵朴：《团二次扩大会至三次大会》，《青运史研究》1981年第12期，第23页。
- ⑥ 团中央常会记录，1924年9月25日、10月9日。

-
- ⑦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原文刊于《新青年》1924年第4期。
- ⑧ 辟世（任弼时）：《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中国青年》，第49期，中国青年社，1924年10月出版，第11页。
- ⑨ 阚世：《苏俄与青年》，《中国青年》第52期1924年11月出版，第39页。
- ⑩ 阚世（任弼时）：《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团刊》第12期，1924年9月出版。
- ⑪ 团中央第63次至76次常会会议记录，1924年10月27日至12月23日。
- ⑫ 据《中国青年》1924年第16期代英文中称：中国有教会办的小学5928所，中学926所，高等以上学校38所，均不向中国教育当局注册备案。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用宗教麻痹中国青年，各省教育会召开联合会，吁请教育部予以取缔。“非基督教运动”即为维护教育主权，反对奴化教育而兴起。
- ⑬ 团中央第77次、79次常会会议记录，1924年12月27日、1925年1月5日。
- ⑭⑮ 任弼时致罗亦农、王一飞的信，1925年2月18日，手稿。
- ⑮ 《关于CP第四次大会代表报告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2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35页。
- ⑯ 《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65页。
- ⑰ 共青团中央内部刊物，“中学”是共青团的代号。
- ⑱ 任弼时：《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1至4页。
- ⑳ 任弼时致旅莫诸同志信，1925年2月18日，手稿。

七、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

- ① 任弼时给旅莫诸同志的信，1925年2月18日，手稿。
- ② 弼时（任弼时）：《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中国青年》第70期，中国青年社，1925年3月出版，第304页。
- ③ 弼时（任弼时）：《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中学校刊》，1926年第1期，第4至5页。
- ④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9日。
- ⑤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48号，1925年5月25日。
- ⑥ 俞昌时：《五卅反帝宣传的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第681页。
- ⑦ 叶圣陶：《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04页。
- ⑧ 毛泽东：《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之宣传报告》，《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9页。
- ⑨ 任弼时：《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5至13页。
- ⑩ 林根：《介绍第七届全国学生大会决议案》，《中国青年》第88期，1925年8月出版。
- ⑪ 任弼时：《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团的组织》，《关于共青团工作的三个通告》，《任弼时选集》，第14页。
- ⑫ 任弼时：《CY四个月工作报告》，手稿。

八、努力使团的工作青年群众化

- ① 弼时（任弼时）：《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中

- 学校刊》，1926 年第 1 期。
- ②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 95 号，1925 年 10 月 30 日。
- ③ 任弼时：《关于共青团工作的三个通告》，《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 9 月出版，第 17 页。
- ④ 任弼时：《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任弼时选集》，第 19 页。
- ⑤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 87 号，1925 年 10 月 18 日。
- ⑥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 96 号，1925 年 11 月 2 日。
- ⑦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 108 号，1925 年 11 月 18 日。
- ⑧ 李玲：《中共中央军事部的成立及其最初的工作》，《党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55 页。
- ⑨ 1926 年 3 月 18 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奉命行动。中山舰抵黄埔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竟加罪中山舰擅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于 3 月 20 日拘捕李之龙。随后，强逼在第一军中工作的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又称三二〇事件。
- ⑩ 任弼时：《CY 工作报告》，《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3 册，第 372 页。
- ⑪ 共青团中央通告第 138 号，1926 年 3 月 19 日。
- ⑫ 阚世（任弼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过去的一年》，《中国青年》第 121 期，1926 年 5 月出版。
- ⑬ P. S.（任弼时）：《自五卅惨杀到北京惨杀》，《中国青年》第 118 期，1926 年 4 月出版。
- ⑭②② 任弼时：《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任弼时选集》第 19、23 页。
- ⑮②① 《目前任务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3 册，第 189 页。

- ①⑥ 《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202页。
- ①⑦ 《经济斗争及工会工作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206页。
- ①⑧ 《农村青年工作大纲》，《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214页。
- ①⑨ 《学生运动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209页。
- ②① 《儿童运动决议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216页。
- ②③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第628页。
- ②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军事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228页。
- ②⑤②⑥②⑧ 任弼时：《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1928年5月7日，手稿。此稿后经补充，收入192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一书，见《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
- ②⑦ 昌群：《这一年的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407、408页。
- ②⑨ 访问饶卫华谈话记录，1982年2月23日。

九、在第一个风浪中

- ①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若干问题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第199页。

-
- ②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第333页。
- ③⑨ 任弼时：《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1928年5月7日，手稿。
- ④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第593页。
- ⑤ 任弼时：《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42页。
- ⑥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
- ⑦ 任弼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任弼时选集》，第25页。
- ⑧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第439页。
- ⑩ 《中国青年》第161、162期合刊，1927年5月30日出版。
- ⑪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9日。
- ⑫ 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 ⑬ 访问黄玠然谈话记录，1986年5月9日。
- ⑭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9日。
- ⑮⑯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35、137页。
- ⑰⑱⑲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7月3日。
- ⑳㉑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77至278页、第289页。
- ㉒ 任弼时：《党的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任弼时选集》，第44页。
- 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27年8月3日。
- ㉔ 唐，即唐生智。

- ②④⑤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 ②⑥ 《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1页。
- ②⑦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5页。

十、“暴动是一种艺术”

- ① 任弼时：《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1928年5月7日，手稿。
-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第262页。
- ③④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8月15日，9月15日。
- ⑤ 中共中央致湖南省委函，《中央通讯》第6期，1927年9月30日出版，第4页。
- ⑥ 属张发奎所部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 ⑦⑧ 《弼时报告》（一），《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出版，第34页。
- ⑨ 《弼时报告》（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 ⑩ 《湖南团务报告》，《团中央通讯》第10期。
- ⑪ 访问任培辰谈话记录，1989年9月26日。
- ⑫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52页。
- ⑬ 《“无产青年”发刊露布》，《无产青年》第1期，无产青年社，1927年11月7日出版。
- ⑭ 《暴动中的工作》，《无产青年》第2期，1927年11月14日

出版。

- ⑮ 任弼时：《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3页。
- ⑯ 任弼时：《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1928年5月7日，手稿。
- ⑰ 烈火：《防止机会主义的余毒》，《无产青年》第2期。
- ⑱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10月29日。
- ⑲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第455页。
- ⑳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第235、198页。
- ㉑㉒ 任弼时：《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任弼时选集》，第32页。
- ㉓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年12月6日。
- ㉔ 弼时（任弼时）：《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无产青年》第3期，1928年1月13日出版。
- ㉕ 任弼时：《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任弼时选集》，第39页。

十一、留守中共中央

- ①④ 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1月3日。
- ② 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2月29日。
- ③ 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3月5日。
- ⑤ 任弼时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言记录，1928年3

月9日。

- ⑥ 黄平,1924年入党,广州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公社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叛变。
- ⑦⑧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第185、183页。
- ⑨ 任弼时:《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概况》,1928年5月7日,手稿。
- ⑩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第243页。
- ⑪ 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为北平市。
- ⑫ 厘、厘金、厘捐、厘税,旧中国一种商业税,值百抽一。1931年裁撤厘金,改征统一税及营业税。
- ⑬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第278页。
- ⑭⑮ 中共中央致顺直省委信,1928年5月11、16日。
- ⑯ 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信,1928年6月1日。
- ⑰ 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信,1928年6月4日。
- ⑱ 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信,1928年8月8日。
- ⑲⑳ 任弼时在中央(留守)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9日,7月17日。
- ㉑ 任弼时:《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任弼时选集》,第46、55页。
- ㉒㉓㉔ 任弼时《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任弼时选集》,第51、53、47页。
- ㉕㉖㉗ 任弼时:《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任弼时选集》,第55、65、56至58页。

-
- ②⑥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22至228页。
- ②⑦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9页。
- ②⑧ 中央给江西省委信，1928年6月4日。
- ②⑨ 毛泽东给中共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1928年6月16日。
- ③⑩ 《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93页。
- ③⑪ 任弼时：《对黄色工会的策略》，《任弼时选集》，第54页。
- ③⑫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63页。
- ③⑬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7页。
- ③⑭ 李立三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9月9日。
- ③⑮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3、167页。
- ③⑯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1928年5月9日。
- ③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1928年9月9日。
- ④⑩ 访问龚德元谈话记录，1988年10月19日。
- ④⑪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信，1928年9月28日，手稿。
- ④⑫ 参见梅为义：《任弼时在安徽南陵被捕前后》，《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鲁尧贤、张胜利：《任弼时同志领导安庆饮马塘监狱的斗争》，《安徽省文史资料选辑》总第4辑。
- ④⑬ 参见《任弼时同志领导安庆饮马塘监狱的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4辑。

十二、在中共江苏省委

- ① 《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第13页。
- ②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26页。
- ③ 《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179页。
- ④ 《教育周刊》，第2期，中共江苏省委出版，1929年7月。
- ⑤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6月10日、17日。
- ⑥ 《江苏省委关于工联组织和工作大纲》，1929年6月26日。
- ⑦ 黄鼎臣：《关于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筹备经过》，访问资料。
- ⑧ 1925年6月23日，参加香港工人大罢工的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和学生等10万人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时，遭英国等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
- ⑨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7月4日。
- ⑩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7月8日。
- ⑪⑫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7月15日。
- ⑬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8月14日。
- ⑭ 伍豪（周恩来）：《上海八一示威的意义与教训及今后的工作路线大纲》，1929年8月5日。
- ⑮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9月2日。
- ⑯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9月4日。
- ⑰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92页。

- ⑮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15日。
- ⑯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12日。
- ⑰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5日。
- ⑱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92、695页。
- ㉑ 任弼时在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29年9月19日。
- ㉒ 刘晓：《悼念任弼时同志》，《中国青年》，1950年第52期。
- ㉓ 《红旗日报》，1930年1月1日。
- ㉔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24页。
- ㉕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联席会会议记录，1929年8月22日，9月12日。
- ㉖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10月16日。
- ㉗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49页。
- ㉘ 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9月12日。
- ㉙㉚㉛ 周朴农口述：《难忘的三十九天》，《浙江青年》1982年12期。
- 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

十三、从湖北省委到长江局

- ①④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第5册，第791页。

-
- ② 《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至13页。
- ③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1月14日。
- ⑤ 《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第12卷，第165页。文中的加重点是原有的。
- ⑥⑦⑧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记录，1930年2月17日。
- ⑨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28页。
- 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2月24日。
- ⑪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2月17日。
- ⑫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4月14日。
- ⑬ 中共湖北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湖北革命形势与代会的联系说明》，1930年4月。
- ⑭ 任弼时：《中共湖北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结论（一）》，1930年4月16日。
- ⑮ 《中共湖北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结论（二）》，1930年4月18日。
- 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4月21日。
- ⑰ 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30年4月。
- ⑱ 中共湖北省委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5月13日。
- ⑲ 国民党武汉市警备部参谋处报告。
- ⑳ 《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1号）》，1930年5月22日。
- ㉑ 《鄂委关于省委、省总及汉口地党组织被破获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6月18日。
- ㉒ 《西一、江钧给中央的报告——长江局关于暴动工作的布置及成立总行委等问题》，1930年8月8日。
- ㉓㉔ 《湖北共祸调查报告》，《铲共半月刊》，第12、13期合刊，

1931年4月25日出版。

- ⑭⑮⑯⑰ 《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形势与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20日。
- ⑱ 《江钧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10日。
- ⑲ 《长江总行委通知第3号》，1930年8月16日。
- ⑳ 《中共长江局向中央的报告——武汉组织破坏情况及职工斗争、党的发展情况》，1931年9月25日。
- ㉑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26日。
- ㉒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84页。
- ㉓ 《中央致长江局的信》，1930年9月1日。
- ㉔ 《中央致长江局信》，1930年9月4日。
- ㉕ 江钧给中央的信，1930年9月5日。
- ㉖ 《中共长江局向中央报告》，1930年9月14日。
- ㉗ 《中共长江局目前实际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
- ㉘ 《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白色恐怖及工农运动情况向中央报告》，1930年10月21日。
- ㉙ 《中共长江局关于武汉组织统计报告》，1930年12月10日。
- ㉚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7日。
- ㉛ 中共长江局关于一、三军团作战分歧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0月23日。
- ㉜ 《中共长江局致鄂西特委及二、六军前委信》，1930年11月25日。
- ㉝ 中共长江局向中央报告，1930年12月11日。
- ㉞ 即李震瀛。

十四、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 ①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共

- 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第644页。
- ②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00页，重点号是原有的。
- ③ 《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46页。
-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4页。
- ⑤ 中共江苏省常委会会议记录，1929年9月6日。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的发言记录，1931年1月3日。
- ⑧⑩⑪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讨论记录，1931年1月4日。
- ⑨ 任弼时的化名。
- ⑫⑬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记录，1931年1月7日。
- ⑭ 《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年1月7日。
- 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1月10日。
- 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1月13日。
- ⑰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1931年1月28日。
- ⑱ 少，少山，周恩来的化名。
- ⑲ 克，王克全。
- ⑳㉓ 特，即特生，向忠发的化名。
- 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1月20日。
- ㉒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2月6日，13日。
- ㉔㉗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2月20日。
- ㉕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给中共中央的答辩信，1930年12月20日。
- ㉖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2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
- ㉘ 《中共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

方党部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39页。

②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3月4日。

十五、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① 《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② 刘型：《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第107页。

③⑬③③ 《苏区中央局报告》1931年7月8日。

④ 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召开的联席会议。

⑤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出版，第316页。

⑥⑦⑪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

⑧ 《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39页。

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1年3月27日。

⑩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03页。

⑫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第13页。

⑬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5年6月10日。

⑭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18页。

⑮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 ①⑥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96、99页。
- ①⑦④③ 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11日，即真电。
- ①⑧ 即朱德、毛泽东、周以栗、彭德怀、林彪。
- ②⑩ 《战斗》第2期，1931年7月5日出版。
- ②⑪ 《党的建设》，第3期，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1931年8月5日出版。
- ②② 卢福坦，六大后为政治局委员。1932年冬被捕，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1951年被人民政府抓获，1969年处决。
- ②③ 李竹声，1930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任书记，六届五中全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
- ②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01页。
- ②⑤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③③①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65年毛重读此文，在前言中说：写作时间“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
- ③②④⑩ 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1年10月31日。
- ③④ 张爱萍：《怀念任弼时同志》，《中国青年》第52期，1950年出版。
- ③⑤ 周爱民：《任弼时同志出席兴国团代会》，《回忆中央苏区》，第438页。
- ③⑥③⑦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四号电报，1931年10月。
- ③⑦ 萧克：《关于中央苏区的几个问题》中称：“从八月以后，红军集结休整时，毛泽东同志才担任中央局书记”；刘型：《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中称：“第三次反‘围剿’后，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回忆中央苏区》，第197、107页。
- ③⑧ 《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1931年8月30日。
- ③⑨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1号电》，（政府执委、军委主席团、各

部部长名单) 1931 年 10 月。

- ④① 《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 年 5 月。
- ④② 即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伍豪，即周恩来。
- ④④ 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复中局十月真电），1931 年 10 月。
- ④⑤ 苏区中央局致中央的电报，1931 年 10 月 31 日。
- ④⑥ 萧克：《关于中央苏区的几个问题》，《回忆中央苏区》，第 197 页。
- ④⑧④⑨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第 467、475、483 页，任弼时起草。
- ⑤⑩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 年 11 月。
- ⑤① 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 4 月 20 日。
- ⑤②⑤④ 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即删电），1931 年 11 月 15 日。
- ⑤③ 王震：《悼念任弼时同志》，《中国青年》，1950 年 52 期。

十六、宁都会议

-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 12 月出版，第 154、155 页。
- ②⑧⑬④⑩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提纲，1943 年 11 月 4 日。
- ③ 《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 页。
- ④ 任弼时：《福建省苏大会的总结》，《红色中华》，1932 年 3 月 23 日。

-
- ⑤ 张越霞、张纪恩为党中央某机关的工作人员。
- ⑥ 陈琮英：《关于向忠发叛变的事实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 ⑦ 访问任理卿谈话记录，1983年4月1日。任培月于1948年病故。
- ⑨ 洛甫：《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10页。
- ⑩⑪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 ⑪ 《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193页。
- ⑫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20页。
- ⑬ 《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09页。
- ⑭⑮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六大以来》上册，第269、270、272页。
- ⑯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记录，1943年。
- ⑰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苏区中央局电 1932年7月25日。
- ⑱ 周恩来给苏区中央局同志的信，1932年7月29日。
- ⑲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出版，第157页。
- ⑳ 《实话》，第7期，1932年9月5日出版。
- ㉑ 《实话》，第8期，1932年9月19日出版。
- ㉒ 《党的建设》，第4期，1932年9月出版。
- ㉓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

- 年 9 月 23 日。
- ②⑥ 苏区中央局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复电，1932 年 9 月 25 日。
- ②⑦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 年 9 月 25 日。
- ②⑧ 苏区中央局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复电，1932 年 9 月 26 日。
- ②⑨ 《周恩来等关于敌人进攻苏区的情况与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问题的报告》1932 年 9 月 30 日。
- ③⑩③④③⑦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宁都会议争论问题之说明，1932 年 11 月 12 日。
- ③①③③③⑤③⑨ 周恩来向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之简情，1932 年 11 月 12 日。
- ③② 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之简报。
- ③⑥ 周恩来致中央局的信，1932 年 9 月 24 日。
- ③⑧ 中共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 年 10 月 10 日。
- ④① 任弼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 4 月 21 日。

十七、湘赣纵横

- ①⑩①④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 年 11 月。
- ② 《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1933 年 2 月 8 日。
- ③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465 页。
- ④⑥ 《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9册、第94页。

- ⑤ 任弼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 ⑦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459页。
- ⑧ 《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1933年2月11日。
- ⑨ 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91页。
- ⑪ 任弼时:《什么是进攻路线》,《斗争》第三期,1933年2月19日出版。
- ⑫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1943年11月21日,摘自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⑬ 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的具体日期,有同志记忆为6月初或6月上旬,萧克同志则明确说是6月11日。此处从萧克说。
- ⑮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366、350页。
- ⑯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总结决议》,《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第418页。
- ⑰ 张启龙:《往事与怀念》,《任弼时同志八十周年诞辰纪念集》,第66页。
- ⑱ 王首道:《任弼时同志与湘赣根据地》,《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第24页。
- ⑲ 《中共湘赣省委关于查田运动决议》,《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61页。
- ⑳ 《怎样进行查田运动》,《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481页。
- ㉑ 《湘赣全省经济建设会议的决议》,《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

- 编》下册，第 531 页。
- ②② 湘赣省苏维埃第三次大会《经济建设问题决议》，《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614 页。
- ②③②⑥ 《政治决议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584、576 页。
- ②④ 《肃反问题决议草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562 页。
- ②⑤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615 页。
- ②⑦ 《中央局、中革军委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及行动纲领方针的指示》，1933 年 7 月 26 日。
- ②⑧ 任弼时电中革军委关于军区干部配备的报告，1933 年 8 月 27 日。
- ②⑨ 蔡会文致项英的电报，1933 年 12 月 10 日。
- ③⑩ 任弼时湘赣问题座谈会总结，1944 年 10 月 26 日。
- ③⑪ 访问王恩茂记录，1988 年 10 月 20 日。
- ③⑫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 36 页。
- ③⑬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967 页。
- ③⑭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六大以来》上册，第 510 页。
- ③⑮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6 页。
- ③⑯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 8 月出版，第 319 页。
- ③⑰ 周仁杰：《沙市伏击战》，《回忆湘赣苏区》，第 138 页。
- ③⑱ 任弼时：关于湘南工作情况向中革军委的报告，1934 年 7 月 2 日。

- ③⑨ 《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1934 年 7 月 23 日。
- ④⑩ 访问龙舒林记录，1990 年 2 月 15 日。
- ④⑪ 任弼时、王震：《关于红六军团状况的报告》，《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 729 页。
- ④⑫ 任弼时致中央的电报，1934 年 8 月 1 日。

十八、先遣长征

- ①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 361 页。
- ② 《遵义会议文献》，第 103 页。
- ③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 62 辑。
- ④ 中央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1934 年 7 月 23 日。
- ⑤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第 53 页。
- ⑥ 访问穰明德记录，1983 年 3 月 15 日。
- ⑦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第 55、57 页。
- ⑧ 访问何辉记录 1988 年 4 月 28 日、5 月 4 日下午。
- ⑨ 施平：《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1936 年第 1、2 期合刊。
- ⑩ 指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
- ⑪ 朱德致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1934 年 9 月 20 日。
- ⑫ 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4 日。
- ⑬ 《湖南妇女报》，1985 年 3 月 14 日。
- ⑭⑯ 访问陶汉章记录，1983 年 4 月 26 日。
- ⑮ 访问王永濬、彭富九、萧荣昌记录，1983 年 6 月 15 日。
- ⑰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⑮⑯⑰⑱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 70 至 73 页。

十九、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 ①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 62 辑。
- ② 王绍南：《黔东的春天》，《星火燎原》第 2 辑。
- ③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 ④ 红二、红六军团致中革军委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5 日。
- ⑤ 红二、红六军军团给朱德、周恩来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7 日。
- ⑥ 中革军委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指示电，1934 年 10 月 26 日。
- ⑦ 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致中革军委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8 日。
- ⑧⑨ 中革军委复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9 日。
- ⑩⑪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 ⑫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86 页。
- ⑬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
- ⑭ 红二、红六军团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的电报，1934 年 10 月 27 日。
- ⑮ 任弼时、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致周恩来的电报，1934 年 11 月 1 日。
- ⑯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 ⑰ 朱德致贺龙、夏曦、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的急电，

1934 年 11 月 13 日 24 时。

- ①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红二六军团的电报,1934 年 11 月 16 日。
- ①⑨ 朱德给红二、六军团的电令,1934 年 11 月 25 日。
- ②⑩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 21 页。
- ②⑪ 《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通知(第 1 号)》,《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56 页。
- ②⑫ 《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湘鄂川黔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80 页。
- ②⑬⑭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65 页。
- ②⑮ 《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57、158 页。
- ②⑯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制定的分田工作大纲》,《湘鄂川黔省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74、176 页。
- ②⑰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268 至 273 页。
- ②⑱ 任弼时:《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任弼时选集》,第 88 页。
- ②⑲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政治部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件汇集》,第 190 页。
- ③⑰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件汇集》,第 170 页。
- ③⑱ 即湖南省沅陵。
- ③⑲ 任弼时:《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任弼时选集》,第 82 页。

- ③③ 任弼时：《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任弼时选集》，第 92 至 96 页。
- ③④⑤ 《任政治委员在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5 年 1 月 27 日，《湘鄂川黔根据地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第 251 至 261 页。
- ③⑥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 358 页。
- ③⑦ 任弼时：《目前湘鄂川黔边区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任弼时选集》，第 90、91 页。
- ③⑧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定》，《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189 页。
- ③⑨ 田玉祥：《我参加革命的经历》，《武陵红叶》，第 103 页。
- ④⑩ 《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给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217 页。
- ④⑪ 贺龙：《悼任弼时同志》，《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 日。

二十、湘鄂川黔保卫战

- ①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 24 页。
- ②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上），第 237 页。
- ③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上弼时的报告》，1935 年 1 月 6 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220 页。
- ④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第 274 页。
- ⑤ 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中革军委朱德的电报，1935 年 1 月 11 日 21 时。

- ⑥ 中共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电报。1935年2月11日。
- ⑦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5年2月18日21时。
- 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的电报，1935年2月28日。
- ⑨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下），第615页。
- ⑩ 任弼时致军委并转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22日2时。
- ⑪ 任弼时：《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任弼时选集》，第110页。
- ⑫ 中共中央致任弼时的电报，1935年4月5日。
- ⑬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0页。
- ⑭ 任弼时：《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任弼时选集》，第106页。
- ⑮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下），第625页。
- ⑯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5日。
- ⑰ 《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 ⑱ 访问龙舒林记录，1990年2月16日。
- ⑲⑳ 任弼时：《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任弼时选集》第101、108页。
- ㉑ 萧克题词，《任弼时同志80诞辰纪念集》1984年4月30日。

二十一、长征途中（上）

- ① 访问江文记录，1990年2月10日。
- ② 红二、红六军团致周恩来的电报，1935年9月29日。

-
- ③ 朱德、张国焘致任弼时的电报，1935 年 9 月 30 日。
 - ④ 红二、红六军团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5 年 10 月 2 日。
 - ⑤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朱德、张国焘并转中央的电报，1935 年 10 月 9 日。
 - ⑥ 朱德、张国焘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5 年 10 月 15 日。
 - ⑦ 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5 年 10 月 19 日。
 - ⑧ 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5 年 11 月 12 日。
 - ⑨ 朱德在红二方面军战史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60 年 11 月 9 日。
 - ⑩ 朱德、张国焘致红二六军团及红一、三军团的电报，1935 年 11 月 1 日。
 - ⑪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下），第 648 页。
 - ⑫ 《任弼时选集》，第 366 页。
 - ⑬ 袁任远：《征途纪实》，第 100 页。
 - ⑭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5 年 11 月 25 日。
 - ⑮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 367 页。陈洪时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1935 年 6 月叛变投敌。
 - ⑯ 王震：《红六军团小史》，《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出版，第 440 页。两星期休息系指红六军团。
 - ⑰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 年 12 月 23 日。
 - ⑱ 军委致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1 月 7 日。
 - ⑲ 朱德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1 月 23 日。

-
- ②① 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1 月 28 日。
- ②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1936 年 2 月 21 日，《红军在黔西北》，第 105 页。
- ②③ 犹国才电报毕威军情，1936 年 2 月 18 日，《红军在黔西北》，第 214 页。
- ②④ 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2 月 12 日。
- ②⑤ 萧克：《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1937 年 7 月 5 日，《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 ②⑥ 《萧克谈红军在贵州的几个问题》，《红军在黔西北》，第 145 页。
- ②⑦ 访问何辉记录，1988 年 4 月 28 日。
- ②⑧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6 年 3 月 29 日。
- ②⑨ 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3 月 23 日。
- ③①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6 年 3 月 29 日。
- ③② 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1936 年 3 月 30 日。
- ③③ 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任弼时选集》，第 127 页。
- ③④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6 年 3 月 30 日。
- ③⑤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二十二、长征途中（下）

- ①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同意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内容包括取消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长，撤销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等。
- ② 林育英、张闻天致四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2月14日。
- ③ 周恩来致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1日。
- ④⑦ 张国焘、朱德复林育英、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9日。
- ⑤ 林育英、周恩来致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5月18日。
- ⑥⑧⑩ 朱德谈话纪要，1960年11月9日。“二方面军”即指当时的红二、六军团。
- ⑨ 访问何辉记录，1988年4月28日。
- ⑩ 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任弼时选集》，第128页。
- ⑪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1936年5月21日。
- ⑫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03页。
- ⑬⑭⑮ 《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76、77页。
- ⑰⑱ 王震谈话纪要，1960年11月22日。
- ⑲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致张国焘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 ⑳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联合签署：《军委命令》，1936

年7月5日。

- ②① 贺龙谈话记录，1962年3月17日。
- ②②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30日。
- ②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00、301页。
- ②④ 廖承志：《关于任弼时同志的一点回忆》，《任弼时逝世纪念集》，第114页。
- ②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9页。
- ②⑥ 特立即张国焘，玉阶即朱德。
- ②⑦ 任弼时致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诸同志的电报，1936年7月10日，《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 ②⑧ 张闻天致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7月12日。
- ②⑨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 ③⑩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联名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8月1日。
- ③⑪ 任弼时致陈伯钧、王震、张子意阅转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信，《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昌浩，陈昌浩。卓然，李卓然。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时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成员。
- ③⑫ 史平（即陈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1936年6月19日。
- ③⑬ 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8月30日，《三军大会师》（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第607页。
- ③⑭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等的电报，1936年9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 ③⑤ 《红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第508页。

二十三、西安事变前后

- ① 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23日。左权时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 ② 中共中央《十一月份作战纲领》，1936年10月11日。
- ③ 康有为题赠吴佩孚的寿联。原联为：“牧野鹰扬，百岁功名纔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西安事变珍史》〔台〕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出版，第243页。
- ④ 《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 ⑤ 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36年11月11日。
- ⑥ 中央军委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1月15日。
- ⑦ 聂荣臻：《山城堡战斗》，《三军大会师》（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第445页。
- ⑧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军团以上干部致毛泽东转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的电报，1936年11月24日。
- ⑨ 中革军委给红军各首长命令，1936年11月26日。
- ⑩ 彭德怀、任弼时致各兵团政治部主任及全体指战员的电报，1936年11月30日。
- ⑪⑬⑭ 任弼时笔记。
- ⑫ 《任弼时选集》第115至131页。
- ⑮ 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的电报，1936

年11月23日。

- ①⑥ 毛泽东、朱德：《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红色中华》第312期，1936年11月23日。
- ①⑦ 《西安事变珍史》，第26页，阎百川即阎锡山。
- ①⑧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201页。
- ①⑨ 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18页。
- ②⑩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等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 ②⑪ 中革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 ②⑫ 刘峙：《我的回忆》，〔台〕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33页。
- ②⑬ 彭德怀、任弼时致中革军委的电报，1936年12月14日。
- ②⑭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张学良、杨虎臣的信，1936年。
- ②⑮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信。1936年12月14日。
- ②⑯ 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
- ②⑰ 彭德怀、任弼时致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宋时轮的电报，1936年12月15日。
- ②⑱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2月15日、16日。
- ②⑲ 彭德怀、任弼时致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的电报，1936年12月16日。肤施，即延安。
- ③⑩ 五项条件为：（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

下令全国绥缓抗敌。(三)成立抗日联军。(四)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五)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 ③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 ③②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2月25日。
- ③③ 彭德怀、任弼时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并一、二方面军的电报,1936年12月28日。
- ③④ 彭德怀、任弼时致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2月26日。
- ③⑤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6年12月27日。
- ③⑥ 彭德怀、任弼时致中革军委主席团的电报,1936年12月27日。
- ③⑦ 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任弼时选集》,第388页。
- ③⑧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5日。
- ③⑨ 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7日。
- ④⑩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27日。
- ④⑪ 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的电报,1937年1月27日。
- ④⑫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第195页。
- ④⑬ 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博古、洛甫、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月30日。
- ④⑭ 任弼时笔记。
- ④⑮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11页。
- ④⑯ 彭德怀、任弼时致徐海东、程于华并告贺龙、关向应、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1937年2月2日。
- ④⑰ 任弼时:《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任弼时

选集》，第134页。

二十四、从云阳改编到山西抗战

- ① 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电报，1937年7月7日。
- ② 任弼时在云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7月22日。
- ③ 五项要求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军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 ④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1937年7月17日。
- ⑤ 博古、林伯渠、周恩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7月21日。
- ⑥ 指共产国际。
- ⑦ 朱德、张浩、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等致书记处及军委的电报，1937年7月26日。
- ⑧ 云阳会议记录。
- ⑨ 《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05页。
- ⑩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1937年7月28日。
- ⑪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的电报，1937年8月

-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299 页。
- ⑫ 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致洛甫、毛泽东的电报,1937 年 8 月 4 日。
- ⑬⑭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 年 8 月 5 日。
- ⑮ 彭德怀、任弼时致毛泽东的电报,1937 年 8 月 7 日。
- ⑯ 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 165 页。
- ⑰ 任弼时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8 月 22 日。
- ⑱ 谢觉哉词《浪淘沙》,《谢觉哉日记》(上),第 120 页。
- ⑲ 汤,即汤恩伯,时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卫,即卫立煌,时任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 ⑳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 年 9 月 3 日。
- ㉑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37 年 9 月 12 日。
- ㉒㉓ 任弼时:《山西抗战的回忆》,《任弼时选集》,第 138、139 页。
- ㉔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作战方针的指示(训令),1937 年 9 月 21 日。
- ㉕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37 年 9 月 21 日。
- ㉖㉗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 年 9 月 22 日。
- ㉘ 《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出版,第 341 页。
- ㉙ 指何应钦。
- ㉚ 毛泽东致林彪并告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电报,1937 年 9 月 16 日。
- ㉛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毛泽东的电报,1937 年 9 月 23 日。
- ㉜ 林彪、聂荣臻关于平型关战斗给总前委的报告,1937 年 9

月 25 日。

- ③②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 1 辑,〔台〕文海出版社,大事记正文九月份,第 50 页。
- ③③ 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1937 年 10 月 17 日。
- ③④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1989 年 5 月出版,第 223 页。
- ③⑤ 林彪、聂荣臻关于平型关战斗给前总的报告,1937 年 9 月 25 日;《关于平型关战斗缴获和伤亡的报告》,1937 年 9 月 26 日。
- ③⑥ 毛泽东致博古、叶剑英、潘汉年的电报,1937 年 10 月 1 日。
- ③⑧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提纲及记录;1943 年 11 月 4 日。
- ③⑨ 《前总关于动员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37 年 9 月 25 日。
- ④⑩ 王平:《初到阜平》,《北京日报》1965 年 8 月 17 日。
- ④⑪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电令,1937 年 11 月 13 日。
- ④⑫ 《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4 月出版,第 261 页。
- ④⑬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等的电报,1937 年 10 月 22 日。
- ④⑭ 《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1937 年 10 月 19 日。
- ④⑮ 《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1937 年 10 月 16 日。
- ④⑯ 《总政治部关于开展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37 年 10 月 6 日。
- ④⑰ 《总政治部关于对伪满军工作的指示》,1937 年 11 月 26 日。
- ④⑱ 《斯特朗文集》第 3 卷,第 138 页。
- ④⑲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74 页。

- ⑤⑩ 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战略补充意见》，1937 年 10 月 6 日。
- ⑤⑪ 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抗战中的中国军事》，第 19 页。
- ⑤⑫ 卫立煌为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时为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 ⑤⑬ 参见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
- ⑤⑭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林彪等的电报，1937 年 10 月 12 日。
- ⑤⑮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林彪等的电报，1937 年 11 月 4 日。
- ⑤⑯ 任弼时关于山西群众武装和牺盟会及政权情况向毛泽东、洛甫的报告，1937 年 11 月 6 日。
- ⑤⑰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洛甫、毛泽东的电报，1937 年 11 月中旬。
- ⑤⑱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电报，1937 年 11 月 13 日。
- ⑤⑲ 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致聂荣臻等的电报，1937 年 12 月 11 日。
- ⑥① 任弼时致毛泽东的电报，1938 年 1 月 28 日。
- ⑥② 丁玲：《忆弼时同志》，《新观察》1987 年第 19 期。
- ⑥③ 任弼时：《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任弼时选集》，第 150 至 163 页。

二十五、在共产国际的日子里

- ① 《关于保卫西安武汉的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426 页。

- ②⑤⑦⑪ 王明：《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1937年12月9日。《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第536页。
- ③④⑥任弼时：《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任弼时选集》，第132页。
- ⑧ 任弼时：《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新中华报》，1938年2月20日。
-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0页。这个宣言是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
- ⑩⑫ 任弼时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 ⑬ 《谢觉哉日记》（上），第245页。
- ⑭ 访问任培辰记录，1989年9月26日；《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第776页。
- ⑮⑰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 ⑯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任弼时选集》，第164至207页。
- ⑱ 原文发表在美国的《亚洲》杂志。
- ⑲ 《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 ⑳ 《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85页。
- ㉑ 方志纯：《怀念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73页。
- ㉒ 访问师哲记录，1988年11月10日。
- ㉓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93至601页。
- ㉔ 《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第368页。
- ㉕ 方志纯：《怀念集》，第71页。

- ①②⑧ 《星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辑。
- ②⑦ 吉合自述。吉合，原军事科学院顾问。
- ②⑨ 师哲：《回忆任弼时同志——纪念任弼时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 ③⑩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为首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罗后来被开除党籍。
- ③① 《陈郁自述和年表》、《广东党史资料》(1)，第196至234页；《王明评传》第258至265页。
- ③② 周达文、董亦湘1933年被联共派到伯力作文化工作，1937年被捕，长期下落不明，直到1959年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发给恢复名誉通知。俞秀松先和周、董一起去伯力工作，1935年被派到新疆，化名王寿成，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王明、康生回国时，指诬他为托派，1938年4月，被送回苏联，即被捕入狱，重刑至死。

二十六、回到延安

-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 ②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11日。
- ③ 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第201页。
- ④ 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第172页。
- ⑤ 丁玲：《忆弼时》，《新观察》1987年第19期。
- ⑥ 任弼时：《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任弼时选集》，第209页。
- ⑦ 1940年7月18日，英国在美国的同意下与日本签订了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英国政府自本年7月18日起

以后三个月内，禁止武器、弹药、并铁道材料之通过缅甸输送”等。

- ⑧ 《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88页。
- ⑨ 《中央关于防止执行政策中左倾错误的指示》194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18页。
-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62页。
- ⑪⑫ 任弼时：《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任弼时选集》，第225页。

二十七、整风运动的前奏

- ① 任弼时：《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形势》，《任弼时选集》第223页。
- ②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于1941年1月1日修正公布，1月29日登载《新中华报》。
- ③ 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停刊，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两者均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 ④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1941年4月28日。
- ⑤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91页。
- ⑥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
- ⑦ 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任弼时选集》，第231至237页。
- ⑧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3月5日。
- ⑨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4月9日。

-
- ⑩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323页。
- ⑪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第177页。
- ⑫ 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 ⑬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 ⑭ 《解放日报》1941年9月14日。
- ⑮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9月12日。
- ⑯ 《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 ⑰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15日。
- ⑱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 ⑲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办的报纸,1935年9月创刊时称《救国报》,11月被迫停刊,12月改称《救国时报》重新发表。
- ⑳㉑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1年10月8日。
- ㉒㉓㉔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 ㉕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 ㉖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7页。

二十八、延安整风(上)

- ① 毛泽东致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2月22日;毛泽东:《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解放日报》1942年2月23日。
-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1月8日。

-
- ③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三年中心任务的指示》，1941年12月28日。
- ④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2月28日、4月11日。
-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2月11日。
- 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4月2日。
- ⑦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4月2日。
- ⑧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
- ⑨ 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2年4月18日。
- 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2年4月11日、5月3日。
- ⑪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
- ⑫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2年4月3日。
- ⑬ 任弼时在边区学习动员大会上的报告，1942年4月21日；《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 ⑭ 《任弼时选集》第522页，注释178。
- ⑮⑯⑰ 任弼时：《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笔记》，《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8页。
- ⑱ 任弼时：《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选集》，第238至255页。
- ⑲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8月8日。
- ⑳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开幕会议上的讲话，1942年10月19日。
- ㉑㉒㉓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月8日至11日。
- ㉔㉕ 《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
- ㉖ 任弼时：《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任弼时选集》，第256至274页。
- ㉗ 任弼时：《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任弼时选集》，第277至

300 页。

- ②⑧ 《谢觉哉日记》（上），第 394 页。

二十九、延安整风（下）

- ① 《中央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1942 年 12 月 1 日。
- ②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 年 3 月 16 日。
- ③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1943 年 3 月 20 日。
- ④ 任弼时等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 年 4 月 23 日。
- ⑤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 年 4 月 3 日。
- ⑦ 胡公冕，1921 年加入共产党，曾赴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参加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1927 年“四一二”后脱党。1930 年在浙南任红十三军军长，后失败。于 1932 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36 年获释后赴西安。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工作。后经胡宗南推荐，任国民党陕西省岷县地区行政专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 ⑧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250 页。
- ⑨ 任弼时：《特务的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943 年 4 月。
- ⑩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 年 4 月 28 日。
- ⑪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2 月出版，第 22 页。
- ⑫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的电报，1943 年 5 月 8 日。
- ⑬ 任弼时致周子健并转周恩来、林彪的电报，1943 年 7 月 6 日。

- ⑭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 ⑮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1943年12月28日。
- ⑯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⑰ 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3月20日。
- ⑱ 毛泽东致康生的信，1943年7月1日。
- ⑲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51页。
- ⑳ 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记录，1943年7月28日。
- ㉑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年8月2日。
- ㉒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9页。
- ㉓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509至514页。
- ㉔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12月6日。
- ㉕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2月22日。
- ㉖ 《汉书·刑法志》：古人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
- ㉗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260页。

三十、整顿经济，发展力量

- ① 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商定对日作战计划，12月1日发表宣言。
- ② 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

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商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消灭德寇及战后的和平问题，12月1日发布宣言。

- ③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2月26日。
- ④⑤ 任弼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任弼时选集》，第306至348页。
- ⑥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6页。
- ⑦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5月5日。
- ⑧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4年5月21日。
- ⑨ 指临时中央。
- ⑩ 任弼时：《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初稿），手稿。
- ⑪ 张树德：《任弼时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5年9月17日。
- ⑫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豫室”向上级的报告。
- ⑬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6月5日。
- ⑭ 《在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加强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
- ⑮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第196页。
- ⑯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 ⑰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5日。
- ⑱ 任弼时：《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

349 至 367 页。

- ①⑨ 任弼时：《南下的方针与任务》，《任弼时选集》，第 368 至 381 页。
- ②⑩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4 年 11 月 9 日晚。
- ②⑪ 《周恩来传》第 574 至 576 页。
- ②⑫ 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 年 11 月 19 日。
- ②⑬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记录，1944 年 12 月 9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1944 年 12 月 12 日。

三十一、党的历史性盛会

- ① 《谢觉哉日记》（上）第 355 页，（下）第 781 页。
- ②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 10 月出版，第 196 页。
- ③⑤ 《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档案。
- ④ 陈毅致毛泽东的信，档案。
- ⑥ 胡耀邦和王兆国谈话记录，1986 年 7 月 29 日。
- ⑦ 任弼时对《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初步意见，档案。
- ⑧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047 页。
- ⑨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26 至 1027 页。
- ⑩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5 页。
- ⑪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1945 年 3 月 31 日。

- ⑫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⑬ 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
- ⑭⑮⑯ 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 ⑰ 《王明诗歌选集》，1979年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其妻孟庆树在《前言》中称诗歌内容“丰富优美”。
- ⑱ 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由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中译本名为《中共五十年》。王明在1974年3月23日写了“作者的话”三天后，于3月27日病死。
- ⑲ 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2页。
- ⑳㉑㉒ 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任弼时选集》，第385至393页。
- ㉓ 毛泽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1945年6月10日。
- ㉔ 《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 ㉕ 《解放日报》1945年6月8日。
- ㉖ 王首道：《忆南征》（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2版，第109页。
- ㉗ 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记录，1945年6月12日。
- ㉘ 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记录，1945年5月16日。

三十二、保卫胜利果实，制止反共内战

- ① 水东，镇名，位于安徽宣城东南，水阳江东岸，是苏浙皖边

战略要地。

- ②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3页。
- ③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15页。
- ④ 中共中央致河南区党委的电报，1945年8月10日。
- ⑤ 中共中央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转鄂豫皖区党委的电报，1945年8月12日。
- ⑥ 中共中央致中共晋察冀分局的电报，1945年8月19日。
- ⑦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1月出版，第71至72页。
- ⑧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5年8月26日。
- ⑨ 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任弼时选集》，第386至387页。
- ⑩ 毛泽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时的报告，1945年6月10日。
- ⑪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山东分局的电报，1945年8月29日。
- ⑫ 褚志远：《延安青年文化工作的片断回忆》，《青运史研究》1982年第4期。
- ⑬ 蒋南翔：《任弼时同志对青年运动的伟大贡献》，《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第52页。
- ⑭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页。
- ⑮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贺龙的电报，1945年8月30日。
- ⑯ 贝鲁罗索夫的谈话记录，1945年9月14日。
- ⑰ 朱德和刘少奇、任弼时复苏联红军代表的信，1945年9月

15 日。

- ⑮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5 年 9 月 17 日。
- ⑯ 中共赴渝代表团关于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等给中央的复电，1945 年 9 月 19 日。
- ⑰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部署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电报，1945 年 9 月 26 日。
- ⑱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 9 月 26 日。
- ⑲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 年 10 月 11 日。
- ⑳ 《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375 至 377 页。
- ㉑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出版，第 318 页。

三十三、全面内战前夕

- ① 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任弼时选集》，第 386 页。
- ②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第 210 页。
-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出版，第 185 至 186 页。
- ④ 刘峙，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 ⑤ 李先念、郑位三请中央设法促使中原停战的建议，1946 年 1 月 14 日夜。
- ⑥ 《中央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页。

- ⑦ 中共中央给李先念、郑位三的复电，任弼时拟稿，1946年1月16日。
- ⑧ 中原部队以新四军为主体，故习惯称中原部队为五师。
- ⑨ 中央关于派飞机给五师送款给叶剑英、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6年1月23日。
- ⑩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08页。
- ⑪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月28日。
- ⑫ 指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
- ⑬ 即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第一纵队。
- ⑭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2月2日。
- ⑮ 《谢觉哉日记》（下），第902页。
- ⑯ 任弼时致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1946年3月15日，手稿。
- ⑰ 钱俊瑞、姜君辰、周扬给毛泽东、任弼时等的信，1946年2月26日。
- ⑱ 中央复叶剑英、饶漱石等的电报，1946年3月7日，任弼时手稿。
- ⑲ 中央关于给五师筹款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3月14日。
- ⑳ 任弼时致叶剑英、赖祖烈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1946年5月1日。
- ㉑ 叶挺致毛泽东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解放日报》，1946年3月8日。
- ㉒ 叶挺给刘少奇、任弼时的信，1946年3月7日。
- ㉓ 《解放日报》1946年3月6日、7日。

- ②④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
- ②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6年3月15日。
- ②⑥ 任弼时：《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任弼时选集》，第394至401页。
- ②⑦ 《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89至92页。
- ②⑧ 《谢觉哉日记》（下），第907页。
- ②⑨ 《中共中央发言人为蒋军妄图歼灭中原我军发表声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5页。
- ③⑩ 《解放日报》1946年5月5日。
- ③⑪ 1937年4月，中共第一任驻新疆代表为陈云（化名施平），不久，陈云返回延安，由邓发接任，1939年11月12日后，陈潭秋继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 ③⑫ 任弼时致陈潭秋的电报，1942年1月12日。
- ③⑬ 任弼时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7月9日。
- ③⑭ 陈潭秋的化名。
- ③⑮ 任弼时致周子健的电报，1945年11月20日。

三十四、当和谈之门被关闭时

- ①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等九省。
- ②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1946年4月1日。
-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2至240页。

-
- ④ 《军委关于苏中、苏北和山东的作战部署给陈毅等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44页。
- ⑤ 周子健致任弼时的电报，1946年7月12日。
- ⑥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页。
- ⑦ 《军委关于准备歼灭蒋军四十个旅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8月23日。
- ⑧ 中央致粟裕、谭震林等的电报，1946年8月20日。
- ⑨ 中央致周子健的电报，1946年8月23日。任弼时手稿。
- ⑩ 任弼时致周子健的电报，1946年8月31日，手稿。
- ⑪ 王浩礼：《回忆办事处撤回延安的经过》，未刊稿。
- ⑫ 周子健座谈纪要。
- ⑬⑭ 任弼时：《提议建立青年团的两次讲话》，《任弼时选集》，第402至407页。
- ⑮ 《任弼时选集》第533页，注释256。
- ⑯ 访问金忠藩记录，1988年10月13日。
- ⑰ 熊晃、金忠藩：《从渤海到天山》，未刊稿。
- ⑱ 《中共代表团致蒋介石函》，1946年9月30日，《群众》周刊第12卷第11期，第4页。
- ⑲⑳ 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6年10月3日。
- ㉑ 高树勋原任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此号召蒋军以高树勋为榜样率部起义。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 ㉒ 任弼时：《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任弼时选集》，第388页。
- ㉓ 《周恩来年谱》，第695页。

- ②④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6 年 10 月 4 日。
- ②⑤ 中央关于国共谈判停战条件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 年 10 月 7 日。
- ②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6 年 10 月 8 日。
- ②⑦ 《周恩来将军十月九日致马歇尔将军备忘录》，《群众》周刊第 12 卷第 12 期，第 572 页。
- ②⑧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6 年 10 月 20 日。
- ②⑨ 属蒋军晋陕绥边区总部序列，总司令邓宝珊，军长左世允，辖新编第 11 旅及 86 师。
- ③⑩ 中共中央关于谈判及停战等问题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6 年 10 月 20 日。
- ③⑪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6 年 10 月 30 日。
- ③⑫ 毛泽东致任弼时的信，1946 年 10 月 20 日。
- ③⑬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1946 年 11 月 21 日。
- ③⑭ 即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入湖南境后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 ③⑮ 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3 年出版，第 98 页。
- ③⑯ 任弼时致任培辰夫妇的信，1947 年 1 月 30 日。

三十五、风雨战陕北

-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38 页。
- ② 《蒋介石秘录》第 4 卷（〔日〕《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翻译组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出版，第 466 页。
- ③ “丙丁”关于边区作战问题致毛泽东电，1947 年 3 月 25 日。
- ④ 《中央关于掩护中央机关安全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16册，第433页。

- ⑤ 《中央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两个方案的指示》，1947年3月26日。
- ⑥ 任弼时致王震的电报，1947年3月26日。
- ⑦ 张仲实：《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纪念集》，第71页。
- ⑧ 中共中央致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1947年3月27日。
- ⑨ 范长江关于党中央在陕北作战的情况给总社社委会的信，1947年9月11日。
- ⑩ 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任弼时选集》，第383页。
- ⑪ 刘少奇、朱德关于行军工作向毛泽东、任弼时的报告，1947年4月4日。
- ⑫ 中共中央致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等的电报，1947年4月15日。
- ⑬ 叶剑英、杨尚昆等致中央的电报，1947年4月26日。
- ⑭ 中央军委致各中央局、分局、各主要战场首长的电报，1947年5月12日。
- ⑮ 任弼时、李维汉致李克农等的电报，1947年5月12日。
- ⑯ 任弼时致叶剑英、杨尚昆等的电报，1947年5月15日。
- ⑰ 任弼时、叶剑英致师哲的电报，1947年6月24日。
- ⑱ 任弼时致曹力如的电报，1947年4月7日。
- ⑲ 任弼时致林伯渠的电报，1947年4月17日。
- ⑳ 鲁迅：《为坪井书屏条》，《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人部分），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1月出版，插图。
- ㉑ 军委致贺龙、李井泉等的电报，1947年5月12日，任弼时拟稿。

-
- ②② 叶剑英向任弼时、周恩来转报王维舟、周士第的电报，1947年6月12日。
- ②③ 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的电报，1947年6月14日。
- ②④ 毛泽东致贺龙、李井泉的电报，1947年6月27日。
- ②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45至346页。
- ②⑥ 中央致陈毅、粟裕的电报，1947年7月10日。
- ②⑦ 《大众日报》，1947年7月。
- ②⑧ 中共中央小河会议记录，1947年7月21日、22日。
- ②⑨ 任弼时致李维汉、李克农等的电报，1947年7月13日。
- ③⑩ 中共中央致刘少奇的电报，1947年7月27日。
- ③⑪ 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的电报，1947年8月16日。
- ③⑫ 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的电报，1947年8月17日18时。
- ③⑬⑭ 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的电报，1947年8月18日22时。
- ③⑮ 中共中央致各军首长的电报，1947年8月21日。
- ③⑯ 《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65页。
- ③⑰ 《中央关于出征部队的供给等问题的规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86页。
- ③⑱ 中央致刘少奇、朱德、冯文彬的电报，1947年10月2日，任弼时手稿。
- ③⑲ 《中央对邓颖超等关于妇女工作报告的复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1页。
- ④⑰ 中共中央给廖承志的电报，1947年10月1日。
- ④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6页。
- ④⑲ “钱钱饭”是陕北农家的便饭，本来是用小米、黑豆压制成铜钱大的面片所熬成的稀饭。当时因农业受灾，钱钱饭是用少量黑豆和米糠秕压成面片后和瓜菜熬成的。

三十六、纠正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 ① 任弼时致叶剑英、杨尚昆的信，1947年11月14日。
- ② 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根据中共晋绥区党委的建议，为克服经济困难，坚持抗战，开展了扩兵、做军鞋、献粮、献金银四项动员，献粮献金银的主要动员对象是地主、富农。但执行中“左”了，后来纠正。
- ③ 《中央转批中央工委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90页。
- ④ 任弼时：《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任弼时选集》，第411至412页。
- ⑤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7年2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⑥ 《谢觉哉日记》（下），第1166页。
- ⑦ 任弼时致林伯渠的电报，1947年10月26日。
- ⑧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东北局、五台局、太行局的电报，1947年11月8日。
- ⑨ 《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文件的指示》，1947年11月29日。
- ⑩ 《谢觉哉日记》（下），第1171至1172页，1947年12月13日。
- ⑪ 《谢觉哉日记》（下），第1175至1176页，1947年12月20日、21日。
- ⑫ 1947年7月1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即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 ⑬ 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7年12月25日。
- ⑭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颁布解放军口号的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6至554页。
- ⑮ 任弼时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12月27日。
- ⑯ 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7年12月28日。
- ⑰ 任弼时致刘少奇的电报,1948年1月8日。
- ⑱ 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任弼时选集》,第413至437页。
- ⑲ 毛泽东对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的批示,1948年1月12日。
- ⑳ 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1948年1月14日。
- ㉑ 邓小平:《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97至108页。
- ㉒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65页。
- ㉓ 《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548页。
- ㉔ 访问陈永清记录。
- ㉕ 乔备果:《转战陕北的一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35至136页。

三十七、春风送暖到平山

- ① 任弼时致薄一波并财经会议诸同志的电报,1948年3月23

日。

- ② 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6年9月5日。
- ③ 1948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指出的五项要点是：（一）由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不明确，将不少人错订为破产地主和富农，这是错误的。（二）对上述错误应坚决地加以改正，已取出的财物，应作适当退还。（三）划分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唯一标准。（四）掌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在农民代表会议中，中农应占三分之一的比例。（五）按照党对中农的政策，凡属错误都要改正等。
- ④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第1310页。
- ⑤ 《谢觉哉日记》（下），第1195页。
- ⑥ 任弼时和山西省繁峙县伯强村贫农团主席的谈话记录，1948年4月8日。
- ⑦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⑧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 ⑨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⑩ 中共中央致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诸同志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的电报，1948年4月24日。
- ⑪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1948年5月5日。
- ⑫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⑬ 毛泽东致刘少奇的电报，1948年3月6日。
- ⑭ 任弼时：《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完全抛开党的支部是不妥当的），《任弼时选集》，第438页。

- ⑮ 任弼时：《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党员），《任弼时选集》，第443页。

三十八、西柏坡的日日夜夜

- ①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第1191页。
- ② 周恩来致廖鲁言的信，1948年7月18日。
- ③ 电话访问李新记录，1987年12月15日下午。
- ④ 任弼时工作笔记。
- ⑤ 《各民主党派赞同召开新政协致毛泽东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74至275页。
- ⑥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第470页。
- ⑦ 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复钱之光的电报，1948年8月30日。
- ⑧ 任弼时致东北局的电报，1948年9月10日；任弼时致曾山的电报，1948年9月20日。
- ⑨ 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 ⑩⑪ 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457至461页。
- ⑪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8年9月13日。
- ⑬ 任弼时：《给任远志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第

97 页。

- ⑭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年出版，第 145 页。
- ⑮ 《蒋介石秘录》第 4 卷，第 472 页。
- ⑯ 《中央关于发展党的若干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第 437 至 440 页。
- ⑰ 任弼时在保卫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8 年 12 月。
- ⑱ 《中央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卷，第 557 页。
- ⑲ 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处理办法的决定，1949 年 1 月 27 日。
- ⑳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75 至 385 页。
- ㉑㉒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386 至 387 页。
- ㉓㉔㉕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记录。
- ㉖ 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任弼时选集》，第 464 至 473 页。

三十九、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

- ① 《人民日报》1949 年 2 月 26 日。
- ② 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任弼时选集》，第 474 至 492 页。
- ③④⑥⑦⑬㉗ 访问刘佳武记录，1989 年 4 月 22 日。
- ⑤⑩ 黄既：《怀念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第 200 页。
- ⑧ 单先麟、任培辰：《怀念任弼时哥哥》，《任弼时同志八十诞

辰纪念集》，第 129 页。

⑨ 毛泽东手迹。

⑪ 张爱萍：《怀念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第 158 页。

⑫ 傅连璋致杨尚昆转毛泽东的报告，1949 年 10 月 30 日。

⑭②① 任弼时：《给陈琼英等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103 页。

⑮ 苏联《党的生活》1947 年 5 月号。

⑯ 苏联《真理报》，1950 年 1 月 7 日。

⑰ 苏联《真理报》，1950 年 1 月 16 日。

⑱ 苏联《党的生活》，1947 年 1 月号。

⑲ 苏联《党的生活》，1947 年 7 月号。

⑳ 任弼时：《给任远芳的信》，《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第 107 页。

㉑ 任弼时致中共中央并陈琼英等的电报，1950 年 3 月 25 日。

㉒ 傅连璋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1950 年 5 月 29 日。

㉓ 傅连璋致刘少奇转毛泽东主席的信，1950 年 6 月 24 日。

㉔ 任弼时致毛泽东及书记处各同志的信，1950 年 6 月 26 日。

㉕ 毛泽东在任弼时 1950 年 6 月 26 日信上的批示。

㉖ 傅连璋给周恩来并转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11 日。

㉗ 陆定一：《痛悼伟大的人民战士——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第 69 页。

㉘ 任弼时：《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任弼时选集》第 493 至 494 页。

㉙ 傅连璋给杨尚昆转毛泽东主席的信，1950 年 10 月 25 日。

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1950 年 10 月 27 日。

㉛ 《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31 日。